

秘密与间谍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幕后的故事



[美]《读者文摘》社编·商务印书馆

秘 密 与 间 谍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幕后的故事

〔美〕《读者文摘》社 编

冯之丹 席林生 译

曹 惇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85年·北京

SECRETS & SPIES
BEHIND-THE-SCENES STORIES
OF WORLD WAR II

The 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

Pleasantville, New York, 1964

根据纽约读者文摘社 1964 年版译出

MÌMÌ Yŭ JIÀNDIÉ

秘密与间谍

〔美〕《读者文摘》社 编

冯之丹 席林生 译

曹 惇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3017·378

1985 年 7 月第 1 版

198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53,000 册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403 千

印张 16 7/8

定价：3.05 元

译 者 的 话

本书是一本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幕后的故事集，说的都是真人真事。许多文章的作者是有关事件的参与者，其中包括美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还有一些作者是名作家或新闻记者。文章取故事形式，写得生动活泼、质朴无华、真实动人，颇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这些文章先后发表在美国《读者文摘》上，后由该社汇编成书出版。全书分六个部分，文章按内容的时间顺序编排，并在每一部分的开头写了简短的引言。

这本书的内容非常丰富，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它通过各种各样人物的秘密策划和幕后活动，相当广阔地展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敌我双方在各地域各方面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其中既有最扣人心弦的突然袭击和间谍活动，又有可歌可泣的人民英勇抗敌传奇和奸诈凶狠顽敌的法西斯丑闻。在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中，秘密工作和间谍情报活动显然起过不小的作用。本书的各篇文章就是努力体现这个主题的。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书中对一些重大事件作了生动具体的叙述。例如，对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始末就说得很清楚，它包括偷袭计划的蓝本的来源、偷袭的过程和获得成功的原因。还有：欧战开始，丘吉尔政府是如何把英国银行中价值超过七十亿美元的黄金、股票和证券秘密地安全运到加拿大的；纳粹德国是怎样大量制造假的英镑，妄图破坏和扰乱英国经济的；德军重要将领隆美尔元帅为什么会被以及怎样被希特勒毒死的；希特勒本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自杀的；美国是怎样制造第一批原子弹并在广岛、

长崎投掷的；日本天皇是怎样扼制军方，宣告无条件投降的，等等，书中都有比较详细而生动的述说。

此书当然不能代替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但是人们通过这些真实的故事，可以获得许多生动的有益的历史知识。因此，似可把它作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一份参考资料。当今的世界仍然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斗争，有众多的间谍在活动，并且使用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更为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我们对此决不可漠不关心，掉以轻心。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也是值得向读者推荐的，它对提高人们的警惕性无疑是有益的。

译文倘有疏误，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第一部分 无耻的阴谋 (1941 年 12 月)	(1)
珍珠港事件的内幕	埃德温·马勒 (2)
和平的最后一瞬间——《虎、虎、虎》一书缩编	戈登·普兰奇 (6)
错过了五次机会	沃尔特·洛德 (27)
第二部分 背水之战 (1939—1941 年)	(32)
间谍的搜捕者	小弗雷德里克·桑顿 (33)
英国财宝向西转移	利兰·斯托 (39)
巴黎：虎口逃生	艾塔·希伯 (48)
跑掉的那一个	肯德尔·伯特和詹姆斯·利索 (77)
愚弄敌方空军人员	唐·沃顿 (100)
窃贼与爱国者	卡林·米凯利斯 (104)
直布罗陀的“人鱼雷”	法兰克·戈兹沃西 (108)
我们组织了法国的地下战斗 安德烈·吉罗德口述、乔治·肯特整理	(116)
不列颠帝国宠爱的间谍 一个前英国潜伏间谍向奥尔·纽门的叙述	(124)
纳粹袭击舰的游弋	罗伯特·利泰尔 (126)
赫斯飞行的秘密	威廉·贾·斯奈德 (133)
逃亡者们	罗曼·图斯基 (136)
第三部分 抗拒来犯之敌 (1942 年)	(140)
希特勒对美国的秘密入侵	劳伦斯·埃利奥特 (141)
大马尼拉湾的“白银行动”	约翰·格·赫贝尔 (150)
微点	埃德加·胡佛 (161)
胡爱的悄悄之战	托马斯·姆·约翰逊 (166)

搜捕一名间谍	卡尔·华尔 (173)
地下的“牧羊人”	乔治·肯特 (178)
吉罗德将军英勇越狱脱险记	弗雷德里克·C. 潘顿 (184)
北极行动	H. J. 吉斯克司 (188)
到北非去的秘密使命	弗雷德里克·C. 潘顿 (197)
宏伟的奇袭战役	唐·沃顿 (206)
我们在达卡等待着你们哩	多纳尔德·柯斯特 (210)
潜入搜查	威利斯·乔治 (217)

第四部分 以诈对诈 (1943 年) (231)

使轴心国上了大当的一具死尸	伊凡·蒙塔古 (232)
邮电检查员与间谍	玛丽·奈特 (237)
深藏密友的丛林	拉尔夫·伊·亨德逊 (243)
佩内明德镇的秘密	艾伦·艾·米基 (252)
拯救了伦敦的人	乔治·肯特 (256)
出卖希特勒的间谍	埃德加·胡佛 (262)
攻心战术	弗雷德里克·C. 潘顿 (267)
十一个人对付了纳粹的原子弹	小弗雷德里克·桑顿 (271)
历史上收入最高的间谍	劳勃脱·姆·瓦·肯普纳 (278)
计歼“夏霍斯特”号	斯·福雷斯特 (283)
慈悲为怀的密谋	乔治·肯特 (290)
通往自由的地道	帕尔·勃立克希尔口述 艾伦·艾·米基笔录 (294)

第五部分 反击 (1944 年) (312)

我扮演了一个假蒙哥马利	米·伊·克里富顿·詹姆斯 (313)
金色的斯芬克斯——军队的反间谍工作	托马斯·姆·约翰逊 (325)
圣·维多利监狱里的偶像	英德罗·蒙塔尼里 (330)
得自深海的密码本	坦尼尔·伽利列 (337)
“大裤管”	威廉·衣·布鲁尔 (343)
若隐若现的部队	勃兰克·克拉克 (347)

空中斗智	艾伦·艾·米基 (353)
这是个有无勇气的问题	多萝西·卡梅伦·迪斯尼 (359)
最长的一天	考纳林斯·雷恩 (363)
隆美尔之死的真相	康泰司·沃尔德克 (402)
神风攻击队成员的死亡	猪口力卫、中岛正 (407)
同希姆莱进行交易的美国人	埃德温·马勒 (412)
一次私下的休战	约翰·赫里沃德·阿列克斯 (417)
身带绝密件的人	小弗雷德里克·桑顿 (422)
第六部分 在战线后面的胜利 (1945 年)	(426)
欧洲最危险的人	托马斯·姆·约翰逊 (427)
蛙人	埃德温·马勒 (435)
躲藏在秘室的日记	路易斯·德·约翰 (439)
大伏击	威廉·L.惠脱 (445)
纳粹制造伪钞的阴谋···	乔治·J.麦克纳莱、小弗雷德里克·桑顿 (467)
阿道夫·希特勒的末日	小弗雷德里克·桑顿 (475)
与原子弹有关的一个神秘人物	约翰·根室 (481)
六十万人守口如瓶	托马斯·姆·约翰逊 (484)
赢得战争的秘密	弗莱雪·纳皮尔、查尔士·维·巴雷 (490)
裕仁天皇同军方的一场斗争	邦纳·菲勒斯 (517)
现在可以公开了	托马斯·姆·约翰逊 (523)

第一部分 无耻的阴谋

(1941年12月)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伟大战役、战斗事迹以及一幕幕英雄主义和勇敢无畏的场景，人们已写过许多故事。其中最扣人心弦的是那些有关敌友双方的秘密策划，即描写突然袭击、间谍网和间谍活动的故事。

自从人类发生战争以来，就有了间谍活动。古埃及人就拥有过组织得很严密的间谍队伍。摩西把约书亚派到迦南城去“窥探当地的虚实”。^①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由于在西班牙宫廷里安插了告密者，事先就获悉了“无敌舰队”的征战计谋。拿破仑宣称，一个好的间谍抵得上战场上两万名士兵。从乔治·华盛顿的时代起，美国在战争时期曾经常巧妙地使用了间谍和反间谍的手段。在这种时候，搜集外国军事情报的任务，主要由陆军和海军来执行，它们是分头活动的；而联邦调查局是只管国内的问题。在和平时期，美国过去并没有统一的搜集国外情报的谍报系统，也没有对付我们潜在敌人的高度发展的情报资料贮存库。

这种情况由于一日之间爆发的事件而发生了变化，这就是1941年12月7日那个静悄悄的星期天，日本人对珍珠港发动了秘密袭击。美国的太平洋舰队毁于一旦，举国震惊。所有的美国

^① 此典出于《旧约全书》《民数记》第十三章。摩西是以色列古老传说中的一位希伯来民族英雄，他于公元前十三世纪末率领以色列人逃出埃及。以后，以色列人又从沙漠进入巴勒斯坦，并征服迦南城。《旧约全书》中描述了摩西如何派探子进入迦南的情景。——译者

人都认为，美国决不能再这样毫无戒备地束手就擒了。

这里介绍三个关于密谋偷袭珍珠港的故事，作为本书的开场白。这三个故事联在一起，揭示了把美国推入人类历史上最大冲突的种种秘密战争计划和间谍行径的这出活剧。

珍珠港事件的内幕

埃德温·马勒

人人都知道，日本偷袭珍珠港，是按照一个老谋深算和精心安排的计划行事的。但是，在美国海军界以外，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计划并非构思于东京，而是产生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美国海军作战计划署。

故事可以追溯到1932年的1月。我们的一支由近二百艘战舰组成的舰队（到那时为止，也许是海军力量最大规模的集结）云集于加利福尼亚海域，举行一次考验珍珠港防卫能力的演习。舰队的一部分将发起“攻击”，而另一部分，加上港口的陆军卫戍部队，将进行防御。

担任攻击任务的舰队，改变了老一套的海军战略，舰队把所有耀武扬威的战列舰和巡洋舰留在后面，而两艘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和“列克星敦”号在四艘驱逐舰护航之下疾驶穿过东太平洋。海军上将赫·伊·雅奈尔自己是在“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上（而不是一艘战舰上），指挥着一个崭新的名为“特遣舰队”的海军群体。这位海军上将是一个热心于航空的军官，他曾经随同他所指挥的一些飞行中队作过许多次飞行，这在当时的海军中是颇不寻常的。现在，他正执行着这项新的航空母舰攻击战略，去袭击一个他在空中早已熟悉了的目标。

珍珠港的防务，在计划中首先是对付海军的进攻。这个任务

委托给了保护通向岛屿航道的一支舰队、港口里的一个潜水艇分遣队以及在海岸上的一个陆军满员师和高度密集的沿岸重炮群，这些重炮能够凭借设计完善的铁路和公路系统，迅速移动。另外还加上空中防御——高射炮炮群、一百架战斗机和轰炸机。

正如雅奈尔海军上将所盼望的那样，他在距离瓦胡岛只有二十四小时航程的时候遇上了阴霾的天气，使得负责防卫的舰队难于发现他的行踪。两艘航空母舰和四艘驱逐舰在大洋上是一个比较小的群体，特别是当防卫者正在期待着一支庞大舰队前来进犯的时刻，更是如此。没有人发现它们。

星期六（2月6日）薄暮，这些舰只已到达靠急速行驶到黎明时分即能进入瓦胡岛的这样一个位置。雅奈尔海军上将料想，在星期天的清早，防卫部队的警惕性总是要比平时差一点。

当夜幕降临，特遣舰队熄灭一切光亮，无线电保持缄默，它迎着阵阵暴雨、低沉的乌云和正在兴起的海风，全速行进在大海上。这是可以避免被人发现的理想的气候条件。但是，在这样的气候下；舰上的飞机能否起飞呢？驱逐舰甲板上的栏杆都被阵阵海水浸泡，即使巨型航空母舰也在大海里剧烈地摇晃着。

雅奈尔海军上将一直等到黎明前半小时、距瓦胡岛六十英里的时候，才让他的飞机起飞。突然间在漆黑的夜空中，一百五十二架飞机神速地飞离了颠簸在汹涌的大海上的母舰。

这个对珍珠港的第一次飞机袭击，来自东北方向。九年以后，日本对珍珠港的致命的袭击，也正是这样进行的。在冬天的大部分时间里，信风从东北方向徐徐地吹向两千八百米高的古娄山脉，在那里散发掉它的湿气。这可以说是为进行攻击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条件。因为，机群能够隐藏在象高空屏障的雨云层里，悄悄地接近目标。然后，在防卫者能够起而截击之前，这些机群就突然出现在珍珠港晴朗的上空。

这就是1932年2月7日(星期天)所发生的事情：从“萨拉托加”号和“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起飞的轰炸机、战斗机、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在云层中突然出现时，发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基地在它们俯视下，处于束手无策的困境。每个机群都有自己特定的任务。战斗机用模拟机枪射击，“敲掉”所有地面上的飞机，在这场袭击中没有一架防卫飞机能起飞迎击。同时，其他的机群投下它们的象征性的炸弹，炸毁军事设施或者“炸沉”在港口的所有假想的军舰。

攻击者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如果我们的全部舰队当时真的停泊在港口，而雅奈尔海军上将的飞机也都是带的真炸弹，那么，这些飞机早就能够把每一艘舰艇击沉或者毁坏了。

海军指挥官们对这场象征性的毁灭，在现场进行了“评议”。在那里开了头的讨论，以后在整个海军界里到处都在继续探讨。对于许多战略家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推翻一切现存的海军作战概念的某种事情已经发生了。

当然，总有一些人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不太以为然。他们说，这主要是由于突然攻其不备的缘故。诚然，如所预见的那样，防卫者在那个星期天早晨确是有点警惕不足，可是看来事情似乎是这样的，即使他们那时十分警惕，也不可能有效地对付这次偷袭。

一些高级军官要求修正海军所赖以建立的全部基础。他们发展了一种革新的思想，主张海军应以空中力量为主，以战舰和其他水面舰艇为辅，不应该以战舰为中心来组织海军，而把空军当作一种支援力量。不幸的是，他们的观点并没有引起注意。

说没有引起注意，那只是在华盛顿。因为在珍珠港现场进行的“评议”，并非是对这次演习的仅有的一次评论。美国海军方面现在知道，在美国举行演习后不久，东京方面就进行了另一次“评议”。

当我们的飞机进行模拟攻击的时候，瓦胡岛上高效率的日本间谍组织，对这个岛的所有制高点都派出了观察员，他们每一个人都编造了一个要在那里逗留的言之成理的借口。在沿着港口的茂密的灌木丛里，也有许多这样的观察者。小舢舨船也在近海“打渔”。事后，在檀香山只要有海军人员聚集的地方，就有偷听者出现。

在东京，经过精心而深入的研究之后，所有这样获得的情报成为一系列秘密演习的基础。我们现在知道，日本的海军专家们，同我们一些海军将领们一样，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现代海军最主要的武器是空中力量，一支舰队的打击力量应当围绕它的空中力量而不是围绕水面舰只进行建设。就这样，日本人从我们的演习中，学到了我们自己的海军将领们所拒绝学习的东西，日本海军从根本上进行了改建。

日本人进一步认识到，可以一举使大部分美国舰队报销的既光辉而又可行的一个计划，已经送上门来。他们在 1941 年 12 月 7 日执行了这个计划。

12 月 8 日，曾经在 1932 年从我们“萨拉托加”号和“列克星敦”号上驾机起飞的一些空军军官们，读到有关日本袭击报道的细节时，有如哑巴吃黄连，满不是滋味。可不是吗——这样一下，再这样，又这样，千真万确，正和我们自己九年前在演习中所做的一模一样！

在某种意义上说，日本人在 12 月 7 日所遇到的问题，比那次演习要困难得多。从理论上讲，防御力量比过去强大了，侦察来犯敌机的设施那时也有了巨大的进展。但是，由于我们缺乏警惕性，当日本飞机突然从古娄山脉的云障中钻出来的时候，我们竟毫无戒备。

从另一个角度看，事情又变得比过去更容易一些。飞机一架

接一架地停在那里，非常容易遭到猛然袭击，而太平洋舰队几乎全部的战舰，也都停泊在港湾里。

珍珠港的悲剧打破了海军作战的陈旧布局。正巧在12月7日那一天，没有一艘航空母舰停泊在珍珠港。于是，迫于需要，航空母舰的特遣舰队就成了我们主要的海军武器。我们几乎立即开始以远比日本为高超的技能，来使用航空母舰——不论是在珊瑚海、中途岛、拉布尔港或是在马绍尔群岛和特鲁克群岛。

和平的最后一瞬间——《虎、虎、虎》一书缩编

戈登·普兰奇

这是历史上的一场最冒风险、孤注一掷的赌博，是在很难想象的实力悬殊情况下所玩的赌博。到1941年12月7日为止，珍珠港这个有着美国的“太平洋的直布罗陀”之称的港口，一直被许多人认为是世界上防御最强的海军基地。日本为了进行对它的冒险袭击，集中了一支拥有三十一艘战舰的宏大舰队，其中包括六艘巨型航空母舰和三百五十三架飞机。这支舰队在人不知鬼不觉之中驶过大洋几千英里。这个在极端机密情况下策划的奸诈使命，在执行中实现了完美的攻其不备的奇袭，而整个特遣舰队没有一艘舰艇受到一点擦伤。直到本书出版之前，对于这个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行动的策划和执行情况的全部经过，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未被披露的伟大活剧之一。

三艘潜艇在主要战舰群前面一百英里处，飞速地穿过黑色的大洋波涛。它们在水下潜航，对于可能被截击的哪怕是最细微的动静，都保持着警惕。在它们的后面，由众多驱逐舰、巡洋舰、战舰和航空母舰组成的舰队，一个庞然大物的队形在海面上散开，其横跨海面的距离跟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到宾夕法尼亚州的哈里斯堡一样远。但是，这支散开得很远的舰队却消失在无边无际的太

平洋上，它从国内港口出发航行近三千五百英里而没有被人发觉。

在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轰炸机和战斗机以准备起飞的姿态排列成行，它们的机首都朝向船头，似乎急于待命出发。飞机的机械师们，看上去都象在可怕的阴暗里形影模糊的守护神那样，匆匆忙忙地走来走去，对飞机内的机械、无线电、起落架和油箱都进行了最后的检查。机关枪的弹药箱装得满满的，炸弹和鱼雷都在它们的发射架上。当一个机械师发现了在一颗炸弹边上用彩笔写着记号时，他不禁自个儿微笑。那上面涂着潦草的字样是：“这家伙将向美国开战！”

这就是日本帝国海军派出对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的第一支航空舰队——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行动，但日本人毫不迟疑地干了。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是一种荒唐透顶的军事赌博；一个丧心病狂的国家选择把自己的前途押在这场赌博上。

1941年12月7日黎明前的时刻，日本军舰上的气氛是严峻的。那些具有成百上千小时飞行经验的老驾驶员，感到处于待命状态的紧张胜于临战前的惊恐。但是，对那些刚刚完成训练的年轻军官来说，他们的心情却是在寒栗的恐惧中混杂着兴奋。在崭新的航空母舰“翔鹤”号和“瑞鹤”号上待命的未经考验的飞行员们，尤其感到神经紧张。当他们吞下“战前餐”、绿茶和大米糊的时候，他们感觉到这些食物似乎在胃里凝结起来。在指挥官作了最后交待任务的训话之后，许多飞行员在一个小神龛前停下来躬身默默地祈祷。其余的人则向舰上人员中的朋友和伙伴们告别。

不安的情绪绝不仅仅限于低级军官们中间。这支远征舰队的司令长官南云忠一在整个航程中，经受着彻夜不眠的焦虑，在他的舱内来回踱步。他从一开始就深信，这次作战使命是注定要失败的。负责空中作战行动的海军少校源田，觉得自己所肩负的使命艰巨而沉重。他总是无忧无虑，而这一次在发动攻击前的最后几

个小时，他老是凝想着那些无法预见的失足将会酿造成的危险。到了那一天，可能带来光荣和胜利，也可能带来——但愿祖宗神灵保佑不要发生！——巨大的失败。源田意识到，一亿同胞的未来系于他所作出的决定。

袭击珍珠港的计划是在不顾一切反对意见的情况下，由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官山本五十六一手策划和强行通过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山本是一个出色的战略家，他曾经断然反对同美国开战。当他在哈佛大学念书以及后来在华盛顿担任大使馆海军武官的时候，他早已亲眼看到了美国工业的威力。但是，山本又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和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他对天皇和自己乡土的爱，简直怀有火山迸发似的热情。他的那颗战士的心，继承了真正的日本武士道传统，那就是：忠于职守为首要任务。正象当时日本许多人一样，山本相信，日本人是优秀人种，被先知先觉的上帝选中，去完成一种无法逃避的使命。所以，在他的思想模式里，日本要在亚洲国家的共同体中起统治作用，那是逻辑的必然。

日本人长期以来梦想攫取南方富饶国土——菲律宾、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的资源，来支撑他们的帝国。如果这次袭击行动得以成功，那么，美国的海军就会被拦阻于南方水域之外，至少在紧要关头的最初几个月是如此。但怎么才能如愿以偿呢？山本处理这个问题，取决于他自己所受的训练及其气质。他是一个航空专家，一个勇敢的、具有独创见解的人，也是一个赌徒。他喜欢在自己的演说中引用格言，以使他的论点令人信服。他最喜欢用的一句格言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因此，他的眼睛不可避免地盯住了在珍珠港的虎穴夏威夷，那里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基地。在发动向南方地区的攻击以前，是否有可能摧毁这支美国舰队呢？

1941年1月的某一天，山本走进“长门”号旗舰舱内，写信给

他的挚友海军上将大西武次郎，他是日本海军中为数不多的几个真正热衷于航空的海军将领之一。山本提醒大西要对他们的设想绝对保密，他用笔飞速地写下了三页纸，把对珍珠港进行惊人空中袭击的计划勾画出了一个轮廓。大西是否认为这样一次袭击切实可行呢？山本在信中恳切地写道：“请对所涉及的种种问题仔细加以研究。”

大西海军上将所采取的最初行动之一就是召见源田海军少校，一个在“加贺”号航空母舰上服役的三十六岁的航空军官。他几乎不可能采取比这更为得力的步骤。源田是帝国海军中最卓越的航空人员，他雄鹰般的贵族脸庞——浓浓的眉毛，挺直的鼻子、坚定的下巴，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双无比锐利、几乎使人感到不安的黑眼睛。他的想法总是勇敢而富有想象力的，他已经对海军的航空战术和作战方案起过相当的影响。

当大西向他出示山本信件时，源田用心地读着它。山本想法中的敢作敢为和首创精神感染了他。他说：“这个计划是有困难的，但并不是不可能办到的。”他相信，首要的目标应当是美国的航空母舰，因为这些航空母舰对日本海军构成了最大的威胁。

源田回到“加贺”号上时，脑子里充满了新的想法。他在自己寂静的房间内，立即开始工作。两个星期以后，他给了大西一份关于拟议中的袭击的完整的计划。他认为，每一艘可以使用的航空母舰都必须参加战斗，而发动袭击的时间应当是在黎明前后，这样，大部分的挺进过程就可以在黑暗的掩护下进行。飞机应当包括俯冲轰炸机、高空轰炸机、鱼雷机以及战斗机。大西几乎批准了源田的全部想法，并且补充了一点自己的意见。他3月初送交山本的作战计划草案，基本上就是最后付诸实施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在一个月之内就着手执行了。海军中的飞行官员们所长期主张的战略思想终于付诸行动了。当时被指派到各海军部队去的五

艘航空母舰和十艘驱逐舰集结起来，每两艘驱逐舰跟随一艘航空母舰，这就组成了“第一航空舰队”。这个行动遇到了“战列舰海军将领们”的强烈反对，他们当时并不知道“珍珠港计划”（即使知道，他们也不会赞成）。但是，山本坚持干下去，而源田从现在起，则着了迷似地致力于执行这个作战计划，日复一日，就象一个怀着强烈宗教热忱的和尚一样。

山本是打从心眼里愿意亲自率领这支舰队，但他的现任职务离开他是不行的，这个位置就只好让给海军中将南云，主要是考虑他年长资深的缘故。南云是一个没有什么想象力的因循守旧的老水兵，一个被公认为航海和战舰演习的权威。然而在他漫长而载誉的事业中，从未和空军发生过任何一点联系。当他听到关于珍珠港计划的时候，他几乎吓呆了。

但是，在这个时刻，这个从来不易激动的南云感到欣慰的是，他相信这个卤莽的计划是怎么也不可能实现的。日本同华盛顿的会谈仍在继续进行（这是一个预谋的骗局，日本一直继续会谈到投下第一颗炸弹为止）。南云感到同美国开战之事决非已成定局。山本倡议这样一个计划，就有越俎代庖之嫌，搞计划这类事本来是应由海军参谋总部来承办的。除非参谋总部批准山本的计划——而这是南云认为不太可能的——否则这个计划是注定要在密件档案中睡大觉、吃灰尘的。

不管南云如何想法，走向战争的无情的步伐却在继续。7月25日，日本在法属印度支那建立了“保护领”，早已占领了印度支那北部的建立“新秩序”的部队又迅速进军，占领整个地区。次日，罗斯福总统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资产，禁止日本船只在美国任何港口装货和卸货，并且早在秋天就已停止装运生铁和废铁去日本，现在又禁止美国向日本销售石油。英国和荷兰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经济战争早已宣战了，”日本报纸写道，不难想象，“下一着会是什么。”

9月6日，裕仁天皇召集日本国的领导层对形势作了一番冷酷的估计。他们围坐在皇宫东厅第一室长方桌旁，天皇则坐在室内一侧的台上，一动不动，显得毫无表情，而近卫首相宣布开会，宣读《国策计划纲要》。这个纲要披露了以下内容：

一、帝国决心不惜冒风险与美国、英国及荷兰开战，以达到其在南太平洋之经济目标。战争准备工作将要在10月末以前完成。

二、在那个暂时规定的期限之前，帝国将试图通过谈判来实现其要求。

然而，这个国家的最低要求也是注定要使谈判失败的。因为如果满足日本的这些要求，那么日本就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而实际上把美国和英国在远东的手脚捆了起来。

现在，各界领袖们一个又一个地站起来发表对形势的看法。所有的人都强调要争取时间。经济状况的困厄将使日本变弱，而不是变强。她必须在她尚有足够储备物资的时候行动起来，因为英国的敌意和美国的禁运，已使日本无法再得到物资的补充。例如，铃木大将就指出，日本的石油储备已不足一年之需。如果日本不立即行动起来，那么，她将来就没有能力再有所作了。

最后一个说话的是天皇的代言人原吉道男爵。他代表天皇说，《国策纲要》使他感到困惑。“这个建议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强调了战争，而对外交则仅作次要的考虑。我相信大家正在尽一切可能通过外交途径来挽回这个局面，我这样想对吗？”在短暂的一片寂静之后，海军大臣吉川上将立即保证说，事情正是如此。但很显然，他的话并无说服力。

此刻，每个人都为之惊讶的是，天皇自己竟然对这次会议发表讲话。裕仁天皇过去是从来不在御前会议上亲自讲话的。但现

在，作为帝国的活生生的象征，这个日本的第一百二十四代皇帝，他站立着，放射出他的“神圣的光辉”。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首题为《大海之四方》的诗篇，这是他的祖父明治天皇的遗作。所有与会者都屏住气息地洗耳聆听。裕仁带着极度严肃的神情高声朗读：

“我认为，四海之内皆为弟兄，
但为何今日之风浪却如此不能平静？”

天皇告诉他的听众说，他曾一遍又一遍地诵读过这首诗篇。为什么不能把他祖父的关于国际和平的理想引入今天的现实呢？接着是一阵紧张的安静。最后海军参谋总长回答说，当然，最高司令部认识到外交的重要性，他们主张动用武力只是作为最终手段而已。陆军参谋总长附和这个意见，但天皇远不以此为满足。据近卫首相后来写道：会议在“空前紧张的气氛中”休会。

有些美国人认为，只要天皇愿意，或者他是一个更坚强的人物，他就可以否决这个珍珠港计划。抱有这种想法的美国人，并不懂得天皇在日本生活方式中所处的微妙而复杂的地位。他只能审议，提意见和批准，因为天皇必须同他的政府一致，以保持全国磐石般的团结。他是被人安排着升上他自己无限威信的旗杆上去的。可是，在这样的当口，裕仁天皇甚至对拟议中的珍珠港的袭击都一无所知。

不应当作这样的设想，即山本的大胆计划是得到一致支持的。事实上，几乎没有一个高级海军人员拥护这个计划。某些批评者认为，全部计划是毫无根据的鲁莽从事。另一些人把他们的视线专注于“南方作战行动”，他们认为仅仅这个计划就会把日本的海军资源弄到极端窘困的地步。还有那些战舰的将领们则深信，依靠象航空母舰这样装甲程度很单薄的舰船，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但是这些保守派所反对的山本却是一个令人慑服的手。

有一张山本的像片——是在他权力的顶峰时期拍摄的，揭示了这个即使按日本标准也属于矮个儿的、身高只有五英尺三英寸的人物。他的宽阔的肩膀因两个大肩章而特别被衬托出来；一个圆桶似的胸膛上，挂满了勋章和奖章。除了脸部以外，其外表显得颇为滑稽。他那隆起的嘴唇，挺直的鼻子和一对大眼睛，还留着不折不扣水手型的灰头发，这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的脸庞，一个野心勃勃充满意志力的人的脸庞。

在青年时期，他专心致志于学习，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为了更高度地集中精力，他连续地一层又一层地脱去自己的衣服，以期用寒冷来驱散疲惫。许多个严寒之夜，他的父母发现他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几乎是光着身子正在钻研代数或几何学的书。

现在当他听到关于珍珠港的“窃窃私语”时，山本在10月11日把大约五十名舰队的指挥员召集到“长门”号的旗舰上。许多海军将领们一个又一个地表示了他们的疑虑。而时间对于在北太平洋的作战行动来说，变得越来越危急了。公海和恶劣天气，会使中途加油或补充燃料成为不可能。而且还必须监视苏联的动向。1月份，即使曾与山本推心置腹的大西海军上将现在也认为，使用现有的航空母舰和飞机部队的计划是不明智的。

当山本站起来的时候，夕阳的余辉已从地平线上消失。他开始讲话很慢，但却表现了明确无误的决心。他说他已经记下了大家提出来的各种意见，这些意见都会予以考虑的。但是，他长期以来对整个战略形势进行着研究。对夏威夷的军事行动，是日本的宏大战略所必需的，「没有这一步，对南方的挺进将会陷于失败。因此，有一点他必须使大家都明白：“只要一天我担任着这支联合舰队的总司令官，就一定要袭击珍珠港。”这个声明一下子澄清了当时的气氛。每个舰队指挥官从此懂得，从现在起不会再有什么喋喋不休的争议或牢骚埋怨了。如果日本启战，那么这支舰队就

会带着水兵们的伟大十字军式远征的振奋和团结心情投入战争。

但是，海军军令部仍然坚决反对珍珠港的袭击计划，在这里，问题要更加棘手。因为山本要同日本海军的最高权力机构打交道。然而，这位海军大将并不是一个徒有虚名的玩扑克牌的高手。10月末，他决定派出一名特使到海军军令部去同他们摊牌。他挑选了他的高级参谋军官黑岛上校去完成这项任务，而且授意他在一切办法都用尽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最后的杀手锏。

黑岛直奔海军军令部作战部能干的部长富冈上校那里。他并没有来什么客套而是开门见山亮出底牌。

“山本大将坚持一定要采纳他的计划，”他对富冈说。“他已授权我郑重声明，如果这个计划不被采纳，那么，他就不再能对帝国的安全负责，他和他的所有部下除了提出辞呈以外，就别无其他选择。”

富冈瞠目结舌，他为这一威胁的巨大力量所慑服。然而他表示他只能作为个人意见同意这个袭击计划。于是黑岛依次对军令部人员逐个进行工作。黑岛一次又一次地使用了山本的雷电般的冲击手段，最后终于使海军军令部作为一个整体批准了对珍珠港的袭击。这是山本的一次大胜利，要说他在日本海军的地位和影响，那是绝无仅有的。海军军令部的任何一个成员只要一考虑到打仗，从来就认为不可能没有山本来作联合舰队的舵手。“这简直不可思议，”一个海军大将后来这样说。

从那时起，日本在夏威夷的间谍就加紧行动起来了。珍珠港被划分为代号A、B、C、D、E的五个区，过去仅仅说明哪些美国舰艇在港口停泊的一般性情报，已经远远不够了。现在东京要知道每一艘美国舰艇的准确的停泊地点。而且，还必须回答关于美国在珍珠港空中巡逻以及飞机部署方面的无数问题。这种情报大多

数是通过完全合法的手段，也就是通过观察得到的。日本驻檀香山领事馆的若干成员组成了一个高效率的专职小队，从事这项任务。中心人物是一个自称森村的年轻的办事员，他的真正名字叫做吉川。他过去是帝国海军的一名少尉。

1941年3月28日，当吉川抵达夏威夷时，他向喜多总领事报到。喜多是一个职业外交官，他新近才被调到夏威夷来同吉川一道工作。喜多颇感兴趣地端详着他的新来的年轻伙伴，他看到了一个中等个子的苗条英俊的小伙子，看上去要比他二十九岁的实际年龄小得多，根本不象个老练的间谍。说实在的，他看上去真是天真质朴得令人深受感动，老头子会称呼他为“我的孩子”，老太太则会为他乱操心，年轻的姑娘们会围着他团团转。他过去没有从事间谍的经验，而且他还失去了左食指的第一个骨节，这可能成为外形上的一个致命的自我暴露。喜多十分怀疑吉川是不是合适的人选。

但是，东京在这种事情上是不会犯错误的。吉川之缺乏经验，恰恰是一个有利因素，因为他从来也没有被列入会引起美国情报机关注意的使领馆随员的名单。他所准备的条件，是堪称典范的。他出身于卑微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警察），他在海军学院上过学，并且当过大约一年的海军少尉，直至病魔迫使他从海军退役。

已经习惯于海军生涯的吉川，显然不再能适应平民生活了，好几个月来他抑郁不乐。于是，一个管人事的海军军官来访问他，并且建议，如果他愿意充当谍报人员，海军仍然可以为他找到一个位置。他当然得放弃未来提升发迹的希望，可是对他来说，只要能回到他所热爱的海军，这样的代价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了。

给吉川的任务很简单，他要成为一个熟悉美国太平洋舰队及其关岛、马尼拉和珍珠港基地的专家。为此，他要提高他的英语水平。以后四年，他留在“美国组”，学习《简氏战舰和飞机手册》涉猎

美国报章杂志和技术书籍。他如期地懂得了每一艘美国战舰和每一架美国飞机的名称、型号、外形以及它们在技术性能方面的特征。

1940年末，他获得指示去参加外交部举办的英语考试，这样就可能担任低级外交官，以“掩护”他的真正使命。据当时海军情报署次官、海军上将小川说，这种安排在当时并非是异乎寻常的。一个海军军官可以被撤职，而故意被安排成为一个平民。随后他就会在日本外交部获得一个职务，并且被派到他能为海军作最大贡献的地方去。总之，这个程序是完全适用于吉川这个例子的，海军领导部门先对海军医疗部队发出一种谨慎的暗示：吉川少尉脱去海军服比他留在海军服役更为有用，因此，可以给他一个适当的游手好闲的时机，以便使他渴望获得新工作。这样就可以……

在檀香山，他被指派了一个名义上的职务——在美国国务院记录中是总领事馆的一个秘书。以后，吉川投入了工作。他每天从头到尾地阅读檀香山的报纸，尤其注意船舶消息和美国海军人员的社会新闻。他每天穿过珍珠港市区来回漫步，可以看到福特港和岛上的简易机场的全景。每星期总有两三次，他在一家由老年日侨开设、位于珍珠市半岛末端的小吃店逗留，吃顿快餐。这里恰好是福特岛的正对面，也是吉川能够接触到珍珠港的最近的地点。

这里，他可以依靠直接的观察知道很多事情，诸如舰队是否即将出发？它是不是正在补充新的给养？夜间，他也经常光临美军人员常去的酒吧间，请他们喝一点，窃听着关于军务的一些闲聊和议论。但他很少直接提出问题，为的是怕招惹别人注意。因为担心被人发现常使他紧张不安，联邦调查局的阴影就象无休止地缠着他似的。喜多曾经提醒他，要警惕这个可怕的机构。他常常害怕在总领事馆，或者在某一个他所常去的餐厅里安装着窃听设

备。吉川往往在深夜里，在领事馆其他人员都熟睡之后向喜多汇报。他和喜多用相互写字条的办法来进行绝密的讨论，讨论之后就把字条烧掉。

吉川已成为檀香山出租汽车司机们的老主顾，因为他经常坐出租汽车，有时在途中常常要换好几次汽车。喜多不赞成他有一辆自己的汽车。汽车牌照太容易被人识别和跟踪，而且一个小小的事故也会意味着要向警方作一次令人困窘的报告。

到夏威夷来的外国旅游者络绎不绝，为吉川提供了许多机会。直到美国禁止与日本的所有贸易之前，他可以迎接每一艘进港的日本船，跟上一批上岸的日本国民，并带领那些不会有任何察觉、而只是喜出望外的旅客们去进行观光旅行。这为他多次短程旅行提供了有效的掩护，否则，他的这种旅行也许会令人可疑。有一次，他穿上他的漂亮的夏威夷衫，带上他的一个日本艺妓朋友在瓦胡岛上空作了一次空中旅行，这次短程旅行使他在空中清楚地鸟瞰了惠勒和希根机场。他还从水上侦察这些机场，有时通过垂钓远足，有时则作为一个游泳者。

爱伊亚的甘蔗田提供了窥视珍珠港的最有利的条件。好几次，吉川穿上庄稼人服装去研究港口里的舰队，每次利用一片不同的甘蔗田，留在田里的时间每次不超过三十分钟。

吉川经常去光顾的地方之一是“春潮楼”（春潮饭馆），是设在阿来瓦山岗上的一座日本式的茶馆，从那里可以看到珍珠港和希根机场的最清楚的景象。有时候，他佯装喝得酩酊大醉，动弹不得。于是，“春潮楼”上的好心的经理就会小心翼翼地把他带到一个房间里去过夜，使他能饱览港口全景。

就在这样的一次机会里，吉川看到舰队清晨从港口启航，这是一次使任何水兵看了都要为之倾倒的壮观！他怀着敏锐的职业兴趣进行着观察，核对着舰队出港所需要的时间，注意着他们用的什

么样的布阵方式，以及每一艘舰船部署的位置。这是东京所需要的重要情报，因为袭击开始后，美国舰队如果企图出港反击，日本就能相应地调整他们的时间表了。

8月7日，惠勒机场举行“狂欢日”，周围的公众都被热情地邀请去参加。吉川就是那些乐于接受邀请的人们之一。带照像机是严格禁止的。但这种禁令对他是不满不在乎的。他亲眼看到了一切，点滴不漏，当他一回到总领事馆时，就写下了他的种种印象。

吉川的日程是排得满满的。对他来说，根本就没有节假日，而星期天不过是另一个工作日而已。虽然日本在夏威夷还有其他的情报网，但吉川不无理地把他们看作非专业人员的工作。

美国的领导人是否警觉到珍珠港是一个潜在的目标呢？当然有所警觉！1941年1月24日海军部长诺克斯写给国防部长史汀生的信里说：“如果最后同日本发生战争”，“那么可以相信，敌对行动很大可能将从袭击珍珠港的舰队和基地开始”。

三天之后（在山本把他的秘密计划告诉大西之后不到两个星期），美国驻日本国大使格鲁向美国国务院发了一份密电：

“我的秘鲁同事已从许多方面——包括日本方面获悉，正在策划对珍珠港的突然袭击，以对付一旦日美发生麻烦的局面。彼称其所以将此情报转来，是由于各方均在盛传此一消息，虽然这一计划看来不无荒诞。”

国务院把这个情报（历史上最重大的情报之一）转给海军当局，海军当局又把它送到了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上将手里，并作了如下批示：

海军情报处对这些谣传不予置信。根据已知的有关日海陆军部队调度的材料来看，尚无迹象显示，有任何针对珍珠港的行动迫在眉睫，或在可见之将来会策划这一行动。

尽管这样，在2月15日太平洋舰队发出的一封机密信件中，金

梅尔曾认为，“在宣战之前，可能会发生对珍珠港舰只的一次突然袭击。”在1941年参谋人员所写的三份卓越的、准确得令人惊讶的报告中，也包含这种假设。最后的一份是夏威夷空军第五轰炸机大队指挥员威廉·法辛上校所准备的关于《夏威夷空中形势》的研究报告。这份有预见性的文件在8月20日送交了国防部。文件认为日本可能会使用六艘航母对珍珠港发动偷袭，而发动这样一次空中袭击的最有利的时间是在黎明时分，进攻线路最可能是来自北面。

为了预先阻止这样一次袭击，这份报告所建议的许多防御措施中，有一项是：空中巡逻机必须“在白天对夏威夷地区完全彻底地保持三百六十度的搜索”。为此，夏威夷空军需要“一百八十架B-17D型飞机或者其它具有同等航程的四引擎轰炸机”。

如果凭这个计划就能致敌于死命的话，日本人早就完蛋了。但是，美国空军并没有一百八十架空中堡垒。所有能够使用的这类飞机都已部署在菲律宾、英国和大西洋战区，在那里美国的国策是集中全力打败纳粹德国。事实上，12月7日日本发动攻击时，美国空军只有十二架B-17飞机驻在夏威夷。

1940年夏季，美国的密码专家破了日本外交密码，这是情报史上最光辉的成就之一。吉川的间谍报告和东京的答复，以及日本驻华盛顿使馆同国内往返的电报，现均已为美国所洞悉。但是这一巨大宝库也很可能是处于一种被埋没的状态。美方截获的许多极其重要的电报，堆压搁置，未能及时译出，有时延误一个星期以上。在情报传送方面——对于情报工作的要求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也存在着缺陷。情报未能及时传送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工作不称职；部分原因则出于对保护情报来源的关注。因为情报扩散可能会导致日本人怀疑其密码已经被识破，所以有的情报往往对最需要知道它的人也隐瞒起来。金梅尔海军上将断言，这些所谓“奇

迹”般截获的电报，没有一件曾经到达他的手里。

秋天，人们看到，美国人顾不上珍珠港，而必须正面对付大西洋上急剧上升的战争风云。当9月4日一艘德国潜艇在冰岛附近击沉了一艘美国的驱逐舰时，大西洋航道的战斗达到了高潮。在这一阵喧嚣之中，有关日本的消息被刊登在报纸的后几版，直到12月7日以前就从未取得头条标题的位置。基迈尔在9月12日忧心忡忡地写信给海军作战署的首脑史塔克海军上将，指出“太平洋仍然是世界形势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史塔克宽慰自得地答复说，“我个人不相信日本人会攻打我们。”

这种心情是普遍的。当美国人全神贯注地眼睛盯住大西洋的时候，很容易忘记他们的后门是敞开着的。

9月末，海军中校源田开始训练袭击珍珠港的第一航空舰队飞行员。这项任务是艰巨的。又由于需要绝对保密而不能向飞行员明说训练的目标，这就更增加了工作的艰巨性。各种不同类型的飞机——高空轰炸机、鱼雷机、俯冲轰炸机、战斗机——必须机动配合，成为一支紧凑有力的打击力量，不是四十架或五十架飞机而是数百架飞机，结成完美无缺的群体飞行。完成这项任务的时间已经不多，随着时钟的每一下滴答声，时间正在飞逝以去。

这样一支打击力量的指挥者，必须完全精通本行，并需要无限的耐心和不寻常的领导素质。当然，按照常规的做法从主管人事的部门“摸彩口袋”中任意选一飞行军官予以委派，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源田胸有成竹，知道最适宜担任这项任务的人选：他在海军学院的同学渊田美津雄海军少校。他三十九岁，仍然是一个现役飞行员（而源田已经不是了）。他是侵华战争中的一名老兵。他有三千小时空中飞行的纪录，他驾驶着飞机，仿佛自己就是它的组成部分。他在日本海军中享有工作最勤奋的军官的声誉。当源田把珍珠港的计划告诉他时，渊田立即心向往之，有如雄鹰迎风展

翅。

与此同时，日本完成了另一个极其重要的执行情报任务的安排。9月间，东京政府开始和美国谈判，企图使美国对日本船只进入港口的禁令有所放宽。经过日本野村吉三郎大使同美国国务卿赫尔之间的几个星期的讨论，他们达成了这样的协议：三艘载客的船只如果它们不带货物，就能够从日本驶进夏威夷和美国港口。美国政府诚心诚意地作此让步，以期有助于缓和美日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而日本却立即背信弃义。正如日本人所十分欣赏的如孙子等中国古代兵法专家们的话“乘敌之虚而入”。

10月23日，三艘日本船中的第一艘“龙田丸”开抵夏威夷。这艘船刚一抛锚靠岸，日本总领事喜多就登上船去，船长交给了他一份密封信件。这是来自日本海军军令部的信件，在提出其他需求的同时，要求提供一张详细地图，标明瓦胡岛上每一个军事设施的位置、规模和力量。一个特别使团将会很快前来取走这张地图，并对喜多等授以其他紧急而重要的机宜。这个使团将包括海军少校铃木，他是研究美国在太平洋的空军力量的权威。还有海军中校前岛，是一个潜艇专家。他们前来对珍珠港形势作出他们自己的估计，然后亲自向海军军令部进行汇报。

“龙田丸”在夏威夷稍事停泊之后，立即继续驶向美国本土。第二条美国批准的日本船是“太阳丸”，它载着铃木和前岛，其航程只到夏威夷。在东京，一位政府发言人向好奇的外国记者们解释说，这仅仅是由于“安排时间表的方便”而已。

“太阳丸”10月22日从横滨出发。铃木和前岛的名字，都没有出现在乘客的名单上。铃木作为一个助理会计员，而前岛则作为船上的医生。这条船一驶离日本海岸到看不见陆地的地方，就转向循着朝北的路线驶去，这就是计划中袭击珍珠港的舰队将要

采取的路线。在整个航程中，两个军官日夜轮班交替认真仔细地观察着地平线。结果是出乎意外的。在驶向夏威夷的整个航程中，没有看到任何种类的一条船只。一路上都是好天气——大部分都是铅灰色的天空，有足够的雾气可以构成提供隐蔽的一层薄幕。直到离瓦胡岛八十英里处，第一架美国巡逻机才从云雾中探出它的机头来。

11月1日星期六上午8时半，“太阳丸”悄悄地驶进夏威夷港。这个时间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这是周末，又是拟议中进行偷袭的相仿的时刻。这艘班轮在靠近阿洛哈塔的八号码头抛锚，这两个军官就能够用双筒望远镜，从船尾对珍珠港及周围地区进行稳妥可靠的观察。“太阳丸”在港口停泊了五天。在这期间，铃木和前岛都呆在船上。这是根据命令行事的。日本海军军令部不希望有一个特务被美国官员看到或被查问，他们不希望引起任何怀疑。喜多总领事三次到船上访问他们，领事馆有两个成员随他一起来，把材料带上船或从船上带回去。这样，如果遇到美国反间谍人员搜身，在总领事身上什么也发现不了。如果一个低级官员被查获有违反规章的行为，那就有可能解释一番开脱了事。

喜多不允许这个主要间谍吉川靠近这条船，以免联邦调查局跟踪他，但是，铃木交给喜多一张要吉川提供答案的一长串问题的调查表。海军军令部提出的许多问题之一，是询问瓦胡岛是否在警戒中。美国人会不会一声令下就立即投入战争；还是有可能在失去警觉的情况下束手就擒？吉川的答案是颇为有利的。

吉川把一张详细的地图、一长串问题的调查表以及其他一些材料交给喜多，而喜多的一名助手，把这些珍贵的材料夹藏在一份地方报纸中间，轻松愉快地走上跳板。当这件任务安全完成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太阳丸”在11月5日返回日本。搭上这条船的乘客们都得经受“夏威夷海关最广泛细致的一次检查”。但在他们

的行李中或在他们的身上，没有被发现任何违禁品。

现在准备工作的速度进一步加快。11月6日，渊田演出了在一切方面尽可能模拟珍珠港袭击的“彩排”，使用了一支以六艘航空母舰和三百五十多架飞机组成的特遣力量，并在二百英里之外部署了靶子舰只，仿佛它们就在瓦胡岛那里一样。

当担任袭击任务的舰队即将出发的时刻，日本当局采取了向日本人民隐瞒事情真相的周密的安全措施。为了尽量掩盖航空母舰上大量飞机的“出走”，附近的空军单位接到指令，要派出飞机到空军基地和城镇上空增加额外飞行次数。这样，大群飞机的突然消失就不致引起人们的注意。所有的海岸部队都鼓励让尽可能多的人员请假外出，使街道上能够看到许多穿蓝夹克的海军人员。整个舰队在航程中，连无线电通讯也完全保持缄默。舰队启航后，从日本发出电讯和指示的数量自然要增多，但是几个星期以来，海军早已制造了伪装的电讯往来，以便使无线电报活动的增多不致引起注意。所有这一切都给人造成这么一种印象，即“平安无事，一切照常”。

11月17日将近傍晚的时候，山本和他的参谋人员登上了停泊在佐伯湾的南云的旗舰“赤诚”号，向舰队上的那些关键人物祝福。山本的讲话并不是一些老一套的勉励之词。他坦率地告诉他们，虽然日本人希望奇袭能够得到成功，但每一个人都应当准备迎接“美国人的凶猛的抵抗”。接着，在舰上的军官餐厅里举行了欢送宴会，气氛是严肃的、充满着尊严，甚至有一点沉重。但是，在这个插曲中，山本表露出了他的真实的心情。他说，“我期待这次行动马到成功。”按照通常仪式的惯例，指挥舰队的海军上将往往只表示“希望”未来的使命获得成功。而山本充满信心的用词，使他的听众深受鼓舞。他们吃着象征幸福的干鲑鱼和象征胜利的栗子糕；然后，他们以天皇的名义，为即将到来的战役干杯：“万岁！万岁！”

万岁！”

夜幕降临，“赤诚”号熄灭了灯火，启锚驶向大海，两艘驱逐舰静悄悄地结伴而行。同样的舰群在海岸边起伏，有的靠近岸边航行，其他的舰群则航行在一百英里之外。总共有三十一艘舰只，其中有六艘航空母舰、两艘主力舰、两艘重型巡洋舰、一艘轻巡洋舰、三艘潜水艇、九艘驱逐舰、八艘笨重的油船。最后驶离基地的是曾在佐世保港修理的“加贺”号航空母舰。

舰队的集合地点选在单冠湾，这是千岛群岛中的一个岛屿择捉岛边上一个荒凉的多岩石的海湾。千岛群岛由于终年雾霭弥漫而又名“烟岛”。这个海湾位于东京以北一千英里以外的航迹罕至的大海，在那些海盗盛行的年代里，曾被海盗们当作理想的隐蔽所。正是从这里出发，在11月26日（星期三）的一个灰暗的黎明前的时辰，这次命运所系的航行开始了。这支宏伟的特遣舰队的舰只，在晨雾萦绕中象幽灵一样，滑出了停泊地点，启锚远航。

一个出色的迷惑性的行动，是“龙田丸”在12月2日驶离横滨。这条船是日本被允许驶向美国的三艘小客轮之一。她的公开任务即“用从远东疏散的美国人交换侨居美国的日本国籍的人”，这样的使命是合情合理的，并被广泛地刊登在美国报刊上。“龙田丸”预定在12月14日抵达美国。12月3日，《纽约时报》从东京发出的一则报道认为，“这是一个信号，说明就日本来说，在若干时间内是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12月7日以后，“龙田丸”却倒转航向，中途折回日本。

在特遣舰队海上航程的第七天，从日本发来的无线电指示至少解决了南云许多困惑问题中的一个难题。这个日子在国际子午线以东是12月1日（在日本是12月2日，那一天“龙田丸”开始了她的迷惑性的航行）。来电称：“攀登新高峰1208”，这是发动袭击的密码信号，宣布谈判已经告吹，开战已成定局。来电还第一次通

报了袭击的日期：12月7日。

舰队正好穿过美国在中途岛基地北面的危险水域。紧张的气氛越来越浓了。因为在这个区域，他们是很有可能被偶然经过的美国船只或美国飞机发现的。但真是奇迹，舰队竟然没被发现，舰上的每一个人抱着舒了口气而又尽力抑制得意的心情。现在，所有人都磨拳擦掌，作好了战斗的准备。而野村大使和来栖三郎特使却接到指示，要他们在华盛顿继续保持和平对话。

12月6日，特遣力量的每一艘船舰都装足了燃料，几艘加油船（除了三艘已返回日本以外）都被派到袭击后指定汇合的地点。中午刚过，所有的水兵都被召到甲板上。天皇的宣战诏书在那里被宣读，接着是山本的电报，写道：“帝国之命运取决于此一战役，望我海军官兵各尽职责，努力奋战。”

在日本海军统治层里，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珍珠港。“夏威夷，你将象一只老鼠陷入捕鼠器一样。”山本的总参谋长宇垣大将在他的日记里秘密地写道，“只有一天时间了，享受你那和平的美梦吧！”然后，他以难于抑制的心情写道：“把一个民族的命运就这样押在一场赌博上，这该是多么惊心动魄的事情呵！”

12月7日上午5时30分，首先被派去侦察的两架远程海上飞机，从重型巡洋舰“筑摩”号和“利根”号的甲板上迅速起飞。这些不祥的鸽子飞越瓦胡岛和毛伊岛旁的拉海纳安科雷奇上空，对美国的舰队作最后一分钟的侦察核实。如果它们被发现，那就自然会引起敌人警觉。但这是经过深思熟虑而进行的冒险，为取得准确无误的情报的迫切需要，非此不可。

又过了一会儿，在黎明前的昏暗之中，情绪紧张的甲板上的水兵们准备好了跑道，为掀起第一次袭击波的日本“雄鹰”发出起飞信号。航空员们则准备进入机舱，每一个人都用一条缠头巾绕在他们的皮制头盔上。这是一条狭长的布条，按照古老的传统，武士

们在进入战斗之前都要把它系在头上。每一个航空员头上所扎的那块布条上都写着“必胜”字样。

当飞行员渊田少校在“加贺”号航空母舰上开始爬进他的那架带着黄色、红色条纹的方向舵尾巴的轰炸机时，舰上留守部队的一个资历较高的军官向他呈献了一块特制的白色缠头巾。他说，“这是‘加贺’号水兵们送给你的，”“我们愿你代表大家带着它到珍珠港去。”渊田向他深深一鞠躬，然后把这条白头巾结在他的盔帽上。

飞机起飞的整个行动执行得顺利而又神速。第一次袭击波包括四十三架战斗机、四十九架高空轰炸机、五十一架俯冲轰炸机和四十架鱼雷机。当第一架飞机离开母舰后的十五分钟内，全部一百八十三架飞机都飞上天空。这是最快速的起飞纪录。加上第二次袭击波的飞机，总共有三百五十三架飞机参加袭击，这是到那时为止，人类战争史上海军飞行力量最大的一次集结。

日本帝国的东升旭日，从来没有上升到这样的高空，所有的人们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欢呼的水兵们，有的泪水顺着脸颊淌了下来，挥舞着他们的帽子，直到飞机渐渐远飞，蜷缩成针尖模样。“加贺”号司令官源田也感到一股自豪的巨浪在心头涌起。当耳际仍鸣响着嘶哑的“万岁”欢呼声时，他跑进了“加贺”号的操纵指挥室，等待着渊田少校达到目标后发来的电讯。

在横贯太平洋航道上散开布阵的日本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舰队，也都等待着这个讯息。它将会使他们立即在十二条前沿战线上投入战斗。在遥远的祖国，山本也同样等待着。在东京，海军军令部的主要成员都以严峻的表情忐忑不安地聚集在海军俱乐部里。那些袭击者能够来它一个迅雷不及掩耳吗？还是会中途被发现以至遭到毁灭呢？

最早的消息终于到来了。两架侦察机中的一架向袭击者报告

他们的侦察结果：所有美国的舰只仍然都停泊在珍珠港，而且美国人没有一点警戒的迹象。

在准7点49分的时候，从夏威夷的天空传来了渊田发出的电波。“托，托，托，”这是日本字“突然袭击”的第一个音节，这意味着第一次打击正在进行。但它并没有关于那次袭击情况的任何细节。

几分钟以后，另一个电讯传过来了。渊田向在“加贺”号上和东京焦急等待着的上司们发来了报喜的信息。“托拉！托拉！托拉！”（虎！虎！虎！）这是事先安排好的密电码，传递的信息是：这次突袭已完全成功！

错过了五次机会

沃尔特·洛德（《值得追忆的夜晚》一书作者）

自从1941年12月7日以来，我们一直在争论着究竟谁该为珍珠港事件负责，这一争论是有道理的。用这么三百五十三架日本飞机去完成这样一次突然袭击，当然是历史上所付代价最小的军事胜利之一。袭击过程只花了两个小时，我们停泊在港湾的八艘主力舰全部被击沉和毁坏，我们的许多巡洋舰和驱逐舰当场被击中，我们在瓦胡岛上的六个主要空军基地全部被摧毁，我们的飞机几乎全部完蛋。此外，为数两千四百名以上的美国人丧生。而当日本飞机飞回他们的航空母舰时，清点一下，只损失了二十九架飞机和五十个人。

许多有学问的人花了很长时间，对这个主题的军事方面进行了研究。但是，对于外行的人来说，更为发人深省的是，人性在12月7日未能避免的灾祸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即使完全不谈华盛顿是否提供了足够的情报，或者夏威夷的指挥部是否适时地利用了

所获得的情报和它所拥有各种设备，就是在最后几个小时之内，还是有五次大好良机，足以避免这场灾祸。但是因为人毕竟是人，所有这五次机会都失掉了。

第一次机会是在攻击发生前的傍晚 6 时 30 分，日本的舰队仍在五百英里之外的时候。当檀香山沐浴在和平时期最后一次的落日余辉时，情报官员乔治·比克内尔中校急忙跑到司令官沃尔特·肖特中将那里，告诉他一则最令人感兴趣的消息。联邦调查局监听到东京方面打给檀香山一个日本人的电话对话。东京方面问及飞机、探照灯、舰船、天气……还有一些花卉。在檀香山的那个日本人答称：“现在是全年中开花最少的季节；然而，木槿花和圣诞红现正盛开。”

这两个军官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天下竟有这样的人愿意花钱打一个跨太平洋的电话来谈论花朵？而如果那是间谍活动的话，又有哪一个间谍会使用象电话这样容易被人监听的手段呢？

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仍然不清楚东京叫这个电话的意义，虽然从事后发生的事情来看，这是十分令人可疑的。但是，当时肖特将军在同他的部下辩论一个小时之后，得出一个非常合乎常情的结论，他决定暂时搁置，先去睡觉，明天再议。就这样，傍晚徐徐进入黑夜。这是一个宁静的傍晚，而不是人们通常臆想的那样一个狂欢作乐和放荡之夜。

次日凌晨 3 点 42 分，日本舰队现在只有二百七十五英里的距离，一艘小扫雷艇“秃鹰”号发现在珍珠港港口外边有一架潜望镜。她向正在巡逻的“华德”号驱逐舰发出了闪光警号。“华德”号冲了过去，足足搜索了一小时，但毫无所获。

“秃鹰”号一直没有把这个发现报告给总部，因为船长很合乎人之常情，他想既然在一个小时里什么也没查获，那一定是他弄错了。而“华德”号也一直没有报告，这是因为“秃鹰”号并没有报

告。总之，“秃鹰”号毕竟是那艘声称它曾看到过某个东西的船只。海军无线电台，全部时间内都在监听着，也从未向总部报告，这是因为“华德”号和“秃鹰”号并没有提出报告。正是这样，那些后来被证明是勇敢、机智而聪明的品性端正的人们，却听任另一次机会被轻轻地溜过去了。那架潜望镜千真万确，就是日本人的。这是为了配合空袭而派出的许多小型潜艇之一。当“秃鹰”号和“华德”号之间互发最后信号的时候，第一批日本飞机正从二百三十英里外的航空母舰上起飞。

现在到了清晨6点45分，日本的航空联合舰队距离珍珠港只有一百八十英里了。仍然在执行巡逻任务的“华德”号，正好在珍珠港口外看到了一艘奇怪潜艇的观察塔。她立即冲向前去，向它开火，施放深水炸弹，把它击沉了。一架海军巡逻机参加了这场战斗，也向这艘潜艇扔了几颗炸弹。驱逐舰“华德”号和那架海军巡逻机都向岸上报告说，有一艘潜艇在严禁航行的水域里被击沉。海岸上的反应是非常合乎常情的，那些高级军官之间电话来往不绝：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真的吗？不是这样吧？他们断定，“华德”号看到的也许是一个桅杆或者是一个浮标，还说不定——天知道，是一艘美国自己的潜艇，由于误会而被击沉了。他们命令值勤待命的驱逐舰去帮助“华德”号，并决定静观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这也是合乎常情的。

7点钟，日本飞机只距离一百三十七英里了，在奥本纳雷达站的两个陆军士兵发现在雷达屏上从来没有见到过那么多的尖头脉冲，多得使他们以为雷达的机件损坏了。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而是一支有许多飞机配合的巨大的舰队向着群岛席卷过来。他们打电话给情报中心。那里值班的是一个年轻的尉官。他生平只有一次曾接触过这样的任务，而他对雷达却一窍不通。他的平时的顶头上司们那一天都没有值勤任务，而他的下属人员也

都吃早餐去了。

所以，千斤重担都系在一个象小兵那样束手无策的年轻军官的身上，既无上级，也无下属，而自己对面临的问题又毫无知识。但是，他确实记得，当他来值早上4点到8点的这一班时，在汽车收音机里曾听到过KGMB广播电台播放的夏威夷音乐唱片；他也记得，每当美国飞机从加利福尼亚飞来时，电台也整夜地播放这类唱片，欢迎他们进来。因此，他断定，那些一定是美国飞机。这是非常合乎常情的判断，于是，他给了雷达站的人员一个合乎常情的回答：用不着操心。这两名陆军士兵继续注视着飞机的闯入：7点15分，距离九十二英里；7点25分，距离六十二英里。最后到了7点39分，这些飞机的影子从雷达屏上完全消失，这是因为飞机已太靠近，雷达不再能发现它们了。

正好在这个时候，一个年轻的电报传递员从RCA的檀香山电报室出来，带着一份发给总司令官的电讯。这是乔治·马歇尔上将一个半小时以前在华盛顿草拟的电报。他刚刚才知道，日本最后中断了同美国的一切外交谈判，而日本特使奉命正式通知美国国务卿赫尔的时间是华盛顿时间1点钟。很明显，正是华盛顿时间1点钟，将会在某个地方发生什么事情，而很快事情就明朗了，这个时间在珍珠港是清晨7点半，正是进行突然空袭的理想时间。

马歇尔将军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立即向檀香山发出警告。他马上写了一份电报，但他并没有拿起就在他跟前的电话筒。这台电话机有一条直通檀香山的专线。这也是一个合乎常情的决定，他之所以没有使用电话专线，是因为他深怕他的通讯系统的安全受到危害。所以，这份电报通过无线电发出去，既妥善，而且也一样迅速。但是，那天早晨恰恰遇到气候的干扰，很可能影响无线电的收报。由于这份电讯太重要了，因此不能冒这种风险，某一位好心的通讯军官擅自决定以商业电报的形式，发出了这份重要电讯。

电报到达檀香山，是在马歇尔将军草拟电稿的一个半小时以后，现在正是7点33分。即使在那个时候，电讯的封皮上也没有注明“紧急”字样。当电报传递员拿着这份电报跑出来的时候，他又同那些在路对面停车场上的孩子们消磨了几分钟。然后，他才登上双汽缸的印度摩托车离开。正当他走在路上，他望见珍珠港上空怒云黑烟翻滚，团团高射炮火点满了清晨的天空。一切都太迟了，袭击已经开始了。

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在进行着争论。但是，在责怪骂娘声中，让我们不要忘记，不论华盛顿和珍珠港的高级领导做了或者没有做什么，反正是曾经有过这些可以避免灾难的机会。坐失这些良机，并不是由于品性邪恶或者是无能，而是由于人毕竟总还是人嘛。

这实在是历史上常有的事情。当年英国殖民军中的印度水兵举行反英哗变，在事变爆发之前，燃烧着的箭穿入夜空，以示警报。在约翰斯敦，有识之士曾预测，堤坝将会崩塌。而在“泰坦号”上也曾预先接到过六份无线电报，警告前面有浮动的冰山。

研究人性学的学生，在研究了人们行为中的这些古怪方式之后，就不会老是去思考什么政策和战略问题。他们会发现：人类避免灾难的最好的机会实在很简单，那就是：在看到危险的信号时，我们必须善于去识别它们，仅此而已。

第二部分 背水之战

(1939—1941年)

希特勒1939年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西方爆发了。毫无准备的英国和法国，终于理解到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假仁假义，并且看到他们曾经以为是已经取得的所谓“我们一代人的和平”，不过是海市蜃楼而已。与此同时，日本又扩大了它本来已经很辽阔的占领区。

在1939至1941两年期间，欧洲大部分地区陷落于一个敌人之手；而东方的大部分地区又相继沦丧在另一个敌人手中。在西欧只有英国，在东方只有固守内地的中国，经受住考验，依然昂首抵抗。

在美国，和平已经变得很不稳定。那些训练有素的破坏者和间谍在美国本土及夏威夷大肆活动。军事情报被窃取，国防工业遭到破坏，到处都煽起仇恨，散布不和，制造分裂。联邦调查局终于渗透到并且巧妙地掌握了美国国境内敌人的全部间谍网组织。但是，在国外，美国当时还没有情报机构足以在敌人可能袭击我们海岸之前就发现他们的阴谋计划。

在那些被占领的欧洲国家里，许多拒绝投降的爱国志士，立即组成了“地下组织”。在英国情报机构向欧洲国家空降特工人员、武器和给养之前，地下战士们仅有的武器就是秘密隐蔽、机智和勇敢。那些被占领国土上的男男女女和孩子们，使用他们的一切智慧，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把战斗引向敌人的要害地点。

现代战争的性质有了极大的改变。大规模的奇袭，秘密武器的

使用——从蛙人到雷达——创造了其他时代的战士们所想象不到的业绩。

间谍的搜捕者

小弗雷德里克·桑顿

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被认为是间谍的天堂。盖世太保的间谍、日本情报机构的摄影师等，在这个国家里随便游逛。但是随着战争的来临，美国就不再是间谍的天堂了。联邦调查局和我们的陆海军情报部门建立了组织，这些组织所使用的科学手段、人员配备和工作效率是法西斯独裁者的密探无法匹敌的。

1941年，联邦调查局反间谍的一个分支机构，取得了世界间谍史上最机智的行动之一的惊人成就。1940年初，盖世太保看中了一个名叫威廉·塞博尔德的美籍德国人，他正在探望他在德国的亲人。在上一次大战中，他曾经是德国的一名机关枪手。纳粹分子窃取了护照，并明确告诉他，除非参加他们的组织，他就休想获准离开德国。塞博尔德最后同意了。他被送到汉堡去接受盖世太保培养间谍的严格的训练。直到那时，他才知道纳粹想要他做些什么。他将返回美国去设立一个短波电台，也就是搞一个情报站，主要是弄清关于英国舰只调动、美国重整军备的情况以及德国最高统帅部感到兴趣的其他问题。

但是，塞博尔德是一个美国人，而不是纳粹分子。他成了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他按照指示，在中央港、长岛中港地方一栋安静的房子里安装了一部无线电发报机，但它是由联邦调查局人员操纵的。足有一年以上的时间，他们使用由塞博尔德带回的精制密电码，同靠近汉堡的盖世太保电台每天都保持着联系。

联邦调查局的人员给德国最高统帅部送去了可信但实际上是一些容易引起误解的毫无意义的情报，而他们却一清二楚地掌握了纳粹在当地的间谍组织。凡是到塞博尔德办事处来的纳粹分子，都被设置在隔壁房间里的一架隐蔽的电影摄影机拍下了镜头。他们的谈话也都被偷录了下来。最后，在1941年6月一次戏剧性的突然行动中，纳粹间谍系统的三十三名男女骨干分子全部落网就擒。

搜捕间谍，不论哪个优秀侦察人员不仅需要必须具备的经验、勇气和无限的耐心，而且还要有了解外国民族的渊博的知识，如他们的语音、他们的心理和特征。最重要的还有，反特人员必须具备一种特别的本领，那就是能够从向他提供情报的诚实的公民中，排除一些证据不足的告密者。随着人们反对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的情绪的高涨，无数邮件、电话和访问者如洪水般地涌向联邦调查局的办事处以及其他机构。

琼斯先生打来电话说，在他的住所对面有一家意大利人经营的酒店。虽然附近并无意大利人居住，但在这家酒店的后边屋子里经常聚集着一群意大利人。他们常常使用电话，行动鬼鬼祟祟，通常在通向二层楼的隐蔽的楼梯处消失了踪影。有一两次，他曾听到留声机在放法西斯党歌的唱片。

奥布赖恩夫人在一个大办公楼做清洁工作。她从晚上9时工作到早晨5时。街道对面有一个阁楼，里面是一所印刷车间。那里的人总是紧闭百叶窗，在深夜干活。一天夜里，从一扇敞开着的窗户内冲出来的穿堂风不断地吹动着遮光的窗帘斜向一边，她往里看去，那些人很象是德国人。在他们收工以前，他们把废纸筐都清理空了，把废纸堆起来，放进大炉子里烧掉。她过去曾在电影里看到过间谍就是这样做的。所以她决定把这一切报告联邦调查局。

史密斯夫人写信给联邦调查局说，她的邻居德国人舒尔

茨先生，他老是带着一架照相机在乡间漫步。在她家附近，有一条城市的水沟和两座重要的桥梁。人们曾看到舒尔茨先生把它们拍进照片。

当地办事处还收到许多其他情报，当然，不可避免地也包括了一个或更多的易于激动的女士们提供的情报，她们曾看到过从房屋顶上向港口的德国潜水艇发出神秘的信号，等等。但是，前面提到的三个事例，看来是最值得侦察的。

爱好摄影的舒尔茨先生是通过在这个国家里对所有外国和本国可疑分子有关情报的大量搜集而被检举出来的，这是联邦调查局最重要的反间谍武器之一。埃里克·舒尔茨是一个来自维也纳的难民。他并没有什么问题。但确实有过许多冒充的难民，身上带着被盖世太保拘留过的纪录和证明，甚至他们的身上还有被鞭打的累累伤痕。反特人员征求了当地警察局、邮差以及舒尔茨经常去冲洗胶卷的那个店铺主人的意见，最后同舒尔茨本人见了面。那个反特人员证实舒尔茨是一个无辜的老年人，爱拍摄各种花卉。

小酒店的老板贝尼托·里科先生，被证明并不是那么无辜的。他曾一度被捕，因为参加了罪行严重的袭击，但被一个行为可疑的法官所释放。他曾参加过纽约的法西斯组织，回到过意大利，并在那里获得过一枚法西斯勋章。关于他最近的活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里并没有纪录。反特人员每夜都到里科先生的酒店去小饮一杯，或者吃点什么，他发现里科邻居的报告是基本正确的。周围总是有些可疑的意大利人在活动，在这个地点不难发现搞阴谋活动的蛛丝马迹。反间谍活动的负责人发出了“密切监视”的命令。

根据法院的指令，电话公司派人在里科酒店的电话线上接了一根直通联邦调查局窃听站的线路。每当里科的电话使用时，窃听站就亮起了闪光，一个反特人员就用录音机把电话中的对话全

部录了下来。这个对话的录音不会在法庭上被当作证据，但它可以使一个罪犯感到惊恐而招认。

与此同时，在靠近里科酒店的地方经常停留着一辆坐着两个人的汽车。如果里科或者他的一个朋友乘车离去，联邦调查局人员就立即开车追踪；如果他是步行的，那么一个反特人员也只得步行尾随。可是这种尾随是棘手的。“尾随跟踪”，是这类活动中最恼火的差使，最令人厌烦，也是最困难的。这绝不是逢场作戏的人所干得了的。训练有素的间谍善于发现他是不是被跟踪了。比如，他在地下铁道跳上了一辆车，正当车门要关上的时候，他又忽然跨回到平台上。如果有哪一个人也照着这样做，那他就可以断定有人在盯梢。

在一个办公大楼里，这个疑心被人盯梢的可疑分子登上了电梯，到他想去的任何一层楼。于是，他站在那层楼的住客房间号码示意图跟前，明显地是想要弄清楚，他该去哪一个房间。当这个可疑分子正在沉思犹豫的时候，那个跟踪的影子也就设法躲开。可疑分子一会儿按“上”字，一会儿又按“下”字电钮，并且很快地冲进先到的一架电梯内。如果有另一个人就近也一跃而登上电梯，那么，他就会施出最后的一招，那就是走进有几个出口的公共厕所。

经过几个月对里科的追踪调查，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得出结论：这个意大利人并没有图谋不轨的行为。他的电话谈话，他的朋友以及他的朋友的朋友，看来同意大利的间谍没有什么联系。并且还说明里科对于“领袖”^①已经厌烦透了。他召开集会，只是鼓励他的伙伴们把钱花在里科的酒店里。这就是关于这件事的全部始末。意大利间谍机关很可能去接近他，那时他就变得危险了。所以里科还会受到不断的侦查。

① 指墨索里尼。——译者

在这同时，奥布赖恩夫人所报告的印刷车间却发展成为一个首要的案件。警察做了许多联邦调查局所需要的最艰巨的基本调查工作。根据调查揭示，它属于一个挪威老年人，是专门制作庆贺卡和商业广告用的折叠式印刷品的。他的雇员都是德国血统，但现已归化入了美国籍。根据档案材料，那些美国公民都历史清白。他的生意很不错，并且付清了一切税款。至于所窃听到的电话讯息，也没有问题，只是正当的谈话而已。那些被盯了梢的雇员们，也没发现有什么罪行，最多也不过是同他们的一些行为无害的朋友们经常光顾德国的啤酒店。但是，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还不能从他的脑子里抹掉这样一个事实，即奥布赖恩夫人曾看到过他们烧毁垃圾筐里的东西。军事情报机关也曾通知他，在他管辖的区域的某个地方，一所印刷工厂正在印制煽动性的传单，这些传单已被散发到军营里来。海军机关发现了伪造的通行证。破坏分子利用这些证件出入海军造船厂和兵工厂，而通行证上印刷的字体同传单上的印刷字体是同一类型的。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于是产生了一种预感。

这个阁楼建筑的管理人受到检查和监视，直到联邦调查局肯定他是可靠的，这才罢休。一个反特人员请他喝啤酒。他悄悄地告诉反特人员说，是的，那个印刷铺子确有许多古怪的事情。有一个人常睡在那里过夜。但除了前面的办公室之外，他们所不认识的任何人都不得进入内室。他们还有精致的照相设备。反特人员对于这些话并没有多大兴趣。可是，那个管理人最后说了一句：“他们还同军营干着一笔大买卖哩！”有一次他正在装运室附近打扫，只听得里面说，“这是给迪克斯军营的，那是给麦克利伦军营的。”

这个汇报证实了反间谍负责人心中的疑团。他正在涉及一件特大的案件：这家铺子的头头可能是一个重要的纳粹分子，而这又

能导致联邦调查局去搜捕另一些重要的纳粹分子。反特人员也知道，如果走错一步，就会打草惊蛇，使这个纳粹组织茫然消失在黑暗之中，而只有等待以后在别的什么地方再冒出头来。所以，联邦调查局十分谨慎从事。

在印刷铺子里，一个“电话检查员”把一个扩音器安装在电话铃的盒子里。电话上讲的每一个字都传到反特人员的耳机里去，那个反特人员就住在几层楼上面。邮政检查员检查每一封来往的信件。在大街对面的一幢楼上，有一个隐蔽得很好的反特人员带着有望远镜头的照相机注视着。在大街上，只要一对盯梢的人跟上一个可疑者之后，立即就有另一对“尾随者”，紧紧跟上另一个可疑分子。那时总共大约有二十个或更多一点的反特人员，参与了这件工作。

错误、失望常常是难免的，但却是令人痛心的。正当这家印刷铺子的老板刚要去会见他的纳粹上司时，他忽然耍了一个乘地铁的花招，反特人员只得“丢掉尾巴”。这也许又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再一次发生接触，但他们绝不会使用一个打草惊蛇的行动，以免影响整个案件的破获。

最后经营这家店铺的老板的同伙人终于被找到了。电话里安装的扩音器揭示了，这些印刷工人确实是秘密的纳粹组织的成员，而且正是他们把颠覆性的传单送进军营。一个德国人办的卡车运输线把传单运出去以及在军营散发传单的方法等情况，是在反间谍组织同军事情报机构密切配合下发现的。这个一目了然的案子的全部证据，都收集齐备。在一个清晨，从联邦调查局当地办事处开出一队汽车向各个方向驶去。对于所有这些要搜捕的人的住处都经过了仔细的研究，并设想了他们抗拒或者企图逃跑等情况。与此同时，军事情报机关在军营里也采取了打击行动。这样，除了未能迅速交付审判之外，那个印刷铺子的案件便到此结束了。

直到1939年为止，联邦调查局的反颠覆分支机构还是外国间谍们的笑料。它是为对付美国国内的黑社会而训练培养起来的，至于如何对付轴心国的间谍活动，却缺少知识和技巧。但随着战火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从加拿大向亚洲中部蔓延开来，轴心国的间谍越来越变成严重的威胁。美国情报机构的官员们被一般公民和许多掌握政府大权的人们所讨嫌，称他们是“多管闲事的人”，因此当时这类机构的人员被精减到最低限度。国务院情报系统一度只由一个人组成。战争的扩大以及敌国间谍网的出现，才改变了这种情况。

英国财宝向西转移

利兰·斯托

这个令人惊异的事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持得最出色的机密之一——也许是由于在许多参加了这一行动的人们中，很少有人知道整个故事的始末。这就需要三个专心致志的调查者去搜集那些零散的片断，并把它编纂起来。前加拿大银行的锡德尼·J.珀金斯，根据他自己在这一事件中的经历提供了这一故事的最初情节。作家A. J. 斯顿普找到线索发现了许多长期不为人们所知晓的事实和数字。然后，获得普利策奖金的外国记者利兰·斯托，经过许多个星期的努力，在加拿大和伦敦又搜索到了许多奇异的情节，终于写成了他称之为“我所涉及的最令人振奋的故事之一”的报道。

1940年7月2日下午5点钟，在纳粹闪电战攻陷巴黎的十七天之后，一列专车驶进蒙特利尔市的蓬纳文图尔火车站。加拿大银行的代理秘书戴维·曼休尔和外汇兑换管理局的锡德尼·J.珀金斯正等待着迎接这列专车。他们都知道这列专车上装载着代号叫“黄鱼”的秘密货物，而且知道指派给他们的这个任务又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只有曼休尔一个人知道，他们行将投入一场金融赌

博中间去，无论在和平时期或是在战时，这都是任何国家所曾进行过的最大的一次金融赌博。

这列火车一到站，随车的武装警卫立即走下来，把火车团团围住。曼休尔和珀金斯被带到一节车厢里。在那里，他们会见了英格兰银行的亚历山大·S. 克雷格以及他的三名助手。

“我们这样出人意料地突然到来，希望你们不要介意。”克雷格微笑着说。“事情是这样，我们带来了极大数量的‘黄鱼’。”那位身材苗条的戴眼镜的英国人稍稍停歇了一下，然后又以最佳的不动声色的英国方式补充说，“实在的，这批‘黄鱼’是大不列颠帝国的‘流动资产’中很大的一部分。我们正在清理我们的地下储藏室，以备一旦敌人入侵。其余的东西也很快就要运来。”

锡德尼·珀金斯感到惊愕的头脑开始捉摸“流动资产”和“剩下的东西”的含意。它只能意味着加拿大银行实际上是要接收英国所有能变成美元的资产。真是整整齐齐的“黄鱼”包装啊！至于这一捆捆东西该有多么齐整，他是马上就会知分晓的。

两个星期以前，当法国的陷落使英国面临被入侵的紧迫威胁的时刻，温斯顿·丘吉尔召开了内阁秘密会议，决定进行一场冒险的赌博，把价值七十亿美元的债券和黄金转移到加拿大去。

这个决定意味着，丘吉尔的政府暗地已下定决心，如果需要的话，要作比“在海滩作战”更多的准备。万一德国入侵成功，英国人会在加拿大坚持作战。财宝的转移，实际上正是“两个阶段”的最后一着，争取生存计划的一部分。

在战争刚开始时所采取的远见卓识的行动，使这场赌博成为可能。当时决定：联合王国所有英国公民都需要把他们所拥有的全部外国债券的资产向财政部进行登记。丘吉尔及其内阁现在下令征用的就是这些资产中的一部分。在一个国家里，老百姓的私人投资未经产权所有人的首先保证同意，而为了国防的目的就

先行征用，这是没有先例的。但是，1940年6月，当巴黎受到战争威胁时，丘吉尔政府立即采取了这一行动。

“在十天之内，”一个参与其事的人说，“存在联合王国银行里的所有经过选择的债券、证券都被提了出来，包扎捆装在几千个象装运桔子的木条箱那样大小的箱子里，然后被送到集中地点。“这里集聚着英国在全世界经商的人和投资者世代挣得的巨大的利润。这些资产，同英国作为帝国长年积累起来的数以吨计的黄金一起，将被送过海洋。

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大洋呵！就在这6月份一个月之内，总吨位达三十四万九千一百一十七吨的五十七艘同盟国与中立国的船只，在北大西洋被击沉了。

由海军上校弗朗西斯·西里尔·弗林指挥的英国巡洋舰“绿宝石”号被定为装载第一批秘密货物的船只。它准备在6月24日从苏格兰的格里诺克^①启航。6月23日，星期天，以亚历山大·克雷格为首的英格兰银行的四个“金边证券”专家，每人只带着一只手提箱乘火车去格拉斯哥^②。同时，警卫森严的秘密列车赶紧把最后几批黄金和证券装到停泊在格里诺克港克莱德码头的巡洋舰上去。就在那一天深夜，“哥萨克”号驱逐舰以时速三十海里，冒着重重危险，迅速地穿过浓雾，去参加为专运财宝的船只护航。

24日下午6时许，“绿宝石”号装载着满满一船财宝，从格里诺克港启航。从来没有一条船载运过这样多的财宝。它的弹药仓库里，二千二百二十九只沉甸甸的金条箱堆得高高的，每一只箱子里装着四大条黄金（数以吨计的黄金是如此沉重，以致在这次航程结束之前，仓库地板下面加固的角铁都被压弯了）。在船的另外一些地方还堆放着四百八十八箱证券，即使根据保守的估计，价值也在

① 指苏格兰南部的港口。——译者

② 指苏格兰中南部的重要城市。——译者

四亿美元以上。这次价值在五亿美元以上的货运是冒着北大西洋上燃烧着的战火的危险航行的。

“我们离开克莱德的那天夜里，预报有坏天气，”身材结实、满脸红光的弗林上校回忆说，“这预报很准确。第二天早晨，当我们环绕爱尔兰的北海岸航行时，大海翻腾咆哮起来。当船转弯驶进大西洋时，我们开始受到大风暴的袭击。”

舰上的军需官在甲板上遇到亚历山大·克雷格，提醒他：“舰长刚才从舰队司令那里收到信号，前面有两艘德国潜艇正等着我们。”然后，军需官冷漠地走开了，就剩这位英国的数学专家一个人在估算着这宗珍贵货物最终运到加拿大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当天气越变越恶劣时，形势也越来越难以预测了。大风迫使护航的驱逐舰减速。护航舰的舰长海军上校维安最后和弗林上校联系，通知他护航舰将沿直线前进，而“绿宝石”号则跟在驱逐舰后面作蛇形航行。这样，“绿宝石”号就能保持更高、更安全的速度。

但是，大海变得更加桀骜不驯，极大地减缓着驱逐舰前进的速度，弗林上校不得不决定“绿宝石”号单独航行。他说：“我们发现，让护航舰返航，由我们单独航行更为明智些。我把船速开到时速二十二海里。最初三天航行中，许多水手都晕船了。”但到了第四天，天气晴朗了。7月1日，刚过清晨5点，新斯科舍①半岛的海岸已隐约可见。现在，在这宁静的海洋上，“绿宝石”号剧烈地搅动着海水，以二十八海里的时速，直驶哈利法克斯港口②。清晨7时35分，财宝船终于安全地驶入港口的码头。

在码头旁边伸展开来的一条铁路支线上，一列专车正等待着。在场的有加拿大银行和“加拿大国家捷运公司”官员。码头在极度

① 加拿大东南部。——译者

② 加拿大东部。——译者

严密的措施之下被封锁了起来，每一只箱子在搬下“绿宝石”号时都清点一遍，而当箱子装上火车时又以加倍的速度重新核查一遍。傍晚7时，火车开动。装载证券的车皮在蒙特利尔卸下货来，装载黄金的车皮则向渥太华疾驰而去。

这就是大卫·曼休尔和锡德尼·珀金斯在蒙特利尔迎接的火车。现在，这些珍宝都安放在他们身旁。什么地方能够将成百箱的证券临时储藏一下呢？大卫·曼休尔早已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答案。

“太阳生活保险公司”的二十四层花岗石建筑物，占据着蒙特利尔‘自治领广场’的整个街区，是英国自治领中最大的一幢商业大厦。它有三层地下室，最底下的一层被选定为人们现在称作是“联合王国安全存款”的战时之家。

当天夜里，当蒙特利尔市的街道安静下来，来往交通冷落，一个大规模的行动就开始了。刚过午夜1点钟，市内警察就封锁了从铁路调车场到“太阳生活保险公司”的几个街区，许多大卡车的车轮滚动起来。在身藏武器的、穿着便衣的加拿大国家捷运公司保卫人员押送之下，一辆辆大卡车穿过大街，直开到“太阳生活保险公司”后面的斜坡。当那些箱子运放到第三层地下“加固室”的时候，皇家加拿大骑警队象鹰隼一般在四周来回盘旋。最后一箱交清，经核查无误后，英格兰银行的存放部经理就递给大卫·曼休尔一张收据单，请他代表加拿大银行在单据上签字。

现在，需要赶紧建造一座永久性的防备偷盗的地下储藏所。但是，一个六十英尺见方、十一英尺高的地下室需要很多钢筋。战争时期上哪里去找呢？幸好有人想到那些已经没有用的、被遗忘了的铁路。两英里长的铁路变成了八百七十根钢轨，全部被用来浇灌到三英尺厚的混凝土墙壁和天花板里。天花板上又安装了数十个测音器，这种测音器的敏感度极高，哪怕档案柜的一个抽屉轻微

的抽动声都能被录制下来。要打开地下室的门，需要有两套保险锁的暗号。一套暗号由两个银行职员掌握；另一套则由另外两个职员掌握。“我从来都不知道另一套暗号是什么，”一个银行职员说。“为了打开地下室的门户，我们必须天天这样配合才行。”

以后三个月之内，又有同样的三十六列专车装载证券到达此地。为了存放这些证券，用了近九百个四扇门的档案柜。二十四名加拿大骑警队员昼夜守卫着这批隐藏的财宝，吃饭睡觉都不离开这个建筑。

“绿宝石”号的史诗般的航行，只是这一历史性的横渡大西洋竞赛的第一次冲刺。7月8日，又有五条船驶离英国的港口，它们装载了陆运或海运所曾装载过的最大宗的混合财宝。午夜时分，战斗舰“复仇”号和巡洋舰“邦纳文图尔”号也悄悄地驶离克莱德码头。天亮时，他们在靠近苏格兰北面的航道上同三艘原来是班轮的轮船相汇合。这三艘轮船是“百慕大君主”号、“索贝斯基”号和“巴脱莱”号（后两艘是自由波兰的船）。四艘驱逐舰参加护航。在海军上将欧内斯特·拉塞尔·阿切尔爵士的率领下，这个船队装运了价值大约七亿七千三百万美元的金条和二百九十九箱证券，总计价值大约为十七亿五千万美元。

阿切尔海军上将回忆说：“我们经常从海军部的情况通报中知道附近有潜水艇在活动（在前两个星期中，总计十三万九千吨的二十八艘同盟国船只曾被敌人击毁）。“我们小心翼翼地躲开了德国的潜水艇。敌人的飞机也是很活跃的，但没有出现过一架。我们是不是有点神经紧张呢？我们知道船上装的是什么，你既然负责这些船只，就得尽力而为。”

“巴脱莱”号轮船走了四分之三的航程，发动机出了故障，不得不减缓速度。为了避免使其他船只发生危险，海军上将命令“巴脱莱”号转航至圣·约翰港，由巡洋舰“邦纳文图尔”号护送。当其余

舰船直驶哈利发克斯港的时候，这两艘船遇到了严重的麻烦。“我们碰上了最可怕的雾，同时又碰上浮冰”，“邦纳文图尔”号的舰长海军中将杰克·埃格顿说，“将近十二个小时，我们一步也不能前进。我又必须在雾中紧紧地靠拢‘巴脱莱’号。我们装运着六千万英镑的金条（约值六亿五千万美元）。雾中又望不见冰山，而当你望见它时，冰山已突然出现在你的跟前了。”埃格顿海军中将总算是同“巴脱莱”号保持了联系，并且护送它进入了圣·约翰港，然后开足马力驶向哈利发克斯港。

在整个横渡大西洋的航程中，“复仇”号战斗舰上的八门十五英寸和十二英寸口径的火炮，加上她的四英寸口径的高射炮，时刻准备着投入战斗。“炮手们坚守着自己的岗位，”舰长詹金斯说。他们夜里就睡在大炮旁边。抢救组经常检查船舰的所有部件，以杜绝可能发生的漏水或起火事故。

7月13日，第一批的三艘船安全地驶进哈利发克斯港口；紧接着，“邦纳文图尔”号和“巴脱莱”号也相继抵达。把这些船装来的金条从哈利发克斯运到渥太华，用了五次专列。金条非常沉重，每辆车皮只能装载一百五十箱到二百箱。每一专列有十辆到十四辆装运行李的车皮。每一辆车皮上有两名警卫人员——四小时一换班，和金条一起都被锁在车皮里。

所有这些航运的黄金都没有搞运输保险。特别是在战争时期，有谁能够或者愿意去替成亿美元的金条承担保险呢？可是，“复仇”号的护航却确立了另一种类型费用的纪录，加拿大国民捷运公司的运输费恐怕是它有史以来最高巨额——“为数在一百万美元以上”。

在渥太华，加拿大国营铁路局为这些专列的到达时间耍了一点花样，这样，黄金就能在夜里从火车站运送到惠灵顿大街的加拿大银行。谁能够想到，这幢正面前沿最多只有一百四十英尺宽的

五层楼建筑即将成为世界上任何地方唯一堪同诺克斯堡^①相匹敌的最重要的竞争对手呢？整整三天，“复仇”号护送的黄金巨流，倾注到加拿大银行的六十英尺见方、一百英尺高的地下储藏室里。开箱工作很快地进行。成万块的块重二十七磅的金锭整整齐齐地码在一个个铁丝笼子里，象一块块金黄色肥皂叠在一起那样。一架复一架，一排又一排，一层更一层，全部都是纯金，一直堆到天花板。

同时，在蒙特利尔，在装满着证券的地下室的外边，一间天花板很高的特大的房间被用来作为储存办事处。现在，在那个地窖的深处，世界上最古怪、最秘密的股票证券交易事业，一个“小华尔街”迅速发展起来了。曼休尔招募了大约一百二十个加拿大人，其中有退休的银行家、经纪事务所的专门人才和投资公司的速记人员等。在宣誓严格保守机密时，他们开始悟到有的人称作“我们来自伦敦的包裹”是指的什么了。

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独此一家的办公室。只有一个电梯直下第三层的地下室。每个雇员必须出示通行证（每月换一次），首先在电梯入口处要这样，然后在下面的警卫跟前也要这样，而且每天出出进进都要签名。在警卫办公桌的下面暗地装着一个连续警报器，直接同加拿大皇家骑警队和蒙特利尔警察总局，也同加拿大电子保护设施联系着。有一次一个骑警队员偶尔不慎触发了警报器，三分钟之内，这个地方立即挤满了持枪准备射击的警察。

整个夏天，当另外的专列运到的证券箱，使箱子总数达到近两千个的时候，克雷格的工作人员每天要工作十小时，每星期工作六天。这些证券真是一堆大杂烩，分属于成千个不同的所有者；所有这些证券都得拆箱进行核对并予以分类。最后，大约有两千种不

① 诺克斯堡系美国国家金库所在地。——译者

同的股票和证券，其中包括了几乎每一种有信誉的“热门”股票。属于个人所有的每一个包裹都是捆扎好了的（为此需要有七十多英里长的绳子），而包裹里的东西则经过一再核查。为了纠正检查中发现的出入之处，六千封以上的“询问电”被发往伦敦。而每件电报都是十万火急，因为除非把这些可流通证券的清单、数目和所有主都得到确证，它们是不能够进入市场的。

“克雷格有一个秘书小组，全体成员不做别的事，专剪票券的息票，”一个加拿大人回忆说。“在我一生中从未见过那么多的票券。相当多的所有主已有很长时间没有碰过自己的票券了。”

到了9月份，对于假定拥有的票券数目一直心里有数的存款部经理克雷格，最后弄清了他确实已拥有这个数目。每一张单据都核对无误，存入了档案。“我相信，我们没有丢失一张息票，”他说。“没有一张证券遗失。鉴于这些证券都是在紧迫压力下征集和启运的，这真是得来非易呵！”

黄金和证券继续不断地运到。据海军部的记录表明，在6、7、8三个月内，英国舰船（有几艘是加拿大和波兰船）运到加拿大和美国的黄金总值超过二十五亿五千六百万美元。更令人惊讶的是，在那三个月期间共有一百三十四艘同盟国和中立国的船只在北大西洋上被击沉，而载运黄金的船只却全部安然无恙。

温斯顿·丘吉尔和他的内阁赢得了他们这场巨大的赌博。他们不仅仅把英国的作战手段——超过七十亿美元的一宗财宝，安全地转移到了加拿大，而且整个这样一个巨大的行动居然成功地保持了秘密。在一段时间或者其他某个时期里，大约有六百多人参加了这次证券存放的秘密工作。黄金的运送则涉及大洋两岸的成千个海员和成百个码头工人。这样多的人能够把这样重大的一个机密保守得滴水不漏，这也许是史无前例的。

巴黎：虎口逃生

——摘自艾塔·希伯的《地下的巴黎》一书

多萝西·坎菲尔德在评介《地下的巴黎》一书时写道：“这份关于两个妇女反抗盖世太保的经历和法国千百万小人物感人的英雄主义的具有吸引力的记录，不仅在文字上、事实上是真实的，而且听起来也是真实的。这位作家只是以一种质朴的诚实，把所发生的事情如实地写了下来，并不企图使事实戏剧化，或者力图塑造一位女英雄的形象。但是，她确是一位女英雄，经历了毛发悚然的惊险。任何一个美国人都应该读一读这个关于勇敢、无畏和自我牺牲的惊心动魄的故事。

我没有向欧罗巴告别。在傍晚的雾霭里，葡萄牙的海岸已经看不见了，这艘巨轮孤零零地在辉煌的照明中移动，她白色船身上的黑色字母被强烈的反射光照亮：“外交家——德洛宁霍姆——外交家”。

我曾在纳粹监狱里蹲了一年多的时光，此刻正在返回家乡的途中。从美国某个地方的一所监狱牢房里释放了一名德国犯人，我是作为交换条件而被释放的。

在里斯本，美国领事威利告诉我说，那个同我作交换的囚徒叫约哈纳·霍夫曼，是德国“白里门”号轮船上女部的理发师。他在1938年作为在美国从事活动的某一危险的德国间谍网成员而被判罪。我的被释放，真是能值这样一个价码吗？

驻里斯本美国领事馆的一位官员给我回答了那个问题。“我的亲爱的希伯夫人”，他说，“国务院很清楚地知道你在巴黎干了些什么。如果在上一次大战中英国人能想到办法换取伊迪丝·卡维尔^①那就好了。而你呢，说真的，就是这次大战中的伊迪丝·卡维

^① 伊迪斯·卡维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的一个护士，是为她的祖国建立过功勋的女英雄，被德国逮捕后，遭杀害。——译者

尔。”

我不能放过这样的话而不加异议。“不，”我说，“我并不是伊迪丝·卡维尔，但我的亲爱的朋友吉蒂也许是。我们所做的任何好事都应归功于她。她领着路，而我只是追随者。她却一个人付出了代价。如果她还活着，那么，她仍在盖世太保手中；如果对她的判决已经执行了的话，那么，她已经不在人间了。吉蒂·博里波可以说真正是这次战争中的伊迪丝·卡维尔。”

1925年，当我一年一度去巴黎旅行时，我遇见了吉蒂。她是伦敦一个银行家的女儿，曾经同一个法国的酒商亨利·博里波结了婚。后来她同这位商人分居了——是在完全友好的基础上这样做的。吉蒂在经济上是独立的，但为了使自己有一个固定的职业，她在罗帝埃路经营了一家小小的妇女时装商店。我就是在那里遇见她的，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33年，我的兄弟在巴黎突然去世，吉蒂照顾着我度过了这场可怕的灾祸，她甚至为我料理了我兄弟的丧葬。三年以后，我的丈夫去世了，她又打电报给我，要我到巴黎去与她同住。没有了男人们的照料，我正惆怅不安，我感激地给她回电：“即至”。

我们在她的现代公寓里住了下来，共同过着愉快的生活，我们中等水平的收入已足够开支。在纳粹进入巴黎的前一天——1940年6月13日，我们象牙之塔式的生活终于结束了。我们深信不疑：正如保罗·雷诺总理曾经讲过，法国将为保卫巴黎而进行逐屋的战斗。但我们却全然忽视了流行甚炽的谣言和人们与日俱增的惊慌情绪。那一天，当我们一次又一次打电话给朋友们而根本无人答话时，我们才忽然醒悟：人们统统逃跑了。

“我要给美国大使馆打电话，”我说，仍然不相信这一切。“他们将告诉我正在发生什么事，是不是德国人要围攻巴黎。”

一个惊愕的声音回答了我的电话：“你还在城里吗？你不知道政府已经转移到图尔^①去了吗？德国人几个小时内就要进入巴黎！”

在盲目的激动之中，我们收拾了几件行装就离开了。但是，在巴黎同法国南方相联结的第二十号国民公路上充塞着惊恐的人群，他们象洪流一般涌进去，力图沿着这条路逃避到安全的地方去。成千上万的难民们有的乘汽车，有的步行，有的骑自行车，熙熙攘攘，堵塞住了在我们前头的二百英里的大路。天已经黑了，我们听到在我们的头顶上有一种嗡嗡声越来越响，最后变成可怕的声音。吉蒂来了个急刹车，汽车跳了一下停住了。我们可以看到黑色的机身冲破这黑暗的夜空，从飞机上机关枪喷嘴中吐出的火焰，正对着它下面被困的人群制造死亡。几秒钟工夫，公路上就变得空荡荡的了。惊慌失措的司机们立即把他们的车掉头离开大路钻进树林或坠入沟渠。有一些车翻了，乘客们蠕动着爬出来，拔腿就跑。只有很少几辆汽车仍停留在公路上，车上的人一点动静也没有。他们没有参加这场逃离公路的疯狂奔突，因为他们已经死了。

在漆黑的夜里，听到了许多机动车引擎的噪声，德国军队突然赶上了我们。首先来到的是摩托部队，他们完全肯定，公路上的障碍已被先遣的飞机扫除一清，所以就在黑暗中疾驰而过。后面跟着轻装甲车，然后是坦克车。看起来到处都是德军，似乎占有了整个大地。在行进的部队后面展开着一个有规则的队列，每隔二百码的距离有一个摩托兵停了下来，负责管教老百姓。靠我们最近的那个士兵走了过来，用非常流利的法语说：“你们应回到巴黎去。”

① 指法国西部一个城市。——译者

“但是，”吉蒂请求说，“我们要到尼斯去。”

这个德国人的谈吐彬彬有礼，但在他的嘴边带着一点嘲讽。

“女士，那是我们要去的通道。”你们得回巴黎去。”

几小时以后，我们在路边的一家小客栈停了下来，全身疲惫不堪，准备就在这里住下；但客栈老板要我们赶快离开。“我已经没有什么给你们吃的了。前两天之内，有一百万人从这里经过。”

“一杯茶水就够了，”吉蒂说着，向他显示了她的最迷人的微微一笑。于是，她迈步直入，在座位上坐了下来。这一下倒是行通了。客栈老板锁上了门，不仅端上茶来，而且还拿出一条意大利腊肠和一小块奶酪。

“你们是英国人吗？”他问道。“那么，你们能为我做点事。我这里有一个，他只会讲英语。请你们告诉他，如果他耽在这里，我就要遭到麻烦……我非常抱歉。”他说着，从里屋领出一个高个子的青年人，这个青年人在他的灰蓝色的英国皇家空军制服上套了一件皮上衣。

他告诉我们，小伙子的名字叫威廉·格雷。他是在敦刻尔克被敌人俘虏的一个飞行员，当时他没有能够登上撤离疏散的船只。格雷解释说，“能不能请你们要这个家伙给我搞几件老百姓的便服，我就能自己照料自己了。”

吉蒂如实地翻译成法语。

“简直是发疯！”老板大声叫起来。“如果他穿老百姓的便服，德国人就会把他当作间谍枪决。而如果穿着制服，他还能受到战俘的待遇。”

格雷坐在那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带着一种不自在的微笑站了起来。“我最好还是离开这里，不要连累任何人，”他说。“请你们问一下老板，我欠他多少钱？”

我捅了一下吉蒂的胳膊。“别让他走，”我低声地对吉蒂说。

“你注意到吗？他看上去真象二十岁时候的可怜的欧文。”吉蒂非常熟悉我的兄弟。“我们的汽车正好在外面，”我恳切地说。“我们可以把他放在行李仓里。”

吉蒂汽车的行李仓不是朝外开，而是朝里开的，是在座位的后面。即使我们被德国人勒令停下来，他们也很难在那里发现任何人。吉蒂高兴地向我微笑。“格雷先生，”她说，“我们要跟你谈谈。”

我们就是这样，在敌占区内两个中年的正派妇女带着一个英国飞行员，开始了惊险的活动，而这一切在几小时以前都会被认为是荒诞离奇的。

我们需要通宵行驶，才能到达巴黎。带着一种揪心的感觉，我又看到了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因为在它的塔尖上现在是纳粹的万字旗在飘扬。我们绕着凯旋门环行，到阿弗利柯特的巴尔尼路二号——我们的家门前停了下来。

“是我——先下去吗？”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感到草木皆兵，似乎到处都有纳粹，在等待时机猛扑过来。

“等一等！”吉蒂紧张地低声告诉我。一个德国军事警卫正带着一个法国的士兵大踏步地走了过来。当他们在街角消失的时候，吉蒂转向行李仓叫道：“格雷先生！”

“是，”传来了他的压低了的声音。

“现在，我们就要下车了。你再等一下，然后跟着我们走。”我们赶紧走进公寓房间，我紧贴着房门，把安全门闩插上。瞬息之间，我感到自己的腿也软了，似乎支撑不了我的身体。

“我不应当让你们为我冒这样多的危险，”威廉·格雷说。“我那时没有理解……”

“现在，听我说，年轻人，”吉蒂坚定地说，“我们全都参与此事了。我们所需要做的是，筹划一下如何离开这儿。”

吉蒂随口讲一讲我们应该设法脱离险境，这自然是很容易的事。但是，我们能够到哪里去寻求帮助呢？唯一知道我们这个秘密的人是来自布里敦的我们的女佣人玛戈，我们深知她绝不会背叛我们。盖世太保对一切隐藏的军人进行着搜捕，他们在一个时候关闭了整个城市封锁处的出口，然后有条不紊地逐屋进行搜查。我们每天都害怕他们会来包围我们。这样，我们在一种持续的恐怖气氛中度过了整整一个星期。

有一天晚上，吉蒂回来吃饭晚了，我知道，当她这样洒脱地走进屋来的时候她准有好消息。“艾塔，”她突然大笑起来，“你记得钱斯尔吗？”我当然清楚地记得他。在我们企图逃离巴黎之前，我们曾同他在“士兵协会”——相当于“美国士兵组织”的一个法国机构一起工作。

“我在地下铁道碰到了他，”吉蒂说。“我信任他，认为他能帮助我们。我们明天下午就会见到他。”

晚餐以后，我们一起坐在起居间，喝着我们最后剩下的珍贵的咖啡，谈论着第二天的会见，我们期待着这次会见将能结束我们的困境。我第一次看到了威廉脸上露出了笑容。

正在那个时候，门铃响了。我现在仍能看到当玛戈溜进房间、关上门时惊慌失色的面容。“德国人来了。”

吉蒂第一个恢复镇静：“士兵？”

“不，便衣。”

“盖世太保！”吉蒂喘着气说。在一片沉寂之中，我能听到她的呼吸。然后，她忽然转身向着我。“把威廉带到你的房间里去，设法使他躲藏起来。”她很快地环视了一下这个房间。“把第三只杯子带走，赶快！”当我们走出以后，她提高嗓门，似乎表示对一个受惊的佣人显示了不耐烦的神气：“别那么呆头呆脑的，玛戈，不要再让那些先生们久等着啊。”

威廉坐在我房间里的沙发边上，他的脑袋向前倾着，两手攥得紧紧的。在恐怖的慌乱之中，我发现两件熟悉的东西忽然起了明朗的作用——在我的梳妆台上放着我丈夫和兄弟的照片。忽然之间，我意识到我的兄弟会给我们帮多大的忙。我冲向沙发，抓住了威廉的臂膀说：“快，快！脱掉你的衣服躺到床上去，假装你有病。”转瞬之间，他就躺在床上。我用一条毛巾扎在他的头上——扎得非常及时。因为就在这时，我听得吉蒂在喊：“艾塔，你在哪里？这位先生要看看你的房间。”

我似乎感觉到盖世太保的凶恶眼神直穿我的心脏。在他后面，有两个便衣人员，还有贝格勒夫人，她是我们寓所的看门人，从她的愤愤不平的神态很容易看出，他们绝不会从她那里得到什么。“这是我的美国朋友，希伯夫人”，吉蒂说。“她感到自己是战争的一个无辜受害者——远离家乡，象你们一样。”

我强使自己表现得自然一点。“务请你们对我房间里的样子予以谅解。我的兄弟患胃肠型流感，正躺在床上。这种病目前在市镇上流行得很。我希望你们不要去惊动他。”

“请拿出他的证件，”盖世太保人员不客气地说。我打开我的写字桌的抽屉，拿出欧文的红皮夹子，里面有他的美国护照和身份证。我庆幸自己现在仍保留着它们。这个盖世太保军官轻轻地翻开护照，一页一页细看，翻到我兄弟的照片时，又向床上躺着的那个人投去很快的一瞥。威廉真象一个生病的人，用毛巾扎着他的头，脸也没有刮过，看起来年纪更大一些。这个秘密警察更仔细地检查了身份证。“为什么这份证件没有更换新的？”他问。

“我们很早以前就想回美国去，如果他的健康情况早好一点的话。在这样的情况下，似乎没有必要去更换了。”我知道这种没有及时更换身份证的事并不稀罕，很明显，这个德国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他问我的证件，并检查了一遍，终于离开了我的卧室。

但是，回到客厅时，这个盖世太保军官向贝格勒夫人索取住户名单。他仔细地查看了名单。“我怎么找不到这位夫人兄弟的名字？”他说。

吉蒂镇静地说：“当然，欧文并不是一个常住户。他只是在需要有人照料的时候才住到这儿来的。”

贝格勒夫人在这种场合见义勇为。“先生，我很抱歉，”她说，“我忘了这位先生了。他从来没有向我要定居证，所以他没有在我的住户名单上。”

这个纳粹慢腾腾地在桌旁边坐下来，拿出他的自来水笔。他想写些什么？写一份逮捕我们的命令？然而，他拿起了住户的名单，在这上面亲笔加上我兄弟欧文的名字！

第二天下午，我们跑去见了钱斯尔。吉蒂开始时讲话很谨慎。他捉摸着她谈话的总的意向，微笑着打断她的话。“我的亲爱的夫人，”他说，“德国人进来之后，我一直没有改变我的政治立场。请问你究竟碰到了什么困难？”

吉蒂咽了一口气。“我们把一名英国飞行员藏在我们的寓所里。”接着她叙述了整个情况，包括前一天夜里盖世太保的突然光临。

钱斯尔吹了一下口哨。“好啊！对于两位女士来说，这可是了不起的业绩，当然，任何人也不会把你们看作骗子的。遗憾的是，你们没有马上来找我，否则你们就可以为自己少操很多心。”钱斯尔属于一个地下组织，专门帮助士兵们逃入非沦陷区。这个组织在河左岸有一所房子，难民们可以住在那里，一直等到他们取得通行证。然后，他们搭乘火车，被送到另外一些朋友那里，他们在交界的地方拥有庄园。从那里，他们跨越交界处进入法国的非占领地区。

“但是，要是你们的那个小伙子不会讲法语，”钱斯尔说道，“他

不能够安全地坐火车旅行。”

“我可以用汽车把他送到交界地带的庄园，”吉蒂说。

“目前，那是不太容易的。你知道，你买不到汽油。”钱斯尔用手拍了一下桌子。“噢，有了！士兵协会在德国人的控制下仍在活动。你可以再申请工作，就可以在你的汽车上标上红十字的标记，然后每星期可领到十加仑汽油。此外，你还可以名正言顺地在这个国家里自由来去，访问医院和战俘营。”

实际上，威廉的脱逃竟是如此顺利，几乎完全出人意料。我们从士兵协会拿到了工作身份证，于是就开始访问在巴黎的医院。钱斯尔为威廉取得了一份旅行许可证，当一切都准备好了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把威廉装到汽车的行李仓里。我们从士兵协会那里领到了包裹和礼品，分送给许多军事医院，但我们的第一站是到分界线上的一个小市镇，在那里我们毫不费劲地找到了钱斯尔的朋友。

一个星期之后，玛戈急匆匆地闯进起居室，手里挥舞着一张明信片。威廉送给我们一个措词谨慎的讯息，告诉我们，他已被允诺即将去“探望他的双亲”。我懂得，这是指的英国。我感到高兴极了，真希望从头开始再来一次同样的过程。

但是，当吉蒂建议去做某些类似的事情时，我害怕了。她在《巴黎晚报》上已发现了在她看来是一则很有兴趣的广告。这家法国报纸的“寻找失踪”专栏是目前读者最广泛阅读的部分——几乎没有一个人，在战争中没有失踪的亲友。《巴黎晚报》每天刊登了几百条这样的广告。下面这一则广告看来不同一般。

乔纳森·伯克正在寻找他的朋友和熟人。

地址：杜朗军医院。

“那是一个英国人的名字，”吉蒂思索着说，“谁听说过一个法国人名叫乔纳森？我来写信给他。”

“吉蒂！”我惊讶地说，“你是不是企图寻找更多的英国士兵，是



吗？”

“不，不。但是，如果我能碰到什么人，至少我可以把他们交给钱斯尔。”

几天之后，她带给我一张便条，是用英文写的，并有乔纳森·伯克的签名。便条上写着：“能够有可以谈心的人，真是太好了……我急切地等待着你们的来访。”“士兵协会希望我们去分发给士兵们的包裹，”吉蒂恳切地望着我说。

“行啊，”我说，“我去——帮助你克服困难。”

第二天一清早，我们启程去杜朗，带着给士兵们的食物和香烟。吉蒂还带着一只包着棕色纸皮的东西，关于这件东西，她什么也没有透露，只是说：“这是在回来的路上，我要留交士兵协会的一点东西。”

杜朗的军医院仍然由法国工作人员经管着，虽然是在德国人的控制之下。两个德国卫兵僵直地站立在大门的两边，显得并不注意我们的出入。到了医院里面，黑暗、肮脏，并且到处是成群的跳蚤和虱子。我们在这家医院里走来走去，同士兵们谈话，随时都注意着寻找乔纳森。在花园里，我们注意到有一个英国军官独自一人坐在长凳上。他的皇家空军制服已经绉得厉害而且已褪了色，在他的右眼上包扎着绷带。当我们走近时，他的脸上忽然显出了盎然生气。

“我希望你们会来，”他说，“但我并没有把握。”

“你是我的一个同胞，”吉蒂回答说，“你被迫住在这样肮脏的地方，这太令人厌恶了。”

“在你们看来也许是这样的，”他用一种很低的声音答道，“但我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按说我是完全可以离院了，但假如他们发现这个情况，他们就要把我送入监狱。这里几乎没有什么警卫，我是可能逃跑的。但是关进监狱，那就很难逃跑了。”

吉蒂从凳子旁边走了几步，然后又转过身来。“你愿意我把你带到巴黎吗？”她低声地说道。

伯克抓住她的手。“怎么去，博里波夫人？”

吉蒂拿出那个神秘的棕色纸皮的包裹。“这里是一套工装裤，”她说。“我们的汽车停在那个矮墙的另一边，那里都是灌木丛。在汽车座位的后面是行李仓的入口。爬进去——地方是够宽敞的——随手就关上它，等着我们。”

我平生所曾做过的最艰难的事情是：当我们回来穿过病房时，我们同病人谈着话，装作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似的。在走廊上，一个金发的年轻人一瘸一瘸地走到我们跟前。“我是劳伦斯·米汉——我看到你们同伯克在一起。请你们——也帮助我出去吧。”他全身都在颤抖，看上去病得很厉害。

“你在发烧，”我说。

“不，我只是腿受伤，快要治愈了。如果能离开这儿，我一切都会好的。”

“瞧，”吉蒂说，“我们汽车里一次只能带一个走。如果德国人没有捉住我们，我们就再回来带你。”她大踏步地走开了，我在后面紧赶。到大门口，吉蒂大声地喊道：“等在这儿，我把汽车倒一下。”我怀着恐惧，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注视着她把汽车开到两个德国哨兵跟前。“早晨你们什么时候为来访者开门？”她用德语问道。其中的一个哨兵告诉了她。

“我们很可能要来这里好几次，”她说。“来一支烟？”哨兵接受了一支烟，并给她的烟点了火。

“谢谢，”她说，同时开动了汽车。我正要去责备她，但她安详地说：“我要他看到在汽车里除了我们之外，没有别人。”

“但是，如果他要我们打开这个行李仓呢？”

“我锁上了。我会告诉他，钥匙留在巴黎了。”

当伯克被安全带到我们寓所时，吉蒂和我感到自己简直象一个经受过考验而胜利了的密谋者。

“你们俩都很了不起，”伯克说。“但愿其他英国士兵也能有我这样的幸运。他们估计大约有一万人，在敦刻尔克被困以后，象野兽那样躲藏在法国北部的树丛里和洞穴里。他们没有吃的，没有武器。德国人组织了一支特种武装摩托化部队，专门搜索他们。真没有办法去援救他们。”

我们在这阴郁的沉寂中坐了一会儿。晚餐以后，当伯克已就寝，吉蒂用她坚毅的目光转身望着我。“艾塔，你得回美国去。我不能在这里仅仅坐视这种残酷的搜捕人的游戏继续下去——我有责任去帮助我的同胞逃脱魔爪。但是我没有权利连累你。”

“我决不会离开你，吉蒂，”我说。“如果你必须援救士兵们，我也必须帮助你。”

我们主要的问题是同那些士兵们取得联系。我们最后决定利用这个“寻找失踪者”专栏，一如伯克做过的那样。第二天清晨，吉蒂在《巴黎晚报》上登了一则广告：

“威廉·格雷正在寻找他的朋友和亲戚。

地址是：巴黎罗迪埃路，现代咖啡店。”

我们既不敢用我们的名字，也不敢用我们的住址。而威廉·格雷已安全离开德国占领区。同时吉蒂又认识现代咖啡店的老板杜兰德先生，他是一个忠实的法国人。他答应把寄给威廉·格雷的任何邮件都秘密地交给我们。

我们同伯克一起正要动身到“河左岸”那幢房屋去的时候，钱斯尔带来了坏消息。由于有一个小组已经叛变，“河左岸”的房屋遭到了盖世太保的袭击。纳粹也知道了前沿地区的庄园。

“那么，他们随时都会上这儿来啰！”我喘着气说。

“噢，不！”钱斯尔回答，“你们没有问题。奸细只知道我们中间

很少几个人。我们在省政府里的朋友——他是给我们准备出境签证的——受到德国人的完全信任，他知道他们所知道的每一件事情。他们还从未听说过你们。”

我们在省政府里的伙伴预先通知了我们的朋友，很幸运，两幢房子里的所有人员都已及时逃离，但那条组织士兵逃走的路线是不能再使用了。钱斯尔自己也得先去非占领区。“我将在那里住较长时间，直到我留起胡须，”他说。“当然还要组织一个小组，负责照顾那些要偷越分界线的人们。等我再回到这儿，我一定同你们取得联系。”

他告辞而去。他的来到时给我们带来的一点勇气也随他的离去而消失。我们听到空军上尉伯克在卧室里踱来踱去的脚步声。他的安全是我们首要的紧迫问题。

“艾塔，现在只有一件事情要做，”吉蒂说。“明天我们必须找到几个住在边境的法国农民，他们会愿意把伯克偷渡出境。”然后，她又中断了自己的话。“我们明天不能做这个！我们必须去把劳伦斯·米汉接出来。”

“吉蒂！你现在该不会把他带到这儿来了吧！”

她惊奇地望着我。“不把他带到这儿来？但我们是答应了的。”

我们第二次去杜朗的旅行是十分短促的。米汉躺在床上，看上去病得很厉害。他的眼睛里闪着光，但是他很机智，装作一点也不认识我们的样子。吉蒂在他的毗邻的那个床铺前停了步，然后带着我到走廊上去。当我们经过医院办公室时，门突然开了，一位法国少校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我是蒂鲍德少校，这里的负责人。我相信你们两位女士上一次曾光临此地。”他说得很缓慢。然后，又突然地说：“能不能请你们告诉我，伯克空军上尉在哪里？”

我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但吉蒂却镇静地说：“你真是个善于猜出别人心思的人。我们刚才还在病房里寻找他呢。”

蒂鲍德少校仔细地审视着吉蒂。然后，他走进门去，说：“请费神到我的办公室来一下。”到了室内，他以手示意，让我们坐下。“我已经作了深入调查，你，博里波太太，是英国出生的。因此，我并不奇怪在你来访之后，这里的极少几个英国战俘中的一个逃跑了。我不是傻瓜，博里波太太。你帮助伯克上尉逃跑这件事是十分明显的。把你移交给德国当局，这是我的责任。我是一个军人，我习惯于服从命令。”他又停顿了一会儿。我的心跳得厉害。“但是，女士们，我不仅仅是一个军人，”他缓慢地说，“我还是一个法国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还没有把伯克上尉失踪的事报告上去。你们女士们必须立即离开这个医院，并且不再回来。我必须征得你们正式同意，你们将不再重复你们的行动。”

我在我的椅子上直挺挺地坐着，对于事态的这种意外发展感到如迅雷击顶，不知所措。吉蒂站了起来。“谢谢你，少校，”她说着，伸出她的手来。“我非常高兴遇到一位真正的法国人。”

蒂鲍德少校握了她的手。“请你原谅我，”他干巴巴地说。“假若为了防范万一，由我来护送你们到车上去，如何？”

当我镇定下来，能够说话的时候，我们的汽车已经离开杜朗几公里之外了。“我们只好忘掉可怜的米汉了，”我议论说。“我们当然不能再回去了，”吉蒂微微一笑。“当我们站在他的邻床边的时候，我递了一张纸条给米汉，”她说。“他现在已躲进行李仓里了。”

到达我们寓所时，米汉行动不便下车都很困难。他紧靠着我们，蹒跚地走进公寓。

“一切顺利吗？”伯克从卧室里出来，叫喊着。米汉躺倒在地板上，一动也不动。伯克弯下身子惊呼起来：“他的伤口又裂开了！”可不是吗！米汉的一条裤腿上沾满了鲜血。

“打电话请一个大夫来!”吉蒂命令着。然后又说:“不!我们可不能给医生说什么。取几条毛巾来——”门铃不停地大声地响着。我们站立着,象泥塑木雕一样。门铃又响了。“没有办法了,”吉蒂默然无望地说,“我们隐瞒不了这个,艾塔,去开门吧。”

我生平还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违背自己心愿的事情——其实,我们的恐惧是一场虚惊。进来的却是亨利·博里波,吉蒂的丈夫。当他在巴黎时,他经常来探望吉蒂。这一次访问真是老天保佑,当博里波先生起初的吃惊之情消失之后,就立即负起全部责任来。他打电话,去请一位他知道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大夫。大夫在五分之内就来到寓所。十五分钟之内,米汉绑上了绷带,躺在床上,但是大夫对他的伤情犹疑地摇着头。“他受到严重的感染,”他说。“但我将为他尽一切力量。”

大夫走了以后,亨利为我们解决了其余的问题。“我的朋友蒂斯埃在利布恩有葡萄园,横跨分界线。他能让你们的小伙子们通过去。只要一笔小小的费用,每人付五十法郎,这是给德国上士的小费。”他露齿大笑。“看来,德国的大兵先生不时地喜欢捞一点外快。我在省政府也认识一个人,他将给你们的英国朋友们准备好填写着法国名字的通行证。你们不必担忧——他们将一切顺利。”

第二天早晨,杜兰德的孩子埃米尔给我们带来了致现代咖啡店威廉·格雷的许多信件。吉蒂拆开其中的一封,没有任何内容,只有一个地址:

B. W.司多瓦

雷米斯市车站路十二号

“我看这有点可疑,”我说。

“噢,亲爱的,”吉蒂对伯克说,“艾塔正在每一封这类信件背后看到盖世太保精巧的笔迹。”

再有一封信是用法文写的，

亲爱的先生：

我是贡熙-上贡熙教区的牧师。我是应本教区一些教友的要求写信给你的，他们似乎发现你原来是一位老朋友。按照他们的意思，我可以放心地去找你商谈一件对我的会众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的教堂建筑需要紧急的修理，否则这个中世纪艺术的美丽产品将毫无疑问地垮掉——这是随时都可能遭到的厄运——，那些无法弥补、无法替代的价值将会荡然无存。我已为这个恢复旧观的计划得到了教堂和地方当局的批准。

我请求你，我亲爱的先生，立即通知我，我们何时何地可以见面以讨论扩大我们募捐的运动。

愿上帝保佑你，我是你们非常忠诚的神父克里斯勤·拉维尔。

“是为了呼吁募捐，”我说。

“艾塔！”吉蒂几乎尖声叫了出来。“这是写给威廉·格雷的，是对我们广告的回答！它这样的写法，只有我们看得懂，别人谁也看不明白。听：‘我们的一些教友们似乎发现你原来是一位老朋友。’那他一定跟威廉·格雷部队中的成员有着联系。‘按照他们的意思，我可以放心地去找你。’‘这是随时都可能遭到的厄运’——换句话说，他的‘会众’可能被发现和被逮捕。”

我们都同意，这封信看来是真实的。我们立即启程去会见这位克里斯勤神父。他原来是个年青人，明亮的眼睛，充满活力——我估计他不会超过二十八岁。他建议我们到教堂背后的教区长的住宅里去谈话，因此他带着我们穿过一个花园，走进一间低屋顶的小房间。他告诉我们，至少有一千名英国士兵躲藏在贡熙-上贡熙的森林里，他同他们保持着经常的接触。“他们忍饥挨饿，精疲

力竭。我的教友们给他们食品和衣服，但是我们的配给是严格控制的，即使把全部配给的东西都拿出来，也是不够的。我能够弄到身份证件，每一次可带几个人，把他们护送到巴黎，假如你们能够接着照料他们的话。你们能做到这一点吗？”

“我们当然能够，”吉蒂说。于是，她就告诉他从巴黎组织逃跑的路线，行动可以在一星期之内开始。

这位年轻的牧师把他的眼睛合上了一会儿：“你们真象是对我的祈祷有求必应。”

大夫对于劳伦斯·米汉的治疗效果好极了，他很快就会恢复健康，满可以出门远行了。因此，我们期望着他同伯克一起送走。亨利在省政府的朋友给我们拿到了大量的空白证件，我们可以在上面填写名字及其他细节。但是，有一天早晨，报纸上宣布，任何人如被发现帮助英国士兵逃跑，一律处以死刑。

“我必须立即到利布恩去找蒂斯埃，”吉蒂说。“我担心，这个命令会吓得他不敢再帮助我们了。”

由于我们已经给我们的两个难友搞到了通行证，所以她决定把他们带上一一起走。她回来时直夸奖蒂斯埃先生。“伯克和米汉已安全越过边界，”她说，“蒂斯埃先生真是一个好样的老家伙。当我向他提到死刑法令时，他只是嗤之以鼻。”

吉蒂立即写信给克里斯勤神父，告诉他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募捐运动可以进行了。几天之后，他果然带了四名小伙子来到我们的寓所。他们带着旅行许可证，搭乘晚车去利布恩。按说他们一安全抵达，蒂斯埃就会通知我们。但两天过去了，他那里并无一点讯息，而当蒂斯埃亲自到来时，我们开始感到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们这些女士们犯了一个错误，”他毫不客气地告诉我们。“你们以后绝不能让那些小伙子们自己去旅行而不配备一个机智

灵活的护送人替他们回答问题——用法语回答。这几个英国青年总算运气，可以说由于奇迹，才幸免被捕。法国宪兵在火车上检查乘客，发现他们都有官方许可证，就是不会说法语。要不是车厢内法国乘客们的愤怒抗议，宪兵就会把他们赶下车去。

“那叫我们怎么办呢？”吉蒂叹息道。“我可想不出什么办法，到哪里去为他们找护送人啊！”

蒂斯埃先生刚离去不到半个小时，玛戈就禀告说又来了一位客人——科贝埃先生。

“我不认识他，”吉蒂带着怀疑的口气说。“他要干什么？”玛戈没有作声，而科贝埃先生却打开门径直走了进来。他看上去象一位法国医生——嘴上蓄着一撮乌黑的不均匀的胡须，戴着一副宽边的眼镜。我们凝视着他。

“我的亲爱的女士们，”他说，“我非常高兴地发现你们认不出我来。”吉蒂和我几乎异口同声地喊了出来：“钱斯尔！”

钱斯尔现在正为一个新的机构工作，这个机构的任务是把任何愿同戴高乐一起战斗的法国人偷送到英国去。他来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同他一起工作。当吉蒂向他说明了我们的问题，他立即意识到他的计划完全可以同我们的相配合。“再没有比这个更容易了，”他说。“当你们有若干英国人需要送走时，我就给你们准备相同数目的正要去投奔戴高乐的法国小伙子。”

“真是上帝又一次把你派来帮我们的忙，”吉蒂对他说。我们现在不仅有了一条逃向非占领区的路线，而且有了一条直接去英国的路线。到11月份，我们送走了一百个以上的英国人，伴随他们的还有相同数目的法国人。整个过程进行得象时钟部件运行时那样准确。我们几乎不再想到有什么危险了。

到10月份，我们组织逃跑计划中的整批运送活动遇到了经济上的困难。旅行费用，包括每人越境费五十法郎，构成相当大的

一笔数目，而开支更大的是这些人在巴黎时还得供养他们。我们家里只有三张食品卡，我们不得不经常求助于黑市，付出比当局规定的合法价格要高出十倍到二十倍的钱。吉蒂认识几个乐意帮忙的家在自由区的殷实富户，当然，她不能给他们写信，只能自己跑去找他们。

“你需要去多长时间呢？”我问。我装出微笑，以掩饰我由于独自留下而产生的恐惧感。

“两个星期——也许三星期。艾塔，别担忧……如果发生了什么事，你总是可以去找钱斯尔的。”

吉蒂不在期间，克里斯勤神父送交给我三批人，而我也就三次把他们交给由钱斯尔安排的护送人。当第三批人上路以后大约半小时，杜兰德咖啡店的侍者埃米尔到我们门前询问吉蒂是否在家：“杜兰德先生说，有一位斯托先生在咖啡店里，说他有事同她讲，太太。”

“斯托先生，”我们在《巴黎晚报》登了广告后接到的许多来信中有一封就是这样署名的。顿时间，我坐在那儿几乎瘫痪了。这个人怎么知道吉蒂的名字？我们的广告只提到威廉·格雷。

我必须逃走。也许我还能跑到非占领区，脱离危险。但是这样，吉蒂回来时，就会发现我跑掉了。我变得较为镇定起来。无论如何，我们过去还是躲避过多次危险。我跑到离现代咖啡店只有一个街区的一家小饭馆，告诉埃米尔让杜兰德先生溜出来见我。杜兰德先生马上就来了。

“你是不是把我们的地址告诉过这位斯托先生？”我问。

“当然没有，”他回答说。“吉蒂太太告诉我不要把地址告诉任何人。这个人找的是威廉·格雷。我才派埃米尔来找你。”我又舒了一口气。“太太，你可以相信，我并不象我看上去那样愚蠢。我告诉他，我不认识什么威廉·格雷。我建议他等着，如果威廉·格

雷来到这儿领取他的邮件时，我就介绍他们认识。”

“杜兰德先生，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嗯……他的法语讲得还不坏——不，也许，倒象一个英国人讲法语。他说，他很害怕讲英语，虽然他的声音低得几乎没有人能够——”他突然停顿了下来，他的嘴微微地张开着。“见鬼，我真愚蠢！他说话的时候，点着一支香烟，就是发给德国士兵们抽的那种烟！”

我隔着一张桌子抓住了他的手。“杜兰德先生，你坐稳了。你的那位斯托先生是一个盖世太保。”

他的脸突然变白了。“那我该怎么办？我会遭到什么呢？”

“我有旅行许可证，”我说。“你现在就可以到车站，搭火车去非占领区。”

“不，”他呜咽着，“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们——我所有的一切都在这里。”他满脸愁云，似乎正在苦苦地思索着一个问题；然后，愁云舒展，变成了开朗的笑容。“有办法，有办法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我就去打电话给盖世太保总部通知他们，有一个可疑的英国人在我的咖啡店里。这样，他们就不可能怀疑我了。”

当他刚一离开桌子，我立即为恐惧所抓住：我们是否犯了错误。要是斯托先生真的是一个英国士兵呢？我走到咖啡店，在店门前一个平台上坐了下来。我必须看看发生了什么，以便尽可能地亲自作出确切的判断。

一辆德国官员的汽车开到，从车里跳出三个人来。他们跑进咖啡店，过一会儿出来了另一个人，由两人用手臂架着他。我的心沉重极了，很明显，我们是错了。但是当他们在黄昏的暮霭中走在街道上的时候，他们全都爆发出一阵狂笑。在他们钻进汽车之前，那个“斯托先生”仍然笑个不止，并且颇有礼貌地拿着一包烟递给其他人，每人一支。我现在能够完全肯定，这是德国人发的香烟。

几天以后，杜兰德闯进寓所来，手里拿着一张报纸，脸上怒气冲冲。“你们真是发疯了吗？”他嚷了起来。我在他用颤抖的手指点着的那则广告上读了一遍：

威廉·格雷(以前在敦刻尔克)正寻找他的朋友。

地址：现代咖啡店，罗迪埃路，巴黎。

“杜兰德先生，”我说，“我们没有登这则广告。我们也没有要报社重登我们的那则广告。”

他捉摸不定地望着我。“那么，是谁干的呢，太太？”

“盖世太保，”我说。我完全可以肯定。“他们想要看到，当你见了这则广告之后，你跑到谁那儿去。”

“啊，老天爷！”杜兰德颤抖着。“我做了什么呀！我现在能干什么呢？”

“没什么，”我说。“如果他们已经跟上了你，灾祸已经造成了。”

那天夜里，我把整个寓所里每个房间，每个抽屉都清理了一遍，凡是可能被当作罪证的东西都付之一炬。第二天早晨，我正在吃早饭，门铃响了。

两个人在厅堂里站立着。

“博里波太太在哪里？”

“在图尔市，”我说。我懂得，我决不能说出她已离开占领区。

“她什么时候回来？”

他出示证件：“德国秘密警察。”

这一场面使我的情绪恢复了一点常态。五个月来，我一直生活在唯恐这一瞬间来临的恐惧之中，而现在它真的来到了。我倒反而镇定和冷静下来。事情的发生比我所想象的要逊色得多——

仅仅是两个穿便衣带着公事皮包的男人，彬彬有礼地在我的房门前站着，象商品推销员那样。

盖世太保人员以为我不懂得德语。“那个英国女人走了，”其中的一人向同来者说道。“不要离开这个地方，一定要接打来的电话。”然后他转向我，又用法语说，“你跟我走。自己打个包，里面放几件厚一点的衣服。”

我走进我的房间，开始把东西塞进手提箱里。当我慢吞吞地收拾行李的时候，心里却绝望地想着，能不能有什么办法给同伴们留下一个警告呢。克里斯勤神父原定在中午是要来的。钱斯尔是随时都可能来的。当我从电梯慢慢地往下走的时候，我还希望能在厅堂里遇到看门的，但是哪里也见不到她。

在盖世太保总部，我被押送到一个房间里，有两个德国人坐在写字桌边。一个穿着制服，另一个是黑格博士，是一个穿便衣，象耗子似的瘦小的男人。

“希伯太太，”他用劝诱的口吻说，“我们并不想被迫把你们伟大国家的一位公民关进监狱。如果你是一个敏感的妇女，你只要简单地把事情的一切经过告诉我们就行了。无论如何，大部分事情我们都知道了。我们知道，博里波太太以士兵协会的工作为掩护展开活动，把英国士兵偷送出边境。我们所要从你那儿知道的不过是这个案件的一些细节，以便记录在案。”

在许多场合由于一想到被捕而产生的那样紧紧攫住我的心的惊慌，现在却神奇地消失了。我发现自己很敏捷而且从容地思考问题。对我们寓所的袭击以及对我的询问，并不见得证明德国人已经知道确情，但他们很希望得到它。“我很抱歉，”我坚定地说，“博里波太太方面的任何这一类活动，我什么也不知道。”

在对面墙上是一个电钟。克里斯勤神父快要到达我们的寓所了。他会拉响门铃，而且按照他的老习惯，会高兴地嚷着：“我带来

几个饥饿的孩子。我能把他们带进来吃顿饭吗？”而当他发现一个不认识的人出来开门时，已经来不及了。

黑格博士对我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时间刚过12点钟，电话铃响了。黑格拿起话筒，听了一会儿，胜利地望着我。“把他立即带到这儿来，”他说，然后很快又纠正他自己，“不，你可能还有别的来访者。我马上派人去。”他转过身来，对我微笑着说：“希伯太太，你注意到这个案件了吗？当穿着一串珍珠的线断了的时候，只要一颗珍珠掉了出来，其它的也就照样跟着掉出来了。”

当克里斯勤神父被带进房间来时，他说，“你好，希伯太太？”

“那么，你是认识她的罗，是吗？”黑格说。

“当然，”神父说，“我是去拜访博里波太太的，她正帮助我们教堂的修复工作，就这样我被逮捕了。简直是莫名其妙！”

那就是我想要知道的事情。他也否认了一切罪名。在以后的几个小时内，又向我们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但我们两个都坚持了神父开头所指出的关于我们之间关系的最简明扼要的说法。到了6点钟，他们不得不放弃追问。黑格博士召来了警察说：“这个女人仍要拘留调查。”

足足两个星期，我是夏希一米迪路德国军事监狱1876号牢房的囚犯。我和其他三名女犯人关在一间牢房，房间里四张肮脏的小床，紧紧地挤在一起，我们简直无法走动。我两次被传到黑格博士的办公室，他用成百个问题向我作连珠炮似的攻击。然后，出乎我的预料，在12月14日，黑格和颜悦色地通知我，我被释放了。怀着惶惑、疑虑不安的心情，我接到了盖着官印的释放证，走出了牢房，呼吸到了夏希一米迪路上的清新的空气。

当我去敲贝格勒夫人门房小间的门时，她装着不认识我。接着，她的眼眶里流下了泪水。“老天爷啊，希伯太太，他们怎么对待你的呀？”

贝格勒夫人说，吉蒂和钱斯尔都没有回到过这个寓所。她也未曾见到过亨利·博里波。他一定安全地回到了非占领区。从她门房的门背后，她曾亲眼看到了盖世太保抓走克里斯勤神父。他没有带任何小伙子来。玛戈也曾被捕，但警察又放了她。她已回到她在布列塔尼的老家去了。

在以后的几天中，不论我到哪里，我都发现有一个影子紧跟着我，追踪不放，我拐弯他也拐弯。有一天，钱斯尔从地下铁的入口处走了出来，正朝我走过来。我的第一个反应是高兴。我想，“他仍然平安无事！”接着我又想，“我决不能表示我认识他。”盖世太保派来跟踪我的那个影子，只在我后面很近的地方。钱斯尔见了我，微笑了一下。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没有作出我认识他的样子。当我们擦肩而过时，我机警地向他低声说，“不要认我，我后面有尾巴跟踪。”

我匆忙跑到街角，然后回头望了一眼。我的那个影子哪儿都不见了，但靠近地下铁的出口处，一小堆人群聚集起来，我听到一个警察在鸣笛。

当天夜晚，盖世太保来到我的寓所，又逮捕了我，说是“为了传讯”。我又一次在盖世太保总部面对着那个带着讽刺表情的黑格博士。“好吧，喜剧应该收场了，”他说。“今天下午，我们捉到了高比埃先生，谢谢你，希伯夫人。两个小时以前，博里波太太已经在波尔多被捕。”

他没有提到钱斯尔的真名字——我注意到这一点，感到有点放心——但是当他说到吉蒂已被捕，这就把对于钱斯尔的种种想法从我的头脑里驱走了。如此说来，他们终于找到了她。

这一次，我的审查是不同于其他人的。一个书记员被叫进来，记录我所说的每一句话。这是我为法庭档案所作的证词。我继续否认一切。当那份打字的证词拿进来要我签字，我仔细地读着

它——长达十页，单行打字纸——，担心里面玩弄花招，但全部内容都同我所说的完全一样。因此，在每一页的末尾，我签上了我的名字。

一个警卫被叫进来，把我带回牢房。当我离开时，黑格博士冷酷地说：“希伯夫人，再有两、三个月，你的案件就要上法庭审判。那并不是很长的时间。所以我劝你还是准备准备吧。对于你已经犯了罪，法庭有责任判处死刑。再见，希伯夫人。”

我得到的关于吉蒂的第一个音讯，是我坐牢的第二个月之内由监狱当局提供的。我被叫到牢房看守的办公室去，那里我发现黑格博士正等着我。他交给我一份十五页长的文件。“你愿意看看博里波太太的招供吗？”

我翻阅了一遍，每一段都以这样的字句开头：“我招供……”看来是包括了关于我们活动的相当完整的内容。我受到了五雷轰顶的打击。吉蒂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呢？

“好吧，你看，”黑格博士胜利地说，“现在，你的招供如何呢？”我保持着沉默。“来，来，希伯夫人，这是荒谬可笑的！你将触怒法庭，我只是为你的利益着想。”

我简单地说：“我对我原来的证词没有什么可补充的。”我又被带回到我的囚房。

3月7日早晨8点钟，警卫命令我跟他去法庭受审。在楼梯口上，他猛然拉开一间囚房的门，叫道：“2017号——受审！”吉蒂在门口出现了。她的脸色苍白，她的两眼下面有着深深的阴影；但她看上去无论身体或精神都没有被摧垮。她望着我，含蓄地微笑了一下，温柔地说：“你好，艾塔。”

“安静！”警卫咆哮着。“囚犯不许讲话！”

一辆绿色喷漆的囚犯押送车停在人行道旁边。警卫打开车门，让我们进去。随后门就被锁上，车子倾斜了一下就开动了。当

我们单独在一起时，吉蒂带着责备的神情望着我，“艾塔，你怎么能，怎么能这样软弱，以致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那些家伙呢？”

“我……？”我瞠目结舌，身子缩了回来。

“他们一定恐吓你，艾塔。但你应当坚强。我真该气愤，上帝知道……”

“吉蒂，”我惊叫了起来，“我向你发誓，我一直没有承认任何事情。”

“但是，我亲眼看到你的供词。这是十页纸的证言，是由你签字的。我认识你的字迹。”

“我作了十页纸的证词，”我说。“我签了名，但那是一份翻案书，不是一份招供状。如果你看到另外什么的话，那一定是一份伪造证词。”

“我的天哪！”吉蒂说，“我相信了它——我真的招认了。”我把胳膊搭在吉蒂的肩上，“这不是你的过错，吉蒂。”

吉蒂慢慢地摇着头说，“我们已经吃亏了，艾塔，吃亏了……”

囚车颠簸着停了下来。吉蒂骄傲地昂起了头颅，整了整她的衣服。“艾塔，抬起头来！”她说，“别让那些德国鬼子看到我们害怕他们。”

在法庭的中央，是一个长桌子，上面堆放着厚厚的一迭文件，那里有几把高背椅子，是法官们坐的；面对着他们是一条长凳子，是被告坐的。吉蒂和我坐在那里，过一会儿，蒂斯埃、克里斯勤神父也被带了进来。钱斯尔是最后一个来到的。他只是微微点了点头，给我们打了一个招呼，好象我们是陌生人似的，我焦急地注视着门口，预期杜兰德会在这个时候走进来。但是，再没有其他人出现。

“吉蒂·博里波夫人，”首席法官点了名。

吉蒂走到那个长桌子跟前。

向她提出的第一批问题是惯常形式上的一套如：姓名、住址、年龄、出生地点、国籍、宗教信仰等等。然后，法官宣称：“你被控告，和希伯夫人、克里斯勤·拉维埃先生、蒂斯埃先生和高比埃先生同谋把英国士兵偷送出这个国家。”

“那并不准确，”吉蒂用一种清晰的嗓音说道。

“是吗？”法官讥讽地说，“那倒是非常奇怪的，因为我手头有你自己签了名的供词。”

“我并不是要撤回我的供词，”吉蒂镇定地说。“但这些人并没有参与我的活动。”

“希伯夫人，她同你住在同一个寓所，必定是迟钝得出奇罗！”

“不过，”吉蒂坚持说，“她什么也不知道。”

“那么蒂斯埃先生呢？我注意到你利用他的庄园去越过边界线。”

“我们并没有得到他的允许，”吉蒂说。“我们看中他的庄园，仅仅是由于它的位置。我们只是借道而过。”

“越说越妙，”法官讽刺地说，“现在，轮到拉维埃先生了。你为他又准备了什么样有趣的借口呢？”

“我利用他作为我旅行的一种掩护，”吉蒂说。“他以为我正帮助他募集重修他的教堂的基金。”我怀着既钦佩而又怜悯的复杂心情听着吉蒂的答辩。她确实了不起，试图保全我们余下的每个人，但是她所叙述的故事却是很难骗过敌人的。

“那么，我们还剩下一个人了，”法官说。“高比埃先生又怎么样呢？”

“我并不认识高比埃先生，”吉蒂镇静地回答。她也曾注意到他们未能认出钱斯尔来。

“你是很高尚的，”法官说。“但是，当然也是幼稚和笨拙的。你已经作了招认，而且你刚才又声明并不撤回你的供词。我们需要

从你那儿听到的就是这些。”说罢，他做了一个手势，让吉蒂退出去。

“艾塔·希伯夫人！”

我在那张长桌边就位，经受了法庭开始审问时必须回答的一系列问题。

“你知道对你的指控是什么吗？”法官说。“你认罪吗？”

“我是无辜的，”我说。

法官把他的冷漠的、锐利的视线转向我。“胡说！”他咆哮起来，“你竟敢自称无辜！你住着的那个寓所里经常住满了逃兵，你是这个犯罪集团的第二号人物！你犯了罪，希伯夫人，法庭将注意你的态度。假如你今天要给我们说的就是这些话，那么，你还是回到你座位上去吧。”我蹒跚地回到长凳子上。

蒂斯埃走到长桌子跟前。他承认，他曾允许提出要求的任何人穿过他的庄园，因为，他说，他不承认外国人有权制订规章制度把法国人捆绑在法国。

紧接着蒂斯埃的是克里斯勤神父。我真希望得到一份他的证词的速写记录。按照我追忆所及，他是这样说的：“我是一个牧师，但在这场战争中，我变成了一个士兵，一个没有屈膝投降的士兵。我在为正义而战斗。我并不希望在这个法庭上找到什么正义。但我深知，神灵的正义最终将占上风；上帝将宣判你们有罪，而你们竟然还来审判我们。”

最后被传问的是钱斯尔，而他再一次被称为高比埃。他被控告为我们的同党，虽然指控他的唯一的证据是在他的寓所发现一张图画明信片，这是一张对希特勒的讽刺画，上面写着：“法国万岁……打倒德国鬼！”等字样。

接着，检察官把一些确切的情节和纯系想象的东西混淆在一起，询问是否要以希特勒的名义给我们判刑。辩护律师们可以允

许发言，法官宣布，他和他的同事将暂时退庭，以商榷判决书。他们刚刚起身要离开这个屋子，黑格博士闯了进来，气喘嘘嘘，兴奋异常。他同法官商议着，并从硬纸夹里拿出纸片来。法官立即用槌子轻敲桌子。“重新开庭，”他说，“发现了新的证据，钱斯尔先生，站起来！”

我不得不钦佩钱斯尔的镇定自若。在出其不意地宣布他的真名的情况下，他仍然不动声色。但我们其余的人都陷入了困境。我们情不自禁地把脸转向他。

“老天爷，钱斯尔先生，”法官说，“我想，如果你已忘掉了自己的名字，但你的朋友却并没有忘掉。如果你愿意的话，钱斯尔先生——或者高比埃先生，你还是放弃你那场闹剧吧。你是不是愿意修正你所说的不认识那些被告的声明，你同他们的活动没有牵连。”

“如果你已经了如指掌，”钱斯尔说，“看来，我就没有必要再补充什么了。”

法官面带怒色。“对本庭来说，你承认还是继续否认你同这个犯罪阴谋集团的明显不过的联系，这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检察官站起身来。“我可以把钱斯尔先生的名字列入那些应当被判处死刑的人之中。”

“应当注意这一更改，”法官说。

正好2点钟的时候，几扇门都开了，法官们依次回到法庭。主持审判的法官宣布判刑：吉蒂，死刑；克里斯勤神父，死刑；钱斯尔，五年苦役；蒂斯埃，四年苦役；判我三年苦役。

我的脸上准是明显地表露出了我所感到的恐惧。虽然我的判刑是我们中间最轻的，但想到将要在那个可怕的牢房里耽上三年，简直不能忍受。接着，我又想到刚才对吉蒂和神父判处的死刑，我知道，他们是无法逃脱的。吉蒂抓住我的胳膊说，“别哭泣，艾塔。

不要让那些德国鬼看到我们失去自己的尊严。”我紧紧地捏住了她的手，眼泪夺眶而出。吉蒂虽已被判死刑，却还在宽慰着我！

我们又一起被锁进了囚车。我们俩都明白，这也许是我们相互见面的最后一次了。我抑制不住自己，把我的头投入吉蒂的怀里，痛苦地哭泣着。她抚摸着我的头发。

“那时，我们还有从容的时间，我应当促使你回家去，”她说。“别为我担忧。有一个时候，一想到死就很害怕，但现在由于我对这个问题想得很多也就习以为常了。在这次战争结束以前，因此多一个死者并无多大差别——特别是当你想起了我并不是一个失败者，而是一个胜利者，我在对抗德国人的斗争中赢得了一百五十比一的胜利。答应我，艾塔，想到我时请不要感到悲伤。只要记住那些有着勇敢心灵的健壮的小伙子们，我们已把他们送回了家园。我已经给英国送回去了一百五十个生命，而现在不过失去一个生命。”

囚车忽然发出一声震响，停了下来，我们又到了监狱。

至此，我的故事也就结束了。你们已知道了下文——我如何在监狱服刑一年之后，同约哈那·霍夫曼进行交换，我又如何登上“德洛宁霍姆”号轮船返回我的祖国的自由土地。

我现在唯一的愿望是忘掉我所遇到的一切。然而，我却绝不能忘怀那些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的脸庞——吉蒂、克里斯勤神父、蒂斯埃、钱斯尔以及其他所有的人们。

跑掉的那一个

——摘自肯德尔·伯特和詹姆斯·利索的著作

空军中尉佛朗兹·冯·维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喜欢夸耀自己

和胆大妄为的德国战斗机驾驶员之一。当他决定越狱，要逃出英国的战俘营时，环境和他本人的机智，使他成为当时对英国安全保卫工作来说，一个异乎寻常的危险分子。英国人熟知这一点，但是他避开了他们——施出他的堪称逃跑艺术典范的全身解数。英国作家肯德尔·贝伯特和詹姆斯·利索从英国和德国的资料中仔细地研究了这个几乎不可置信的故事。

德国空军中尉佛朗兹·冯·维拉，走在毫无表情的警卫们中间，穿过柯克福斯特英国空军审问中心的长长的走廊，被引进了一间舒适的、用许多板条镶嵌的房间。天气已经完全黑了，只有一盏明亮的供阅读用的桌灯，在一张宽大的桃花心木书桌上投下了一道光环。在书桌后面坐着一位英国皇家空军的军官，他有一张瘦小的起了皱纹的脸庞、一对浓眉和一撮向上卷的胡子。

他用一种流畅的、微微带着口音的德语说话。“我是空军少校霍克斯。坐下，中尉。”

当这个俘虏“卡嚓”一声立正，生硬地欠身鞠躬时，他注意到紧靠着书桌，有一银把子的手杖。这使他想起了德国报上刊登的漫画里公子哥儿气魄的英国军官。

“中尉，十三架英国飞机被击落，六架在地面被毁，真是令人尊敬的纪录。”在这个审问者的声音中，有一种冷漠的嘲弄。“作为首次大战中王牌飞行员中的一名区区小卒，能够会见二次大战中王牌飞行员中的一员大将，我感到不胜荣幸之至。”

冯·维拉模仿着审讯者讲话时漫不经心的腔调。“在研究皇家飞行大队的辉煌历史时，我未曾拜读过有关你的事迹的材料，”他说。“尽管见到你，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但我决不会透露任何军事情报的。”他停息了一会儿，然后用一种嘲讽的傲慢态度补充说：“但是，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少校先生，毫无疑问，就是你把我打下来的吧！”

这位空军少校一言未发。随之而来的长久的沉默最后被空袭警报器尖厉的声音所划破。另一个警报器开始响了，又一个响了，直到刺耳的尖叫声笼罩着整个伦敦地区。冯·维拉得意洋洋地笑着。更多的德国轰炸机在头顶上飞翔。这是1940年9月7日，一场全面的“大不列颠战争”已经展开了。

现在，警报器发出的尖叫声一个随着一个沉寂了下来。

“告诉我，中尉，”空军少校霍克斯随便地说，“你在第三战斗机联队第二组梯队总部里的朋友们，哪一个人将照顾‘辛巴’，你的宠爱的幼狮呢？也许是一个叫‘萨尼’的，对吗？”

冯·维拉喘了一口大气。自从两天前他被俘以来，他只泄露了他的名字、军阶和入伍编号。但是一个英国的审讯官员竟然不仅知道他的单位，而且知道他的宠爱的幼狮的名字和他最好的朋友的外号。霍克斯并不是在讹诈，看来他什么都知道。他甚至评论到冯·维拉要求取得男爵称号是多么希望渺茫，而男爵称号却是这个年轻的飞行员常常喜欢自封的。

整整两个小时，空军少校霍克斯继续他的进攻，他的带讽刺意味的声调深深地刺痛着这个德国人的妄自尊大的感情。“我必须向你祝贺，中尉，”他说，“祝贺你的出风头的天才。”他拿出一份德国电台的广播节目抄件，内容是冯·维拉叙述他仅仅在一次袭击中就打落五架英国“飓风”式战斗机，还击毁地面上的四架。虽然并没有什么见证，但这个英雄业绩却在德国当作“第二次大战中最伟大的战斗机的战绩”而被大吹大擂。

霍克斯的声音是冷冰冰的：“‘男爵’中尉冯·维拉——‘红色的魔鬼’，‘皇家空军的恐惧’，你我都知道，从来也未曾发生过象你所声称的那样辉煌的战绩。”

“皇家空军不可能在九架‘飓风’式飞机遭到损失之后却毫无察觉”，霍克斯说。他逐点地指出了这种捏造的谬误之处和漏洞所

在，包括冯·维拉在电台发表的讲话和他对报刊记者的谈话前后不一致的情况。说到头，这个故事的虚构性是显而易见的，冯·维拉默默地坐在那里，侷促不安。

现在，空军少校乘胜追击。“如果你的被俘的德国同伴们知道了你我所了解的有关你的著名英雄业绩实情时，那你在这个战俘营里将何以自处？你将成为此地的一大笑料。”

冯·维拉淡然一笑。“少校先生，我知道你为了对此不加张扬而要索取的代价——军事情报。”他的声音变得坚定了。“我什么也不会告诉你，少校先生。你可以使我不能再同我的同伴们住在一起，但是另一条道路是会更糟糕的。我绝不会自个儿单独生活。”

口头审问就这样结束了。冯·维拉并没有被这种最后盘问所屈服。当霍克斯按铃召唤警卫时，这个战俘显示了他的不屈精神。“少校先生，我给你打赌：一夸特（即1/4磅）香槟酒对十支香烟。我将在六个月之内逃跑。”霍克斯幸好没有接受这个打赌。

当年的弗朗兹·冯·维拉，只有二十六岁，任性、充满精力和野心勃勃。自从德国空军成立五年多以来，他一直在那里服役。他很快就找到了这个行业的窍门：要想出人头地，唯一办法就是要使自己到处被人谈论。会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猛冲猛打、富于攻击性和不惜舍命的精神。冯·维拉努力在一切模拟作战中超越其他人的飞行技艺，专爱搞一些被禁止的惊人之举，诸如向桥下俯冲，或在他心爱的姑娘的屋顶上表演低飞特技。别的飞行员到处都带着宠爱的狗、猎鹰，甚至还有猪，而冯·维拉偏要带上一只幼狮。为了增加他的派头，他给自己加上了“男爵”头衔。尽管这个头衔的合法性是很可怀疑的，但即使在希特勒的部队里，也有它一定的势利价值。

当战争爆发后，重要的事情当然要当上一名王牌飞行员，而

冯·维拉确实已经击落了八架查有实据的飞机。这是一个不坏的纪录。但是，波兰、挪威、丹麦和比利时的空军力量在数日之内已被毁灭殆尽，而法国的空军已遭到沉重打击。不出几周，英国皇家空军也快要被打垮了。在这种情况下，纳粹飞行员都争先恐后地抢立战功，获取勋章以免失之交臂。冯·维拉的吹嘘——在他的一次没有见证的著名袭击中击毁九架“飓风”式战斗机，使他的纪录近乎顶峰。纳粹当局把他的战绩从九架减到五架，然后给了他一枚骑士十字勋章。但是，在他未能接受这枚勋章之前，当他第十次到英国上空执行任务时，他就被揍了下来。

尽管他的吹牛的虚荣心极为强烈，但冯·维拉对于保密安全的警惕性还是很敏锐的。有一个时期，那些自信十足的纳粹很少想到自己会有损失，因此很少操心去给他们的飞行员以保密安全教育，于是那些被俘飞行员的疏忽就成了英国情报机构的求之不得的宝物。他们经常随身带着秘密文件、地图、力量报告、技术资料、日记——或者公共汽车票的碎片、电影票的票根和揉碎了的售货纸条，从这些东西，有可能推断出不同部队单位的所在地点。但是，冯·维拉在他的飞机被击毁时却立即烧毁了他带在身上的一切证件。

他的第一次被审问，使他相信德国的领导者是正确的：英国人是愚蠢的。一位彬彬有礼、很随便的陆军上尉递了一支香烟给他，完全不顾胜利者和被俘人员之间的不同身份，看样子只是想要谈论谈论德国的政治、纳粹的理想、德国对殖民地的要求，等等。冯·维拉由于没有被询及军事方面的问题感到极大的宽慰，因而放松了紧张情绪，变得爽朗而又健谈起来。只是到了后来他才理解，这次会见是处理得多么狡猾，这个审问者只是想对他进行一下摸底，以便决定在今后的审问中采用什么技巧才会取得最好的效果。

虽然冯·维拉现在已经成功地顶住了他的第二个讯问者空军少校霍克斯的审问，但英国皇家空军情报机关是决不会轻易放过他的。在接踵而来的日子里，他几乎是日以继夜地被六个会讲德语的军官轮番审问，有时是单独审讯，有时是协同审讯。他们施尽了本行的各种技巧，促使他开口。

直到最后结束对他的审讯之前，审问官们在冯·维拉身上足足花了三个星期。在这个期间，他并没有有意识地泄露任何军事情报。但是在他被审问的全部过程中，英国人却不可避免地向他提供了他们审问方法和技巧的一幅几乎完整的图画。结果是，这个情报较之他所能够告诉他们的任何情报都远为重要。因为冯·维拉中尉对英国人审问方法的巧妙和毒辣，获有极深的印象。现在，他比任何德国人都更了解他们——这件事后来对英国皇家空军和德国空军都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

冯·维拉被遣送到格利兹达尔庄园去，这是一个战俘营，设立在离爱尔兰海岸二十英里处的荒凉的土地上。这个建筑物是一幢光秃秃的石头大厦，共有四十个房间，警卫森严。在到达后的十天之内，冯·维拉就设计了他的逃跑计划。

每隔一天，二十四个战俘被带到路上去做体操。他们或向南或向北——显然都得取决于紧看着他们的骑警队班长的意向——以轻快的步伐前进三公里，然后在路边转弯的地方休息十分钟，再齐步回来。纪律严格，监视严密。除了骑警队班长之外，还有一位负责的步行军官，行列前后各有四个警卫随行监视。

在向北途中的休息地段，有一个篱笆可以通往露天牧场，此外没有可作掩护的东西。然而，在向南去的路上，休息处所靠着一座石头围墙。如果战俘营的同伴中有一个吸引住卫兵的视线，其他人故意集合在一起，就能掩护他的行动——冯·维拉已设想好了如何从事的种种细节——他就可以翻越围墙，蹲在它的后面快跑

出去，直到大路上的一个幽暗处，然后逃入茂密的树林。一旦自由了，他就会直奔海岸边，并争取藏匿在一艘中立国的船只里，逃之夭夭。

两天以后，计划付诸行动。由于向北走的路线存在被抓住的危险，所以有一个战俘下命令转向南走。这个行动并未遭到阻拦。因为那个负责的军官以为是骑警班长下的命令，而骑警班长则以为这个命令是军官下的。

当通常地叫了休息的口令之后，警卫们在大路的一边放哨，而战俘们则跑到另一边站立着或群集在这座石头的围墙跟前。在这往常人迹罕至的路上，突然出现了一辆卖蔬菜水果的双轮车，起初是颇为令人惊慌的。但后来证明它倒是分散注意力的有利条件，卫兵们从水果车那里买来苹果，那个班长就用一只苹果去喂他的马。当水果车走了之后，冯·维拉移向那几个身材最高的伙伴们的身后，他们是按照预定的计划集合起来。冯·维拉就自己撑上石墙。一只胳膊轻轻地碰了碰他，暗示没有卫兵在那里监视，于是，他就翻过墙去，毫无声响地跌落在墙后面的田野上。

战俘们重又排列成纵队，那个班长下令齐步前进。当他们走出三百码的时候，德国人就唱出一首歌——事先安排好在这个关节眼唱的两首歌之一。这是一首报平安的歌，好让冯·维拉知道，他的失踪还没有被发现。现在，他安全地离开了他的俘获者的视线，他们已在转弯处看不见了。他冲过大路，消失在路那边的一个茂密的松林之中。

囚犯在行进中唱歌是严格被禁止的。当战俘们突然爆发出一阵高声歌唱的时候，卫兵们不禁大吃一惊。骑兵班长怀疑可能出了什么乱子，他骑着马来回观察战俘们的行列，试图点一下战俘的人数。但是，他们却从一行到另一行来回地移动——这是冯·维拉设计的一个诡计——所以很难清点到底有多少人。班长同军官

说了一下，最后策马至纵队的头里，拔出他的左轮手枪，命令停步。

当战俘们零乱地停下步来，英国军官就走进纵队的行列清点人数。数目是二十三个，不是二十四个。那就不可能再有疑问了：一个战俘已告失踪。

当地居民迄今仍记得随之而发生的一片忙乱。5点半钟，这个地区的所有捉拿逃犯的机构和工具全都运转起来。载货卡车、面包车、勃伦式轻机枪小战车和摩托车狂暴地在乡间穿来穿去，英国国民军和警察都出动搜捕逃犯。

冯·维拉失踪了整整三天三夜。随后，更多的警察和部队被召来搜捕，但那个德国人就是不见了。

在湖区，即使是最偏僻的地方，也有许多用来储存喂羊草料的石头小屋。第四天大约晚上11点钟，两个国民军士兵正在布劳顿巡逻。他们发现离海岸只有四至五英里处的一所小屋，锁着的门被强行撬开了。屋里亮着一盏自行车灯，他们发现一个逃亡者。他的脸瘦瘦的，愁眉不展的样子，他的衣衫褴褛不堪，他的靴子已经破烂了。

当一个国民军士兵举枪朝着他，另一个士兵就用绳索紧紧地绑住了冯·维拉的手腕，然后又将绳索的另一头绑在自己的手腕上。但是在他们能够把他带走之前，冯·维拉采取了一个非常准确及时的行动，先把同他一起拴着绳子的那个人打倒在地，同时扑灭了灯火。然后，迅速跃起躲开第二个人，用足全力猛然一甩，挣脱了绳索，重又消失在黑夜之中。

又经过两天的紧张搜索，冯·维拉才重又被发现。在冯·维拉获得自由的第六天的下午2时半，一个牧羊人远远发现他在俯瞰杜登山谷^①的高一千二百英尺的小山上，偷偷穿过羊齿草草丛。

^① 在英格兰西北。——译者

坎伯兰和威斯特摩兰郡的警察局，很快就布置了一条警戒线，紧紧地包围了这个山头。当他们把冯·维拉团团围住时，立即给这个俘虏带上了手铐。这一次他没有能逃脱。

在作为对逃跑惩罚的二十一天单独监禁之后，冯·维拉从格利兹达尔庄园被押解到斯汪维克，这是在米德兰兹的一个战俘营。但是，既然已经逃跑过一次，他有信心能够再次逃脱，而且决心再作尝试。

斯汪维克为两重密密麻麻的带刺的铁丝网团团围着，两道铁丝网之间的狭长地段不断地有卫兵巡逻。沿着外围的那道铁丝网，每五十码设立着一座瞭望塔，塔里装备着机枪和探照灯；铁丝网通夜都被强烈的汎光灯照明着，除非遇到空袭警报，那时卫兵就加强警戒。因此，他决定，唯一可能逃跑的办法是挖掘地道。

指定给他住的那座楼房，距离内层铁丝网只有一码左右，冯·维拉计算，从一个底层没人住的小房间通到外围铁丝网的边上，只要挖一条十四码长的地道就行了。出口处由于接近一个瞭望塔不太理想，但是却有灌木丛和树木可以作为一点掩护。这个计划看来是可行的，几天之内就有其他五个军官热心地同他一起组织了“斯汪维克矿山公司”。

从最初的时候起，计划就进行得很顺利。所有的战俘都来合作，在各个要害地点担任瞭望，当挖掘和撬开巨石的声音有可能传到哨兵的耳朵时，他们就打出暗号，发出警告。当响声已不可避免，他们就会用集体的歌唱声、口琴演奏声、玩扑克牌的喧闹声，甚至演出一场打群架的“全武行”，把开石的声响压下去。工程开始一个月之后，这条地下道，一个只能容一个人爬行通过的“兔子洞”，终于竣工了。

与此同时，五个地道挖掘者（原来的六个参加者，其中之一在中途悲观失望，放弃了挖掘）也制定了逃出英国的计划。他们把

一只钻石戒指以一英镑的代价卖给了一个卫兵，他们每人分得四个先令，这么一笔微不足道的“资金”，仅仅可以支付搭乘公共汽车的费用。他们中的两个，希望能到达利物浦，然后藏在中立国的船只里，逃往爱尔兰。其他两个则希望去格拉斯哥^①，以便在那里也能试图搭上中立国的船只。只有冯·维拉决定独自一人单干。

湖区逃遁的这次经验使他确信，一个德国逃犯要想逃出英国，只有很微小的机会，除非他能够想方设法在当局开始搜捕他之前逃离这个国家。做到这一点的唯一途径是通过航空。所以，冯·维拉决定采取有可能做到的最冒险的途径，他将直奔距离最近的一个皇家空军飞机场，在那里争取能驾驶一架飞机。

冯·维拉苦思冥想，要找出一个简单易行而又令人信服的伪装方法来，他决定把自己说成是刚从一次轰炸任务返回途中坠落的荷兰籍飞行员，以便蒙混过去。这是可信的，因为现在有许多捷克、荷兰、挪威和波兰难民正在皇家空军中服役，他们讲一口蹩脚的英语（他自己的英语讲得很好），并且穿着一身比较少见的制服。在密德伦这儿，很少有空军人员知道海岸司令部方面的工作情况，他就可以自称是来自“海岸司令部特别混合轰炸机中队”的飞行员，这个中队的基地是在阿伯丁^②。阿伯丁离开这儿很远很远，而这个模模糊糊、含混其词的“特别混合联队”的称号，使他在为自己进行解释时有一定的余地。

还需要有一身制服。一个战俘送给他一套飞行服，是他设法保存着的；另一个提供了一双软毛里的飞行员靴子；第三个战俘送了一副皮手套。为了备齐他的行头，他在战俘营的商店里买了一条苏格兰格子呢围巾。他可以放弃一切证明文件，但总需要一个英国的服役证章，这是用硬纤维制成的。当然，要取得这样的证章

① 苏格兰中南部的港口。——译者

② 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部。——译者

是不可能的，但是战俘营里的“伪造证件部”为他准备了一个能乱真的复制品，是用硬纸板做成的。

12月20日下午9时，冯·维拉把黑色的睡衣套在飞行服上面作为掩护，他小心翼翼地穿过地道，走出了地道出口处上面的最后一层浮土。情况是非常理想的。夜色漆黑一团，而且空袭警报又使铁丝网上的汎光灯全部熄灭了。冯·维拉静悄悄地穿过了黑暗，几分钟之后，他的同伴们一个又一个从地道走出来。在离地道大约二百码的一个谷仓前面，他们向冯·维拉轻声地道别，并握了他的手，然后他们各自分道扬镳。

由于空袭仍在进行，冯·维拉决定等待警报完全解除后才继续前进，以免被当作一架坠毁的德国飞机上的幸存者而遭逮捕。现在倒用不着匆忙了。不论运气如何，反正这次逃跑在翌晨点名前是不会被发现的，这就使他至少有十个小时的回旋余地。他蹲伏在谷仓附近，等待着。

到了3点钟，解除警报还没有响起。冯·维拉不敢再拖延了。他从他的藏匿处出来，把战俘营里的一份《泰晤士报》夹在腋下作为掩护，起身越过田野。

冯·维拉沿着乡村道路走了几英里远，没有遇见一个人。4点半，他听到了在附近的铁路旁规上机车的嘶嘶的响声。他走过去，爬进了这辆机车。

火车司机的下巴搭拉了下来：“你想干什么？”他质问道。

“我是万·洛特上尉，过去属于荷兰皇家空军，现在是英国皇家空军，”冯·维拉淡淡地解释着事情的经过。“我刚刚从一架轰炸机中强迫降陆，飞机在丹麦上空的袭击时被高射炮火所击中。我必须尽快到距此最近的皇家空军机场去。请告诉我，最近的地方哪里有电话？”

火车司机很帮忙。“我的伙计哈罗德正好下班。他陪你走到

车站去。”

冯·维拉同那个司机的伙伴沿着火车路轨同行，5点半到达柯达奈公园车站。但是电话在办公室里，而办公室已上了锁，办公室的办事员伊登直到6点钟才来到。冯·维拉只得提心吊胆地等着。

伊登来到时，无精打采地、不耐烦地听着冯·维拉叙述的故事：轰炸机在附近坠落了，他把没有受伤的机组人员留在一间农场房舍里，那里没有电话，等等。“能不能请你打电话给附近的皇家空军机场，请他们派一辆车来接我？我的阿伯丁基地将会派飞机来接我和我的机组人员。”

这个车站售票员显然表示怀疑，他询问了关于飞机坠毁的几个问题，然后拿起了电话筒，“请给我接警察局。”

冯·维拉僵硬地坐着，伊登终于打通了电话。但是，很显然，伊登只是希望自己摆脱这件事。他一挂上电话就说，“别着急，会来人的，他们比我有更大能耐来帮助你。”

此时一个火车站服务员沏了茶。伊登给冯·维拉递过一杯来，他自己也喝一杯。三个人坐着等警察的到来。冯·维拉的吸引人的魅力和令人可信的样子开始起了作用。足有半小时之久，他回答了关于飞机坠落和轰炸攻击的问题，并且还大谈皇家空军。最后他“吐露”——“我本不该向你们说起这个，”——他是属于一个特别飞行中队，而那次夜袭是为了试验一下新的炸弹瞄准器。“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这样急于要很快回去。”

伊登看上去被说动了。“唉，真的！我非常抱歉。假如你早对我说这些……我是不是马上给基地打电话？”

“请吧！”

售票员举起话筒，要接赫克纳尔机场。当他接通了电话，找到值班军官，他简要地解释了关于冯·维拉的事情，然后示意冯·维

拉，要他自己来听电话。赫克纳尔机场的值班军官很难相信这件事。他对飞机坠落事件提出了许多问题，并且指出，令人奇怪的是他从未听到过这件事。但最后他说，“我想我得为你做些事情。我将派辆车把你接来。”

7点过一分钟，警察来了。是两个便衣人员和一名穿制服的警官。他们静静地凝视了冯·维拉一会儿，他们的目光既不是友善的，也不是敌意的。然后，其中一个侦察员突然用德语问道：“你讲德语吗？”

冯·维拉用英语回答说，“是的，我能讲一点德语，大多数荷兰人都会一点。”

紧张气氛顿时松弛了下来。“你讲德语吗？”显然这是他们所知道的唯一的一句德国话。那第二个便衣人员说：“如此说来，你就是海岸司令部的飞行员罗，嗯？”

冯·维拉现在知道，他们并不是来抓他的。他们只是来核实他所讲的事情。他曾在英国报纸上读到过关于皇家空军轰炸袭击的足够的材料，可以使他的故事令人信服。“是的，”他说着，显出了令人释疑的一笑。“昨天夜里真是一场绝妙的表演，但我们几乎统统玩完了。”

听到这句心领神会的皇家空军俚语，三个警察局人员都相互递了一个眼色，并且满意地笑了。“你的证件呢？”警官问。

冯·维拉表现了惊人的耐心。“你们难道不知道个人证件是不许带着去飞行的吗？对我们特别空军中队来说，这条规定是最最严格的。”

在这之后，他们甚至连他的身份证章也不要求看了。虽然他们询问着更多更多的问題，但冯·维拉的回答，加上赫克纳尔机场正要派一辆车来接他的这一事实，看来已使他们满意了。警察离去的五分钟之后，一个空军人员走了进来，漂亮地行了一个敬礼。

“去赫克纳尔的车子来了，长官，”他宣称。冯·维拉的精神又振奋起来。当他稳坐在汽车上，驰向皇家空军基地的十英里的途中，他觉得他完全可以偷走这一架飞机。

但是，与冯·维拉的那种假设相反，这位赫克纳尔机场的值班军官所以派车来，并不是因为他相信万·洛特所说的那一套是真的，而恰恰是因为他强烈地怀疑这是假的。他还没有听到斯汪维克有逃犯的消息，但万·洛特说话说得太多了。这看上去难以置信的是，一架轰炸机在漆黑的夜里坠毁，而机上人员却无一受伤。所以这个军官决定，还是把万·洛特上尉接来，就地核查为好。

为了预防不测，这个值班军官给了汽车司机一杆枪，并且事先告诉他说，万·洛特可能是个破坏分子或者是个在逃的战俘。总部办公室的窗户都是关闭着的，还把所有的门锁上，只剩下一个进口处。在副官办公室里，他升起了熊熊炉火，这就会迫使万·洛特不得不脱去他的飞行衣而露出他的制服来。

当车子到达时，天刚蒙蒙亮，他把冯·维拉引进副官办公室。值班军官希望装着很忙，以便暗地观察他的来访者。于是，他把遮光的百叶窗放了下来。

他看到的是一个身高五英尺七英寸的卷头发的男人，一张率直的孩子气的脸庞和一种愉快的微笑。他看上去既不邪恶，也不象是日耳曼气派。但他的飞行衣是不太合适的，很怪异的样子——淡灰绿色，有一条对角线拉练。

军官仍然装着笨头笨脑地在弄遮光的百叶窗，他漫不经心地问道：“万·洛特？——我不会留你久等的，你可能感到这儿空气很闷浊。脱去你的飞行衣，请坐，请你象在家里一样！”这间房真象船上的锅炉房那样窒息。但是，冯·维拉回答说，“没有必要这样麻烦了。我的飞机从阿伯丁随时都会到的。”说着就很自然地尽可能离火炉远一点。

值班军官搞好百叶窗，回到他的办公桌。冯·维拉同他握手。“我很抱歉来麻烦你，”他说，“我希望不要使你为难。我就出去，在控制塔旁等待我的飞机，好吗？”

“那没有必要。就在这儿暖和的地方吧！控制塔只要和你的飞机取得了联系，会立即打电话给我的。”由于来访者没有对室内的闷热作出任何不舒服的反应，而且显得一切都很正常，这个值班军官于是又施出新的一招。“你在这次飞机坠毁事件中自然是最幸运的了，”他说。“在电话上，详细情况听不太清楚。你最好还是把整个事件的经过再讲一遍——你明白，我必须写一份报告。”

当冯·维拉很快地描述着袭击和飞机的坠毁时，这个军官做着笔记，并且提出一些刺探性的问题。冯·维拉告诉他，警察局人员曾同他谈过话，这就使值班军官暂停了下来。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个问题就得另眼相看了。因为如果警察局已对他所说的事情表示满意的话……

尽管如此，他现在还是拿起电话筒，叫接阿伯丁基地的电话。同那里的指挥军官通一次话，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这有必要吗？”冯·维拉问道。“我的飞机肯定很快就会到达的。”

“抱歉，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还不是官样文章那一套，你是理解的，”值班军官补充说。“你必须恰当地证明你的身份。能不能请出示你的入伍身份证呢？”

冯·维拉雍容大度地笑对这种坚持繁文缛节的做法。他是戴着他的细心伪造的硬纸板牌证的，就挂在他的脖子上。他颇为自信地从他的飞行衣上部解开拉练，伸手去摸。当他的指头接触到它时，他喘了一口大气。汗水和身上发出的热气使这张硬纸板逐渐缩小，快变成粘糊糊的纸浆了。他不敢把它拿出来。

当一个继续不安地在衣服里摸索着，而另一个却颇有耐心地

等待着的时候，电话铃响了，这就救了他。值班军官拿起话机。“对！”他对接线人员讲，“到时间了！快给我接……喂，阿伯丁？”通话线路的效果显然很坏，他不久便恼怒地嚷了起来。

但是，冯·维拉并不愿意听这样的对话。他退到房门边时，引起了值班军官的注意，便扬起眉毛，若有所询，并且做出要去洗手的样子。“一会儿就回！”他说着沿走廊走向写着“男盥洗间”的门户。他开了门，然后又砰的一声从外面把门关上。他就踮着脚尖走向正门。当他拉开正门时，他就听到值班军官在叫嚷：

“万·洛特上尉……两个字……一个荷兰人……”

他一走了出来，就匍伏着走路穿过副官办公室的窗下，然后向着停放飞机的厂棚快跑。时间目前是致命的因素，四分之一秒的时间都是至关重要的。

接近第一个飞机厂棚时，他放慢脚步，做出敏捷地漫步的样子。这里正在进行基建，木工们从施工架上好奇地望着他。为了躲开混凝土搅拌机，他几乎撞上了一个正在拆开一袋水泥的工人，他来到停放着一排双引擎飞机的地方。这些飞机对他没有用处，所以他继续大步地前进。

前面来到了第二个飞机厂棚，那是一群“飓风”式战斗机。赫克纳尔的一部分是皇家空军训练飞行员的基地，而另一部分则是高度机密的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的实验站。冯·维拉现在潜入的就是那个机密的、警卫森严的地区。基建区域的混乱无秩序状态，给它正常状态下万无一失的保密安全措施造成了极大的漏洞。

他走到眼前仅能遇见的一位机械师面前。“早安，”他以一种权威似的口吻说，“我是万·洛特上尉，荷兰飞行员。我刚刚派到这里来。但是，我还没有驾驶过“飓风”式飞机。副官要我上你这儿来，学习一下操作，并作一次实习飞行。哪一架是准备起飞的？”

这个机械师是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的一名雇员，他显然迷惑不解。“你是不是跑错地方了？”他问道。“这是一个私人飞机公司。”

“我知道。但是，副官要我上你这儿来。我没有多少时间了。”

机械师沉思了一会儿，然后似乎得出了一个想当然的解释。这位航空员一定是从航空运输指挥部来的一名民航飞机驾驶员，是来运走一架“飓风”式飞机的。这样的飞行员往往被尊称为“上尉”，他们中间许多人是外国人，只能讲一点英语。“除非你在来访登记本上签了名，不然我不能为你做任何事情，”他说。“上尉，请在这里等候一下，我去请经理来。”

当机械师跑进机棚里去的时候，冯·维拉靠在“飓风”式飞机的机身上。这是一架全新的“飓风”式飞机，机身上没有任何一点擦伤（这是一种二号型，是尚未在战斗中使用过的秘密机型）。他曾企图爬进去，试着由他自己来发动引擎。但这样做可能会使他的逃跑希望全部破灭。在他企图开走飞机之前，有几件操纵器，他是必须要有把握弄清楚的。

机械师回来时，带来一位穿卡其工作服的人，看来就是经理了。这位官员向他微笑，并且很愉快地向他致意。“我听说你是来为取走一架“飓风”式飞机的。请你跟我来，我们将把你的书面手续办完。”

“那要花很长时间吗？我只有很少一点时间，”冯·维拉回答说。“我只是想熟悉一下“飓风”式飞机的操纵仪器。”

“除非你签署来访者的登记册子，否则恐怕什么事情也做不了。我们倒是会很快帮你办妥的。”

冯·维拉勉强地跟随他进入厂棚。经理把他领进一间小办公室，那里有一个穿蓝制服的人，显然是公司里的警察，他管理来访者的一本大登记册。现在，警察把登记册递了过来。“请你在这里

签署，先生。”

冯·维拉用印刷体签名，深怕德国式的签名会使他暴露，他办完了手续。经理现在宣称，一切都就绪了，只差征购“飓风”式飞机的定货收据。冯·维拉说，这些都放在他的个人装备袋里，飞机随时就会运来的。在这个时间里，他能不能知道操纵“飓风”式飞机的一些要领呢？

“行啊，”经理说，“我们现在就可以马上开始这样做了，因为你已经在来访册上签过字。”

当他同机械师走出飞机厂棚时，冯·维拉不安地四周张望。还没有看到有穿皇家空军制服的人。只要值班军官再给他五分钟的时间，那就一切都妥了。

机械师走到一架“飓风”式飞机跟前，并且取下了引擎的罩子，冯·维拉就爬了进去。机械师开始讲解这个不熟悉的工具：操纵台和操纵器。冯·维拉对每一个字都不放过。其中许多是容易混淆的，但他尽力集中注意力记住一些要领，以免在起飞时使“飓风”机机首触到地面。在机械师没有让他操作之前，他就猛然地按动了发动机的电钮。

“别那样做！”机械师惊叫起来。“没有触轮蓄电池是不能发动的。”

“那么，去拿来吧！”冯·维拉命令着。

“别人正在使用它。”

冯·维拉温和地微笑了。“请你去拿来，行吗？我真的得赶时间。”机械师热心地跑去拿蓄电池，回来时，他驾着一辆电机发动的车，穿过柏油路。他在飞机引擎下面停了下来，跳下车，扛起电缆，把插头塞进去。当冯·维拉操作加燃料的油泵时，飞机稍稍摇晃了一下，在他的头顶上面忽然发出了一个声音，冷静地命令他：“滚出来！”

冯·维拉向上看去，发现他自己正好面对着一支自动手枪的枪口和那个值班军官的冷酷的蓝色的眼睛。

“我与阿伯丁通了话，”值班军官断然地说。同阿伯丁的联系效果极坏，只有靠大声叫嚷和不断的重复，才使值班军官的话使对方听懂或者懂得对方讲的是什么。但到最后，他终于弄清楚，万·洛特是冒充的。

回想起来，冯·维拉编造的故事是漏洞百出的。举例说，其中有一点是一眼就能看穿的：在皇家空军里根本就没有上尉这样一个军阶。但事实却是他竟能够成功地潜入英国的飞机场，在那里要驾走一架“飓风”式飞机。英国人往往醉心那种大胆、富于进取性和具有魅力的人物，他们倾向于钦佩这种冒险的事迹。正如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的一个官员所说，“我们中间许多人对他最后未能成功实在有点遗憾。”

这五个逃犯，全部在二十四小时内重又落网，他们在斯汪维克被处以十四天的单独禁闭。这种温和的惩罚，也许是由于这样的事实，战俘营的指挥官知道，他很快就要把这些家伙全部弄走。在他们监禁的最后一个早晨，他宣布，他们将在第二天同一批其他战俘一起被押送到加拿大去。

对于冯·维拉来说，这个仅仅意味着另一次逃跑的机会。加拿大还有一个极有利的条件：它邻近当时还处于中立地位的美国。另外一批战俘中的一个，知道一些这个国家的事情。他就立即从这个战俘那里尽其所能地了解关于加拿大的地理和风习。

1941年1月，当“约克女公爵”号轮船从苏格兰的格陵诺克载了一千零五十个战俘准备远航时，冯·维拉始终被特别看守起来，直到轮船驶离港口。这种严加监视使他感到有点自鸣得意。在航程中，他长时间地把自己的脑袋浸泡在盛着从水笼头流出的冰凉水的澡盆里，他要使自己坚强，以便轮船靠岸时，一有机会就能跳入

水中。

轮船在哈利法克斯停泊时，并没有出现任何这样的机会。现在，他只有满怀希望地盼着火车里的时机，这列火车象赶羊似地押送战俘远去。在冯·维拉的车厢里，有三十五个战俘和十二名卫兵。每三个卫兵值一班岗，他们站在两排座位的中央通道，车厢的每一端站着一个卫兵，一个则站在中间。战俘被押着去上厕所，每一次只限一人，盥洗间的门户总是开着的；而车厢的两层窗户中间结着冰块。

当冯·维拉获悉，火车将开往苏必利尔湖岸边安大略^①的一个战俘营，他知道这列车必然经过毗邻美国的国境线。如果他能在一个居民分布较合理的地段逃脱，他就能搭乘便车在一天之内到达美国。唯一可能的方法是从窗户里突然跳车到雪地上。在火车全速行驶的时候，这样做是自取灭亡。而在停车时却又是无法进行，因为卫兵在停车时特别警觉。当他的同座者注视着卫兵时，冯·维拉跪了下来，设法拍起里层窗户约莫有一英寸的四分之一的样子。打开这么一点口子，很少会引起注意，但它可以使车里的暖气跑到外层窗户上结着的冰块上去。

可是，窗户上的冰一解冻，他又当如何避开卫兵的监视，把窗户打开呢？又将如何穿上他的外套呢？这是在严寒的加拿大所必需的，但如果他在有暖气的车上穿上外套，就一定会引起怀疑。一个逃犯必须有运气，而运气现在替冯·维拉解决了这些难题。

那一天在晚餐的时候，发给了战俘们一箱苹果。他们好久没有水果吃了，因此吃得很多。但是苹果对他们的肠胃系统来说显然是过了量。从午夜开始，战俘们排了长队等上厕所，而有的战俘还必须被押送到卫兵使用的厕所去。经常只有一名卫兵留在车厢

^① 在加拿大南部。——译者

内。

虽然车上有暖气，但有几个患病的战俘，脸色苍白，浑身颤抖着，用外套和毯子裹着他们的身子，坐在那里紧抱着自己的肚子。这样，冯·维拉穿上外套，就显得很自然。后来，他就坐着，用双手捂着脑袋。

当火车向着下一站徐徐行进时，他等待着表明卫兵们正忙于别的事情的信号。忽然，他站立起来，拉开他的毯子，拿在手里抖动。在毯子的掩护下，他的一个伙伴跪了下来，把里层窗户完全打开。当车在车站停稳时，外层窗户上剩下的冰块就很快溶化了。引人注目的明净的玻璃窗现在却构成了一种危险，但总算幸运，没有一个卫兵注意到窗户。当火车开动时，几个战俘举起手来，要求去厕所。他的一个伙伴又施展毯子的把戏，冯·维拉趁机站起来，抓住外层窗户，用力向上一推，但推不动。再试行一次，窗户就顺利地被打开了。

紧接着，冯·维拉以跳水的姿势跳出窗户，脑袋先行，摔到雪地上的时候，他头晕目眩，但又十分兴奋。其他战俘能够立即关上两层窗户，这就不会被发觉。直到火车已开出几百英里之外，他的逃跑才被发现。

根据加拿大当局提供的情况，冯·维拉从车上逃走的地点邻近安大略省史密斯大瀑布，当时他距离边境只有三十英里。富有特色的是，后来冯·维拉告诉纽约的记者们，他离开火车时正好在渥太华以北一百英里的地方——这个地点可以使他有更多余地重新讲述在加拿大的那次狂想式冒险。考虑到他善于说谎的天才，他究竟是怎样到达边境的，那就很难说了。

然而，无可争论的是，1月24日下午7点钟，他确实到达了圣劳伦斯河北岸的金斯敦城，而且看到纽约州奥格登斯堡的闪烁的灯光正在另一边召唤。这条河已结上了冰，他起初希望从冰上走过

去。但是在离开美国河岸还有四分之一英里处，他却遇上了一条黑色的开裂的水道。他只能重新折回到加拿大那边的河岸，沿着河岸走去，到达一个空无一人的夏令营。这里，他最后发现了他所要寻找的东西，那是在雪地中埋着的一座雪茄形状的“小丘”，一只倾翻了的划艇。

用木围墙沉重的木栅当作杠杆，他艰难地把它从冰雪中扒开，并且弄正了它。然后使尽他吃奶的力气去推动它。他一点一点地把沉重的船从冰上推到水道。他没有划橹，但这次又是福星高照，这只船顺顺当当地漂向美国那边的河岸。

当这只船擦到河岸的冰块时，冯·维拉跳了出来。在靠近河岸的路上，他看见一辆停在那里的汽车，挂着纽约州的牌照。司机是附近医院里的一个护士，她正准备开车。

“请原谅。”他焦急地问，“这是美国吗？”他想得到肯定的回答，因为他知道，加拿大边境的有些地方一直延伸到圣劳伦斯河下游南岸。

“你是在奥格登斯堡，”护士回答说。

他疲惫地微微一笑。“我是德国空军的一个军官，我是——”他纠正自己——“我是一名战俘。”

此时此刻，他并不安全。不久前曾有一个德国战俘逃入明尼苏达州，在那里坐了三个月的牢，然后又送回了加拿大。冯·维拉免遭同样的命运，主要是靠他会出风头的本领。

当美国移民当局指控他非法入境，并且把他转到奥格登斯堡警察局时，记者们和特作家们围住了冯·维拉的牢房。他的吹牛，他的夸夸其谈，他的有声有色的凭空创造，使他们大有文章可做。不少报纸的评论是带讥讽语调的。如《奥格登斯堡日报》写道：“在他的记者招待会上，他编造出来的故事，简直能使作家霍拉秀·阿杰、约瑟夫·康拉德或者《天方夜谭》的作者会自叹不如。

但是，报刊、新闻记录影片和电台的大肆宣传，使他的案子一下变成了一个国际性事件。

德国领事急于要禁止他这样令人不安的轻率言行，寄了五千美元的证券给他，秘密地把他送到纽约市去。人们一度看到他在剧场、夜总会和社团中受到盛情款待。在德国，由于对他逃跑的事迹大量宣传，使他身价百倍，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式的大人物。同时，加拿大则试图拘捕他，因为他偷窃了价值三十五美元的划艇。而英国也尽一切可能要求引渡冯·维拉。3月24日，德国领事馆官员告诉他，华盛顿新的部署很可能要把他押回加拿大。他得牺牲总款额已达一万五千美元的证券而必须立即采取非法行动逃离这个国家。

联邦调查局的人员，曾紧紧地跟踪和监视冯·维拉的行动，但是他以连续不断更换出租汽车来躲避他们。最后搭上一列去埃尔帕索的火车，并装扮成一名墨西哥的工人，穿过了国境线上的桥梁。德国驻墨西哥的大使馆为他准备了一张护照，用了一个假名，并且为他弄到经由里约热内卢和罗马直飞德国的飞机座位。他在1941年4月18日到达柏林。戈林晋升他为空军上尉，希特勒则亲自祝贺他逃跑成功，并且为他所谓的早期英勇事迹授以长期拖延而未能授予的骑士十字勋章。除此以外，当然还有许多盛宴和招待会。

冯·维拉的逃跑所造成的后果，远远超出作为个人冒险业绩所具有的意义。他的关于英国人审问方法的报告，随后扩展为一本十二页的小册子，成了全德国空军人员必读的标准文件，而且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从此，英国人发现，他们所俘获的德国空军人员具有高度的保密警惕性。

在德国进攻俄国两个星期之后，冯·维拉被派往前线。作为第五十三型盖世华德战斗机的第一中队的指挥官——以“黑桃A”

盖世华德而著称——他又被信以为真地取得了八次空中胜利，把他所谓的胜利纪录提高到总计二十一次。

9月份，他的飞行中队转移到荷兰，被指派去担任海岸防御巡逻。在10月末的一次例行的空中巡逻时，冯·维拉的飞机引擎发生了故障而终于坠落海中。德国报纸大肆宣扬他是在战斗中牺牲的。但是审议飞机失事的调查法庭报告说，这次事故是由于“引擎发生毛病和该飞行员的不慎失职所致。”

愚弄敌方空军人员

唐·沃顿

到1941年末，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了一整套新的军事欺诈术——尤其是在空中。

当德国人开始使用无线电波束为他们的飞机导航以袭击在英国的目标时，英国的科学家们找到了一个漂亮的对付办法。两道德国的信号波束，从欧洲大陆的两个距离很远的地点发出，对准目标。这样，纳粹轰炸机夜袭时，只要追随其中一条波束，就能在两条波束之间的交叉点上投扔炸弹。英国无线电专家们用他们自己的一条无线电波束制造出一个假交叉点——德国的轰炸机就会把很多炸弹浪费在农村的田野里。后来又有改进，英国人使用德国人同样波长的波束，使敌人的无线电信号转向。从此以后，纳粹飞行员不仅把炸弹扔在错误的地点，而且有时在返航时却跟着英国人发出的波束，最后因汽油耗尽而坠落大海。

一个飞行员在紧急情况下最喜欢用的欺诈术就是装出他的飞机已被击中，而且正在跌落下去，失掉控制。德国人还给一些飞机装备着化学品，它可以放出烟雾，给人一个假象：这架飞机已经着火了。在潜艇战中，也同样使用这种诈骗术。假造的水面油膜——

甚至假的残件碎片，都能搞得很象，使人看到这艘潜艇已经粉碎。

1941年夏天，在偷袭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一个美国人沿着柏林附近的一条路散步，碰见了战争中设计最精巧的一种伪装。引起他注意的是散开在田野里的一个电线网。他仔细地察看了这个电线网，电线从一个掩蔽壕里拉出来，象扇形一样散布开来，通向四分之一英里远的许多小建筑物。这些建筑物没有屋顶，窗子也没有玻璃，地板上堆满了木柴和刨花。在掩蔽壕里只要轻轻地碰一下开关，就能点燃刨花。黑夜里火焰穿过没有屋顶的建筑物上空和没有玻璃的窗户，真象是烈火熊熊，以此来蒙骗英国的夜航轰炸机。

我的情报人员曾发现过模拟柏林城的部分伪装。另外一些细心的旅行向导也会发现几英里长的假的街道、工厂和铁路。假的街道上排列着一些大的运货木条箱，每只木条箱里安装着一盏电灯。从空中俯视，这些街道和灯光真象是柏林的一个区，灯火并没有完全熄灭。而更为逼真的是，模拟的城市配备着许多保护它的高射炮。专家们说，很难使轰炸机的机组人员不上这个当，即使是事先已经警告过，也不能幸免。

德国人还建造其它诱敌上当的城市，并仿建罗马尼亚石油中心普洛耶什蒂，仿制了大型炼油厂，还树立起帆布“油罐”，它们在被炸时就会放出浓烈的黑色化学烟雾来。

在英国，单独有一家工厂可能成为德国轰炸机的轰炸目标。于是一所廉价的建筑物就在不远的地方建立起来。那个真正的工厂完全熄灭了灯火，而那座诱敌的建筑物却布置得稍有违反灯火管制条例的样子。结果是敌人浪费了大量的炸弹。

伪装的策略愈来愈高明。英国的工厂区油漆得象好多公寓房子，军事设施都伪装成无害的汽油加油站。用石灰和白粉铺成的假跑道，在假的飞机场上交叉纵横，而假的公路线却一道道地划在

真正的机场上。一个从英国归来的美国观察家估计，在某些地段，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机场”是模拟物。一个真正的机场，毗邻的是建筑住房的开发区，于是把机棚伪装起来，办法是把它们油漆成看上去象更多的住房，有门、窗、花盆等等，完全可以同开发区的真房子相媲美。

德国人改造了从空中俯视柏林的形象。房屋的屋顶上都是鲜花盛开，枝叶繁茂。池塘的外形也改变了，塘内放了许多木排，上面覆以草皮。那些小湖泊都拉起网把整个湖覆盖隐蔽起来。辽阔的恩脱·丹·林登地段，在正常情况下是辨认柏林城的明确无误的标志，现在用施工架和铁丝网把它真正的宽度缩小了一半。

在汉堡港，德国人感到最头疼的是那个阿尔斯特盆地，这是城市心脏地区的一个目标——靶子中心。他们也是用木排和施工架等，使这个盆地变样，看上去似乎是街道和建筑物纵横交叉；他们还修筑了一座假桥，另外还在海湾之外建造了一个假的盆地，把附近的铁路线掩护起来，用油漆涂料画出穿过车站的街道。英国的摄影机最后揭穿了这个欺诈术。

任何一种欺骗和伪装最终都是要被侦破的。但如果它能造成敌人的拖延、浪费和犹豫不定，这就被认为是成功的了。德国人曾经接连几夜在斗智中胜过了英国人，他们在一个假机场上只开了几盏“飞机降落灯”，而在真正的机场上索兴搞得灯火通明，象挂灯结彩的圣诞树一样。但另一次英国人在埃及却狠狠地报复了一下：十八架轴心国的轰炸机由三十架战斗机护送，轰炸了一长列模拟的坦克，它们伪装得很好，但仅仅留一点假破绽，好让敌人很容易发现目标。1942年，蒙哥马利将军在突袭阿拉曼前，使用伪装和其它办法，十分成功地搅乱了德国人的侦察。

在许多情况下，只要伪装物能使敌人轰炸机对目标的窥视模糊不清，这个欺诈就被认为是成功的。在两万英尺高空，以每分钟

五英里的速度飞行，飞机必须在十英里以外看到目标，到了五英里处作好准备，三英里处投弹。如果这个伪装的目标只是在头顶上空才辨认出来，那是很难击中的。

大自然往往使伪装“漏馅”。有一个德国的机场同一个农场相邻，农场的标志是有明显的灌溉渠。纳粹用油漆涂料画出同样的小水渠和农场的条条灌溉渠相联结，这从英国人的照片里看来象是真的一样。但一到灌溉渠里真的水结冰时，人工画上去的地里的水流就象霓虹灯一样突了出来。对那些树叶作屏风的伪装，假的树叶也要随着季节的变更而更换，因为真叶子的绿色素很易变质，在照片上立即能显出差异来。

照相机是空中观察者发现伪装欺骗术的主要依赖工具。画上去的东西，可能在一张照片里看起来象是真的，但如果同一地点的照片，早晨和下午各拍一张，那么，相似之处常常成了一个破绽：太阳变化了，但画上去的影子却没有变化，所以证明它们是假的。英国立体镜片的照相机揭穿过德国的许多次欺诈行为。它们往往同时从空中拍下两张平行的照片，然后把照片放在立体镜下一起观察。这种立体镜有三种度量的性能，而画上去的物体是缺乏厚度的。

认为德国人和日本人垄断了这种军事上机灵的技巧，这纯粹是胡说。同盟国的空中部队曾经用红外线拍照，能侦察出画上去的物体以及自然与人工树叶的差别。他们是夜间摄影和使用彩色胶卷的先驱者，这种胶卷能够制作如同人的肉眼所见一样的图像。

甚至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人的机智已经在实践中表现出来。军事基地被修筑成农场社区的样子；海岸工业区则装备了能够制造人工雾的种种手段。美国人的智慧和创造性，在随后发生的军事事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窃贼与爱国者

卡林·米凯利斯

卡林·米凯利斯，丹麦人，以她自身的经历写出了这个真实的故事。
她是丹麦最著名的文学界名人之一，于1950年去世。

在战前的丹麦，有许多小偷小摸，但真正的刑事犯却寥寥无几。因此，当汉斯·彼得森成为著名的丹麦“最危险的窃贼”时，这不能不是极大的轰动。但是，尽管他把四十年的生涯的一半虚度在监狱中，他却不象听起来那么可怕。因为他以自己的本领而自豪，绝不允许自己染指一般低级的犯罪形式或者伤害任何人。

彼得森是古玩专家。他会洗劫一家住宅，然后第二天写一份详细的报告给报馆和警察局，准确地告诉他们，他拿了些什么，价值多少。如果他进入某个鉴赏力很差的人家，他也会如实描绘一番，并且会揭露一些珍贵的“古玩”实系膺品的情況。

他的最为显赫的惊险业绩，是在警察局长的家里度过了一个周末，那位局长正好同全家一起到乡间去了。彼得森报告说，这是一幢非常漂亮的住房，可惜那张弹簧床有点下陷，瓷器已有缺口了。

丹麦人愿意对几乎任何事情予以宽恕，如果它能使他们笑乐的话。所以举国上下都饶有兴趣地欣赏着这个窃贼的业绩。没有人希望警察局逮捕“H.P.”（汉斯·彼得森），但是他终于被逮捕了。

作为自己辩护人，汉斯·彼得森告诉法庭，在他上一次坐牢的时候，曾经有人向他允诺，如果他走正路，就会得到那个人的帮助；可是当他离开罪犯教养所时，他得到的唯一帮助是一条旧裤子。当然不用去怀疑此人的诚意，但在痛苦和失望之余，他对社会作出了强烈的对抗。

汉斯·彼得森直认不讳，他曾把他的赃物带到伦敦，在那里开设了一家古玩商店，聘了一名可靠之人经营这家商店，但不让他知道货物的来源。

我决心给予汉斯·彼得森以他所急切需要的精神上的支持，并且写信告诉他，一旦获释，我愿帮助他建立新的生活。从他来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渴望安定的生活。我跑到国王那里，请求他赦免这个人的罪。国王陛下问我是否理解到其中所包涵的风险。“陛下”，我回答说，“我一点也不害怕。我将把这个人带到我自己的家里，直到他向我们显示他能很好地做人。”

国王陛下没有允诺什么，但当国王的下一个生日来到时，我的这个窃贼朋友获得了赦免。彼得森写信告诉我，在一星期之内，他不会到我在都罗岛的家里去，因为他还得到附近的斯文堡城去办一些事。当他最后来到我家时，我的母亲看到他走下汽车，衣着讲究，堂堂仪表，只是背稍有点弯曲，她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人是个贼？”她惊叹着，“他的仪表简直象位教授！”

午饭以后，我把我们的客人带到我的大花园的一间平房里去。这间房地方很小，但充满阳光，是吸引人的。他环视左右，微笑着。他说：“可不是吗？真象个家的样子。”他开始打开几只精美的手提箱，并且解释道，他的几只大箱子随后就运来。它们后来运来了——一些包铁的家伙，从里面取出了精致的东方地毯、花瓶和书籍。

有一天，我记得彼得森的煤油灯里的火油不多了，我提了一只火油桶去他房间。当我敲门时，他答应了一声，但要我在门口等着，同时，房间里发出砰然重击和搬动家具的声音。最后他把门打开，房间里变了样，用艺术珍品布置得优雅不凡。

“我堵住了这扇门，”他以认真的口气说。

“但这是为什么呢？”

“的确，你是太天真无瑕了，”他说。“你还不懂得那些人——囚禁在牢里的人们。我所以要到斯文堡去，是为了要取出那些偷窃物的保险单。只要我正式收到保险单，我就用不着那样谨小慎微了。但是现在，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悄悄溜进来，窃走我的宝贝！”

汉斯·彼得森善于待人接物，因此在这个岛上，他就很快地到处受到邀请——甚至星期日下午应邀到教区牧师的住宅去喝咖啡。他是孩子们受基督教洗礼时的教父。在那些招待会上，他大讲关于他斗胆行窃的动人故事。他表演如何用女人的夹发针打开一把锁，又如何使自己从一个只有他脑袋一般大的洞中蠕动着钻了出去。

星期日以外的时间，汉斯·彼得森常常呆在他的小屋里，写他的回忆录。遗憾的是，他的写作是如此装腔作势，而他的词汇又是如此有限，以致他的文稿读来味同嚼蜡。

几个月之后，彼得森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雄心——他在哥本哈根开设了一家出售旧书珍本的吸引雇客的店铺。用监牢里苦役挣得的一点钱做本钱是不够的，但那些律师们、警察局官员们、法官们以及别的对他感兴趣的人们为他筹集了资金。

一天，彼得森遇到了一位美丽的年轻妇女，并爱上了她。她是哥本哈根的一家著名法律事务所的雇员。而他的可疑的历史并没有妨碍他的恋爱和求婚，他们的结婚仪式成了当地一件盛事。仪式在最高法院检察官的家里举行。检察官邀请了他的许多同事参加，一切都很顺利。每年，一到他获赦的日子，彼得森总是要给我一件小礼品和一封短信。有时在夏天，他和他的妻子到我的小岛上来，在那间平房里度过一个月。我注意到汉斯·彼得森不仅已成为一位辛勤的店铺主人，而且还是一个体贴的丈夫，一个沉静而又谦逊的男子。我们这位前偷窃犯真的变了。

接着，德国人来到丹麦。德国人对汉斯·彼得森的一切都很清楚。他被列入了可能对德国有用之人的名单。不久，到处可以见到，他同德国军官们鬼混在一起，甚至同他们一起吃喝。他穿着一身剪裁得很漂亮的德国制服，并且带着一种固有的傲慢的神情。所有他过去的朋友都憎恶他。他们都已转入地下，同英国保持密切联系，并从英国接受指示和供应，以进行破坏活动。

在莱夫谢辽岛子上，德国人占领和经营着一家重要的飞机部件工厂。地下工作者决定要把它炸掉。成百的人为这个计划工作。许多人被安插到这个工厂里做工；其他的人安排于动手那天夜里制造汽车“事故”，在街上打架斗殴和虚报火警等等，以吸引哥本哈根德国警察局的注意力。所有这一切都计划在一个没有月光的午夜进行。精选出来的人员被指派去看管守卫着工厂的德国哨兵。炸药包被偷运进工厂，随时准备使用。时间越来越紧迫了。

接着，这个几乎是完美无缺的计划，看来就要陷于失败。他们尽管全力以赴，但却无法找到如何打开工厂进口那座大钢门的特制锁的办法。

预定行动日子的前两天，地下工作领袖之一收到了一张便条。他曾收到过其它一些同样字迹的便条，给他报告关于德国人计划的情报，但谁也不知道送这些字条的人是何许人。然而，这一张便条是署了名的。字条上写着：“我将在两天以后的午夜恭候于工厂入口处。我穿着德国制服，我将打开门锁。”字条的签名是“H.P.”。

他们能信任他吗？在绝望之中，他们决定去碰一碰机会。在约定的时间，他准时到达，穿着一身德军制服。邻近地方的德国哨兵都被有效地处置了，黑夜里聚集在大门口的爆破小组成员们仅仅只有一会儿的行动自由。

汉斯·彼得森镇静地说：“我来这里履行我的诺言。我只向你们要求一件事。如果我遇到什么不测，请费神澄清我的名声。我

的妻子——”

他立即把身子弯了下去，在大锁跟前动起手来。三分钟之内，大门打开了。

现在，他完全可以安全地离开，但他拒绝这样做。“我要亲自点燃一根导爆线。”一切都准备就绪。按照暗号，人们很快地散开来，各就各位。他们都紧张地等待着。然后，爆破手们一个接着一个跑出了这个建筑物。在安全距离之外，他们观察着一次在方圆几英里震撼大地和映红天空的巨大爆炸。工厂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一些七歪八斜的机器和一片瓦砾。

但是，象汉斯·彼得森这样能够敏捷地打开大锁的人，在爆破时却是动作太缓慢了。他是唯一没有能跑出来的人。这是一个壮烈的结局。我总感到，这个结局是汉斯·彼得森自己愿意选择的。谁知道呢？也许他自己是知道的。

直布罗陀的“人鱼雷”

法兰克·戈兹沃西

1941年9月的一个无月的夜，一艘潜水艇在海平面上迎着海浪前进，缓慢地进入了西班牙西南岸的喀地兹海湾，并且在意大利的“富尔哥”号油船旁边停泊下来。这艘潜艇是属于意大利海军的“赛莱”号。艇长是裘尼奥·伐莱利奥·保吉斯亲王。它的任务是召集一批“人鱼雷”的驾驶员，以便对离此只有八十英里的驻在直布罗陀的英国舰艇发起攻击。正是这个夜晚，开始了持续两年的战中之战，这场战争静悄悄地发生在直布罗陀湾的海面之下。

当意大利在1940年参加战争时，这艘六千五百吨的“富尔哥”号油船在喀地兹湾躲避。几个月之内，“富尔哥”号油船被改变为意大利潜水艇的一艘秘密补给修理船。现在，当“赛莱”号潜艇停

泊时，六个人鱼雷的操纵手上了补给船，他们是用假护照通过西班牙的。

几分钟之内，“赛莱”号载着他们启航了。潜艇下潜到能保证使用潜望镜的水深处，向着西班牙水域的直布罗陀湾西南角移动，此处离英国的港口只有四英里。当它仍在海平面下游动的时候，那六个人穿着橡皮衣，带上呼吸装备，经过危急逃生舱口跳到甲板上。那里，安放三个两人操纵的二十二英尺长的鱼雷，用夹钳夹在架子上，它们都装有可以分离的弹头。每一个鱼雷配备一个军官和一个海军军士，操纵人员骑上了鱼雷，拉开了发射控制杆之后，漂浮到了海面上。攻击就开始了。

意大利人把这种鱼雷叫做“猪”，因为它的样子真象一头正在游泳的猪，而且容易听摆布。在鱼雷的身躯内，带有调节其深度的压缩空气桶和推动其双推进器的电池组。1941年，鱼雷艇最高速度往往只有三海里，再高一点的速度将会把操纵者从他们的座位上摔下来。最远的射程是十英里。

坐在前面的军官掌握着速度、方向和潜水的操纵器，还有一个发光的深度测量器和在水下使用的发光的罗盘针。在正常情况下行驶时，操纵人员正好把他们的下巴露出水面，但是如果遇到周围有巡逻的船舰时，他们就得潜入水下航行。

有一个人鱼雷操纵人员叙述了这样一次鱼雷攻击的故事。

“瞭望水天相接的远方，你已经见到你的攻击目标（船只）的轮廓。到了相距五十码的时候，你就紧紧掌握住方向盘，使潜水箱被水淹没，你的头部也被水淹没了。你感到寒冷、黑暗而又寂静。

“现在，你在水下已经够深了。关闭淹水阀，开动马达，缓缓地驶向前方。黑暗变得更加深沉，你就知道，你已来到了目标船的底下。于是就停止马达，打开阀门，使潜水箱里的水排出来。当你升起来时，你把手按在自己的头上，深怕你的头会碰到光滑的船底或

者船底附着物的刀刃般的东西，它们会把你的手指切断，或者最可怕的是，把你的橡皮衣撕裂，让海水渗漏进去。”

“啊，那就是船底了。现在，把鱼雷倒回来，直到你的副手能够摸到一英尺宽的船舳龙骨（船底和船侧连接处），这种龙骨在大船船身两侧都有。你感到肩上挨人拍了一下。你的副手已找到了船舳龙骨，并且正在夹上夹子。你的肩上挨了两下敲打，夹子都已夹妥。现在就要转到船底另一侧的船舳龙骨。”

“副手正在拉出一条绳索。他固定了他的第二个夹子，然后再回到船底的中央。副手绕过你爬行到前面的弹头那里，用绳索的另一头把它系上。当弹头分离时，鱼雷轻微地颤动着。引信钟已拨在两个半小时之后燃着这五百磅重的弹头，时间的滴答声一秒一秒地消逝着。副手爬回他的座位。肩头被敲了三下，一切都办妥了。你发动马达，在这艘大船底下游出来，缓缓地上升。现在，你可以设法逃跑了。”

利西奥·维辛梯尼，是这个小组中最勇敢的一个，也是发动人鱼雷攻击的智囊团成员。正是他在1941年9月的那个夜晚把他的鱼雷带进直布罗陀的港口。他随身带着能够切断保护港口的钢丝网的工具，但他并无使用它的必要。当这个网放下让一艘驱逐舰通过时，他也趁机溜了进去。他把弹头系在一艘油船底下，然后硬从网子底下钻出去逃跑了。

另外两个人员把鱼雷弹头悬吊在直布罗陀湾内船只底下，凿沉了他们的鱼雷艇，然后泅渡到西班牙的海岸。司令官皮埃利奥尼正在海滩上等着他们。他是意大利海军军官，以驻巴塞罗那领事的身份作为掩护，被派到西班牙来，指导破坏活动。当他把这些人员带走时，轰隆隆的声响和一股浓烈的烟云宣告，一次爆炸把“邓比达尔”号油船的脊梁骨炸断了。不久之后，货船“杜兰姆”号和储油船“费俄那西尔”号的船底下发生了同样的爆炸。

1941年至1942年的冬天，皮埃利奥尼在西班牙组织了一个破坏活动的机构。7月里，他准备了第一次以陆地为基地、矛头指向直布罗陀海峡同盟国航运的行动。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攻击，由一个名叫“加玛”的游泳攻击小组的十二个成员来执行。游泳者集合在拉利内阿城附近的一家别墅里，这正好是在英属直布罗陀以北的西班牙的领土上。在厨房里，他们穿上了长而厚的羊毛连衫裤和从脚趾直到脖子的橡皮衣，带上呼吸装备和织有伪装网的钢盔。7月13日晚11点钟，他们出发到海滩去。

每个人的背上和胸前都戴有“橡皮圈炸弹”——吊在能膨胀的橡皮环中央的小雷管，橡皮环可以使雷管贴在一艘船的船底，直到引信钟走到燃着的时间为止。五磅重的雷管比起人鱼雷的弹头来是微乎其微的，但它却能够把钢板炸开一个大窟窿。在直布罗陀湾之外，停泊着三十艘同盟国的舰船。每一个人都奉命选择好自己的目标。

在这些溺水者之中，有一个叫伐哥·吉亚利的，是一个强壮的、宽肩膀的农民小伙子，在水下具有海豹似的灵巧。在他所选择好的船底下，黑暗中他碰着了另一个溺水者。他们争吵起来：究竟这是谁选择的目标？吉亚利事后说：“他疯了，简直是疯了。”吉亚利潜入水下，放下了他的炸弹。当他浮上来以后，那另一个人把他的口罩拿掉，向他大叫大嚷。“我真不明白，为什么那只船上的水手们没有听见他叫嚷，”吉亚利说。这一次他并没有同那个人争吵，而是把那个人的头按到水里去，使劲地按着它，直到他停止呼吸，不再能叫喊为止。

六个溺水者安全地返回；而另外六个落入了西班牙巡逻队之手，被送去“拘留”在塞维尔的一家旅馆里。

这次攻击只取得差强人意的成就。有一些人员根本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物，有些炸弹被水流冲走，在水面爆炸。总共有四艘船

被损坏。几个月之后，吉亚利和一个伙伴又重创了另一艘船只。

正好在西班牙阿尔赫西拉斯港口之内，从直布罗陀望去可以见得着的地方，停泊着意大利油轮“奥尔脱拉”号。意大利宣战，这艘油轮被船长在浅水凿沉，1942年该船受到“中立国”的监护。但年轻的西班牙士兵最感兴趣的是骗取几支香烟，而不是去报告一些可疑的活动。

就在这儿，利西奥·维辛梯尼组织了一组“人鱼雷”人员。在“奥尔脱拉”号油船里，维辛梯尼开始建立了一个秘密基地。最初，这些意大利人把船首舱和小货舱之间的一道钢壁切开二十五英尺长的一部分，用铰链又连接起来。他们告诉西班牙人说，他们必须清理一下平衡箱，于是他们把前面几只水箱用唧筒把水打出来，使船头高高地露出水面。

一天清晨，被白兰地酒灌醉了的卫兵酣睡正浓，船侧被凿开了一扇门，由此可以通向处于正常吃水线之下的船头舱。门上装了铰链，是朝里开的，一切都做得如此敏捷，只有潜水员才有可能侦察出来。当这艘船重又恢复了她的正常的平衡时，船头舱内被水淹没，而货舱内却是干燥的。

按照计划，他们要在船头舱内把人鱼雷悬吊在滑轮上。当夜晚准备袭击时，这些人鱼雷就能下水，从这艘油船的边门里滑出去，驶向大海。

但首先，这些鱼雷必须从意大利运来。所以西班牙人被告知说，“我们必须检修这艘船的引擎，以便迎接胜利。”如果西班牙人对这些用货车从意大利运来装着“锅炉管”的箱子稍加注意，并加以盘问的话，他们会发现每一只箱子里装的是一个二十二英尺长的鱼雷。

就这样，从“奥尔脱拉”号上发动了几次人鱼雷袭击。第一次是在1942年12月7日的夜里，结果使维辛梯尼和他的伙伴一起

丧了命。当时，英国人每天夜晚隔一段时间就向直布罗陀投下能够爆炸的雷管。一个这样的雷管杀死了两个“人鱼雷”人员。两星期后，他们的尸体在直布罗陀港湾之内被找到。但“奥尔脱拉”号的秘密却仍然没有被发觉。

这是1943年的5月，意大利人还不能给“奥尔脱拉”号带进足够的新“机器”，以恢复鱼雷攻击。这一次，他们放弃了渗入直布罗陀港的一切希望，而是选择在港口外抛锚的船只作为目标。5月7日的夜晚，三个人鱼雷从“奥尔脱拉”号油船敞开着的边门滑了出来，发动了一次袭击，安然返回原地。同盟国的两艘货轮遭到严重毁坏，而第三艘货轮则彻底被击毁。

另一次从“奥尔脱拉”号发起的袭击，是在1943年8月3日的那个夜晚，由海军少校欧纳斯多·诺塔利负责，他的目标是排水量七千吨的美国自由轮“哈里森·格雷·奥底斯”号，在这只船的船底下，诺塔利碰上了一种新的防御设施——带着蒺藜的铁丝悬挂在一片漆黑之中。他的副手海军军士贾恩诺利，是最后一分钟才替补上来的。他比较缺乏经验，他在船舳龙骨的夹板之间放下了绳索，而弹头必须直接安放到船的左舷龙骨上。当这一步正在完成时，鱼雷开始上升。由于诺塔利把潜水阀门开得太大，鱼雷突然下沉，失去了控制。这时，诺塔利的肺都快要炸了，脑子快裂开了，他摸索着鱼雷的操纵器，闪闪发光的潜水探测器的指针转过了它的三十四米（一百一十二英尺）的限度——这是正常训练潜水深度的三倍。

正如鱼雷忽然下潜一样，它又突然间开始向海面上猛冲。诺塔利这一下预计他的脖子将撞到船底而被折断，或者他的橡皮衣将在带蒺藜的铁丝上被撕得稀烂，但是他却被冲出水面，落在离船侧一码左右的地方，海水飞溅，回响四起。他陷于半昏迷状态，已不能思索和动弹了，只是躺在操纵器的上面，等待着能听到高声的

雷恩

叫嚷或枪声。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诺塔利慢慢清醒了。人鱼雷的发动机只会以最高速度运行，而在这种速度下，潜水是不可能的。

诺塔利抱着他的微弱的希望，在海面上全速撤退，足足行驶了近四英里，随时都想着他的冒火发光的鱼雷尾巴会被一只巡逻船发现和跟踪。接着，真的发生了一个奇迹。一群海豚参加到他的行列，一路上在他周围嬉戏着，直到抵达阿尔赫西拉斯港。这就给鱼雷的尾波提供了最好的掩护，从而使其安全地回到了“奥尔脱拉”号油船。

与此同时，贾恩诺利由于鱼雷的突然下沉而从座位上摔了出来，浮上海面，正好是在大船的另一侧。他以为诺塔利已经淹死了。他游泳到船尾，脱掉他的呼吸用具和橡皮衣，只穿着他的羊毛连衫裤在船舱上冷得发抖，足有两小时之久。当他判断其他伙伴可能已回到“奥尔脱拉”号，他自己在船底安放的弹头也快要爆炸了，他就沿着船边游泳，并且大声呼救。

他被拖上了船。他被俘的消息迅速电告海军总部一艘载有一名潜水员的巡逻艇，赶紧到（美国船）“哈里森·格雷·奥底斯”号去接收俘虏和检查这条船。巡逻艇正在大船一侧。贾恩诺利被带上小艇，当潜水员、海军军士贝尔正把他的脚踩下水去的时候，一个五百磅的鱼雷管就在船的另一侧爆炸了。它把引擎房炸开了一个巨大的窟窿。

就在这爆炸的几分钟之内，第二个鱼雷小组人员把一万吨的挪威油船“索肖夫第”号炸成了两截，使大量的厚厚一层的石油漂浮在海湾水面上。第三鱼雷小组的成员安放的雷管使六千吨的英国船“斯坦利奇”号遭到重创。所有这三艘船在浅水中沉没。除了贾恩诺利之外，所有意大利人都安全地回到了“奥尔脱拉”号上，并于第二天离此去意大利。

马

这些意大利的袭击小组，并没有把他们的活动局限于直布罗陀区域。1941年，三个意大利的人鱼雷潜入亚历山大港，而凭借操纵这些鱼雷的六个人的活动，一夜之间就使东地中海的海军力量平衡发生了不利于同盟国的变化。

大概在12月19日凌晨3点钟左右，有人看见两个意大利人——贝尼海军上尉和海军军士比安齐——正沿着英国战舰“勇敢”号的边上洒水，她的姐妹舰“伊丽莎白皇后”号也在港口。这两个意大利人被拖到船上，但两人都不回答问题。海军上校摩根（后来是海军中将查尔士·摩根爵士）于是下令把他们拘留在被认为是紧挨着他们捆放弹头的船底那个部分。足足有两个半小时，意大利人闭口静坐，一言不发。

到了5点45分，贝尼海军上尉要求同上校谈话。“我愿意警告你，你的那条船快要爆炸了。”

他再也不说什么了。摩根上校立即下令他的人员全部集中到甲板上，并把防水的门统统都紧闭上。早晨6点零4分，一声剧烈的爆炸使“勇敢”号战舰完全瘫痪，但没有造成伤亡。在差不多同一时刻，“伊丽莎白皇后”号的锅炉间也被炸坏，进了水。附近的一艘海军油船则被炸掉了她的船尾和推进器。

1944年，在意大利停战以后，贝尼上尉参加了同盟国部队的行列，在拉斯佩西亚参与了英意对德国船舰的一次联合攻击，表现了突出的勇敢精神。结果是一艘巡洋舰和一艘潜艇被击沉了。摩根海军中将为了这次战绩，试图为贝尼上尉争取获得一枚英国勋章，但由于当时在法律上意大利与英国仍处于交战状态，因此，授予勋章的事被拒绝了。

1945年3月，意大利皇储跑到塔兰托去检阅在同盟国军队中服役的意大利海军部队，并授予勋章。贝尼上尉上前去接受一枚金质奖章，这自然是为了表彰他在袭击英国战舰“勇敢”号事件中

所表现的勇敢精神。然后，皇储恩贝托转向摩根中将说：

“请过来吧，摩根将军，现在该你来主持了。”

摩根中将接过这枚勋章，把它别在这位勇士的胸前，也正是这一位勇士在三年前曾把他那艘军舰给报废了的。

我们组织了法国的地下战斗

——安德烈·吉罗德口述，乔治·肯特整理

此文写于1944年，当时法国仍处于被占领状态。战后还没有看到过历史记载能象法国地下战斗的一位领袖所叙述的那样，把法兰西的秘密战士们在那些日子里的英勇气派再现出来。

从个人严酷的切身经历中，我了解法兰西的地下组织，因为在1940年停战之后，我立即成为法国地下组织的一个组织者和军官。与一般的见解相反，法国的地下组织不是由一些孤立的破坏者、枪手以及小册子撰写者等乌合之众所组成的。地下组织是一支真正的军队，是由原法国步兵和军官中最坚强、最优秀的分子以及公民们所组成，他们分别被编入突击队，破坏通讯、情报和工程部队。他们分布于全国，包括了所有阶层和各种政治信仰的人们。

当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和前军人在入侵的德国军队占领乡土之前，蹒跚地沿着公路向南逃亡的时候，组织工作就开始了。许多家庭离散。报上专设广告栏，征询关于他们离散的亲人的消息，诸如：“紧急！如果你看到我的兄弟查尔士·贝梯尼，失散前知道他是在去夏尔特尔的路上，请写信到信箱——”

地下工作的组织者对这些广告作出了回答，实际上他们这样写道：“你是受痛苦折磨和无家可归的。但是战争继续着。为法兰西作出你的贡献！把此件抄录下来，并分送三位朋友。成为整个链条中的一环吧！这一根链条将会粉碎我们所有的锁链！”

这个思想发展着，扩散着。组织者团结着他们的朋友们，把计划告诉他们，向他们发出危险的警告。对每一个朋友，他们都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有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吗？那么，你就告诉他，引导他。

我们从高级军事人员那里得到帮助。从理论上说，所有战争物资都要移交给德国军队，但实际上，成吨成吨的军火却被秘密地用卡车运到隐蔽的地点。有一处价值几百万法郎现钞被搜获，并被隐藏了起来。还有德国军官和他们法国傀儡之间的那种得意忘形的电话密谈记录，也被缴获。这些记录被归入档案，以待来日清算时使用它。

在法国的丛山峻岭里，地下军建筑了坚固的要塞，被称为“武装区”。所有的山上通道和隘口都有许多掩体、机关枪和大炮，严阵以待。这儿地势险要，据此而“一夫挡关，万夫莫敌”。这里就是从未被征服过的法兰西。

开初的时候，主要的精力集中在控制和指导人们对德国人的复仇行动上。对于那些不重要的纳粹分子的漫无目的之暗杀活动，为数太多了。举例说，一位名门闺秀，她的未婚夫被敌人枪杀了，她就接连地诱惑六个德国士兵进入她的房间，然后一个一个地把他们刺死。有一个法国人每天夜晚都要出去杀死一个纳粹，为在敌人来时逃难致死的他的八岁的女孩子复仇。在他被俘和被处死之前，他总共干掉了十五个纳粹分子。一个农民在他的草莓园里埋掉了八个被他勒死的德国人，因为他的女儿被杀害了。成百上千的德国人被杀死，但成百上千的法国人作为报复的对象，也被杀害了。

地下组织对这种个人报复行动很伤脑筋，因为这样做妨碍了展开对军事目标的更有效的打击。“这是一种简单的会计账目，”一位参谋总部的上校说。“如果德国人为了每一个被我们干掉的

德国人而杀害一个或更多的法国人的话，那我们就亏了。我们付不起这个代价，我们必须使每一个行动都划得来。”

在最初的日子里，地下工作的组织者把巴黎地下铁道当作他们的总部。地铁的火车一圈又一圈地运行着，他们就在车上工作。后来德国人发现了这个计谋，他们只能放弃这种做法。密谋者经常转移地点。记录被留存在许多很小的纸条上。每一份记录写着新加入组织的人名、他的职业、他的社会关系，还有他是否拥有一辆自行车，他可以提供多少人的膳宿，他被编入哪一部门：破坏活动、运输或者突击任务。这种分类目录是由夜间工作的银行会计员来完成的。

法国的每一个地区都有档案材料。编纂好的纪录上列出了每一条铁路隧道，每一节列车必须缓行的地方，每一个工厂、修车厂和船坞。秘密的报纸，开头是油印的，后来成为铅印的四页小报——由隐藏在阁楼和地下室的小印刷机印出的小型报纸，帮助人们澄清观点，并向人民提供真实的消息。到1944年初，大约有四十种这类报纸正式出版，总共的发行量约为五十万份。

地下组织派遣工作人员到全国各地去听取人民在说些什么，并驳斥德国的宣传，另外还征招新的工作人员。成千上万报名参加地下组织的人必须受到训练。辅导人员被派去访问他们。这些人是以前的律师、学校教师、士兵，他们夜里旅行，走遍全国，以避免德国的公路巡逻队。

每个辅导人员在一段时间里只给两个人开课。他们教导学员如何埋放燃烧弹，如何在铁路的路轨上放置雷管以使列车出轨，如何破坏为德国人制造产品的工厂。他们也教练如何使用“绞刑”（在一个人还来不及叫嚷之前就把他勒死的一种方法），如何在手枪上安装灭音器，如何装配和使用自动步枪。

为了考验一个新参加者的勇气，辅导人员往往派他去递送一

架机枪——把它包成不惹人注目的一般包裹样子——送到距离几英里外的小市镇去。这就意味着要赶到一个火车站，把包裹寄存在行李车里，然后又把它取出来送往目的地，这一切都在警察的眼皮底下进行。新参加者还被要求去切断一条长途军用电话线，或者在一座铁路桥上安放一个爆炸雷管。只有当新参加者通过了这些对他的勇气的初步考验之后，辅导人员才能判断他是否合格。

权威是由能力来决定的，昔日的将军们往往听命于以前的尉官。在总部下面设有二十个地区单位，受一些在指挥机构负责的军官们的领导。这些指挥机构每隔八天到十天迁移一次。一个被称为“征粮员”的先遣人员找到一个十户人家的村庄就可以使指挥官安全地居住下来。虽然德国人下令任何窝藏地下组织人员者将被处死，但房屋的主人们却很少拒绝给予帮助。

地下军的敢死队叫做“法兰克斯部队”，相当于美国的“别动队”或英国的“突击队”。他们又被称为“大猩猩”。因为当他们完成一项行动之后就垫居起来并留起胡须，以节省肥皂和刮脸刀。他们是一些不怕艰险的硬汉子，大多数都在四十岁以下。他们的工作需要的是胆量、力量和不怕死。而另一方面，从事破坏者倒往往是老人、妇女和青少年。他们的工作同样重要，他们一旦被捕也面临死亡。但是，对这项工作来说，隐蔽和机智要比肌肉发达更为重要。

每一个行动都经过精心而周详的策划。举例说，这儿有一个存放轻武器的仓库，而这些武器正是地下军所需要的。于是，对这个仓库的敌情进行详尽的研究，它有多少卫兵，他们的习惯，附近楼房里的住家，以及如何通往仓库的办法等等。如果说那儿有八个德国守卫，那么为了对付他们，指挥官就从法兰克斯部队里挑选出十六个人来。为了运走军火，他又准备了两辆卡车和五十个人。四名爆破人员被派去炸掉这个仓库，指挥官还对他们面授机宜。时

间表也是经过严密计算的：“大猩猩”们的行动需要十分钟；卡车运输四十分钟；最后炸毁行动需要十分钟。

在一个无月的夜晚，法兰克斯部队的人员来到了这个仓库。开头是装有灭音器手枪的嘶嘶射击声，接着是砰砰的落地重击声和喘气的声音。第一部分的工作顺利完成，“大猩猩”们撤离了。对于这些人的身份，担任运输的人并不知情。他们把卡车重又开回来，紧靠仓库的大门。当他们的卡车装完了货，四个人就冲进这空荡荡的建筑。几分钟之后，火舌从屋顶架上奔突、喷吐；当地下军的最后一个人敏捷地溜掉时，卡车的声响渐渐在远处消逝。

要策划一次象炸毁法国电力最强的广播电台“巴黎电台”这样的行动，常常需要三个月的时间。伦敦方面首先要求准确地判断这一行动需要多大的爆炸力。为了找到答案，英国人甚至建造了与巴黎电台一样规模的模型，并且炸掉了它。法兰克斯部队的四名成员被挑选来干这件事。在地下组织辅导人员的督导之下，他们成百次地进行了排练。到了行动的那一天，四个人翻过围墙，安放了雷管，就逃跑了。二十分钟之后，“嘭！”的一声爆炸了。这些人从未被捕。

另一次精心策划和顺利执行的行动发生在美国军队攻入非洲之后。那个时候，人们以为法国南部自身也将遭到进攻，因此必须堵住在意大利的轴心国部队通向法国的道路，办法是立即封锁连接法意两国的铁路线。一个地下小组在弧形隧道里埋下了雷管，使一列火车来了个大翻个儿，被炸得七歪八斜，这就有效地堵塞住了这一通道达数日之久。另一小组炸掉了一个山峰，造成一次岩崩，从而毁坏了一座铁路桥梁。第三小组在另一座桥梁杀死了卫兵，然后把它炸掉。

当纳粹开始把法国食品装满一列列火车转运到德国去的时候，地下组织的化工人员想方设法在装运的食品中放毒。于是，特

工人员溜进停在巴黎火车货运集结场的火车车厢中，执行这个计划。结果是成百上千个德国人中毒死亡。纳粹以后又试着利用法国其他地方的货车集结场，但每一个场地都有地下组织派出的监视者，他们通常就是在这些地方正常值勤的铁路员工。德国人的食品里继续被放进毒药。

在准备毒药的地下实验室，也配制一种在工厂里用于损坏机器部件的磨蚀剂。德国人为了安全起见，把生产线完全分散，一个工厂制造卡车的底盘；另一个工厂制造发动机，等等。这些工厂中除了一家之外，全部产品都合乎规格。然而，就在这样一家工厂里，一支无形军队的成员会在某个要害部件，比如说在轴承上涂上磨蚀剂。这样，卡车就会从装配线上滑溜出去，事实上可以平稳地行驶上一百公里。可是，这辆卡车忽然会莫名其妙地坏掉了。大概有十来个月的时间，从一个巨大装配线上出来的卡车，百分之九十的卡车都不断地发生了这种奇怪的事故。同样的妖魔鬼怪也缠上了纳粹在法国经营的飞机工厂、造船厂和其他每一个机器制造工厂，有一家造船厂从来都没有生产过一艘完好的船只。

德国人同地下组织作斗争，直接的办法就是用逮捕、暗杀和酷刑，间接的办法是用奸诈诡计。德国人喜欢用的诡计是，当他们抓到地下军的一个成员，他们就施以酷刑，直到他被折磨得半死不活。然后把他扔到人行道上，仍然血流不止。他们暗地等待着地下组织的其他成员会见景触情，前来解救。确实，要对一个战友陷于这种处境而无动于衷，是很难做到的，可是却又必须这样做。

德国人往往喜欢雇用女间谍。他们的理论根据是，谈情说爱是法国人生活中的一种爱好。漂亮的德国姑娘，会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围坐在咖啡店或者夜总会里，或在林荫大道上散步，指望能诱鱼上钩，有人会向她们无意泄露有关谋反纳粹的情报。但是，这些姑娘们并没有搞到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因为地下组织很快就发

现了她们。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法国人成功地使这些姑娘真的陷入情网，这是破坏她们起间谍作用的一个因素。而市政当局也要求不少妇女遵守为管理妓女而制定的一些不愉快的条令。所以，不久以后，德国人就放弃了这种手段。

地下组织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如何同它的各下属单位以及伦敦保持联系。这种联系大部分是依靠秘密电台取得的。

有的时候，德国人使用配备着搜索电台方位装置的汽车，这种装置可能找到设有地下电台的房屋的大体上的位置。然后，他们派一个人去，随身带有一个微型装置和耳机，沿街走动，以发现电台所在的确切地点。接着，就在那个地方布置了一条军事警戒线。电台操作的人被杀害了，他们的设备被毁坏了。地下组织对此进行了反击，他们伏击纳粹的无线电汽车，枪杀汽车上的特工人员。

口头传话的办法被有效地用来传递信息。信使们常常把信息牢记在心里，而不是携带文件。如果遇到涉及转运军火的事情，那就需要以签署为证。那种信息是写在一张粮食纸上，一旦信使遭到逮捕，他就能够把纸片嚼烂吞下肚去。

有一段时间，维希政府^①某个高级官员的小汽车背后的行李厢，被定期地用来为两个市镇指挥点之间传递信息。被运送的东西总是在车子停在马路边时交进去，而由另一端的一位友好的汽车技工前来帮助修理后带走。由于那些在终点站工作的忠诚技工们的配合，正规的德国铁路捷运公司也以令人满意的“正规性”为地下组织“服务”。德国的军用卡车也曾被地下交通所使用。

食品匮乏使法国人民体质恶化。当一个人骨折后医生很难把骨节再连接起来，而且长势很慢，非常痛苦。一个断指，几个月也治不了。人们的牙齿颜色变黑，长歪、甚至脱落了。德国人抓了人

^① 维希系法国中部一城市，1940年7月—1942年11月期间法国贝当元帅在那儿设立了和德国纳粹合作的政权。——译者

之后的一个绝招，是突然把这个人的嘴巴撬开。如果他的牙齿是完好而洁白的，他们就知道这个人一定是最近从国外来到这个国家的，可能是个间谍。不久以前，一个地下组织的成员访问了伦敦，要求牙医生把他的牙齿作一番处理，使它们看上去很不健康的样子，以免当他返回法国时危及他的安全。

地下工作人员的外出旅行，组织得非常巧妙。不知是什么原因，人们骑自行车总是较之步行更少引起怀疑，而一个漂亮的少女往往能够在男人通不过的地方可以通行无阻。有一个人坐在某个友好的宪兵汽车里跑遍了法国的许多地区。这种骗局很简单：警察把他带上手铐，德国巡逻兵就以为他仅仅是一个囚犯而不加注意。

凡是利用法德之间旅行路线的爱国者，都多少探得一点有用的情报。比如：某一德国铁路车站，那里可以睡觉而不用提心吊胆；某一所房子里住着的德国人很友善；在某一农场，那儿可以弄到吃的，等等。地下工作人员穿过德国到俄国去，实际上正是靠了诸如此类的情报。从德国逃跑出来的英国和美国的战俘到达法国，也是经过这条路线。他们从法国再被迅速带到西班牙，或者用船送往英国。

有一个地下工作的成员经过精心策划，混进了装运纳粹在法国抓来的苦工的船只，目的是要发现一个秘密潜艇制造厂的位置。一旦到了德国，他就设法逃出来，在乡村地区，忍饥挨饿，足足浪迹了一个月时间终于找到了潜艇工厂的所在地。那个工厂完全是在地下建造潜艇，他把工厂的位置牢记在心里，然后设法躲在列车厢下面逃回法国。后来，精确安置的炸弹使这座工厂长时期陷于瘫痪。

法国地下组织最后准备要迎接盟军进入法国。德国人的交通线将被切断，他们的指挥中心将被摧毁，增援部队也将受到困阻。

许多男人和女人接到指示，每人只要做一件简单的工作。如剪断一条电话线，或者把几包炸药放到铁路路轨上去，或者按一按引起炸药爆炸的雷管（已经放好了），把一座德国碉堡彻底报废。在机场和汽车厂周围，那些平日温驯谦恭的雇员们也收起了驯服的态度，勇猛地执行他们各自的一项专门任务，从而在摧毁敌人空军司令部的行动中作出自己的贡献。至于那些艰巨而棘手的工作——比如说，封锁铁路线以阻止敌人增援——将由法兰克斯特种部队和专职的破坏者去执行。

法兰西隐蔽的战士们，渴望着等待那一天的到来！那时，他们将能够在最后彻底消灭德寇的行动中发挥自己积极的作用。

不列颠帝国宠爱的间谍

——一个前英国潜伏间谍向奥尔·纽门的叙述

1940年10月，佛朗哥政府为一位长枪党党员申请去英伦三岛的许可证。这位人士与西班牙的青年运动有某种联系，因此他想研究一下战时英国的童子军。外交部回答说：“行，来吧。”他们熟悉这个人，并且肯定他所见到和听到的一切都将直接向柏林汇报。

他是我们自己宠爱的间谍，我们亲切地喜欢他。我们中间的几个人，作为童子军的官员，在飞机场与他相会，并在阿萨农宫廷饭店为他安排了一套房间。这套房间也许是安置了曾经有过的最完善的秘密扩音器和窃听电话线路的设备。我们给他准备了酒和他想要得到的任何东西。

那个时候，我们只有大约三个重型高炮连驻守在伦敦地区。其中的一个连，我们把它转移到了这个大饭店对面马路的公园里。他们接到命令：在每次空袭中，都要自始至终地连续射击，速度越

快越好，不管在几英里之内是否有敌机的踪影。

他们发出了多少轰响喧嚣啊。由于每个夜晚至少有一次空袭，我们那位受宠的间谍大部分时间只得躲在防空洞里，连续不断的轰鸣之声使他深信，伦敦密布着防空的高射炮群。我们让他顺便观察了一个高射炮连——一个精锐的配备三英寸口径高炮的部队。在这个场合，我们甚至也布置了几个童子军让他看看。

随后，我们又把他领到温莎市，去看更多的童子军。事情装成好像是完全的巧合，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们把英伦三岛上仅有的一个装备精良的团以及我们在本土所有的坦克都集结在那里。我们说，这些优秀的、外表健壮的卫队，仅仅是从英伦三岛国防部队中抽出来的一支微不足道的小部队，是被指派来作为皇家仪仗队的。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如何地惊讶不止，但是他把这一切所见所闻全都信以为真。

接着，我们又把他带到海港。那里，所有可资利用的舰队单位，都集结了起来。我们巧妙地暗示，由于国内舰队力量的秘密加强，我们有可能把这些船舰作为仅仅防卫一个海港的力量。他的眼睛稍稍睁大了一点，表示惊讶，但事实俱在，他不能不相信他的亲眼所见。同时，我们又让他看到更多的童子军。那个时候，他已对童子军感到有些厌烦了，实际上我们也一样。但它是整个这场戏里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啊！

我们这场舞台导演的最成功之举，是安排他乘飞机去苏格兰的旅行。你会记得，那时候我们的空中力量是多么薄弱——只有少量“飓风”式飞机和少得可怜的“喷火”式飞机。向北飞行途中，我们看到一个中队又一个中队的“喷火”式飞机。天空中似乎布满了它们，其实，他怎么能知道，这只是同一个中队的飞机，从云层中钻进钻出，并从不同角度和高度向我们飞来？

在苏格兰的那次演习中，我们给他看了他曾在英格兰温莎附

近所看到的同一个团的卫兵和同样的一些坦克。我担心他会认出其中的几个卫兵，但他并没有认出来。我们向他解释说，这只是一支装备较差的小部队，正在重新调整，准备去参加将在一个辽阔地区进行训练的大部队，而整个参加演习的军队也只不过是主要从防御部队中抽出来的部分后备力量。噢，对了，在现场附近仍然出现了少量的童子军。

在返回伦敦的路上，我们碰见更多的“喷火”式飞机，足有几百架之多。如果我并不知道内情的话，我自己也会被搞得晕头转向的。在这之后，他向我们告别，并对我们的这种出色的合作，表示殷切的谢意。

后来，我看到了他向上司汇报的一部分材料——我们早有安排，让复写一份。这份文件是颇为唬人的，它说：英国是一座武装的军营。凡是喧叫英国虚弱的谣言，只能是狡诈敌人的奸计，旨在诱骗德国入侵英伦，从而使它陷入不可避免的灾难。所有这些材料均系亲眼目睹，在柏林，它显然得到了极大的重视。

我常常纳闷，不知我们那位受宠的间谍境况如何。他是一个体面的家伙。我们亲切地宠爱他，并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但是，我愿以十个英镑来打赌，他现在仍在做梦想着英国的童子军。我深知，我亦如此。

纳粹袭击舰的游弋

罗伯特·利泰尔

当英国航轮“爱塞特城”号的守望员报告，在南大西洋的地平线上出现一个奇怪的船桅时，船长起了疑心。这是1940年5月，纳粹德国正在继续进军。但是半小时之后，船长放心了，他认为靠近的那条陌生的船只原来是八千四百吨的“香椎丸”货轮——日本



船，因而是中立的。

在它的甲板上，一个妇女推着婴儿车。近旁是几个水手懒洋洋地站在那里——他们衬衣的下摆在微风中飘拂，正象日本海员的派头。两条船擦肩而过，没有停歇，也没有打信号。

实际上，婴儿车里是空空如也，这个“妇女”也根本不是什么妇女。甲板上水手的名字都是德国的：弗立兹、克劳斯和卡尔等等。其余的海员，总共三百五十名技术人员和战斗员，都躲藏在船舱下面。这条船用夹板做的通风设备、帆布做的烟囱和油画等伪装起来，实际上是德国武装袭击舰“大西洋”号，这是过去一直逍遥法外的一只致命的海上吃人猛兽。

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武装了九艘这样的袭击舰。它们总共击沉船只一百三十六艘。但是，“大西洋”号的战果最大，航行时间最长，而且还有一个最出众的舰长。它开始航行时，命名为“金岩”号，是一艘七千八百吨的货运船。当战争爆发，它就装上了六门隐蔽的五点九英寸口径的炮，还有许多更小的炮，有鱼雷发射管和一架海上侦察机，货舱里装满了水雷。它还载着一大堆伪装的道具，可以冒充任何这一类的商船。

1940年3月，在一个大面庞、仪表堂堂的四十岁的军官朋哈德·罗吉的指挥下，“大西洋”号潜入了挪威海岸，乔装成苏联轮船的样子，自由自在地闯入了北大西洋。它的任务是，用一切可能的奇袭手段，打击绕道非洲好望角的船只。4月25日，在经过赤道之后，“大西洋”号降下了它的苏联旗帜，突然亮出它的伪装的烟囱，变成了一艘日本的内燃机轮，这就是英国航轮“爱塞特城”号所遇到的那一条船。罗吉船长所以没有攻击“爱塞特城”号，是由于船上载有为数众多的乘客。

“大西洋”号袭击的第一个受害者是英国轮船“科学家”号。“大西洋”号勒令它停止航行，不许使用无线电，这对“科学家”号航轮

是一个完全意外的遭遇。但是，它的无线电发报员却镇定自若地发出了呼救信号“Q Q Q”——意思是“武装的敌方商船意图阻截本船”。“大西洋”号开了火，击中了“科学家”号的中部，摧毁了它的无线电设备。受害船的七十七名船员登上救生船，其中两名受伤，一名垂危。所有的人作为战俘都被带上了“大西洋”号船上；“科学家”号沉没了。“大西洋”号绕过好望角，疾驶而去。

两个星期之后，罗吉舰长截获了一则英国的警告电讯，说有一艘德国的辅助巡洋舰伪装成日本船，可能游弋在印度洋。于是，“大西洋”号立即脱去了日本的“和服”，摇身一变又装扮成荷兰内燃机船“阿贝扣克”号。

第二个受害者是挪威机动船“梯拉那”号，这条船正装载军需物资支援驻在巴勒斯坦的澳大利亚军队。罗吉舰长派了押送俘获船的水兵登上“梯拉那”号，使它成为俘虏船，尾随“大西洋”号之后航行了好几个星期。在“梯拉那”号被俘的一个月之后，很快就有三艘受害船连续被俘。接着，下一个月，又增加了五艘。在一条船上的废纸筐里发现一些电报，使德国人有可能破了英国商业海运的密码。

至此，英国海军就发出命令，要求所有船只通过无线电报告所遇到的一切可疑船舰的情况，不论其后果如何。结果是，“大西洋”号接到命令，只要看到敌国船只就可以射击，先开炮后问话。遭到德国袭击舰袭击的受害船中，差不多有半数在被敌人制服以前都发出了一份紧急电报。大多数船只遭到了炮击，有时受到重大伤亡。但是，罗吉舰长独自进行的海战，可以说在战争情况下是最“文明”的了。他为俘虏准备了住的地方，并尽其所能把他们救上船来。足足二十个月期间，他在海上前后总共接纳了一千多名俘虏。这些人中间年龄各异，有男有女分属于二十个国籍。他发给他们同船员一样的食物配给，允许他们白天到甲板上来，除非“大

西洋”号的船员们处于战斗状态。他们在帆布建成的游泳池里游泳。被俘的船长们在船上有他们自己的住处。当战俘们被转移到其它船上去的时候，罗吉舰长为那些被俘的船长们举行欢送会。

1940年的整个秋天，正象渔民打鱼时得碰运气那样，“大西洋”号在四十天内只搞到一条船。接着，忽然在11月中旬，四十八小时内就搞到了三条船。正当挪威船“奥尔·雅柯勃”号油箱里的高度抗爆性能的汽油爆炸之时，“大西洋”号袭击舰放下汽艇上的两名军官冒充英国军官，就把这条船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俘获了。另一条挪威油船“台第”号燃烧了几个小时后，正在这一海域航行的船只都能看到冲天火柱。还有英国邮船“奥托米屯”号，船上存放的文件中有英国战时内阁的绝密报告和给远东英军最高司令部的邮件。当一枚炮弹炸死了船桥上的每一个人的时候，它宣布投降了。

罗吉舰长具有笼络人心的才能。每一个人都分得完全相等的一份从敌船上掠夺的小小高档食品——啤酒、糖果、食品包裹。船上人员虽不准离岸休息，但作为替代的制度，他特准给予一星期的船上休假。十二个休假者一度接管了空着的隔离病房。除非发出战斗的号令，他们都可以随意干他们所愿意干的事，不论是睡觉、修补衣服、写诗或者演奏吉他。享受正式规定的休假闲荡，对那些艰苦工作的人们，产生了一种绝妙的松弛神经的效果。罗吉舰长——他的祖父是威廉二世皇帝宫廷里的一个牧师，坚持他的下属军官每星期日都要到教堂去做礼拜。在做礼拜之后，他经常请他们痛饮一杯，被称之为“教堂鸡尾酒”。

1941年对“大西洋”号来说，是出师不利的，四个月之内，只掠夺了四条船。其中之一是埃及航轮“桑桑”号，船上有一百四十名美国传教士。“桑桑”号上的乘客和海员总共三百零九人，全部转移到“大西洋”号。第二天，另一艘德国船舰“德累斯顿”号接管了

“大西洋”号上的全部俘虏，把他们安全地转移到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城。

德国袭击舰所散布的恐惧和越来越多的船只被击沉，使同盟国感到痛心。到处都急需的英国战舰，不得被派往南方去搜寻德国袭击舰。商轮不得不绕道远行，以致浪费时间和燃料。海员也很难招聘，而且还必须付给危险地区的津贴费。官方的邮件不是耽误了，就是丢失了。战时保险费率空前上升，而海港的灯光也终于熄灭。

整个夏天的大部分时间，“大西洋”号横行印度洋南端，而没有遇到过比海鸥更大的东西。然后，到了1941年9月10日，它俘获了它的第二十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受害者——挪威船“西尔伐普兰纳”号。

11月21日，当“大西洋”号上的侦察机在清早飞行后降落时，机能失灵了——也正是最需要它的眼睛起作用的时候。因为次日，一百二十六号德国潜艇将要与“大西洋”号袭击舰会合，为它加油——这是一次十分微妙的行动，在这个过程中，“大西洋”号处于毫无防御功能的状态。它们中途汇合的地点是在巴西和非洲之间，而汇合和加油的时间正好是在用早餐的时候。在潜水艇身边荡漾的摩托小艇上有几个“大西洋”号的水手，潜水艇的艇长已登上了“大西洋”号。与此同时，袭击舰的左舷发动机已被拆除，正在修理。

突然间，监视着朝阳辉耀的大海的守望者发现了铅笔尖大小的船桅。几分钟之后，英国重型巡洋舰“迪温郡”号，由舰长奥利维指挥，向着这两艘德国舰艇急速逼近。

一看到英国重型巡洋舰，德国船舰把安全固定绳索扔了出去，潜水艇迅速下潜，而艇长却被撂在袭击舰上了。潜水艇已经被发现了吗？从脱节的接油软管里漏出的足以暴露真相的彩虹色油迹

在水面上扩散着。现在，“大西洋”号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用诈骗、谈话等手法争取时间，以诱使英国重型巡洋舰“迪温郡”号驶入潜艇鱼雷射管的射程之内。

奥利维舰长感到极为可疑。除了发现诸如通风设备之外，他还发现那条船把汽油撒在宁静的海面上，一切正符合司令部对那种神秘袭击舰的描述。因此，他让战舰来回游弋而不进入鱼雷的射程，并且向“大西洋”号发出了两排礼炮。

罗吉舰长回电说，他们是“波利费墨斯”号船舰。奥利维舰长立即电询南大西洋海军总司令，这艘陌生的船只是否真正的“波利费墨斯”号。

几乎足足有一个小时，“大西洋”号启了锚，在浪里轻轻荡漾，并尽量拉长对话。那时，一二六号潜艇仍然有一点希望可以靠近英国巡洋舰，以便发射鱼雷。但是，潜艇的那个高级军官却宁愿靠近“大西洋”号，而不向英国巡洋舰接近。

9时34分，奥利维舰长从南大西洋总司令那里得到回电：“不——重复——不！”一分钟之后，“迪温郡”号开火了。当第三批炮的八英寸炮弹倾泻在“大西洋”号的时候，罗吉下令埋下定时炸弹，放弃这条船舰。

正好在10点钟以前，前面的弹药舱爆炸，几分钟之后，“大西洋”号的船尾下沉了。当它下沉时，那些以它为家达二十个月之久的海员们向它发出了致意的呼唤声，而罗吉舰长身边带着他的苏格兰种的小狗“菲雷”站在一条小船上，向“大西洋”号致以敬礼。

由于英国海军部的报告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搜罗幸存者，那就要“冒被鱼雷击中的极大危险”，所以，“迪温郡”号立即从地平线上消失了。“大西洋”号的海员们用口哨和呼喊声使大家集合在一起，只有七个人死于炮击。至少有一百个人在沉船的周围洒水，或用手抓住这艘舰船的残骸。潜水艇把伤员和无法替代的专家们带

到艇上。六条救生船搭救了二百人。五十二人配备了安全带和毛毯，在潜水艇的甲板上缩成一团。在潜水艇下潜的情况下，他们得游向救生船。最近的陆地是比利时，远在九百五十英里之外。

这个古怪的舰队——六条救生船，由一艘潜水艇拖着，就在沉船的当天下午启航上路。每天有两次，从潜水艇里放下一只橡皮艇来，向六条救生船依次送去热腾腾的饭菜。

沉船三天之后，潜艇“一二六”号遇上了德国潜艇的供应船“皮生”号。幸存者被救了上来，只是后来又重新被抛弃在海上。因为“皮生”号被另一艘英国巡洋舰“多塞夏”号截获和击沉。这艘英国军舰在几个月前因给予德国船舰“俾斯麦”号以致命的一击而闻名于世。

最后，“大西洋”号的水手们登上德国和意大利的潜水艇到达法国的圣纳塞市，并由此启程前往柏林。他们抵达柏林，正是1942年元旦节之后。

罗吉被提升为海军少将，并且负责训练海军军校学生。但是，他的反纳粹情绪被人发现，因而又被分配到一个不重要的岗位上去了。

在经历了如此漫长而痛苦的战争之后，令人感到稀罕的是，那些“大西洋”号的受害者——绝非少数竟然对罗吉怀有亲切的感情。“巴格达城”号的舰长怀特写信给罗吉，对他作为战俘时所受到的良好待遇表示感激。当“托顿亨”号航船停泊在汉堡港时，船长伍德柯克邀请罗吉少将到船上去作客。在纳粹德国垮台后的那些贫困的年月里，“前战俘们”邮寄给他们的“前俘获者”许多写着“小心”字样的包裹。

“他使‘大西洋’号的船员们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家庭，”海军上尉德尼尔解释说。“如果罗吉召唤我们，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去追随他——不管是什么样的海军。”

赫斯飞行的秘密

威廉·贾·斯奈德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令人神往的故事之一，就是鲁道夫·赫斯和他秘密飞抵苏格兰。作为纳粹统治集团中的第三号人物和希特勒的副手，赫斯是“元首”的一个狂热的追随者。在全部欧洲大陆沦陷之后，英国继续巍然屹立并坚决抵抗，赫斯便设下了一个计谋，那就是秘密去英国议和，以便希特勒能够放手对俄国发动“圣战”。赫斯生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英国区。他讲一口英语，并深信他是“理解英国人的想法的”。他决定飞往汉密尔登公爵的庄园——他在1936年柏林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曾遇见过这位英国人。时间是1941年5月10日(星期六)将近6点钟，德意志第三帝国的部长鲁道夫·赫斯爬进一架M—110战斗机，不告而别，驾驶飞机飞入暮色苍茫之中。

根据某些报告，赫斯曾试图通过一个中间人与汉密尔登公爵联系，但他不知道他自己发出的无线电讯息已被英国情报机关截获。

在赫斯飞行的那个夜晚，纳粹派往英国的最重型轰炸机队之一正在轰炸伦敦。忽然，一个设在苏格兰海岸的电台宣称，有一架单独的飞机飞近，显然这架飞机本身难以准确地加以辨认。它的速度表明，这是一架战斗机。在雷达指示室里，飞机飞行显示出它的精确定位是在苏格兰东海岸很远的上空。箭头指出，这架飞机正向西移动。

两架皇家空军的歼击机迅速被派去追踪这架神秘的飞机。当测位图桌上的红色箭头爬过苏格兰时，战斗机司令部的军官们一直监视着，到贝斯莱市附近，箭头停止了。后来得到报告说，一架

敌机在火焰中坠毁，它的驾驶员已跳出机舱。

在苏格兰的兰那克夏，一个叫麦克米伦的农民看见一个人跳伞降落到他的田野里就向他奔去。“喂，你是一个纳粹敌人；还是我们自己人？”他问道。“不是纳粹敌人，是英国朋友，”那个人回答说。他讲话有困难，因为他扭伤了脚踝，非常疼痛。他被搀扶到农民家的厨房里，那时国民警卫队和警察都急忙赶来了，他向他们承认，他来自德国，正要寻找离此十英里外的汉密尔登公爵的庄园。他说：“请告诉公爵，阿尔弗莱德·霍恩已经到达。”

赫斯被带到格拉斯哥(苏格兰中部)附近的玛丽山兵营。在那里，他又变换了腔调。“我是来拯救人类的，”他说。“我是鲁道夫·赫斯。”

汉密尔登公爵，是皇家空军部队的一位空军中校，他被叫来了。他并不记得过去曾经遇到过赫斯。而赫斯却对公爵兴高彩烈地谈论着他的使命。次日，伊汪尼·库克帕特利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超级间谍，并曾担任英国驻柏林大使馆秘书达五年之久，专程飞到苏格兰来见赫斯。这个纳粹分子向库克帕特利克和盘托出了关于停战与和平建议的全部细节。他高度兴奋，而且滔滔不绝。人们以速记形式在许多笔记本上记录了他所说的一切。他深信，英国已被打败，因而是能够懂得利害关系的。赫斯的口气象是一个宽宏大量的敌人对一个注定要灭亡的对手提出暂缓执行的判决。

简要地说，他的基本之点如下：希特勒提出在西线停止战争。德国将撤出整个法国，只有阿尔萨斯和洛林两地除外。它将保持卢森堡，而撤出荷兰、比利时、挪威和丹麦。还有，元首准备从南斯拉夫、希腊并且总的来说要从地中海地区撤走。希特勒还愿意帮助英国和意大利安排重新修好的解决办法。作为对这些让步的交换条件，大不列颠将同意在东欧问题上对德国采取善意的中立态

度。

赫斯解释了希特勒东进“拯救人类”使命的重要性。他并且指明，英国和法国将如何变成自由资本主义、反对亚细亚共产主义的军火库。他还指出，德国将取得同盟国军事工业的全部产品，直到这些工业能够转变为和平工业时为止，这就可以防止整个经济的衰退。他对希特勒进军东欧的军事计划，没有提供任何情报。据他说，那是一个由德国单独决定的问题。

整整两天时间，赫斯滔滔不绝地畅谈他的建议。他强调，元首不会在枝节问题上斤斤计较——英国实际上可以写下她自己的和平条件。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希特勒渴望停止同一个兄弟国家的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当然，附带地也是为了使其在东线作战时避免后顾之忧。

德国公众知道赫斯的飞行，是通过一次简要的新闻发布。消息说：“我党赫斯同志似乎是生活在一种幻觉状态之中，以致他感到他能够使英国和德国达成谅解……然而，这对战争的继续不会发生任何影响……”希特勒听到了这个消息大发雷霆，他下令说，要是赫斯一旦返回德意志帝国，就处以极刑。

这里，库克帕特利克带着记录了赫斯建议的笔记本赶赴唐宁街十号。这个计划也立即转达给了华盛顿。伦敦和华盛顿都反复地作出努力，向俄国发出德国将要进攻的警报。但俄国的领袖们并不相信，或者假装不相信（赫斯跳伞降落英国是在1941年5月10日，德国入侵俄国是在1941年6月22日）。

当他已讲完自己的一切并且不能指望他提供更多情报的时候，赫斯被通知说，他的计划已遭拒绝，英国早已成为俄国的盟国。他所受到的震动和失望，使他的神经有点失常。纳粹宣传关于赫斯患有癡狂症的故事，一度近乎变成了真实。当他听到德国“俾斯麦”号战舰被击沉时，他竟哭泣了一整天。

赫斯要求遣返德国，理由是作为一个密使来到英国，他理应安全返回。但英国政府则持有不同的想法，于是，在战争持续期间，他成了一名特殊的战俘。他被软禁在英国一家大庄园的房子里，在警卫森严的地段之内，他有一定的行动自由。1945年10月，战争结束以后，赫斯被带到纽伦堡作为一名战犯受到审判。由于神经失常，他免于死刑，而被国际法庭判处终身监禁。他被囚禁在西柏林的斯本多战犯监狱。

逃亡者们

罗曼·图斯基

我出生在波兰。在上次大战前的波兰，宗教上排斥异己的情况是司空见惯的。尽管我的父亲反对我在华沙参加反犹太人的游行示威，我还是常常向犹太人开的店铺的玻璃窗扔石头。我并不为我的行动感到内疚，但后来经历了几个月的艰难困苦和受尽迫害——也通过一个犹太人的遭遇，使我认识到应当如何忠于《圣经》的教诲：“爱你的邻居如同爱你自己一样。”

当希特勒兼并奥地利，战争看来已迫近眉梢之际。我决定辞去在法国里昂飞行俱乐部所担任的教导员的职务，动身返回故里。我的飞机中途出了故障，因此必须在维也纳降落，并在那里过夜把飞机的引擎修好。

第二天早晨，正当我结账前，走出旅馆想去买一点纪念品的时候，一个男子突然闯入大门，奔跑过来，正好把我撞个满怀，使我全身摇晃了一下。恼怒之下，我紧紧地抓住了他，正想要狠狠地训他一顿，只见他脸色苍白，惊恐万状。他喘着大气，力图从我的紧抓着手之中摆脱出来。他惊呼道：“盖世太保——盖世太保！”我只懂得一点德语，但是立即明白他是想逃脱可怕的德国秘密警察的魔掌。

我使劲地把他推进走廊，让他上楼到我的房间里，指着床铺，暗示他躺下来。我用折叠得很艺术的毯子把他的瘦长的、摺刀似的身躯覆盖了起来，这样，我的零乱的床铺看上去是空荡荡的。然后，我脱掉茄克、领带和活领子，这样，如果盖世太保人员进来，我就能装成刚刚起床的样子。几分钟之内，他们果然进来了。他们检查了我的护照，退还给我，并且叫嚷着询问我。我只用我背熟了的一句德语回答：“我不懂你们的话，”他们并没有搜查房间，就走开了。

当他们刚刚走出去，我就锁上了房门，掀开了毛毯。这个可怜的人像滔滔流水似地、急速地讲了一通德国话。即使一个字也听不懂，我也完全明白，他是在倾诉他的感激之情。

我拿出我的飞行地图，并且用手势和在地图边上画画的办法来进行解释，告诉他，我有一架飞机，能够带他逃出奥地利。他指着华沙，他的善于示意的双手似乎问道：“你能把我带到那里去吗？”我摇着头，并使他懂得，我必须在克拉科夫着陆，为飞机加油。我画了警察和监狱，说明如果他抵达任何一个机场，都会被逮捕的。我还使他明白，我们将在波兰边境的牧草地上降落，一到那里，他就能跑掉。他满意地点了点头，他的窄小的脸庞和深棕色的眼睛再一次传达了他的深切的感激。

当我告诉机场上的海关和移民局人员说，我的朋友要给我送行时，他们就挥手让我们通过。我的飞机发动机热了起来，准备起飞了。我们很快爬进机舱，起飞。我们的飞机穿过捷克斯洛伐克上空，立即看到了象一条细长绸带的维斯杜拉河和克拉科夫城市。飞机在森林边的一片辽阔田野上着陆，我向我的伙伴指明地图上我们所在的地点，并且把我身上带着的大部分钱都给了他，祝他幸运。他握着我的手，无言地望着我，然后飞快地走进了树林。

当我抵达克拉科夫机场时，早就有一支警察分遣队等候在移

民局检查官的身旁。一个警察说，“我们奉命搜查你的飞机——你帮助了一个人从维也纳逃跑。”

“那就请搜查吧。顺便想问一下，你们查这个人是为了什么呢？”

“他是一个犹太人。”

他们搜查了我的飞机，他们当然得放我走，因为查不到任何证据。

战争爆发了。波兰对德寇进行了短暂的浴血抵抗，我当时作为一个战斗机驾驶员参加了波兰空军部队。在这之后，我又参加了决心继续为自由而战的成千上万的我的同胞们的行列。我们越过边境进入罗马尼亚，接着很快就被捕，押进了集中营。最后，我越狱逃了出来，参加了法国空军部队。在法国瓦解之后，我又去英国，参加了“不列颠战役”。下一年的6月，当我驾驶着一架战斗机如风卷残云似地飞渡英吉利海峡时，德国空军在法国的布伦港上空打击我们，我就在那一次战斗中受了伤。在早期的防御战中，德国空军总是在数量上和实际行动上压倒我们，而我们仅有的优势就是我们的士气。

当我开始返回时，我的飞机猛然撞上了一架“Me—109式”敌机，并被它自己折断了的一段机尾所击伤。我血流满面，几乎处于半盲状态。我的战斗机中队掩护我越过海峡，但当我的喷火式飞机在英国坠落时，我已失去了知觉，后来才知道，我的头盖骨碎了。当我被送到医院时已临近死亡，医院的外科主任认为，对我施用手术，几乎是多余的了。

当我恢复知觉之时，渐渐感觉到有一张窄小的脸和一对棕色的大眼睛凝视着我。“记得我吗？”这对眼睛的主人说。“你在维也纳救了我的命。”他讲话只带有一点点德国口音。

他的话结束了我的惶惑。我回忆起了这张敏感的脸孔，并试

着说出话来：“你是怎么找到我的？”我注意到了他穿的那件白大褂。“你在这里工作吗？”

“说来话长呢，”他回答说。“在你把我降落到地面之后，我去了华沙。那里有一个老朋友给了我帮助。就在战争爆发之前，我逃跑了，并安全地到达了苏格兰。当你们波兰的一支空军中队在‘不列颠战役’中大显身手的时候，我想，你可能在这支部队中，所以我写信给空军部，果然发现你在那里。”

“你是怎样知道我的名字的呢？”

“你的名字写在你的地图的边缘上，我是记得的。”他的细长的手指触到我的手腕上，感到有点凉。“昨天我在报纸上读到了关于一位波兰英雄一天内击落五架敌机，然后坠落在这所医院附近的报道。报道还说，你的情况已是危急万分，几乎没有指望了。我立即向爱丁堡的皇家空军部队要求用飞机把我送到这儿来。”

“为什么？”

“我想我最后总能做点什么，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你知道，我是一个脑外科大夫——今天早晨就是我给你做的手术。”

第三部分 抗拒来犯之敌

(1942年)

美国从她的和平梦幻中醒过来时，发现自己已卷入了一个新的战争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琢磨心理、高度冒险和或大或小的欺诈成为生存的必需。

被珍珠港的灾难搞得摇摇晃晃的美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形成了自己的世界情报系统，目的在于预报未来之敌何时何地可能发动攻击。联邦调查局、海军情报办事处、陆军反间谍部队和空军特种调查办事处，统统都高速地运转起来。在“粗野的比尔”杜诺万上校（后晋升少将）指挥之下，“战略情报局”这个机构已从设计蓝图变成了遍及全球的现实。

随着情报机构的膨胀，就产生了混乱、竞争和情报活动的争夺局面。科学家、教授和几乎每一行业的专家们云集于华盛顿，成立了许多情报单位和专门组织，其中有些机构对战事还是没有经验的。借用了英国和其他盟国的经验，美国才填补了过去的空白。

退却和失败的乌云已经开始消散。日本的突发性的征战已达到了它的极限。到了年底，一支英国军队已经阻止住了著名的“非洲军团”；英美联军已在北非登陆，向敌人发动了挑战。

这是充满空袭和奇袭，神秘行动和令人难以捉摸的欺诈的一年。在同盟国努力制止猖狂敌人进攻的过程中，秘密工作和间谍情报活动起了不小的作用。

希特勒对美国的秘密入侵

劳伦斯·埃利奥特

1942年6月13日(星期六)午夜刚过,海岸警卫队人员约翰·库伦从长岛的亚马根塞特海岸警备所出发,去执行一次海滩的例行巡逻任务。他带了一支手电筒,而且不时地闪亮着光柱。但在一片弥漫的浓雾中,他最多只能看得见前面不过五、六码远的地方。

这位二十一岁的海岸警卫队员走到大约离开警备所以东半英里时,忽然发现有四个人簇拥在一条小船的周围,拍岸的海浪淹没了他们的脚踝。他突然直着嗓子喊道:“在这儿干什么?”

一个长脸蛋、说话略带一点外国口音的人解释说,他和他的朋友都是渔民,他们在浓雾中迷失了方向。

库伦并不满意这一回答。他说:“你们最好还是跟我到警备所去跑一趟。”

长脸蛋的“渔民”抓住了库伦的胳膊。“听着,小伙子!”他说,“你有母亲和父亲吗?你想再见到他们吗?来,拿着这笔钱,去过个好日子吧。把你在这里看见的一切都忘个干净,明白了吗?”

库伦一时目瞪口呆,抓住一束钞票,攥在他的手心里。他没有武器,而且意识到他已碰到远非他个人所能对付的事情。他转身返回,直奔海岸警备所。

那个长脸蛋的人和他的三个同伙迅速地卸下了橡皮船上的东西。他们就是坐着这只从潜水艇U—202号放下的橡皮船上岸的。他们把四只防水的箱子埋在匆忙地挖好的土沟里,每一只箱子都装满炸药、定时设备和雷管——足够对美国工业的核心力量来一次大规模的猛烈的袭击。然后,正当库伦快步赶回海岸警备所去求

救的片刻，他们就敏捷地转移到通向亚马根塞特火车站的公路上。等到库伦和两个伙伴带上武器迅速跑回来时，他们发现，那里只剩下空无人迹的海滩和寂静的灰濛濛的薄雾。

就这样，德国破坏小组在美国海岸登陆的第一阶段开始了。

这个要使美国关键性工业企业生产陷于停顿的阴谋计划概要，是由德国统帅部谍报机构策划的。阴谋的技术工作委托给了一个很有办法、但易于暴怒的情报军官瓦尔特·卡贝中尉，他曾在美国芝加哥和纽约为纳粹前哨组织进行宣传达十二年之久。卡贝的计划是征募在美国生活和工作过的德国人，这些人如此熟悉美国的风习和语言，以致他们能够在这个国家到处混迹于美国人之中而不被发觉。

这些人组成的小分队，经过紧张的训练和不惜工本的装备之后，将由潜艇载往美国登陆。他们的目标是事先就被指定的了。卡贝自己深信，他们会得到无数忠于祖国的美籍德国人的帮助。他们将同卡贝以及相互之间保持联系，办法是在《芝加哥论坛报》上刊登约定暗号的广告。一旦破坏者建立起了工作网，卡贝本人就会悄悄溜进美国，并在芝加哥负责一个秘密总部。

瓦尔特·卡贝开始他的征募工作，是在1941年的冬天。这是一种令人厌烦的繁杂任务。他征询盖世太保关于最近遣返回国的德国人名单；他在奥斯伦学院为征募身在国外的德国人加入纳粹而举行的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他查阅德国军队里的人事档案；他找每一个可能被选中的对象谈话。最后，在1942年4月10日，在柏林郊外的一个树林茂密的庄园里，一小股志愿人员集合了起来。他们很快就要担负起带头从事德国人“入侵”的工作。在他们中间有：

乔治·约翰·达契，即那个长脸蛋的人，三十九岁，是小队里年纪最大的一个。他在1922年非法进入美国，曾在纽约当过一家

饭店的侍者，甚至在1941年返回德国之前，还在美国空军部队里混过一个短时期。

温纳·梯埃尔，他是1927年来到美国的，住了十四年，专职管理初次提出的申请美国公民资格的文件纪录档案^①。

爱德华·吉林，早就献身于纳粹，他在美国当私人汽车司机和家庭仆人达十一年之久。

欧门·纽保，一个厨师。

赫贝特·汉斯·霍普特，他是这些人中最年轻的一个，在他二十二年生涯中有十六个年头是在美国度过的。由于他父母的归化，他就自然取得了成为一个美国公民的权利。

欧纳斯特·彼得·贝吉，一个纳粹党员，曾在美国当一名机械师，并曾在国民警卫队中服役。

海因利契·海因斯克，一个修理机具的技工，在美国生活了十三年。

里查德·奎林，1927年来到美国，几年以后按照德意志帝国关于资助德国熟练技工回国的指令，返回祖国。

4月10日的下午，卡贝中尉安排他们到柏林郊外庄园进行一次远足。那里除了一幢宿舍之外，还有一座体育馆、一间教室、一个设备阔气的实验室，一个为试验爆炸用的塔和两个步枪打靶场。卡贝对这个小队的人员说，从即日起他们将同外界隔绝。任何人也不得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

第二天黎明时分，严格的训练课程开始了：柔软体操，课堂讲授纵火、爆炸、引爆、定时设备和秘密书写知识、扔手榴弹、步枪射击以及摔跤运动，还有真正从事破坏工作的实习任务。

教导员着重讲解一些原材料，这些东西都可以随便在一家杂

^① 即指外国人申请加入美国籍时初次填写的表格、申请书等原件。——译者

货铺里买到而不致引起别人怀疑。举例说，一种可燃物可以用硫酸和糖的粉末加以点燃。显隐书写的程序也很简易，只需把一片阿司匹林溶解在酒精里当作墨水，字迹干了以后就不见了；如果用酒精浸过的棉花一擦，字迹又清晰地显现了出来。

灵巧而又十分厉害的方法，足以触发一次爆炸，只需要一个接通了线的金属线头的软木塞漂浮在一只慢慢漏水的罐头里就行了。当全部的水流尽前，爆破人员有时间远离爆炸目标几英里之外，而当软木塞到了罐头的底部，金属接触金属，电路通了。这就造成爆炸。

最后一星期的训练，上课地点是在柏林的运货场。专家们指点他们，如何抓一把沙土扔进一个轴承箱就能使一部发动机失灵，一个小小的炸药装置只要安放得当，就能使铁轨的某个关键地段阻塞好几天而不能使用。破坏者们从货运场又到法本工业公司的制铝和制镁工厂呆了三天。卡贝表演示范了轻而易举的行动：把一段高压电线切断，用步枪一发子弹把变压器打个粉碎，这样，美国同一类型的工厂就会至少在八个小时停电。这八小时时间，足以使液体铝凝固起来，从而损毁加热炉和铝液盆的网状系统。结果是在新的设备安装起来以前，工厂将要瘫痪好几个星期。

最后的大考于4月29日开始。密封着的指示，命令每一个小组去工厂的模拟实体、铁路终点站和油库所在地。在秘密地估计现场形势之后，他们就着手准备爆炸，并要求在三十六小时内破坏指定的目标。这个队的两名人员被立即开除，原因是他们工作很糟而为学校卫队的突然袭击所困。

考试过后，没有被开除的候选队员都被许诺每月有一定的收入，并在战后可以得到一个舒适的政府部门工作职位。然后，他们被分成两个小队，每个小队都有指定的破坏任务。第一小队由达契率领，包括贝吉、海因斯克和奎林，他们要去破坏几个制铝厂（在

田纳西州的阿尔柯亚、伊利诺斯州的东圣路易斯、纽约州的墨塞纳)和在费城的制造冰晶石(一种氟化物)的工厂。他们还要去炸毁从匹兹堡到路易斯维尔之间的俄亥俄河上的水闸。第二小队由吉林领导,队员有纽保、梯埃尔和霍普特,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铁路桥梁和隧道,炸毁纽约东河上的海尔门大桥,破坏纽约市的供水系统。只要有会机,两个小队就要在公共场所埋下炸弹,以制造公众的惊慌。

卡贝还命令每一个队员毫不犹豫地把他队员中任何削弱和危害他们任务的人干掉。但同时,他自己也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5月26日早晨,这是在两个小队从劳伦特潜艇基地登上U—201和U—202潜艇的两天以前,卡贝发给了为这次冒险行动所需的费用。他给两个队长每人各五万美元,并发给每个队员一条塞了四千四百美元的腰带。达契正要把钱放进一只按上假底的手提箱里时,他忽然发现相当一部分钱是金钞,而这种票子大约在九年前就回收而不再流通了。虽然这种违法的钞票很快就被换掉,但那些从事破坏者们的心理却起了微妙的变化。正如达契后来说的,“我一直想着关于那笔钱的事情。如果他们竟然是如此愚蠢,那么他们对于我们中的任何人还谈得上什么真正的关心吗?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

6月13日早晨,达契一伙沿着海滨公路向着亚马根塞特迅跑时,达契心里又有新的理由忐忑不安了。他们第一件不幸的意外——那个讨厌的海岸警卫队员——甚至在他们还不能够把登陆船拖出水面之前,就碰到了他们。

早晨6点半,亚马根塞特的车站办事员打开了售票窗口,那时,达契还是忧心忡忡。他们这四个德国人正在等候着买票。“你们这些人起得真早啊!”办事员轻松愉快地说。

“我们刚打完鱼,”达契说。

达契买了几张报纸，给了他的同伙。他关照他们各自把头埋在读报里，象每天使用月票乘车上下班的人们一样，不要说话。他们乘上了6点57分去纽约的火车。

当他们抵达纽约后，达契和贝吉登记住进了第三十一号街的克林顿总督旅馆，而海因斯克和奎林则住在马提尼克的旅馆。

他们应当聊以自慰的是：已经安全登陆了。在火车上，没有什么人用怀疑的目光盯过他们一眼。他们成功地使自己混迹于城市之中。以后，当他们搞到一辆汽车，他们就要按计划安排把他们所带来的那些装备挖掘出来，运到卡次吉尔山上的一个永久的隐蔽处去。但这件事倒不用匆忙，因为卡贝曾经一再强调，在两个小队没有完全站住脚跟以前，切切不要采取引人注目的破坏行动。

然而，现在却到了转折关头。为什么正好在这个时刻如此突然地来临呢？这可能永远也不能作出判断。当达契和贝吉只有两人留在他们房间的时候，达契心神不定地踱着方步。“听我讲，”他说，“我很担心。我希望你告诉我，你对这件事有何感觉。我有一个能使我们在这里摆脱麻烦的计划。”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贝吉说。

“好啊！但如果你不同意，我在此时此地就把你干掉。”

贝吉的回答是：“不用担心我。”

星期天傍晚快到8点钟的时候，联邦调查局反特人员迪恩·弗·麦克霍特在纽约联邦法院他的办公室接到电话。有一个略带外国口音的人说，他从德国潜水艇上刚刚登陆，有重要的情报要告知埃德加·胡佛^①。“我将于一周内在华盛顿亲自送给他这份情报，”他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这是战争已进行到第七个月的时候。联邦调查局这些天一直

^① 埃德加·胡佛当时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译者

为一些古怪的人和神经有毛病的人打来的电话所困扰。麦克霍特把这个神秘的电话写成了一份备忘录，就去处理别的事情了。但是当海岸警卫队向联邦调查局报告亚马根塞特海滩遇到的事情，并把其后他们发现了隐藏的炸药送来的时候，这个电话就产生了新的含义。

与此同时，大约纽约以南一千英里处，U-201潜水艇载着第二破坏小队驶向佛罗里达的海岸。它在6月17日清早在杰克逊维尔市东南二十五英里的邦特维德拉海滩浮出水面。一艘橡皮船从艇侧放了下来。奎林、纽保、梯埃尔和霍普特划着船上岸。他们很快地埋藏好爆炸用的设备，换了衣服，走上了美国的一号公路，并且等着去杰克逊维尔市的公共汽车。第二天早晨，奎林和梯埃尔坐上了去辛辛拿提市的火车，而霍普特和纽保则启程去芝加哥。

乔治·达契在乘火车去华盛顿并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总部之前，在纽约一直玩到第二个礼拜的星期四，整天同他的旧日当侍者时的老友们玩纸牌以消磨时间。“我就是打电话到你的纽约办事处的那个人，”他说。“我现住在五月花旅馆三百五十一号房间。”他不久就把他异想天开的故事向特工人员杜安纳·特雷诺和汤麦斯·唐纳根和盘托了出来。

他讲了两三天工夫。特工人员法兰克·约翰斯通和诺伐尔·维尔斯轮流替换特雷诺和唐纳根。每隔两小时，有一个新的速记员到三百五十一号房间里来。达契的证词杂乱无章，而且许多是文不对题的，单行打字总共达二百五十四页之多。在一些有价值的情报之中，最重要的是，他叙述了卡贝和他的训练学校。他开出了关于第一和第二破坏小队袭击的目标，描绘了每一个成员的特征并提供了他们可能与之联系的美国人的名字和住址。他还描绘了德国的食品、配给、住房和军事形势等等。他透露纳粹的潜艇正在人们很难想象的海下深处进行活动，远在同盟国深水炸弹射程之

外。最后，他表示希望，作为对他的合作的一种交换，他可以有一个机会，向德国人民作宣传广播。

正当达契在华盛顿快要结束他的陈述的时候，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在纽约推开了欧纳斯特·彼得·贝吉在克林顿总督旅馆房间没有锁上的房门，把他监禁起来。他看来与其说是感到惊慌，不如说是如释重负。大约一小时之后，当海因斯克和奎林下午看完电影回到马提尼克旅馆时，发现联邦调查局人员正在等着他们。

爱德华·吉林，第二小队的队长，在纽约有一个妻子。他在6月22日从辛辛拿提市乘车来看望他的妻子。第二天傍晚，他和跟随着他的梯埃尔一起被捕。

同时，在芝加哥，霍普特已迁回到他双亲住宅的他自己的老房间。一天，他自鸣得意地走进联邦调查局的一个办事处，询问关于他是否合乎征兵条件时，他被告知说，“这是没有问题的。”其实不然。联邦调查局把他置于监视之下已有一个星期了。他们在等待时机。最后，在6月27日的夜里，在他把联邦调查局人员领到八个德国破坏者中的最末一名欧门·纽保那里之后，霍普特被捕了。

五天之后，7月2日，罗斯福总统指派了一个军事委员会来审理这个案件。在美国，自从1865年亚伯拉罕·林肯被刺以来，还是第一次举行这样的法庭审判，这种审判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审讯是在司法部长法朗西斯·比德尔提出确证的情况下开庭的，军队检察长密隆·克拉梅亲自主持这个案件的起诉。除了每一个被告的惊人详尽的供词之外，他还把他们带来的爆破器材作了介绍。他承认德国人在双脚踏入美国海岸后的侷促不安。但他强调的事实则是，只有依靠联邦调查局有效的工作才把他们一一搜捕归案，从而阻止了至少几起破坏活动。那么，是不是所有的被告会由于他们中的一两个人缺乏进行破坏的意愿而都被释放呢？

被告的辩护凭借一个简单的事实，也是一个明显的事实：这些德国人没有犯下任何一项破坏的罪行——而且他们从未打算这样做！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一些不太狂热的纳粹分子，他们自愿参加这种行动，只是由于希望因此而能够安全地离开德国，回到他们在美国的亲友中来。

卡贝中尉的学生们一个接着一个地在法庭上作证，申诉他们对希特勒政权的私下的不满。贝吉详述他与盖世太保之间的矛盾。他提请法庭注意，他的供词中包括一些对美国具有巨大价值的情报，比如对于他的同伙的详尽描述；关于破坏者埋藏设备的细节，以及关于 U—202 潜艇的建造和设计等。

为了作出最后的判决，最大的可能是，委员会的成员们会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假如在象纳粹德国那样第一流的军事强国里，谍报机构挑出来执行如此重要任务的最优秀分子，会像达契那样竟是一个神经有缺陷的不满意纳粹的人，而其他人也是同样不坚定的分子，这能够是合乎逻辑，或者是合乎情理的吗？否则，这一切是不是统统虚假的，而且是经过精心预演的，即一旦被捕，这些阴谋者都要来一番这样的表演呢？

作为起诉的总结，检察长向委员会的八名官员致词说：“接受被告辩护人的说明，诸位先生，那就意味着得出结论：被告不是作为入侵者，而是作为难民到此地来的。”

8月8日，被告听取了由总统批准的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他们每一个人都犯了违反战争法令的罪行。达契被判处三十年徒刑，贝吉终生监禁。其余的人都坐电椅处死。他们在那一天中午就被处决，并埋入华盛顿政府专用地上不设标记的坟墓之内。

这条新闻迅速地刊登在全世界的报纸上。在对美国海岸登陆事件发生之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一切企图进行破坏的人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当破坏者被俘的消息宣布时，德国海军上将多恩

涅兹为他的潜艇被用于这样冒险的计划而大发雷霆，以致好几个月之久，他拒绝同谍报机构在需要 U 型潜艇运输的冒险活动中进行合作。

大马尼拉湾的“白银行动”

约翰·格·赫贝尔

1942年夏末，日本占领菲律宾群岛已有好几个月了，该占领区的货币体制突然开始走向崩溃。日本士兵发现一个月的薪饷还不足以买一杯啤酒。原因是在马尼拉市场上开始出现的菲律宾银比索突然神秘地泛滥成灾。

这种银币甚至通过某种途径进入了战俘营。美国战俘对那些道德败坏的日本卫兵进行贿赂，送给他们食物、衣服、药品。下一步，他们将买取自由！如果这种银币的来源不是被迅速发觉的话，它可能会腐蚀日本占领统治的整个结构。

这种银币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日本人知道，麦克阿瑟的部队在他们投降之前，曾把成百万的银比索倾倒在科雷吉多尔岛以南的深水之中。总共有八百五十万美元的银比索被倾倒在那里，安躺在海面下一百二十英尺深的地方。七名被俘的美国潜水员被安排来打捞这笔钱财，它将是日本皇军对天皇的一份厚礼。日本保安警察监视着美国的潜水员，守卫着每一枚被重新找回的比索。要想从这些银币中弄一点私运进马尼拉，几乎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尽管如此，日本人还是决定加紧对美国人的看管。

这个行动是在 1942 年开初几个月里开始的，那时，菲律宾的失败已是不可避免的了。菲律宾政府官员和美国的军事官员很快决定要拯救菲律宾的国家金融财富。2 月份，有大约价值二百万美元的金条和三十六万美元的白银，安放在美国德罗特潜艇的压

舱库里被海运到旧金山。可是，时间不等人，敌人进展神速，已经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其余的财富转移出去。有一千七百万银比索（每枚值五十美分）用木箱包装好了的，仍然放在科雷吉多尔的钢筋混凝土地下室里。

4月20日，美国军队的官员们在地图上划了两条直线，把地图上马尼拉湾的著名界标连接了起来。两线的交叉点是在卡巴洛湾的水域，由科雷吉多尔岛蜷曲尾部一条细长弦月状的水带所形成。正是在那里，海水特别深邃，而且风大浪急，敌人不会有勇气在这儿打捞。剩下的菲律宾的金银财宝就可以倾倒在这个地点。

在马利维尔湾附近，指挥港内舰艇的乔治·格·哈里森海军少校，召集了一个工作组。十二名海军人员被指名去那里报到，这些人都是从马尼拉湾沉没的一艘潜艇的勤务船“卡诺帕斯”号和另一艘潜艇的救生船“鸽子”号上逃生的幸存者。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是潜水员。哈里森告诉他们，固守科雷吉多尔的日子已屈指可数，这项工作必须迅速完成，并且必须是在夜间工作。

沉重的箱子，每一只装着六千个比索，一只又一只地被拖上了平顶的大驳船，然后被运到海湾的倾倒地点。在那里，疲惫的水兵们开始把这些珍贵的货物抛到海洋中去。整整花了十个夜晚，才把四百二十五吨白银移放到卡巴罗湾的海底。当大功告成，哈里森要那些水手好好休息，并告诫说，“如果你们被俘，切莫要让他们知道你们是潜水员。”

5月6日，科雷吉多尔沦陷了。潜水员们也在那些被俘者中间。六个星期之后，位于马尼拉以北九十英里的卡邦那通战俘营的日本指挥官，把水手长的潜水员摩里斯·“摩埃”·梭罗门召去。他说，“我们知道你是一个潜水员”，“马尼拉港被沉船堵塞了，必须清理一下，以便畅通航路。”

日本人有着很精确的情报。除了梭罗门之外，他们还把水手

长的得力助手们“傻瓜”V. L. 索埃斯、“大力士”华莱士 A. 巴顿、“小苗条”P. L. 梅恩以及其他两个有经验的潜水员挑了出来。在离开卡邦那通之前，这个潜水员小组征求海军少校法兰克·戴维斯的意见，他曾是他们“鸽子”号的船长。“你们知道他们真正想找寻什么？”戴维斯说，“不要让他们弄到它！”

这些人懂得，如果日本人要他们潜到水中去取出白银，他们就必须弄一点上来，否则将会被枪决。但他们一致认为，他们只能弄一点敷衍敌人的白银量。他们要尽可能多地偷到白银，并走私运给其他美国战俘，以便他们能用来贿赂日本的卫兵们，以得到食物和药品。有一点看来是肯定的，或迟或早，他们会被抓住，并以破坏活动之罪而被处决。但这是战争，而这里却存在着使敌人遭受巨大损失的良机。

在去马尼拉的火车上，敌人改变了他们的严峻态度。带着微笑的卫兵给每一个人拿来了猪肉三明治和香烟。在马尼拉，他们被带领到船坞附近一幢大楼里一个整洁的房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带锁的小柜和一张小床。真的，他们变成了“显贵战犯”！

一个日本公民，衣着不整地进来了。他的秃头上留着象马蹄形状的灰色头发，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和一张笑脸。他看样子好象是在一部蹩脚间谍影片里出现的一个演员，但他的柔软而高调子的声音却是友好的。“我叫与三兵卫先生，”他说。“我们将在一起工作。对潜水工作来说，我是稍老了一点，但在打捞工作中我已有二十年的经验。来吧，见一见我们的负责军官。”

卓市上尉，在船坞上接见了他们。他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年纪较轻的人，出身于一个富有的日本家庭，说着一口标准的英语。他告诉这些人说，他们在科雷吉多尔将住在一条宽敞的船上。

与三兵卫和两个日本卫兵给这些美国潜水员看了看日本人找到的美国海军潜水用具：几顶浅水用的潜水帽和二十四件又长又

沉的潜水内衣。这将是危险的活计。如果有份量的潜水帽倾斜超过四十五度，它将要灌满水，使潜水员下沉。浅水装备，并不是为承受水下三十六英尺象大蟒缠身似的窒息压力而设计的。而且这些潜水帽上装的通气软管至少用了十年以上了，当一个潜水员潜到海底作业时，这些软管可能会一下报废。

他们要去住的那条六十英尺长的船——一条紧系在科雷吉多尔北码头的破船，原是六个菲律宾人的宿舍，他们是被雇来照料菲律宾潜水员的。这些潜水员从5月底以来就为日本人打捞白银箱子。他们已经打捞了十八只箱子，装有五万四千美元的白银。美国人探悉，这些菲律宾潜水员过去从未在深水工作过。他们在水下停留过久，而又上来得太快。两个已在“潜出病”的极大痛苦中死去。第三个人丢掉了潜水帽，就上不来了。幸存者拒绝再去潜水，日本人把他们统统送进了监狱。

那一天夜晚，这些美国人议论了形势。打捞到的第一批十八只白银箱子说明，其他的箱子也是能够被找回的，这就引起了敌人的胃口。很明显，日本陆军要在打捞白银上邀功；否则，帝国海军的潜水员就会取而代之。这就说明，为什么他们如此急于要同美国人合作。也许，他们会作出更多的让步。

当卓市出现时，潜水员们告诉他，他们在上面生活着的这条船简直是一个小猪圈。它需要打扫、油漆和修理。他们说，象干这种危险活的人们该有一个愉快、松弛和休息的地方。“你们在岛子上能够找到的东西都可以享用嘛，”卓市告诉那些受惊的战俘们。“只是请抓紧一点时间。”

从科雷吉多尔的瓦砾中，水手们获得了丰盛的收获。几天之内，这条驳船被擦洗和油漆得焕然一新，看上去真象一艘舒适的游艇。他们安上了电灯装置，同码头附近的柴油发电厂接通了线路；他们安装了水管、一个木炉、一只急救柜和许多书架。他们把睡舱

用墙隔开，并铺上地毯（这条地毯从战俘的标准来说，真是不错，它过去曾铺在麦克阿瑟将军的办公室里）。

他们正要开始享受他们自己的“家里生活”，与三兵卫和两个日本士兵突然出现，匆忙地催促美国人和那些菲律宾侍者登上一只小渔船。他们在船机突突声中缓慢地绕过科雷吉多尔的东端，然后直接指向卡巴罗湾。不远处，美国人看到了一只平底的水船。它正好停泊在他们曾倾倒财宝的地点的正上方。

几分钟之内，一艘摩托艇到来了，把一个身材高大、外表粗暴而表情冷酷的日本人送上了潜水船。他的制服显示，他是一个宪兵——日本陆军中高级的、类似盖世太保那种组织的一个成员。一个普通士兵可以被贿赂，但是他们知道，一个宪兵是不受贿的、机智的，他的行动对任何人都不负责任。他可以把他们就地枪决，而不许人提出任何异议。

这个宪兵的第一个行动是，终止了他们将要打捞沉船的这出假戏。他用日语对与三兵卫说：“给你们命令是打捞在美军投降以前在此地倒下海里的白银，”与三兵卫带着微笑对美国人说。潜水员们原来打算告诉与三兵卫，他们对这样的白银毫无所知，但宪兵的表情使他们改变了主意。

一只平底小船荡漾在驳船旁边。一条粗大的铁锚索从一架手摇绞车上拉过甲板，吊下水去。铁索的末端有一条腰带一样的皮带。当一个潜水员发现一箱白银，他就把这根皮带套住木箱，于是，两个菲律宾人就摇动绞车把它绞上来。

索埃斯第一个潜水。他戴上了潜水帽，把空气管和救生带夹在他的右臂下，并且抓住了锚索。然后，他潜进水去。海水是温暖而平静的。索埃斯沿着下降的绳索一寸一寸地向下缓慢地、谨慎地移动，一根粗长的马尼拉绳一直固定在海底。他很快地就站稳在坚实的沙底上。然后，海底底面渐渐进入到他的视线中心，他终

于看到了这一切！

堆积如山的箱子就在离他几码远的地方。如果敌人得到一点暗示，知道水下的白银是如此集中，那么，他决不允许在水下耽搁时间。能干的潜水员是完全能够在几个星期之内就把全部财宝提上水面的。

索埃斯苦苦地思索着：由于菲律宾人已弄上来十八只箱子，日本人知道他们选择的是正确地点。所以最好是立即送上去几只箱子，以证明潜水员的可靠性，从而有更多时间可以允许他们再作计议。他把绳索套在一只箱子上，然后用力地晃动了三下，这是要菲律宾人拉上去的讯号。十五分钟之后，他爬上了驳船。当他脱去潜水帽，索埃斯开始露出牙齿笑着。与三兵卫和那个宪兵并没有注意到他。这两个人都站在那条小船上，向那些满身大汗的菲律宾人发号施令，要他们把这箱白银搬运到船的后梢去。宪兵就站在木箱的旁边，显示他要以生命来保卫这只木箱。

接着是梭罗门潜水，他也送上来一只箱子。“大力士”巴顿第三个潜下水去，但什么也没有送上来。“那里什么玩意儿都找不着，”他告诉与三兵卫。“一定是其他什么人把这儿周围的东西都弄走了。”

“我们将再试试看，”与三兵卫说。

那一天潜水暂停，卓市上尉在北码头见到他们，并带来了一只火腿和一瓶威士忌酒。虽然只找到一万二千个比索，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啊！

在他们生活的那条驳船上，这些美国人一面自己做饭，一面商议对策。他们弄上来的两只箱子，由于浸在水里过久已开始腐烂。以后再潜水下去时，他们可以把箱底两头搞得再松动一点，这样，当木箱被拉上来时，沉甸甸的白银袋子就会破箱而出，白银就会倒出来。于是，他们就能窃取那些另散的银币。

摩·梭罗门剪掉了几件粗布工作裤，把裤腿缝合当作口袋，口袋上装有拉绳，另外用一根粗绳把它绑在潜水员的腰围上。口袋就吊在他的潜水内衣下面。在海底，潜水员把银比索装满了口袋，当他上船时，他的侍候者就把口袋移开，藏在甲板上的雨衣下面。

“小苗条”梅恩第一个潜下去。他在潜水衣下面暗暗藏了一把穿索钻，用以撬开木箱。在海底，他把一个木箱的铁箍去掉，然后撬开两头，直到箱子松散了为止。于是，他打了个暗号，并注视着它上升。当箱子升到距水面不到一半时，它就开始出毛病，成袋的银币就纷纷下落。菲律宾人感觉到箱子的重量忽然消失了，于是把绳索又放下一点。梅恩安放好另一只损坏了的箱子，在被拉上水面的中途，箱子同样裂开了。然后，他把穿索钻子插在海床上，便游上来了。

驳船上一片惊愕。与三兵卫几乎暴跳起来。白银出了什么事？宪兵站在一旁，沉默不语，愤怒地凝视着。梅恩佯作憎恶的样子说，“这真是见鬼的工作！”“那些箱子都烂了。你一接触它，就散开了。”

“但是，昨天取上来的两箱是完好的，”与三兵卫说。“昨天我们很幸运，”梅恩回答说。“你们看我们取上来的箱子，都长满水锈了。”

与三兵卫在甲板上踱着方步，失望地绞扭着自己的手，喃喃地自语：“我们必须做得更好些，我们必须做得更好些！”

下一个潜水的是巴顿。他尽量地把另散的银比索塞满了他的潜水衣下面的口袋，然后送上来一只没有损坏的木箱，以安抚与三兵卫。木箱拉上了小船时，他也随即浮到了水面。当日本人正在检查木箱时，梭罗门解开了他装钱的袋子，把它悄悄放进用雨衣覆盖着的吊桶里。梭罗门接着又潜下水去。

那个夜晚，这些美国人计算他们的战利品，共计七百五十美

元。为了收买任何一个起疑心的日本人，和建立一个向科雷吉多尔和马尼拉的美国战俘们递送白银的“体系”，他们还需要更多更多的白银。“先生们，我们必须做得更好些！”巴顿说。

以后两星期之内，美国的潜水员们把值一万美元的银比索塞在他们住宿的那条驳船的船艙之中。敌人拿到的是五万五千美元。加上某些日子里风浪太大，不能潜水，因此找到的白银就不能满足与三兵卫的要求。他认为，工作进行得太慢了。唯一的办法是召来更多的潜水员。

在卡邦那通战俘营，日本人又挑出三个潜水老手：渔雷兵西茨、水手长助手乔治·乔普切克和木匠的伙计安德生。他们都是卡巴罗湾潜水员们过去的老同事。

在他们上船之后，那些老手们就向他们传授机宜，然后把他们领到住所。那些新来者感到惊讶不止。角落里和墙缝里都塞满着香烟、糖果、花生、盐、糖、胡椒、鸡蛋、咖啡和甜酒等等。

那一天，西茨、安德生和乔普切克兴高彩烈地计算着他们的收获，共计一千二百一十五美元。后来他们帮着把银币从一个暗门带到黑暗的下层甲板。潜水员们用长绳拉着，通过船艙的洞口，使许多盛满白银的桶被吊到船舱地板上面的洞门。

“利息当然是非常可观的，”“傻瓜”梭罗门说。“但是我们不能信任本地的银行。”新的白银不断增加，而吊桶又继续不停地往下吊。

老手们告诉新来者，他们的这套体系是如何工作的。安排和管理空气泵的菲律宾人是被允许去马尼拉回家探亲的。美国人对他们进行了审慎的研究，用对日本天皇进行冷嘲暗讽的话来试探他们。最后，在对他们的忠诚深信不疑之后，美国人就告诉他们偷窃白银的事情。菲律宾人能够帮助递送白银吗？他们愿意。

管泵的人们在马尼拉找到了几个兑换货币的中国人，他们乐

于用日本占领区的纸币换取菲律宾的银币——按照黑市上不利于日元的兑换率换取。这样，他们把大量银币在马尼拉流通，致使日本“元”的兑换率降到三十比一，而终至没有人愿意同日本占领区的伪币打交道。银币往往用来购买供应品，或者私运给美国的战俘。菲律宾人从中获取大量佣金，美国人认为这些佣金是理所应得的。菲律宾人是用他们的生命在进行冒险。

自从西茨和乔普切克到来以后，与三兵卫把这条生活船拖到南码头更接近安置财宝的地方。他要求加速这项工作。这些美国人并不高兴，因为那里没有现在这样隐蔽。一条小拖船和另一条敌人的驳船紧紧地系在美国人生活船的两边。日本的水兵们往往心血来潮，突然到生活船上来检查一番。有一天他们忙乱得不可开交。天空昏暗下来，海上浪高风紧，日本水兵们准备应付大风暴的到来。

第二天早晨，这个地区就处在强劲台风的尖厉的、狂暴的猛袭之中。看上去好象整个南中国海的无穷尽的滚滚巨浪正向着马尼拉湾进发。日本水兵们放弃了小拖船到科雷吉多尔的隧道里去躲避。但美国人必须抢救他们的船只，因为如果它撞碎在岩石上，那么船上的违禁物品就一定会倾撒在沙滩上。

靠了某种奇迹般的努力，他们保住了这条船。当台风最后过去的时候，科雷吉多尔呈现出一片荒乱。没有一棵树是立着的。日本人的那条驳船早就被卷走了。从远在海湾之外、渗满水的地下室里卷起来的成打成打的白银箱子，支离破碎地散置在这个岛子的南岸，在那里，菲律宾的工人们正在急切地捡着便宜。但是那条潜水员的生活船却仍系在码头上。

日本人需要用两个星期才能修复损毁了的东西，这就给予潜水员们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去把白银递送给在科雷吉多尔的其他美国战俘。在风暴过去之后，战俘组成的工作队被带出战俘营去清

理污秽杂乱的东西。而这些工作小队并没有受到严密的监视，敌人的士兵不可能从战俘中辨认出潜水员来。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潜水员们三三、两两地混在一队战俘中开始工作。趁敌人的警卫不太警觉的时候，他们就把白银传递到惊恐万状的战俘们手里。这些潜水员们很快就把成千上万的银比索散发了出去。他们决定不再凭运气办事了。幸好如此，因为第二天早晨，卓市上尉就来到了船上。

同卓市一起来的是一个面目丑陋的军官。他们谁都不说一句话。他们慢慢地穿过船上的房舱里，拨动着床垫子，并在潜水衣裤堆的下面、药柜子里面、火炉里以及书架子里看来看去。如此看来，敌人对他们已有怀疑。最后，卓市站在一块地毯上，它正好覆盖着通向下层甲板的活门。卓市是知道下面的货舱的。在船艏处仍有成千枚银比索留在那里。潜水员们以为，这一下他们搞的玩意儿就要完结了。

但卓市有点出乎他们的意料。“你们这些人必须为发现白银作出更多的成绩来，”他声色俱厉地说。接着，莫名其妙地说完就转身离开了。

“他一定是忘记这里的货舱了，”有人喘息着说。

“他没有忘记，”索埃尔斯说。“他上次看到的，货舱里潮湿而且肮脏。很可能是他不愿意弄脏自己。他们是要回来的。让我们把那些东西从这里移走吧。”

他们现在只能做一件事。他们必须把他们的大堆白银扔回到海里去。那一天，可以塞满好几桶的白银又沉到了海底。

第二天，卓市和三个武装士兵在生活船上搜索着每一个角落。潜水员们跟在这些日本人的后面，他们的脸上充满着被暴行伤害的表情。

“我们曾为你们辛辛苦苦地工作，上尉，”梭罗门恳切地说。“现

在你似乎把我们当作窃贼或者什么似的。”

“我认为这是极为可能的，”卓市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你们就是贼或者什么东西！”当卓市领着他的检查队离开驳船时，他大发其火。他未曾发现一个比索。如果他发现了，那么这些潜水员们就会统统被枪毙。

第二天早晨，他们的疑虑被证明是有道理的。当他们准备潜水时，日本宪兵突然出现在潜水的驳船上。他用日本话同三兵卫讲话，并且开始脱去衣服。“他要潜下水去，”与三兵卫说。“他想去看看你们在海底干了些什么。”

潜水员们面面相觑。看来他们全都要完了。绝不能让这个宪兵活着回到海面。但是，这样他们也要被处死。敌人绝不会接受使宪兵致死的任何理由。

这个宪兵戴上了一顶潜水帽，开始潜下水去。西茨照看救生索，巴顿照料着空气软管。当宪兵潜入海底时，西茨设法要把他头上的潜水帽扯开。

宪兵抓住了下水的绳索，开始下去。但在下去只有几英尺之后，他重新开始上来！潜水帽也脱掉了，他同与三兵卫紧紧挤在一起。

“宪兵患了幽闭恐怖症，”与三兵卫向潜水员们解释着。“他受不了这顶潜水帽的压力。他得出的结论是，你们在海底没有做什么错事，否则你们就不会提供合作，把他送下海去。”

潜水工作一直继续到秋末。那时，对日本人来说已很清楚，白银是来自卡巴罗海湾。但是，他们绝不愿承认（即使对他们自己也是这样），这些白银是被美国潜水员偷去的。因为那些美国人是绝不可能瞒过宪兵的耳目而取得白银的啊！

秘密警察现在正式报告说，所有在市场上流通的这些白银都是人们从那些在台风中被海水冲到岸上的箱子里取出来的。这个

案子就此了结了。为了确保这个案子的圆满结束，他们取消了白银打捞计划。于是，日本人和美国人皆大欢喜，尤其是那些美国人。

这些潜水员被遣送到马尼拉，在海军少校乔治·格·哈利逊领导下的一个队里当装卸小工。正是这个人，以前曾同他们一起工作，把白银倾倒在海底。他们以后足足花了两年时间，同“乔治·格的四百名窃贼”一起，破坏他们所能接触到的食品和战争资源等货物。许多出港的船只，故意使它们超载，预计遇到暴风雨的天气就会倾覆，或者在船身上撞它几个大窟窿。这些货船以后就无影无踪，再也没有人听说什么了。

所有这些人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了。只有乔治·乔普切克1944年在登上一艘战俘船去日本的途中，死于非命。

至于海底的白银，美国海军在战后总共打捞起了二百五十万美元，然后就停止了打捞。这些箱子由于海水的腐蚀和美国战俘的故意破坏而变得更加支离破碎了。打捞工作所需的经费，甚至要比白银本身的价值更加昂贵。

1947年两个美国人从菲律宾政府那里得到一张打捞合同，他们也只能打捞起了二十五万美元的白银。

超过四百万美元的白银迄今仍躺在卡巴罗湾的海底，长年累月地被潮流和风暴冲击得七零八落，并埋在那里。——也许将永远地埋在那里了。这正是曾为保存这些白银作出一切努力的美国海军人员的一座永恒的水下纪念碑。

微 点

埃德加·胡佛

1940年1月初的一个清晨，当一艘轮船进入纽约港的时候，有

一个旅行者倚立在船栏旁，领港员同港口的一些常见的官员一起刚刚走上船来。趁无人在场之际，刚刚上船的人员中有一位向栏杆边的那个人细声耳语说：“你的名字将是斯·脱·蒋金斯。我们一上岸，你就去贝尔伐旅馆。在你的房间里等着！”

那一天傍晚，在等候了几小时之后，蒋金斯听见开锁的声音。通向隔壁套房的门静悄悄地打开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两个特工人员走了进去。蒋金斯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名雇员，他同那两个特工人员握手，接着就陷入了对一份令人困惑不安的报告的研究。

我们的一个秘密谍报人员报告说：“我曾是在汉堡克劳普斯托克大厦里纳粹间谍学校的一个学生。两个星期以前，我的这个班毕业了。在欢送的仪式上，校长雨果·西伯尔德博士发表讲话说：‘元首在北美洲和南美洲的耳目所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同我们保持联系。美国人给我们造成了很大困难。但不久我们就要在全世界畅通无阻地互通讯息，而不致遭受险阻。现在，我不能给你们解释传递讯息的方法，但请你们注意发现微点——许许多多的小黑点！’我奉命被派到美洲来——除此以外，就再也没有告诉我什么了。”

直到那个时候为止，我们一直利用经常破获敌人传递信息的新技术，使德国和日本的间谍陷入困境。我们识破了他们的信使，发现了他们投递邮件的地方，破了他们的密电码，并解开了他们用显隐墨水书写的密件。我们还追踪发现了他们隐藏的电台，有时候这些电台正在为敌人工作。有一次，我们从一个间谍的口袋里拿到一盒安全火柴。其中四根看上去同其它火柴一模一样，而实际上是小铅笔，写出字来肉眼看不见，事后用一种稀有药物溶剂，就显现出来。我们所揭露的儿童故事书所玩弄的花招，里面有许多用缩微胶卷照的信件卷在一个软片轴里，然后用丝线加以覆盖，其它缩微信件则被缝在杂志的背脊；有一卷缩微胶片被折藏在一支自来水笔的吸墨水管的里面，必须折断吸墨水管才能取出这

份便笺。

我们侦察到了所有这些装置,以及其他更多的东西。但是,关于“许多小黑点”,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的第一个步骤,是把一个年青的物理学家从我们的实验室里请出来,他曾在彩色缩影照像方面作出过出色的成就。他被指派去做某种实验——根据我们办公室里对西伯尔德吹嘘内容的各种猜测。同时,每一个特工人员都去拼命搜索迄今尚未侦察到的小黑点传递机密的证据。

1941年8月的一天,我们遇到了一个年轻的旅行者,刚从巴尔干半岛抵达美国。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百万富翁的纨绔子弟。有理由可以相信,他是一个德国的间谍。我们非常仔细地检查了他的东西,从牙刷一直到鞋子。当一个实验室特工人员正在拿起一张信封时,光线正好倾斜成一个斜角,掠过信封的表面,他突然看到了一闪微光。一个小点反射了光线。一个微点——在信封正面有一个“句点”符号——一个黑色的微粒,并不比蝇尿污点更大一些。

这个特工人员小心翼翼地用针尖触动这里圆圈的框框,将它撬开,使之松动。这有点象是从外面用力把它附着到纸纤维里去的某种异样物质,看起来象是打字机打上去的句点符号。在显微镜下,它被放大二百倍。这样,我们就能见到,这是一封完整的打字信件在底片上的映像,是一封令人不寒而栗的间谍信,其全文如下:

有理由可以相信,利用原子核能的科学工作正在美国沿着一定的方向加速进行着,部分地是使用钷。关于进行这个项目的试验的情报需要连续不断地送来。尤其是关于以下几点:

1. 在美国,运输重铀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办法?
2. 铀的试验是在哪里进行的(大学、工业实验室,等等)?

3. 还有什么其它原料被用来进行这些实验？这方面工作只能委托给最优秀的专家。

这就真相大白了：德国间谍机关已经发明了一种照相术，可以把一件完整的书信缩成蚂蚁般大小。这个微点真是难以置信的精巧而有效。它完完全全地伪装成一个打字打上去的或者是铅印的黑点。举例说，这个巴尔干的间谍在他的口袋里有四张空白的电报纸，上面就有微缩了的“小人国”间谍命令，看上去都象是句点符号，在四张纸上共有十一个小黑点。我们发现一个细微的底片窄条粘贴在邮票的下面，它带有整整二十五页打字信件的形象。

在审讯之下，那个巴尔干的纨绔子弟倒是彬彬有礼而且是和蔼的。看到我们已经知道了关于微点的秘密，他就开始随便地谈了起来。

他曾在查普教授的指导下，在德累斯顿高等技校念书，这个教授就是微点技术的发明者。间谍的信息首先在四方的纸片上打字，然后用高度精确的微型照相机摄影。初步被缩到大概象邮票那样大小，然后再摄影，这次是经过颠倒了显微镜，极度微小的影像就留在一块涂着厚厚一层秘制乳胶的玻璃片上。冲洗了的底片又被涂上一层醇精火棉胶（珂罗碘，粘性极强的化学剂），这样，乳胶就能从玻璃片上完整地脱落下来。技术人员于是使用一种皮下注射针，经过奇特改装，把针尖剪断，把它的圆边磨尖。这根针对准微点，就象一个面包师的切割杯那样，把一团做点心的生面团给挤压出来。微点就这样被取出来了。

下一步，在信纸上安置小黑点的地方，用针把纸张非常轻巧地划了几下。注射器的注塞把这微点压进纸张的纤维中去。另一个非常小的针头又把起毛的纸张纤维重新压到微点上，最后用极少量的醇精火棉胶使纸张的纤维紧紧地贴住。为了阅读这些密件，纳粹的间谍需要随身带一架折叠式的显微镜。

我们能够发现和截获成百封微点信息。通过经常不断对微点的严密审察，我们日益看清各种不同集团日常活动的情况。他们猖獗地干着罪恶活动，探听关于巴拿马运河的船只来往情况、关于某个水闸发生裂缝的情况，以及珍珠港遭到袭击时，我们的石油储藏被破坏的程度等等的情报。从柏林传来了越来越多的紧急要求。在一个间谍身上，我们发现了已被揉成一团的一家旅馆电话总机备忘表格上看来是无害的电话留言。但在那张表格的印刷字体中包括两个句点符号，当这些句点放大时，它们却包括了几封信件，其中一封信的内容如下：

特别命令：据称，美国正在制造一种火药——几乎无烟，只有微弱之枪口火花。望告细节：枪口火花颜色，烟之颜色。如可能，告知火药成份。

日本人同样玩弄这种微点的把戏。1942年2月12日，一系列的微点信息中的第九十号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它被嵌在一封信的信封里，这封信在巴西投邮，经由东京转给日本驻南美洲的一个海军武官。

许多间谍落网，许多间谍集团的巢穴被清除，就是因为我们掌握了微点的秘密。有一天，一份电讯偶然提到了马德里市的一位妇女居民的名字。我们对大量相互关联的档案进行查究，结果发现若干年以前，她曾电汇金钱给住在美国的一个男人。我们发现这个年青人在华盛顿无业游荡，并且一度曾对一位美国姑娘大献殷勤。后来她参加了美军妇女队，现正在太平洋海岸。象往常那样，军队总是合作的，他们命令这个年青妇女队成员去华盛顿。当她抵达十五分钟之后，就到了联邦调查局的办事处。

她熟悉这个年青人到什么程度？他曾有一度对她大献殷勤，但他的局促不安和鬼鬼祟祟的样子使她厌恶，最后她断绝了同他

的一切通讯。我们把问题坦率地向她提了出来。我们所需要的是找到一条通向 he 内心深处的渠道。作为美国军队的一名士兵，她是否愿意试着去判断一下他是不是一个敌人。

事情是这样设计的：她在街上偶然地同她的爱慕者相遇。鱼儿上了钩，他为能再见到她而非常兴奋。下一个月内，这个美国妇女队成员出色地当了套取情报的情妇。不久，这个间谍就被关进监狱，因为他向她泄漏了间谍活动的秘密。他的自负深信，她是深深爱着他，以致完全能够成为他的同党。

通过发现微点而破获的最重要的案子是在南美洲的国家，在那里我们正搜查各种人所写的信件，尤其是寄往柏林的每一封带有微点的信件。爱情书信、家信、商业往来函电等，一切似乎都是无害的，但他们的嵌着微点的讯息却与炸毁在南美海岸被俘的轴心国船只和战争工业的详情有关。这些信是用不同的笔迹，或者用不同的打字机打出来的，但这些秘密附着的微点，都是在同一个机器上被制成的，签名也都是出于同一个手笔。由此可见，一切都是由一个单一的机构准备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从南美洲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商店、办公室和家庭，南美当局在我们的特工人员帮助下，抓住了纳粹间谍的一个规模巨大的、具有相互连锁关系的间谍网，他们都是美国的敌人。

因为我们从安插在西伯尔德博士的鼻子底下的反间谍人员那里，得到了关于微点的情报，所以我们成功地阻止了纳粹间谍的许多阴谋诡计。上述这些，只不过是若干典型的事例而已。

胡爱的悄悄之战

托马斯·姆·约翰逊

一个小个儿的菲律宾女人，微弯的背上背着一只皮囊，拖着沉

重的步伐走着，穿过马尼拉以北的战场。几个日本士兵开始盘问她。有的日本兵一看到她那臃肿和伤痕斑斑的棕色脸庞，立即就会明白并且退缩了回来。面对其他的士兵，她袒胸露臂，出示她身上的伤痛。只要她说出一个字：“麻疯”，就没有任何哨兵再坚持纠缠，就没有人检查她的背囊，没有人发现用胶布贴在她背上的却是一张日本人在马尼拉北部设防的地图。

这幅地图准确地指出了布雷区的位置，这是正在前进中的美国军队所迫切需要知道的。在疾病的剧烈折磨下，胡爱·葵雷罗顺利送递了这张图，从而拯救了成百上千的美国人的生命，这仅仅是她为我们在菲律宾战场上的胜利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之一。

在战时最聪明、最勇敢的女间谍中间，胡爱被美国政府授以银棕榈自由勋章，这是对一个公民战时服务的最高奖赏。这就使她有可能去路易斯安那州的卡维尔，那里在治疗汉森氏病^①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胡爱·葵雷罗曾经想出家当一名修女，但她患了肺结核，而修女们说，她体弱多病，恐怕受不了她们的清苦生活。她的双亲去世后，她的祖母把这个孩子带到她所经营的可可种植园去，并且使她恢复了健康。

后来，胡爱到马尼拉去同她的一个叔叔一起生活。雷那托·马利亚·葵雷罗博士同这个活泼的姑娘恋爱，他们结了婚，对未来抱有灿烂的理想。但是，1941年冬天，当她的女儿辛西亚刚满两岁，胡爱就开始感到体力不支和食欲不振，全身出现了肿块。她的焦虑不安的丈夫请来了一位在美国训练过的专家。他尽可能委婉地告诉了她关于病情的真相。“这是在初期阶段，”他说，“你只有二十三岁，而且现在又有良好的治疗方法。但是孩子是最易感染的，

^① 即指麻疯病。——译者

所以你必须离开你的孩子。”她坐在医生的办公室里，足足有几个小时，祈祷上苍赐予她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所需要的非凡的自制能力。她回到家里。孩子在育儿室里玩耍。这简直象是死亡一样。当胡爱把她的孩子送到她祖母那里去的时候，她甚至不敢向女儿辛西亚吻别。

丈夫和妻子开始计划他们如何同疾病和遭受歧视而进行斗争。关于麻疯病患者走在马尼拉街头时必须摇铃的规定，实行的时间还不太久。专家们告诉他们，现在人们认为汉森氏病在成年人中间只有很小的传染性，而胡爱对别人更是不构成威胁的。但她确实需要良好的药物治疗和休息。

但药物和休息，她什么也没有得到。三星期之后，珍珠港袭击事件发生了。不久，日本士兵大摇大摆地走在马尼拉的街头。有一天，五个日本兵在大街上勒令胡爱和其他四个年轻的菲律宾妇女停步，并且明确地表示了他们的邪恶企图。胡爱，这个只有五英尺高、一百磅体重的遭受污辱的弱女子，举起她的阳伞，狠揍那个个头最大的日本兵，直到他和他的同伙离开为止。那天夜里，其他几个妇女中的一个打电话给胡爱。“到我们的家里来吧，”她说了一句，就挂断了电话。

她的朋友的丈夫迎候着胡爱。“象你具有这种精神的妇女应当参加游击队，”他说，“你正是我们秘密工作所需要的人。”他告诉她，菲律宾人的地下组织正在把关于日本人的情报送给在澳大利亚的麦克阿瑟，从而有助于他们策划菲律宾群岛的解放。她愿意参加他们的行列吗？“我可干不了什么大事，”胡爱说，“但小小的帮助也有用。行，我参加！”

他们给了胡爱一次试验性的任务。“你住在一座日本兵营的对面，因此，在以后的二十四小时之内，请统计一下有多少日本人进出这座兵营，是从什么时候、什么方向来的。对来往的车辆也作

同样的统计。”

在垂下的百叶窗背后，胡爱注视了从营房前经过的每一件事物以及经过的时间。她不仅统计了卡车装载的日本兵的数字，而且还观察到他们外形很脏，好象是刚参加了战斗行动。她带着一本记得满满的笔记本到指定的地点去。在那里，她在一份表示保持秘密和忠诚的宣誓书上签了字。她正式登记，参加了她称之为“我的悄悄之战”。她为特殊任务而跋涉奔忙持续了整整三个神经紧张的年头。

胡爱被指派去监视滨海地区。她的锐利的眼光在那里发现了隐蔽起来的日本高射炮群。她画了一幅速写，并把它藏在她所带的篮子里的一只挖空了的水果里面。一个日本兵止住了她，乱摸水果，并贪婪地挑了一个大水果，扬长而去。还算幸运，她把速写放在一个小的水果里面。自此以后，她只把见闻记在心里，等回到家里再画出来。

胡爱是一群被允许带食品给饥饿的菲律宾人和美国战俘的姑娘之一。她使那些眼窝已经深陷进去的美国兵感受到勇气和忠诚，他们中间有些人把他们一点一滴地从多嘴的日本警卫那里搜集到的情报给了她。有一次，一个起疑心的警卫用刺刀威胁她，最后用手势让她走，又在她背后把她的黑头发的辫子扯动了一下。她的发带里正藏着一份战俘的报告，但由于系得很紧，很难脱落下来。

1944年9月，正在逼近的美国人轰炸马尼拉，以摧毁胡爱曾为他们在地图上标出的高射炮阵地。日本反谍报的警察到处都有密探，许多游击队战士被抓住、受酷刑或者被枪杀。地下的行动现在改由盟国情报局来指挥。在另一次秘密电话联系之后，胡爱会见了马纽埃尔·柯雷可，他以前是山多·汤麦斯大学的一位教授，而今是情报机关的一名上尉。胡爱愿意参加这个盟国情报局吗？这

可能意味着她有生命之虞，但是……

“我能做些什么呢？”她问道。

他告诉她在城市郊区的一个约定地点去和一辆卡车会合。她穿着一双鞋底凹进去的木鞋，鞋底里藏着小卷薄纸，里面就是有关日本人为防御马尼拉而作准备的情报。卡车带着她在去那格卡伦崎岖不平的路上行驶了五十英里。在那里，有一个向导把他们引上一条狭窄的小径。一块大石头挡在路上，而不知从哪里传来了向他们叱喝的声音。胡爱说了通行口令。灯光从上面的树梢向她的眼前闪烁，然后一霎而过。向导掀开一块大石头，就好像它是装在绞链上似的。他们穿了过去，发现自己进入了森林中的一片空地，那里大约有一百名菲律宾游击队生活在棕榈叶盖成的营房里。胡爱看着他们架设起了一个无线电装置，并把她传递的讯息转发出去。

她变成了“只是一个跑腿的童仆”。通过不同的路线，她把报告、地图和照片带到游击队隐蔽的地方。也正是在游击队的兵营里，她听到了无线电中传来的这个振奋的消息：“美国人正在吕宋岛登陆！”

游击队用偷运进去的油印机印刷传单：“解放临近了！”同时加上紧急呼吁，要求支援。胡爱带着这些传单到了马尼拉。她和其他志愿人员在灯火管制的一片黑暗中穿梭移动，把传单递进家家户户的大门或送到过路行人的手中。

接着，她被派去侦察日本人的军火贮存站。有一天夜里，她在家里听到了一声敲门的暗号，立即迎进来一个身穿日本制服的男人，他交给她看样子好象是一口袋的蔬菜。“这里有一些给葵雷罗博士的东西，”他匆忙地低声说了一句，然后就从屋子里溜走了。她的丈夫也是地下组织成员，他收下了这袋“蔬菜”，一句话也没说。此后，许多个夜晚，敌人军火贮存站接连地象雷鸣一样地爆炸。大

白天，胡爱就侦察那些需要更多“蔬菜治疗”的军火贮存站。

但是不久，柯雷可捎话来，需要她再从事信使的工作，所以胡爱又回到了那格卡伦。她指望高山的空气会使她的日见衰弱的身体重新焕发活力。由于缺乏食品和药物，她更经常地发烧，弄得精疲力竭。她忍受着剧烈的头疼，她的双脚肿胀，身上出现了更多的疮伤。当然，她祈祷着上帝和将要返回马尼拉的美国人给她带来帮助。

1945年初，当美国军队逼近马尼拉的时候，柯雷可召她去，交给她一项最危险的任务。游击队曾送给美军一张日军防御地图，地图上标明着一条比较宽阔的无雷地带。美军计划要在那里发动攻击，但是现在，日军在那个地带布满了地雷。因此，一张详细而准确的地图必须送到马尼拉以北四十英里卡伦比特地方的美军第三十师的总部。一路上战斗正在进行。日本军队严守着每一条大路和每一条小道，搜查每一个行人。车辆更不能通过。但是，一个小个儿衣衫褴褛而又勇敢的妇女步行过去，有可能通过。胡爱愿意试一下吗？“只需告诉我上哪儿去！”胡爱回答说。

最初，她趁着夜间走路，但没有睡眠使她更加衰弱，头疼变得更厉害了。她决定试着在白天赶路。第一天，一个日本军官止住了她，走过来似乎要搜查她。这张用胶布贴在她双肩之间的地图，似乎要烧灼起来。当这个军官走近她身边，他盯着她的脸看。这张脸浮肿而长着点点红斑。他恐惧地凝视着她，然后很快地挥手要她走开。胡爱知道，她有一张可怕的能够帮助她安全通过的通行证。

在两昼夜的长途跋涉之后，她到达了美军总部，递送了这张地图。由于病痛和长途劳累而体力不支，她吃不下去美国人为她准备的薄煎饼和咖啡，虽然她已有好几年没有尝到这些食物了。

在归途中，她穿过了枪林弹雨的战斗地带。当她一到达马尼

拉，就获悉马纽埃尔·柯雷可在最近几天的战斗中受了致命的重伤。她到医院里去看望他，他躺在那里，已奄奄一息。他挣扎着抬起他那被剧痛撕裂着的身子。“你干得出色啊！”他只说了一句，表示了最后的敬意。

胡爱转到一家疏散的医院里去看护病人，但她的病情由于过度的工作而恶化了。她的病变得很严重，医院当局通知她必须去塔拉——菲律宾政府举办的麻疯病院所在地。到了那里她才发现，原来是荒凉的原野上一簇四壁裂缝的棚屋。食物很少，更谈不上药物治疗。

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塔拉麻疯病院突然涌进了六百个以上的病人。这对胡爱来说是太多太多了。她曾经试图为这个地方建立一点秩序和卫生设备。于是，她向前总统的女儿阿露拉·奎松发出呼吁。马尼拉报纸对实情的详尽揭露，终于产生了效果，建了新的楼房、一所实验室、一个手术间，还有更多的医师和护士，更重要的是，硫酰类药剂的供应增多了。

通过了解胡爱工作的朋友们的说情，首席检察官答应了胡爱的请求，她可以到卡维尔治疗。在那里，病人们用花束和生日蛋糕向她致敬。他们看到一个弱女子，她的棕色脸庞斑痕累累而且苍白，但她的有神的眼睛仍然在微笑。弗莱德力克·约哈生大夫——人们亲昵地称之为著名的“约大夫”——开始每天为她注射硫酰药剂，以及做其它的治疗，她的健康开始好转。她的疮肿治好了，她的脸上焕发出了光辉，她变成了人们赞美卡维尔治疗中心的照料和精湛医术的典型病例。她紧紧地握住许多来访者的手，并且以她的热诚的语言向他们致意。“我从心底里感到幸福，”她告诉他们。

从卡维尔出院后，她在加利福尼亚安了家。她说：“我的一生就是一部巨大的惊险故事。”

搜捕一名间谍

卡尔·华尔

这是一个真实的间谍故事，其中并没有什么假胡须，没有斗篷和短剑^①。

这里也没有美丽的玛塔·哈莉^②，没有悬岩削壁边沿上的格斗，更没有放过一枪一弹。但这个案件却是联邦调查局历史上最引人入胜的故事之一。这是搜捕一个不知姓名、消失在纽约市八百万市民的激流漩涡之中的一名间谍。

1942年2月20日的夜晚，一个警觉的邮件检查员，审视着一封寄往葡萄牙的邮件，并从一个航空信封里抽出一张打字纸页来。表面上看，它没有什么危害性——无非是一位先生写给他的一位老朋友的那种信件。但是，邮件的地址却是国外反谍报人员所开列的作为给德国间谍“投邮”地址中的一个。

几小时之后，在华盛顿联邦调查局的实验室里，一个研究密写墨水的专家，用一块浸透化学药剂的海绵轻擦信纸边上的空白。在这空白的纸上，渐渐地显出了密写的字迹，一种扭扭曲曲奇特的德文手写印刷体的象形文字。这个讯息传递了在纽约港内组成护航船队的军舰和货船的情报。这样的情报如果落入敌人之手，将会对士兵和海员的生命以及数以吨计的贵重物资构成极为严重的威胁。

这个间谍，必须捉住他。但是实验室只提供了一个简单的线索。这封伪造的信件是在一架“安德伍德”牌三排键的手提式的打

① 斗篷和短剑系指描写间谍或密探的作品和戏剧。——译者

② 玛塔·哈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名的德国女间谍（荷兰人），以舞蹈演员为掩护盗取大量军事情报，1917年为法国当局逮捕，判罪处决。——译者

字机上打出来的。特工人员开始了一项大海捞针的工作，那就是检查纽约地区打字机的出售和租借情况。

在以后的十天之内，出现了第二封信，接着又是第三封信，都是从纽约的邮政局投寄的。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间谍住在纽约呢？那么，他长得什么样？按常情，当警察搜捕一个罪犯时，他们总有一些有关罪犯的描述作为依据。然而，联邦调查局这次却什么也没有。

一天夜晚，一个特工专业人员正琢磨着这些原信的影印复制件时，忽然被一个事实所吸引，即这张信纸上的打字部分的某些段落有着奇特的真实性气息。当然，他知道，其中大部分纯系作者的虚构，但关于一些无关宏旨的日常琐事，这个间谍可能写下了真实的情节。怀着兴奋的心情，这个特工专业人员匆匆地摘录了看来是真实的东西。

X 已婚。他拥有自己的房子。他有一只狗，曾患瘟热病。他有一个职业。每星期的工作日，他总是在早晨七点和八点之间离开他的家。他最近曾换了一付眼镜。他又是一个空袭民防人员。

在大纽约市总共有九万八千三百三十八个空袭民防人员。特工负责人听到这个想法时，不禁咧嘴笑了。“民防人员的人数可不少，但比起芸芸众生八百万人来总要好办得多吧！我们至少取得了可以搭上一个脚尖立足点。”

联邦调查局以顽强的毅力开始了审查每一个民防人员的艰巨的工作。他们中间多少人已婚，多少人拥有自己的住宅？多少人养狗？谁是戴眼镜的？由于更多的信件被截获，X 的形象开始显现出来。这些项目增补到开列的清单上去：他有一个蔬菜园子；他的家正遭到取消赎回抵押品权利的威胁；他希望拥有一个养鸡场，等等。

那个无形间谍的影子，仍然飘忽不定，但他无需再从成百万人

中去鉴别了。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不分昼夜的工作，使这个数字一步步缩减了下来：九万八千人……八万八千人……八万一千人。但即使八万一千人，也是太多了。

4月14日的夜间，第十二封信被截获了。检查员从这封信里摘取了这样一段显然是内容无害而且表示怀乡的文字：“这里已是十分暖和了，树上的蓓蕾正含苞欲放。春天总是使我回忆起我们在埃斯托利尔海滩上度过的那些美好的星期……”埃斯托利尔！联邦调查局知道埃斯托利尔，这是在里斯本郊外几英里的海滨避暑胜地，是德国间谍接头的地方。

于是，开了一个仓促的会议，讨论了用什么最好的办法来查一下从1941年春天以来从里斯本进入美国的每一个美国公民和外国人。手头并没有相片可以同护照上的相片对照。也没有指印，没有姓名。这时，有一个特工人员高声说道：“有了。我们有X亲笔签名的一个非常好的标本——信上的签字——弗莱德·刘易斯，这个名字是伪造的，但伪装你的笔迹几乎是同改变你的指纹一样困难。”

“每一个进入美国的人，”他继续说，“必须填写海关的行李申报单。为什么我们的人不能到纽约的海关办事处去查阅卷宗，把申报单上的字迹同弗莱德·刘易斯的签名对照一下呢？”次日早晨，联邦调查局的手迹专家带着我们要搜捕的间谍签名的影印复制件，开始了查阅成千上万件海关申报单的工作。1941年春天，是里斯本大量难民外流的高潮。因此，行李申报单上的签名手迹简直是五花八门的大杂烩——波兰文、德文、法文、荷兰文、俄文以至立陶宛文……

字迹专家的工作是一项准确的科学。在一个“e”字母上的一点点扭曲，或者在“l”这个字母上带个环，都会提供研究的线索。每一张申报单都要经过缜密的过细的观察。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专

家们对堆积如山的卷宗进行了核查。

1943年6月9日，夜晚9点钟，一个特工专业人员从纽约海关办事处的卷宗堆里抽出了又一张申报单，即已经查阅过的第四千八百八十一张。突然间，当他注意到报单底部的签名时，他的厌倦情绪顿时消失了。他把这张申报单置于放大镜下。是的，正是完全相同的带环的“e”，同样倾斜的“f”和完全一样的斜写的“s”。这个专家不禁叫出声来，使他的同事们吃了一惊。

那天夜晚，在华盛顿的实验室里，这个签名被拍了照，字迹被放大，并且同间谍信上的签名进行了比较。现在专家们对此完全肯定了。午夜1点45分，联邦调查局的纽约办事处的电话铃响了：“核查人名：欧纳斯特·弗·莱密兹。”查阅了空袭民防人员的名单，名单上确有莱密兹这个名字，住在纽约斯塔顿岛上汤金斯维尔的牛津地方123号。

不到一小时之后，几个特工专业人员从曼哈顿到斯塔顿岛的渡船跳板上走了下来。联邦调查局人员通宵达旦地监视着这所在牛津地方的房子。到了清晨7时15分，一个高个儿的瘦削的男人，戴着一副眼镜，从门里走了出来。一个联邦调查局人员随随便便地沿着大街跟踪着他。离开住所不远的地方，那个可疑分子转身进入了一家餐厅。

尽管是在清晨的时光，这家餐厅挤满了海滨的工人、士兵、水手。特工人员也走了进去。他跟踪的那个人穿着一件肮脏的围裙，正在那里擦洗地板。他看上去大约有五十五岁，有一对温驯的眼睛和纤细的棕色头发。你绝不会看上他两眼，因为他不过象一只麻雀和天下的麻雀一模一样。

在餐厅里，人们谈论着船运的货物、船只的调动以及航行的日期等。特工人员喝了一杯咖啡，就跑出去了。

以后的十六个昼夜，这个间谍继续被跟踪尾随。特工人员伪

装成推销员和多嘴多舌的酒吧间游手好闲之徒，他们发现一个又一个说长道短的事情。所谓说长道短，就是那里的人们以那个间谍信件所涉及的内容作为聊天的笑料。邻座的人们都喜欢这样谈论。

“欧尼(欧纳斯特)?当然，我知道欧尼。他是本街区的一个民防队员，你大概听到过他大声嚷着，叫居民出来，不要有一点微弱的光亮。欧尼认真地对待战争。”

“欧尼?一个好心肠的人。他有一只狗，去年夏天得了瘟热病死掉了，你大概会以为他失去了他的最好的朋友。”

“欧尼·莱密兹?他在这个岛上拥有一片最好的菜园子。”

“银行撤销了他赎回抵押品的权利，这太糟了。”

“我当然知道他。他常常在这里歇一歇，在回家的路上喝上一杯啤酒。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他总是谈论关于养鸡场的事情，这些日子里他正要买进一个鸡场。”

绞索渐渐地套紧了。1943年6月27日早晨8点钟，在第一封间谍信被截获的一年四个月零七天之后，莱密兹被带到了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室。所有这些信件都放在他的面前，这样大量的证据都是如此艰辛地积累起来的。大量事实象山崩一样，他只得在一份完整的招供书上签字画押。

他第一次抵达美国是在1908年，在德国驻纽约领事馆充当办事员。他曾几次返回德国。最后一次是在1938年，被纳粹间谍系统所征募，并受过书写显影墨水和从事间谍活动的各种秘密手法的训练。他奉命于1941年春天回到美国，找到了一个固定的职业，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良好的公民，这样就使自己淹没在成百万的居民之中。

在他的招供中，莱密兹还牵连到了另外一个间谍欧文·哈利·第斯普莱脱。这些间谍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时间谍法规受

到审讯，均被判处三十年的有期徒刑。

从莱密兹被捕几星期以后所发生的事情中可以看出，他是如何出色地混迹于普通人之中的。他的斯塔顿岛上许多邻居都来对莱密兹太太表示他们的同情。其中有一位妇女，她有一个儿子正在服役，她说，“不可能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的。为什么呢？欧尼·莱密兹是连一只跳蚤都不会去伤害的啊。”但是，对于联邦调查局来说，捉住这个溜肩膀的、举止温文尔雅的间谍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桩最最枯燥而令人厌烦的工作。捕捉一个戏剧性的、披斗篷佩短剑的间谍是比较容易的事。一个乘地下铁、穿着橡皮套鞋的间谍也可能并不那么富有迷人的魅力，但是，捕捉本文所述的那个人却要难上一千倍。

地下的“牧羊人”

乔治·肯特

法国东部的一条铁路旁轨上，停着一列货运车。一位法国红十字会的女工作人员，听到从这列货运车里传出一阵奇怪的、抑压住的号哭声，酷似收音机的声音透过隔墙传过来一样。她沿着列车走去，谛听着，忽然使她恐惧万状，她发现了在一辆运货车里，许多小孩子在尖厉地哭喊着。她叫来了车站上的人员，他们设法把车门打开。

有八十个犹太儿童拥挤在那辆货运车里，他们在恐怖中紧紧相依。他们被巴黎的纳粹分子扔上了车，只给了两片面包、一壶水和一点奶酪。他们被锁在车里已有十八个小时，列车慢速前进，向德意志帝国驶去。四个儿童已经死去。伙伴的尸体，车厢内黑暗无光，对不可知的未来的害怕，使这些孩子们变得歇斯底里。其中几个孩子已经暂时地陷于精神错乱了。

这些孩子们大概是再也见不到他们的双亲了，即使假定他们的父母能够死里逃生的话。纳粹分子取走了他们手上戴的刻有其出身家世的手镯，而大多数孩子因为太小，连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有一个小女孩只清楚地记得她住在十六号，但不记得街名。然而，这些孩子们还是幸运的，他们被偷偷运走，藏匿了起来。而纳粹在法国抓到的一万五千名犹太儿童大多数都被装运到德国，他们并不如此幸运。许多孩子在毒气室里被处死了。

我的故事是专谈那些没有被纳粹抓到手的犹太小孩子。总共有一万二千以上或更多一些的孩子，从婴儿到十五、六岁大大咧咧的小伙子，其中四千人被偷偷地送过瑞士和西班牙的边境；八千人在纳粹的鼻子底下仍然活着，而且安然无恙。

这项工作的领导人是两个天主教神父和一个基督教新教的牧师：查伊莱特和杜伏神父以及保罗·凡加拉牧师。查伊莱特神父是一个带神经质的人，脸色苍白，眼带倦意，象个学者的样子，他每天工作十四到十六小时。而杜伏神父则象是坎特伯里故事^①中的人物，一个满面红光的大汉，蓄着扇形胡须。凡加拉牧师，他的职称同长老会的长老相似，小小的个儿，象神话故事中的小地精一样，一头蓬松的灰发，还有一对高高的颧骨。

这三个人使一个连锁组织完善起来，这个组织唯一的目的就是从纳粹手中拯救犹太小孩子。查伊莱特神父一个人就设法使四千多个孩子获得安全；杜伏神父藏了一千名小孩。凡加拉在另外一个新教牧师帮助下，藏起来的小孩达到第六个一千人。其余的犹太孩子则由普通老百姓照料着，他们为对儿童的爱心和对纳粹的憎恨所激励。

一位著名的医生大力帮助他犹太小孩子带进他的医院，为

^① 英国十四世纪名诗人乔叟著作。——译者

他们制作假病历和发烧登记表。他又发明了一种化学合成剂，可以把孩子们食品卡上的“犹太人”字样洗掉，而这种红印章字迹用别的消除剂是无法抹去的。一个由十个中年妇女（五个新教徒、五个天主教徒）组成的委员会，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设法拯救三百五十八个儿童。帮助拯救这些孩子的男人和妇女成百地被捕了，其中有些人已被杀害了。

查伊莱特神父，一个耶稣会的会员，是这个博爱工作中的杰出人物。在1940年停战以后，他开始举办了一家战斗的自由周报，名为《基督徒见证》，它对地下工作的人们具有相当的影响，特别是在青年男女们中间。他们时常进出查伊莱特神父的办事处。

1942年初，维希政府抓了几千名犹太人，用船把他们送往德国。在里昂——神父住过的地方，被驱逐出境的男人和妇女被迫离开他们的孩子，一共有一百二十个孩子被留了下来。查伊莱特神父开始搜罗这些孩子们。他在地窖里发现了四个孩子，浑身颤抖，处于半饥饿状态。有一打以上的孩子是从街上捡来的。他在一座营房里带走了被警察抓来的三十个孩子。他有条不紊地把这些儿童安置在纳粹找不到的地方，使他们有可能在战后同他们的家人团聚。一个过去当过侦探的人留下了每个儿童的指纹印。他们的姓名、住址以及辨认的标记都记录在案，一式三份，并隐藏了起来。然后，查伊莱特神父派遣他的年青助手，通常是十八岁到二十岁的姑娘们，骑着她们的自行车到乡间去同农民接触聊天。她们首先要判断这些农民是不是爱国者，是否可以信赖他们照料孤儿，而且他们是否有一头奶牛或奶羊。这些年青的姑娘们在里昂周围半径一百英里的地方，为大多数犹太儿童找到了安全的栖息所。其余的孩子们则被安置在孤儿院和学校。同时，为每一个孩子准备了假证件。

年长一些的主妇、一般的妇女就要冒更大的危险，把孩子们带

到新的家庭里去。对那些幼小的孩子，很难进行布置和预演。有一个小女孩，因为给她起了个新名字，她就哭了起来：“妈妈回来时，怎么能认识我呢？”一个六岁的男孩，父母是荷兰人，讲起法语来带着很重的口音，人们事先告诫他一路上要完全保持沉默。在四个小时的旅程中，这个孩子没有开过口。到达目的地时，他的裤子完全尿湿了。“是你们教我不要作声的，”孩子怪可怜地解释着。

这些犹太儿童进入到法国农民家庭，并同当地的孩子们自由自在地混杂在一起，一同上学，一同玩耍。在这些小小的社会里，新来者的身份并不是什么秘密。可是，其中只有六个孩子被人出卖了。

在查伊莱神父藏匿儿童几个月之后，纳粹又限令里昂市交出二百名犹太人。维希政权的警察局建议把儿童作为这个数字的一部分交出去。查伊莱神父公然违抗当局要搜寻犹太儿童的命令，因此被送进了集中营。在监狱里他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这封信被偷偷送了出去，送到了一万名牧师和传教士手中。它呼吁所有的教会用帮助犹太人的办法，参加到反抗希特勒的斗争中来。

三个月之后，查伊莱神父被释放，他脱去了神父的装束，领导他的组织转入地下。《基督徒见证》作为抵抗运动的一个机关刊物，发行量达到二十万份。查伊莱神父被公认为抵抗运动的一个精神领袖。戴高乐将军指定他为地下组织的所有社会服务活动的头头。

他的行动中心设在格里诺贝尔一条贫民街道的陋室里。正是在这里，他策划了抵抗运动的许多次成功的突然行动，并且设想了一套藏匿犹太孩子的细致复杂的结构方案。随着时间的消逝，他扩展了他的活动范围，直至法国的每一个角落。他的工作人员有几百人之多，其中从充当信使的小男孩到担任护送小孩的五个

伯爵夫人，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1942年7月，纳粹集合了在巴黎的一万三千名犹太人，把他们赶到弗洛德罗姆·迪弗这个大运动场去。几个街区的人们都能听到妇女们为被迫同她们的孩子生离死别而大声尖叫，成千上万的人目睹惨状。这使法国人惶恐惊愕，从而促使他们采取了行动。左邻右舍都来收养孩子，并且千方百计地安抚这些幼小的心灵。

杜伏神父是多明尼教派。他派出修女，她们带回了三十个小孩。到了夜间，他把他们分成三个人一组，分别安置到巴黎朋友们的家里。他们呆在那里，直到在巴黎市以外能为这些孩子找到安身之处。然后，修女们又带回了更多的孩子。这就是杜伏神父工作的开始。对他来说，这是特别危险的事情。战前他在欧洲曾经是一个反犹主义的著名反对派。纳粹分子抄了他的住房，拿走了他的书籍和书信文件。盖世太保一天二十四小时监视着他的寓所。

在7月袭击之后，并不是所有留下来的孩子都转移到了善良人们的手里。盖世太保发现了很多小孩，并把他们投入集中营。孩子们在那里简直象住在冷藏库一样，等待着下一厄运。这些孩子们过去曾生活在温暖的家庭里，而今却住在肮脏、没有洗涤、无人照料的地方，浑身长满了跳蚤和虱子。

有一天，一位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访问了这样一个地方，并向保罗·凡加拉牧师描述了她所见到的一切。这位个子很小的人义愤填膺。在他经营的一家设在巴黎贫民区的福利机构里，他把十二个妇女，其中包括他的妻子集合在一起。她们准备了一张用德文写的指令，说明他们是从盖世太保总部那里来的，要求释放这些孩子们。这是一次危险的计谋，但是它终于成功了。

凡加拉牧师在这所安置犹太难童的房屋的门上漆上了路易·

巴斯德^①的语录：“我们不向一个不幸者询问：你来自哪一个国度，或者属于哪一个宗教？我们对他说：你受苦了，那就足够了。你属于我们，我们将改善你的处境。”那一个夜晚，七十名衣衫褴褛的、受惊害怕的犹太儿童们在这崇高的题词下面，拖着沉重的步子跨进了这所房屋的门槛。第二天，牧师就在查伊莱特神父和杜伏神父的合作之下，开始为这些孩子寻找定居的家园。

后来，盖世太保两次袭击了这所福利机构。他们在第一次袭击中杀害了凡加拉的内兄。由于事先得到了第二次袭击的警告，福利机构的工作人员们纷纷跳出窗口越过邻近的屋顶逃跑。但是，纳粹分子囚禁了凡加拉的妻子和儿子，并施以酷刑，最后把这个孩子驱逐出境。

当解放的时刻来临，躲藏在法国的八千个孩子，大多数仍住在寄养他们的家庭里。大约有一千个孩子被从纳粹死亡营逃出来的亲戚们认领了去，走出了躲藏之所。而其余的则还要等待战争的结束，才能把他们归还给他们的至亲，或者被别人收养起来。

这些都是不幸的孩子们。他们经历了多少辛酸，使他们的年龄和经验极不相称。他们亲眼见到他们的双亲被毒打，被拖走，而他们自己也被人野蛮地虐待。所有这些遭遇，对于孩子的心灵来说，是无法解释清楚的。但是，那些打开家门收养犹太儿童的人们倒是疼爱起他们来了。“唉，是的，如果琼诺特的父母来找了，当然我们得让他走！”一个妇女说道，“但假如他的父母不来找，那么，琼诺特就是我们的，我们自己的孩子。”

孩子们一旦懂得了爱，就不会再茫然无知。当爱再度来亲近他们，他们也会报之以爱。

^① 路易·巴斯德(Loius Pasteur(1822—1895)，法国化学家和细菌学家，近代微生物学的奠基人。——译者

吉罗德将军英勇越狱脱险记

弗雷德里克·C.潘顿

1940年5月19日，德国步兵从法国卡特勒附近丛林中蜂拥而至，包围了法国的一个机关枪阵地。在这个阵地被迫击炮火摧毁之后，德国军官呼吁那些幸存者投降。使这个军官惊讶的是，在这批法军幸存者中间，出现了一个身高六英尺、蓄着灰色胡须、在他的平顶军帽上嵌着五星徽记的将军。这是亨利·霍诺·吉罗德在二十五年之内，第二次成为德国人的战俘。

这对一个在事业上正好达到顶峰的人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耻辱。吉罗德自1898年在圣·西尔军校取得优异成绩以来，一直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军官。但是，当进入战争时，厄运却追随着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时吉罗德还是一名上尉，当他率领一支轻步兵在恰勒罗伊进行刺刀冲锋时受了伤，当作阵亡者被遗弃在战场上。德国人俘获了他，把他投入了比利时的一座监狱。甚至在他的创伤治愈之前，他就设法逃跑。他伪装成一个比利时人，在一个巡回的狂欢旅行表演团找到了工作。当旅行表演团到达了布鲁塞尔，他得到护士爱蒂斯·贾娃尔的帮助，她把他带到了荷兰。他从那里上路到英国去。虽然 he 已受伤致残，但他终于在战争结束之前重又回到法国的团部。

在和平的年代，他在非洲服务，声誉卓著，并担任米兹的总督。他还在军事学校教学，他的学生中的一个就是夏尔·戴高乐上尉。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来了，他在拉翁之前成为盟军的总司令。当德国人突破了阿登纳森林，他冲到前线，去观察和研究如何遏制敌军的这个攻势。这样，在这次侦察中，他在前沿的一个机关枪阵地上被俘虏了。

是的，吉罗德以前曾经逃跑过。但是现在他已六十一岁，逃跑是需要有青春活力的啊！尽管如此，他拒绝保证不作逃跑的尝试。他被押到克尼格斯坦因这个令人望而生畏的要塞，它座落在一百三十英尺高的陡削的悬崖绝壁之上。每一个进口处都布有双岗，而且还设有一个岗哨，每隔十分钟必有卫兵们走过。

吉罗德立即开始了逃跑的计划。他练习德语，直到他能讲德语，而不带任何口音。他得到一张周围乡村的地图，并记下了每一个地形特点。他利用从送给他的包裹解下来的细绳，织编起来，成为一条能够支撑他二百磅体重的粗绳。当发现这条绳还不够结实，他的妻子把一卷一百五十英尺的铜线巧妙地藏在一包食物里送到他手中。当然，他还是被允许写信的，但他的狱卒们并不知道这个曾经被遣返回国过的、有残疾的囚犯向将军的妻子传授了密码。使用这个密码，他以看上去毫无问题的信件形式，一点一滴地把逃跑计划的细节全部传递了出去。这一工作花费了1940年残剩的时间和整个1941年。他的雨衣可以充当老百姓的衣服，他在狱中还弄到了一条普通西装裤。现在，更多的食品包裹不断寄到他的手里。如果德国人搜查一下其中的一个包裹，那么他们还会发现一顶别致的提洛尔式的小帽。

1942年4月17日的早晨，亨利·吉罗德站在阳台上，注视着岗哨哨兵在走动。他带上了一个包裹，里面放着面包、奶酪、糖、白兰地和伪装用的衣服。当哨兵过去的时候，这位将军就把他的土法制成的绳索系到栏杆柱子上。然后，由一个同牢的囚犯把他徐徐放了下去，到达一百三十英尺以下的地面上。

他一瘸一拐地找到几棵大树作为掩护，刮掉了他的胡须，戴上他的提洛尔小帽，穿上他的雨衣。两小时之后，他到达了五英里以外的桑丹地方的一座桥梁。他安详地靠着一座矮墙，从背包里取出他的午餐，大嚼起来。在那里等到1点钟，准确地按计划规定，

一个瘦瘦的年青人，一手提着手提箱，还拿着一顶帽子，漫不经心地走向吉罗德。这是事先安排好的一个信号。这个青年人是他的朋友们派来的。

吉罗德和这个年青人跑到了火车站，搭上正好进站的第一辆列车。他跑进车厢里的盥洗室，在那里吉罗德打开手提箱，找出他自己的巴黎旧日服装。还有身份证件，上面写着一位企业家的名字和一张看上去很象他（只是没有留胡须）的照片以及钱币。几分钟之后，当盥洗室的门打开时，出现了一位庄重的、仪表堂堂的商人。

然后，吉罗德开始执行他的逃跑计划的第二部分。德国人已经发出警报，边境守卫严密地警戒着。

如果他希望避免被捕，唯一的办法是继续在火车上旅行，直到这一阵追捕的喧嚣平静下来。由此，乘坐火车横越德国的历时一星期的逃亡行动开始了。

有一次，在斯图加特附近，盖世太保人员开始搜查列车，对照乘客的身份证件检查每个人的身长，因此，吉罗德的六英尺身高是很难掩饰的。吉罗德看到德国非洲兵团的一个年青上尉，他就坐在他的对面坐了下来。他向这个上尉微笑着，并且提起他也曾在非洲住过很长时间。德国人听了不禁放下他的杂志，为在这里遇到熟悉非洲沙漠的人而感到高兴。他们热烈地谈论着。正当这个时候，盖世太保人员来到他们跟前。吉罗德用他的手比划着，绘声绘色地阐述着他认为隆美尔所以能够打败英国人的一些想法。这个德国上尉凝神地听着，眼睛充满着急切的神情，双手保持着平衡。

盖世太保人员碰了一下吉罗德的肩膀：“先生，请拿出你的证件。”

这个德军上尉，急于要发表他自己的观点，狠狠地盯了盖世太保人员一眼。“走开！你怎么敢来打断我们的谈话？”他接着就发表他的激烈的讲演。

盖世太保人员正如吉罗德所预料的那样，他表示歉意，然后转身离去。

在另一个场合，当这位将军快要上火车的时候，他看见盖世太保人员正在搜查每一个乘客。他就故意在车外闲荡到火车开始移动的时候。其时，吉罗德拼着命向前跑，腿也似乎不跛了。他的眼镜轻微地晃动着，他的双颊鼓了起来，他同慌慌张张的德国商人赶火车的架势完全一样。他叫嚷着说了一通似乎赶上这列火车对他是何等重要的话，他的这种急中生智，使他化险为夷。一个盖世太保人员实际上帮助了这个气喘吁吁的老绅士上了火车。

最后，他越过边境线进入了被占领的法国。他希望能溜过另一条边界线，以进入非占领地区，但发现德国卫兵正喝令每一个身高超过五英尺十一英寸的人停下来进行检查。他又转回来，搭上火车越过德国的东南部到达瑞士边界。那条边境线似乎也同样严密地禁闭着。但有许多山间小径，是不可能完全被监视的。一天夜晚，他突然迈步走上一条人迹罕至的小径。他攀登着，并转辗于峻峭的峰峦之间，突然发现了三个士兵，上了刺刀的来福枪摇晃着挡住了他的去路。然后，一个士兵开口了，说的是瑞士方言。他顿时如释重负，感到了安全。卫兵把他带到巴斯莱，在那里他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德国人对此暴跳如雷，而瑞士人拒绝交出吉罗德。

吉罗德最后决定快速冲向法国的非占领区。他采用了一个老手法，那就是在荒凉的公路上几次更换汽车。而汽车可以通过不同的路线进入法国的非占领区。盖世太保拦住了几辆汽车，但是没有拦住吉罗德乘坐的那一辆。

1914年，当他第一次从德国人手里逃脱并且安全抵达荷兰时，吉罗德打了一个电报给他的妻子，电文如下：

事情办完，极为健康，你亲爱的亨利。

现在这一次，他又给妻子发出同样的电报。

事情办完，极为健康，你亲爱的亨利。

但是，亨利·吉罗德将军却仍不是一个自由的人。他的辉煌的逃脱，使沮丧的法国人民满怀憧憬和希望，他成了一个公众的偶像。而德国人则大丢其脸。在贝当元帅拒绝德国人的要求不肯拘捕吉罗德并把他送还给德国人之后，纳粹就企图暗杀吉罗德。他只好被迫隐藏起来。吉罗德发现他刚从小监狱里逃了出来，却又进入了一个更大的监狱。

然而，历史把亨利·吉罗德从湮没无闻的状态中召唤出来。1942年10月22日，在阿尔及利亚的一所阿拉伯的农场屋子里，陆军中将马克·瓦·克拉克与亲同盟国的法国军官们密商关于同盟军可能占领法属北非的机宜。

在这个会议上，法国军官们提出的论点，就是要选择一位能够把法国许多派系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将领。麦斯特将军说，“我能推荐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吉罗德将军。”

克拉克将军表示异议，“但他在法国实际上是一名囚徒。”

“我们必须把他弄出来——可以使用潜水艇。”

几个夜晚之后，这样一个大胆的方案便付诸实施：一艘潜艇驶抵法国的南部海岸。吉罗德及时地到达北非，从而在英美联军进攻非洲的行动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

在荣获戴高乐十字勋章和军事勋章之后，亨利·霍诺·吉罗德于1949年逝世。他被安葬在巴黎的残废军人宫，在那里，埋葬着拿破仑和法国其他的军事英雄们。

北 极 行 动

H. J. 吉斯克司(纳粹德国在荷兰的反间谍机构头子)

1943年12月，同盟国有一个精心策划的间谍网和一个拥有大

约一千五百名(或者他们相信是这样)破坏者的地下组织,在被德国占领的荷兰活动。但实际上,那个向伦敦发回报告的“地下”电台由德国的操作人员工作了近两年之久。英一荷特工机关通过近两百次空投送到荷兰来的特工人员和大量的武器炸药,均在降落时受到了德国“接收委员会”的接待。五十四名伦敦训练出来的秘密间谍人员被投入监狱,而德国反间谍机构却编造这些英国间谍仍在进行活动的神话故事向英国报告。这是在整个这场“秘密战争”中使同盟国落入圈套的一个最大的骗局。

作为德国秘密军事情报机关的一名少校,我奉命于1941年秋天到海牙去指挥在荷兰的军事反间谍活动。其时,已盛行着同伦敦有地下无线电联系的传闻。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发现敌方的间谍人员,并挫败他们在德国前线的后方进行战争破坏的计划。

我们首次真正的突破是在11月的末尾。我们中间的一个伪装的、钻进了荷兰地下组织的人员报告说,两个英国间谍正要在海牙组织一个新的间谍网。1942年1月,这个报告得到了证实,我们电讯截获机构的海因里奇中尉收听到了一个新的电台广播,使用RLS呼号,是从海牙发播的。

我们经常监听RLS电台,注意着它播送技术的细节。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消灭这个电台装置,而是要“来一个回马枪”,那就是由我们自己来操纵它,伪装成同盟国的间谍。这可以使我们探悉敌人特工活动的内情。

到了3月6日,我们探测方位仪表上的指针指明了RLS电台的位置,当天晚上,我们就抓到了它的操作者。他是一个英国人,名叫H.M.G.劳威尔斯。两个小时之内,我们包围了这个间谍集团的所有的同伙,这样,我们没有留下什么可能危害我们执行“回马枪”计划的破绽。

利用了查抄时所缴获的密码材料和我们潜伏人员的情报,

我们很快地破了劳威尔斯的密电码。但是劳威尔斯拒绝通过电台为我们向伦敦发送假的电讯；由于时机不成熟，我们也不乐于由自己来播发电讯。

3月里的第三个星期天，我跑到劳威尔斯那里，告诉他，为了他自己和他的同伴西基斯免于被德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他可以独自帮助我完成一项计划。我说只要他发出在他被捕当天未能发出的三则电讯就行了。

劳威尔斯似有所动，但仍沉默地坐着。

“作为一个士兵，我对你的勇敢和忠于职守表示尊敬”，我说。“但我憎恶伦敦给予你的工作，因为这牵涉到武装起平民百姓而从背后向我们打枪的问题。任何占领军都要用抓到人质的办法来粉碎这类计划。我将使用我所掌握的一切手段，制止把武器散发给这个国家的狂热之徒，因为他们使用武器只可能意味着对荷兰百姓的一场血洗。”我穿好了上衣。“这该是准备今天发报的时候了，”我说。“你来干吗？”

他望着我的眼睛。“是的，”他回答。

劳威尔斯发出了这三则电讯，然后接到了对于以前报告的几则回电。当然，海因里奇安排了他的一个人员收听发电，他的手按在一个干扰性的键盘上以防万一劳威尔斯背叛我们。但没有发现可疑的迹象。

（编者原注：战后据劳威尔斯称，伦敦曾指示他在发出每一则电讯时，每到第十六个字时故意制造一个错误；如果没有这种“身份核查”，那就表示他已落入敌人之手。他向敌人隐瞒了这一手，因此在为德国人发出的每一项电讯中间，他插进了明确无误的警告。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伦敦方面竟忽视了这些警告。）

这就是我们命名为“北极行动”的开端。

这种与伦敦的无线电联系能维持多久呢？如果其中夹有验证

发报者真伪的密码信号而我们却毫无所知，那么，在下一次我们发报时就真相大白了。

第二次，我们便从空中收到伦敦方面发出的紧急要求，即：要为大量搞破坏所需物资和一个新的间谍人员准备一个降落地点。这个消息使劳威尔斯颇为苦恼。他说他不愿再操作 RLS 了；他不能为让同伴落入我们手中承担责任。

“我们能抓到这个人，”我说，“不管你是否合作。如果你继续为我们操作这个电台，那么，我希望能从最高当局获得一项指令，保证每一个被俘的间谍人员不被处死。考虑考虑你的决定吧。”劳威尔斯回到了电台的键盘旁边。

（与我的愿望相反，在五十四名荷、英“北极”间谍人员之中，四十七名没有在战争中幸存下来。据荷兰方面的调查揭露，他们于1944年在毛索森集中营被枪杀。他们的被消灭是典型的希姆莱秘密警察系统的许多罪行之一。这绝不能以战争需要为借口来辩解。正是对于那种声誉扫地的背弃诺言所造成的受害者的记忆，使我回想起来只能感到羞耻和痛苦。这种感情促使我拿起笔来写下这个故事。）

第一次降落的信号是在3月27日出现的。那天夜晚11时，一小排汽车，开着幽暗的小灯，停靠在降落地区附近的小树林边，那里有三个人带着强光度的手电筒守候在一个大三角形地带。英国人是不是已经发现我们的这个把戏了呢？他们是不是正在策划对我们的灯火通明的三角形地带投下一束炸弹，用炸药把这片地方变成荒原呢？

最后，我们听到了飞机引擎的嗡嗡声，一架飞机在我们头顶一扫而过，飞行高度绝不超过六百英尺。突然，正好在我们头顶的上空，随着飞机而出现了几个黑色的斑点。四个笨重的大箱子，装在降落伞上，降落地面，发出沉重的撞击声。第五个降落伞载着一个

间谍。这架双引擎的轰炸机重新升向高空，闪烁着它的导航灯向我们致意，然后消失在太空之中。海因里奇和我默默地握手致贺。

紧接着空降之后，我们立即电告伦敦，他们空投的间谍太平无事，绝对安全。这样，有几个星期之久的沉寂间歇。看来这是一个恶兆，因为我们有证据证明英、荷特工机构正在没有我们的帮助下进行着他们的活动。不仅如此，如在乌塔拉赫特地区，我们还收听到一个新的发报台。4月里，在荷尔顿附近发现了一具降落者的尸体，头盖骨被砸得粉碎，他着陆时撞在一个石头水槽上。我开始对我们在RLS电台玩弄的“回马枪”计划感到不安。伦敦方面是不是已经怀疑其中有诈？

当然，如果不是现在就能遇到难得的机会，使伦敦控制英、荷秘密机构的所有渠道统统落入我们的手中，我们的初次成功是维持不了多久的。

在我们毫无所知的情况下，三对间谍，每一对都带了一付电台装置，降落下来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在这些空降中，有一个电台的操作者马尔顿被杀害了（在石槽旁发现的就是他的尸体），而且只有一架电台在着陆时没有损毁。所以，这些间谍串连了起来，通过这架唯一的电台发出报告，它的代号叫作“啦叭”。当伦敦指示RLS同“啦叭”的间谍人员之一进行接触时，这个间谍网整个地暴露无遗了。

“啦叭”间谍网落入我们之手，使我们掌握了它的全部信号计划和密码材料。我们利用它开辟了同伦敦联系的第二个“北极”链环，并且向伦敦建议为这个集团准备一个新的降落地点。大约两星期之后，我们在那里接收了第一批空降。

同时，已死去的发报员马尔顿的信号计划，在他的组员安德林戛那里找到了。我们通过“啦叭”向伦敦报告说，安德林戛从地下

组织那里发现一个可靠的发报员，他能够使用马尔顿的修复了的电台装置，执行马尔顿的信号计划。伦敦给这个新的伙伴发了一次考察性的电报。这个德国的发报员接受了这次考察，立即被批准了。这样，我们与伦敦建立了第三个链环。

大概是在5月中旬，海因里奇报告说，他怀疑劳威尔斯在他的上一次发电之后又附加发出一些字母。我们焦急地等待着查对一下伦敦方面是否起了疑心。明显地，他们并没有任何怀疑。尽管如此，我们终止了劳威尔斯的发报，并且向伦敦建议由“后备”发报员来替代。出乎意料的是，这也被批准了。

由于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更多的来自伦敦的间谍人员被捕，我们的人从一开始就操纵了他们的发报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冒着这样的危险，那就是伦敦方面可能在一个间谍人员被派遣以前就录下了他的发报“特征”。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在这方面从来也没有进行过审慎的比较研究。在不同的时间里，我们与伦敦联系的无线电链环共达十四个之多，操作人员只有六个德国人！

从6月份起，这种电台发报简直不可置信地增加了。空投象输送带运转那样，一个接着一个地发生。伦敦决定通过现存的联络渠道，派遣所有未来的间谍人员和输送物资，这实在是我们的敌人所犯的戏剧性的错误。只要有一个控制小组“盲目”飞行，随意空投下来，并且瞒过了我们，就会揭穿“北极行动”的计谋。

7月，伦敦委派给RLS小组一个重要的特别任务，派侦察人员了解是否有可能炸掉那个被德国舰队司令用来同德国在大西洋的潜艇进行电讯联络的科特威克电台的天线塔。西基斯将负责这个爆破小组。我派出了一个侦察小组，然后向伦敦发电报告准确的情况，告诉伦敦说，炸毁这些天线塔并不存在什么困难。西基斯和他的人站在一边等候前进的命令。到命令传来的时候，我已想好了这个行动宣告“失败”的种种理由。

两天之后，RLS 向伦敦发了一则电讯：“科特威克的尝试失败了。我们的人跑进了地雷圈。五个人失踪。西基斯和其余的人安全，其中包括两名受伤者。”第二天，又发出一报：“五个失踪人员中的两名业已回来。其他三人在这次行动中被杀。敌人已在科特威克及其它电台加强了警卫。”

伦敦来了回电：“所遭伤亡，极表哀痛。敌防卫方法新颖，且难预见。务需最大警惕。盼续报新情况。”

我在荷兰报纸上有意发表一篇文章提及这件事。文章叙述犯罪分子曾企图炸毁一座无线电台。被缴获的破坏物资证明是得到敌人支援的。我希望伦敦方面我的对手能通过中立国看到这份报道。两星期之后，伦敦果然为破坏科特威克电台的图谋向 RLS 发来了一份贺电。

“北极行动”从 1942 年 6 月直到 1943 年春天之间的决定性阶段，牵涉到英荷“马罗行动”。“马罗行动”的领导人是一个名叫蒋布罗斯的间谍。当“地下组织代表们”欢迎他而我们没有逮捕他之前，我们就知道了他的任务是要与荷兰地下组织的领袖们取得联系，帮助他们组织十六个破坏和抵抗集团，每个集团约有一百个人。

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荷兰组织的领袖们是谁，所以我们告诉伦敦说，在这个组织的上层领导中已出现了败坏的苗头，它的领导已被德国情报人员所渗透。我们建议蒋布罗斯同其他更加可靠的组织领导人取得联系。

“马罗组织”的虚假建制，始于 1942 年 8 月。十六个集团都取得了这样显著的进展，以致 11 月间伦敦方面通过我们之手，派遣了十七个间谍，其中有五个是电台操作人员，他们都有自己的电台装置和频率。当我们发电报告说，大约有一千五百人现正在进行训练，我们意识到这样一个数目的人员自然急需象衣服、鞋袜、烟、茶

等物资。所以我们要求供应，而一夜之间，我们就收到了总共五吨重的物资。

从1943年的1月到4月，又有十七名间谍被空投下来，落入我们手中，其中包括七名电台操作者及其独立的电台链环。于是，我便面临着必须不断向伦敦提供有关近五十名间谍活动情报的问题。我们不可能把这种局面维持很久，我们的六名电台操作人员不可能在这种困境下坚持下去。接着，我们得到伦敦方面的许可，“为了更大的安全的理由”，关闭掉一些“马罗行动”中的发报台。

当一个真名叫琼格里，假名“阿里哀”的间谍空降下来的时候，我们总算是转危为安。他被逮捕时，声称他必须立即向伦敦发报：“快车按时出发”，以肯定他的安全抵达。这就使审讯员们陷入犹豫不决的境地。他是试图愚弄我们吗？

我去看琼格里。他不为所动，对我提出的问题仍然重复地回答说，他必须立即向伦敦发电：“快车按时出发，”否则伦敦将会认为他已落入德国人之手。最后，我佯装深信不疑的样子。看起来我好象在沉思，并且说我将发出他的电讯——然后，我突然举目，发现他眼神中出现了洋洋得意的一瞬。原来是这样，他在诈骗！

在下一轮正常发报时间内，我们发出了如下的电讯：“发生意外事故。阿利哀降落时重撞，失知觉，大夫断为严重脑震荡。”三天之后，我们发电称：“阿里哀昨已短时恢复知觉。大夫盼病情好转。”下一天，又发电：“阿里哀突然死亡。望胜利后厚葬之。”

我们很走运：伦敦方面只是采取了通常的警惕态度，就是没有想到这种可能性，即它的在荷兰的全部电讯联络网和它的所有的间谍人员统统都落入了德国人手中。

这一事件发生以后，英、荷总部很快就强令我们把“马罗集团”的间谍首领蒋布罗斯送回伦敦进行磋商。我们还得为不让他走而寻找借口。主要借口是，进入西班牙的信使路线颇多艰险，不甚安

全。我们不断报告并列举事实证明这个借口。我们报告说，一个间谍启程去法国，但从未到达，而且不知去向。于是，伦敦要求得到关于在荷兰可以降落飞机的地点的确切情报，以便派机接走蒋布罗斯。我们回答说，我们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如果我们发现特殊飞行任务即将迫近降落时，我们就会突然宣布一个并不安全的指定地点。最后，我们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我们报告在“鹿特丹的一次德国警察袭击”之后，蒋布罗斯失踪了。

为了补救这种形势，“高尔夫”间谍小组被空降到荷兰。它的目的是来准备一条经过比利时和法国到达西班牙和瑞士的信使路线和组织逃跑的路线。我们故意让“高尔夫”小组平安度过了大约六周时间，直到它打电报给伦敦说，一条直通巴黎的可靠路线已经建立，而信使是一个名叫“阿诺德”的有经验的人。实际上阿诺德是我们的下士阿诺，伪装成法国难民，他过去曾同地下组织有过联系，并且曾有效地渗入了敌人的信使路线。

为了“检验”“高尔夫”逃跑途径的“可靠性”，我们派遣了两名潜伏在荷兰的英国空军军官。三星期之后，伦敦证实这两名军官安全抵达。通过这个事迹，“高尔夫”和阿诺德取得了伦敦的信任，于是我们从伦敦方面得到了有关在巴黎的英国特工组织的三个工作站的详情。这三个工作站，正为安排新的逃跑路线而努力。德国反间谍机构对这些工作站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们始终坚持这样一个原则，获取情报—我们已收集相当多—比消灭更有价值。

在以后的几个月中，“高尔夫”确实为同盟国进行了一定的效劳。许多在荷兰和比利时被击落下来的飞行人员，经过一条冒险的秘密途径被护送到西班牙，而他们并不知道这是在德国的反间谍机构卵翼之下进行的。我们不断地报告这种启程情况，并提供姓名和军阶。只要这些人一抵达英国，我们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那就是提高了“高尔夫”的信誉，而又不损害我们的“北极”行动。

1943年8月下旬，被我们囚禁在哈伦监狱里的五十名间谍中的两名人员厄宾克和杜莱因，忽然越狱失踪了。我深信不疑，这些勇敢和坚毅的人无论如何都会设法返回英国。如果他们得逞，那么，他们就会暴露我们的反间谍行动。

12月的头十天里，伦敦的电讯突然变得黯然无色。厄宾克和杜莱因显然已达到他们的目的。这样，伦敦就会试图愚弄我们。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大骗局的真相被戳穿了，但我们却不露声色，而仍然正常地向伦敦发报。只是从伦敦发来的电讯已变得越来越琐碎而没有价值了。

1944年3月，我向柏林建议，我们该用最后一份电报来结束“北极”电台行动的愚弄把戏了。我们给那些我们所熟知的可能是英、荷特工机构的头头们发出如下的一份电报：

伦敦，宾亨、勃伦特同伙诸公：我们理解到你们力图在无需我们的帮助下在荷兰干一番事业。我们对此深表遗憾，因为我们在这个国家充当你们的唯一代表如此之久，并彼此均感到满意。然而，我们可以向你们保证，如果你们想要来大陆访问我们，不论其规模多大，我们都将一如既往，给予你们的特使们以同样的关切和同样热情的欢迎。

4月1日^①，通过十条无线电渠道同时向伦敦发出了这一措辞坦率的电文。发电的日子看来是特别适宜的。“北极行动”就这样结束了。

到北非去的秘密使命

弗雷德里克·C. 潘顿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他的伦敦总司令部里，凝神地阅读一

① 按4月1日是西方的“愚人节”。——译者

份陆军部标着“绝密”字样的电报。这份电报促使他不得不作出他毕生事业中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决定。电报的内容是：在阿尔及利亚的一批亲同盟国的法国军官建议，请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参谋部派遣五名军官立即秘密地到达阿尔及尔附近的约会地点，并要求带去这样的情报：即同盟国方面将何以援助他们对付轴心国的入侵。

将军思考着。在“D”日“H”时（1942年11月8日清晨1点），美英军队将在北非实行两栖登陆。同法国军官的一次秘密会见，可能得到情报，以便拯救许多生命。但是，也涉及到一次可怕的冒险，如果使命暴露，反倒会使维希最高司令部和纳粹当局警觉到正在发生什么重大事件。这个伟大的作战行动可能因此而以灾难告终。

艾森豪威尔将军面对站在书桌对面那位身高六英尺三的少将马克·瓦纳·克拉克，他的副司令员。“我想，你能担当此任，瓦纳，”他冷静地说。

事情既经决定，艾森豪威尔和克拉克立即前往唐宁街十号。温斯顿·丘吉尔首相一听说这个计划，就表示欢迎。这正是他所一心向往的一场大胆行动。“好，一言为定！”他说，“你们将得到我们的充分合作。”

克拉克遂即告辞，亲自挑选四人随同他去北非。他们是：美国海军吉罗尔德·莱特上校，一位神枪手；朱丽叶·霍尔姆斯上校，懂法文，并熟悉阿尔及利亚；阿克·汉勃伦上校，一位船舶海运专家，还有一位莱门·兰姆涅查准将，是属于作战部第三组的。

每个人都接到指示：“离开你们的办公室时，好象是不到一小时就要回来似的。随身的东西放在一个野战背包里就行了。不许带任何文件。今夜就动身。”除了野战背包之外，他们携带了加朗型的卡宾枪、冲锋枪以及作为急需之用的二千美金。10月19日

上午7时半，两架大型飞机在空中吼鸣，这个历史性的使命开始了。

同时，参谋部密电驻英国海军基地的福克斯上校，令其准备好一艘潜艇和四条小木帆船，以便把这些乘客送上岸去。英国突击队提供了三名熟悉这方面事务的专业军官为之服务，他们是库特内和利文斯敦海军上校以及福特海军上尉。

傍晚时分，克拉克小组抵达海军基地。福克斯聚精会神地听取了那个计划的梗概。于是，他直率地说，“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能够把你们送上岸去，那里并不会有什么麻烦。但是这些小船真是一叶轻舟，遇到海浪，你们驾驭不了，也逃脱不了。”克拉克点头表示同意。这是一场经过深思熟虑而认可的冒险。福克斯继续说，“将军，这听起来象是奥本海姆特工人员的惊险故事，主人公跑到一所闹鬼的农场房舍里去，在那里到午夜还亮着一盏灯。”

克拉克咧嘴笑了，“真见鬼，你怎么知道得那么详细？”这很简单，因为当海岸上并无阻碍可以登陆时，农场房子里就会放出光亮。

月亮正在升起，五名美国人和三名英国突击队员在潜艇艇长朱威尔上尉的率领下，登上了一艘吃重七百五十吨的海下船艇。他们随身带着特制的手电筒——不会从旁边看到它的光线——以便他们登岸时发出摩尔斯电码讯号；还带着一架手提的步话机，可以用来同潜艇上的人对话。内燃机轰响着，潜艇开动了。

第二天清晨4点钟，他们见到了非洲海岸上约会地点的信号灯。但这已是接近黎明时分，不宜冒险登陆。他们重又下潜，以待傍晚的到来。从潜望镜中望去，克拉克能够见到一所古老的摩尔族类型的农庄房子座落在陡峭斜坡的边缘上，房子背后是通向阿尔及尔的公路。他们在周围没有看到一丝人迹。

小潜艇在海面下足足耽了十五个小时。黑夜终于降临，潜艇

浮出了水面。艇上的人们爬上瞭望塔，等待信号灯再次闪光。8点钟已过，又等到9点钟，农庄的房子仍是暗无光亮。人们以一种非祈祷的方式说出了祈求上帝的言词。他们会不会在这个机械化了的阴沟管道里再耽上二十四个小时呢？兰姆涅查嘟哝着说，“那里不会有灯光了，肯定是出了什么事。”“一定会有灯光的，”克拉克说，“我可以打十美元的赌。”除了霍尔姆斯以外，全都接受这个打赌。克拉克跑了下去，小睡片刻。11点10分，霍尔姆斯把他摇醒。“你赢了，灯光刚刚出现。”

艇上人员从鱼雷发射管的出口处把小船放下了水，小船一条紧靠着一条，向岸边进发。离沙滩大约五百码的地方，他们停住了。要是维希政权的警察已有所察觉，他们正埋伏在岸上的树丛里呢！他们难道就这样自投罗网吗？必须派人先去探一探虚实。

朱丽叶·霍尔姆斯的法语讲得最好，而且在岸上还认识几个人，因此他和突击队员利文斯敦上校先上岸去。如果一切顺利，其他人就跟着上去。十分钟之后，霍尔姆斯的船底在沙滩上发出磨擦的声音。这两个人带上卡宾枪，跳出了船，小心翼翼地沿着海滩走去。

突然间，他们听到有人在灌木林中走动。他们一阵忙乱，卡宾枪瞄准着。

有英语的说话声：“谁在那里？”

“你是谁？”霍尔姆斯回敬了一句。

“我是里吉威·纳爱特。”纳爱特是美国的副领事，他参与了这次会见的安排工作。

“我是朱丽叶·霍尔姆斯。鲍勃·墨菲在哪里？”墨菲是美国驻北非的总领事，他是帮助安排这次会议的重要人物。

“他一会儿就来到，一切顺利。”

霍尔姆斯转向利文斯敦：“发出信号！”利文斯敦向着海面闪亮

他的手电筒。信号“K”，就是一切均好；信号“F”就是发生了问题。他用摩尔斯电码，发出了“K”的信号，于是其他的木船在黑夜中驶来，其余六人登上了岸。然后，向潜艇发出了“平安无事”的信号。这艘潜艇停在近海水域，它的发动机声已经听不见了。

那些湿透了的、浑身颤抖的人们使劲把小船拖到农场房舍，把它们藏在院子里。然后，他们脱掉身上的衣服，把它们晾干。小餐之后——其实，过度兴奋的人很少感到饥饿——他们打起盹来，直到法军方面的人员7点钟到达此地。会议开始了。

得到的情报可说是无价之宝的。它包括了卡萨布兰卡、阿尔及尔、奥兰、突尼斯这些港口的航运吞吐能量，法国海军为阻止登陆行动所部署的计划，以及哪些地点会遇到法军重兵的抵抗和哪些地点只有象征性的守军。关于飞机场跑道的情报，后来证明其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但是克拉克将军的好运气终于又溜跑了。莱特听得声响，立即跑出屋去。风儿萦绕着红瓦的屋顶窃窃私语，一人高的海浪咆哮着，拍击着海岸。莱特深知，在那大海怒涛澎湃之中，小木帆船是不可能行驶的。他沮丧地回到屋里。

同时，有两个阿拉伯的佣人，正好是在这个早晨，出于安全的考虑被农场主人解雇了。他们跑到附近的城镇，求见警察局长。他们报告说，他们见到了一些陌生人带了大包东西（小船）到农场上来。这个地方一度是走私贩子藏匿的处所，也许现在又被利用来干这个勾当了。于是，一辆警车立即震响在公路上，朝着那个约会的地点驶来。……

农场屋子里的讨论正接近结束。只有一个问题有待解决。一位法国军官说，“这里需要有一位我们大家都愿意追随的领袖。”亨利·吉罗德的名字被提了出来。这位将军正藏匿在法国的非占领区，大家决定要使他偷越国境，把他送到北非。

正在这时，邻室的电话铃发出刺耳的声音。会议参加者们僵立着，面面相觑。房屋的主人听了电话，一会儿之后就冲入会议室内，他两眼圆睁，面有惧色，“警察！他们五分钟之内就要来到这里！”

大部分法国军官——他们是高个军官——赶忙离去。在这种情况下如被发现，就意味着要以叛国罪遭到枪决。摩托发出咆哮声，汽车的拉排挡声响着，他们扬长而去。

克拉克的人员赶紧把地图和纸张都塞进他们的内衣。他们被围困在维希政权的警察们和汪洋大海之中。而如今警车的响声愈来愈近，他们躲到哪儿去呢？“那里有一座空酒窖，”墨菲说，“你们从那儿下去，我将支使这些警察离开。”

克拉克并不喜欢这个酒窖，这活象一个耗子笼，没有回旋的余地。但现在已没有其他选择的可能了。他们能够听到警察一个个从汽车里跳出来的声音。这八名军官紧握卡宾枪和冲锋枪，鱼贯而入酒窖。墨菲猛然把门关严，用箱子盖在上面，然后去迎接警察。

他只有一计可施。会议桌上散乱地放着喝了一半的酒瓶和香烟头。一位穿便衣的法国尉官和农场房舍的主人，法国人铁西埃，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同墨菲和纳爱特伪装成正举行一次狂饮酒会。他们开始唱起了祝酒歌的一些片断，大声地笑着、嚷着。这就是一会儿以后那位警察局长走进来时的景象。

在下面地窖里——只有十平方米——，克拉克把他的小组人员安排在楼梯背后和沿墙的地方，这样从上面粗略观察很难发现他们。但是，假如警察当真走下来看一看，那该怎么办呢？克拉克将军的命令是直截了当的：他的人员开枪把他们打死。楼上的形势迅速恶化。他们能够听到鲍勃·墨菲同那个警长在争论。墨菲抗议说，他和他的几位朋友正在举行一次小小的联欢会。什么时候

规定过，这是一种罪行呢？假如美国警察在纽约侵犯了法国公民的私人生活琐事，警长先生以为如何呢？而且，声音越来越近，似乎他们已到了地窖的门口。

正在这个时候，地窖里的紧张的沉寂被窒息的喘气所打破。库特内力图压制住一阵咳嗽。他拼命抑止咳嗽而发出的声音使他的同伴们感到似乎连整个阿尔及尔市都能听得到。蒋波·库特内绝望地挣扎着。“说真的！”他大口喘着气，“我恐怕快要闷死了。”

“我想你是不会的！”克拉克冷酷无情地说，“喏，这儿有口香糖，拿去嚼吧。”

蒋波用手摸索着口香糖，绝望地咀嚼着。他的痉挛止住了。地窖里一阵死一般的沉寂，人们甚至能够听到自己心脏的跳动。

上边，墨菲仍然大声地争论着。法军尉官断断续续地哼出了醉汉的歌。接着，楼上讲话的声调改变了，警长先生说话不那么粗暴了。霍尔姆斯舒了一口气。“鲍勃镇住他了，”他低声细语着。

警长判断并未发现什么走私行为。不过，他说，他还是必须向他的上级报告。是的，毫无疑问，他的上级会回来进一步查清事情的。

正当这个时候，蒋波又开始难以抑制的一阵咳嗽声。

“咀嚼那块口香糖，”克拉克紧张地低语着。

“我在嚼着呢，将军，但是甜味已经一点儿也没有了。”

“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克拉克低声说。“在我给你这块口香糖之前，我自己已经嚼过一个小时了。”这被认为是很有趣的事情——事过以后更是如此。

最后，脚步声消逝了，他们耳闻警车呼叫着，扬长而去。克拉克和他的小组从地窖里走上来，急于想赶到潜艇那儿。但是，激浪沉重地拍击着沙滩。莱特说，“我真厌恶在大海上驾驶这种小救生船。”

可是，只要能把情报送走，这次使命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功。克拉克说：“我们努力试试看。”一份无线电报发给了潜艇：“尽可能地靠拢我们。我们正遇到麻烦，需要立即上艇。”

他们把小木船带到受着海风冲击的沙滩。在咆哮的大海 中，乘这样一条并不比儿童玩具船更大一点的、容易损毁的小舟出海，即使是一个勇士也会望而却步的。克拉克穿上他的内衣内裤，把他的外衣托在手上，同库特内一道走向海边，步入激浪之中。他们设法跨进这只小船并拼命地划桨。一支巨大水柱向他们倾倒下来，小舟倾翻了，两个人都消失在狂怒的浪花之中。

过了一会儿，他们被回头浪一次又一次拍打着，终于又被冲到了沙滩上，满身都是沙、咸海水，嘴上咒骂不休。其他的人员把小船又弄了回来，但是船桨和将军的衣服却被急流卷走了。

有人叫喊着：“把他的裤子捞起来！”

莱特嚷着，“让他的裤子见鬼去吧，把桨拿上来！”

他们拿到了船桨，而将军的裤子却留在非洲了。

现在，即使是克拉克也被迫承认，他们不可能在那天晚上驾小舟出海。他理解到，如果大风继续刮下去，他们也许会在这里搁浅几天。但不管有没有警察，他拒绝回到地窖里去。他们宁愿到树林里去，紧急时，一个人还能从那儿杀出一条路来。所以，他们把自己和小船掩蔽在棕榈树下，他们在严寒中颤抖。风仍然呼啸着，使他们无法逃遁。

当天夜晚 11 点钟，警察又回来了。墨菲再一次带着可爱的笑脸招呼他们，轻快地、流畅地讲个不休。末了，警察并不搜索树林。他们并不满意，他们说将在早晨重新回来，但至少眼前是延缓了。

清晨近 4 点钟，风看来有点减弱了，虽然大海还在翻腾。“我们再来试一下，”克拉克说。这一次他发给潜艇的电讯是紧急的：“尽可能地靠近我们！”

纳爱特、铁西埃、墨菲和那个法国尉官稳住了第一条小船。克拉克和莱特爬了进去。他们四个人推着把这条很不结实的小船送进拍打着浪涛中去，直到莱特发现了一条比较平整的狭长的航路。“行了！”他叫了起来。四个人使小船漂浮了起来，推向前进。克拉克和莱特使劲地划着桨。这条轻轻的小舟越过迎面袭来的大浪的边缘，垂直地悬挂在一望无际的空间——忽然，它飞过钩状的浪峰，终于越过了拍岸激浪。

同时，其余的人也正在努力使他们的船只漂浮起来。他们最后都成功了。霍尔姆斯是最后一个登上潜艇的，而正当他要登上潜艇时，一个巨浪攫住了小舟，把它高高地抛了起来，甩到潜艇上。水手们抓住了霍尔姆斯，支撑着他，那时潜艇背部倾倒下一柱激浪。大浪把小船击成两段，然后把它卷走了。

一种危险将是显而易见的。一条靠岸的破船，它里面的东西狼藉在沙滩上——这些东西包括信件、制服和装着钱币的野战背包，都会成为美国人到过的铁证。后来，有一份电报发给墨菲，警告他必须去清除一下沙滩的残迹。墨菲、纳爱特和两个法国人在大清早到沙滩搜查了一遍，把船只的所有的碎片和残存的实物统统都清除了。

潜艇掉头向北，勉力以每小时四海里的最高速度下潜。克拉克急于要把他的情报送到伦敦，因此决定冒险打破无线电波的沉寂。他向附近的英国基地发出了一则电讯，告诉他们关于潜艇的航道、速度和位置，要求他们立即派一架飞机来。

下午3时20分，一叶飞船在头顶上发出嗡嗡的声音，并在海上降落。克拉克和他的人员从潜艇登上飞机。一个半小时之后，他们在英国基地登陆，并迅速地发出了这次使命取得圆满成功的讯息。然后，他们登上飞机飞往英国。而载着克拉克的那架飞机，经历了各种艰险，似乎命运在最后一分钟也不愿意让他顺利地通

过。他们迷失在浓雾中达数小时之久。飞机又由于结冰严重而曾一度摇摇晃晃，勉强地升入高空。这位将军后来回顾说，这次飞行是“此番旅行中最大的一次惊险场面。”

在英国，其他的飞机都按时到达了，这就引起了惊恐。但是，克拉克的飞机最后在浓雾中安全滑到了地面。而飞机上只剩下用一毛钱就能买到的几滴汽油了。

后来，克拉克将军曾谈论过在北非农场小屋制订的计划以及法国人所提供的情报的巨大价值。在进军北非成功之后，我有一次去访问克拉克将军，他告诉我说，“这次秘密会议拯救了成千上万美国人和英国人的生命”。他说：“由于那次会议制订的计划，现在法国军队正在我们的前线进行着英勇而有成效的战斗。”

宏伟的奇袭战役

唐·沃顿

1942年初夏，一个星期一的早晨，十二位陆军军官奉召到华盛顿那幢老军需大楼的3045号房间，举行秘密会议。他们一个一个地、自然而然地到达这里，根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奉召到此地来。两小时之后，他们仍然不动声色地离去，但他们却带走了我们时代的一个最大的军事机密，也就是派遣一支美国远征军到北非去作战的决策。

这些陆军准将们和上校们回到他们的办公室，立即使这个复杂的作战部署付诸行动，以便使北非战役成为可能。他们着手开展这一战役的“后勤”——这是一种艺术，即使用合适的兵力，带着合适的装备，在合适的时间，到达合适的地点。十五个星期之后，装备出色的美国军队从美国 and 英国出发，在十分准确的规定时间内，在法属北非三个不同的区域、十二个不同的地点登陆。

到那个时候为止，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庞大的一支海外登陆部队。只有后来的诺曼第登陆才超过了它。必需提供的后勤供应达到七十万件不同的品种——例如，二千二百万磅食品，三千八百万磅被服和随身装备。还有一千万加仑的汽油，由每个士兵背负五加仑装的汽油桶，运上岸去，或者分装成五十加仑的汽油箱，或者用油船大量载运，送上岸去。军需长官为非洲远征军准备的军需供应清单，是一份令人咋舌的文件。它包括了一百个闹钟和五百八十个捕鼠器，还有折梯、橡皮图章、屠夫的制服和钢制保险箱。

每一个美国士兵上岸时，随身都带着他自己专用饮水的过滤药剂。如果他从这个有问题的水源灌满了他的水壶，那么，他只需放进去一片相当于阿司匹灵片三分之一大小的药物就行了。每个士兵还带着盐片，以便对抗非洲的高温。为便于在伤口撒药，每个士兵还备有磺胺晶片，是用特殊的包装包着的，包装物的顶端就是搅拌器。每人还发给一副护目镜，是专为在非洲作战用的，配有两种可移动的镜片：一种是防尘的；另一种是遮阳的。军需主任还专门设计了一种新型的熏烟袋，是为了对付虱子的。

这样巨大规模的供应工作，还由于整个行动必须保密而变得更加复杂艰巨了。譬如说，要制造商生产一种网孔极为细小的蚊帐。如果这个机密被泄露出去，那么德国人就会立即知道，我们的部队是为在非洲地区范围之内作战的，因为这样细小网孔的蚊帐只有在沙蝇出没的地方才用得着。军需主任还必须为每一个士兵配备一块一英尺见方的羊毛巾，附在他的钢盔衬里上，以避免他的脖颈背部受到烈日的曝晒，这又将会使敌人得到一些线索。军官们被嘱咐这些都是“不许提及”的物品。成千上万箱的物资装上船只，箱子上标着“内装XY”。即使作战部队在他们接近非洲之前，也不知道那些木箱里究竟是些什么东西。

为这个作战行动保守机密，本身就是一件极为艰巨的工作。除

了通常的预防措施之外，还设计了一个大的骗局，不论这里进行什么活动，都只不过是向联合王国进行的另一个输送计划。主要的军官们甚至使用“爱尔兰”和“不列颠”这些字眼作为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代号。巴顿将军在华盛顿同那些计划人员商议军情时说，“如果多一个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就意味着你可能葬送七百五十个人的性命。”乍听起来，不无言过其实，但这很可能约束了一下那些嘴巴不严紧的人。在军需部队里，只有十个人知道此事，在运输部队里只有九人知道。他们知道的深浅多少，程度不一。有些高级军官只知道，已经策划了一项重大的战役计划。有些知道目的地，但不知道行动的规模；有的则知道规模的大小，但却不知道目的地。

为严密控制这个秘密，还采取了巧妙的步骤。为了掩护八百五十艘船只的集结，许多船只停放在干船坞里，有待修理。为防止任何人根据航程长短估算出到达的目的地，又为这些船只提供了远比它们在海上实际所需更加旷日持久的给养。

每一个熟悉内情的人，姓名都登记在册，有些办公室只允许列入名单的人进去。有些军官也不再使用口述录音机和秘书，而由自己手写指令。整个军队一向总是把文件复制两、三份左右，但是文件档案中却没有留存任何关于这次作战计划行动的资料。

运输部队为了不暴露它对奥兰、卡萨布兰卡和阿尔及尔港口的兴趣，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即令在室内并无别人的情况下，运输部队的两个军官在一张办公桌旁窃窃私语，他们也仍然从不说起奥兰、卡萨布兰卡或者阿尔及尔这些字眼，他们分别用一种哑剧的手势来代替每个港口的名字。

工程部队则耽在位于数百英里外的内地的营房里，几个星期来一直实习着向他们称为“具体船只”上的装货工作。他们从美国用的每一种同类型的货运车上把形形色色的装备品（从大豆直到

三十二吨的坦克)装载起来。他们用计秒表计算装运所花的时间。当他们熟练了装运技术之后,即被调往装运港口,并且在几艘将参加护航的舰只上检验他们的技术。最后,在一个短短的黑夜和半个白天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在诺曼第登陆前现代战争中一次最大规模的装运任务。

从部队集结地区到启运港口的备用的铁路和公路线,也已准备就绪。即使破坏者摧毁了美国东部四分之三的桥梁,部队仍然可以照常调动。

为了这次非洲战役,工程师们准备了一千种以上的不同类型的地图。这些都是在卫兵的护送下被带到运货港口的仓库的。在那里,有一个工程兵军官和十五名士兵负责为每一个作战单位准备好包裹。为了安全起见,这些士兵是不允许请假的。他们不论吃饭睡觉都得守着地图。一切都由铁将军把门,卫兵看守,直至装运之夜,用专车把那些地图分送到各单位司令官本人手里。

军械处为非洲战役重新改装那些旧式武器,并且发展了一些新武器。其中最重要的秘密武器之一是一种威力强大的反坦克车辆。当那些军官们在 3045 号房间开会的那天,这种武器还只是处于蓝图设计阶段。而四十八小时之后,一名军械处官员却在我们的家大型汽车制造厂里同生产制造专家们进行会商。他要求他们做通常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他们做到了。这家工厂在 8 月份装备了机械,到 9 月份第一批反坦克车辆就制造了出来。试车之后,这批反坦克车辆被分配到部队,在野外进行实验,然后在 10 月末,它们就登上了运往北非战场的途中。

人们估计非洲登陆的百分之五十到八十的工作是属于军需供应的。军需供应处准备了应有尽有的每一件东西,从邮票直到三十二吨重的坦克。它还供应挖井器械、摩洛哥火车头所需要的煤和作为部队薪饷的各种货币,包括千百万金元和银元。当不负责

任的人们高谈阔论要对将军们施加压力开辟第二战场的时候，这些默默无闻的军需部门的计划人员，正在悄悄地准备着几十万件防毒制服。他们正在秘密地试制一种新型的单人包裹，便于使供应很快上岸。还准备了防水的板条箱，它们可以从水上漂流靠岸，以支持第一批登陆的梯队。

一般说来，军官们除了知道他们执行特定任务所需要的事情之外，就再也知道什么了。某些师的司令员一直到最后的时刻，才知道他们的部队准备开向何处。在整个美国，只有寥寥几个人知道登陆的确切日期，也就是“D”日。

我们在达卡等待着你们哩！

多纳尔德·柯斯特

1942年末的一个夜晚，可怕的德国潜艇部队正集结于南大西洋，它们接到一个紧急命令，要求全速前进，在达卡海岸附近集合。几天之内，百艘以上的纳粹潜艇游弋在非洲偏西海域之端。维希法国部队掌管着强有力的海岸防务，他们曾在两年前击退了由戴高乐将军率领的英国—自由法国部队的进攻。德国统帅部认为，美国军队横越大西洋发动进攻，正好进入一个伏击圈，将遭致巨大的灾难。

然而，11月7日的夜晚，德国电台发出电讯：“注意！注意！北非海岸出现大量敌军。”我们的进攻部队在距离他们预期地方约二千英里以外登陆，使德国人大为吃惊。“达卡掩护计划”，这次战争中最有效的伪装计划之一，已经完全成功。

这次骗局链条中最重要的一环，是多纳尔德·柯斯特，一个说话腼腆的年青的纽约人所策划的。他在入伍前曾是一家广告公司的经理人员。

1940年，柯斯特为法国军队驾驶过一辆美国战地服务队的救护车。他被俘入狱，在德国人手里度过了不愉快的几周时间。最后被释放回家，又参加了海军。他的法语知识，又使他进入海军情报机构。后来又

从那里调到威廉·杜诺万的战略情报局。——小弗雷德里克·松登。

那是一个星期日，我被召到杜诺万上校的办公室。“你就要去非洲，去卡萨布兰卡，”他说，“这是当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我眨了眨眼睛。“这些天内，法属非洲将要遭到进攻，”他继续说，“不是德国人的入侵，就是我们的进入。你将被派去协助准备应付任何一种局面。我们必须知道德国人的计划。”

“是的，上校先生，”我舒了一大口气。

“一个德国停战委员会现驻在卡萨布兰卡，目的是监督实行纳粹在1940年强加于法国的条件。你要尽力使他们相信，如果我们有一天发动进攻，达卡将是我军入侵的必经之地。至于如何使他们深信此点，那就要靠你了。”随着上校漫不经心说出的字句的全部含意进入我的脑际，我艰难地领会着。“你最好在伦敦、里斯本和直布罗陀停留，以便从英国情报机关那里得到所能取得的情报。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我感觉到，自己似乎象那个《小小红色骑兜帽》^①那样，在午夜即将进入一个遍地狼迹的丛林。盖世太保的枪手、超级间谍和机灵的纳粹谋杀手段，象过电影似地在我眼前相互追逐。

过了几天，我发现自己已作为一个“副领事”，领取国务院所发的薪金。杜诺万利用这个伪装，掩护他的间谍在表面上中立的维希法国领土上进行的活动。

在华盛顿，我匆忙地完成了密码的速成训练，别的东西就学得很少了。这个精心培育间谍的学校，后来训练我们的人员各种技术，从撬开保险箱直到在敌国的街道角上冒最小的危险同另一个

^① 《小小红色骑兜帽》原系德国童话：妈妈要小女儿给生病的外婆送饭，小女儿途中遇狼，并告以去处，于是狼先去小女孩的外婆家吃了外婆，回头又伺机加害于小女孩。——译者

间谍人员接头的技巧，但这样的间谍学校当时还没有建立起来。我连如何撬开一个办公桌上的抽屉都不会。当我飞往伦敦的时候，我尖锐地意识到自己缺乏经验。

于是，柯斯特的第一次“奇遇”发生了。通过朋友的间接关系，我遇到了一个英国姑娘，她多少得到了一点暗示，知道我将去北非。她恳求我尽力寻找和帮助她的一位非常亲密的朋友，一个名叫弗莱迪的奥地利人。他曾在法国外籍军团中服役，现在很可能是在卡萨布兰卡附近的一座维希政府的集中营里。我是一个颇为局促不安的间谍人员，按说不该有人知道我上哪儿去。但我半心半意地许诺说，我将尽力去找那个奥地利人。

在伦敦、里斯本和直布罗陀，我见到了英国情报服务处的一些“大人物”。他们都是些平稳的、令人生畏的人，他们有一种镇静的自信力，使我感到极不舒服。他们告诉我有关德国停战委员会首席代表西奥多·奥尔的一切——显然是一个阴险的对手。他的反间谍系统组织得很完善，而且是残酷无情的。

这些英国人对于我能否使那位德国将军先生相信任何非真实的“重要消息”，老是摇着他们的脑袋，表示怀疑，因为他懂得所有这些把戏。他们警告我，必须小心谨慎注意自己的身体。德国人对同他们捣蛋的人是很有办法的，他们往往把这些人诱入偏僻的死胡同，用利刃刺死。在我乘上飞机正要飞离直布罗陀的时候，一位英国人拍拍我的肩膀说：“老兄，祝你交好运！我们会想念你的。”我想，我从他的声音中感到一种送葬的哀调。

在卡萨布兰卡，我们的高级外交官中只有很少几个人知道杜诺万上校的人员在干些什么。领事馆的一般成员继续对那些年青的、莫名其妙的助手们感到恼怒，他们很少务正业，而是超越了领事馆事务的范围，常去找船坞的工头、渔民和其他不三不四的人聊天。我们还颇费心机地不让一些喜欢打听的同事们知道我们有无

线电发报机，因为我们就靠这些发报机来发送我们的情报。

我发现，我的钮扣眼系着一枚“战争十字勋章”以及我精通法语，使我很容易地到处交朋友和取得情报。许多忠实可信的、反维希政权的人们协助核查我们情报来源的可靠性。一个渔船队的主人为我画了一张可以进入摩洛哥海岸航道的地图。一位从德国的强迫劳役中逃亡出来的法国建筑师，事先安排好了，接连两个星期日跟我进入教堂，以教堂内有靠背的长凳作掩护，交给我德国最新防空火力塔的图纸，这些防空火力塔是他在德国人强迫之下帮助建造的。所有这些都是珍贵的情报，但是我却仍然接近不了奥尔将军。

有一天傍晚，柯斯特的第二次“奇遇”发生了。另一个“副领事”和我坐在一家名声很坏的海滨咖啡馆里，正在打听关于海运的情报。两个年青人走过我们的桌子。“瓦尔特，”我的同伴叫了起来。新来者停止了脚步。“来见一下我的朋友多纳尔德·柯斯特，他也在领事馆里。”那个年青人坐了下来。他们说，他们是奥地利人，当德国侵法时，他们正在法国。他们曾参加过法国外籍军团，后来被关进一个维希的集中营，终于设法逃到了卡萨布兰卡。“突然，有一天”——瓦尔特讲述着他的故事——“我在街上偏偏见到了奥尔——就是那个主持德国停战委员会的将军。战前我在巴黎就认识他。”瓦尔特在故事结尾时轻松愉快地说，“我们同他做了一笔交易。我们提供他情报，而他就使我们脱离监狱。我们当然都强烈反对纳粹，我们想狠狠地给德国人一点教训。”

我的脑海在迅速翻腾着，瓦尔特和他的同伴，该不是奥尔派来跟踪我的吧，这可能是一个圈套，要不然是一个天赐良机。在我苦苦思索时，那个奥地利人——我没注意他的名字，忽然转身向我。“原来你是新近才从伦敦到达这儿的，”他叹口气说。“我在那儿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姑娘。只要我能够回去的话……”我已拿出我的

皮夹子来想要付帐。突然间，这个奥地利人几乎跳过桌子来抓住我。“这是她的手笔！”他嚷了起来，指着我的皮夹里的一只信封。这是我收到的那位伦敦姑娘写来的信，信封上的书写字迹大而醒目。这个人肯定是那个弗莱迪，就是她要求我找寻的那个人。

当天夜里，我的脑子里涌现了一个具体的计划。我将变成一个碎嘴的花花公子，我可以经常借酒酣耳热之际，不断给奥地利人透露一些准确的但是并不重要的情报，让他们转给奥尔。我曾书本上读到过这类事情，我并不认为它会有什么成功的机会。但是，除此以外，我再也想不出什么妙策来了。

几天之后，事情发展很顺利，当奥地利人报告新得来的情报时，奥尔不仅相信了他们，而且打开了一瓶香槟酒。“是的，这些美国人全都是笨蛋。”将军说，“让他们喝得酩酊大醉，他们就开口了。”

奥尔提出的对于情报的第一要求，并不是很难办到的。显然，将军是企图核实他的新的情报来源在每一个细节上的准确性。有一天，当我遇到他们两位时，他们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紧张。将军先生在前天夜晚，曾经怒气冲冲。“你们这些奥地利猪猡，”他叫嚷起来，“你们对这个美国人什么也不了解，你们是在骗取我的金钱。”弗莱迪和瓦尔特向他保证，他们确实对这个美国人非常了解，而且可以证明这一点。“好吧，你们立即给我证明这一点，否则我就要教训你们，欺骗一个德国将军，将意味着什么。”

我看到自己的计划岌岌可危，奥尔已起了疑心。他会把他的反间谍人员全部转向我们。我们整个间谍活动长时间来进行顺利，还从未受到过德国方面的干扰，而今将面临危机。然而，柳暗花明，又忽然出现了一丝希望。是啊，为什么不告诉将军，如果他想看一看我们是多么好的朋友，让他明晚到那个临海的黑市饭店来看我们共进晚餐呢？“我将演出一场好戏，好让他相信，”我补充

说。

奥地利人的脸上显出喜色。“那么，将军将要支付我们的晚宴费用罗，”瓦尔特严肃地说。

我将永远忘不了那个夜晚。我们几个人都感到有点紧张不安。我们正要开始吃我们的黑市牛排时，那个清瘦白皙脸蛋的、法属北非的非正式统治者，由德国停战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们簇拥着，昂首阔步走了进来，并在我们近旁坐下。我一直感觉到这位将军的眼光死盯着我的项背。于是，我变得相当激动。我敲着桌子，讲了一些对国务院不甚体面的故事，并且嚷着要更多的酒喝，同招待员争吵，不时地拍拍瓦尔特和弗莱迪的背，而对那些德国人则投以横眉竖眼。但我的内心却屏气息以待。

渐渐地，奥地利人开始松快了，瓦尔特喃喃地说：“将军先生高兴了。我看得出他的神情表现，他已经轻松而得到了很深的印象。”为了把事情搞得更地道一点，我们后来又把我们的汽车停在德国领事馆门外，而且扯开沙哑的嗓门唱起歌来。

第二天，弗莱迪给将军递去了支付这顿晚餐的几千法郎的帐单。奥尔满面春风地支付了这笔帐，并且外加相当优厚的赏金。“很好，我的年青人，”他大笑起来，“现在你们要帮我从那个笨蛋那里弄到关于美国人的重要情报。”

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好运气。现在，将军开始邀请那些奥地利人去参加他的一切豪华奢侈的宴会。他们因而听到有关某些问题的对话，我们对这些问题是深感兴趣的。德国的化学家们正在大规模生产一种新的气体。最高统帅部已经放弃经由西班牙侵入法属非洲的打算。每一个夜晚，我们把这一类情报通过电台和邮袋发送出去。

我每隔一定时候，向弗莱迪和瓦尔特暗示，美国人已经制定了一个入侵计划。接近7月，奥尔明显地为此而感到烦忧。他把奥地

利人召到他的办公室，向他们发布新的指示：他们必须专心致志、竭尽全力，去发现美国人将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动这场攻击。

“告诉奥尔，”我说，“美国的入侵计划是肯定无疑地确定下来了。我们将于今年秋末在达卡登陆。”接着，我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奥尔会落入这个陷阱吗？弗莱迪和瓦尔特会不会是奥尔派来耍弄我，正如我想要弄奥尔一样呢？如果我失算了，那么我将要对同盟国许多生命的牺牲承担责任。

第二天早晨，奥地利人显得兴高采烈。因为将军先生得意地嚷道：“我们将活捉住这些美国猪猡！他们将要进入一个漂亮的陷阱。这个消息必须立即送到最高统帅部去。”他按动了电钮，叫嚷着来人帮助他。一则很长的电讯发向威斯巴顿。紧接着是打开香槟酒瓶和无数次的举杯祝酒：为了希特勒，为了德国武装力量光荣，为了奥尔的“忠诚的奥地利朋友们”，甚至为了“那个愚蠢的美国人”。弗莱迪和瓦尔特获得了大量金钱奖赏。

我对达卡掩护计划所作的贡献已经完成了。当然，我的任务也受到其他方面的伪装手法和有意识地泄露机密等等行动的支持，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进一步对达卡布满疑云。

几个月之后，在我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我在“D”日于奥兰海滩登陆，那里距离达卡有一千九百英里。这个“火炬战役”如风卷残叶，横扫法属非洲，而仅仅放了很少几枪；我们巨大的舰队在航程中也没有一艘舰只遭到击沉。我们的军队进占塔法罗伊机场时，俘获了六百名敌军战俘。我奉命与维希军队指挥官接触。当我走近他时，他的脸涨得红红的，并且气愤地用手指指着 我。

“你们美国人为什么要在这里呢？”他简直要气炸了，“我们一直在达卡等待着你们哩！”

潜入搜查

威利斯·乔治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不久的一个夜晚，我正在纽约第三海军战区海军情报组值班。晚上11点钟，办公室的寂静的气氛被电传机的震颤声所划破。这是从华盛顿发来的指令，它使我开始去从事一项只能被称之为“公务窃盗的任务”。

指令说，可以相信，华盛顿某个大使馆随员在前一天焚烧了文件。要我们考虑能否侦察一下他们在纽约的领事馆是不是也已如法炮制？

我要求我的指挥官允许我设法进入这个领事馆去检查一下。与其他的军官不同，他愿意为他所认为应该做的事情而冒风险，并不惜以他的前程作为赌注。

“去干吧，”他说，“但记住，领事馆是外国的领土。如果你被抓住，这会使海军部极为狼狈。”

我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因此，我设想了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首先，我见到这幢大楼的值夜总管，我向他出示了我的证件。他是一个海军老战士，毫不犹豫地答应提供帮助。他说：“在夜晚，除了领事馆的专用电梯上的那个人之外，就没有任何守卫的人了。”

我借来了一套清洁工的大褂，化装成大楼里的一名雇员，乘上另一座电梯到了领事室上面的第二层楼。然后，又走下楼梯到领事室，并使用了总管的万能钥匙。在室内，一股焚烧纸张的气味扑鼻而来。每一个废物箱都证明领事馆的文件已经被焚烧了。但是，那里还有不少保险柜、一个壁橱式保管库和许多档案柜，所有这些都是在上了锁的。我断定，还有重要文件仍然保存着。

于是，我决定，不论是否得到允许，我将带着必要的人和工具

回到那间办公室来，打开那些保险柜和档案柜。我的指挥官又一次甘冒风险，虽然这一次他的行动并没有得到华盛顿的授权。他深知，我也同样深知，利用清洁工的职责去检查一下废物箱是一回事，而撬开一个保险柜又是另一回事。

“我只是提出一个条件，”他说。“你必须在于过之后，不要使人怀疑你曾经碰过那些保险柜。”

第二天早晨，我开始召集一伙人，有一个锁匠、一个开保险柜专家、一个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文件值得拍摄的语言学家和一个能够摄制微型照片的第一流照相师。英国的保安机关借调给我们一位瘦骨嶙峋的寡言少言的五十岁老处女。她只要借助于两臂抱满的锅、罐、蒸汽水壶之类的东西就能够打开任何蜡封着的包裹，而且事后谁也发觉不了，即使用紫外线来侦察也无济于事。

当我们这些乌合之众执行第一次潜入室内搜查任务时，我们实在是有点外行。我们在总领馆内一起转动，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挤来挤去，观摩门锁是怎样去撬开的。当第一个保险柜被打开时，每一个人都把目光投向保险柜，想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无疑地，我们是比较粗心大意的，对于自己所留下的痕迹，并未加以清除。但幸好，我们没有被发觉，我们继续每夜的搜查。

有一天夜晚，我们的照相机掉落在地上，发出了一下响声。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总领馆的电梯服务员肯定报告了这一事件。到了下一个夜晚，直觉警告了我，一定出了什么事情，所以我在派出我的搜查人员之前，决定先核实一下情况。我穿上了清洁工大褂，由那个清洁工的头头陪伴着进入了总领馆。咔嚓一声，灯光大亮，总领事和一个武装警卫站在我们面前，都是握枪在手。清洁工的制服救了我们。总领事表示歉意，说他以为我们是夜盗。

在这之后，我从毗邻的大楼上加以监视，发现那个警卫每天下午5时抵达，然后通宵地留在那里。只要他在那里，我们就休想去

登门访问。于是，我设法撵走他。有一天夜里，我悄悄地潜入第二楼层，在电梯升降机井旁边有意摔了一下椅子，发出了巨大的响声。很快我就带着椅子撤到底层。半小时以后，被那个警卫的报告所惊动的总领事坐上出租汽车到了大楼。从毗邻的大楼上观察，我们看到他激动地搜查着整个总领馆。几个夜晚之后，我又重复了摔椅子的动作，获得完全相同的效果。这一次总领事终于大发雷霆。他由于为那种无聊小事而从热被窝里被拉出来，感到厌烦。再过一天，那个警卫不再出现了。很显然，这位总领事已经打发他卷铺盖走了。

然后，我们重新开始了搜查工作。当然，现在我们已变得更加小心翼翼，因为我们知道，总领事已起了疑心。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才学会本领的。整整花了十周时间，我们才完成这个任务。可是，话得说回来，在事情结束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拍摄了每一件重要的文件。我们掌握了总领馆的密码，一套住在美国的亲轴心国居民的名单索引卡，还有足以充分证明纳粹利用这个总领馆从事重要的谍报活动的大量材料。

在以后的两年之内，我进行了一百五十次以上的这一类潜入活动，从来都未被抓住过。事情也是这样做为好，这些工作完全由我们自己负责，搞的是非法的活动，假如被捉住，我们就不可能指望政府的支持和承认。

当12月7日战争爆发时，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对间谍的警觉性特别强烈，我们的电话铃也从未停止过震响。有一天夜晚，从一幢公寓大楼的顶楼小屋窗户里忽然有灯光闪烁。有间谍在发密电码！我们立即冲到顶楼闯进屋去，抓住了我们的“间谍”。这闪亮的密电码原来是从窗户边上一个很值钱的养鱼缸处发出的，它装有电灯，时常一亮一灭，是为热带鱼取暖用的。

我们还接到电话报告说，有人发出短波无线电讯；有人看见德

国潜艇在赫德逊河上浮现。所有这些报告，证明都是凭空猜疑，但每一件事情都得经过侦察和调查。

对我来说，这些统统都有点过于天真。我开始苦苦地思索着在美国经营商业的、成百家德国控制的公司里那些上了锁的档案柜和保险箱内所隐藏的秘密。在那里——而不是在个别古怪人的手中有我们情报机关所必须得到的重要情报。于是，在我的脑海里慢慢形成了潜入室内，或者毫不掩饰地说，是“偷盗”的那种想法。我们搜查可疑的总领馆活动获得成功，使这种方法赢得了高级领导方面的批准。

说实在的，我们初期的成功，差一点毁了我们。虽然我们懂得，我们依然是多么不老练成熟，但是上面那些大人物却认为我们已经能够大规模地进行这种潜入活动了。我们必须——假定是在一夜之间——训练五十个人成为撬锁专家，还要训练更多的人掌握打开保险柜的复杂技巧。

对那些可疑分子保守我们行动的秘密，较之向我们的自己人保密，困难要少得多。我们建立起来的科研实验室，时常有那些来访的军官们出入其间，令人很不舒服。技术人员喜欢向那些先生们显示，怎样轻而易举地用一根电线或者一段破钢锯的锯身，打开档案柜；又怎样把锁撬开，把信件拆封，以及我们在搜查过程中所显示的任何其他技能。甚至对那些我们仍在进行中的具体案情，也习以为常地泄露出去。久而久之，这些道听途说，就成了茶余饭后助兴的谈话资料。一些从未参加搜查队的军官和其他的人们发现，这也是讨好他们女朋友的一个妙法。有一次在鸡尾酒会上，一位年轻的妇女给我详尽地叙述了某一次搜查事件的经过，她是从一个佯称自己是我们搜查队成员而实际上是一个坐办公室的人那里听来的故事。

我们把我们的技术和装备改进到这样的程度，即我们在一个

夜晚就能够重复我们第一次需要十个星期才能完成的工作。然而，策划和准备这样一次搜查任务，有时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每一次重要的搜查，总要把清洁工从可疑的办公室里拿出来的所有碎纸片加以仔细的整理。在许多情况下，来往书信的碎片或者焚烧过的残迹往往足以证明：全面搜查是值得进行的。有一个可疑分子撕碎了他的信件，并把这些碎片付之一炬，但一星期之后，他的私人秘书却把他的速记本完整无缺地扔进了字纸篓。这个速记手抄本，向我们提供了他在六个星期之内寄出的每一封重要信件的内容。

在那个瘦小的英国安全系统女人的指导下，我们拆开腊封的技能已臻于完善。我们学会了在搜查带着灯火管制专用的遮光幕布，以便在灯光下工作；也学会了在完全无声无息的情况下工作，直到我们发现任何可能安装的传声器。我们随身携带含有炭和滑石混合物的放尘枪，可以在被我们碰过的文件或者封皮上再喷上尘土。我们学会注意室内暗设的机关陷阱；也能在接触所有保险柜内的东西之前，记录下它们的位置，以便在挪动后可以把它们准确无误地放回原处。我们有一辆汽车装有短波无线电收发报设备。另有三套小型收发两用设备放在我们随身携带的手提箱内。只是在训练我们搜查小队的非技术人员如何撬锁的问题上，我们始终未能取得多大的进展。学会撬锁和打开保险柜的技术，需要对锁的构造有完整的知识，并且至少要有一年的经常实践。

我们最富有成果的一次搜查，是在芝加哥，在斯蒂芬·克·席格利那套精心设计的第十二层楼的住房里。表面上，席格利是经营银行和保险业务的，而且在银行和保险界享有国际盛誉。但是美国当局怀疑他在干着另外的更为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操纵一个纳粹间谍网。他在一个中立的欧洲国家的首都保留着他自己的银行和保险业务，但他的主要的关系是在德国。

当席格利到芝加哥开设办事处时，他坚持要对办公室进行大规模的变动，重新安排那一套房间，使每一个来访者在到达他的私人办公室之前必须经过四个房间里雇员们的仔细审察。他刚迁入不久，就向大楼的管理人员抱怨说，那些毛手毛脚的清扫女工毁坏了他的有价值的文件，他坚持要雇用他自己的清洁人员。

我们花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审查了从席格利办公室取出来的碎纸片。他是一个习惯于乱涂乱画的人。而他的不三不四的画，总是那些大炮、舰船、飞机、炸弹之类的工整的小图，有时也画一个极象雷达装置那样的草图。最后我们决定要来一个潜入搜查。

作为行动队的负责人，我带上一支左轮手枪和一根包皮的棍棒。三个反特人员也都这样。其余的人，每一个都有一枝铅笔型的信号汽枪。我的首要任务是取得看守人的合作。他和房子的主人，他们早已经被审查过，对我们是肯帮忙的。然而，房主坚持要我们这个搜查队找一个合理的借口，以便进入这所大楼。我建议我们这个小队可以工程人员的身份作为掩护。我们是去试测大楼的倾斜度^①的。

“所有的大楼，”我解释道：“由于倾斜，在应力点上会发生裂缝。这样，今后可能发生空袭，你们就有合理的借口，要求把大楼的应力部位测试一下。同时，我们也能利用这个掩护，在搜查中把电梯全部关闭，借口是：电梯的震动会影响精密的测试仪器。这就有助于防止在搜查时受到干扰。”

“行！”房主人说，“你们是工程技术人员。”

大楼的五个值夜班的雇员，都经过审查。其中有一个人的社会背景不太令人满意，因此把他调为白班。同时，我们的无线电专家在大楼附近选择了停车的地方，两个反特人员穿上油漆匠的大

① 建筑的行话叫侧移。——译者

褂，开始油漆正好位于席格利那套住房外边的过道。两天之后，两位“油漆匠”报告说，他们已能够辨认席格利的全部人员。

然后，我的锁匠和我对席格利的办公室作了一次初步的检查。非常静悄悄的——因为我们知道，席格利如果真是一个间谍，那就一定设有暗藏的机关——那个撬锁专家撬开外屋的门锁。他只用了不到十五分钟时间就把房门打开了。接着，我们就在门口外边工作，开始制作一把钥匙。

我们利用了房主人所提供的整个一层楼的建筑图纸。我很快地把席格利安装的所有的隔墙速描下来，并标出了椅子、桌子、档案柜和其他家具安放的位置。接着，我又搜查暗藏机关。在席格利桌子后面的窗台上，我发现有一只手提箱，它拖着一条隐蔽的电线，一直通向一个墙底插座。我使插头脱离接触，然后打开箱子。里面安有一架带着高敏感度开关的录音装置，开关会自动打开，房间里只要有人说一句话，这声音就通过扩音器悄悄地被记录在薄膜上。

我们在席格利办公桌背后的书架上发现了一个扩音器，另一个则被隐藏在房间中央一张小桌子下面。席格利的私人办公室里还发现有一个“防盗”保险箱。它的把手号码被记了下来。在离开这个办公室之前，我们进行了仔细的检查，使室内每一件东西都放回原来的位置。打腊的地板上有我们的橡胶鞋跟的印记，我们又重新给地板上打上腊。在箱子上曾覆盖着一层薄薄的尘埃，我们就用滑石和碳的尘埃重新盖上。在出去的路线上，我注意观察了万一在遭到干扰的情况下可能逃跑的出路，并且还在隔开席格利办公室几个门的地方选择了一间盥洗室，用来进行照像冲洗工作。

在初步检查的三天之后，大约是清晨1点钟，我们小队十一个人分乘几辆车和一辆巨大的周围封起来的送货车驶向这幢大楼。送货车上标有这些字样：“西北工程公司”。我们事实上还租赁了

一间小小的办公室。电话号码及地址均列在芝加哥的电话簿上。从大车辆上卸下了十二个箱子和手提箱，每一只箱子上都印着公司的名字，里面装满了搜查设备和测试大楼倾斜度的仪器。两个人躲藏在大卡车里，一个是无线电收发报员和那个能够辨认席格利的雇员的安全人员。在卡车的边上留着一个隙缝，通过这个小孔可以清楚地看到大楼的入口。

我在门厅里找到大楼的总管家，装作陌生人的样子，向他出示有房主人签字的测试大楼倾斜度的合同。我要求所有电梯都停止开动。两部电梯为“工程师们”专用，以便把装备安放到各层楼上去，然后，他们或向上或向下走到十二层楼。他们把上衣、帽子和鞋子留在电梯里，嘱咐电梯服务员说，即使是鞋后跟砰的一声响，也会产生震感，足以影响仪器的准确性。

我们中间的一个人，带着钥匙专家特制的钥匙，他走在我们前头，打开席格利办公室的门，先试探一下，使我们这个小队不致误入暗设机关。如果他自己出了问题，他就假装盗窃未遂，拔腿逃跑。但是，事情很顺利，所以他立即进入室内，切断录音机的线路，拉上遮亮的窗帘，打开电灯。看到他发出的讯号，其余的人也都进入室内，每个人各司其职。收发报员同街上停着的卡车建立了通话联系，摄影师在盥洗室安置了他的设备，而钥匙专家撬开过道对面的一个办公室的门锁。这是为了万一需要逃跑时用的。

工作开始后大约十五分钟，卡车上的无线电收发报员报告说，席格利的一个雇员已进入大楼。我们的人敏捷地把他们的装备集中在一起，退到穿过大厅的一个房间里，并且在那里重新同街上的卡车建立了无线电联系。不到十分钟时间，席格利的办公室完全撤空了，没有留下曾经有人潜入的一丝痕迹。

同时，在大楼休息厅里的两个安全人员执行了事先布置好的拖延计划。一个人坚持席格利的雇员必须向大楼的总管证明他的

身份，并且又费了五分钟以上的时间向空无一人的办公室打电话寻找那个总管。另一个人则向那个雇员大讲其关于测试大楼倾斜度的高度技术性的情节。

“你在干扰一件重要的工作，”我们的人埋怨说。“你能不能把你的事情留到明天再办？”

“好吧，”那个雇员说，“说实在的，我不是去工作的。我带了个姑娘在附近街角上的一个酒吧间里，但我没带够现钱。因此我要从我的办公桌里拿出一瓶威士忌酒来。只用一分钟时间就够了。”

就在这样好说歹说之后，让他坐电梯到了第十二层楼。当他打开席格利办公室的门并取走酒时，电梯就在第十二层楼等着，他离开大楼后，我们便派一个人跟踪，直到他又回到酒吧间他的姑娘那里。我们又恢复工作。

我们的专家在不到二十分钟之内就打开了席格利的“防盗”保险柜。我的眼睛立即注视到一个腊封了的包裹，上面用紫墨水办公用戳标着：“下午5点10分收到”。这个日期正好是前一天。很明显，包裹到达之时已接近下班，席格利完全知道这包裹里是些什么东西，因此没有打开就塞进了保险柜。我把这件东西交给了拆封专家去处理。

他用玻璃纸把这件包裹包了起来，玻璃纸上打了小孔眼使蜡封的印记暴露在外。然后，他涂上少量的牙医常用的咬印膏。用它在暴露出来的蜡封印记上取下一个压印，然后用一个烫热了的、铅笔尖似的烙铁，沿着玻璃纸割开整个蜡封。包裹里装着的原来是一册密码本！摄影师拍下了每一页密码，而后把密码本交还给拆封专家，把它按原样蜡封起来。拆封专家用热烙铁使封蜡融化，并且使用牙科化合物制成的印记模型把封蜡结实地压进去。这蜡封看上去一如原样，而且没有留下丝毫曾经被任何手段损坏过的破

绽。

当我们正在进行这一切活动的时候，我们发现在保险柜里有一个很象装有暗机关的东西——在满是灰尘的锡盒子上面放着一根蜿蜒盘旋的线。我们花了整整二十分钟描画和测量这根线，最后断定这根线并不通向任何地方。随后，保险柜里的其他一切东西都被文件鉴别专家取出来仔细审查。此外，从办公桌和档案柜里取出的文件和公文文献，也都经过同样的工作程序。

文件鉴别专家懂得四国语言，他在搜查的全过程中使用了他的全部语言知识。凡被专家审定为重要的文件都要被拍摄下来。照相专家以最高速度工作着。在仅仅不到四小时的过程中，他拍摄下了两千幅有关信件、密码、报告和其他资料的相片。

搜查之后，我们在大楼的休息厅集合。在那里，为了照顾大楼雇员们的利益，我们着实煞有介事地表演了一番把测试大楼倾斜度的工具装箱和简要记录下精确数据的假戏。演戏到一半，席格利突然闯了进来。那个更早来过这里的雇员，在整整两小时的饮酒作乐、喝得醉醺醺之后，终于给席格利打了个电话，报告他说，有一伙人带着怪里怪气的工具窜入大楼，正在楼里楼外折腾。作贼心虚的席格利匆忙穿过特工人员，要求立即把他送到大楼的上层去。我们自信，他决不会发现我们这次来访的任何痕迹，因此我们对他的光临毫不介意。

二十分钟之后，席格利重又出现了。他满面春风，欣然自得，显然是他已发现他所安排的一切暗机关均安然无恙，因此无所怀疑。他对在休息厅地板上散乱着的一大堆测试大楼倾斜度的工具颇感兴趣。而且，当一个“工程师”告诉他这幢大楼保证安全时，他显得非常愉快。他吹着口哨，扬长离去。这很可能是他最后一次这样地吹口哨，因为两天之后，政府特工人员便悄悄地进入他的办公室，而又悄悄地把他带走了。

我们获得了结论性的证据，证明席格利控制着美国六大城市里由十二名间谍组成的谍报网。放在他的保险柜里的有些记载录有这些间谍的名字和住址。其他的材料是关于使用微型胶卷、显影墨水和伪装等等的指示。一个月之内，席格利的间谍人员被一网打尽，这个间谍网被粉碎了。但是，不论是席格利还是他的任何一个助手，都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搞的。

此时此刻，与我们首次潜入外国使馆的笨拙行动相比较，我们已经总结出了一整套万无一失的潜入法。巴塔事件也许比任何案例更能说明我们在技术上的变化和进步。

有一天，西部的军事工厂里一位受到信任的重要雇员格斯塔夫·金生被捕了，因为例行安全检查员在他的口袋里搜出了一种新的秘密武器的部分设计图。金生是在这个工厂研制这一武器部门里工作的工程师，他声称他在工作时把这张蓝图放在口袋里，忘记取出来了。由于他以前曾对这家公司在军事技术上作出过若干有价值的贡献，所以在严厉警告之后，他被释放了。但是，这家工厂的安全负责人对格斯塔夫的说法并不满意，他下令把这个涉嫌的工程师置于监视之下。

格斯塔夫·金生是一个归化了的美国公民，他出生的祖国，那时已被纳粹占领，并且在伦敦设有流亡政府。他是高度受尊敬并被认为是强烈亲美的人。但是格斯塔夫的一个邻居，在宣扬他的美德时，无意之中提供了一个使安全负责人产生疑团的线索。“格斯塔夫是一个非常精明能干的男子，”他说。“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工程师，在军事工厂里干大事情，而且他能制造他自己需要用的任何东西。就在不久以前，他还制作了一架影印机，正放在地窖里呢。”

一架影印机？这真象是指向间谍的一个线索。于是，这个案例就转交给了我们办公室。有关金生个人经历的档案指出，在他

申请职业时，在介绍人一栏里曾使用过巴塔上校的名字。这是他祖国的前流亡政府驻纽约办事处的一位重要官员。我们知道，巴塔上校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从事过间谍活动，现在看来很值得对他进行一番调查。我奉命对巴塔上校在纽约的办事处进行初步的搜查。

“你们来了，我很高兴，”大楼的管理人说。“我对那一伙人实在有点恼火。他们占了整个第十层楼，还有十一层楼的几间办公室。来访者老是川流不息。他们还常常在楼上焚烧文件，把纸灰倒在筐子里。”

我们审查了放在休息厅里的纪录本，发现星期六晚上可能是我们进行初步搜查的最保险的时间。下一个星期六，我遇到了管理人，他放我们进去，直上十层楼。摄影师利用了红外线设备，使他能够在黑暗中照相，他把整个一层楼和楼上的办公室都拍了照片。

办公室很大，仅在一部分空间里，我就发现了一百四十个档案柜，全都上了锁。我把每一个柜子和办公桌上锁的连续顺序号码以及每一个保险柜的构造、类型和大小尺寸都记录了下来。这种连续顺序号码有助于我们制作开锁的钥匙，而事先得到有关保险柜样式的可靠资料，将能使我们的保险柜专家对他所要去撬开的那些保险柜的类型保持清晰的记忆。

我很快认识到，这次潜入将会非常复杂，而且规模甚大，需要动用我们所有的人力和设备。我们需要两部高级摄像机、一辆安装无线电收发报机的汽车和每一层楼需要一架手提无线电收发报机，还至少需要有二十个人。

有好几天时间，被选派的安全人员装扮成清洁工和修理人员的样子，在办公室周围工作，直到他们能够一眼就认识那里的主要雇员为止。无线电在这个区域进行了试验，以便肯定这幢大楼

的电器设备不会干扰收报和发报。

我们决定再次施展测试大楼倾斜度的技艺作为我们这次搜查的掩护。我们又增添了若干毫无意思的、但却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工具，好让大楼的夜间值班人员感到，这些工具的使用不同凡响。有了这些道具，我们这个搜查小组就准备去进行一次留下极深印象的潜入。

无线车辆停在大楼正对面的街上，这样，安全人员可以在那里监视大楼的入口。在大楼管理人的安排下，货运卡车进口的大铁门打开了，两辆装载室内用的无线电设备和摄影人员的大卡车开了进去。一分钟之后，大铁门又关上了。我们的人把他们带的器材设备搬进了电梯，然后跑到第十层和十一层楼上去。

另两辆车载着“工程组人员”开到了正大门，大楼管理人在那里迎接。这里停留一下，无非是显示他们的精致道具，并且使他们进入这里的一套理由更能令人相信。接着，这些人员也都进入了可疑的楼层。

保险柜专家立即开始了他的工作。档案柜和办公桌的锁很快都用事先配好的钥匙打开了。文件鉴别专家接着就审查档案柜里大量的资料。仅仅在十分钟之内，第一批相片就拍摄好了。

突然，我们接到对面街上发来的警告说，有一个窗户还漏出灯光。我们弄好了遮光窗帘漏亮的地方，从街上停着的那辆收发报车上马上发来了使我们放心的“O.K.”的讯息。我们的工作进展很快。又过了十分钟，保险柜被打开了。我们默默地工作着，一片肃静。谁也不许使用饮水喷泉或盥洗室，免得下水管道发出的咕隆声响会暴露我们。搜查和文件鉴定人员以最高的速度，足足工作了五个小时。摄影师拍下了六千张以上的照片。工作完成了，我们准备离去。

每一件东西都物归原处。小保险柜由于里面的东西，看来很

少使用，柜子上面都有了一层灰尘，现在又使用放尘枪重新覆以灰尘。办公桌又擦了一下，档案柜上的指印统统抹掉；地毯上可能会留下我们穿着袜子的足迹，也索兴给它刷个干净。

当我们回到我们的总部时，摄影实验室冲洗了三十五毫米的胶卷。底片干了的时候，就一张一张地加以放大。然后，我们对这许多相片加以分类，并编成索引。这样，我们就能够检验那天夜晚搜查的成果了。

我们获得到了什么呢？首先，我们掌握了格斯塔夫的全部历史。我们确知，他是一名外国间谍，而且也知道了他所提供的每一项情报。除此以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搞谍报的总部，它在南、北美洲每一个大城市搜集军事机密。

这个间谍网活动的严重程度，使我们大吃一惊。举例说，在盟军攻入西西里岛之前两个星期，我们就在这个纳粹间谍总部发现了进攻西西里的计划。

我们潜入行动的历次获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帮助我们工作的熟练的技术人员。这些人都是普通老百姓，他们在夜间冒着毁坏自己的名声、甚至是生命的危险来帮助我们。假如在这些潜入活动中偶一不慎被当场抓获，他们是不可能有什么辩护理由的。我们全都自己承担风险——但是这些人都有可能毁了他们的事业或者职业。我们国家的一位最有名的摄影专家一次又一次地冒着私闯民宅从而被捕的危险，帮助我们去完成异常困难的摄影任务。

最后，我从搜查队被调到战略情报局的学校里，担任教导员的工作，在那里，我教会战略情报局的一些缺乏经验的特工人员，如何撬锁以及其他有关的复杂技艺。又过了一些时候，我带了一个开保险柜的专门小组进入德国。我们在那里弄到大量文件，这些文件被送往纽伦堡，作为纽伦堡战犯审判庭上的证据。

第四部分 以诈对诈

(1943 年)

战争形势终于开始扭转。在太平洋上，美军攻克了瓜达卡纳尔岛，但面临着的是越岛作战的可怕任务。那年秋天，盟军进军意大利，正冒着纳粹的炮火，顽强战斗，在古老文化地带寸步寸步地前进。

随着战火的日趋猛烈，间谍这一招的全胜王牌，在一场空前神机妙算的智斗竞赛中亮了出来。这是一个有着危险使命和巨大骗局的年代，是一个涉及千万人生死存亡、进行大胆拯救的年代，是一个在敌人大后方建立秘密武装力量以骚扰敌人的年代。这也正是在那些号称“中立的”间谍和外交活动中心——里斯本和里斯坦布尔国际盗窃活动和国际阴谋空前猖獗的年代。

心理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成为如此必不可少的武器。轴心国的宣传机器，在奴役其本国人民方面是早已得心应手的了，现在散布着恶毒呼吁、老练的谎话和涣散人心的谣言。而同盟国则使用了可以穿越战场的新型通讯设备来进行反击。

探求更大杀伤破坏力武器的科学竞赛，在军事上给予了最优先的考虑。每一方都使用间谍和侦察手段，刺探出对方骇人听闻的秘密。同盟国轰击机发动了猛烈的、不惜同归于尽的袭击，以摧毁敌人对任何一种可以用来赢得突然胜利的武器的试制。

到了1943年底，没有一个人敢说，究竟是单凭人力，还是单凭智斗，就能赢得这场巨大的搏斗。

使轴心国上了大当的一具死尸

伊凡·蒙塔古

在大西洋海岸直布罗陀北面一百三十英里的一个叫作韦尔发的西班牙城镇墓地里，安息着一个英国居民。他是在多雾而潮湿的英国死于肺炎的。他生前怎么也不会想到会在阳光灿烂的西班牙蓝天下长眠。在他的有生之年，他没有为他的国家做出什么贡献。他去世之后，却可以有把握地说他搭救了成千上万英国人和美国人的生命。

1943年秋天，盟军向北非的进军正在沉着坚定地逐步走向胜利，并已初步作出决定：下一步攻打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德国人所必然会估计到西西里岛将成为下一个目标。我们怎样才能改变德国人的判断，诱使他们中计，从而分散他们的兵力呢？

我们的英国海军谍报小组的一个成员提出了一个建议。当时，德国人已经知道我们的官员正在不断地乘飞机沿着西班牙海岸周围飞向北非。我们为什么不布置一具尸体，身上带着特别炮制的文件，让他漂流到西班牙的海岸边，看上去好像是飞机失事而坠海致死的呢？如果这具尸体漂到海岸，可以打赌，这些文件肯定会落到德国间谍分子的手里。

一个实际问题发生了。死人是不会呼吸的，如果把他放在海里，他的肺部则会空无他物——这样验尸人会确证：这个躯体掉进海里时已经是死人了。于是，发现死尸者就会怀疑这是一件“故意安排的计谋”。

我们悄悄地在军事医疗单位范围内进行了解，希望能获得一具尸体，它的致死原因可以同水溺致死别无二致。最后，接到一份报告：有一个人刚刚死于肺炎，这种死亡使在肺部有液体。这个死

者的一些亲戚还活着。我们并未透露细节就得到他们的同意——条件是：对这具尸体的真实姓名将永保秘密。从这个时刻起，这个死者就成了“皇家海军陆战队少校威廉·马丁”，他的尸体立即被放进了冷藏库。

事情一开始，就决定：为了欺骗敌人而炮制的文件，必须有高级领导人签署。我安排妥了由帝国参谋总部的副总参谋长写一封信给当时去非洲指挥第十八集团军的亚历山大将军。这封信是一封不准对外发表的文件，内容是说明亚历山大将军为什么从参谋总部不能尽如所愿地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人们可以据此推断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正在西地中海计划进攻的目标，并非西西里岛。

在这封信里，我们还故意搞了两个假目标作为盟军可能发动进攻的对象：一个是希腊，另一个没有明确地说明具体地点，只是泛指西地中海某地。同时信里也明白指出，我们要使德国人误认为我们将在西西里岛登陆——我们正是用西西里岛作为我们真正进攻目标的“掩护”。因此，如果德国人对此信以为真，那末任何攻打西西里的真实消息泄露给他们时，他们会认为这是我们诡计的一个部分。

此外，我们还决定让马丁少校随身带上由路易斯·蒙巴顿勋爵致皇家地中海舰队司令、海军元帅安德鲁·坎宁恩的一份公报。公文说明了马丁少校的使命，结束时说：“我想，你会发现马丁正是你需要的人。进攻一结束，请让他立即回到我这里来。他可以带上一一点沙丁鱼——在这里它们是定量配给的！”我认为这个颇费心机想出来的沙丁鱼笑话对德国人会具有吸引力——意在表明撒丁岛将是一个攻击的目标。

下一个难题是马丁少校的身份证。从死者身上摄取任何照片，都只能是毫无办法的死人相。后来有一天，正在开着会，我忽

然发现坐在桌子对面的人，简直是马丁少校的再世，我们说服了他给照了一张相。

现在，我们必须赋予这个尸体某种个性。我们把马丁定为一位登陆艇专家，这正是他飞向北非的原因所在。他可有一点爱挥霍，在他的口袋里放着一封劳治银行1943年4月14日的来信，要求他付还透支的八十镑钱。

每一个年轻军官都有风流韵事，马丁少校最近遇到了一位名叫帕姆的媚人姑娘。他身上的皮夹子里带着她的一张照片和两封信。这两封信不断地折叠又打开，使人看上去好似已被反复阅读过多次。有很大可能，他因订婚才向银行透支的。因为在他的口袋里还有购买订婚戒指的一张五十英镑的账单。当然，马丁身上还得带有一些日常的个人用品和零星物，诸如刻有名字的手环、手表、香烟、用过的公共汽车车票，一些纸屑、钥匙等等。我们还决定安排一个细节：他很可能最后一晚在伦敦时，是陪着未婚妻一起在看戏。因此，在4月19日乘潜水艇离开之前，还把两张看4月22日一场戏“新气派”撕了一半的戏票放进了他的口袋里。

我们决定把这具尸体放在靠近葡萄牙边境的一个叫做韦尔发的小港口外的水域里。西班牙人发现这具尸体后，必然会把它移交给英国副领事来把它埋葬掉。同时我们感到有把握的是：当地的德国情报人员肯定会获得死者身上文件的复制品。

幸好，由海军上尉恩·艾·朱威尔指挥的潜艇“天使”号，正好在我们希望的日子驶往马耳他。朱威尔在盟军登陆北非之前，于1942年曾几次把马克·克拉克将军秘密地带进、带出北非。

现在我们只需要等待丘吉尔首相的最后批准了。我们不得不提请他注意，如果德国人看穿我们的计谋，他们一定会把西西里岛列为盟军攻打目标。丘吉尔表示同意，并且通知了当时指挥进攻西西里岛的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

“天使”号潜艇于1943年4月19日下午6点钟启航。甲板上躺着威廉·马丁少校，他被放在一个六英尺长放满冰块金属容器里。整整十天，“天使”号只是在夜间露出水面。4月30日，潜艇距韦尔发只有一千六百码，一路没有被任何人发现，并且按时抵达。在战役开始时刻凌晨4点半钟，金属容器被高高地抬起来，马丁从里面滑了出来。朱威尔向少校的救生衣里打气。当司令官为葬礼念念有词时，四个年轻的军官脱帽俯首致敬。然后，他们轻轻一推，马丁少校开始战斗了。在半英里外，朱威尔从我们的正机上放下一只橡皮筏，筏上只有一个铅制的桨板，为的是装成时间仓促的假象。

1943年4月30日清晨，一个西班牙渔民在海岸附近发现了尸体。后来当地政府取获，验了尸，结论是：沉没海水窒息致死。英国的副领事及时拿到了通知。1943年5月2日，马丁少校在军事礼仪下安了葬。

迄至当时为止，一切情况还不错。尸体归还了我们，但是关于有关文件之事，我们没有得到任何通知。5月4日，我们发出了“最急最机密件”信号，说明我们获知威廉·马丁少校身上带有文件，其中某些文件“至属重要并机密”，应向保持中立的西班牙政府提出正式要求，希望归还这些文件。

在此期间，在韦尔发的德国间谍并没有使我们失望。他已经了解到一些信封的存在以及收发信者的显贵身份。从以后发生的事情看，无疑地他已把这一切报告了上司。一直到5月13日西班牙海军总参谋长才把这些文件移交给我们的武官并通知说：“一切都完好无缺”。

之后，我们又要求在死者墓上立一块碑，这块墓碑至今还在（帕姆还献了一个花圈）。最后，我们把马丁少校的名字列入1943年6月4日伦敦《泰晤士报》发表的战地伤亡人员名单。

7月份盟军在西西里岛的胜利登陆，是我们计谋成功的有效证明。但是更有力的证据是后来缴获的敌人文件。第二次大战结束后，有一天，负责清理缴获了的德国海军档案的一位英国官员，曾经用惊惶失措的声音向皇家海军情报处处长报告，有一位非常高级的陆军军官，显然通过不正规的途径发出过一些具有高度机密的信件，而这些信件均落入德国人手中。

很明显，这些高度机密信件就是马丁少校身上带着的文件。就在德国人的档案卷宗里，放着这些信件的复制照片以及翻译过来的德文译文和情报机构的报告。其中有个卷宗是专供德国海军上将邓尼兹批阅的。在这具尸体漂浮到西班牙海岸的十四天之后，德国海军参谋部的战争日志上记载着：陆军参谋部已经肯定地作出结论：“这些文件是真的”，而且他们判断盟军攻击的主要目标不是西西里岛而是撒丁岛，同时还将在希腊作配合性的登陆。

德国最高统帅部把一个完整的装甲师从法国调往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控制着通向阿拉克索斯角和卡拉马塔角两个海滩的交通。这两个据点在马丁携带的文件里曾经提到。这个大调动，使这个师一段时间内根本打不了仗。最高统帅部还下令在希腊沿海布雷，部署海岸炮群，准备R-艇（德国摩托鱼雷艇）基地并建立指挥站和海上巡逻队。德国人在6月份把一支西西里岛R-艇舰队调往希腊。

德军西线司令，威廉·凯塞尔元帅以武装力量最高司令部名义签署了一项命令，要“增援撒丁岛”。于是一支强大的装甲部队被调往法国的科西嘉岛，并且加强了西西里岛北端的防务（实际上盟军并未登陆），为的是防止“盟军进袭撒丁岛时发动的牵制性进攻”。

甚至当盟军已对西西里岛发动进攻后，德军最高司令部还要求部队在直布罗陀海峡特别提防盟军进攻科西嘉岛和撒丁岛的护

航队。在有的文件中还颇有怨言地提到：把 R-艇舰队调往希腊，使西西里岛防务出现了致命的缺口。

马丁少校“使命”的成功，还可以从德国元帅隆美尔的话中得到证实。他的私人书信文件里揭示，当盟军入侵西西里岛时，德国的防御被引入歧途——“这是由于在西班牙海岸发现外交信使浮尸的结果”。

希特勒也肯定看到了这些文件。因为海军上将邓尼兹在他的日记上写着这样的话：“元首不同意……盟军最可能进犯的地点是西西里岛。他相信德军所获悉的英军指令证实了盟军的主要进攻目标是撒丁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

邮电检查员与间谍

玛丽·奈特

我是战时的一名检查员——一万五千名“包打听”之一。这些“包打听”差不多有四个年头的时成天就是开拆信件，听别人打电话，干预电影放映，阅读材料和无线电台节目等等。

开始时，我们有一种犯罪感。我们在做一种我们大多数人都厌恶从事的工作——好管别人闲事。但是不久我们就发现检查工作该是何等必需。其意义甚至在珍珠港的废墟停止冒硝烟之前已十分清楚了。那时，我们接管了檀香山的一所老式房子后，在洗澡间实验室里打开的第一批信件中，就有一封详细地描绘了袭击珍珠港的具体细节。这封信是辗转传递寄往日本的。

检查制度是一种双刃剑。它不仅不让敌人得到我们的情报，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它也给我们提供了有关敌人方面有价值的资料。举例来说，一位检查员从一封商业来往书信中摘取一点东西，从另外的一封信中又摘取一点，如是这般累积起来，就得到了日本

人秘密做生意航道的全貌。这就使得美国海军有可能潜伏在某一个地点而击沉日本商船。

一次偶然被听到的电话谈话，透露了一个对当时急需的奎宁药品搞黑市交易的市场所在地。从检查一份海底电报中，我们发现了在哈瓦那的一个德国间谍。他装扮成一个妇孺衣料商，诡秘地从多家银行里领取款项。他被抓起来审讯，定罪并枪决了。1938年到1945年，一共有九十一个人被判定犯了反对美国的间谍罪行而被逮捕。在大多数这类案件中，邮电检查对破案起了作用。

当检查机构的头头第一次上班时，他仅仅是在华盛顿借了一间房间。后来，他的这个机构在美国全国发展扩充到九十所大楼。而且它还同英国和加拿大一起，建立了第一个全球性的检查监察网。

大部分的检查官员必须是某一方面的行家。我们这一行需要译电员、翻译员、技术人员、法律和财政专家，甚至还要有集邮专家那样的人（一封寄自某一“邮票收集者”给另一收集者的信里附了一老版邮票，通过巧妙安排的暗号，透露了关于“爱荷华”号战舰将于某天从某一港口启航到达某一目的地的情报）。有位哥伦比亚的大学教授，可以阅读九种不同文字的资料，其中包括梵文，同时辨认得出九十五种其它文字。我们碰到的语言文字有海地克里奥耳人所讲法语，印度斯坦语盲文，还有葡萄牙人搞的拉丁化日语（葡萄牙神父在十七世纪时去日本传教，把日语拉丁化，现为巴西某部分日本人沿用）。克里奥耳人所讲西班牙语（为库拉腊索居民所使用，包括从水手们那里捡来的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和英语词汇）。我们拥有能阅读三百种文字材料速记的语言学家们。

每天，有上百万封信经过我们的办公室。一封航空信只能耽误二十四小时，普通邮件耽搁不超过四十八小时。我们自己政府和盟国政府之间来往的信件是不拆开的。但是我们必须很仔细地

检查信封。因为敌人的间谍甚至伪造美国国务院和白宫的信封。所有的信件都要根据一张“监视名单”加以核对——名单上都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或者怀疑系我们的敌对分子。这个名单的总人数有所起伏，总在七万五到十万之间。这些人的信件需要特别处理。

其他的信件我们总是立即转移到检查员的桌子上。每个检查员都有一本厚厚的标有政府部门所需各种专题调查项目的本子。例如，财政部对财金来往、商业部对做生意情况、劳动部对工作条件以及联邦调查局对可疑活动等等。

被检查截获的文件透露了橡胶、马口铁和云母这些战备物资的贮藏点。根据某一检查员提供的线索，查获了正在运往阿根廷途中的一货船锌：这是在海洋中被抓住并勒令返回美国的。有一封信透露了纽约某一工厂正在把三百万磅镍废料运往瑞典制造硬钢，以便最终运往德国。另一封信泄露了德国的一个计划：德国要在西班牙出售一百万瓶香槟酒，以便在国外银行储存近六百万美元。一个德国母亲给她在美国的儿子写信说：他回德国后将会乘火车去上班。这就泄漏了新建铁路线的消息，这条铁路立刻遭到了轰炸。

在我国边境线上，我们检查乘飞机和火车旅客的证件。有一次我们抓住的一位女旅客，她在一篮子鲜花中间藏了一张条子，上面写着一艘重要船只离港出航的日子。一个纳粹间谍用显影墨水写的信里抱怨说：他的活动由于旅客检查站而陷于瘫痪。这一下使他在边境就擒。

由于续有新的发现而使我们不断提高警惕性。例如有人把金刚钻石藏在巧克力糖块中进行走私。发现过一只肉罐头罐底夹层里放着一份德国“法本工业集团”一年来在西半球活动的报告。这家工业企业同时也从事纳粹间谍活动。

最使我们感到担心的是那些用秘密暗号和隐显墨水书写的书

信。凡是在信件中使用奇怪号码或记号的，或者别扭的表达方式，或信纸看来有烤干或刮过的痕迹的，我们都要进行非常仔细的检查。即使无色的擦痕也显露出为隐显墨水侵蚀过的信纸纤维。我们把每封有上面所说那些怀疑之处或其他可疑迹象的信以及几乎所有与“监视名单”上任何人来往的信都送往“技处部”。

“技术处理部”是我们故意给设在华盛顿的一个试验室所起的含糊的名字，那里负责检验一切代号、密码和隐显墨水。这个试验室地处偏僻，无窗户，它的有着屏障的入口处只放行十二个上下的男人和女人入内工作。他们用沾着试剂的拭子“清洗”每封信使普通的隐显墨水显影。同时用紫外线来进行探照。他们发现了一种德国方法，把一整页东西用暗语打字并照相，然后缩小成一个小的圆点，把它隐藏在信封口的边上，或者藏在打字字行的标点符号里，这种信除一个圆点外其他一切正常，无懈可击。

我们侦察了成千上万个代号和密码。我们认为至少有四千六百个值得联邦调查局或其他情报机构来进一步严加注意。代号常常有“明的”和“暗的”两种。“明的”代号用一种看来清白无害的信息来掩盖危险的情报：“母亲将于7日抵达毕尔巴鄂（西班牙港口城市），”这里“母亲”指的是护航队，“毕尔巴鄂”指的是直布罗陀。“暗的”代号常常是用暗号来代替信件，用号码或记号来代替文字。它们同“明的”比较起来，相对地说危险要小一点。因为他们用这种方式已说明它是秘密信息。

我们需要有最机敏的检查员检查国际电话信息。他们坐在那里，戴着受话机，一手拿着铅笔，一手按着线路开关，可以立即切断任何一方的通话。麻烦老是出在高级官员的通话中，特别是在发生危机的时刻。在德黑兰会议之后，有一位将军的助手在通话中逐一详细介绍一些乘客的名单和官衔——有的是很高级的——这实际上无异于邀请敌人对这些高级官员进行伏击。

在国内归档的每一份电报，都通过电传打字机发往我们的十二个电报站。如果我们完全了解电报的内容，并且能肯定这是无害的，我们就批准通过。如果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我们就要加倍进行检查。一个士兵是不容许给女友发电报时用“价值‘四镑’的兰花”字样的。我们把它改成“四镑的开花植物”。花名可能是个暗号。一个检查员把“父亲已死”改为“父亲亡故”，结果来了封回电问道：“父亲是死还是亡故？”——一个致命的暴露。

· 归总起来说，检查机构先后查获了将近四百封重要的秘密间谍文件。开始时对“间谍玩意儿”持怀疑态度的人对下面这件事大吃一惊：一封由欧洲寄给纽约一家旅馆一位妇女、看来毫不足奇的普通个人信件在清洗处理时露出用隐显墨水写的信息：“向泰列莎去信或亲自到她那里去。她从密勒先生那里取钱……”。我们没有把收信人立即逮捕，为的是继续检查她的信件。不出所料，她无意之中暴露了五个同伙。最后这六个人都被捕从重判刑。

另一个女间谍，用了一套比较聪明的传递情报方法，但最后弄巧成拙，败露了。她建立了一个世界性的销售洋娃娃商业网。她用一种外表正常的商业通讯，来掩盖她向日本传送在她去太平洋海岸办事时所观察到的，有关盟国战舰驻在地和情况的报告。她写道：“我把三个英国洋娃娃留在洋娃娃医院里了。几个月之后，他们会全部修理一新。”这是指三艘英国军舰。信中还提到“暹罗洋娃娃”，指的是两重目的的护航航空母舰。如果不是因为她在某些信件上冒签了她同行中别人的名字，而根据她从日本人那里抄来的地址给阿根廷某地发信的话——阿根廷的地址偏偏弄错了！她的这些代号是不会被人怀疑的。结果这些信退回到她冒签的所谓发信人手里，我们向联邦调查局报告，联邦调查局又告诉了我们。于是我对凡是谈到洋娃娃以及有范尔瓦里·迪金逊签名和其他人签名的信统统进行了审查。结果从雪片纷飞的信件中发现了足够

的证据，把女间谍逮捕了。她承认有意逃避政府检查罪，受到严惩：罚款一万美元和十年徒刑。

在我们的“监视名单”上还有一个住在瑞士叫哈尔柴尔的人。一封署名艾尔·迦孙寄给他的信看起来十分自然，毫无破绽。但是它却掩盖着一份用新的隐显墨水写的关于我国生产炸药的情报。这可是让我们上大当！很好，后来的信表示“迦孙”害怕了——“很可能非逃跑不可”。他让他的上司不要再给他写信了。他的好墨水已快用完。下次他将用尿写字并用“皮尔”这个名字签署。他真的这样做了，提供了一些军事情报。联邦调查局把他逮捕了。在大量证据面前，他承认自己是纳粹间谍。他叫劳特尔，是一个入了美国籍的外国人。

通过检查信件，我们还发现通向我们阿拉斯加新基地的三起间谍踪迹。一是日本女人，企图打扮成一名印地安人蒙混过关。一名间谍想在森林里建立一座无线电台。还有一个间谍想要得到隐显墨水。

我们取得完全成功的一次扣压消息——由于电台和报界的合作——是不让日本人知道他们的一种新式武器的效验究竟如何。这种武器就是现在出了名的装着炸弹的纸气球。当顺风能把它们带到美国西北部森林中时，日本人就把它放出来。日本人希望它能在美国引起大火，从而动摇老百姓的士气。在俄勒冈州被一群正在野餐的主日学校学生发现的炸弹，炸死了一名妇女和五个孩子。后来森林服务处一共发现了三百三十四个这种炸弹。我们这次保密做得如此成功，以至日本人以为这些炸弹根本没有到达美国。他们在发射了九千个这种炸弹气球后也就放弃了这个计划。

所有各种类型的检查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在这期间，我们一共截获了一百多万封危险的信件和电报。当然，我们也顺便听到了许多美国人的通话并拆读了他们的信件。当他们违犯国家安

全规定时，几乎都经常是无心的。当我们打断他们的电话，要他们说话小心时，许多人甚至对我们表示感谢。

深藏密友的丛林

拉尔夫·依·亨德尔逊

在缅甸，一位长着胡子的年青上尉对我说：“当我们志愿参加‘危险性服役’的时候，我们当然不知道我们会到这个地方来，当然更没有听说过有一个叫做克钦的部落。可现在我们对这个部落已经颇为熟悉的了。他们真的是世界上最好的丛林作战者，走运的是：他们碰巧喜欢美国人。”

这支美国—克钦族的别动队，是美国战略情报处的一支小分队，他们在日本人的后方作战。由于这个原因，这支别动队需要有一种军事秘密的屏幕把它保护起来。然而，我已经听说过有关这个支队的一些令人惊异的成绩。

1943年2月，这支部队曾经作过温盖特将军的前哨。当他率领他的“亲敦支队”深入缅甸进行第一次较大规模袭击时，这支小分队就成为前哨屏护。1944年初，他们曾担任过梅里尔将军“突击队”的向导，在丛林中行军七百五十英里攻下密支那的简易机场。当史迪威公路^①的工程师们穿越丛山峻岭修筑一条通往中国的陆上通道时，他们走在前头。当威利将军的“火星部队”正在缅甸北部丛山里最后摧毁日军老巢的战斗中，他们也是走在前头。

战斗经验可观，也许可以如此说；但这不过是美国人同原始部落民接触以及结成战斗伙伴关系后所带来奇特成果的故事中的一

^① 史迪威公路是连接缅甸和中国云南省昆明市的战略公路。史迪威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译者

小部分而已。

那位上尉继续向我说这个故事：

“我开始报名参军时，简直象是争取参加什么联谊会、兄弟会一样。我们单位的官员们在国内训练营里挑选着合格人选，他们要你谈上两句：‘你是不是愿意参加突击性战事行动？当然是带危险性的。’‘你会照顾自己照顾得挺不错吗？’接着又是一个需要三思才能回答的问题：‘你敢不敢独自一个人在敌人后方跳伞降落？’当我被叫到华盛顿一间房间里，并要我准备一张如果碰上我单独在丛林里的情况下应该需要那些物品的单子时，我对我将被派往何处略有所悟。几天之后，我登上了一艘小艇，一位军官告诉了我将要去的地点。”

缅甸同印度阿萨姆邦接壤的山区是世界上最原始的地区之一。从飞机上往下看，就象在一堆堆的岩山上披了一整块硕大无比的绿色豪华绒毯。从地面上看，这里一般是无景可看，而只是一片见不到阳光令人憋闷的植物。极少几条由山上居民践踏出来的羊肠小径，似乎更加加深而不是减轻了这一片无尽丛林的无法渗透性。

正是沿着这些小道，于1942年初，遭受挫败的盟军从缅甸逃到阿萨姆邦。沿着小道，在那次败退之后，日本人盘踞要津，杜绝了盟军卷土重来的任何希望。此外，日本人对缅甸的征服还切断了缅甸公路，使中国处于孤立隔绝。除非能找到新的通路把供应品运送到中国，中国将面临绝境。在缅甸北部多山地区把日本兵清除干净并修建一条长约一千英里的物资供应公路的这一任务交给了约瑟夫·史迪威将军。美国一克钦族别动队作为史迪威将军的一支队伍，起了出色的作用。

1942年7月4日，一个小组先去阿萨姆邦在那里设立了别动队的总部。开始时那里总共才有二十个人，十一名军官和九个士

兵。他们是经过精选的一些专家：不仅有经验丰富的军官，而且也有一些专家，其成就与战争毫无关系的地理学家、语言学家、律师甚至于还有一个珠宝商（他使用精密仪器的技巧在设计小巧耐用的无线电时起了极大的作用）。

这支部队的行动计划很简单，有些常规部队的人把它说成是“发了疯似的”。在日本人占领的山区里有一个好斗的山地部族，叫做克钦人，他们十分仇视日本人。我们的计划就是由美国志愿人员去把克钦人组织成战斗单位，向他们提供武器和领导。夜晚，在敌人的占领区内，一个美国志愿人员会在靠近丛林深处的一个小村子里跳伞降落。另一个降落伞则携带着食品、武器、药品和送给村落人民的一些礼物以及一部小型发报台。

当美国志愿人员一跳伞（也常常是他生平第一次），一切都已无可挽回地将由他自己主宰。尽管他对当地语言和习俗一窍不通，但他必须同当地人交朋友。他必须把自己当作他们的领导人，相信他们决不会因重金收买而背叛出卖他。只要他在当地站稳脚跟，那末，夜航机将会源源不断给他运送更多的食物、武器和各种供应品。他也可以开始进行他的小型战，对敌人发起袭击和伏击。

这个计划当然需要胆识。如果不是由于下面两个因素，人们满可以认为这是盲目冒险。第一，这个地区荒野原始，丛林密布，位于僻远的山村，日本巡逻队从未进入过。第二，克钦族的难民曾经告诉我们，他们喜欢美国人的程度正如同他们仇恨日本人一般深。克钦族战士正象美国士兵们后来相当惊奇地发现的那样，和想象中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原始野人形象并不一样。他们通常身高不超过五英尺，头发细密，牙齿不齐，样子孤僻，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愚蠢笨拙，他们的衣服就象是很久以前穷亲戚送给他，而他有意极少洗濯，为了怕它们洗得破烂不成体统。从外貌上看，人们看不

出与他所属部落内部嗜杀格斗以及外域抢掠史有任何违背之处。号称“缅甸外科大夫”的戈登·西格雷夫医生对于情愿让他开刀的克钦人是很感激的：克钦人对刀的普遍喜爱使得他们欢迎任何动刀的试验，包括在他们自己身上动刀。克钦人对流血的爱好是传统的，自然的；他对美国人的喜爱则是后天的。

1878年，缅甸正值国王锡袍(Thibaw)统治时期，当时美国一个名叫威廉·亨利·罗伯茨的传教士，曾要求能允许他进入这个国家的边远的北方领土。那里居住着原始的、好斗的种族，缅甸人称他为“克钦”——意即“强盗”。任何旅行者在那里都不会感到安全。国王同意了他的申请。如果一个外国人为了他自己的那种牌号的宗教狂热，愿意奉献他可能极为短暂的生命，这就与他无干了。

罗伯茨在克钦人之间进行工作产生了两个显著的后果：首先，他赢得了部落内大部分人的感激。他们的第一个毫不自私的朋友，第一个愿意教他们并生活在他们中间的是来自那个遥远的叫做美国的国家。根据一种简单而朴素的逻辑推理，这些山地居民对于罗伯茨以及那些在他以后来的美国人的友谊，逐渐全盘地移向那个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伟大国家，美国的身上。其次，罗伯茨为他们搞了一种书面文字。因为克钦人没有他们自己的字母，罗伯茨就把当地语言的发音，尽可能用英文中相近的字母来表示。他还在他们中间建立乡村小学，教他们最起码的知识。因此，许多克钦人就用我们的字母来学习他们自己的文字。由于我们同他们使用同一种字母，因此，训练克钦人的无线电发报员就成十分容易的事了。

第一批志愿人员在黑夜跳伞降落在毫无所知的陌生地区确是心惊肉跳的。他们承认这一点。他们害怕在丛林里全然迷失道路，害怕受伤，害怕蛇，害怕疾病的侵袭。最使他们感到惊怕的就是被敌人抓获备受折磨。有一个志愿人员曾经对我说：“我第一次

跳伞时，跳得很顺利，安全地降落在一个克钦人村落的附近。他们第二天就发现了我。他们待我十分友好，给我吃大米和鸡蛋。但是我知道，一支敌人的部队就在附近，我准备随时牺牲自己的生命。当时，我自己根本不知道，你只要把手搭在最靠近你的克钦人的衣带上，他就会把你送到日本人怎么也找不到的安全地点。他可能对你曾经大力学会的几句当地话一句也听不懂，但这并没什么关系。他会把你隐藏起来，弄东西给你吃，整天陪伴着你，直到你可以安全地进行活动为止。”

这些志愿人员，在开始时还无心顾及打仗。他们为了要学会如何在丛林中生存，有很多事要做：要同总部建立无线电通信联系，要熟悉当地人的语言和习俗。他们需要熟悉他们所在的地区所有丛林的通道，日本人通常使用的道路以及那些只有克钦人知道的小路和狩猎通道。日本人现在当然知道了他们的存在。敌人的巡逻队把他们从一个地方追赶到另一个地方，但绝少能抓住这些志愿人员。

克钦人十分乐意充当战士。慢慢地每个美国人都能够把自己的一股坚强的小个儿战士组织起来，并且开始把他们建成武装力量。无线电经常报告他们所在的地点，要求投递各种供应品，运输机不断地在山上的稻田或秘密的林间空地投下一包包用品。投掷的数量标准相当于普通一支美军部队供应品的三分之一。别动队成员生活用品的其他三分之二则仰赖当地。

对于克钦人来说，连年战争使日用必需品濒于绝迹。现在从天而降的厚礼有如奇迹：大米、盐（山地难得，珍贵如银）、药品、烟叶、灯油、机枪、来复枪以及在丛林中使用的各种武器。

这些武装力量很快就开始互相接触串联并渗透到敌人占领地区。他们在丛林中开辟出能让飞机着陆的小片隐蔽空旷地。在那里小型联络飞机能够悄悄飞入运走伤病员。他们竭力抢救在敌占

区里飞机出了事的驾驶员以此来报答空军的恩惠。

在那些曾朝着漠然无所知的地区跳伞的美国士兵，现在已成了老资格的战斗员了，他们学到了大量关于在丛林生活、关于克钦族的知识，就拿我们这位年青上尉的经验来说，他跳伞降落以后两个月，在无线电里得到了“开始战斗”的命令。

“那时候，我带领着一个班的克钦族士兵，”他对我说：“对于四周的通道和小路，已有了相当清楚的概念。那时候，我们在山路伏击敌人，炸毁桥梁，炸毁弹药库。在丛林伏击战里，克钦人能够用尖尖的竹桩干出使敌人丧胆的事情。他们在灌木丛的两旁，按上象针尖那样尖锐的竹桩，并把它们巧妙地伪装起来。当一支敌人巡逻队遭到枪击时他们就扑进灌木丛中躲避——这一下啊，我实在不愿再谈下去了。经过几次这样的伏击，以后我们再向日本人开火时，他们就再也不敢跑进灌木丛去找掩护了。

“当然，日本人是想对我们进行报复的。我的生命可以说还不如一个镍币那样值钱，如果我的士兵不以十倍的警惕性胜过任何一个日本人的话。他们看来似乎能预卜日本人将会在什么时候到来。仅仅有过一次，在同敌人进行好几个月的捉迷藏式战斗中，日本军的行动突如其来使我们大吃一惊。那天我们正要炸毁敌人的一座桥梁，兴许我们过于全神贯注地考虑这件事了。不管怎么说，一排来复枪子弹在近距离内向我们射来，至于他们为什么没有打中我们，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我只知道丛林中射击是较难的。而后来的霎那间能使我们获救则更加奇妙。

“克钦人是天生的丛林好猎手。他们不用别的武器，只是用一种粗糙土制的前膛枪来打击猎物，并且总是在最可能靠近目标的地方向猎物射击，然后冲上前去用刀把受伤的野兽刺死。因此，当我们被敌人袭击时，他们就象猎手一样，围护着我，并跳起来向前冲去。伏击的日本人一看见他们冲上来就乱了阵脚，站起来想对

抗，而克钦人却卧倒用自动步枪把他们打死了。

“即使如此，也并非全靠走运使我们得救。日本人有来复枪，而我们每个别动队成员都有快速的自动步枪。因此我们的小分队在火力方面是压倒敌人的。我们常常把最现代化的武器交给克钦人使用。

“我教会了克钦族一桩本领而我自己是永远不会掌握的——喜爱美军的K种配给份餐。有一次我们搞到惠特曼厂的糖果，糖果罐头上印有纽约市的高楼大厦建筑群。他们喜爱这种糖果，接连十来天谈论着图画里的好多美国巨型宝塔。

“1944年2月，当梅里尔将军的一支经过特别训练的美国丛林作战部队，称做‘袭击队’的，向密支那的日本基地发动进攻时，我们这支别动队担任他们的先头屏护部队。三个月以后，当‘袭击队’在了不起的进军后，包围了他们的目标，这次就是一个克钦人作向导为他们带路的。那天早上，这个克钦向导被毒蛇咬伤了。但是他拒绝躺下而坚持带领美国人从一条只有克钦人才知道的小道去突袭和占领飞机场。这以后发生的殊死战斗，别动队患难与共，是战役的一个转折点。最后密支那被攻下了，原因是飞机场已被我们占领并始终坚守。”

在总部的档案上还载着另外一些别动队个别成员作战的记录。有个来自美国南部的士兵，他曾经一个人在丛林里有好几个月之久。他进行了多种活动，包括从日本人那里抓来了十只大象。象在那里是非常有用的，它可以在丛林里起拖拉机和卡车的两种作用。

还有一个美国陆军中士，他后来成为爆破桥梁的专家，还曾经炸毁过一列运兵军车。他还曾经在险峻的小径上单独走了一千五百英里，而且长期靠从敌人粮仓里偷来的米充饥维持生命。

在整个了不起的冒险业绩中，医疗卫生的优异也是最令人鼓舞的一个方面。事实是：美国人和克钦族人一视同仁。后来在阿萨姆邦成立一个第一流的医院。其中一部分工作人员是美国戈登·西格雷夫上校的著名医疗队成员。而这个医院许多好护士是克钦族女青年。这个医疗单位里小型空军的飞行员常常冒着生命危险运送克钦族伤员正好象运送美国伤员一样。

别动队外部没有一个人会否认：美国—克钦人组成的别动队由于勇敢而获得很高荣誉。别动队内部没有一个人会否认：作为个别成员来说，他们是严格地而且奇妙地与世隔绝的。

在总部，我曾经同一位刚刚从丛林里出来的、高个子的蓝眼珠的军官作过交谈。我问他：“不是有人告诉我，你已经变得对克钦人的迷信挺有兴趣的了吗？譬如凶神鬼灵、用鸡骨头占卜等等一类事情？”

他回答说：“当然，任何一个人如果真有占卜实际经验的话，一定会发现这里面还是挺有意思的。克钦人用鸡骨头占卜来选择走哪条路最安全。举例来说，要是你不信他们这一套，那末不止一次我们就硬是会走进日本人的伏击圈里。我也不全信他们那套凶神鬼灵之说，但是在过一条河之前，在水里投下几个银币也还是有道理的。”

我说：“啊呀，是不是有些小伙子有那么一点古怪？”

他回答说：“那些人肯定是给丛林迷了窍的。我们曾经碰到一个人自称是‘南部联邦骑兵团’成员，但是我要进行观察和担心的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而不是骑兵团与否。一个人孤单生活在丛林里是会发疯的。树木到处包围着你，直到你好像要为得到空间、阳光和空气而战斗。在雨季里情况变得更恶劣。大部分时间你总是感到湿漉漉的。蚂蝗啦，蚊子啦，那些成千上万会咬人的爬虫蜂

拥向你进攻。你的腿上长疮，有时也许会发疟疾。你脸色变白，白到可怕得毫无血色。你孤零零一个人无处去倾吐你的苦恼。逐渐你会认为过去从来没有人经受过这样的地狱生涯……。

“当事情开始发生时你可以在他的无线电发报里有所觉察，这时就要赶快把他从丛林中调出来。”

最后，日本军队终于撤离山地据点，被赶到缅甸南方的平原上去了。卡车车队可以在整条修建好的史迪威公路上畅通无阻，直抵中国境内。许多工人和士兵为胜利作出了贡献。而其中不可缺少的，也是迄今未予报道的，就是美国—克钦族别动队，他们把敌人引出洞，然后在丛山孤径使敌人闻风丧胆命归阴。

这位年青的上尉说：“在那些日子的战斗中，最使人感到神奇的是，美国伤亡率记录特低。在所有派往敌后作战的人当中仅仅只有七个人牺牲。这只能有一种解释：克钦人的忠诚以及克钦人的丛林战斗技巧。因为他们是怎么也要想方设法不让我们的小伙子们受伤，而且他们能发现日本人的每次伏击。人们要问：他们怎么会预先料到呢？关于这，我始终没有找到答案。然而我知道，我们曾经用战犬作过试验，它们是受过巡逻的专门训练的。这些战犬真是好样的，而克钦人则更胜一筹。克钦人值得授予特别奖章：事实上他们获得一枚 CMA 奖章。”

创制这种奖章是因为一位军官在丛林里看错了一份无线电报。这份电报说由于他所领导的克钦人进行了特别勇敢的战斗，应该发予食物和新衣服以资奖励。在电文里“食物”这个字后面出现了 CMA 三个字母。这在无线电报电码里表示逗号（英文为 COMMA）的缩写字。而这位军官竟然忘记了这是一个标点符号的代号，居然召开了一个小小的庆祝会，向几个队长颁发了“CMA”奖章，在会上他说真正的奖章正在送来的路上。当总部听

到这样的消息时，实在有点发窘。他们既不能破坏一位美国军官向他的士兵所许下的诺言，可又不能随便颁发一种新奖章——也许还有可能？当有人建议，“CMA”可以当作“Citation for Military Assistance”，即“协助军事行动奖”时，这个问题实际上就解决了。在一个漂亮的银质奖章上写了上述字样，配上绣有白色孔雀的绿色缎带，就成了美国对克钦人专门颁发的一种奖章。这种奖章也许有点不合常规，但至为珍贵。

最后，在克钦族的领土上赶走了全部日本人。他们在收复了的高山园地上重新种上水稻和巨型黄瓜，并且再次在依稀的小径上追逐野猪、麋鹿和其他猎物。有一个年老的克钦头人回忆说：“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看见第一批美国人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他们是徒步走来的，有的骑着一匹小马，但他们都带着书，这真是好事。我们都是丛林里的居民，我们非常需要学习。而当我们国家遭难的时候，美国人又来到了。他们从天而降，并且带来了武器。这又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的刀对付日本人已没有多大用处了。我们同美国人的友谊是非常牢固的。”

这种感情是彼此相互的。许多年轻的美国人在他的丛林主人中间，不仅发现是出色的战士，而且也找到患难与共的好友。在战后，有些美国人把克钦族孩子带到美国上学和进行技术训练。当这些聪明年少的克钦人第一次看到美国时，他们感到茫然、迷惑和惊讶。但是和空降到克钦故土的美国人相比，又不可同日而语了。

佩内明德镇的秘密

艾伦·艾·米基

1943年8月17日夜晩，五百七十一架英国皇家空军重型夜航

轰炸机组成的大机群呼啸着横越过北海上空。第二天，英国空军部的公报上有着这样的记载：在德国佩内明德的研究和发展机构站被炸。在这个故意含混不清的公告措词的背后，有着这次战争中一个最富有戏剧性的故事。除了极少数人之外，一般人都不知道：皇家空军的轰炸机指挥部赢得了一次使战争发生转折性变化的空战的胜利。

1943年春天，盟国空军的攻势开始使德国土地上受到难以愈合的创伤。当时德国的空军只能搞些打了就跑无关宏旨的袭击，它根本无法穿越英国的空防。但是希特勒曾经夸口的“秘密武器”言犹在耳，他想利用这个来满足德国人要求进行报复的愿望。为此，希特勒下令尽速完成这种秘密武器的试验和发展。

这种秘密武器的研究中心是设在佩内明德的德国空军的研究站。这个研究站的地点十分狡猾地隐藏在波罗的海海岸后面的森林里。那里位于波兰什切青的东北六十英里，距离英国七百英里。它的四周围着通电的铁丝网，隔绝一切爱好打听的人们。在佩内明德的工作人员里有几千个德国空军中最优秀的人才和德国航空和工程科学方面的最高层人员。这些科学家们每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进行工作。因为希特勒希望他所夸口许诺的武器能在1943到1944年冬季出成果。

热衷于秘密武器的人相信它可以在二十四小时内决定战争胜负。更为现实的德国人则希望这种武器至少可以破坏英国的军火生产，从而制止对德国的入侵准备。即使这种武器并不能起决定性作用，但用作报复性轰炸会激励德国士气。

1943年7月，英国情报机关得到确凿情报，佩内明德系德国主要的大规模制造自动操纵飞弹和火箭——即后来人们称之为V-1和V-2火箭的场所。有关这一事件的报告档案和空中侦察照片

很快就到了英国内阁特别委员会的手中。这个委员会建议皇家空军把佩内明德作为最优先考虑的一个轰炸目标。空军元帅、轰炸机总指挥官阿瑟·哈里斯爵士决定在下一轮望月期间对这个地方展开一次突然的轰炸。

德国人对佩内明德的安全过于自信。英国皇家空军夜航轰炸机在飞往什切青、甚至飞往柏林的航途中经常飞过佩内明德的上空。而在那里工作的德国人常常看着英国皇家空军飞机从头上飞过，心安理得地认为英国人根本没有发现佩内明德的重要性。英国空军拍摄了为进行轰炸作准备所需要的特殊空中侦察照片，侦察过程中特别注意避免引起德国人的注意，不让他们知道英国皇家空军对佩内明德发生兴趣。这些照片常常是借着侦察波罗的海港口的经常性任务时顺便拍摄的。德国人对这种侦察已经习以为常。这些空中侦察照片使得拟定轰炸计划的人员可以从中选出三个必须给以最沉重打击的主要目标。

第一个目标是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居住区。第二个目标包括飞机库和试验自动操纵飞弹和火箭的车间。第三个目标是行政区域，包括藏有各种蓝图和技术资料的建筑物。

轰炸的日子选定为8月17日夜晩，因为那一晚月亮几乎是满月。

向轰炸机队的人员下达通知时，只告诉他们佩内明德是一个重要的雷达试验站。在那里他们会碰上一大批德国科学家，他们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结果这些科学家，多多益善。在简短的通知后，又大声地朗读了轰炸机指挥总部的告示：“所有机组人员应深悉目标的这一极端重要性以及一次打击务求摧毁的必要性。如此次轰炸未能达到目的，嗣后夜晩将再度进行。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将不计伤亡牺牲。”

五百七十一架四引擎重型轰炸机起飞以后，它故意选用了一条迂回航路，然后直捣佩内明德。佩内明德的防守部队显然以为这些飞机是飞往什切青和柏林的，因此毫无戒备之心。探路飞机飞在最前面，然后猝然低飞在目标的上空，并在瞄准点周围投下各种颜色的照明弹。紧接着是使用完全革新了的轰炸瞄准器的轰炸机。对德国的轻型高射炮毫不在意，轰炸机一批又一批接连不断在几千英尺高度向三个看得非常清楚的主要目标倾泻大量的高爆炸弹和燃烧弹。四十分钟内，这一地区几乎变成了一片火海。

当最后一批轰炸机飞回英国的时候，在柏林附近白等多时的德国夜战机终于赶上了英国轰炸机，结果使英国丧失四十一架飞机。

第二天早晨，一架喷火式侦察机到佩内明德拍摄了被炸毁的情况。科学家和专家们所居住的四十五幢木建房屋，一半已经荡然无存，而剩下的一半也被严重破坏。此外，四十栋楼房，包括装配车间和实验室被完全炸毁，而其他五十栋建筑物也受到破坏。

几天之后，关于轰炸结果更为详细的报告源源不断送来。佩内明德有七百三十五人（其中包括一百七十八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死亡或失踪。被认为负责这项计划的最重要的科学家瓦尔特·苔尔博士和总工程师埃列克·华尔脱均被炸死。

纳粹党对这次轰炸的反应简直到了狂怒的程度。盖世太保人员审查了每一个幸存者并清查了整个乡村，想追查出把佩内明德的重要性透露给皇家空军的叛逆分子。纳粹黑衫党特务机关的华尔脱·施根巴克将军被任命主管佩内明德，并命令要恢复自动操纵飞弹和火箭的试制工作。

但是德国的一切计划必须重新考虑。由于佩内明德已一半被毁并且以后随时可遭到轰炸，德国人不得不把他们的实验室建造在较深的地下。同时还得搜罗另一批科学家和专家来继续进行工

作。由于种种因素使事情推迟了，纳粹政府不能按他们原先计划的时间来使用他们的秘密武器。另外要在遭到盟国连续不断轰炸的情况下设法提高德国人的士气，他们也感到棘手。

德国人由于盟军对飞弹、火箭发射台以及一些部件工厂进行轰炸和攻击而遭到更大挫折。纳粹现在对德国人民说，这些秘密武器将要作为反对敌人入侵德国的武器，它可以用来阻击盟军在港口和海岸的登陆。直到 D 日（指盟军在欧洲登陆的日子）那天，德国人也还没有把这种武器准备好。直到盟军在诺曼第登陆后七天才有第一颗飞弹命中伦敦。

如果当时没有把佩内明德毁掉，这种飞弹至少将会早半年发射到伦敦，而且还要重好几倍。伦敦的交通、英国的枢纽和制定入侵计划的神经中枢将会受到严重损害。反攻欧洲这一行动很可能非向后推迟不可。

拯救了伦敦的人

乔治·肯特

那是 1943 年 10 月——正是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五个年头——一个矮个子、结实、四十五岁年纪、名叫米歇尔·霍拉特的法国人，正在准备跨越边境，偷偷地进入中立的瑞士国土。他的肩上扛着一麻袋的土豆，手里拿着一把斧子。从外表看，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伐木者。

当这个伐木人迅速向前奔跑时，清晨的阳光已透过茂密的树林。这个时候发出任何一点声音就可能意味着死亡。因为在森林里和小山冈后面有好多耳朵在竖着倾听——德国巡逻队队员和德国警犬的耳朵。霍拉特原是一名工业设计师，为了拯救自己的祖国，他变成一名间谍，曾偷越边境进入瑞士达四十九次之多。每一

次他带有递交给英国方面的军事情报。他和他的同伴经常精确地描绘出纳粹德国在法国的秘密机场和海岸炮兵群的位置，或者报告整个德国师团的调动情况等等，都是十分有价值的情报。然而所有这些机密都不能同他这一次携带的相比。

这一次藏在他的土豆中间的是一张图纸。这张图纸不仅将拯救伦敦使之免遭毁灭，而且也会把战争缩短好几个月。霍拉特带着的是希特勒夸口的那个可怕飞弹——V-1 飞弹发射场的蓝图。按希特勒的想法是要在伦敦扔下五万枚 V-1 飞弹，差不多每个月要有五千枚之多。关于发射这种飞弹的准备工作，纳粹是用了最严密的方法加以保密的。建造这些发射架台的工人大部分是荷兰和波兰的劳工，他们都不会讲法语。这些发射台有一百多处已经接近完工。

米歇尔·霍拉特是盟军这方面唯一知道这个计划细节的一个人。他这时正在临近边境线，并且飞速地奔跑着，不一会儿他已经到了把法国与瑞士边界隔开的层层铁丝网边。他把斧子和一口袋土豆扔过了铁丝网，正当他要爬过去时，突然，神不知鬼不觉，他的膝盖被一个“铁钳”夹住了——被一条硕大的德国警犬牢牢咬住。这只警犬直直地站在那里，并紧紧地咬住不放。霍拉特一动也动弹不得。但是他意识到他必须脱身，因为附近一定有着和警犬配合搜查的边防人员。可霍拉特身边没带武器，因为象他这样乡下人打扮的人，如果被搜身，带武器会引起敌人的怀疑。他这时忍受着痛楚，向四周搜寻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这条警犬的嘴撬开。上帝保佑，就在不远正好有一样他所需要的东西——一根长长的坚实的棍子。于是他拿过来想法把它插进警犬口内然后用尽平生力气直插气管。好一会儿不见动静，然后这条狗松弛下来，爬在那里死了。

当霍拉特半蜷着身子穿过铁丝网，捡起他的麻袋时，他看见他

的肩旁站着一个端着枪的瑞士哨兵。不过这个卫兵的枪口不是对准霍拉特，而是对准那面两个正向霍拉特准备射击的德国士兵。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德国兵把他们的枪口朝下咕哝着跑开了。

就在霍拉特艰难地越过边境后不久，盟军的轰炸机开始轰炸V-1发射台。五个星期的轰炸，把七十三个发射基地不是完全摧毁就是破坏得不能再使用了。虽然后来又重建了一些——规模小了——基地，但是纳粹企图炸毁伦敦的宏伟计划破产了。希特勒没有能向伦敦扔下五万枚飞弹而只扔了二千五百枚，再说这些飞弹也不是在1943年发射。在那时可能会发生致命的效果，而是在1944年中期——为数太少，为时过晚。

“这是很可能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他的《远征欧陆》一书中写道：“如果德国早半年完善并使用他们的新式武器，那末，我们对欧洲的登陆将会极为困难，也许根本不可能。”

这件事的最令人惊奇的部分是：成为第二次大战中最出色间谍人员的迈克尔·霍拉特完全是自愿、主动地干的。因为谁也没有要求他做间谍，也没有谁帮助他成为间谍。当他要传送情报时，他就越过边境到瑞士去。迈克尔·霍拉特是个极普通的人，他是研究机构里一名薪水很低的雇员。当德国人进军巴黎、霍拉特的老板开始为德国人干事时，霍拉特感到一个新的转折点已经来临，他辞掉了他的工作以示抗议，并且另外找了一份差使，充当为汽车使用而生产的木炭炉发动机制造商的代理人。这个工作对于他决定献身于祖国而去完成的任务是十分宝贵而有帮助的。因为这可以对他经常去靠近前线的森林地区作出有力说明——他是为了寻找木材烧炭而去的。

有一天，他试图悄悄地越过有重兵把守的瑞士边境，为了要当一名为英国服务的间谍。但那次他被德国兵抓住了，不过他用一席话使自己脱身了。第二次越境得到了成功。英国方面要他弄清

德国军队番号情况并报告他们的调动情况。

这以后的三年，霍拉特几乎是经常地仆仆风尘。他有一个妻子和三个可爱的孩子，但是他很少去看望，为的是怕连累了他们。在长年累月间，他找到几个法国人作帮手。他们有铁路工人、卡车司机、酒吧间雇员、旅馆看门人。他们一共五个人作为核心结成了一个组织，取名为“行动网”。最后这个组织发展到一百二十人。这一百二十人中有二十个人后来被德国人抓住处死了，有些人受了伤，有一些难以置信逃生的经历。霍拉特自己有一次深夜从瑞士回来，居然傻得在嘴里还叼了一枝点着的香烟。当德国人发出“站住”的声音时，他扑倒在地，然后把手伸出去将燃着的香烟插在树上。当他爬行着离开时，两颗子弹钻进了树皮。

霍拉特的最大的成绩，就是探明关于自动控制 V-1 飞弹开始的。他的一名同伙报告说，在那里他听到了两个建筑承包商在谈论一项德国人正在搞的很不寻常的基建。这两个建筑商引以为奇的是：那项建筑需要的水泥数量大得惊人。一天之后，霍拉特亲自到了鲁昂。他身穿肃穆的黑色衣服，走进当地招聘办事处，向办事处人员说，他代表一个热心对劳工传布福音的耶稣教会组织。他拿出几部圣经，并且打听在这个地区有没有建筑公司。人家告诉他在奥费有一家建筑企业，那里离鲁昂二十英里。

一个钟头之后，他到了奥费，换上了工人的蓝布服装。他到了一块空地，那里有好几百工人。人们正在浇灌混凝土，在盖起新的房子。霍拉特随手操起一辆手推车，上面装着砖头就用劲干起来了，没有任何人阻止他。这里大部分工人都不会讲法文。会讲法文的人告诉他这里正在建造汽车房。这显然不是真情。这楼房太小了。而且汽车库房为什么要盖在离大城市那么远的地方呢？

最吸引他注意的是：一个五十码长的光秃秃的水泥平台，上面有一条笔直的蓝线指示标。他拿出指南针发现这个平台——显然

是某种发射台——的方向正好直接对准着伦敦。当他了解到德国人正让工人们三班制，二十四小时连着干时，他离开了现场去向英国报告。

在伦敦，盟军的领导人，包括温斯顿·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将军，都十分关注着德国人在搞些什么名堂。从佩内明德得到的情报似乎表明，那里正在发展一种“无人驾驶飞机”。另外，在波恩霍尔姆的海滩上一个丹麦人发现有一种显然系从天空掉下的某种奇怪武器的残骸。这一切都说明，看来有一种新的闪电式武器正在试制，但这种武装究竟是怎么回事？有多大厉害？谁也说不好。

在这种情况下，霍拉特的报告就象炸弹似地爆炸开了。英国方面要这个矮小的法国人放下所有其他的工作，集中精力搞清这个神秘的基建。霍拉特和他手下四个人就骑着自行车开始到法国北方进行一次周密细致的旅行。他们在三个星期内发现共有六十多处同样的神秘的建筑基地。到11月中旬，他们又发现了另外四十个。所有这些基地都集中在一条二百英里长、三十英里宽的走廊地带，大体上同海岸平行，并且方向都直指伦敦！但是，它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在间谍活动中，运气常常会起重要作用。可以说，由于一系列的奇遇巧合才使霍拉特了解到希特勒的这个严加保守的秘密。有一天，霍拉特同他的伙伴商量着一件事。这个同伙十分热情地向他推荐了他的一位朋友。那是一位叫劳勃脱的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很想给德国鬼子来一点狠狠打击。霍拉特给劳勃脱在机场找到了一份差使。而劳勃脱又说服了他的一个朋友安德烈去自动报名干活。这个活把安德烈带到卡利森林地带——又是一个正在搞神秘建筑的地方。安德烈到新工作岗位一星期后，向霍拉特作了汇报，并把他经手的建筑设计图纸描摹了送给了他。霍拉特指示安德烈不惜任何代价搞到这个计划的总蓝图。

在卡利森林的德国负责人把总蓝图常常放在他的大衣的里边口袋内，他甚至在办公室里也总穿着大衣。他脱掉大衣的唯一时间是每天上午9点钟去上厕所的时候。接连好几天，安德烈计算着德国人离开办公室时间。大概总在三到五分钟。有一天当这个德国人脱了大衣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安德烈立即蹑手蹑脚走过去，快速地映描了总蓝图，在德国人进来的时刻，安德烈已回到了自己的桌位上。

到了周末，根据霍拉特的建议，安德烈服用了给他准备的药物，然后说他肚子痛得不得了。德国医生不以为然。但是当安德烈呕吐的时候，他开了通行证，以便让安德烈可以到巴黎去请他自己的“家庭医生”治疗。

在巴黎，安德烈和霍拉特开始把总蓝图和由这个“行动网”组织从其他地方弄到的图纸配合起来描摹。然后他们把描摹好的图和现场观察加以核对。最后，他们把一张一张图对好位置，于是V—1飞弹基地的全部布局和细节美妙地显示了出来。

这就是霍拉特在国境线被警犬咬住时，藏在土豆中间的一张图纸！

霍拉特把这件无价之宝交上去之后，伦敦发来了一份无线电报，它写道：“缴获品安全收到，致以庆贺。”接着，他感到体力衰退，霍拉特感到太疲倦了，他对无休无止的来回奔跑感到有些厌倦，对那种每时每刻都陷于恐怖的生活感到了厌倦。英国当局实际上坚持要他暂住瑞士，他对此有所吸引。以后他想到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抄录火车运输时刻表的火车站站长们，想到那些偷偷地钻进飞机库和船坞的人们，以及其他一些在教堂尖塔顶上监视着德国人行动的人们。他回到了法国。在那里，几个月之后，由于一个同事的疏忽所造成的差错，他在一家小酒店里被捕了。与他同时被捕的另外三个人中，一个死在集中营里，其他两个过了三个月被释放

了。霍拉特受到了残酷的折磨，可是他没有对德国人提供任何情报。由于在他身上没有找到同谋犯罪的证据，他未被枪毙，但被送到了“诺因加默”集中营去了。

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纳粹出清了集中营，把俘虏赶进了船舶的底舱，并且让船舶在北海漂流。德国人深信不疑：这些船只一定会给盟军轰炸机炸沉。霍拉特和其他几百个人被关在一起，但是到最后一刻，却奇迹般地从一条注定要覆没的船只转送到了瑞典红十字会的船上。霍拉特被送进医院，整整六个星期的治疗才使他逐渐能动弹起来。皇家空军派了一架飞机去接他到伦敦。在那里他将获得外国人在英国所可能获得的最高军事勋章，即“功勋勋章”。但是那时霍拉特已经回法国去了，因此只能以后在巴黎授奖了。载着他回到法国去的飞机，在奥费那个地方特意降低了高度。霍拉特可以看到他第一次发现的 V—1 飞弹基地上东歪西倒的残留的屋梁和瓦砾。

对于米歇尔·霍拉特在战争时期的活动，英国解放军^①某军团司令官、陆军中将布赖恩·霍罗克斯爵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谁都不会怀疑，霍拉特完全有资格在勇敢方面获得最高荣誉勋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一个拯救了伦敦的人。”

出卖希特勒的间谍

埃德加·胡佛

1942年4月6日，有一个名叫艾伯特·范洛普的荷兰人走进了马德里的美国领事馆，要求发给他和他的妻子去美国的签证。他介绍自己的情况是：他是德国情报机关派去美国的一名谍报人

① 英国解放军指的是当时负责在英国组织反法西斯法国军队的部队。——译者

员，主要任务是去探取有关美国部队和战事工业的情报。他受命要在美国建立一座秘密电台，并定期地向汉堡发报。为了证明他说属实，他拿出了关于教人如何建立和使用短波无线电发报机的微型片，包括需要材料、装配图、频率表，密码和一套详细的密码代号。他还把他随身带着的一万六千二百三十元美钞的现金和支票给美国领事看了。

范洛普一再强调，他和德国人一同工作并且进入纳粹间谍学校受训，都是为了逃离欧洲而采取的办法。他想要为盟国服务。如果我们允许他去美国的话，他愿意为我们充当间谍，而同时表面上又假装为德国工作。

美国领事说他愿意考虑范洛普的要求，并立即通知了我们^①。随后，我们华盛顿总部的档案中发现了有关范洛普的记录：生于荷兰，年约五十岁，同一名德国女人结婚，做过工程师和珠宝商，两次大战中当过间谍。于是我们回电：“让他前来。”

在这同时，范洛普受到我们严密监视。我们知道，在他去美国之前，收到过这样一些书面指示：“美国科学家正进行铀中分裂原子试验，此种试验至何阶段对我甚为重要。”接着还开列了从事原子研究的美国科学家的姓名和地址。别忘了这是在1942年上半年，当时即使在美国政府官员中也很少有人知道我们正在从事研制原子弹。

范洛普一家乘葡萄牙船到达美国时，我们同他见了面。经过一番耐心说服式的盘问，我们最后使他承认，他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德国的间谍，而且由于从朋友那里盗窃七千美元还坐过一段时间的牢。我们当面戳穿了他许多谎言，他大为震惊。

我们把范洛普一家安置在一家旅馆里，他们可以随便走动，到

① 指美国联邦调查局。本文作者埃德加·胡佛当时是联邦调查局局长。——译者

那儿去都行——当然一切都在我们最严密监视之下。我们的计划是让他建立一座电台，并且用范洛普的名义同德国情报机关发生联系。我们方面的任何疏忽都会意味着失败。譬如，有一个名叫维柴杜的德国人，他只要同谁用无线电联络过一次，就能辨别那个人发报手法的特点，而对范洛普的发报手法是十分熟悉的。

我们把范洛普的无线电发报全部用留声机唱片记录下来。同时有三个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不断模仿着学他的手法直到乱真的地步（他的主要特点是发句点符号时的长度几乎和发冒号的长度等同）。之后，他们又研究范洛普的发报语言，一个荷兰人使用德文时的奇特表达方式。

在纽约长岛上一座孤零零的房子里，我们开始设立了一个无线电台。1943年2月7日我们第一次同德国人建立直接联系：“收发报工作现已准备就绪，有必要多加小心，但眼下我甚感安全。将在1900听你回答。”五天以后来了答复：“叔叔感到十分高兴。他向你表示欣赏和良好祝愿。”

我们感到十分欣喜。这以后有两年多时间——直到1945年5月1日——我们始终同汉堡保持着从未中断的联系。我们向德国人提供军事和工业情报，其中大部分是真的。我们向他们提供天气报告、美国口岸停泊船只的名字，正在修理中的海军舰艇及新闻报道中关于政府拨款建造新船或购置军火的消息等等。

我们不能装得好象范洛普什么都知道。因为德国人很清楚一个间谍单独在美国行动必须是有局限性的。不过我们捏造了两名定期向范洛普汇报的德国籍码头工人，一个在布洛克林的海军码头，另一个在费城，随着一个月又一个月的联系，范洛普在德国最高司令部的地位也与日俱升。

我们这样干并不是为了开玩笑。我们想要弄清楚是不是还有别的德国间谍在美国活动。汉堡可能会发电报来要范洛普同那些

间谍接头。我们也想了解德国人在美洲如何支付他们的间谍。而最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利用提供假情报来使德国最高司令部作出错误的判断。

我们要范洛普一再假装说自己已经身无分文无法继续工作。结果，他的上司，一位德国将军简直急得要命，用一切办法要使范洛普感到满意。开始，他提出送交二千美元给一家瑞士银行，再由它电汇纽约一家银行。为了试探德国人是否还有别的办法可行，我们以这种汇款方法太危险为理由否定了这个做法。于是，这位德国将军就试图经由拉丁美洲寄来各种珍藏邮票。后来在两年的时间里，范洛普只收到过两套这样的邮票，而每套邮票价值不超过一百五十美元。这倒使人看清了，德国人为了支付他们间谍的费用，即使有联邦调查局的暗中帮助尚且如此困难，如果没有这种暗中帮助，那困难该有多大啊！

与此同时，我们仍然继续不断要求德国发来更多经费。最后，德国人把一个荷兰的电影业巨头派来了美国。这个荷兰电影业巨头的来访任务之一就是交给范洛普一批价值六千美元的珠宝。当我们听到有新的间谍到美国来时，都感到有点担心。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名叫舒伯特的荷兰巨头逮捕起来的话，这样柏林就会怀疑他会出卖了范洛普。而如果让舒伯特同范洛普接上头并放回德国，那么他就很可能发现范洛普是一个双重间谍。

巧得很的是，这个舒伯特也到了马德里美国领事馆，并且表示愿意为盟国服务。我看他态度很真诚，因为他各方面都能同我们合作。

根据无线电发来的指令，范洛普将在他的旅馆里打电话给舒伯特。我们的一个特工人员代替范洛普打了这个电话，对他说：“我是克里艾曼。我叔叔向你问候。你有什么东西要交给我吗？”舒伯特说他有东西要面交。于是他们相约在一个旅馆的门厅里碰

头，并且约定接头后以互相说“克里艾曼”口令为准，交接珠宝。舒伯特把这些细节全部告诉了我们，以便使我们能抓住同他接头的人。

使舒伯特感到懊恼的是，在门厅里有一大堆人。只听得有一个人在他耳边咕哝了一声“克里艾曼”，抓起了装有珠宝的包裹就走，很快在人群中消失了。舒伯特几乎要哭出来。因为他以及按他的想法，联邦调查局的人都没有看到范洛普这个人。要是舒伯特真的看清了那个在他身边咕哝“克里艾曼”的人，其实他是个穿着汽车司机制服的黑人。那样，他就怎么也无法向德国人报告他曾经见到范洛普这个人了。

现在这个故事快要到结尾的时候了。德国人曾经要范洛普集中精力搞美国入侵非洲的计划。他们要他报告在纽约美国军队的番号，军用卡车的编号等等。我们给了他们大量情报。开始暗施巧计，这里那里都要故意提一提冰岛。当时范洛普已就职于一家珠宝店。于是我们向德国人发报说：“珠宝店里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的儿子已经开往冰岛去了。”我们不断敲边鼓——尽是些琐事——老提冰岛、冰岛、冰岛。

接着在1944年3月3日，我们向汉堡发了一个大意如下的电报：“上星期日在旅馆酒吧间里，一群军官饮酒交谈。有人以去冰岛服役为笑话，一个戴着五边纹章的军官告诫同伙们，不可笑得太早，他们中有些人完全有可能被送去冰岛。在他离开冰岛之前，曾经亲眼看见那里已经准备了供大量军队居住的营房和设施。”

好几个月以来，德国人没有派遣过任何一架侦察飞机到过冰岛，可是就在我们上面这份电报发出不久，冰岛上空就出现了一架德国侦察机。这架侦察机驾驶员看到了冰岛有大量的兵营（当然是假造的），而且在港口停泊着许多船只。根据这种情况，德国最高司令部就作好准备以防盟军对挪威入侵。

我们故意给他们足够的时间。我们用一些“进军欧洲时间已决定推迟”的报告来做烟幕，使他们慢慢从事，而就在这种烟幕下，盟军陆海军突然在法国诺曼第登陆。

奇怪的是，范洛普并没有由于他判断错误的电报而威信下降。他从来没有受到过斥责。我们仍然继续不断向汉堡发出更多的情报，好些是暗示我们日益增长的海军力量。这些报告，我们肯定德国人是会转送给日本人的。

以后到1945年4月27日，我们接到汉堡发来的一份电报，它写着：“考虑到目前的处境，我们必须中断同你的联系，但以后每周可联系信号一次。叔叔会一如既往保护你将来的利益。”之后，我们就一天天地等着对方联系信号。但信号始终没有再来。叔叔逃跑了，德国崩溃了。只有那个曾经和我们配合工作过的——虽然总是要有手枪迫在身后、矮小的荷兰珠宝商却留了下来。

攻心战术

弗雷德里克·C. 潘顿

在美军攻打西西里岛的战役中的一个夜晚，一名美军炮兵把一颗炮弹推进了向敌人堡垒瞄准着的野战炮膛。大炮冒起白烟，炮弹嘶叫着飞向夜空，紧接着在遥远的地方响起了一声微弱的爆炸声。炮手感到十分懊丧，他咕咕哝哝地骂起来：“用塞满了结婚彩纸的炮弹来打仗，真是活见鬼的战争”。

这个炮弹里装的是传单。这些传单告诉意大利人，他们是纳粹的马前卒，德国纳粹要把他们可爱的意大利变成战场；告诉他们，他们已陷入毫无希望的困境，凭这些传单作为“投降证”，他们可以到盟军阵地的后方领到好食物并保证安全。在那些蹲着美国大兵的前线散兵坑里，会讲意大利语的人不断念着这些传单，通过扩音

机使传单上的话在山谷里回响。

在天蒙蒙亮之前，美国的中型轰炸机群又在敌人后方扔下更多的“投降证”。那些不乐意的驾驶员们抱怨说，要是扔下去的是巨型炸弹就会起更大的作用。但是就在那个早晨，一批意大利人从敌人阵地那里跑了过来。每一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份白色的传单。有人担心地问说：“这是作投降用的凭证吗？”美国人对他们表示欢迎，请他们到一个有带铁丝网保护着的警卫室里，并且发给了美军军用罐头食品。

这是我们“心理战”部门在进行活动。这一个部门是盟军总部情报和保密检查处的一部分。开始，这种工作是为一些职业军人所瞧不起的。经过阿拉曼（在埃及）战役后不久，英国的蒙哥马利将军说：“在我的战场上我可不需要一辆宣传车。”可是到了盟军打到西西里岛时，蒙哥马利自己亲自下命令要连珠炮似地发射这种宣传炮弹。

在向北非进军时，这种做法就展开了。那个时候，美国和英国拥有半打这样机构，有民间的也有军事机关的，他们要想在思想上向敌人作战。而每个机构都各有一套自己的主张。从战争情报处、战略服务处、英国政治战争执行局、英国情报部以及美国 and 英国的陆军、海军情报处发出各自一套的宣传，结果是混乱不堪。

1942年10月，艾森豪威尔把整个工作统归查尔斯·波·黑兹尔坦上校掌管。他意志坚强，当了三十三年骑兵军官，最近被任命为机械化步兵兵团团长。黑兹尔坦把各种各样宣传组织里的男、女工作人员统统召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盟军心理作战部。他坦率地对大家说：“我对宣传这一行一窍不通，但是我相信它是有威力的。我了解军队，也懂得组织工作。我们来试工一番，直到能生产出产品。你们就写起东西来，我来根据它们的价值向军队推销。”

心理作战部下面设三个部分：作战宣传单位，它同前线的部队一起前进；占领地区单位，它主要在新占领区开展工作；直属机关，它主要是协调盟军总部的宣传和伦敦、华盛顿的宣传。这里有这个部门怎样进行工作的一个典型事例：一个名叫约翰·惠特克的十分出名的驻外记者，他带领了作战宣传单位到了西西里岛的巴勒莫地方，立即就接收了广播电台和报纸印刷厂。然后他向心理作战部发报要求派一个占领地区单位的人来。几天之内广播电台就开始工作，向意大利人民广播了公正的消息。同时也出版了《西西里解放报》，让西西里岛人民二十年来第一次看到了事实真相。

在开始阶段，心理作战部走过了一条艰辛的道路。这个组织刚建成时，正值突尼斯战役处于危殆局面，因此许多人根本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更有甚者，一些驾驶员不愿在飞行时携带宣传品，而步兵巡逻队也不喜欢把它带到敌后去散发。后来一个英国的上尉发明了把宣传品装进炮弹并装上足够的炸药使传单包装能散开而不致烧掉纸头的办法。但是炮兵们却不愿发射这种“哑弹”。

心理作战部的官员们耐心向将军们呼吁宣传这个做法。每个星期他们都想方设法发射出更多的传单直到最后产生了显著变化。意大利人开始是数十名一批，后来是成百名地拿着这些传单作为“通行证”跑过来投降了。说到这个问题时，一位心理作战部的官员说：“有一天两个意大利人带着传单走过来了，并告诉我们说，他们那里还有六十多人想过来又不敢过来，因为他们没有“投降证”。于是我们就派人去把那些人都弄了过来。有一次，一个意大利人跑过来了，要求再发给他一份传单，以便把他的兄弟也带过来。有人还告诉我说，在攻打突尼斯的最后几天中，阿拉伯人把传单拿到黑市上去作为投降“票证”卖给德国人和意大利人。

一个被俘虏的德国上校曾向情报官员说过这样的话：“你们的宣传给我们带来了灾难。即使一张小小的传单也罢，你读过之后

就好像得到了真理。认识到我们的政府是在向我们撒谎。”

此后，那些打仗的将军们可重视这项工作了。乔治·巴顿中将那时统率着第二集团军，就曾下令在他的阵地前线外沿散发宣传小册子。当盟军西北非空军决定轰炸罗马的军事目标时，卡尔·斯巴茨中将也下令空投几百万张传单向城市居民发出警告。心理作战部还利用无线电广播来削弱敌人抵抗的意志。这种肉眼看不起的武器的威力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在德国战俘中人们的看法起了巨大的变化。在突尼斯被俘的纳粹官兵们，他们脑袋中充塞了戈培尔博士^①荒唐幻想。一个说：“现在日本已经打进西伯利亚了，今年俄国就要完蛋。明年我们就要打垮英国和你们美国了。”另外一个说：“我希望我能乘船到美国去，倒要看看现在日本人把它炸成平地后纽约是个什么样子。”他们真是趾高气扬。

但是在西西里，许多德国战俘变得沉闷和气馁了。他们知道德国对苏联的进攻已经失败，西西里岛已经陷落，而且认为意大利也差不多完了。一些军官承认德国已经没有希望来打胜这场战争。这些德国人大都来自驻在法国南部的后备部队，在那里可以连续十四小时听到心理作战部一刻不停的广播。由于德国的战车里都装有收音机，德国最高司令部根本没有办法禁止这些士兵收听广播。

心理作战部的电台用意大利文、德文和法文向德寇广播，起了攻城重炮的作用。我们进行新闻广播的一条主要原则是：“新闻要尽量简单而且是讲真话。如果德国人能指出我们一条谎言，我们的新闻就没有价值了。”

^① 戈培尔全名保罗·约瑟夫·戈培尔。在二次大战中是德国宣传机构首脑，希特勒的亲信。此人一贯造谣，鼓吹战争，无耻宣称“谎言重复百遍变真理”，宣扬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侵略思想。1945年5月1日苏军攻占柏林时，他毒死六个孩子后，与妻子一起自杀。——译者

无线电广播不断向意大利发动攻势。艾森豪威尔将军就是用心理作战部电台向意大利人宣布与意大利停战的。后来，心理作战部还向意大利人民发布各种特别指令，告诉他们如何去破坏德国人的交通线。

心理作战部的一位官员说：“我们一开始是白手起家，对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一无所知。可是我们很快发现，反映真实的宣传几乎象轰炸机袭击一样有致命的打击力量。我们等于拯救了许多美国士兵的生命。因为每一个手拿我们传单的敌人过来投诚，那就意味着我们的士兵可以少一个在前线向他们开枪射击的人。”

十一个人对付了纳粹的原子弹

小弗雷德里克·桑顿

1944年2月的一个清晨，一辆满载的铁路渡轮“氢化”号正颠簸着穿过波浪滔滔的挪威廷斯贾克湖时，忽然间船的甲板下传来一声闷雷似的爆炸响声。船只左右倾斜，停滞不前。五分钟以后“氢化”号沉下了水底。同它一同沉没的是希特勒想占有第一颗原子弹的梦想。这一声爆炸声的背后蕴藏着大战期间一个难以置信的秘密行动的故事。

这要回溯到1940年的4月。国际科学家们流传着小道消息说，凯瑟·威廉研究所正在进行一项广泛的企图分裂原子的试验，接着正当美国的曼哈顿计划^①在1942年开始确立之时，英国负责经济战部门的情报机构又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情报：德国人已经命令挪威的电力化工厂诺斯克氢化工厂（世界同类工厂中最大的一家工厂），每年把重水的年产量从三千磅增加到一万磅。这只

^① 即美国研制原子弹的计划。——译者

可能意味着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我们的物理学家过去已经发现，重水是用于取得铀 235 制作过程中理想的减速剂。由于当时盟国没有获得足够量的重水，而提炼重水则需一年半时间。最后我们成功地使用石墨作代用品。而英国的报告证实凯瑟·威廉研究所已经卓有成效地在进行着试验了。

如何摧毁诺斯克氢化工厂和破坏它的重水储存，这个问题成了英国战时内阁考虑的首要问题。英国空军参谋部报告，由于这个工厂四周为丛山所包围，使用现有飞机进行直接瞄准目标的轰炸是行不通的。这是突击队干的活。

不久之前，一批挪威反法西斯战士曾经截获一艘海岸轮船“高尔逊特”号，并且驾驶着它穿过北海水雷和潜水艇的伏击圈驶向了英国的阿伯丁。他们之中一些人已经组织了挪威地下组织下面一个很有实效的单位。

艾因纳尔·史吉纳兰德被英国特种部队总部召到伦敦。这个聪明、体格健壮的人是个滑雪能手和神枪手。这一切对于他将要从事的工作是重要条件。更其有利的是，他过去一直就住在诺斯克氢化工厂附近，他有个兄弟和一些朋友在那里身居重要职位。

在特种部队总部，史吉纳兰德同利夫·特朗斯塔特博士见了面。后者曾经发展了大规模生产重水的工作。作为相当多德国原子科学家们的战前老友，他比任何活着的非德国人对德国制造“原子弹”的进展具有更确切的情报。地下抵抗组织偷偷把特朗斯塔特博士送到瑞典，之后又把他空运到伦敦。

在同特朗斯塔特会面后，有人问史吉纳兰德：“你认为能破坏诺斯克氢化工厂使其瘫痪吗？”史吉纳兰德用斯堪的那维亚人考虑问题的方式说明了情况。这家氢化工厂是一座七层楼钢骨水泥的巨大建筑。这座建筑和附近同样坚固的水力发电站座落在一千英尺高山的峡谷边缘。所有进出的通道和这座工厂本身都有经过特

别挑选的德国兵警卫着。四周的高山几乎难以逾越，要搞掉这个工厂的确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史吉纳兰德说：“我们当然愿意试它一试。”

史吉纳兰德立即被送到特种部队的训练中心。他很快学会操作一台电力强大的短波收发报机，这台机子可以放在一只小手提箱里。他学习了必要的电码，而且也学会了跳伞。不久他得到命令：立即潜回挪威，收集一切有关诺斯克氢化工厂的情报，并发回伦敦，在那里等待增援小组的到来。

就在一个月明如镜的夜晚，史吉纳兰德乘坐一架皇家空军的轰炸机，在离他家二十英里的山区跳伞降落了。通过他兄弟的介绍，他在诺斯克氢化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主要是建造一个新的堤坝以增加重水的产量。他非常谨慎小心地把他的那些最信得过的朋友们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提供有关工厂的各种消息的“联络网”。这些消息立即发往伦敦的中央情报机构。

史吉纳兰德报告，近年工厂里生产的重水迅速增加，而且每月一次用轮船把重水运往德国。英国战时内阁给联合作战部下了一道命令：立即向诺斯克氢化工厂发动突击队袭击。联合作战部尽管在敢死队活动方面颇有经验，现在碰到一项他们经历过的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峻峭的山峰以及无法预测的猛烈气流呼啸于山峰之上，使得挪威成为欧洲一个最不利于用空降式滑翔部队来发动进攻的国家。但是由于有了特朗斯塔特博士——他负责建造攻击目标的模型和房内工程结构——的帮助和史吉纳兰德准确的报告，“燕子”行动计划终于组织起来。

四个精选的挪威人——他们全是滑雪行家和在那个地区土生土长的，将空降去增援史吉纳兰德，并组成一个接待委员会，以迎接随后将要到来执行突击行动的英国伞兵部队。当时英国轰炸机曾两次载了“燕子”行动的突击队员们飞到挪威上空，准备跳伞，但

是每次都是由于云层太厚无法执行而返航。最后，在1942年10月的一天晚上，突击队员在飞机起飞前几分钟内得到通知，匆匆忙忙地被赶进座舱，经过几小时飞行之后，就在黑夜中跳伞降落了。第二天清早，当他们卸完各种跳伞服和用具后，才发现他们跳伞的地方是在离开行动地区一百英里之外的崎岖多石的山腰小路上。而且飞机投下的各种箱子散落在各个地方，差不多化了整整两天时间才从散落各处的空降箱笼里找齐装备和器具。

在以后的十五天中，这些“燕子”们经历着一种地道的战争长途跋涉。在四千英尺的高度，经常处于零下严寒天气，一个人最多只能负荷六十磅重的背包行军。可是每个突击队员负带的装备的实际重量有一百二十磅，这就是说，他们每天得走三趟来回把一百二十磅东西往前驮去。而每天每人的粮食定量却只是一小片厚实的干酪、一撮麦片和四片饼干。

最后在11月9日，远在伦敦心急如焚的联合作战部军官终于听到他们等待已久的突击队员们发来的信号。他们在诺斯克氢化工厂附近已安排就绪，同史吉纳兰德已联系上，并且已用无线电和着陆信号作为标志来迎接滑翔部队送来的破坏小组。

11月19日，两驾哈里法克斯轰炸机，每一架牵引着一驾满载伞兵部队的滑翔飞机从英国起飞了。但是几小时之后，在挪威的一位特工人员用无线电发来报告说，轰炸机和牵引飞机坠毁，机上所有人员不是死亡就是被俘了。

接着各种各样坏消息接踵而来。一名德国军事情报官员在搜查飞机残骸时，发现了一张地图，而且在重水工厂所在的弗马赫镇划上了红线。于是德国驻挪威的帝国总督约塞特·泰鲍温和部队司令官冯·法尔根霍斯脱立即奔赴弗马赫镇亲自视察防务。纳粹党卫军在附近地区大肆搜捕，只要谁有一点点亲英的嫌疑，立即予以逮捕。但是他们没有抓到一个“燕子”突击队员。

在伦敦，陷于绝望的联合作战部只得一切从头开始计划。用滑翔部队进行攻击的方案不得不放弃了；而改用空降六名挪威特种部队成员。特朗斯塔特博士重新用地图和模型对他们进行训练。时间越来越紧了。我们的“燕子”突击队员食物越来越少，无线电发报机用的电池也将用完。耽在四千英尺高山上旦不保夕。他们住在狭小的完全被大雪覆盖的小茅屋里，被迫用驯鹿吃的苔藓充饥。而在数英里以外的史吉纳兰德却在和盖世太保比赛跑，不过，隔几天他总要从那个埋在雪地里的伪装的茅屋里溜出来，滑雪到山下同他在弗马赫的那些可靠的朋友们见面。

不久，史吉纳兰德用无线电发来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报。情报说德国人根据某些理由认为上次的伞兵突袭不是针对诺斯克氢化工厂，而是针对一座建筑在附近的新水坝的。因此水坝上新近增加了一百名警卫人员，而工厂只增加了十二名警卫。

12月下旬，另一项代号为“炮手行动”的计划已准备付诸实施。一天晚上，六名挪威特种部队成员跳伞降落在冰雪覆盖的斯克莱根湖面上，那里离突击队员隐藏的地方往北三十英里。在这以后，事情就进展得比较顺利了。就在“燕子”突击队员的隐藏地，现在一共有十一个挪威人在一起出谋划策了。史吉纳兰德不时送来最新的各种具体的情报，报告德国人守卫的位置，他们换岗的时间以及那扇门是上锁及如何锁上等等。可是要去袭击的人员要穿越好几英里长的雪封的陡峭而全是斜坡的树林，往下爬一千英尺进入峡谷，涉过急流险滩，再登上一千英尺——几乎都是岩石石墙，才到达通向工厂的铁路堤岸。工厂整个地区只要一有警报马上就有探照灯不停地自动来回照射。

2月27日8点钟，九个人开始出发了。由于他们带着敏感的爆破炸药，他们踉踉跄跄地向下滑过多险的雪地直来到峡谷的底部。真是提心吊胆，一失足会成千古恨。接着又是可怕地沿着巨

大岩石石面往上爬。这个小组的负责人乔基姆牢牢地盯着他的手表，根据预定的时间表容不得任何拖延，在这一千英尺高几乎是垂直的悬岩上寸步慢移的时候，每个挪威人都知道，一不小心那就会掉到万劫不复的深渊。

终于到达了山顶，他们沿着铁路堤岸匍匐着向前爬行。到距工厂五百英尺之内时，他们可以听见工厂机器的轰鸣声。乔基姆在最后一次耳语会议上，明确了每个人要干的任务。一个带着一把巨剪的人走在前列——走向工厂的大门，因为这扇门上只有一根链子和一把锁。于是发生了钢铁剪断的尖锐声响。其他的人一动不动地屏息静候。但是大门里面却没有动静。他们迅速挨次窜进敞开的大门里。五个人端着汤姆枪，占据了包围起住着十二个德国卫兵的营房的有利地势。一旦响起警报，他们立即把冲出来的卫兵干掉。

由于特朗斯塔特博士的工作出色，这个由乔基姆率领的四人爆破小组仅仅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就找到了安装电缆线的隧道，它一直通向毗连浓缩铀部门的一个房间。但是小组的两个成员在黑暗中没跟上乔基姆，这时剩乔基姆和另外一个开始爬越错综复杂的管道系统。

这时，在那间极端重要的房间里值班的德国警卫，突然发现两支手枪枪口对准着他，即刻双手高举——噤若寒蝉。根据挪威人后来发来的报告说：“他看来似乎吓昏了，但除此之外还安静并听话”。那时，乔基姆检视了储藏罐、管道和机器，并在会造成最大损坏的地方安装好炸药。——他们往日在伦敦就是根据一模一样的模拟工厂进行训练的。正在这时，听得一声玻璃的碰撞声，有个人踢碎了地下室的窗户，乔基姆正要开枪，但及时认出：来人是他组里迷了路的一位助手正从窗户上往里爬。乔基姆用颤抖的手把炸药安装完毕。

他时时担心着警报器会突然尖厉地嘶叫起来的情况却一直没有发生。他检查了三十秒钟引爆的导火线，然后把它点燃。他立即要卫兵和一位挪威人赶快跑开。当他们到离地下室门口二十码远的地方，听到了一声爆炸巨响。在硕大的水泥墙后面声音显得低沉，但是却震撼着地面。

等到警铃开始大响，酣睡的德国兵纷纷从房子里窜出来时，乔基姆和他的小组成员已经从那同样危险的潜进来的通道中——德国人认为难以置信的通路，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就在同时，极其珍贵的一千磅重水从炸碎了的储存罐里涌流出来，流得满地乱泻，顺着工厂的污水沟流走了。

几个钟头之后，德国的司令官冯·法尔根霍斯脱将军气急败坏地开进弗马赫，视察着工厂被破坏的情况。他边看边骂：“这是我所见到过的他妈的最厉害的袭击。”将军接着就发出一道又一道命令。几乎整个一个德国国防军的师，一万二千人开进了这个地区。滑雪巡逻队和低空侦察机搜寻了全部山头。所有的大路和小道一律封锁；盖世太保和党卫军挨家挨户地进行了搜查。但是突击队员们一个也没抓到。

当时，六个特种部队队员中的五个人立即滑雪潜入瑞典的边境。经过了难以想象的艰难路程，后来安全地飞回了伦敦。而第六个名叫克努特的队员和另外四个突击队队员则留下来继续进行其他的地下工作，他们同德国的巡逻队不断地玩着“你追我跑”的游戏。史吉纳兰德则隐居到山洞藏身处，以便报告这次爆炸的后果，并继续监视诺斯克氢化工厂的活动。

1943年下半年，史吉纳兰德发来的密电报告说：诺斯克氢化工厂已经再度修复，工厂也重新开始生产。几乎一收到电报之后，美国第八航空师的飞机立即起飞轰炸了这家工厂的发电站。这以后德国人决定把所有诺斯克氢化工厂提炼重水的设备和储存重水

统统搬迁到德国的一个地下基地。于是，史吉纳兰德向总部提出，要求允许他将一艘叫“氢化”号的渡船炸沉。这只渡船要载运那些装满重水的货车在某天通过廷斯贾克湖。总部立即复电表示同意。于是史吉纳兰德即去寻找克努特要他参加一起干。当时克努特正在五十英里外的一支挪威人组成的地下突击队里工作。利用伪造证件，克努特冒充一名诺斯克氢化工厂雇员，曾先乘“氢化”号渡湖进行侦察，以便决定用什么东西将船炸沉而又使它无法被抢救。在这艘船装载重水准备渡湖之前，他把定时炸弹放进船的前舱艙。

没有多大一会工夫，德国的最后一批重水就沉入廷斯贾克湖中。由于急需发展某种武器来尽快对付盟国，希特勒和戈林又在另外的武器上打主意。这样德国进行原子弹的试验就陷于停顿

历史上收入最高的间谍

劳勃脱·姆·瓦·肯普纳

1943年，在莫斯科、德黑兰和开罗举行的一系列秘密会议，其实并不象人们所想的那样保密。由于有安卡拉(土耳其首都)英国大使馆纳粹间谍的帮助，希特勒在这些会议举行后不几天内就了解到这些重要会议的大量情况。

我是在一次偶然的场合知道“西塞罗行动”这个安卡拉间谍活动的代号的。当时我作为纽伦堡审讯纳粹外交官的主要检察官，在接触到大量的文件中，我审阅了德国外交部同安卡拉德国大使馆之间的秘密通讯。这些资料中经常提到的“西塞罗行动”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为了获取进一步的情报，我从过去德国外交部一位专和情报机构联系的联络官霍斯特·瓦格纳那里打听到，“西塞罗

行动”是他所在部门从事的工作中“最重大的事项”。曾任内务和军事情报头头的沃尔特·舒伦堡将军也承认，他的“最大的成功”就是得力于这个“西塞罗行动”。然而，直到我找到了路德维奇·摩席希之后，才了解到整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

摩席希是一个瘦削而不爱抛头露面的小矮个儿。过去是维也纳的一名记者，后来加入了纳粹党。在安卡拉的德国大使馆里当商务专员。他的任务之一就是指挥德国情报机构在当地的活动。他有战犯嫌疑，是因为当时德国驻土耳其大使弗朗茨·冯·佩本在给盖世太保头子希姆莱写的一封信里表扬摩席希的“杰出的功绩”。后来在受到英国人审讯之后就回到他故土奥地利——当时的法国占领区里隐藏起来。当他被我办事机构又找回来时，他渴望澄清他的名声。对于他的证词我开始觉得不可信。以后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核查验证，知道它完全是真实的。

1943年10月26日夜晩，摩席希被连续不停的电话铃声吵醒了（他当时在英国驻安卡拉大使馆的院子里占有一所房子）。原来是使馆里第二把手的夫人珍克太太打来的电话。她丈夫要摩席希立即到他的住处去。在门口，珍克太太向摩席希迎上去说：“在起居室里有个家伙，他有你的行当会感兴趣的东西。他是个阿尔巴尼亚人，名叫迪罗。你同他谈完话后送他出去，然后把门锁上。”

在起居室里，摩席希看到的是一个矮个儿，相貌精明厉害、不讨人喜欢。那矮个儿对摩席希说：“我能为您的政府做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不过你们要付出一笔大大的报酬。我可以为你弄到英国大使馆里最重要文件的复制照片。但是价钱是每张文件的照片付给我五千英镑。”摩席希对我说他当时听了之后的第一个反应是真想把他撵出去。然而这个家伙居然有胆子提出这样荒谬的要价倒引起了他的兴趣。

摩席希当即反问他：“我怎么知道你不是一个英国的间谍呢？”

迪罗用不耐烦的口气冲着苏联大使馆方向指了一指说：“如果你不想要的话，别人会付给我这笔钱。你可要记住我的话：我向你提供的东西是完全值这么多价钱的。”

这个矮个儿不想再多谈了。他说：“我知道，你没有同你的大使商量不能作决定。我可以等到28日下午，以便你们有时间作出决定。”限期还不到两天时间！摩席希当时提出抗议希望时间再放宽裕一点。但是，迪罗说他将在刚刚说定的那天下午5点整给打电话，如果回答是：“要”，他将在当天夜晚10点钟在某一个公园里同摩席希碰头，交给摩席希四张绝密文件的底片，摩席希作为回报必须付给他二万英镑。迪罗说完就走了。

第二天早晨，珍克问摩席希：“你对我过去的那个男管家印象如何？”摩席希表示他的迷惑不解。珍克微笑着说：“迪罗现在是英国大使的男管家。他过去曾经想当一名歌剧演员。反正，他的聪明才智绝不止做一个管家，所以我让他走了。”

珍克同意摩席希的意见：要为还不知道是何内容的材料付出二万英镑——按当时汇率要超过八万美金，代价是太高了。不过他又说，如果这些文件真象迪罗所说的那样了不起，那可是不能放过的好机会。在珍克的建议下，摩席希决定就这件事向大使呈递一份报告书。第二天上午，冯·佩本接到报告书后立即向在柏林的里宾特洛甫（纳粹德国的外交部长）发了一个紧急电报，请求他如果同意的话，能送来二万英镑。这笔钱第二天中午由飞机送到了安卡拉。

摩席希在28日晚上同迪罗见了面。后者一句话没吭把钱收下，并把一卷装着胶卷的铝盒交给了摩席希。摩席希急匆匆地赶回办公室，并且把使馆里专门由盖世太保派来从事秘密工作的摄影师找来，要他立即冲洗出来。佩本大使和夫人珍克也来了。

当底片冲印出来之后，他们三个人都认为化这么大笔钱买这

些文件的确是值得的。一张是英国在土耳其的全部间谍名单。另外一张是关于美国迄至当时为止运交俄国各种武器装备的精确型号和数量的报告摘要。再一张是英国驻土耳其大使休·夸施波尔一黑格森刚刚送交伦敦的一份备忘录的副本，上面记载着这位大使同土耳其外长举行会议的经过细节。在这次会议上，英国大使立促土耳其向德国宣战。最后一份是一件影印文件，它是最近盟国三国外长：霍尔、艾登和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举行外长会议上所作决议的初步报告。

冯·佩本大使的眼睛闪闪发光，他说：“我们似乎已经聘请到一位非常有辩才的小矮子。我们别叫他迪罗，因为这偏偏是他的真名^①。西塞罗是个雄辩家，让我们叫他西塞罗吧。”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他就成为西塞罗了。

那些影印文件由特别信使送到了柏林。里宾特洛甫立即呈送给了希特勒。希特勒看后下令他要阅读西塞罗所能买到的全部材料。里宾特洛甫指示冯·佩本要把此人长期雇佣，如果可能的话，可以付出更为合理的价钱。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西塞罗同意每二十张显影清晰的胶卷付一万五千英镑。这个价格后来又减到一万英镑。可是总起来算，在以后的五个月中，这个西塞罗搞到一百多万英镑。

有一天，当西塞罗在回答不断重复的问题时，他向摩席希透露了他如何能拍到这样多绝密文件照片的秘密。英国大使夸施波尔一黑格森是一个音乐爱好者。当西塞罗告诉他他能凭记忆唱出好多意大利歌剧时，这位英国大使十分高兴。此后，他常要求西塞罗为他演唱一些咏叹调和某些歌剧片断。这个男管家也成了他的贴身男仆。有一天他在收拾大使的衣服时，在裤子的一个口袋里

^① 迪罗(Diello)这个字和拉丁文 dialogos(会话)、dialogistes(善谈者)相似。

——译者

发现了一把能开大使保险柜的钥匙。他意识到他可以利用这位大使的健忘而大发其财，于是他立即照样复制了一把钥匙。

西塞罗买了一架照相机开始偷摄那些藏在保险柜中看上去极为重要的文件。他经常在大使出城去的时候，偷拍这些文件。但是有时，他在深夜，当黑格森睡觉之后偷拍照片。

西塞罗的人品使摩席希感到既迷惑又厌恶。他得悉西塞罗的父亲是被英国人杀害的。西塞罗对钱真是贪得无厌。他之成为德国的一名间谍，只是因为德国人能比别国的人愿意付出更多的钱来买他的英国秘密而已。

然而话又说回来，西塞罗的情报对于德国人真是无价之宝。关于一份有关德黑兰会议的报告透露了盟国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讨论情况。从另一份休爵士有关开罗会议的报告，希特勒获悉了英国和俄国正决定强迫土耳其参战。

当时冯·佩本的一项任务就是利用威胁和利诱两种手段使土耳其保持中立。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冯·佩本过于依赖西塞罗的情报，以致于搞过了头，引起了土耳其反纳粹的外交部长纳门·麦纳姆肖格路的强烈怀疑，感到里面有鬼，最后他告诉英国大使夸施波尔—黑格森说，在英国使馆内肯定有德国的间谍在活动。

英国大使立即向伦敦发了一份密码电报，这份电报被西塞罗偷拍了照片并立时把它送交了德国大使馆——报告了麦纳肖格路的怀疑。白厅^①立即派飞机送来了一个精致的防盗警铃。西塞罗参加了警铃的安装工作。因此他了解如何拉开警铃导线，使他继续从保险柜里偷摄文件而一直未被人发觉。

突然，在1944年4月，德国大使馆的内幕完全被人揭穿。在1月份的时候，摩席希新雇佣了一位漂亮的女秘书，名叫娜琍·库

① 白厅是英国政府机关所在地。——译者

柏，是过去德国驻孟买一位领事的女儿。4月6日，她忽然失踪了。后来了解到，她是一个反纳粹分子而且一直为英国情报机关工作。是她向英国大使夸施波尔—黑格森告发了西塞罗。

当盟军在诺曼第登陆后不久，土耳其对德国的外交关系已濒临中断，它准备最终站在盟军一边向德国宣战。冯·佩本回到了柏林，人们认为他失宠了。可是不久以后他被授勋——正如同他的专员摩席希也得到勋章一样。

摩席希告诉我，在西塞罗被英国使馆开除之后，他只见过他一次。后来人们传说，西塞罗移居到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并且从此改了一个假名在那里生活着。

路德维奇·摩席希由于他仅仅从事间谍的一般性活动，没有战犯罪行，审讯后回到自己的乡村去了。

这个西塞罗的间谍故事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讽刺性转折。纳粹付给他相当于一百多万美金的钱币，大多数都是德国人伪造的、一文不值的英镑假钞票。

计歼“夏霍斯特”^①号

斯·福雷斯特(《霍拉休上尉》一书作者)

纳粹德国已经了解到，有一批护航舰队正沿着挪威的北方开往摩尔曼斯克(苏联北部的一个港口)。这就是为什么纳粹把“夏霍斯特”号巡洋舰从挪威的峡湾开出驶入北冰洋的原因。这艘“夏霍斯特”号在它的桅顶上打着贝海军少将的旗号。

搞突袭任务，这艘二万六千吨级的战斗巡洋舰拥有各种符合要求的性能。航速设计为每小时二十九海里，它比英国的任何一艘

① “夏霍斯特”是普鲁士一名大将(1755—1813年)的名字。——译者

军舰的速度还快；装有九门十一英寸口径大炮，它比任何一艘英国巡洋舰的威力还大。再有它的庞大的辅助性枪炮装备可以保证：它如果闯进一批护航船，那简直象一只狐狸窜进鸡窝吃鸡那样容易地把它们击沉。

“夏霍斯特”号是在圣诞节的下午启航的，时间计算得十分精确，正好是第二天破晓，灰濛濛的北海刚被晨曦照亮的时候，它和护航队接触上了。那里护航船舰多达五十万吨以上，因此，“夏霍斯特”号在下一个小时内有可能重创敌舰，它比整个潜水艇部队在半年时间里所能取得的战果都更辉煌。

当时，英国的护航舰队正好在北角以北一百五十英里处往东行驶。这支船队由一串轻型护卫舰和驱逐舰以及小型军舰保卫，以对付德国潜水艇的袭击。为了防备水面舰只的进攻，海军中将伯纳特还拥有三艘巡洋舰：“贝尔法斯特”号，“诺福克”号和“谢菲尔特”号。他把他的海军中队部署在护航船队的东南面，也就是那天上午9时35分德国贝海军少将到达的地区。

“夏霍斯特”号同英国的护航舰队彼此发现对方时相隔不到七英里。在英国船上，从不睡觉的雷达的眼睛透过北极夜和浓雾、暴风雪，监护着船队的安全。它已经发出了第一个警报，现在在报告敌人的行踪和航向。大炮根据雷达的观测摆好瞄准方位，火炮指挥官正等待着开火的命令。这时按照分队指挥官的指令，整个舰队转了航向，而“诺福克”等三艘巡洋舰立即向敌舰猛冲过去。

在一阵排炮轰鸣中，德国“夏霍斯特”号发射的大口径重磅炮弹比英国三艘巡洋舰加在一起的发射炮弹重量还大。能够经受住它的十一英寸炮炮弹轰击而不遭灭顶那可算得上是一艘幸运的轻巡洋舰；而它自己装备精良，除非在极近距离，否则敌人的巡洋舰炮弹是一筹莫展的。即将来临的战斗是不公平的。但是三艘巡洋舰还是全力向“夏霍斯特”号猛扑过去。

在北极地区上午的微光中——地平线上并不是整天都有太阳的——还是能看见高速“夏霍斯特”号发光的白色舰首所激起的波浪，虽然它的灰色上半截模糊难辨。英国的护卫舰向这艘德国巡洋舰发射了一枚照明弹，它在暗色的空中划出了一道美丽的弧形白光，然后在巡洋舰上空爆炸，照亮了周围一英里方圆的夜空。当它凭降落伞在空中照亮的时候，英国巡洋舰的炮开了火。

炮弹一阵阵嘶叫着飞过头顶。“诺福克”号上的瞭望官通过望远镜正好看到，当“诺福克”号舰上发射的一枚炮弹正要落到“夏霍斯特”号舰上的霎那间，这艘舰只黑色船身上闪起一股巨大的绿色火光。“诺福克”号装备的是八英寸口径的火炮，其他二艘英国巡洋舰都是六英寸口径的大炮。因此很有可能“夏霍斯特”号已中弹受伤。

德国巡洋舰迅速地转身，因此，下一发炮弹未能击中。“夏霍斯特”号冲出了这闪亮的火光圈，然后就消失在微光之中。这是德国贝中将早就计划好的一个计谋。他的目标是整个护航船队，现在他了解到那儿是船队的主要火力点，并相当精确地猜出来商船队在哪个位置上。于是它就隐藏在蒙蒙暗色中，准备突然发动新的袭击。

在“贝尔法斯特”号上的伯纳特中将得猜想着这个德国的海军少将下一步会干什么，可能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间再次向船队进攻。一艘时速二十九海里的战舰可以在一小时内绕整个护航船队一圈。它可能从任何方向冲进来，并且在十分钟内击沉好多艘商船。因此在伯纳特说来，对敌人行动的判断决不允许出半点差错。伯纳特站在狭窄而又没有掩蔽的“贝尔法斯特”号船桥上。这艘向海上全速前进的巡洋舰，不时在舰后面溅起飞舞的浪花。

在12点半钟——东南方第一次接触后的三个小时——“夏霍斯特”号重新在东北方向出现。可是它发觉伯纳特中将正好就在

它前进的路上。这对伯纳特说来，是一个非凡的成就。至于贝将军如何看待这三艘神出鬼没的无敌巡洋舰（因为根据一切或然性规律，它们应该在二十英里以外）。可以从他的行动中揣摩出来。突然间发生了一阵排炮射击，有一炮弹在“诺福克”号的舰尾爆炸，而这位德国贝海军少将则转头往回跑了。

这位德国海军少将一点也没怀疑到，就在三个钟头以前有一份加急电报发向了英国海军部和主要英国舰队。他也从未想到，英国是在竭尽全力派遣船只和飞机来进攻象“夏霍斯特”号这样有价值的舰只。

事实上，他并不知道他还会冒更大的风险。就在他的西南方向一百五十英里处，有一支疾驶的舰队要切断他的归路，并把他的军舰打成废铁。这就是“约克公爵”号和它的护卫巡洋舰“牙买加”号以及作为前哨掩护的四艘驱逐舰。在它的桅顶上挂着海军上将的圣乔治十字旗帜——这是不同凡响的英国国内舰队司令官布鲁斯·弗莱泽爵士！除了极少几个得天独厚的人之外，没有人知道英国皇家海军曾经多少次搞过这样的诱敌部署，多少次派出主力舰队和护航队拉开距离而在平行线上向俄国挺进，为的是截击从挪威派出的纳粹舰只。这里是第一次说明耐心和决心必将得到报酬。

而当伯纳特第一个电报打来的时候，“约克公爵”号正在二百英里以外的地方。敌人有着比英国舰只速度快的优点。弗莱泽必须很快能楔进到“夏霍斯特”号巡洋舰和它的基地之间的地方。要是为追赶而追赶，那是注定要失败的。他全速驶向重心战略位置——就是“夏霍斯特”号目前所在的地点与德国基地之间一条直线的最近地点。

在“夏霍斯特”号第二次出现之后，伯纳特发来了第二份电报时，弗雷泽就知道了这艘德国军舰的确切位置。当时它还在一百

五十英里以外。

现在是伯纳特再一次显露才能的时机。在“夏霍斯特”号击中“诺福克”号以后，“夏霍斯特”号在微光依稀中向南驶去。伯纳特也掉转头去进行追赶。对弗雷泽来说，当前最为重要的是不断有人向他报告有关这艘德国军舰的航向。因此，伯纳特必得跟“夏霍斯特”号保持接近。可是跟有着十一英寸口径大炮的船只保持接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颇为不易。这种大炮很有把握一下就打中地平线上露出的目标，事实上只需要一发炮，正好命中，就可以把伯纳特的任何一艘巡洋舰击沉。

在那个令人焦虑不安的下午，弗莱泽一直注意不要暴露他的舰队的位置。从无线电里发出任何一点轻声耳语都会使“夏霍斯特”号知道在南面海面上有一支英国舰队。到了4点30分，一切怀疑顿时都为之释然。“约克公爵”号打破了它的沉默，弗雷泽立即向伯纳特发了个无线电报：“用照明弹照亮敌人。”这时伯纳特他们才知道弗雷泽已经靠近了，“约克公爵”号的官兵们完成了一件干净利落的行家任务，准确地跟踪了他们的猎物。

天色较暗。“夏霍斯特”号正在弗雷泽的左侧前方，而“贝尔法斯特”号正位于这艘纳粹舰只后面八英里。“贝尔法斯特”号的大炮发射出照明弹，闪烁的白光象一条银线划破了夜空，炮弹在半空中爆炸，燃起一股巨大的白色火焰。

在这一簇簇白光的正中心就是“夏霍斯特”号。弗雷泽的瞭望员、着弹观察哨、炮手们看着它的上半截舰身清晰地浮动于海天之间。舰上五门十四英寸大炮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轰响声向它的目标倾倒了三吨半的灼热的钢铁和高爆炸药。好几秒钟里，炮弹在头顶上空轰响。“约克公爵”号的一艘前哨驱逐舰正在炮弹的弧线之下，他们听到炮弹飕飕而过，有如一列发了疯的特快列车轰然而去。

当炮弹降落时，激起二百英尺高的浪花，由于射击距离测得很接近，只能说是交叉弹。隔了半分钟后的又一阵轰击才是命中。这时，那位纳粹贝少将急速地向左转，它利用东部海面的阴暗来掩护它安全逃遁——“约克公爵”号早紧紧尾驰于后。“夏霍斯特”号显然是被一次又一次地击中了，不过它受伤还不重，因为看来它的航速还不曾马上有什么变化。到6点半钟时，“夏霍斯特”号已经逃出了大炮射程之外，可是它起火了。暂时它总算逃脱了“约克公爵”号的炮击。

“约克公爵”号还未完全停止开火，可是在远前方地平线上又闪起了大炮的火光。“夏霍斯特”号显然又遭遇到别的敌人而不得不开炮自卫。原来“约克公爵”号的四艘前卫舰以它们的高超航速跑到“夏霍斯特”号前面去了。它们两左两右正好在这时候切断了“夏霍斯特”号的退路。

“夏霍斯特”号使用它所有小口径炮开了火。从旁观者来看，反击十分壮观。从它的炮口喷出的桔红色火焰形成一片光亮，而从这一光源中心向四周喷射出无数条照明弹则形成了光带。四艘前卫舰以每小时四十海里速度向前冲锋，一时是很难刹住的。同时“夏霍斯特”号已经负了重伤，它的控制火炮射击的指挥仪和通讯体系已经受到破坏。它射出的一阵阵排炮也老是无效。这时，四艘前卫舰只有一艘“绍玛尔兹”被击中了。但是这些前卫驱逐舰还想冲到最近的距离再向敌舰发动攻击。在一万码的地方他们不放水雷，甚至到了任何驱逐舰攻击主要舰只的最好距离——六千码的时候，它们也还按兵不动，直到离“夏霍斯特”号只有两千码还不到一点的地方，才发射出水雷并且立即拨转航向，避开注定覆灭的战列舰。

好几颗水雷击中了它的要害部位。“夏霍斯特”号经受住这些水下的打击并且保持着巨量的炮火射击，虽然命中率有点问题；但

还是颇有气派。德国海军所具有的一大特点在这一危机中表现了出来。德国作为一个较弱一点的海军国家，它从来不把军舰设计得具有能够在水上停留很长时间的能力，因为要求于它们的就是迅速和突然袭击，这样做的结果使他们认为舰只的持久性是不必要的。他们的舰只平时尽可能地留在海港里，水兵大部分时间耽在岸上的兵营里。因此他们船上隔间的模式对于英国和美国的舰只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

“夏霍斯特”号现在可是丧失了它的航速，而“约克公爵”号又追了上来，它的十四英寸口径大炮开始要把“夏霍斯特”号砸烂。“约克公爵”号的随从舰只，巡洋舰“牙买加”号完全可以对它进行近距离平射了。这时，伯纳特的“诺福克”号和“贝尔法斯特”号两艘巡洋舰也赶来了，还有护航船队里的四艘驱逐舰也同时赶到。在这漆黑的海面上，一共有八艘驱逐舰、三艘巡洋舰，一艘战列舰把“夏霍斯特”号团团围住。这时需要的是老手、行家来收拾局面。总司令发出的信号用的完全是日常英语语言：“除了带水雷的船只和一艘有探照灯的驱逐舰以外，一律撤离目标区域。”

除了两艘舰只以外一律驶开。一艘驱逐舰把它的探照灯打开——一束束强光穿透海上的一片黑暗，对准残舰照着。而“牙买加”号则负责扫尾工作。它摆动了一下，从甲板上放出了一排水雷，当这些水雷击中目标时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硝烟四散时，“夏霍斯特”号最后一次露在水面，倾斜着，由于弹药舱的爆炸而火焰冲天。接着浓烟把它淹没，它沉入海底去了。这时英国的驱逐舰抢着搭救幸存者。这艘船上共有二千人，最后从冰冻的水面上搭救出来的只有三十六人。

对于德国的策略或战略很难进行批评。但是事实终归是事实：“夏霍斯特”号出动了并遭摧毁。

慈悲为怀的密谋

乔治·肯特

针对由于人们了解到纳粹分子如何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从而普遍产生的反感还是有一副宽慰消解剂的。这种宽慰消解剂得之于成千上万的欧洲人冒着死亡的危险把其他犹太人从希特勒魔掌中解救出来的那种高贵品格和英雄精神。

这是动人心弦的拯救人命的故事。这里有无数不同国籍的男男女女——有法国人、荷兰人、丹麦人、挪威人、比利时人、意大利人、葡萄牙人，也还有德国人——他们在看到别人遭受苦难和死亡时，感到不能袖手旁观。这些自我任命的犹太人保护者们，把不下二十万难民从纳粹的迫害下偷运到安全地带或把他们安置在自己家里养护，使其得以活命。即使在柏林，就有五千名犹太人从一个隐藏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隐藏地点，一直活到了战争结束。这意味着，在这个作为盖世太保总部的城市里，至少有五万名德国人是一定参与了救人的活动的。

丹麦差不多拯救了它整个的犹太人口。法国至少救了它的犹太居民的一半。荷兰救出的犹太人占犹太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挪威也把数千犹太人偷运至安全地带。

参与拯救犹太人的活动的有牧师，农民，商人，侍者，教师，警察，有头衔的人物和妇女。有位比利时的伯爵夫人，把一百多名妇女和孩子藏匿了起来免于纳粹残害。一个意大利军官就曾偷偷地把三千名犹太人从南斯拉夫带到了意大利，使他们在某个军营里未受惊扰地度过战争年月，生活了下来。

在尼斯，一位基督教牧师曾经拯救了一百多名犹太人，把他们弄到了意大利，之后又用船运载他们去了北非。在罗马，一个天主

教神父开设了一家印刷厂，专门为犹太逃亡者印制各种假护照和出生证。事实上，许多神职人员把自己奉献给了拯救犹太人的事业，后来使凡是穿神职长袍的都成为盖世太保怀疑的对象。在巴黎，就有四十九名神父由于营救犹太人和进行地下活动而遭到纳粹逮捕，有不少人被处决。

在法国的波尔多，一位葡萄牙的领事阿利斯蒂德斯·德·沙萨门德斯博士，公然违抗葡萄牙政府的命令，向所有提出申请的犹太人发放了签证。他每日工作十五小时，接连三天为这些人的护照盖章，使得九千名犹太人从法国进入了葡萄牙。当这些人等待过境的时候，他还为他们（一批有好几十个人）安排食宿，并且用自己的汽车送他们去车站。

丹麦人利用一切划艇、渔船、货船、警艇、灯塔划子甚至独木舟把居住在丹麦的全部八千犹太人中的七千五百多人送到了瑞典。作为这次“小型敦刻尔克”的组织者是哥本哈根的医生们。他们把这些受害的逃亡者藏在医院里，为他们起了假名字，并且在他们的病床前挂上了发烧体温登记表。有的还藏在护士们的住处。等到援救的船只准备停当，医生们就把犹太人带到有厚帆布覆盖的卡车上，开往僻静的海边，在那里他们登上船驶向自由。为了支持这项营救活动，各阶层的丹麦人捐献了总计二百万美元的款项。

在这项事业中，医生们得到了各方面人士的帮助。有一个哥本哈根的店主，他的商店准对着纳粹的机关，可是他实际上是运送犹太人的联络人。犹太人在什么时候准备好动身，就向他报告，他就为他们安排交通。瑞典人也出了很大的力。每艘瑞典船只在离开丹麦水域时，总是要在它的底舱里藏上几十个犹太人。

在这些营救工作中最惹人注意、然而又最不为人所知的是关于一名杰出的荷兰妇女特萝丝·维杰斯米勒的事迹。她是一名社会工作者。她用粗枝大叶的外表掩盖着她对人的情爱。维杰斯米

勒夫人从事营救事业始于1938年。有一天她驾车行驶在靠近德国边界的一条树木成荫的路上，忽然看到一个小孩，孤零零地一个人一瘸一拐地走着。她走了过去，发现这个孩子被鞭子打得遍体鳞伤，嘴里喋喋不休地说：“他们杀了我的爸爸和妈妈，我亲眼看见的。”她把这孩子送到医院之后，返回边界又找到五个小亡命者。在回家的路途上，她把三个孩子藏在汽车后身的旧衣服堆下面，同时又把两个孩子藏在她穿着的灯笼式撑开的裙子里面。

当英国政府决定同意接受犹太儿童入境时，维杰斯米勒夫人是荷兰负责聚集运送犹太儿童委员会代理人之一。为了这件事，维杰斯米勒夫人还去了维也纳，她居然访问了当时纳粹德国派来主持奥地利反犹太人活动的阿道尔夫·艾契曼。当她被领到艾契曼跟前时，维杰斯米勒夫人说明了来意。

艾契曼翻阅了他的文件，“星期六你可以送走六百名犹太儿童，”他说：“你得安排交通工具。要是他们能够到英国去而英国又肯接受他们的话，你还可以送走更多的人。”

这个建议是十分恶毒的。当时到星期六只有五天的时间。要在五天时间里为六百个儿童安排食宿、护送并且办完一切海关和移民手续，看来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维杰斯米勒夫人，这个在阿姆斯特丹被人亲昵地称之为“推土机”的人，旋风似地辗平一切障碍。到星期六，火车准备齐全，六百名儿童启程了。这是把一万名犹太儿童从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送往英国的一系列列车中的第一列火车。

荷兰人特别为维杰斯米勒夫人在荷兰投降的那一天（1940年5月14日）所创业绩感到自豪。正当德国国防军的铁蹄将要踏进阿姆斯特丹的时候，维杰斯米勒夫人得悉有一条轮船正在艾莫伊登等候结关准备开往英国。她很快找齐了五辆公共汽车，把市立孤儿院里八十名犹太儿童塞进汽车开往码头。在它们驶往码头途

中，许多犹太人纷纷爬进车里，有的站在踏板上，有的甚至躺在车顶上。当车辆开到港口时，人数已达到二百。他们一个不剩地都上了船。

还有一个名叫乔普·惠司特维尔的荷兰教师，他保护了许多犹太人通过边境逃向法国。他最后一次护送的是二十三个男孩。当他同他们分手的时候，这个虔诚的加尔文派新教徒要求这些孩子们答应他：他们将来一定设法去巴勒斯坦。后来其中大多数人真的去了。今天在以色列，这个教师的名字仍为人们所传颂，人们以他的名义种植了一片小树林。但是惠司特维尔未能看到这一切，因为就在他回到荷兰的路途中被盖世太保弄死了。

在这些营救人员中间，最勇敢的是德国人，因为他们是在盖世太保的鼻子底下去完成他们的仁爱事业的。在柏林，有个叫弗朗茨·考夫曼的，他不是一个犹太人，但是他日以继夜地养育着他的那些流亡者，并且把他们一个个转移到朋友的家中。同事们劝他：“别再干了。”他的答复就是一个：“我知道迟早我是会被逮捕的，但是我是在圣坛上向上帝起过誓的，我不能丢下受苦的人不管。”有一天他果真被捕了，并且在一个铺着石块的院子里被枪决了。

在上西里西亚的卡托维兹，一个防空民防队长曾经在一座空的理发店里砌上一垛假墙，里面安全地住着三个犹太人。有一个党卫军军官更是了不起。他住的地方就在柏林党卫军总部的楼上。就在那里，他藏着一对犹太夫妇，他们一直安居到战争结束。

有一个驻在波兰的维尔诺的德国士兵，叫安当·施密特，他不止一次向犹太人透风警告他们：盖世太保就要来抓人。在他管辖地区有三栋算是德国军队财产的房子属他掌管。就在每栋房子的地窖里，他藏着被盖世太保通缉的犹太人。

另一个德国商人奥斯卡·辛德勒，他在波兰的克拉可夫接管了一家搪瓷工厂。结果他把凡是能搜罗到的犹太人都收进来——

总共一千二百人——放在他的工厂里工作，并列为主要的军工人员。他为此向党卫军付出了大量的贿赂。

在波兰，关于亚历山大·米高拉奇卡瓦救了犹太人的事迹也是非常动人的。他同他的妻子住在迪别卡的一幢三层楼 的房子里。在那层房子的阁楼上，他藏匿了十三名犹太人一直呆到战争结束。这个阁楼非常低矮，人们根本无法站直。在那里没有厕所，没有洗脸洗澡的地方，也没有电灯。每到半夜，医生（指米高拉奇卡瓦）和他的妻子吃力地爬上楼梯，留下吃的东西，把装他们排泄物和垃圾的桶拿走。最后，当迪别卡解放的时候，男的女的从他们藏匿的顶楼上爬下来，人人毛发蓬松，形容枯槁，满身肮脏，不过都活着。但是医生没有在楼下欢迎他们。因为当战争在这个城市里进行的时候，他带着急救箱赶忙外出救护伤病员，不幸被炮弹击毙。

这就是那些对别人的苦难不能不闻不问的男人们和妇女们的故事。在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内，还从未有过象许多自己受苦受难并付出生命来营救犹太人的普普通通的欧洲男人和妇女所展示的充满恻隐之心的高贵品质。

通往自由的地道

皇家澳大利亚空军上尉帕尔·勃立克

希尔口述，艾伦·艾·米基笔录

1943 年春，在德国沙岗地方——刚好是柏林勃兰斯劳两地之间的中点——施泰拉加空军第三所，囚禁着一百名被俘的空军人员。他们差不多全都是英国皇家空军人员，尽管送进来的美国人的数目也开始在增加。

3 月底的时候，集中营扩大，增设了一个北院。我们有七百个

人都被赶进去住了。参加建造北院的战俘们已经暗中研究了它的设计，并用步伐丈量过院子里房屋的各种距离——脑子里早就有了挖地道逃走的念头了。因为逃走是支持着我们度过了无生趣的被俘岁月的一个希望。

曾经有几个军官在其他集中营里挖过地道。以这几个人为中心，组织了一个逃跑集体，取名为“X”，这个“X”小组的领头人是空军中队长罗杰·布什尔，他来自南非一个高个儿，过去是战斗机驾驶员，直到在敦刻尔克被俘。布什尔曾经有过两次了不起的逃跑经验，有一次几乎快到瑞士边境才被抓获。

北院占地一千平方英尺，四周有两道高高的铁丝网形成围墙，两道网平行，相隔五英尺，中间填满了成卷成卷的铁蒺藜。在铁丝网里沿十码处是一条警报线路，只要有人跨越，警卫人员马上开枪。四周有数不清的瞭望岗哨，每座岗楼高十五英尺，装有探照灯和机枪，一天二十四小时有人值岗。在铁丝网外二十五码远的地方，四面都是密密的松林，它隔断了我们同外部世界的联系——但是同样地可以掩护我们逃跑。

当我们一进入北院，我们就贴出布告征集志愿参加板球和垒球的运动员。这个布告下面署名写着“大 X”。谁都知道这个署名是什么意思，有五百人签名参加了挖地道工程。大家决定要挖就挖三条长地道，取名为“汤姆”，“狄克”和“哈雷”。因为怕单挖一条被发现就完了。我们从来不叫它们“地道”，因为有许多偷听我们讲话的卫兵都懂英语。

汤姆是从 123 号平房区挖起一直通到铁丝网，相距一百五十英尺，然后再向外延伸直挖到松林的隐蔽地点。狄克这一条将从 122 号平房区挖起，可以接到汤姆的竖井穴，也可以直接通到森林去。哈雷则从 104 号平房区挖起一直通向松林的北端。

当然，这些地道都得在我们住的棚屋里挖，每一间棚屋有一百

英尺长，里面有许多放床位的房间，盥洗室和小小的厨房。德国人建造这些棚屋时把屋基垫高离地面一英尺，这样警卫人员就能从地面上看清楚我们是不是在搞些什么名堂。而且棚屋周围还按上了好几个“窥探孔”。由于他们穿的是蓝工装还易于辨认。他们用手电和探测器不断搜寻着掩盖起来的活板门和挖地道弄出来的沙土等等。

我们组成了三个小队，每个队都有一名挖地道的老手带领。瓦利·弗洛岱是一个加拿大的矿业工程师，他是挖地道工程的主要技术专家。每一个志愿报名人员都要经过各个平房区里的“X”组织领导人的个别谈话。凡是当过矿工、木匠、工程师的人都分配去搞地道工程。当过裁缝的人组织起来搞伪装制作。艺术家们搞个专制假证件的车间，制造各种各样证件。所有那些能讲流利德语的人都被分配去同一个德国“窥探孔”交朋友，经常跟他聊天，培养交情，最后使用贿赂让他从外面弄回来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有一天，来了一个特别认真的看管人员——“窥探眼”，监视很严，我们称他为“眼神爷”。但是不到一个月，通过接触和联络感情，到后来他也丧失了防止我们逃跑的警惕性。他有时到院子里来直接走到同他拉交情的人住处开口就说：“尖眼神来了，能进来吗？”接着就走进来坐下喝茶和吃饼干。

没有专门技能的俘虏人员或者被分配当“企鹅”，即不断处理从地道里挖出来的沙土，或是当“暗探”以监视看管人员。到了下一年，我们每天差不多有三百个“暗探”轮班工作。他们得向“大安”汇报工作。“大安”是负责安全方面的头头，他是一个又高又瘦的美国上校。

我们的安全体系投入工作之后，我们在地道工程方面也就有所进展。德国人疏忽了一个细节。在每排棚屋的盥洗室、厨房以及放着炉子的小角落都有水泥地板。它们是由水泥和砖头砌起来

的，根本没有什么缺口或空隙让安全岗哨来查探。我们正是从这些地方开始挖掘地道。

这里第一道工序就是建造一个伪装起来的暗门。在一天二十四小时里，德国人都随时会走进棚屋来大声吆喝“快，出来，快出来！”于是他们搬动床位，拉开橱柜，撬起地板和墙壁，搜寻有没有藏着什么工具、老百姓的衣服、钮扣、钉子等等任何可以用于逃跑的东西。可是凭着三年来艰苦的经验，人们还是机灵地建造了德国人无法发现的一个秘密活门。

很幸运的是：我们弄到了过去建造集中营时候剩下来的一些水泥。有个波兰人的小队铸造了一块可以挪动的板块来代替从123号平房区地板上凿下来的两平方英尺的混凝土板条。当我们把沙土和污泥抹在它的边沿上就没有人会发现它。这里就是汤姆的入口。

狄克的活门装在122号平房里，这是设计最妙的。在它的盥洗间的地板上有一个铁制的格栅，这里可以让脏水流进一个三英尺深的水泥池子。而池子的排水管安装得有点特别，总是使池子里留下那么一点水。当我们干活时，那些暗探们向外面望风，波兰人就搬起铁格栅把池子里的水舀干，并且用一把从贿赂一个守卫人员而弄来的一把钢凿，把构成水池子一个方面的一块水泥厚板凿开使之可以随时放正或移动开。当厚板放正，隙缝用粘土封上后，水又积聚在池子里，一点也看不出破绽。

哈雷的入口也是十分巧妙的。104号平房区的23号房间的一个高高的取暖水炉是砌在花砖上的，花砖埋在一个四英尺见方的水泥台基上。人们把这个炉子往后移动一下，把花砖撬起重新砌在一个水泥的秘密活门上，看起来一切好象都是原来的样子。在改造过程中五块花砖破裂了，只好用从东院烹饪室偷运来的花砖替补。这是冒风险的活儿。哈雷的地板改制只化了十天时间，只

是用一块随便安放着的床垫遮住了“窥探孔”的视线，可是我们居然顺利完工。

现在我们要动手从事最危险的挖掘地道工作了。三条地道的距离、方向和角度都是根据三角学粗略计算出来的。我们了解到德国的探测器探听不到深度在距地面二十五英尺以下的一切声响。因此我们决定从进口竖井处一直挖下距活门三十英尺，然后再向松林地区掘进。

表面一层松松的沙土是比较容易挖掘的。但是它需要坚固的支柱。一开始，我们让每个人捐出两条床板。初征募搞的还可以。但是到了第五、第六次还要人们捐献床板时，人们就无法睡觉了。

1943年5月初我们把第一层土挖掉了。各个小队几乎从起床点名之后就开始干一直干到晚上点名为止，只是中午吃饭时稍息一下。

“企鹅”们对于如何处理亮晶晶的黄沙土却是个棘手的难题。因为要把它堆在外边，那土的颜色显然跟地上的土不一样。有些土可以把它搅拌在我们那个小小花园的泥土里，然而量大了就不行。于是人们用成打的小毛巾把它们缝成香肠似的袋子，“企鹅”们就把这些袋子装了沙土，套在裤腿里漫步，逍遥地走向运动场。在那里“暗探”们有的在搞拳击比赛，有的玩排球。“企鹅”们一到他们中间双手插进裤袋，拉开系住沙袋口夹子的绳子，让沙土慢慢渗到地上。几十双踏着步的脚会迅速改变了黄沙的颜色把它掺和到土地和表层中去了。当我们搞得顺利的时候，我们几乎使一百五十名“企鹅”忙个不停，并且就在守卫人员的鼻子底下处理掉从地道挖出的成吨的沙土。

地道都是用小的煤铲和用烧饭炉子改制的铁刮挖出来的。孔道约二英尺见方，用床板改制的板条支撑，并用凹凸拼凑法连接，我们省下钉子来建造竖井井里的梯子。

在竖井井穴的底基，得建几个较大的洞室，给木匠和装配工使用，并安放通风设备。有一天，当三个人正在挖掘狄克地道里的洞室时，一段坑面忽然开始落土，几秒钟后这种落土几乎成塌陷之势。下井的梯子顶住了，两个人挣扎着爬了上来。而第三名瓦利·弗洛岱在另外两个人进去把他救出来前，几乎窒息致死。狄克地道的竖井洞穴几乎都被土埋了，这真是一个痛苦的挫折。但事情还得咬着牙重新挖掘起来。

老手们懂得，没有新鲜空气不可能挖一条较长的隧道，仅仅在地道中向地面开几个小洞是不合格的。正好在集中营里流传进来一本现代机械学方面的杂志，上面有篇文章详细地介绍自制空气调节器的情况。我们立刻准备制造一具。

我们的“白铁匠”把红十字会送来的奶粉罐头的两头切掉，然后连接起来成了一个圆柱式的通气管。他们把罐头连接处用德国宣传性报纸包上几层。这根管子铺在一条沟里，沿着地道的走向。上面覆盖着土。管子的尽头是一个出气喷管，它往洞里输送新鲜的空气。通风装置是用一个帆布风箱做成的容具，不断地呼噜呼噜地把空气抽送进去。这第一具通风装置做的还不错，接着就再做两个。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可以把秘密活门关上，避开看管人员安安稳稳地在地下工作了。

我们的一些电工专家把过去建筑工人扔下的一段一段散落在各处的电线尽量收集拢来。他们偷偷摸摸地把集中营里的电线重新改造一下，省下来好多电线。于是他们把电线装在下面三个竖井井穴里，把线头接通集中营里的电流。后来又从走廊里偷来了灯泡。这样我们就能在灯光照射下挖掘地道了。有时，德国人在白天忘记打开电门，我们就使用自己制造的灯，那是用一个罐头盛着人造黄油，然后用一根细绳放在油里燃着。这种灯稍微有点臭味。

在地道里挖掘小组搞出一套非常严格的工作方法。一个人全身侧卧，用一个肘臂支撑着，一只手不断刨土，把土送到脚下，而第二个面向另一面，他的腿压着第一个人的腿，然后把土装进一个箱子，箱子放在一具小车上由人们用结实的绳子拉到整井洞穴里。

这些手推车其坚固程度可以装两箱土或一个人，堪称第一流设备。后来人们还给它装上两个轮子，并用马口铁罐头做轮子，轮毂里甚至还用轴承，这是通过一名好说话的守卫人员走私进来的。轮子轨道则是用军营营房装饰板制成，后来地道不断延长，挖掘的人就扒在推车上一直滚到工作面。

有的时候，在洞里干活是十分闷热的。人们都光着身子或者穿着发给战俘使用的令人讨厌的长裤子挖掘。外衣沾了污泥会暴露了自己。我们在地道上面弄了粗陋的莲蓬头，挖掘工只要冲一冲淋浴就可以在集合点名之前把可疑的痕迹都去掉了。

到5月底，也就是在开始挖掘后一个月，每条地道已经挖了七十英尺长。这时已差不多进入夏季，这是逃跑的最好季节，因为我们可以在野外生活和睡觉。“X”组的领导人决定集中精力挖掘汤姆这条地道。因为它还有待完成的距离最短。一个星期以后，他们在一百英尺地方造起了一个“中途站”。这是一个小小的洞室，到这里我们用木板支撑的部分已经到头。根据计算，汤姆这个“中途站”正好是在装有警报器的铁丝网下面。这就是说，再挖一百英尺正好是到那个松林的底部了。

其他的小组正在忙碌地为我们准备逃跑所需要的器材装备。我们那个有五十人参加的造假证件的部门，造出假护照和假身份证。那些德国守卫人员可以用咖啡和巧克力来加以引诱。只要他们有一次私运进来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就不敢再拒绝我们的要求，因为他怕我们会向他们的上司告发。正由于这个道理，我们弄到了各种颜色的墨水、笔、刷子、特种型号的纸以及用来制造指

南针、收音机部件的磁石。我们偷着安装了一台收音机每天可以偷听各种新闻，也弄到了照相机，可以拍摄假证件上使用的照片。甚至还有锤子、锯子、箱子、钉子、地图等等。

有几个德国守卫人员，由于我们的语言学家结交深入，甚至言听计从把他们自己的“帐本”即领工资册和身份证的混合体，都借给我们使用，正好在我们伪造证件需要标本的时候。伪造证件是一项精雕细刻的工作。所有证件上都要用手写出模仿打字机上打出来的字体。包括打字稿件上出现的字母重叠、个别字母有毛病和移行不当等等。有的文件又要求模描印刷字体，字距行距都得讲求整齐划一。伪造者从圣经上撕下纸页，从精装书上扯下布封面来做身份证。有一份在跨越边界时需用的文件十分复杂，一个伪造文件的能手要每天五小时、干一个月才能完工。信箋上印的凸出的字体是用牙刷柄弄出来的。德国的鹰和卐字印章则是用长统靴的橡皮后跟雕出来的。总之，这个伪造证件的部门为逃跑者准备了四百份以上各种各样的伪造证件和文件。

一个澳大利亚驾驶员能造出指南针——盒子是用留声机唱片融化后做成的，玻璃是从窗户上的破玻璃做成；指针则系用缝衣针在磁石上摩擦而成。

在裁缝车间里，有六十个人缝制着用皇家空军制服改制的平民服装，并且也能仿制与德国空军相似的制服。逃跑者穿了一模一样的制服如果被抓住，那是要当作间谍被枪毙的。但是根据日内瓦公约，我们是允许穿伪造的制服的。

我们听到一个消息说，美国人将在六周内移往另一个院子，而他们曾经在地道工程上花过不小力气。为此我们加了夜班以加速工程。但是对于沙土的处理，我们只好多少要碰碰运气了。大部分挖出来的沙土都被倾倒在菜园里。有些散落在一座新建的集中营戏院周围翻过的土层上。一天，一个“窥探眼”在那个菜园里翻

看到了新的亮晶晶的黄土。这就引起了一场疯狂了似的、但又是无效的搜查活动。德国人在123号平房区和铁丝网之间挖了一条长长的壕沟，可是它挖的并不深，根本没有发现“汤姆”。

到了6月底，计算了一下，正好这条“汤姆”地道已经可以挖到森林的边缘了。从这里开始就要挖一条直通地面的竖井出口。可是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来了一群德国人，他们着手要把这一片松林砍掉。其实这纯然是一种巧合。因为他们想在那里建造一个新的院子，因而把松林砍了足足五十码地方。现在对美国人来说，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因此，决定无论如何要使“汤姆”这条地道通往地面，逃跑者可以爬行一段距离再隐蔽起来。

现在挖出来的沙土越来越多，令人着急。有人建议把它暂时堆在“狄克”地道里。于是每天晚上一大溜的“企鹅”用红十字会的箱子装满土，到狄克地道的棚屋里把土从竖井洞穴倒下去。但即使如此，仍然容纳不下。于是“X”组织的领导人决定，大家把土装进红十字会箱子后，堆放在床底下，在这些土被处理掉以前，希望德国人不会发觉。

“汤姆”地道已挖了二百六十英尺长了，再有几码就可以到达它的目标了。“X”组织领导人布什尔决定暂时停工数天以减少怀疑。可是不幸，守卫人员发现我们藏在棚屋底下的沙土箱子了。德国人把重型运输车辆调进集中营里来，他们到处乱挖乱压，想把我们可能有的地道摧毁，但是他们只是把菜园弄得一塌糊涂而已。

过了一两天，最后到123号平房区来搜查了。一个守卫人员突然将探测器戳到了汤姆地道秘密活门的边边上。这是“汤姆”的末日来临。那个守卫人员不知道怎么打开活门，于是他们把它砸了。他们最后用炸药毁了“汤姆”地道，甚至把123号平房部分屋顶也掀掉。他们对能够发现了“汤姆”如此欣慰，他们甚至都没采取报复措施，也没再作提防。

在这之后，“X”组织举行了一次全体大会，大伙决定要赶紧挖掘“狄克”和“哈雷”两条地道。但是大家又认为最好是到冬天再动手。我们相信在冬天德国人会放松警惕，因为那时不是逃跑的好时机。

1943年8月底，美国人要转移到一个新的院子里去了。于是我们用自己酿造的葡萄干酒开了一个欢送会。

正当我们等待冬天到来的时候，“X”组织作出决定不妨试试从地面上逃跑的计划。一个方案是：木匠们用木头仿造出假的来复枪，他们偷偷地在岗哨身后用卡尺量出枪支确切的尺寸大小，然后用铅笔芯把它们铅化得象金属外表，然后再用擦光油擦亮达到乱真程度。每间隔一段时间，德国人总要押送一小批战俘走出大门外太阳底下去脱下衣服捉虱子。地面上逃跑的想法是要我们自己的人来搞押送和抓虱子。有一次，三个战俘假扮成德国空军的下级军官，押着排成一溜的二十四名战俘大模大样地通过了大门口岗哨走进了松林。几分钟之后，六名高级军官（包括大不列颠战役中的王牌飞行员鲍勃·斯泰因·托克）也试图如法炮制，正走到门口被查觉了。德国人要我们全排队站了将近七个小时，目的是要查清三个失踪的人是谁。后来所有想逃的都被抓住了。

1944年年初，我们又准备动手继续挖地道。在“狄克”地道里几乎塞满了从“汤姆”地道里运来的沙土。而且德国人又要建造一座新院子，它把“狄克”地道的通路给堵了。最后只剩下哈雷这条地道了。但是当时白雪盖满了大地，挖出的沙土往那儿放这个问题难住了我们。有个人提出建议，把哈雷地道挖在戏院的下面。他曾注意到德国人从来不去那个地方。那座戏院是我们自己盖的，建造时我们特别注意不让那些“窥探眼”有窥视我们的机会。戏院下面有个很深的坑，那儿可以存放成吨成吨的沙土。我们的工程师们把一张座位椅子调整了一下，用铰链使它可以往后翻，而在

这张椅子下安了个活门。“企鹅”们每夜把一袋一袋沙土倒向其内。

三个小队——每队有十名挖地道里手——把“哈雷”工程大大加速，每天可以前进十二英尺。到1月底，第一个“中间站”已经在 一百英尺外的地方建立起来。设计者们计算，把地道总长加到三百英尺，就可以把我们带进树林的隐蔽地了。

这可得挖很远很远，而条件却越来越坏。土地又冷又潮湿。每个挖地道的人差不多都感冒了。不过到了2月中旬又向前挖了一百英尺，建造了第二个“中间站”。这里已到了最外一层铁丝网的地方。前头还有一百英尺的工程。

然而，德国监视我们的头子对我们怀疑起来。突然，瓦利·弗洛岱，我们的“企鹅”头头以及负责安全的领头人和六、七个起关键作用的挖掘人员都被转移到几英里外的一个看管所去了。这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丧失了关键人员本来就够糟糕的了，而更糟的是，德国人显然知道我们正在干些什么事情。

1944年3月8日，我们剩下的人又挖掘了一百英尺，并且建造了地道末端的一个洞室。在四天中，我们最好的四个挖掘能手这时直向上挖出道口，并在一旁搞好梯子步步上升。后来他们甚至挖到松树的根，估计已经挖到了松林里边，离地面只有两英尺了。于是他们停下了工作，用板铺盖了竖井洞穴的顶部，以便让别人在夜间来把它同地面挖通。3月14日，这条地道已经挖好了。人们把秘密活门关上，在四周砌上了水泥，这是为了等待天气转暖，并挑一个合适的夜晚可以逃跑。

就在第二天，那个德国监视我们的头子派他的部下到104号平房区来搜查。其中有个人甚至把他的探测器在封住“哈雷”秘密活门的水泥四周探查。幸好未有觉察。

参加挖地道工作的一共有五百个人，但我们估计只有二百二

十个人可以在黑夜的几个小时里通过地道逃出去。逃跑委员会起草了一张名单，其中包括最需要逃跑的人和挖地道中表现最好的人。其他的人的名字则放在帽子里抽签拈阄。

那些上了名单的幸运者们开始作逃跑准备。我们凑集的钱只够四十个人买火车票，其余的人只能步行穿过边境。布什尔和另外几个曾经浪迹德国的人给大家讲课，提出各种建议和忠告。一位捷克斯洛伐克籍的飞行员描述了德捷边境的山地情况，从这里到那边只有六十英里远。大部分步行穿越边界的人都要往那边去。

3月24日星期五早晨，集合点名之后，罗杰·布什尔向大家宣布决定在当天夜晚实现逃跑计划。当时地上还积着六英寸厚的雪。这显然不太妙，但那晚没有月光。而且据我们的气象学家们推定，当晚的风可以掩盖住容易引起怀疑的声响。

那些伪造证件部门的人，在逃跑者的证件上填好各项内容，盖上合适的日期印戳，那是必须等到最后才能办的，不可能事先盖好。这些人有的伪装成外国工人，有的是中立国的人，其他也有扮成德国军官、士兵和平民的。而且每个人的证件都必须和他本人所谈的经历相符。

一个挖掘者一直爬到哈雷地道的末端，亲自考察一下要走到地面究竟还有多远。当他拿根棍子向上捅了三英寸时，日光就射进了地道，这使他惊奇非凡，看来，要达到地面已经没有什么困阻了。

我们在地道竖井洞穴穴底铺上了毯子以冲淡任何响声，同时在滑车上钉上光滑的板，使人可以躺在上面被拉着走。当暮色降临，逃跑的人开始伪装自己。我们把我们自己搞的紧急口粮发给他们。这是味道不佳但营养丰富的混合物，由碎巧克力、麦片、压碎饼干、维生素、大麦、奶粉以及其他浓缩食物加工煮在一起。

到8点半，一切准备停当。十分钟以后，第一个逃跑者走下了梯子，他穿着平民的服装，手里拿着自制小办公包。第二个是个工人的打扮，紧跟着第一个人走进地道。罗杰·布什尔夹着一个公文包，穿着灰色人字呢便服，黑大衣，黑礼帽，活象一个神气的商人。他是首批五个逃跑者中的一个。

但是当第一个逃跑者撬不开顶面隔板时，人们等得实在心焦。好不容易才把膨胀了的木板弄松动，并搬走浮土，几乎折腾了一个小时，这对于躺在地道中等逃走的人真是难受。当人们看到了天上闪烁着几颗星星，竖井通道里吹进了自由的新鲜空气，人们无不感到松了一口气。

可是当第一个逃跑者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看望时，他大吃一惊。原来这个通向地面的洞口，非但不是在树林之中，而是距树林还有十英尺远，再说，这个张着口的洞穴离开一个德国兵岗楼才十五码左右。当消息传来，我们都目瞪口呆。可是逃跑者心急如焚，欲罢不能。现在，跑出洞穴是一场冒险。如果等一个月以后另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再跑，而在这期间还要挖三十英尺的另一段地道也是同样地冒险。此外，伪造的证件上都已填好日期，将来再要重新弄过那就太麻烦了！这成了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第一个逃跑者窜进灌木丛，拿着一段在洞里拖出来放松了的绳子作为暗号。如果前面平安无事，就用绳子告诉第二个人出来。岗楼上的哨兵并不注意松林里的动静，只是把探照灯扫射铁丝网和看管所院子。另外两个哨兵沿着铁丝网来回巡逻。当这两个巡逻兵走远时，前一个人就拉动绳子，后面一个人就跳上来窜进树丛里去。

第一批二十个人花了一个多小时才逃出集中营。这二十个人都是搭火车走的，他们到四分之一英里外的沙冈车站乘车。由于事先从德国守卫那里弄来了火车时刻表，我们能准确地了解火车



开行的时间。

在104号平房区里，逃跑时间表的拖延，真使人担心透顶。准备逃跑的都围坐一起，一群奇形怪状人的集体：衣冠楚楚的平民、工人和德国军士，心里嘀咕的是：德国守卫人员千万不能来。到9点半后，坐在活门口的人感到吹来了一阵冷风，这就是说地道口打开了。平房区里引起了一阵欢乐的骚动。

但是中间又出现了其他意外情况。两处地方不断有大块泥土崩落，使行动中断了一个半小时。有时手推滑车出轨也延缓了时间。我们距原定时间表落后了好多。糟糕的是，半夜里还响起了空袭警报，所有的电灯，包括地道里的用偷电办法点起的电灯都一下全熄灭了。现在事情明摆着的是：在天亮之前跑出去的人不会超过一百个。

我们听到了远处炸弹爆炸的响声。当英国皇家空军正在对一百英里外的柏林进行轰炸时，我们的棚屋也颤动了。在任何其他时间我们一定会为此兴高采烈，可是那天晚上我们却骂娘了。一直差不多到凌晨两点，电灯才恢复光亮。人们一个挨着一个默默地爬进地道口，然后钻出地道进入松树林。

到了差不多5点钟，负责组织的皇家空军人员感到天色已经太亮，果断地下了命令：“再让三个人下去，其他的只能停下来。如果他们走完后，德国佬在早上集合点名时，没发现的话，那末这些逃跑出去的人在德国人发动追捕之前至少还有四小时的时间可以利用。”

最后三个人下到了地道，正当第三个人坐上滑车在地道里消失的时候，我们听到了一声枪声。

原来事情是这样：有两个逃跑的人已经到达了松林中指定的一棵树旁，另外有一个人爬行着，爬过了洞口到这棵树的一半距离，而第四个人正好刚刚钻出地道口，就在这时，那个摇绳子打暗

号的人看到一个德国兵正在走来，如果他继续走来，他必然要发现洞口。在洞口外的人吓得伏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但是他急忙找到绳子拉了两下，发出了危险的警告信号。那个德国兵大踏步走了过来。当他离开洞口才七码远，但仍然没有发现洞口。

一、二、一……他迈步向前，很可能是半睡半醒似的，而且有一只脚正跨在离地道洞口十二英寸的地方，下一步几乎就要踩着隐伏在洞口的人。他再迈了一步，这一下他从瞌睡中猛醒过来。他根本没有注意到在他脚下面躺在那里的人。但是他一定看到了横跨雪地上的一条黑色脚印带。接着他看到有人伏在去松林的半道上，于是他举起枪准备射击。正在这个时候，一个逃跑者从树丛里跳出来一面向他摆手，一面用德语喊着：“别开枪！哨兵，别开枪！”

这个哨兵猛地吃了一惊，乱开了一阵枪。这时两个藏在树边和躺在半路的逃跑者缓慢地起来向前走，双手举起。而在这个卫兵的脚底下未被发觉的那个最后一名逃跑者，此时也站了起来。这个卫兵向后退了一步，并向下面探看，在他面前洞开着的是“哈雷”这条地道的入口。卫兵点起了火把照亮了地道，正好看到那个第八十一名逃跑者正摇摇欲坠地站在梯子上。

于是哨兵吹响了哨子，守卫人员从四面八方赶了过来。挖了那样长时间的“哈雷”这条地道算是完了。

在104号平房区里，人们正在十万火急地销毁各种名单和证件，消灭器材装备和处理掉平民服装。还在地道里的人沿着滑车轨道移步后撤，唯恐后面飞来枪弹。当最后一个人跑出来后，立即把秘密活门口封死了，并且把取暖火炉搬过来把它盖上。

过了几分钟，地底下传来了扒土的声音。有个守卫人员沿着地道口想把活门打通，但我们不让他上来。

早晨6点钟，院子里来了许许多多德国警卫，机枪对准着窗口和大门。守卫人员搜查104号平房，并且不断叫喊：“出来，出来，每

个人都出来!”当每个人走出平房时,守卫人员就把他抓住,在雪地里把所有衣服和鞋子全剥光,每件衣物都经过检查。

正当在进行搜索的时候,一个德国副官走了进来,并且恳求我们把秘密活门打开,因为那个守卫人员还在下面,他们深怕会把他闷死。其他守卫人员发现不了活门的地点。我们把它打开了。在地道里的那一个守卫人员还是个不赖的家伙——他是唯一的有足够勇气下到地道里去的“窥探眼”。

几小时之后,在周围的乡村激起了一场战争中空前浩大的逃犯围捕。收音机里警告所有居民进行监视。而且从斯台汀和但泽两地调来了成千上万名党卫军、盖世太保和空军,甚至海军人员也参加了搜捕工作。

我们在看守所院子里等待着受打击报复。不管怎样,哈雷这条地道创造了从集中营逃走者人数最多的世界纪录。盖世太保来到这里进行了调查。但是这些间谍不是德国正规军,他们得不到守卫监视人员的合作,也根本发现不了什么。而我们却从他们手里偷来了两个手电筒。

七十六个逃跑出去的人大部分在一天左右的时间中就被逮住了。虽然有几个人已经跑到较远的但泽和慕尼黑。许多人被关进了离我们四十英里远的、盖世太保设在戈立兹的监狱里,后来其中十五个人又被带回了我们所在的看守所。除此之外,我们就不知道什么了。

过了两个礼拜以后,我们的一位高级军官被叫进了司令官的办公室,德国人冷冰冰地念着一份官方报告:七十六名逃跑的军官中四十一名已被枪决。

我们的高级军官回来后召开了一个大会,宣布了这个可怕的消息。根据日内瓦的战俘公约,对于企图逃跑的战俘是不能处以严刑的。德国人过去也从来没有这样干过。我们猜想这种消息不

是真的，而是对我们的一种吓唬，以制止我们今后再逃跑。但我们在看管所院子里还是举行了追悼会，每个人在手臂上都佩带了表示哀悼的黑色菱形臂章。

德国人贴出来的布告上，被处决的人决不止是四十一个而是四十七个人，在他们中间有我们的领头人罗杰·布什尔；负责伪造文件车间的汤姆·魏伦；摄影师查理·霍尔；造指南针的阿尔·黑克。有好多天，看管所院子里充满了悲痛和愤怒的气氛。后来被处决的人又增加了三个。德国人从来不告诉我们处决的理由，也从来不讲为什么七十六个人中他们要枪决五十个人。过了几个星期之后，他们运来许多骨灰盒，里面放着被处决的人的骨灰。我们把它安放在一个地下室里留作纪念。

到6月份时，我们收到了一封用西班牙文写的信，署名是一个假名字。这是一个逃跑者事先联系好的暗号。他是英国皇家空军里的一名荷兰飞行员，信上表示他已到达了英国。另外又收到了一张从瑞典寄来的明信片，上面写着两个假名字，这是两个挪威逃跑者寄来的。这样，算上十五个人送回看管所，五十个人被处决，还剩下有八个人下落不明。

一直等到很久之后，我们才打听到又有三个人被送到了巴茨的集中营里，另五个人被送进了臭名远扬的萨赫森豪森集中营。盖世太保曾经夸口，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从集中营里逃出去。但是就在几个月之后就有三个人从萨赫森豪森集中营挖地道逃了出去，他们最终还是被抓住了。但那时候，德国已快崩溃，他们没有被枪毙。

如果德国人真的以为处决我们五十个同志就能把我们吓住，不会再挖地道，那他们是犯了个心理学上的大错误。后来，“X”组织在两个挖地道的老手率领下又重新成立起来了，并且立即挖一条叫“乔治”的地道。它是从那个戏院的地方开掘的。乔治这条地

道大小同哈雷一样。我们几乎准备要逃出去了，忽然之间我们被匆忙疏散了。这时，俄国军队已经到了离我们只有三十英里的地方。我们被迫接连走几个礼拜，横跨半个德国。1945年5月2日我们在卢贝克。英国第二军的坦克冲了过来，并且把我们解放了。

第五部分 反击

(1944年)

1944年2月12日，英美联合参谋长会议给最高统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发布的一项指示里说：“你即将进入欧洲大陆，并且要同其他盟国一起担当直捣德国心脏的作战任务，并摧毁其军事力量。”

关于随之而来的在英国准备军队供应和船只结集等等，不管如何保密，也是瞒不了敌人的。然而，要使盟军的进军获得成功，那就必须把登陆的地点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水陆两栖作战的日期，置于最严格的保密措施之下。

现在，普通爱国者们的英勇行动；聪明机智的人们静悄悄的侦察、机密的偷窃、一些人被俘和一些人潜逃等等，无一不和即将来临的进军密切相关。人们搞精心策划的骗局和“假面舞”，搞迷惑敌人假情报。空中的弄虚作假也不少，既拍发伪造的无线电信号，又对雷达的屏幕进行干扰。在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分散在各地的抵抗战士们已联合起来组织成一支打击敌人的军队，随时准备从内部袭击敌人。

1944年6月6日进攻欧陆的开始日来到了，这项经过周密设计的进攻计划给敌人以猛烈打击。在仅仅几个小时内，希特勒大吹大擂的西线的壁垒以及它严密的防线被打开了个大缺口，盟军迅速地向德国挺进。

纳粹德国对于盟军排山倒海的进攻究竟采用什么对策来加以

阻挡和反击呢？它们的计划随着时间的消逝也展现出来。

在进攻欧陆开始日之后，太平洋的岛屿堡垒一个一个地被盟军所摧毁。但是日本把中国分裂成两半。

我扮演了一个假蒙哥马利^①

（书摘）

米·依·克里富顿·詹姆斯

1944年暮春的一天早上，在英国雷塞士特皇家陆军军饷部办公室，我桌子上的电话响起了清脆的铃声。“是詹姆斯中尉吗？”话筒里传来了愉快的声音：“我是部队电影摄影队的尼文上校”。对于电影明星大卫·尼文的声音我是熟悉的。他接着问我：“你对拍摄一部陆军的电影是不是有兴趣？”

我回答他：“是的，长官，我当然是十分感兴趣的。”

尼文高兴地说：“那好，看看你是否可以就到伦敦来试试镜头。”

我慢慢地放下了听筒，寻思着部队里是不是由于疏忽大意而一下变得富有理智了呢？我曾经当过二十五年的演员。1939年战争爆发后，我就志愿参军愿意给战士们演戏。可是我被分配到军饷部来当差，这个差使对我是完全不合适的。现在看来也许要纠正这个错误了？

我高高兴兴地到伦敦去了。我按他给我的地址找到了寇松街那个地方。大卫·尼文亲切地接待了我，然后就把我介绍给一个穿便服，自称是莱斯脱上校的人。他向我说：“我是军队情报部

^① 贝纳德·洛·蒙哥马利(1887—1976)是英国陆军元帅，前帝国总参谋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先后任英国第八军团司令，曾在北非打败纳粹名将隆美尔而闻命。1944—1945年任西北欧英军总司令。——译者

MI5 的成员，我说出来恐怕会使你震惊，你来这里不是为了拍什么电影，你是被选中来扮演一个假的蒙哥马利将军”。

我知道，我的外表看来有点象“蒙迪”（蒙哥马利的昵称）。我的朋友常常谈论我们两人的外貌酷似。有次我的相片在伦敦《新闻纪事报》上刊登出来，那是戴着一顶贝雷帽的姿势，说明词写着：“你错了，他的名字叫克里雷顿·詹姆斯中尉。”这张照片就是扮成蒙哥马利的模样的。

莱斯脱上校默默地打量了我一番。然后他向我解释了他的计划。他说，进攻欧陆的开战日已经迫在眉睫。我们已经建立了一支有力的登陆部队，它将很快在法国登陆并且要为进攻柏林打开道路。要想把这方面的集结和准备不让德国人得到任何风声是不可能的，而且他们很可能猜出我们究竟打算在那里登陆。但是他们不知道这场期待中的登陆战在那一天发动，他们也不能排除在其他战线方面我们来一个突然袭击。因此，我们现在已经拟定了一个迷惑敌人的假作战方案，这个方案已经得到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同意。这个假方案的意图，就是要大力搞凿凿有证的宣传：蒙迪——最有可能当上英国登陆部队司令的蒙哥马利将军，已经离开英国的职位，到世界其他地方去了。为了这一目的，他们要我在经过一段短短的角色训练之后，变成“蒙哥马利将军”。莱斯脱上校对我说：“对这个计划，你绝对不能向任何人透露一个字。”他最后问我：“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摇了摇头。因为我要么问问题，那可有多好多好多要问，要么就索性一个也不问。自从这次谈话以后，我总有那种怯场似的心惊胆战的感觉。在上次大战中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列兵，至今看到那些高级军官还有小学生见到老师那样的胆怯心理。可现在却要我去扮演他们中间的一个最大的长官，这实在有点啼笑皆非的喜剧味道，然而现在我已没有时间去仔细玩味这一切了。

在以后几天里，我就细心琢磨报上蒙迪的照片和新闻片里他的一举一动。莱斯脱上校和他的两名低级军官教给我有关扮演蒙迪的成百上千细节。他们把保密的重要性一遍遍向我灌输以至我有阵子根本不敢和任何人讲话。莱斯脱对我说：“我希望你把这场正在排演中的戏看成是专给敌人排的一次演出。我们的观众是很不简单的。我们一定要骗住德国的最高统帅部。”为了进一步演好我将扮演的这个角色，他们还安排我去当了好几天蒙迪身边的工作人员，以便能在他身边仔细观察模仿。为了避免引起怀疑或者一些别扭问题，我伪装成一个情报部门的军士，蒙迪近身工作人员中只有两个成员知道我的活动目的。

当我穿着奇特的IC情报部门军士服装和带着证件报到后的第一个清晨，我发觉我坐在紧跟蒙哥马利将军的罗斯·劳伊斯轿车后面的吉普车上。天亮时，我们一溜车队，每辆相隔五码远，在朴次茅斯的乡下一座大宅前停了下来。经过长达五分钟的紧张的等待后，按准确安排的次序，蒙迪近身的助手们开始出现了。当他们都按照礼仪上的精确规定对我们审视一番以后，蒙哥马利自己也出来了。他的模样正是我想象中的那个将军，一点也不差。他戴着那顶出了名的黑色贝雷帽和穿着皮飞行夹克。而且我注意到，他在敬礼的时候有他特有的姿式——手轻轻按动了两下，象是打招呼一样，而不象别的什么。

当车队启程的时候，我们的司机仍然同前面的罗斯·劳伊斯轿车保持着规定的相隔五码的距离。我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蒙迪。当我沿着乡间的公路飞速前进时，有些一大清早就在路上走的人都站住了。突然他们认出了蒙哥马利，欣喜地招手欢呼，蒙迪向他们回答了友好的敬礼。

正当车队到达海边的时候，一幅壮观的图象映入了我的眼帘。我看到了全副武装的欧洲登陆日的一次彩排。在视线所及的海岸

边，有着一艘艘战舰、巡洋舰、驱逐舰和其他船只。无数巨大的登陆艇正吐出成百的坦克、装甲车和大炮。头顶上是密密麻麻的飞机。步兵则从登陆艇上蜂拥地登上岸边。

蒙哥马利同站在一个旅馆房顶上观看这次演习的其他盟军司令官简短地交谈之后，又走了下来。立即，在他身后跟了长长一大队人马，我也挤进了这伙人群跟在他后边。我只是死盯住他，几乎忘了其他一切。他不断向前走，一个人支配着整个的场面，但从来没有不必要的指手划脚。他老是停下来向军官、军士和列兵们提出了问题，检查情况，提出建议和果断利落地发出命令。他的人品多么出众。只要他一出现，还没有张口说话，就会引起人们的强烈注意。我想他如果是名演员的话，他早就发了大财了。

随后的几天里，我知道了将军的好多情况。他不抽烟，严格禁酒，特别讲究体格健壮。当有一次莱斯脱上校在电话里问起他，在他的饮食方面有什么我须要知道的特殊的习惯时，他快声地说：“没什么特别的，我的粥里不加牛奶和糖，就这些。”在吃饭的时候，他常常兴致勃勃地谈起鸟，野兽和花。如果他发现他的军官对自然历史知识一窍不通时，就轻声地打趣他们。我从来没有听到他在这种时候谈论过战争。

我几乎象头鹰隼似地注视着他，试图抓住他种种瞬息即逝的表情。我观察到他习惯于把手放在背后进行散步，当思考的时候用手按着面颊，他的突然性的动作，吃东西时的模样以及说话得意时老要伸出一只手来的习惯，我也细细体察。最后，我对扮演这个角色已经满有信心了，不管是他的声调、姿态和各种习性都可以学得象。但是由于我天生有些羞怯，对于能否模仿蒙迪的独特性格，迸发出他能带给别人的那种有力的感情和自信心，我抱有怀疑。

作为我模仿他的最后一步，人们安排我对将军进行一次访问，当我走进他的房间的时候，他正在书桌上写东西。一看见我进来，

他立刻带着笑容站起来。他比我年龄大得多，但是我们俩长得奇怪的相象，就好象我在镜子里看我自己一样。不必用假眉毛，也不用在面颊上垫上什么，不必用任何人工化妆。他也很快发现了我们之间的共同点，并说了出来使我消除一点紧张感：我是在澳大利亚长大的。他是生在澳大利亚附近的塔斯马尼亚岛。当他说话的时候，我留心地听着，力图记住他那个有点尖声的、高调子噪音和他爱用的字句。他从不使用那种夸张的形容字眼。有人曾经形容他的语言干巴无味。

在我离开前，他对我说：“你知道，你的责任很重大，你有信心吗？”当我有点犹豫的时候，他很快就说：“一切都会顺利的，别发愁。”就在那一时刻，由于他那种鼓舞人心的能耐，使我的疑虑一扫而光。

几天之后，我在作战部感到有种紧张的气氛。莱斯脱对我说：“詹姆斯，现在拉开帷幕的时候到了。明天晚上6点半，你就要变成蒙哥马利将军了。你将驱车前往机场，在众目睽睽下，登上首相的专机启航了。第二天早上7点45分你将在西班牙的直布罗陀着陆。我们一直在整个非洲海岸散布这样的谣言：蒙哥马利很可能要来组织一支向法国南部登陆的英、美联军。你到整个中东去旅行是为了增加这种谣言的份量。你的每一个行动都会受到希特勒的特务的严密注视。我们将或多或少地告诉你，做这做那，但是事情决不可能象原来计划里那样一丝不差。你得自己随机应变，经常注意掌握整个局势。要记住，从现在开始，所有那些高级军官都是你的下属，如果群众看见了你高兴地欢呼，那是理所当然之事。”

第二天，当我穿上我的全套上将军服，带上那著名的黑色贝雷帽——上面佩戴装甲军团的军徽，那种沉重的即将投入战斗的感觉笼罩着我。但是在我向莱斯脱上校报告请他检查是否合格时，

他对事情似乎感到满意。他说：“现在只有最后一件事”，他边说着，边把几块卡其布似的、绣着将军名字字母B.L.M.的手帕拿给我，并且说：“只要你认为那儿合适，就把这些手帕随便丢落在附近。在这种游戏中，经常是：细致小节很管用。”说完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并祝我幸运，就走开了。

我迅速地把贝雷帽戴在正确的角度，后面由海伍德准将和摩尔上尉跟随着（他们作为我的两名个人助手）走下楼去。楼下停着三辆军车。在挂着三角锦旗的那辆“蒙迪”坐的汽车周围围着一大群人。当我走进汽车时，人们发出了一阵欢呼。当汽车徐徐启动时我给了群众一个漂亮的蒙迪式微笑和人人都熟悉的蒙迪式的敬礼。我听到人们的呼声“老蒙迪好！”我一直微笑着和敬着礼，直到我的面部肌肉都有点僵硬，我的手臂酸痛了。

当我抵达瑙索尔特机场时，那里的群众更多，而且在我的飞机旁边排着一溜令人望而生畏的高级官员。有些是蒙哥马利十分亲近的密友。我的心象个活塞在上上下下跳动不已。我用力强制自己才跨着轻快的步伐跨出车门，微微笑着。海伍德准将跟随着我。我慢慢走过列队排着的高级官员检阅着，他们都一个个毕直地立正。随后我走向飞机的机组。

我问驾驶员：“你好，斯利，你认为我们这趟旅行会很顺利吗？”我们读了一下有关气象的报告。然后我在检阅了机组人员之后登上了舷梯，转过身来向着机场上的人们最后敬了一个礼就走进了飞机。现在看来第一场戏算是成功地通过了（我后来听说，那批为我送行的高级官员丝毫没有怀疑我是个冒牌货。其中有个同蒙迪十分亲近的人说了这么一句：老头看来倒健壮，只是有点倦容）。

次日晨，飞抵直布罗陀。第二场戏的幕帘拉开了。背景是那著名的岩石（直布罗陀的别名），站着两群官员和一系列汽车。在机场

的人群中间还有些西班牙的工人。他们中的某些人就是知名的敌方特务。我听见海伍德准将对我说：“要尽可能让越多的人看到你越好。”飞机的门打开了。我在机舱口站了一会儿。在肃静中我行了蒙迪式的敬礼，然后轻快地走下了舷梯。

在机场欢迎仪式结束之后，我驱车经过直布罗陀城的大街。在大街上站着许许多多西班牙居民，正在等候着看我。当我到达政府大厦时，那里伫立着许多的群众。仪仗队举枪致敬后，直布罗陀总督，罗夫·伊斯伍德将军，他是蒙哥马利的老朋友微笑着伸出他的手说：“喂，蒙迪，再次见到你真好！”

在动身来这里之前，关于这次会见事先已经简单谈过，而且我也知道蒙迪一直是用小名来称呼罗夫爵士的。因此我用蒙迪那种快活的声调问他：“罗斯蒂，你好吗？你看来长得顶健壮。”于是我亲热地挎起他的胳膊并排走着。

罗夫把我带进他的书房，向走廊里张望了一下，然后小心地把门关上，这时一句话不说地盯着打量我。接着他脸上露出了笑容，并且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我脑子总是转不过来。你就是蒙迪！有那么几分钟我还以为他改变了计划，决定他亲自来了呢。”

我被带到我自己的房间，并且让我一个人在那里单独早餐。碰巧我向上望的时候，我注意到在邻近一幢房子屋顶上有个人影晃动了一下。有一个工人蹲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支来复枪的东西对准了我。我一时感到很不妙。但是我再走近点瞧瞧，我发现这种害怕是太过虑了，他不是拿来复枪瞄准我，而是用一个望远镜在对我进行窥测。

一个助手又把我引进了书房。在那里罗夫又解释了下一步的行动，他说：“几分钟之后，你和我要到房子后的花园里去散步。两个有名的西班牙金融家，他们是我的相识——我不愿意把他们说成是我们的朋友，他们要到我这里来观赏几条古老的摩洛哥地毯。

可以说完全出于巧合，他们在进入花园朝里走时会遇到你。”他看了看他的手表，就把我领着朝花园里走去，并且说：“自从童年以来我还从没有一次感到如此快活！”

当我们在花坛之间慢慢蹒跚的时候，太阳直照着。我们停下来歇息片刻互相讨论一些园艺问题。我们走进一条小路，就在房子左侧，迎面碰到一群工人正在脚手架上修理墙壁。其中一个工人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但一当我也对着他看的时候，他立刻把目光移开，继续干他手中的活。我认出来这个人就是早先用望远镜看我的那个人。

我们仍然若无其事地散着步，直到花园的铁门喀嚓一声被打开。有两个人正在中间那条路上向着我们走来。这两个人约三十多岁，十足的西班牙人模样，胡子刮得光光，穿着深色的西服。

当他们向我们走近的时候，罗夫向我耳语一声：“詹姆斯，别紧张，你的头就这么抬着。”

我假装没有看到他们两个陌生人，开始向罗夫谈起英国的战时内阁以及“303计划”。这位直布罗陀总督对我的手臂触碰了一下，好象装作要我注意有人来了，我突然煞住了话头，对他们走近表示出惊讶。罗夫友好地向他们问好，而这两个人按西班牙方式向我们屈了屈身子。罗夫把我介绍给他们。这两人直挺挺站着用那种敬畏而又尊重的目光看着我。我保持着礼貌但十分矜持，并且说话时用蒙哥马利那种典型的样子把手放在背后。

其中一个西班牙人，给人的印象就象侦探小说里阴险的间谍那样，用蛇似的眼睛紧盯着我。而另一个则假装很有兴趣地听着罗夫爵士的谈话。但我注意到他有时候偷偷地用眼睛扫射着我身材的每个部位。他们俩在听我唠唠叨叨地谈论天气、鲜花和政府大厦的历史时，摆出了那种使人觉得滑稽的全神贯注的样子。当我认为他们已经看我看得够了的时候，我就显出轻松的态度说：

“好啊！我希望天气一直这样好，摆在我面前还有好多飞行任务呢。”接着我就准备掉转身子。他们向我告辞，罗夫马上就把他们招待到屋子里去了。整个会面的时间是很短促的，然而就在那短短的瞬间，这两个间谍的命运，以及很可能我们成千上万的士兵的命运，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后来我才听说，这两个西班牙人是希特勒的最有才能的间谍中的两名，他们都经过盖世太保的特别训练。由于MI5细心安排的谣言的广泛流传，他们在柏林弄到假证件，假姓名，又匆匆忙忙作为银行家进入西班牙社会，然后在直布罗陀住了下来，明显的目的就是为要侦察我。同时他们还安插了两名下手，一个就是装作政府大厦建造队的工人，一个在机场上搞到一个职位。这四个间谍都要分别把他们观察到的种种细节写报告送了上去。

西班牙人干活可真是够快的。在他们离开政府大厦之后两个小时，希特勒在马德里的代表已经得到报告：蒙哥马利将军已经抵达直布罗陀，将乘机前往非洲。柏林立即收到了一份紧急呼吁：“请不惜一切代价查明303计划内容。目前有无任何情报？十万火急。”接着德国反间谍部门命令下属集团中一切力量摸清这一问题。

我离开直布罗陀的情况同我到达的时候差不多是一样的。士兵们持枪挺立，刺刀闪闪发光。“烈火式”飞机在机场上空摇摆着机翼向我致敬。当这一切礼仪过去之后，我挽起罗夫爵士的胳膊在机场的食品小卖部里来回地走着，因为这里显然混有盖世太保的特务。就在这个小卖部里间开着的窗口，我假装同罗夫一本正经地并且急切地谈论起军事问题来。我对他说：“罗斯蒂，关于这些海港的防御，我已经告诉了首相，这C4是绝对安全的。不过我要海军任务告一结束，这样就能毫不延迟地运装甲车。”然后，我用手直指着海湾说：“如果我们能取下海岬右边正中地段附近，工程

师们就能改变使其适应303计划。”我沿着这个路数继续唠叨下去，其实这一切彻头彻尾是无聊的废话，可是我几乎可以起誓，在有一个地方我说得连那个罗夫爵士都对我使了怀疑的眼色。

我从直布罗陀起飞后，第一站到阿尔及尔。在那里早已散布下了有关我的谣言，就是说蒙迪到这里来负有一项重要使命，也许就是组织一支在法国南部登陆的英美联军。在机场上我受到了梅特兰·威尔逊将军指挥部官员的欢迎。欢迎之后，我进行了通常的视察工作。在四周围聚拢着一大群说各种语言的观众。这些观众都是因为我们故意透露出去的关于蒙迪“绝密访问”的消息吸引来的。他们都想一睹蒙哥马利将军的丰采。

在这些群众中有两个意大利人，他们表面上同情盟国，但是有人知道他们是盖世太保雇佣的人物，和他们的顶头上司——一位神秘的法国少校。这个法国少校是一星期前作为法国情报机关的成员来到阿尔及尔的。但是据我们情报人员了解，这个人是敌人的一名“王牌”间谍。几乎一到阿尔及尔他就表示强烈愿望想要见到蒙哥马利，如果后者碰巧来到阿尔及利亚访问的话。现在这样安排显然是为了满足他的愿望。

在我们离开机场之前，威尔逊将军指挥部的一名上校把这个法国人介绍给我。我很少看见过象他那样一副阴险模样的人。他的黑眼珠闪闪发光，苍白的脸上横着一条青灰色的疮疤，还有那残酷无情的嘴巴。他似乎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不禁带着怀疑的心情注意他的一举一动，怕的是他正在算计着要向我开枪。但是后来总算什么事也没发生，我们只是握了握手，相互寒暄了一番。

一位美国上校陪同我从机场驱车到阿尔及尔。当我走进汽车时，那位漂亮的金发碧眼女司机，穿着一身剪裁出色的美国陆军妇女队制服，向我敬了一个礼并且立即要我签名留念。由于预料到在同那些爱好请签名的美国人接触中会碰到这种紧张情况，莱斯

脱上校给我准备了好些有蒙迪亲笔签好名的照片。我板着脸（因为蒙哥马利在战场上对妇女抱有反感是大家所熟知的事实）把一张照片给了这位妇女队员，并且冷淡地说：“我想这一张大概可以了吧。”

在我这一辈子，从机场到阿尔及尔的这一段路上的情景是永远也不会忘的。我的美国扈从提出警告说由于腾不出部队来保卫这十二英里长的路程，很可能使蒙迪的生命遭受危险，因此决定这条路上车子要没命地快跑，希望不会出什么事。因此汽车开出机场就象一支火箭那样，警报器尖叫着以便前头的人让出一条路来可以使我们的汽车无阻挡地飞速前往阿尔及尔。在这种发狂一样的行车中，我用一种蒙迪式的讲话同那位上校攀谈起来——他当然是了解内情的人。为的是要考虑到我们可爱的女司机。当我们最后经过一座大门在一所石头厦前停下来时，这时才舒了一口气。这里是威尔逊将军的总司令部。一走进表示欢迎的大门，门就立即在身后密闭起来，窗帘什么的也为又一场演完的戏而全都给拉上了。

以后的几天，日子好象是在重演一场场梦境中度过的：飞机着陆，官方宴会，仪仗队，有关高级战略的虚假谈话，大群围观的人群，无疑敌人的间谍也混迹其间，街上站着一行行欢呼的士兵……。最使我头痛的是，在小范围内会见那些高级官员。因为对那种高度技术性的军事事务的谈话，我根本没法应付。不过MI 5在计划我的旅行的时候，是十分周到的。我总是一个人单独吃饭，除了那些了解这个秘密“化身”计划的一些官员外，我很少会见那些对蒙哥马利很可能有个人交往的军官。

然而，我总是要和敌人的间谍狭路相逢。我记得海伍德准将曾经带来了一个间谍，是一个年老的平民，留着山羊胡子，穿着一套旧的黑色上装和戴顶大的宽边帽，看上去象精神垮了的悲剧演

员。海伍德向我说：“请原谅，首长，萨尔瓦多的X教授认为，如果允许他能够向你致敬，他将感到无上光荣。作为一位考古学家，他当然是挺有名的。另外他也是一名忠诚的意大利人。”他一边喃喃地说着这些话，一边看着我半信半疑的表情。有好一会儿我真不理解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同一个考古学家去谈话。但我知道海伍德在MI5里面工作了好多年，他是特地被挑选来担任那种棘手的工作的，而且从来不做没有充分理由根据的事情的。因此我就同这位教授说了几句话，当他后来向我鞠躬转身走开，离我们几码远的地方时，我同海伍德就大声讨论起秘密的军事计划。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进入角色如此彻底，以至我已经实际上变成了蒙哥马利将军。甚至在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也在扮演着这个角色。

有一次，正好我们乘坐飞机将要在一个机场着陆时，海伍德问我：“神经感到紧张吗？”我学着蒙迪的腔调斥责说：“海伍德，什么神经不神经，别再胡诌。”

结果他板着脸孔回答说：“对不起，首长。”

在最后一个礼拜，我们重又回到阿尔及尔时，心里清楚：我完成了这个任务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纰漏。就我们所知，还没有人怀疑我不是蒙哥马利。

现在离开欧战登陆日只有几天的时间了，我的工作已结束。我带着最后的得意洋洋荣耀感前往威尔逊将军的指挥部，换上了我那中尉的制服，静悄悄地从后门被偷运出去。这时，我同蒙哥马利将军酷似的相貌已给我带来了不安。因为在登陆战真正发动之前，始终存在着我的秘密被泄漏出去的危险，因此，下一天的下午，我被偷偷地送上一架飞机飞往了开罗，那是靠得最近的一个大城市，大得足以把我淹没在里面。我住在那里，隐藏着一直等到欧洲登陆战开始以后。

好长一段时间里，我总怀疑我的这一切努力到底有什么用。一直到战争结束以后，人们才告诉我，我扮演的这个骗局给敌人造成了一种错觉，使德国隆美尔元帅的机械化部队被调开了，这对我们在欧洲登陆的成功起了很大的作用。

后来我还听说这趟使命可也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当蒙迪企图去中东旅行的消息头一次传到柏林时，德国最高统帅部曾经下令要把我的座机在半途中加以击落，如果不能把飞机击落，那就要在西班牙或非洲的某个地方把蒙哥马利暗杀掉。但是到了最后时刻，德国人决定要弄清楚我是否真的是蒙哥马利。当他们对这一点获得满意答复之后，希特勒出来干预拯救了我的生命。希特勒命令必须等到弄清楚蒙哥马利究竟计划在欧洲那个地方登陆以后，才能下手暗杀蒙迪。但是直到6月6日的黎明，他们一直没有弄清楚。

金色的斯芬克斯^①——军队的反间谍工作

托马斯·姆·约翰逊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个在军界里流传很广的故事：一位在太平洋地区作战的将军，听说他的“反间谍队”要向他报告工作时，叫喊起来：“反间谍队？他们是干什么玩意儿的？”这个故事很可能是件真事。因为美国军队的反间谍部队很长一个时期是军队情报组织——G2部门里极少为人所了解的一个单位。

1942年，反间谍部队(CIC)是继承老的情报警察部队(CIP)而组织起来的，它很快成为战士猎获间谍的一支独特的力量。由于

^① 按斯芬克斯原系希腊神话中一个狮身、女人面、有翼的怪物。传说她常叫过路行人猜谜，猜不出即遭其杀害。转义：凡不为常人所了解、莫测高深的人亦称斯芬克斯——译者

这个组织破获了成千上万名间谍和破坏分子，挫败了各种危险的阴谋，它在第二次大战中为我们拯救了无数生命和财产。麦克阿瑟将军曾经说过，这个反间谍特种部队使太平洋战争缩短了六个月。

反间谍特种部队里有个菲律宾的特工人员，他曾经伪装成一个小贩在马尼拉整整住了三个年头。他干的工作主要是向日本军官兜售水果，同时把收集来的情报用无线电台发给麦克阿瑟将军。当美国军队在菲律宾登陆的时候，这个“小贩”向美军献出了关于日本军队分布图作为见面礼。接着他划破自己鞋子的后跟，拿出了反间谍部队成员的证件。

这支反间谍特种部队在各种不同时期拥有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森林专家，跳舞乐队的领队，叙利亚地毯商，诗人等等。有一次要进行一项困难的调查。这项调查需要一个具备十三项条件的人，条件中规定得是个黑人，有条北欧的猎狗，会讲法文。反间谍部队提供了这样的人。

有次在澳大利亚北部广阔原野上，反间谍部队送去了一名人类学家，此人专门向当地的部族进行工作，要他们不要杀害盟军的空军人员和日本间谍，如果发现他们就把他们送过来。他知道当地土著居民喜爱发亮的东西，因此他向他们分发了大量用金属制成的向日葵花，上面镌刻着“推选兰敦”字样。他几乎被部落民看作自己人一样。

在大战中，反间谍部队有次查获了在墨尔本以一个意大利坏人藏匿所为活动中心的间谍集团，但只知道其中一个成员是一家旅馆的老板。如果把这个家伙逮捕起来，他的其他同伙就会逃散，然后再在一个新的地方东山再起。因此，弗兰克·科留希中士决定亲自打进这个墨尔本的意大利人的小集团去。但是整整一个星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反间部队的一位上校在邻近侦察时

找到他的中士，穿着邋遢的制服，也不刮脸，酒气熏天地站在一家小酒馆门外。

上校决定整他一下，大声问道：“你是一个战士还是一个酒鬼？”

中士反驳说：“哪个下地狱的想要知道这个哟？”说完摇摇晃晃地走进了小酒馆。

这个军官冲着大门对中士高吼：“我回去找宪兵来把你逮走，你这个逃兵！”

晚上，这位上校家里的电话铃响了，有人小声地在电话中说：“多谢你啊！他们对我原来有点怀疑。你跟我吵这一场架可帮了我的忙了。”科留希终于被接受进这个意大利人的间谍网里，而且过不了多长一段时间，所有的间谍都集拢来了。

1943年在意大利的厄立特里亚，盟军有一个巨大的空军基地，这个基地引起了当地意大利间谍组织的极大注意。它们的总部设在一家旅馆里。这家旅馆的主人是一个意大利籍的美国人，他有证件证明美国陆军没有要他是因为他倾向于法西斯分子。而实际上他却是反间谍部队的一个特工人员，在他旅馆的所有房间里都装上了窃听器。这个间谍网十分有价值，因此反间谍特种部队一直没有去动它。后来由于这批暴民从搞间谍活动——反间谍部队可以限制并引导这种活动——转向破坏活动，这才下手。

有一个反间谍特种部队的一个特工人员，他负责审查返回新近解放的马尼拉的所有难民。当他看见一个胖乎乎的赤脚青年，特工人员立即叫住了他。这青年明显的是个菲律宾人。特工人员向他提出尖锐问题：“说清楚，你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大脚拇趾？你那脚趾头张得那么开，看来是穿过日本军队的那种把大脚趾头分开的胶鞋的吧。”然后在他的衣服里搜出藏着的一把手枪，一颗手榴弹和一些搞破坏用的火柴。同时还搜出一份日军调查表，上面

的空白是要间谍把自己看到美军士兵坦克和卡车的数量和所在地，填写汇报。他还招供他在替阴谋暗杀麦克阿瑟将军的一帮人做侦察工作。

所有反间谍组织都十分重视截获敌人的无线电报信息。过去，许多船只从非洲黄金海岸（即今加纳共和国）装运重要的战略物资锰砂运往美国的时候，常常会被潜伏的纳粹潜水艇击沉。后来英国方面获得了情报的线索。英国监听员侦察到，有人从阿克拉（加纳首都）用无线电台给纳粹发情报。一次“定向”测试——两个监听站都集中注意可疑的无线电报的发报方向——捅出阿克拉的唯一的一个白人牙科医生，此人是一个反英的爱尔兰人。反间谍特种部队立即派出特工人员到这个牙科医生处去检查牙齿，并且谈起美国人正在感到头痛的关于矿砂船的问题。这个特工人员给医生说几个假船名及启航日期。一个钟头之后，监听者听到这家可疑的电台正在把这份假情报发给纳粹。这个牙医生立即就被捕了，并用他的密码发出电报诱使纳粹潜艇集中到某地，然后一举击沉。

在反间谍活动中最妙的一种计策就是把间谍捉住，然后“两用”这个间谍——利用他向敌人送假情报，引诱敌人上当。当然这样做必须说服这个间谍：他自己的生命决定于他在出卖他的前主人方面有多大能耐。发出的无线电报必须有极高技巧，善于把无害的真情报和希望敌人上大当的假情报揉在一起。而这些电报还要由那个“两用”间谍自己发出去，因为对方熟悉他的“指法”，一听就能识破冒牌货。对两用发报员也必须严密监视，防止他偷偷夹进去他们事先拟好的密码警告收报者：“这个东西是假的，他们在逼着我发报呢！”

反间谍特种部队最成功的一次策反是使意大利一名叫阿尔法·波列摩的间谍倒戈。这个人在1944年曾经向他的老主子发

出一份电报，报告说英国第八军正在准备向意大利东海岸进攻。结果，德国人把大量后备部队拉到那里加强防御。几天之后，美国第五军在英国部队的增援下在西海岸地区发起了全面进攻，并最后直捣罗马。

对盟军欧战登陆日的保密工作，可以算是一次考验，也是一次巨大的胜利。直到登陆战在诺曼第爆发的时候为止，纳粹一直不知道这场登陆战将在何时和何地发生。在美国方面，保护这个秘密的主要靠驻在不列颠岛上二千名反间谍特种部队人员的辛勤工作。他们不知疲倦地堵塞一切漏洞，制止了美国士兵和军官在小酒馆和夜总会里的无意中丧失警惕性的谈话。他们甚至截获了盟军秘密进军文件，它们是无意地夹在一封寄给芝加哥一名妇女的信中的。他们还帮着秘密扣押一个木匠，这个木匠只是因为无心闯进了一间墙上挂着绝密的欧洲登陆地图的房间。

在战场上，通过那些“拣破烂”的侦察活动，反间谍组织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个“拣破烂”的词包涵意义甚广，从在日本人的地窖里搜索文件到在北非的德国——意大利停战委员会总部里搜出的档案——这是在被美国和法国炮火轰击、玻璃碎片和崩裂砖头纷飞的情景下，反间谍组织建立的功绩。这一成就对于德国情报机构进行活动的方式、对于我们军队感到非常有用的敌人供应仓库的位置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情报；另外还有那些同德国人合作的法国人名单，对我们也是很有用的。

在阿尔及利亚的奥兰附近，我们获得了一具纳粹的尸体，在他身上藏着一张地图，上面画着法国维希政府^①在北非所有布雷地带的情况。这张图拯救了许多美国人的生命，并加快了我们的部队前进的速度。从此以后反间谍部队的特工人员经常随同进攻部队

^① 指在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法国投降分子在南部维希地方成立的傀儡政府。——译者

在炮火下前进。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反间谍特种部队成员还获得一张所有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的每一支意大利部队驻防地的图。

在太平洋地区，反间谍特种部队的“捣破烂”活动首先是在海军部门干出甜头的。有次反间谍部队同海军一起登上一个岛屿准备进行一次“打了就跑”的袭击。反间谍部队成员巴尼·斯特拉辛搜到了一些文件，文件中透露这个岛只由一支相对来说为数无几的日本军守卫着。麦克阿瑟将军看了这些文件后就说：“把这个岛拿下来！”结果我们用极小代价占领了这座岛屿。

反间谍特种部队的最棘手的任务之一，是要教美国人保守机密。那些单身的军官常常在跳舞时向那些富有同情心的舞伴吐露军事机密，这是十分危险的。当特种部队对某人发生怀疑时，就派遣陆军妇女队成员或一些护士去同他约会。如果他把秘密乱说一气，那就要把他调到某些不太重要的岗位上去。反间谍部队还经常帮助那些邮政检查官发现并删除掉一些并非有心造成危险的段落，在那里面士兵们常用私人暗号来告诉妻子或恋人他所驻在的地点。

用来象征军队反情报部队里那些献身的无名英雄们的标志，可能不止一个，但颇为恰当的是金色斯芬克斯——取其无声无息之意。

圣·维多利监狱里的偶像

英德罗·蒙塔尼里(翻译、改编者欧文·莱斯纳)

我的故事开始于1944年3月的一天。那一天，巴杜格里渥元帅的密友和英国阿历山大将军的技术顾问迪拉·洛瓦利将军阁下，被关进了圣·维多利监狱，关押在正对着我的那间牢房。当

时，意大利的地下抵抗组织，正企图破坏德国人源源不断运往南方前线的一切储备。我得悉这位将军是在意大利北部被德国人抓住的。他是由盟军的潜水艇从海上送到岸边，以便指挥当地游击队的活动的。他那种贵族气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弗朗兹——就是那个残酷的德国监狱看守官，站在他面前时也是立正姿势。

在意大利的所有德国人管辖的那种“忏悔”工厂（指监狱）中，圣·维多利是最坏的一所。那些被俘虏的意大利抵抗战士，他们经受住初步“例行”的审讯后，就被带到这里来。盖世太保的头子谬勒和他挑选出来的一伙党卫军（这些人以惯用酷刑折磨而遗臭万年于史册），经常用各种办法从那些即使是最坚强的伙计们的嘴巴里压榨出他们所希望得到的情报。

在我被捕后的六个月里，我已经被“审问”了好几次，感到精疲力竭和失却了勇气。有时我真怀疑这一切我还能坚持多久。然而，有一天使我大为惊讶，赛拉索，一个意大利守卫人员跑来打开我的牢房，并告诉我，迪拉·洛瓦利将军希望同我见面。

这位将军的牢房的门是不上锁的——经常如此。再有，他有一张吊床，而我们所有的犯人却都睡在光光的木板上。他衣饰整齐，右眼上戴着单片眼镜，见了我非常有礼貌地问：“是蒙塔尼里上尉吗？在我登陆之前就知道你在这里了。英王政府十分关心你的命运。我们深信，即使你在德国的执刑队前倒下来了，你也完成了你的任务，作为一名军官的最基本的任务。请随便一些。”直到那时，我才发觉自己是立正得直挺挺的，后跟紧靠一起，大拇指紧贴着裤线。

他又问我：“我们当军官的生命是短暂的，难道不是这样吗？一个军官可以说是死亡女神的一位新郎。”他一边说着一边用块白的手绢擦着他的眼镜片，这时我感到好象人的名字的确能反映一

个人的人品。迪拉·洛瓦利意思是“属于橡树的”，现在面前这个人的确是块坚强的栋梁之材。

他接着说：“他们已经给我下了判决了，你怎么样？”

“还没判决，阁下，”我答道，几乎带着一种歉意。

他说：“他们要判的。德国人要你招供时是很残酷的。但是他们对于那些不肯屈服的人还是顶看得起的。你没有招。做得好！这意味着你将得到光荣的待遇，让敌人的子弹穿过你的胸膛而不是有人在你背后把你打死。我希望你继续保持住沉默。不过你得要忍受折磨。我不是说你的精神力量有问题，而是说人的身体的忍受力量总是有限度的。我建议你只向他们招供一个名字：就是我的名字，告诉他们你所干的一切都是根据我的命令行事的……顺便问一下，他们控告你的罪状有哪些？”

我把一切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将军阁下犹如一个神父倾听忏悔似的听着我所说的一切。他不时点头表示赞同。当我讲完时，他说：“你的案子同我一样清楚。我们两个都是由于执行上级命令而遭逮捕的。现在我们剩下来的责任就是要死在荣誉战场之上。要死得体的应该是容易做到的。”

当赛拉索把我送回牢房之后，我向他恳求下一天给我找个理发的。那天晚上，我把裤子叠整齐并且把它在窗格子搞出裤线后，我才大手大脚舒舒展展地躺在床板上睡着了。

在以后的几天里，我看见许多战俘一个一个到将军牢房里去。当他们走出来时，看来都是精神抖擞，不再显出颓丧的样子。此后，在我们这个同外界隔离的部分，吵闹声和混乱大大减少了。215号那位战俘过去成天为他的妻子和女儿哭泣，悲号声充塞了整个空间，现在也不再哭了，而且当被提出审问时也变得沉着了。赛拉索告诉我，自从将军同几乎所有的人谈过话后，人人向他要求找个理发的，而且要梳子、肥皂什么的。监狱看守人差不多每天要给人

刮胡子。甚至于那个谬勒，也不得不（尽管有点勉强）赞扬秩序和纪律有了改进。

最了不起的是：这个“忏悔”工厂不再出产坦白交待或忏悔了。人们个个都变成顽固不化的沉默者。迪拉·洛瓦利以他极大的勇气给予人们以忍耐的力量。他以自己被捕以来的经验给予人们无价之宝似的忠告。他向人们警告：“最危险的时刻是饭后的两三个小时内，当你只是渴望着消遣解闷的时候，就会使你招供出来”。有时他提醒你说：“别老是盯着墙瞅，你不时地把眼睛闭上，墙壁就会失去那种似乎把你闷死了的威力。”他还申斥不修边幅的人说：“整洁能增强士气。”而且他不断地提醒人们要意识到自己对意大利的责任。

不久之后，监狱里开始流传着一个谣言，说将军是一名反间谍分子，他是德国人的密探。那些意大利守卫人员，即使有些是从墨索里尼旧政权那儿弄来的渣滓，也感到他们能忍受的羞耻是有限度的。他们之间一致同意要经常监视这位将军：如果他确是德国人的密探，他们就决定把他勒死。

第二天早上，迪拉·洛瓦利接见 203 号战俘。他是一名少校，人们猜测他比别人掌握更多的情报，但是却从来一句也不吭。赛拉索在牢门前来回走着，别的意大利守卫人员也在附近监视。他们听见将军对那个少校说：“你将要经受极度的酷刑，但是你决不能供出一个字。你的脑子什么也不要想，要强迫你自己相信，你什么也不知道。如果你老是想着你严格保守着的秘密，那末有可能把秘密带到了你的嘴边。”那个少校听着，脸色苍白，当将军对他说着曾经也对我说过的那番话时：“如果事情逼得你非说不可，就告诉他们，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按我的命令干的。”

那天下午，赛拉索带着满心的歉意把几朵玫瑰花送给了将军阁下，这是意大利守卫人员送给他的礼物。将军彬彬有礼地收下

了玫瑰花，他甚至连一丁点儿也没有意识到，他曾经遭到过人们的不信任。

有天早晨，德国人跑来找普上校和艾夫上校，要把他们带到院子里去。在走出牢房之前，德国人允许实现他们最后的愿望——向将军告别。我看见他们站在他的牢房前，毕恭毕敬地立正。但我未能听清楚将军对他们说了些什么，只看见两位军官微笑着。他握着他们的手，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这样的动作。后来，就好象突然意识到德国人在场，他立即振作起精神，举起他的手向他们敬礼。两位军官还了礼，然后转过脚跟向死亡走去。后来听说，当他们面对执刑队时，两个人都高呼：“国王万岁！”

就在当天下午我又被提去审问了。谬勒这个监狱长警告我，我的命运就看我对这次审问的结果如何而定。如果我仍然坚持沉默，那么……。我用瞪大的眼睛死死盯着他，但是我什么也听不见，也看不见他。我看到的倒是普上校和艾夫上校的苍白的脸以及将军阁下微笑的面容。在德国人讯问两个钟头而一无所获时，审讯告一段落。这次我没有受刑，不过即使上刑，我也是能挺住的。在走向牢房时，我要求在将军阁下的门前停一下。

当我在他面前立正时，他把正在念着的书放在一边，用锐利的目光注视着我，未等我开口他说：“是的，这就是我所希望你做的。你做的真是恰如其份。”他又提高声调说“蒙塔尼里上尉，我无法用言语把要说的话全说出来。让这个正直的意大利守卫人员来当个见证人，听着我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说的这些话。让他听到每一个字。我是非常满足的，上尉，我真的感到欣慰！太妙了。”

那天晚上我真的感到在世界上的孤独。但是我的可爱的祖国却在我的心中显得更加亲近，更加可爱，比任何时候更觉得真切。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将军，直到意大利解放我才知道他的结局。这事还是一个“福索利”里的幸存者告诉我的。



福索利是纳粹的一座臭名远扬的杀人集中营，那里杀人的方式是复杂而多种多样。当迪拉·洛瓦利将军同其他成百名俘虏一起用军用列车转移到那里时，他仍然保持着他的尊严。在整个旅行中，他坐在一堆背包上，这是别人收集拢来给他当靠垫的。当盖世太保的一个军官进来巡视时，他拒绝站起来，结果军官打了他两个耳光并咆哮着说：“我认得你，你这猪猡，波托尼！”他仍然镇定自若。为什么他要向那个瞎了眼的德国人去解释：“我的名字不叫波托尼而叫迪拉·洛瓦利呢？”有什么必要他要去解释：他是一个军队的将军，是巴杜格里元帅的密友和阿历山大将军的技术顾问呢？他沉着地拿起单片眼镜并重新把它戴在自己的鼻梁上。这个德国军官诅咒着走开了。

在福索利，将军不能再享有象在圣·维多利时那样允许他享有的特权了。他同其他人住在一起，并象所有人一样必须去劳动。那些追随他的俘虏要代他去干那些低贱的杂务劳动。但是他从来不逃避他应完成的任务。这些对于象他那样年龄已不轻的人来说，有时是相当困难的。一到晚上，他就提醒他的同志们要记住，他们不是囚犯，而是军官。面对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和听着他的声音，人们不由自主地站得更直了。

福索利集中营里的大屠杀发生在1944年6月22日。这可能是对盟军向意大利热那亚市的胜利进军的一种报复行为。但不管什么理由，反正从米兰发来了命令，从四百名犯人中圈出了六十五个人的名字。当一名叫梯杜的中尉宣读名单时，那些被判决的人都要从行列中往前站立出来。当他念到波托尼名字时，没有人站出来。这位中尉眼睛瞅着迪拉·洛瓦利又吼叫：“波托尼”，但将军阁下不动。

是不是梯杜中尉要对一名被判处死刑的人显示宽容？谁也说清。他忽然笑着说：“好吧！好吧！迪拉·洛瓦利，你愿这么叫

也可以。”所有的人都屏息以待地看着将军。将军从口袋里取出他的单片眼镜，用明显的有力的手把眼镜戴在他右边眼睛上，然后冷静地说：“迪拉·洛瓦利将军，对不起，”从容地迈进了等候着判决的人的行列里。

六十五人全被扣上了手铐，并被带领着走向围墙边。所有的人都被蒙住了眼睛，只有将军阁下除外，他坚定地拒绝蒙住眼睛，德国人倒也没有为难他。当四挺机枪把子弹推上膛，将军阁下向前站定，显出自豪和坚定，用高昂的声音说：“先生们，军官们，当我们面临最后牺牲时，让我们的思念忠诚地飞向我们亲爱的祖国。国王万岁！”

梯杜叫喊：“开枪！”四挺机枪哒哒地响了起来。

这个我从后来才听到的有关迪拉·洛瓦利将军的真实故事，是一个充满英雄主义的故事，也是一个几乎难于置信的弄假成真的故事。这个圣·维多利监狱崇拜的偶像并不是一位将军。巴杜格里和阿历山大都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而他的名字也不叫迪拉·洛瓦利。

在监狱里长年的记录上，他只是一个叫波托尼的人，热那亚城出生的居民，一个小偷和骗子。德国人因为他的一些细小罪行而把他逮捕，在审问过程中却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天生的演员。他们相信他那种不讲道德的观点加上他的演戏才能，将会使他成为一个杰出的特工人员，从战俘口中套出情报。

波托尼准备和德国人作成一笔交易。他可以做别人要他做的事，报酬是他在监狱里获得特殊待遇，并且可以早日释放。然后德国人就虚构了这个迪拉·洛瓦利将军的故事，并指导他如何扮演将军这个角色，以便骗取信任，引诱人们上钩投向纳粹。当他被送到圣·维多利监狱时，他要求，并获准，可以有一段时间让他赢得人们对他的信任，稍后再把这些人变成为牺牲品。但是，这个波托

尼却比德国人所了解到的还要狡猾，他决心要愚弄的是德国人而不是别人。

这以后就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老扮演着迪拉·洛瓦利将军这个角色，波托尼变成了迪拉·洛瓦利。于是他从事了一项寻常人所不可能担负的巨任——即要使圣·维多利监狱里的人保证不向德国人屈膝招供，并且使同狱的人坚强地面对自己的命运。由于在监牢里他的威严的存在，他的一丝不苟的装束，他的伟大的勇气和忠诚，给禁闭在那里的可怜的人们带来了一种新的尊严和个人价值意义。

但是最后，他知道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监狱官谬勒对他的一再延宕变得越来越不耐烦。为什么老是没有人来坦白交待罪行？当“迪拉·洛瓦利”最后一天在牢房里对我说话时，他要求那个守卫人员来作证，因为他知道，事情已经完了。他要通过第三者让外面世界的人们知道关于他的故事。也只有这个办法才可能让意大利了解他是保持着他对祖国的忠诚的。

1945年6月22日是福索利集中营里大屠杀的一周年的日子。我站在米兰大教堂前，注视着米兰的大主教献祭福索利的英雄们的灵柩。那位红衣主教知道那个标明迪拉·洛瓦利名字的棺材里躺着的是谁。同时他也知道，没有人能比睡在这口棺材里的人——过去的小偷、惯犯波托尼，更有资格来获得将军的称号了。

得自深海的密码本

根据美国海军少将坦尼尔·伽利列所

著：《准备战斗！》一书缩写而成

1944年，作为大西洋某个特遣舰队的指挥员，我曾经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壮观的一次英雄业绩——捕捉一艘德国潜水

艇。自从1815年以来，美国的海军还未曾在公海上登上过或者活捉过一艘敌人的军舰。事实上，由于这一行动史无前例，因此，当我们向上级送去头几个报告说明我们的成就时，华盛顿是报之以怀疑心情的。特别当华盛顿听说我们在把战利品用军舰拉回来的时候，更是如此。

我们那艘军舰的名字叫“瓜德尔运河”号，是一艘不太漂亮的一万一千吨的小型航空母舰，它的浑号叫“肯干”（英文字意思是“能够做”的）。我们的船桥上涂着四个纳粹的卐字。其中最后一个是我们骄傲的象征，也是我们迄今为止最大的胜利——击沉了一艘潜水艇U—515号。

仔细回顾同U—515的战斗中，我们注意到有一个情况：潜水艇没有反击，它没有把自己炸沉。当艇上的舰长和官兵陷于困境时，他们只有一个要求：自己活命。于是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从深水搞上海面的潜水艇来一个登艇活抓呢？为什么不可以使“登上敌船！”的叫嚷之声——在现代海军中是从未听到过的——再次响亮起来？

当一艘被围困的潜水艇露出海面时，有时它会腾起战斗，有时舱门砰地一声打开，然后一些黑色的小小的人影一个个跳离潜艇。但是你不可能客客气气地站在那里等待敌人先提出要谈判从而导致投降。这时你的驱逐舰全速冲刺，发狂似地蜿蜒盘旋，发出最大的火力攻击。那时，你的大群飞机猛扑下来，机枪哒哒地进行扫射。深水炸弹、火箭、穿甲炮弹和水雷从各个方向射向水面上的潜艇，也许这艘潜水艇升上水面是要求投降的，但是你可担当不起贸然下这样结论的责任，因为由于判断错误而受的惩罚是太严重了。

一艘受了伤的潜水艇如果在距离你五英里之内是一头极端危险的野兽。它的水雷——由那些准备弃艇逃跑的水兵们放射出去的，可以使任何一艘好船变成一团烈火。所以我们清楚地知道：想

要登上一艘潜水艇并且把它“活捉”，那可是件危险的事。但是，如果能够弄到艇上的密码本，即使冒一点大风险也还是值得的。到那时，华盛顿的海军交通处就可以监视纳粹潜水艇发报的频率，并能破译它们的行动命令。这正象在一场足球赛中，你把你的头伸进了对方的战术讨论会里一样。这样一来，在柏林的德国海军总部的无线电发报员一下子就成为美国的情报人员了！

在下一出发前的会议上，我提出了我的计划要领。华盛顿的专家们对此抱怀疑态度。不过，我们大家最后都同意在潜水艇升上水面之后，不需要再发射彻底摧毁潜艇的炮弹，因为纳粹自己会对它注销掉的。我们是计划用小规模的火力迫使敌方官兵离开潜水艇，然后由我们的人登上潜艇并保护好潜艇。

6月4日（星期日）的早晨，我们正航行在离法属西非勃朗可角一百英里的地方，突然无线电扩音器里广播说：“美国舰只‘查特兰’向特遣舰队指挥员说话，我可能发现声波接触。”凡是发现声波接触，必须十分慎重对待。因此，“瓜德尔运河”号开足马力向“查特兰”号驶去，这时在近旁的两艘驱逐舰也改变航向去进行援助。一艘航空母舰在这种发现声波的场合，就象一个老太婆在酒吧间的吵嚷斗殴中一样“无所作为”。

这时，“查特兰”号舰长正在报告：“声波断定为潜艇，正准备攻击”。我们两架野猫式战斗机一字行飞到了“查特兰”号上空，在舰艇前头不停地打转直到他们发现一条长长的深色的水痕，全部潜在水下疾行。然后，“查特兰”号根据从空中发来的指示航向，掉过头并发出最厉害的深水炸弹。当深水炸弹沉下去的时候，一个野猫式战斗机飞行员埃沙因·坎特从无线电里传来了喊声：“打中油罐了，潜水艇正在浮向水面。”

在驱逐舰发出原来的报告后十二分半钟，凶恶的黑色潜艇艇身鼓起来映入人们的眼帘。就在潜水艇再度露出水面时，“查特兰”

号、“匹尔斯贝雷”号和“琼克斯”号按照原定计划，用它们的小口径高射炮开火了。在空中野猫式战斗机猛扎下来，用50毫米口径机枪扫射，打出了一阵阵发烫的钢弹横扫潜水艇甲板。所有这些炮火都不会对潜水艇造成大的损害——就其密封外壳而言。

事后我们才知道，当深水炸弹爆炸时，纳粹水兵正坐在桌子旁吃他们的礼拜天午餐，结果轰的一声，把这些人震倒在地，跌在瓷盆和食物堆里。纳粹官兵们以为潜水艇给炸沉了，都纷纷跑窜到太平门舱盖门口准备逃命。当时惊慌的艇长立即命令潜艇浮出海面，预备仓皇逃跑放弃潜艇。我们终于把他们全部诱出了水面，而这些人后来只好站在“查特兰”号的甲板上呆呆地看着随后发生的一切。

当潜水艇浮出海面时，我想“这该是我们插手的时候了。”我拿起了麦克风，把古代人使用的海上术语第一次在现代化扩音机上叫唤开来：“登上敌船，全体出击！”我们的计划实现得十分完美。德国人跑出潜艇来挺快，甚至连发动机也未关上。潜艇在无人操纵下还扑通扑通在水里连连打转按每小时八海里速度前进。我们的捕鲸式救生艇纷纷下水，“匹尔斯贝雷”号的台维特上尉是第一个跳上潜水艇甲板的人。

台维特上尉同他的小队人马都以为打开舱盖门时，一定会射来一梭子机枪子弹作为“欢迎”的。他们也知道德国人的潜水艇里是装有十四个定时炸弹装置的，可他们看不懂德国定时炸弹钟表上的数字。他们不顾这一切，还是下到了潜艇指挥塔里去，而且准备同纳粹干一仗。结果是发现整个的潜水艇都归属于他们。也就是说：如果它不爆炸掉的话，则全归他们所有（台维特上尉后来被授予与荣誉勋章，这样的勋章在大西洋战役中仅有两枚。他的助手们被奖与海军十字章）。

在主要的控制室里，我们的士兵们发现从一个与海相通的连



接口上有一股六英寸宽的水流源源不断流进艇里，几分钟之后会使潜艇沉没。人们找到了连接口上的盖子，立即把它关上堵住了流进的水。

这时“瓜德尔运河”号发来了信号：“立即把机器关掉，我们将把它拖在船的后面”。机器马上停了下来，潜水艇开始沉入水中，尾部首先浸到水里。这时我们立即靠近它并把拖船的钢缆扔给潜艇上的伙伴们。那个潜水艇的丑陋的头部连同它那四个装有鱼雷随时可放的发射管几乎要碰着我们舰只的边边。我用热切的声调祈祷：“上帝啊！在潜水艇里可有着我们一群喜欢寻根究底的小伙子们，千万别让他们瞎摆弄发射水雷的开关！”当我们拖着战利品开航的时候，潜水艇的尾部又飘起来了。

登上潜艇的那队人马动作敏捷地切断了炸弹的电门，搜索鱼雷，并把所有秘密文件都递到甲板上来，为的是万一丧失潜艇还有凭证可查。

虽然我们的这只“迷途牲口”拴的绝对可靠，潜艇毕竟没有受过笼头缰绳的训练。它不是老老实实跟在我们船后面走，而是不断地要向右边打转。我怀疑是不是它的舵给什么缠住了。正在此时，那些在潜艇上的士兵报告发现了新的鱼雷，使我决定亲自到潜水艇去看一看。我总想有借口上潜艇看看：作为自封的“负责处理鱼雷官”是一个合法的借口。我发现这个可疑的鱼雷紧挨着潜艇内存放鱼雷室后面那个密封的门。如果不炸掉这个鱼雷，门就无法打开。我们必须设法进那间屋去操纵手控操舵装置。根据正规操作规程，处理未爆炸炸弹，当我在可疑的机械上操作时，所有的人全应撤离潜艇。但是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而且在干这样一种危险事情时，有人陪伴你，心里会踏实得多。因此，我就跟几个爱站在一旁乱出主意的士兵一起留下来。我小心翼翼地把撞针卸了下来。当我们把那扇门打开的时候，所有人的脸上出现了欣慰的

笑容。

当我从太平门舱盖爬出去时，我看到那些苦干的油漆匠已经忙过一番，他们在指挥室上用红色字母写上我们潜艇的新名字“肯干小字”号。后来我们很快就把这个名字再缩短，索性大家都叫它“小字”号了。

回到了“瓜德尔运河”号上时，我们在桅杆上挂起了传统方式的扫把（这在海军的信号里意味着“已一扫干净”），然后我们迎风疾航开向百慕大。

华盛顿把我们胜利的消息列为特大号“绝密”，下令不准向外透露一点风声。在我向部下谈安全保密时，着重向他们指出，如果我们能把活捉潜艇的秘密一直保守下去，这可能会成为二次大战的一个转折点。我们获得了五枚音响鱼雷^①，这是使我们军舰伤透脑筋的玩意儿，我们的技术人员很快就会知道如何制服它们。但是比这个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潜艇里弄到了纳粹的密码本，因此决不能使这次捕捉敌人潜水艇的消息让德国知道，因为，德国人一旦知道了就会立即改换他们的密码。

于是我又对水兵们说：“弄到了纪念品，而又不能拿出来在面前显显眼或者吹嘘一番，这些纪念品就没啥意义了。因此，凡是手里有纪念品的请你们明天都交回来，并请不要再提任何问题。”

第二天，值勤官应接不暇地收到了你从未见过的莫名其妙的各式各样的破烂。也不知这些小伙子在关掉阀门，拉掉定时炸弹导线的同时还有暇收集到那些堆积如山的東西。我知道其中大多数入宁可交出自已的右手也不愿交出弄到的双筒望远镜、照相机和军官帽等等。

我们于6月19日抵达百慕大，随后我们特遣舰队获得了渴望

① 一种能跟踪声音的鱼雷。——译者

已久的总统荣誉单位奖状。我对那些小伙子们坚持保守这一巨大秘密的行为感到十分自豪。特别是当我们回到美国时，正是我们对一生中最得意的一段经历记忆犹新之时。事实上，这个秘密一直保得很好，甚至连那些写二次大战历史的书里对此也一字未提。

当那艘 U-505 号潜艇能够监听敌人潜艇无线电频率，念起它们发出的密码电报信息就象它们是用平易的英语所写一样。我们截获了他们每艘参加战斗的潜艇都必带的航海图、出版物、指令和密码本。虽然纳粹定期要变换它们的密码，但是变换的诀窍在密码本上也有说明。从海军情报工作的观点来看，这可以说是战争中最大的一笔意外收获。

“大裤管”

美国退休准将威廉·衣·布鲁尔

那是 1944 年 6 月的一天，清晨 2 点钟，突然我们牢房里电灯通亮。一下子工夫，监狱里到处站着日本的军官和士兵。这是一次突然袭击性的检查，它使你没有机会来隐藏、销毁或者处理掉任何可以被当作是违禁品或犯罪的东西。当我们全都目瞪口呆地立正着的时候，日本人仔细地搜查我们的所有物，并拿走他们发现的任何写了东西的纸张、材料和书本。

我是完全惊呆了。自从我被捕的两年来，我把一些发生过的事情、我的思想、感情统统乱记乱涂地写在好几本笔记本上。我甚至还把我写的诗集成书稿，表面上看来内容似乎无害，但反映了监狱生活的惨痛经验。写作简直使我着了迷，引起我一种难以遏制的兴趣。它令我忘掉一切，使我的手不得闲着。在处于落魄和悲惨境地中，它是能使我保持头脑清醒的唯一方法。

但是这也是一种会导致严重后果的自我消遣。当时，与我同

狱的一位乔纳森·姆·温拉脱将军曾经警告过我，不要冒险把什么事情都乱涂在纸上。我们的看守人对于凡是他们说的或干的有使他们感到不乐意的任何事情，他们都非常敏感。而他们的不乐意常表现为粗暴的报复。很自然，我所写下来的那些可悲的东西，有许多并非是对日本人的溢美之词。

因此，当我看到我的那些笔记本被日本人抄走的时候，我知道，我非得倒霉不行。从那时起，只要我看到那个集中营的指挥者或者那个中尉，我们称之为“大裤管”的那个人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悚悚发抖。

“大裤管”是我们所诅咒的铁丝网监狱生涯一切坏事的总代表，诸如糟糕的食物、肮脏、各种惩罚——首先是我们被俘的耻辱。他是一个块头高大的人，穿的裤子象个大口袋似地垂到了鞋面上，走起路来象拖地似的。他英语说得相当好。我们疑心他能听懂我们对最常用称呼。

在日本人抄走我们的笔记书本后不久就开始传讯犯人了。他们井井有条地把有问题的人按名字字母排列起来，先把姓名A字打头的放在头里，接着就是B字打头的。有一个英国陆军准将，因为他在纸上写了些使看守人所不喜欢的东西，结果他被单独禁闭了三天，只给面包和水，没有任何副食。一个美国上校则被痛打了一顿，而且要他以后每天前去挨打。轮到传讯我的期限已经不远。

为了松弛一下我那忧心忡忡的日子，我尽可能地长时间泡在那豆腐干大小的花园里，他们允许我在那里耕耕种种。那个花园也就二十英尺长，十英尺宽，是我唯一的消遣的地方，也是我值得自豪的源泉。我的十二颗蕃茄秧子已长得有八英尺高了，枝上结着累累的果实。那些白萝卜、洋白菜、甘蓝草如果拿回美国去在县里展览会上展出，那准能得奖。

有一天中午，正当我在蕃茄枝下锄草的时候，我听到后面有一

种走路拖地的声音过来了。一个非常清脆的声音对着我说：你的名字就叫布鲁尔吗？这是“大裤管”！我立即意识到我受惩罚的时候到了。我放下锄头，两手直挺挺垂着，按日本人认可的方式低头鞠躬。“大裤管”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脸色十分严肃。

我回答说：“是，我是布鲁尔。”

他说：“这儿是你的那些本子，我已念过了，”他边说边从信封里掏出一本笔记本，神情仍然十分严肃地问我：“你写诗？”

这里显然藏着一种新的陷阱机关，我小心翼翼地回答：“对，我尝试着写写诗。”

他问我：“你写诗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吗？”

我尽量用随便的口气回答：“对，我已经断断续续从事这件事差不多大半辈子了。”

他打开了一本笔记本，把它凑到我的面前说：“你写了一些非常美丽的东西，你是不是美国的一个大诗人？”

我竭力从他的话音里寻找那种挖苦的语气，从他的脸上看是否有奚落别人的假笑。但是他的脸色是全然严肃的。我向他保证说：“我不是诗人，我是个军人。我写诗只是闹着玩。你真的念过我的几首诗吗？”

“大裤管”回答说：“是的，是的，我念了好几遍。”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一开口准会说错话。可是我也控制不住每一个想做诗人必然会向念过自己诗的人提出的问题：“你，你对我其中那几首诗比较喜欢呢？”

“大裤管”说：“是啊！有几首诗我非常喜爱。我不会评论诗，你知道，我只是非常喜欢。”

到这个时候，我才从他的肩头窥视我自己的笔记本，忘了我应该脚跟并拢地立正：“你喜欢那一首？”

“大裤管”的厉害面孔终于露出了微笑，他说：“我最最喜欢的

那一首，就是你描写你妻子的那一首。而这里一首是描绘你的家庭的。这一首我还……英文是怎么说的，背下来了？”

他把本子打开着，那是一首短诗，一共只有三十八个字，他看也不看原文就背诵起来了。当他用他那特殊的英语音调念起来的时候，并没有使原诗的感情减损。但是他背诵了几行之后，就畏畏缩缩地把本子交给我说：“我那点英文念诗不行，请你念给我听听。”

我对他的戒心完全消除。现在的情况是：一个诗人和一个欣赏诗人作品的听众。从来很少有象我那样地激动：当我穿着色彩单调的囚衣，站立在蕃茄和洋白菜丛中念着我自己的诗句：

暮色降临，寂静唤起晚祷，
美丽的身影显现，徘徊在我坐椅近旁。
柔情的双手紧缠住我的手，双唇轻吻我的脸庞，
让两个灵魂拥抱，忘掉空间时间的差距。

“大裤管”大为欣赏地说：“真好！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我的家了，我喜欢你这一首。”

“你喜欢诗！”我仍有点迷惑地问。

“噢，是的，是的，我们日本人爱诗。天皇写诗，伟大的日本人也写诗。”

我既已深知内情，就不再在乎他来找我可能是出于可怕的原由了。我说：“是啊！那真是太有意思了，你是不是有时也自己写几首？”

“大裤管”的脸涨红了象个羞涩的学童，他迟疑地说：“是啊！我也试着写来着。只是试写，但写不好。我写得象你写的那么好，我没写出好诗。”

在消除了所有担心害怕的感觉后，我终于提出了：“你是否可以让我看看你写的诗？”

“你要念我的诗？”他带着惊奇而又谦卑的喜悦问我，然后接着说：“写得不好——不好。不过，你也许可以把它译成很好的英语吧？”

他给了我一张纸，上面印有几行用打字机打成的字，我高声地朗读起来：

秋空明月高挂，
一片银雪倾泻。
奋斗不已身困倦，
心神恬淡喜静安。

当我念到最后一句时，声音有点变了。我好像是噎住了似的：“怎么，大裤……”我立即住了口。

他笑起来说：“大裤管，是的，我早知道了。行啊！行啊！大裤管，对，”他耸耸肩膀，朝下看看他的裤子，然后他看着我问道：“你喜欢我的诗吗？”

我说：“写得很美，别再改它。”

“谢谢你，谢谢你。”他小心地把纸叠起来，把它放回自己的口袋里，然后他把那个装着我乱涂乱记的本子的大信口袋给了我，说：“你的那些本子——将军！”

当他称呼我的职衔的时候，他作出本能的动作似乎要立正敬礼。然后，他转过身来要走开，但又停下回过来说：“你蔬菜种得不坏，我们日本人喜欢美丽的花园，美丽的诗。你跟我握握手吗？”

我表示愿意。而且真的握了手。

若隐若现的部队

勃兰克·克拉克

1944年6月1日晚上，英国广播公司9点的新闻广播之后，紧

接着一个广播员用干巴巴的语调朗读了摘自鲍尔·范尔拉尼(Paul Verlaine)的一行诗：“秋日的琴音抒发出阵阵呜咽。”到了6月5日，又广播了另一行诗句：“绵绵柔情揉碎了我那个心。”

紧接着是使用密码的暗语，它对绝大多数的听众，包括那些德国人来说，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对于二十多万武装起来的法国人来说，却是他们长久等待着的一种发起行动的秘密号召。就在那天晚上，还没有一个盟军兵士登上诺曼第的时候，在整个法国，桥梁倒塌了；水坝爆炸了；钢轨脱枕，火车出轨；大树倒下堵塞了公路；油库起了大火，电话线被割断拖落在地上。

第二天，是盟军在欧洲登陆发动日，即所谓D日，德国军队的调动和后勤供应行动之缓慢简直象人的步行速度那样。因而德军派往诺曼第的部队平均延缓四十八小时，对英美军说是极其宝贵的时间。当盟军在诺曼第突破之后，法国游击队经常向巴顿将军报告每一个德国纵队的确切的驻防阵地，保护着巴顿将军的侧翼，帮助巴顿将军完成了战争史上罕见的快速纵深挺进。

由英军、美军和法国地下组织三者联合起来，引爆了法国抵抗运动的火药库，这在第二次大战中还是一件新事物。所有活动都是由艾森豪威尔将军^①建立的一个联合司令部指挥的。

早在1941年，英国曾经派遣了一个秘密行动小组去法国，同当时在法国全国自发组织起来的各地破坏小组进行联系。这些地方小组终于被说服放弃搞那些零星分散的暴力抵抗活动，因为它们只能带来德国人报复性的屠杀。到了1944年，盟军登陆欧洲的计划已经拟定之后，在法国的一支经验丰富的英国战斗人员组织叫做“特别空中服务队”的被授予统一指挥权，同美国“战略情报局”所

^①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1890—1969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任欧洲战场美军司令。1943年12月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1944年升为美国五星上将。德国战败后任美驻德占领军司令。1953—1960年任美国总统。——译者

属地下抵抗分子以及其他一些抵抗小组进行合作。法国地下抵抗组织被引导着去攻击德国人的供应线，后来就转而帮助搞在法国领土上清除敌人的工作。为了支援这些抵抗组织，把它尽快地组织起来，盟军总部在敌占区空投了一批特别小组的战士。有一种类型的小组（叫作介得堡士或介士）是由三个军官或三个军士组成，其中一个会操作电台，还带上其他几个人员。这些小组包括了英国、美国 and 法国三个国籍的士兵。

法国的地下抵抗组织搞的三个为盟军登陆欧洲发动日作准备的计划，称之为“绿色”、“紫罗兰”和“蓝色”计划。这些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切断通讯联系、破坏铁路和炸毁发电厂。

要实现这一切，就必须在盖世太保的眼皮底下同数以千计的法国国内部队进行联系，并对他们进行培训，把他们武装起来。为了要完成“绿色”计划，那就要召开一个百万铁路工人的代表会议。要完成“紫罗兰”计划，那就得教会各村居民在那儿埋设地雷和炸药。

每一次空投下的成员平均说来总要带上可以够三到四个月使用的武器弹药，如果他运气好的话，他将保存一些情报档案，而这种情报有时会被敌人发现。他由于形势所迫一定得按几个心腹之人，但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是个间谍。如果他是英国或美国人的话，他还得经常警惕是否有疏忽失误，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在吃饭的时候，他必须记得按照法国方式，把餐巾一端塞在领子里。他还得小心别上商店去买什么刮须膏或牙膏，因为谁都知道，这些东西在法国商店里已经有两年不见了。

德国盖世太保常常会设下一些陷阱，以使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暴露自己。例如在某个城市里很专横地规定不准两人并排骑自行车，而在另一个城市则规定星期二或星期五中午酒吧间不准卖酒，如果有谁来要红酒，酒吧的侍者必须及时向当局报告。但是尽

管设了那么多陷阱，有些胆大无畏的抵抗战士还是冲破了这些障碍而得到出色的成功。他们在一些地方开设了香烟店、书店或旧货家具店。那里有各种各样的“顾客”来做买卖，并没有引起人们有种种的怀疑。

如果给敌人发现，想逃跑是颇不容易的。有个战士乔治，是个美国特工人员，有次在同盖世太保枪战中受了伤。他被盖世太保戴上了手铐，并被扔进汽车后座而失去了知觉。当他醒过来时，他掏出了藏在袜统里的手枪，从后面给了每个德国人一枪，法国人用锉子锉断了镣铐把他救了出来，后来他又在法国其他地方继续进行战斗。

另一个战士米歇尔是个戴高乐派的工人，有次他正在一家旅馆房间里。当盖世太保突然前来袭击时，他立即奔向最高顶层，但那里无路可以通到房顶。于是他冲进一间房间，看见一个女侍正在整理床单。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向她解释这是一件有关生死的事，并且对女侍说：“快，跟我一起睡到床上去。”可是女侍抗议说：“不。”他就说：“别傻了，我心里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在琢磨着呢！”当盖世太保人员猛推门进来开亮电灯时，他俩睡在床上，并装出一副对闯进来的陌生人顶生气的样子。盖世太保头子笑了起来，说：“正在享受良宵！”说罢，关上房门走了。

这些秘密地下组织取得胜利的必不可少的人员是无线电报务员，他们同伦敦或阿尔及尔保持着规定的通讯联系，并且提出需要武器和炸药的数量以及指示新来战士的降落地点。有一位无线电报务员是一位美国姑娘，她是法国抵抗运动中一位无名英雄。那些从巴黎发出无线电的报务员经常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因为德国人用三十六架探测器从各个方位不断地搜寻电波，这种搜寻十分有效。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当发报员在空中发出电讯二十分钟之后，德国的巡逻车就开到了他的门口。有许多次，报务员只是在德

国人来到的前几秒钟才不得不把发报机扔下而从后窗口逃出去。

在盟军登陆欧洲发动日之前，这些神出鬼没的部队战果是巨大的，他们在四个月内摧毁或破坏了七百五十辆机车。这就充分说明加强这方面的破坏性可以严重影响德国人在关键时刻的后勤供应。1944年3月，通过法国全国将近三千个从事组织地下战斗的特工人员，法国所有地下抵抗组织几乎竭尽全力地去完成“绿色”、“紫罗兰”和“蓝色”计划。在伦敦和阿尔及尔的总部向每个小组送来了各有关小组在每个行动地区的详细地图，向他们指示了该地区的一些特殊目标。同时还派遣了各种技术专家，把他们空投到一些地区，指导当地游击队破坏铁路和桥梁的工作。6月1日，在伦敦和阿尔及尔两个总部墙上挂着的法国地图上，满是红色圆点。每个圆点都表示在那里培训着爱国游击队，存有后勤供应随时准备在欧洲登陆日以及登陆日以后摧毁指定的任何目标。

等到6月5日晚，发出了行动暗号后，在法国全国破坏的铁路有五百处之多。由于巧妙安排的地下特工人员部署，伦敦一般都在两天之前就了解了每一列重要军事列车的行动日程，因而盟国空军能够袭击几乎所有运往诺曼第的军事列车。

有些抵抗组织的特工人员混进了法国长途电信系统的中转站，变成了一名精通业务的内行。他们都拿到了德国人发的通行证，可以通行无阻地进入各个中转站，并捣毁了其中不少设施。

在成千个村庄里，人们埋上了地雷，并且在公路上安装了伪装了的、专门破坏德国人卡车轮胎的炸弹。当时人们最乐观的希望是，他们要是能把德国增援部队拖迟十二小时就不错了，但是结果把他们的增援行动推迟了整整两天。

许多派出的“介得堡士”特殊部队都在山区帮助“马基”^①。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抗击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游击队和其他成员的称呼。——译者

现在这些游击队的人数多达十万人。在四个月内，数千吨美国枪枝、手榴弹和医药用品运送给了游击队。7月14日还进行了一次大胆的白昼运输任务。三百二十四架美国B—17飞机在大白天运送了近五百吨装备，足足可以供应三万六千人。

当盟军于8月份向纵深进行突破之后，在法国布列塔尼地方，由老练的特别空中服务队（现在是法国第四降落伞兵营的成员）组织起来不断地伏击敌人并保护盟军向前推进的通路。

当时，有支部队称之为“行动团”，是这支秘密部队里的敢死队。他们有很多进行大量爆破和突袭的专家。他们以十五到三十人为一组不断进入法国，从事一些需要高度技术的任务。有十一个小组空降在法国的南部，那里集中着大部分的马基。有二百个这样小组成员从事组织和训练法国的部队，在一些联合行动中，他们打死了四百六十一名德国人，打伤四百六十七人，俘虏数千名敌人。这支部队第一次是在洛特县降落的，那里德国人的力量很强。但他们立即组织起三个营，伏击了一千名德国军队。同时，他们破坏了铁路桥梁和旱桥，切断了整个地区的德军的联系。

当德国人大量撤退时，“行动团”又改变了策略。他们派了一个二十五人的小组赶去乌茄尚保护一座大的水电站，这是法国最重要的发电站。而当时德国人已派了五百人准备破坏这个发电站，只要一决定撤退，马上摧毁。就在这时，“行动团”的指挥官同敌人安排了一次会见。这个指挥官把穿军装的布置在“马基”部队众多群众的前列。让敌人在谈判时可以看到他们。这位指挥官威胁说现在有一千五百名美国伞兵部队已经包围了这个地区，准备战斗，如果德国人想转移，可以给他们安全放行。结果，这些吓得发抖的德国人把水电站完好地交出来之后就跑掉了。

这支部队的战士无一例外地对于那些为帮助解放祖国而不惜冒险的法国爱国者给予高度的信任和评价。许多人一直受到敌人

追捕，不少人吃不上饭，住不上房，过着长期的游击生活。不管是一小组人或是单独一个人活动，有些人坚持了整整四个年头，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反法西斯侵略的斗争。他们的英勇战斗的精神永远激励着一切热爱自由的人民。

空中斗智

艾伦·艾·米基

自从1942年德国人在第厄普进行了一次反登陆战演习之后，纳粹不断自夸他们有能力对付盟军的任何登陆。然而，到了1944年6月6日，盟军在欧洲登陆战正式开始，六千艘左右盟军舰只毫未受阻地向诺曼第海岸进发并且把大量部队登上欧洲时，德国人甚至还蒙在鼓里。在这关键性的时刻，敌人的雷达兵被盟军愚弄了，他们误以为盟军将会在派司一迪·克拉斯——离实际登陆的海滩有二百英里之遥登陆呢！这个巧妙设计的关于盟军欧洲登陆战的障眼术可以说是二次大战中电波战的高潮，也是绝密无线电信号的战役。这个战役几乎随着盟军空军和纳粹空军的空战整整打了四年之久。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空战的巨大速度使得双方都需要极大地依赖于无线电电话和无线电通信。因为它们不仅可用于结集或者指挥轰炸机群，而且也能指示战斗机去拦截敌方轰炸机。当时英国和德国的反敌机的空中防御主要依靠的是雷达，它能侦察并测定逼近来的飞机的位置。因此，电波战中的一个目标，经常是破坏对方的无线电通讯和雷达侦察设备。

“无线电反击措施”，（官方行话的缩写是“RCM”）是在1940年的秋天开始悄悄地使用的。当时正值德国戈林（纳粹空军元帅）的轰炸机对英国城市进行夜间轰炸的时候。德国人的轰炸机群是由

设在法国和比利时基地上发射出来的比较狭窄的无线电波来指引飞向它们的目标的，有时也从荷兰和挪威发出的电波相交叉来指引方向，当飞机接近目标时，它们就会发出信号。英国当局决定要干扰这些信号。德国人经常在进行轰炸之前数小时就发射出他们的指示电波，因此英国方面完全有充分的时间来发现并加以“复制”。他们能够再发射同样电波并逐渐使它从目标城市“转移”开去，只要有两度的偏差就可以使飞了二百五十英里航程的敌机产生九英里的差距，结果让它们炸弹全扔在空旷的农村田野里。

当德国人发现有人在电波上捣鬼，并摒弃这种方法开始使用直接从德国基地发射无线电波来导航的时候，英国也想出了一种新的妙计来应付这种无线电波战。德国领航员用无线电来指示方位以校正他们轰炸机的位置时，英国的无线电操纵者立即袭用德国空军的频率，向飞机指示了另一个虚假的方位。德国飞行员常常被这些假的导航指示弄得糊里糊涂，不停地在空中打转找不到目标，直到天亮了他们把英国的南部看成法国，而把飞机降落了下来。

德国人是首先成功地发明干扰雷达的人。1942年2月，德国军舰“夏霍斯特”号、“格那赛渥”号和“埃根王子”号，曾偷偷地从布勒斯特港溜走开往英法海峡。当时英国雷达专家正操纵海岸雷达站，发现有人在干扰，这种干扰开始比较轻微，然后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强烈起来。等到德国这支小舰队抵达英国多佛海峡时，干扰不断加强，使得英国地面操纵站无法看清海面情况并指挥自己的船只和飞机。而德国的战舰却安全地冲过海峡。

就在同时，英国发现敌人的雷达也是可以受干扰的。英国沿着南部海岸建立起了强大电力的发射站，开始干扰敌人的早期警报雷达。与此相平行的是：英国皇家空军这时也开始干扰德国空军地对空的无线电电话和无线电通讯。

空间的电波战几乎没有任何平静的时刻。为了寻找新的波长，德国人经常不断改进或更换他们的雷达和通讯设备。但是差不多只要德国人开始动用他们的新机器，英国方面也就马上使用新的装置来进行干扰。其中有一种是经过克服了技术上几乎难以制服的困难之后才搞成了一种很完美的可以空运的干扰器，它非常轻巧，能够装载在轰炸机上。这种干扰器，代号称做“机载雪茄”，应用得十分成功，它逼得德国人不得不求助于功率更大的中转发射站使用无线电通话来把口头指示传达给他们的夜间战斗机。英国皇家空军立即建立了一座强电力的发射台，用德国人的同样频率广播。于是，这种“鬼怪声音”开始向德国地面控制站人员发问，并向夜间战斗机发布相反的指令和提供错乱的情报。这种“鬼怪声音”不仅能说地道的德国话，而且它不断训练使之完全能模拟德国地面控制站人员发音的腔调。

这种称之为“柯洛娜行动”（柯洛娜是从前哈瓦那出产的一种有名雪茄的商标名称）的技术第一次应用于1943年10月22日到23日。当时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决定对德国卡塞尔进行一次猛烈轰炸。在这次轰炸中，德国人发现有些事情不对头。皇家空军监听员听到德国地面控制站告诉德国夜间战斗机的飞行员们“要警惕另一种假冒的声音”，警告他们“别被敌人引入歧途”。在德国地面人员大为发怒地骂了一通之后，那个“鬼怪声音”就开腔说：“英国人现在骂人了。”德国人叫喊道：“这不是英国人在骂人，是我！”结果弄得德国飞行员们晕头转向，他们彼此大叫大嚷对骂了起来。

英国“无线电反击措施”的专家们早就预料到：德国人为了打击这个“鬼怪声音”，可能突然会起用一个女广播员来代替原来的人，因此早就训练了三个会讲德语的英军妇女队成员，准备随时调用。过了个把星期之后，德国人果然换了个女的来发布指令。一个妇女队成员马上模仿她的调子也广播起来，搞得德国空军驾驶

员象过去一样稀里糊涂。

一个最有效的而引人注目的干扰雷达的措施是利用铝箔薄片——叫做“窗户”，专门迷惑德国的雷达操纵者。英国皇家空军的科学家们发现把一大批这种薄片洒在空中，使它们互相靠近但又不彼此接触，就会在雷达指示仪器上产生犹如飞机一样的形象。因此，如果隔一段时间洒下足量的铝箔薄片，这在敌人的显示屏幕上不是失明，就是显示有许多虚假的“雷达回波”，雷达操纵人员就无法辨识真正飞机的“雷达回波”。

这种“窗户”办法最初用于1943年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这是把汉堡几乎炸平的对德四次大规模轰炸中的第一次出击。就在那一回，七百九十一架轰炸机在飞向目标的航路上，每一分钟每架飞机按计划洒下二千多条薄片，使每批薄片能在雷达屏幕上造成十五分钟的“回波”，而这次轰炸使整个屏幕上出现了一万二千五百架飞机！这种办法对德国雷达基地的防御造成了直接的和破坏性的影响。据英国轰炸机机组人员报告，德国雷达站的探照灯在空中毫无目标地乱照一通。而人们预料中的高射炮炮火（由雷达指示）成了排炮乱轰。那些依赖地面雷达指示航向的德国夜间战斗机和机载雷达最后简直成了无头苍蝇。那天晚上英国皇家空军损失了十二架轰炸机，占那天出动飞机总数的仅仅百分之一。这十二架飞机是偶然碰上了截击或者德国高射炮火瞎乱打时给击中的。

由于他们用雷达指示飞机方向的办法受到“窗户”的干扰而大部分失效，因此，德国空军的夜间战斗机退回到过去使用过的无定向的侦察体系，而这种体系一部分要靠地面观察哨的指引。而这些观察哨只能根据目测和声测来判断轰炸机方位位置，最多使用一些辅助性手段，如照明弹和声音探测器同时使用的探照灯等等。这种方法比起“窗户”干扰法之前的雷达侦察来说要原始得多。而

且它的弱点正好使英国皇家空军司令阿瑟·哈雷斯元帅有可能开始派轰炸机去袭击战争的靶子中心目标——柏林。

1944年春天，德国人被英美这种干扰弄得束手无策，结果它的战斗机指挥人员们只能在同时都用20波长来发送指令，以便希望其中总有一个能被收听到。

整个“无线电反击措施”的活动在盟军欧战登陆日开始后的严峻时刻里，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虽然，初步的空中袭击削弱了德国人海岸雷达体系的有效能力，但是人们仍然发现：在法国的瑟堡和德国的肖尔台之间的一百个雷达设施在盟军于诺曼第前夕，依然在运转。为了保证盟军登陆的成功，必须把这些雷达眼全部摧毁或使之失灵。在登陆地区内，“雷达眼”必须打掉，因为登陆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靠攻其不备的突然性因素。而在其他某些地区，我们要给那些雷达观察员造假象，使他们得出错误判断：盟军部队正在他那个地区登陆！

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无线电反击措施”的专家们搞出并演习了一种复杂的蒙蔽敌人的办法。就在6月5日到6日晚上，当盟军舰队从英国海峡地区出发直驶法国瑟堡半岛真的欧战登陆开始时，迷惑敌人的把戏也同时开始了。

当时德国人还深信不疑地认为盟军是企图在法国勒阿弗尔或是可能在加来海峡地区登陆。而那个欺骗敌人的把戏正是建立在敌人的错误判断上。当时，英国皇家海军的十八艘小型舰只以每小时七海里速度直向勒阿弗尔北面一点的安梯福角驶去，它们这样做是要给德国人造成盟军似乎将在此附近地区登陆的错觉。每艘船后面还拖着好几个低飞气球，以便在敌人雷达屏幕上造成“大军舰回波”。但是，这样做还不够。因为敌人的雷达侦察兵会很快从屏幕上发觉这支舰队的规模还是十分有限的。因此还要上空低飞着的十二架飞机，每隔一分钟每架飞机就洒下一大束干扰

雷达的“窗户”金属箔，这样可以使敌人误认为有一支大护航舰队正徐徐向法国前进。而且这些飞机上的干扰手们要不停地制造这种假象，以防止敌人的雷达侦察兵清楚地识破“窗户”术骗局。在这样做的时候，必须精细地掌握时间并要精心设计时间表。这些飞机要在三个半小时里不停地循着一个面积为十二英里长、八英里宽地区轨道上飞行。

在这同时，类似的干扰活动也在向着布洛涅的方向进行。而在勒阿弗尔和波洛涅两地区之间，有二十九架轰炸机发起了佯攻，它们在整个四个小时中，不断地向着敌人海岸穿梭般地来回飞行，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敌人的夜航机从盟军真正登陆的地点吸引开去。而这二十九架轰炸机也继续不停地用不下于八十二架干扰器来对敌人的雷达进行干扰。采取这种行动的第二个理由是希望德国人会错误地认为这些巡逻机是“登陆”部队的空中掩护。

除此之外，当盟军伞兵在诺曼第空降时，另一项分散敌人注意力的活动也开始了。就是在真正的伞兵降落前一刻，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支小型机群飞临勒阿弗尔，投下了大量的带着假人的降落伞，让他们徐徐飘荡而下落在费康附近。与这个行动同时进行的是，另外有一队飞机飞越瑟堡半岛，在盟军真正登陆地点的右侧也投下了大批的假的伞兵部队。在这样做的时候，飞机也不断搞“窗户”式干扰，使敌人雷达兵从屏幕上看来似乎空降兵的伞兵部队要比实际人数多二十倍。

在盟军真正登陆的地区，人们搞起了迄今为止最最集中的，大规模干扰雷达的活动，而大批的登陆舰队就隐藏在这些干扰的后面。二十四架英国和美国的飞机，配置着干扰器，沿着离敌人海岸线五十英里的一条线上在一万八千英尺高空来来回回不停地飞行着，接连好几小时不停地干扰敌人在瑟堡半岛的雷达站。这种干扰网不仅仅掩护了盟军轰炸机对诺曼第海岸的敌人防御线发出的最

后一分钟的猛烈攻击，不仅仅掩护运送伞兵部队的飞机和滑翔机，而且也阻止了敌人觉察出大批登陆舰队。一旦当这些军舰进入一定距离之内，它们也立即加入了干扰网的工作。

这一蒙蔽术可以说是干的十分出色。德国人真的以为在波洛涅附近地区是对它威胁最大的地方，因此集中了一切的武器装备和探照灯来加以保卫。他们还派出大量鱼雷艇冲向海上，企图拦截这支完全是虚构出来的巨大护航队。绝大多数的德国夜航战斗机出动来对付那二十九架兰开斯脱轰炸机，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飞机是用来掩护登陆舰队的。那天晚上最大的成功是把敌人的绝大部分夜航战斗机从诺曼第地区吸引开去，那里致命性的输送伞兵的飞机和滑翔机正在大肆活动。那些假造的伞兵部队也引起了敌人的迅速反应，他们把部队调去包围那些木头做成的伞兵，而真正的伞兵部队却轻易地在诺曼第地区左、右两侧降落，巩固了盟军东西两翼的桥头堡阵地。盟军从空中和海上联合进行的干扰活动，使敌人的雷达侦察兵处于混乱不堪的境地。只是到了德国人真正看清盟军舰队之后，他们才如梦初醒地了解到英美盟军是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发动了进攻的。

这是个有无勇气的问题

多萝西·卡梅伦·迪斯尼

在英国一次颇为拘谨的军人午餐会上（参加的人互相都不认识）我的旁边坐着一位美国第一〇一空降师的伞兵。那个空降师是巴斯托尼的英雄部队。这个美国兵大约二十岁光景，胸前闪着光亮的各种缎带奖章。在我的记忆中还没有见到过一个不是将军级的军人而戴有这样多的奖章的人。他开始时有点羞羞答答，而且也不善于讲话。过了一会儿，他的那种紧张感慢慢消失了，他对

我讲了他的故事。下面就是他的故事。

在盟军欧战登陆发动日的前一天，——即在向法国海岸进军前24小时——各种经过精心挑选的伞兵人员被投放到诺曼第地区。这个年轻人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是不幸，他降落的地方离开指定的着陆地点有相当一段距离。那时天刚黎明。他找不到事前曾向他介绍过降落地点的地形标志。四周也看不到自己的一个战友。他吹起了警察使用的尖音哨子，这是用来要自己人集合的信号。但是周围没有听到其他警哨的回答。他发现这次降落的计划出了毛病。现在在敌人的占领区里他成了孤单单一切靠自己一个人。

他意识到现在必须很快地找到一个掩护的地方。他正是掉在一个很整齐、弄得很美的果园的石墙附近。在灰蒙蒙的晨光中，他看到在不远处有一座小小的、红屋顶的农舍。但是住在那个农舍里的人究竟是亲盟军的还是亲德国人的，他可不知道，不过，这总得要碰碰机会。他跑向那座房子，默默地背诵着他过去学过在紧急情况下要用的法文句子。

他敲了敲房子的门，一位年近三十的法国妇女出来开了门。“她长得并不算漂亮，而且脸上也没有太多笑容，但看上去她有双仁慈、神情稳重的眼睛。她刚从灶边走过来，那里正在做着早饭。她的丈夫和三个小小孩——婴儿在高椅上——从餐桌旁瞪着眼睛惊奇地瞧着。

“我是一个美国兵，”那个伞兵说：“你们愿意把我藏起来吗？”

“行，当然行！”那位法国妇女回答，并把他引到了屋里。

“快！你必须赶快藏起来，”那位丈夫说着就把他推进在火炉旁边的一个大的木制的橱里，并把橱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几分钟之后，六个德国党卫军来到了。他们已经发现有个伞兵在附近降落了下来，而这座农舍是附近地区的唯一的一间房屋。他



们立即搜查了整个屋子。很快这个伞兵被发现了，并且把他从食橱里拉了出来。这个法国农民犯的虽仅仅是藏匿罪，但无需审判。这里不需要有任何繁文缛节的手续，也没有向亲人告别场面。当这个农民被从厨房里拖出来时，他想同他妻子讲几句话，但是，党卫军冲锋队员连连打他的嘴，使他无法吐字。德国党卫军命令他站在谷仓前的空地上，立即枪决了。他的妻子呜咽着，一个孩子吓得尖声哭叫。

党卫军冲锋队员知道怎样来处置一个敢于掩藏敌人的法国农民。但是，很明显，要处置他们的俘虏就不那么意见一致了，因此，他们暂时就把这个伞兵关进了农田里的小棚屋里并锁上了门。

在这个小棚屋的后面有一扇小小的窗户，正对着一片田野。田野边上就是一个树林子。这个伞兵不顾一切地从窗户里往外挤，当他逃出小棚后便竭力向树林跑去。德国人听到他逃跑的声音，他们绕过小棚屋冲过来在伞兵后面紧紧追赶，不时开枪射击。但子弹没有打中他。现在要逃脱他们的追捕看来是不可能的了。他刚刚躲进了树林——精心护理的法国树林是没有矮树丛的——就听到追捕的人在四周互相叫唤着。他们分散在四面八方，现在他们正在步步紧逼周密地搜索着。要发现他藏匿的地方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现在已逃走无门。

可是，还有最后一线希望。这个伞兵鼓起勇气决定冒一下风险。他急忙折回逃跑，弯着身子从一棵树窜向另一棵树，就这样他终于钻出了树林，重又走向开阔地。他跑回到刚才的来路上，越过那个小棚屋走到了谷仓前的空地上。那个被杀害的农夫的尸体仍然躺在那个地方。这个美国兵又一次站在这所静悄悄的农舍前，轻轻地敲着厨房的门。

这个农民的妻子很快来开门。她脸色苍白，眼里噙着泪水。他

们相对无言也许有一秒钟。她不敢向她丈夫的尸体看一眼，因为到那时为止她还没有敢去碰一下。她直直地瞅着这个年轻的美国人，正是他的来到使她成了一个寡妇，孩子们成了孤儿。

“你愿意把我藏起来吗？”他问。

“行，快！”

毫不迟疑，她反身把他带进了火炉边的食橱里。

这些党卫军的冲锋队员再也没有回到这家农舍前来。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要再到这座房屋里进行搜寻。因为他们不了解他们正在与之打交道的那些人民。他们也许根本无法理解人能够达到这样崇高的境界。两种勇气挫败了他们：一是这个美国年轻人敢于开动脑筋，智斗胜敌的勇气；一是这个法国寡妇敢于再次接纳美国伞兵的勇气。三天之后，诺曼第地区的这一部分获得了解放，这个美国伞兵重返部队。

这个真实故事中的两个主人翁的品格深深地吸引着我。他们的形象经常萦回在我的脑际。我曾经向在法国和意大利的美国士兵们反复地讲述这个故事。然而我的口才笨拙，无法充分表达我对这两个杰出人物的思想感情。一直到战争胜利后，当我准备回到美国去的时候，我遇到一位美国空军将领，他把我想说而未能说出的感受确切地表达了出来。

他说：“这个年轻的伞兵有着一种绝处求生的勇气。在极度困境中，他看到了并且抓住了一条唯一的生路。他是一个勇敢聪明的好小伙子。而那个法国妇女却有一种坚信不疑，从不背离你的勇气。她是一个幸福的妇女。”

“幸福？”我惊奇地望着他问道。

“是的，幸福的，”这位将军重复地说：“因为她知道她信仰的是什么。”

最长的一天

考纳林斯·雷恩著书缩写

村庄在潮湿的6月的清晨显得格外静悄。这个村庄坐落在塞纳河畔，叫拉罗什居扬。差不多十二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宁静地位于从巴黎到诺曼第之间的中央、塞纳河水流缓慢的大河套上。好些年以来，这里不过是来往行人去某地路过之处。它的唯一的特征就是那座洛希福考特公爵的城堡。

可是，现在，这座村庄却具有另一种与众不同之处。就在这种牧歌式田园景色的背后，拉罗什居扬却变成了一座真正的监狱——在整个被占领的法国这里是被占领色彩最浓的一个村庄。因为这小小的村庄驻扎着大量的德军。全村五百四十三个村民，却有着二千名德国驻兵（有一个村民，就有三个多德国兵）。这支德国军队中有一位埃尔温·隆美尔元帅，他是德国第二集团军（德国西部最强大的部队）的总司令。它的司令部就设在那座城堡里。在这个地方，隆美尔将准备打一场他一生中最大的恶仗。虽然，当时隆美尔还不知道，这场反对盟军登陆欧洲战争将要在四十八小时内爆发。因为那时是1944年6月4日，星期天。

在隆美尔指挥下，五十多万军队沿着一条从荷兰的堤岸直到大西洋浪花冲击着的法国布列塔尼半岛全长八百英里的海岸线布防。他的主力，第十五军就集中在英法海峡最窄的地点——加来海峡。连续着好多个夜晚，盟国轰炸机对这一地区进行了狂轰滥炸。那些对炸弹厌烦透顶的十五军老兵挖苦说，现在最好的休养圣地就是第七军驻地的诺曼第地区，因为那里几乎一颗炸弹也没有擦下过。

好几个月以来，隆美尔的军队就在象丛林一样密布的海滩障

碍物和地雷阵后面严阵以待。但是，在蓝灰色的英吉利海峡里却空空如也，一条船也看不到。这里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在拉罗什居扬，一个阴沉沉的、平静的星期天早晨，仍然没有任何盟军登陆的迹象。

在司令部的底层办公室里，隆美尔独个儿在一支桌灯下工作着。他看来要比他五十一岁的年龄要苍老一些，但是仍然是那样地不知疲倦。这天早晨，隆美尔象平时一样，一早4点不到就醒来了。现在正在不耐烦地等着6点钟的到来。因为那个时候他将同他的参谋人员一起吃早饭，然后动身去德国。这是好几个月来他第一次回德国。

隆美尔的肩上正担负着巨大的责任：在盟军进攻一开始就要击退敌人的登陆。但是那个时候，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的根基正在动摇，它的灾难一个接着一个。盟军轰炸机日夜轰炸着德国。俄国的大军正直驱波兰，而盟国的军队已经到了罗马的大门口了。差不多在许多地方，德国国防军正在溃退和受重创。德国虽然还远远没有被打垮，但盟军在欧洲的登陆将是一场有决定意义的战斗。对于这一点隆美尔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

然而，隆美尔在这天早晨将要回家。好长时间来，他一直希望能在6月上旬回到德国去度几天假，同时，他也需要去见一见希特勒。他认为现有好多理由使他能够离开司令部，虽然他永远不会承认他所以要回德国去是因为他迫切需要休息。真正了解隆美尔所处的紧张状态的是他的妻子，露茜·玛丽亚，因为只有对她，他才吐露一切真情。就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隆美尔已向她写了四十多封信。差不多在每隔一封信里，他都对盟军的进攻作出新的预测。

4月6日的那封信上，他写着：“这里的紧张局势是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看来是几个星期之内的事。”

在5月6日的信里他又写道：“仍然没有英国和美国人进攻的迹象……每一天、每一星期……我们都在变得更强大……我深信有信心期待着一场战争，可能它将会在5月15日爆发，也可能在月底。”

5月19日的信里是这样写的：“我不知道能否在6月份抽出几天离开这里。但目前仍然没有机会。”

但是，机会最后终于来了。隆美尔决定在这个时刻离开这里回德国的原因之一，是他对盟军意图的估计。他的桌上有一份第二集团军的每周军情报告。这份报告应在下一天必须送往巴黎郊外的圣·盖门地方的冯·朗斯代茨元帅司令部，从那里再直接送给希特勒的总部。隆美尔的估计里认为盟军已经进行了“高度的准备”，此外发现有“数量大大增加了的发给法国抵抗运动的电报文件”。之后报告又说：“根据以往的经验来判断，这并非预示着盟军的登陆将迫在眉睫……”，隆美尔显然又猜错了。

现在5月已经过去了——5月，气候良好，是盟军进攻的好时机——因而隆美尔下结论说，在最近几周之内，盟军将不会登陆。他是这样考虑的：——希特勒以及德国最高司令部也如此考虑——盟军的登陆或者将同苏联红军的夏季攻势同时进行，或在红军攻势之后发动。他们知道，俄国的进攻在波兰的天气转暖之前是不会开始的。因此，他们认定盟军的登陆至少将在6月下旬才有可能。

在西线，一连好几天都是很坏的天气，而且气象预报报告，今后几天天气不会好转，而且可能更坏。6月4日早上5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是多云、大风和雨。即使在这会儿，英吉利海峡也刮着每小时二十英里到三十英里的大风。在隆美尔看来，盟军不可能在下几天里会发动进攻。他拉开了办公室的门并走下去同他的参谋人员共进早餐。在司令部外边拉罗什居扬村上，圣·赛姆桑教堂

的钟声不断地响着。每一响钟声似乎都在同大风搏斗以求它的存在。那时正好是早上6点钟。

隆美尔从1943年11月以来一直住在法国。这对六十八岁的贵族出身的元帅冯·朗斯代茨总是件有失面子的事。因为原来是他负责整个西欧的防御的。可是隆美尔却作为钦差大臣来到这里，他带有“圣旨”，要他亲自视察海岸工事（这项工事曾经被希特勒多次称之为“大西洋铁壁”），然后将视察结果直接报回元首总部。

这座大西洋铁壁是使希特勒着迷的一种新花样。一直到1941年，希特勒和趾高气扬的纳粹们踌躇满志，以为胜利在望，根本不需要什么海岸工事。法国投降之后，希特勒曾经希望英国会提出和平祈求。但是结果英国并没有这样做。而且随着时光的流逝，形势起了迅速的变化。在美国的帮助下，英国开始有了缓慢但踏实的恢复。不久之后，希特勒又深深地陷到和俄国的战争里面去了（1941年他开始进攻苏联）。他知道法国海岸已经不再是进攻时的一座跳板。它成了他防御体系中的一个薄弱环节。1941年12月，自从美国参战以后，元首曾经向全世界夸口说：“我们要建立一条坚强而庞大的防御带，这条防御带将从基尔克内斯（在挪威—芬兰边界）直到比利牛斯山（在法国—西班牙的边界）。……我的一个不可动摇的决心是要使它成为任何敌人所攻不破，摧不毁的防御带。”这完全是吹牛，事实上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不算那些凹陷的弯曲地带，整个这条海岸线就有三千英里长呢。

1942年，当战争的浪潮开始转向对德国不利时，希特勒向他们的将军们厉声吼叫，命令要以最高速度加快完成“大西洋铁壁”。于是，成千上万个奴隶劳动力日日夜夜地赶建这座铁壁。几百万吨的水泥浇灌在这座铁壁上，以至当时在希特勒占领的整个欧洲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可能买到需要的水泥。同时钢的订货量大得惊

人，可是这项商品供应奇缺，工程师们只得被迫不用钢材。一直到1943年底，尽管有五十万人在为此劳动，可是这座铁壁却远远没有完成。

当1943年11月隆美尔来视察这项海岸工事时，他所看到的景象使他大吃一惊。只有少数几个地方，工事算是完成了，在有些地方，工程甚至还没有开始。但是人们不得不承认，即使当时看到的那部分大西洋铁壁，的确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障碍。在它完工的部分，那里部署着密密的重炮。然而尽管如此，隆美尔对这一切还觉得远远不够。在他的挑剔的眼光下，这样的大西洋铁壁不过是一种滑稽玩意儿。他指责这东西是“希特勒理想国的幻梦”。

冯·朗斯代茨完全同意隆美尔这种毫不留情的指责（也许这是朗斯代茨仅有的一次同隆美尔对一个问题具有完全相同的观点）。这个足智多谋的老朗斯代茨从来不相信这种固定式防御。因为1940年他曾经策划过对法国马奇诺防线的进攻，当年他就是采取迂回包抄的办法挫败这条法国防线的。马奇诺防线的崩溃导致了法国的失败。对于他来说，希特勒的大西洋铁壁不过是一个“吓人的怪物，……而且与其说是吓唬敌人不如说是吓唬德国人民的”。它只能“暂时阻挡”盟军的进攻，而不能制止住敌人。朗斯代茨深信，没有任何办法能阻止敌军在一开始登陆时所取得成功。他的挫败盟军登陆的计划是，在海岸线后面集中大规模兵力，等盟军登陆之后再发动攻击。

对于这个理论，隆美尔是全然不同意的。他明确主张只有一种办法能粉碎盟军进攻，那就是在敌人一登上岸时就迎头痛击。那时来不及调派增援部队。他很有把握地认为，增援部队会遭到空军攻击、海军和大炮的轰击。在他看来，从步兵到装甲师每一样东西都必须在海岸上或者稍后的地方全都准备停当。

隆美尔的三十六岁的副官海尔默·伦盖上尉，对于有一天隆

美尔是怎样总结他的战略思想的，记得很清楚。他们站在海边的一块荒滩上，隆美尔这个矮个、胖胖的人物，穿着一件厚厚的大衣，围着一条旧围脖，大步地走来走去，挥动着他那根三英尺长、顶端包银并装有红、黑、白三色流苏的“非正式”的元帅指挥棒。他指着沙子说：“战争将在海滩上决定胜负。我们只有一个机会来制止敌人，就是当他们还在水里，想拼命爬上岸来而还未爬上来的时候，后备部队根本来不及赶到攻击点，因此哪怕是考虑这个问题也是愚蠢的。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必须搁在这海岸上。伦盖，请相信我，在登陆开始的二十四小时内将是决定性的，……对盟军和我们都是一样，这一天将会是最长的一天。”

希特勒总的是赞成隆美尔的计划的。从此，冯·朗斯代茨变成仅仅是个傀儡式的头头。在短短几个月里，隆美尔大胆的魄力改变了事物的整个面貌。在海滩上，凡是他认为盟军可能登陆的地点，他都下令竖起一种粗糙的反登陆的障碍物。这些障碍物包括锯齿状的三角钢齿、尖桩、铁制的门栅、头部装有金属的木头桩子、水泥制的锥形物体等等，这些东西全都放在涨潮和落潮的水位标志下面。每样东西上还绑着炸药。隆美尔的这些奇怪的发明（有许多东西都是他亲自设计的），都是又简单、又致命。它们的目的是要限制和摧毁装满部队的登陆舰艇，或者尽量减慢它们的行动，以便岸上的炮火能及时加以摧毁。现在有五十多万个这样致命性的障碍物沿着海岸线布放着。

但是，隆美尔仍然不满意。他下令在沙滩和峭壁上，在通往海滩的溪水和小路上都要布满地雷。这些地雷大大小小各种品种齐全，有大的专打坦克履带的，也有小型的S地雷。这种S地雷当人一踩上去，它会蹦到半空中正好在人们的胸膈部位爆炸。这种地雷在海岸附近就几乎有五百多万个。隆美尔希望在盟军发动登陆战之前，能够布下五千万个这种地雷。



俯瞰这些海岸线，在那丛林般的地雷和障碍物后面，隆美尔的部队严阵以待地守在无数个用几层铁丝网围起来的掩体、碉堡和交通壕里。经过隆美尔亲自视察过的每尊大炮俯视着沙滩和大海，并已对好准心准备构成交叉火力网。

隆美尔利用了每一个新的技术和发明。有的地方如果缺少大炮，他就摆上火箭发射器或多管迫击炮发射器。在有一次，他甚至放上了被称为“哥利亚”（基督教《圣经》中记载的菲利勇士，为大卫王所杀）的小型自动坦克。这种设计型的坦克可以携带半吨以上的炸药，从工事里可以对它们遥控指挥，让它们开到海滩上，在登陆部队之间或登陆艇之间爆炸。

在战争史上，还从来没有准备得如此严实而厉害的防御来对付敌手的进犯。然而，隆美尔仍然不满足。他需要更多的碉堡……更多的海上障碍物……更多的地雷……更多的大炮和军队。他最为迫切需要的是力量雄厚的装甲师，而它们现在作为后备，部署在离海岸很远的后方。但是，现在，在这样一个严峻的时刻，元首坚持要把这种武装部队牢牢地掌握在他自己的手里。隆美尔至少需要五个装甲师部署在海岸一带。现在他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弄到它们：亲自去见希特勒。隆美尔经常对他的副官伦盖说：“最后见到希特勒的人能赢得他所要的东西。”就是在拉罗什居扬那个灰色的早晨，隆美尔准备长途旅行回德国去。隆美尔下定决心一定要赢得他所需要的东西。

在离拉罗什居扬一百二十五英里的比利时边界上，第十五军的司令部里海尔默斯·梅耶中校正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显得憔悴而目光迟钝。他担负着使人沮丧而又十分紧张的任务。他在这个敌人可能登陆的前线，领导着唯一的一支反间谍的队伍。这支队伍的核心就是三十个人的无线电拦截小组，他们的任务就是监听，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是专家，能讲三种语

言。只要盟国发出的摩尔斯密码在空中微微出声，他们没有听不出来的。

梅耶对他的差使是干得不错的。一天好几次，他要仔细地象过筛子似的审视监听站送来的报告，从不放过那些令人怀疑的，或者不寻常的甚至不能相信的事件。就在那天晚上，他的部下拦截到一份令人难以相信的电文。这是一份特急新闻电报，是在天黑之后监听到的。电文是这样的：特急新闻，美联社 NYK 火急，艾森豪威尔总部宣布盟军在法登陆。

梅耶看了这份电文惊得发呆。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立即向总司令部报警。但是稍停他镇静下来，因为梅耶知道这个电文必定有错。理由有二：首先，在海岸线上根本就没有发生任何登陆活动的行动（如果真有这种行动的话，他是马上就能知道的）。其次，在1月份的时候，德国情报机关的头子威廉·卡那里斯上将曾经对梅耶详细交待过“两部曲”信号的问题。他说：盟国如果有所行动，它常常事先向法国地下抵抗组织发出警报，然后再采取行动的。

卡那里斯曾经嘱咐：盟军在发动进攻以前的几个月里常常会向地下抵抗组织广播上百条电文的指令。其中只有少数是有关盟军欧战登陆的，其余都是伪造的。发这些假电文的目的是想把敌方引入歧途和造成混乱。可是，卡那里斯却明确规定：梅耶必须监听每件电文以免漏掉任何重要电报。起初，梅耶曾经怀疑过。如果单独依靠唯一的一份电报对他说来简直是发了疯了。可是在6月1日的晚上，他的部下截获了一份盟国发出电文的上半部分，其情况正象卡那里斯嘱咐过的那样。这看来不象平常在英国广播电台播送正常新闻之后发向地下抵抗组织的那种成百件其他的密码广播。那些广播用法文、荷兰文、丹麦文和挪威文广播，大多数都是没什么意义的，诸如：“特洛伊（小亚细亚古城）战争将不会停止”，“糖浆明天将喷出白兰地酒”，以及“约翰长了一脸胡子”等等。

然而，6月1日那天晚上，英国广播电台在9点正常新闻广播后播送的几条广播电文，梅耶是太感熟悉了。电台里用法文广播说：“现在请大家静听几条个人的信息”，中间稍停了一下，开始广播：“秋日的琴音抒发出阵阵呜咽”。梅耶意识到这就是卡那里斯警告过他们要十分注意的广播。范尔拉尼诗集的开头一句。这显然是一个信号。后来又广播了电文的下半部：“绵绵柔情揉碎了我那个心”。根据卡那里斯分析，这意味着“登陆战将在48小时之内开始”。

当梅耶收到范尔拉尼的诗句的上半句时，立即向第十五军参谋长威尔海姆·霍夫曼准将报告。他说：“第一个电文已经到来，现在看来要出点什么事情了”。霍夫曼接到报告立即向第十五军发出了战备警报。梅耶同时也用电传打字把广播电文发往希特勒总部。接着他用电话向冯·朗斯代茨总部和隆美尔第二集团军总部作了汇报。

在希特勒总部里，电报交到了作战部主任阿尔弗雷德·约道尔将军的手里。但是他把它放在书桌上，并没向部队发出战备警报。他设想冯·朗斯代茨一定已经发出警戒命令，而冯·朗斯代茨认为隆美尔总部肯定会发出了命令（隆美尔肯定听到了这份电报，但是根据他个人对盟军意图的估计，很明显他一定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因此，在盟军实际登陆的地点，只有第十五军一个军保持戒备。而防守诺曼第海岸的第七军根本没听到什么电文信息，也没有收到战备警报。

在6月2日到3日晚上，第一部分的电文，英国广播电台又重复播送了几次。到3日晚电台连续广播之后，就收到了前面提到的美联社发出的关于盟军在法国登陆的消息。如果卡那里斯嘱咐过的话是正确的话，那末美联社发的消息就是假的。这份火急电讯原来是最最离奇古怪的泄密。当天晚上，一个美联社的电传打

字员为了提高她打字的速度在一架空机器上练习。由于发生错误处理，她打过的打孔字条（发报机上用的），不小心地当“电讯”发出，而且发在晚间发布的苏联战报新闻之前。火急电讯发出后三十秒钟，即作了更正。但是，电文毕竟是发出去了。

在梅耶，开始确有点惊慌，之后他有卡那里斯这张王牌作为依靠，现在他是又疲倦又高兴。黎明的来临以及沿着前线的持续平安无事足以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现在正是无事可做静候重大消息，等待电文的后半部分。它随时都可能来临。

正当梅耶定下来安安静静等待的时候，一百二十五英里外，第二集团军的总司令还准备动身回德国去。早上七点，一位陆军元帅的专车——隆美尔坐在司机旁座位上，穿过村庄，然后向左一拐上了开往巴黎的公路。在这样一个特别阴郁的6月4日的清晨离开拉罗什居扬，对于隆美尔来说可能是合适的。这趟旅行选择的时机是不可能再好的了。坐位上放着一只纸板盒，里面放着一双手工精制的灰色小山羊皮鞋，尺码是五号半，这是隆美尔送给他妻子的。他所以要在星期二赶回去和妻子在一起是有特殊原因的也是合乎人情的，因为6月6日（星期二）是他妻子的生日。

在英国，现在正是6月4日早上8点钟（英国的夏季时间和德国的中央时间时差一小时）。在靠近朴次茅斯的一个下过雨的树林中有一辆汽车拖车住房，盟军最高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经过通宵的工作现在正睡着了。

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司令员们已经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情来保证用最少的生命代价使得这次登陆战有一切机会取得胜利。可是，现在，经过了好几年的军事和政治方面的计划，“霸王行动”——这次盟军欧洲登陆战的秘密代号——却在听候着老天爷——气候的摆布。天气很坏。艾森豪威尔所能做的就是等待和期望天气条件

能有所好转。不过直到6月4日(星期天)这一天,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要作出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究竟是马上就动手还是推迟进攻时间。

5月17日,艾森豪威尔曾经为盟军欧洲登陆战发动日选择过三个日子:6月5日、6日或7日。气象研究报告表明如果要决定在诺曼第登陆的时间,必须考虑两个极为重要的气候条件:晚上月亮要出得晚,另外,在黎明后,潮水就要落。

因为伞兵和滑翔机载步兵在发起攻击时需要有点月光。但是他们在发动突然袭击又需要在黑暗中进行直到抵达降落地区。因此他们要选择月亮在下半夜才升起的日子。

而从海上来的登陆部队,他们需要潮水退落得低到足以暴露隆美尔设置的海滩障碍物时才能行动。因此这次整个登陆的时间安排要以这个低潮时间为依归。使气象研究更为复杂的是,在这一天的后半截,当第二批部队登陆时,也需要低潮——而落潮的时间得在夜幕降落以前。

月光和潮水这两个难办的因素成了艾森豪威尔的两大负担。光潮水这个问题就使一个月中只有六天能发动进攻,而这六天里又至少有三天是没有月亮的。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还需要有其他许多因素。第一,所有兵种都要较长的白日时光和较好的能见度。他们需要光线来辨认海滩;来让海军和空军易于寻找目标,另外,当无数舰船几乎首尾相接(在塞纳河河湾里)开始行动时可以减少相撞的可能性。第二,需要大海风平浪静。大风大浪可能使舰队遭受灾难,除此之外,晕船病可以使兵士在没有登陆之前就不行了。第三,要有点向海岸方向吹的风,它可以驱散烟雾,使靶的不致模糊不清。再有,最后一点,盟国在登陆以后还需要三天时间来迅速搞好人员和物资的集结。

在选择登陆战发动的日子时,艾森豪威尔原先选中的是6月

5日。现在在6月4日星期日早晨5点钟——正是隆美尔在拉罗什居扬起床的时候,艾森豪威尔作了一个命运攸关的决定:由于天气条件不好,盟军对欧洲的登陆战将推迟二十四小时。如果天气情况有好转,发动登陆战的日子将确定为6月6日,星期二。

6月4日晚上9点半钟,艾森豪威尔的高级指挥员和他们的参谋人员集中在绍恩维克大厦图书馆里开会。一小群一小群的人们散立在屋子各个地方小声议论着。靠近火炉边的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瓦尔特·贝特尔·史密斯少将,他正同抽着烟斗的盟军最高副司令、空军上将阿瑟·特德爵士交谈。坐在一边的是性情暴躁的盟军海军司令、上将贝特拉姆·赖姆塞爵士,他身旁的是盟军空军司令、上将杜拉福特·莱赫马洛莱爵士。据后来史密斯将军回忆,当时只有一位将军没有穿正式的军装,他就是脾气急躁的伯纳德·洛·蒙哥马利。蒙哥马利负责整个登陆战的进攻行动,他穿着一件经常穿着的灯蕊绒裤子和紧领子厚运动衫。就是这个人,只要艾森豪威尔发布命令后,他就要把命令变成登陆行动。现在这些将领和高级参谋人员一共十二个人守在这所屋子里,等候着在9点半开始的一次决策性会议。

9点半整,图书馆的门开了。艾森豪威尔穿着他那整齐的暗绿色作战服装迈进了房间里来。不再需要有什么开场白,每个人都知道即将作出的决议具有多大的严肃性。几乎在此同时,三位负责“霸王行动”的气象学家,在他们的头头、皇家空军斯苔琪上校带领下走进了房间。当斯苔琪上校开始汇报时,全场静悄悄地倾听。他很快地简要汇报了过去二十四小时的气象概况,然后他低声地说:“先生们,形势将会有某些迅速而意外的发展……”。所有人的眼睛都盯住了斯苔琪,当他给面色焦急的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司令员们叙说存在着一线希望之光的时候。

他报告说:根据新的气象报告,英吉利海峡地区在未来的几小

时之内气候将有变化，在盟军登陆地区天气将逐渐转晴。这种好转的情况将会在第二天整天内持续下去一直到6月6日的早晨。这之后，天气又将变得恶劣。在这个好转过程中，风势将减弱，天气也会晴朗。这个情况，至少可以保证让轰炸机在5日晚以及6日整个早晨进行活动。到6日中午，云层将要越积越厚，天气又将转阴沉。总而言之，艾森豪威尔听到的是，真正可以利用的好天气时间是不多的，甚至还不能满足最低的时间要求，因为天气转好的时间只有二十四小时多一点。

艾森豪威尔和他的指挥员们仔细考虑了十五分钟。海军上将赖姆塞强调作出决定的紧迫性。如果“霸王行动”要在星期二发动的话，那必须在一个半小时之内立即向库克少将指挥下的攻击“奥马哈”和“犹他”（两个代号）的海滩地区的美国特遣部队发布命令。

艾森豪威尔一个一个地向他的将军们征求意见。史密斯将军认为，进攻应当在6日发动，虽然它看来有点冒险，但是冒这种风险是值得的。特德和莱赫马洛莱两个担心预报中云层厚度可能会使空军行动不灵。这可能意味着，登陆战将在不能取得足够的空军支援下进行，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危险的”。蒙哥马利坚持他原来作出的5日晚之前发动的进攻推迟二十四小时的决议。他说：“我的意思是——干”。现在轮到艾克（艾森豪威尔的呢称），由他来拍板决定的时候终于来到了。当艾森豪威尔掂量着各种可能性时，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当史密斯将军注视着这一切时，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是：这位盟军最高总司令一个人“孤零零地、与人隔绝地”坐在桌子一端，两手在胸前紧握着，低着头看着桌子。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接着，艾森豪威尔面容紧张，抬头仰望，并宣布了他的决定。他说得很慢：“我积极主张，我们必须发布进攻命令……我并不喜欢如此决定，但事已如此……我看不出我们还能改做什

么样的别的决定。”

说完，他站了起来。他看来有点疲倦，但是紧张的神色已经有所消失。盟军欧战登陆发动日将是6月6日，星期二。

当夜幕降临，在英国的所有登陆部队仍在继续待命之中。经过许多个月的紧张训练，他们已随时作好进攻的准备。行动时间的推迟，使他们焦躁不安。他们还不知道离开登陆战的发动时间只有二十六小时了。现在要往下透露进攻消息好象时间还是早了一点。因此，在这个风雨的星期天夜晚，人们在孤寂、焦灼和暗中害怕的心情中静静地等待着，等待某种事情或任何事情的发生。他们做着世界上任何人在这种环境下都会做的事情：想着家、妻子、孩子和心上人。而每个人都在议论着即将来临的战斗。海滩上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是不是登陆会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出生入死？谁也想象不出欧洲登陆战发动日具体将会是什么样子，当时间一小时一小时消逝时，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想法在准备着。

1944年6月5日（星期一），对德国人来说，那天是平静而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情。巴黎的天气坏得厉害。在德国空军总部，气象负责人、上校教授沃尔特·斯迪拜告诉参谋部的官员，他们可以轻轻松松。因为他怀疑在这样的天气里盟军空军是否还能进行活动。德国防空战斗部队士兵甚至立即接到命令可以不必值勤。

接着斯迪拜把情报向圣·吉尔玛的冯·朗斯代茨总部通报，朗斯代茨也象平日一样睡得很晚。直到中午之前，他才同他的参谋长会面，并且批准了参谋部搞的“盟军意图估计”报告，准备送往希特勒总部。

这是又一份典型的判断错误的报告。它说：“他们有步骤地、明显地增加空袭，表明敌人登陆的准备工作已到达高度的成熟。可能登陆的地点仍然是从荷兰的斯凯尔特到诺曼第之间。在北面的布列塔尼前线，也有可能包括在内。……（但是）……敌人究竟将在

这整个战线区的那一部分突破，至今仍是难以预测的。敌人在敦克尔刻到第厄普之间进行了集中的轰炸，可能意味着盟军将在这一地区附近登陆。……（但是）……我们看不出登陆将会迫在眉睫。”

在处理完这种模棱两可的估计之后——这个估计涉及几乎八百英里的防线。当晚冯·郎斯代茨同他的年轻的中尉儿子一同去了元帅最喜欢的“考·哈迪”饭店。这家饭店在附近地区的邦奇瓦尔，那是中午1点钟刚刚过几分钟，离开盟军登陆战发动时间只有十二个小时了。

对各个环节上的德国指挥人员来说，天气的持续恶化似乎是一副镇静剂。许多部队的总部都十分相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盟军不会进攻。他们的理由是根据他们对盟军在北非、意大利和西西里地区登陆时天气情况的研究，经过仔细分析而得出来的。尽管情况千变万化，但是气象专家们注意到：盟军决不随便进行登陆战，除非能够确保有个好天气——特别是需要掩护性的空中行动时。对于德国人那种刻板的头脑来讲，这条规律决不会有所背离：天气必须对劲，否则盟军决不发动进攻。而现在的天气还是不对劲的时候。

在拉罗什居扬的隆美尔总部里，一切工作就象他在时那样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不过他的参谋长，汉斯·斯派达尔少将认为现在应该安排一个小小的午餐宴会。他邀请来了几位宾客，其中有恩斯特·温盖尔，一位哲学家和作家。斯派达尔是个知识分子，他正期待着这个宴会。他希望在这次宴会上能讨论一个他喜爱的题目：法国文学。同时，他们还要讨论其他一个问题：温盖尔起草的一份长达二十页的手稿。这份手稿他偷偷地送给了隆美尔和斯派达尔。隆美尔和斯派达尔对这份文件有着强烈的信念，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关于如何实现和平的计划——在把希特勒或是由一个德国法庭审判或是加以暗杀之后。

在圣·洛安的德国第八十四军团的总部，情报官员弗烈德里希·海因少校，正在为这个军的指挥员们安排一次庆祝会，这个会是为军长埃里希·麦克斯举行的，因为6月6日正是他的生日。他们想不经事先通知而在午夜突然举行这个生日庆祝会。因为麦克斯将在天亮前要到布列塔尼的雷恩去。在那里他和在诺曼第的其他高级指挥官一起参加将于星期二早晨开始的一次大规模沙盘作战演习。大家都认为这种“战争游戏”会很有意思：它将研究对付一场假想在诺曼第会发生的理论上的“登陆入侵”。

这个“战争游戏”使第七军的参谋长马克思·帕姆塞尔准将大大发愁。他的在诺曼第和瑟堡半岛的高级指挥员们都将将在同一时间内离开他们的指挥部，已是够糟糕的了。但是如果他们在外地过夜，情况则可能会变得危险。雷恩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是够遥远的。帕姆塞尔担心有些人可能会在天亮之前离开前线。他相信，如果盟军入侵真的在诺曼第发生，进攻会在天一亮就展开。他决定向那些去参加“战争游戏”的人发出警告，他用电传送出了他的这条命令：“凡是计划去参加‘战争游戏’的指挥将领和其他人员不得在6月6日破晓以前首途雷恩，特此提请注意。”然而这份电报发得太晚了，有些人已经动身走了。

就这样，在这场战斗打响的前夕，高级指挥官一个一个地都离开了前线。他们也许都是有理由的，然而这却好似是神秘莫测的命运在冥冥之中安排他们离开的。隆美尔回德国去了。第二集团军作战部指挥官汉斯·乔治·冯坦布霍夫上校也在德国。防卫瑟堡半岛另一面的第二四三师师长海因茨·赫尔·米希少将都到雷恩去了。到雷恩去参加“战争游戏”演习的还有第七〇九师的卡尔·冯·施里本少将。致于刚开进诺曼第的精锐的第91空降师威廉·法雷准将则准备要去雷恩。还有冯·朗斯代茨的情报官员威廉·梅耶·迪特令上校请假外出。有一个师的参谋长和他的法国

情妇出去打猎去了。

〔这里顺便提一下，在盟军欧洲登陆战发动之后，在法国前线发生这样多起同时离开战斗岗位的情况，使德国深为震惊。后来德国人曾经要求发起一次调查，看看这里面是不是有英国的间谍分子在捣鬼。然而事实是，希特勒他自己也并不比他的将军们对这个登陆战的伟大日子有更多的思想准备。元首就在他那个巴伐利亚的贝希特斯加登休养胜地。希特勒每天很晚起床，通常在中午召开他的军事会议，然后到下午4时吃午饭。除了他的情妇伊芙·布朗以外，还有一些显要权贵和他们的妻子同希特勒在一起。希特勒这个素食者会用他吃饭时经常说的话向女士们谈论他不吃肉食的吃饭习惯：“大象是最强大的动物，它也是耐不得肉食的。”吃饭以后，大伙一块到花园里，在那里元首啜饮着花茶。6点、7点之间，希特勒小睡一会儿。晚上11点再召开一次军事会议。在午夜之前，他又把那些夫人、女士们再请回来共同聆听一两个小时的华格纳、雷哈尔和斯特劳斯音乐。〕

在这个当口，当德国负责防守滩头阵地的军官几乎散在欧洲各个地方的时候，德国最高司令部决定把驻在法国的最后几个德国空军中队调到远离诺曼第海岸的地方去。那些飞行员们都被这个命令吓呆了。这一撤退的主要理由是要这些中队来保卫第三帝国本土。因为德国本土最近好几个月来一直处于盟国日夜二十四小时不断增长的强烈轰炸之下。在这种情况下，最高司令部认为要把这些重要的飞机搁在法国经常处于暴露状态下的机场，遭受盟国战斗机和轰炸机的摧毁，看来是没有道理的。希特勒曾经答应过他的将军们，如果盟军进行登陆，德国空军将出动一千架飞机来轰炸登陆的海滩。现在这样一来，这种计划完全成了泡影。6月4日那一天在整个法国，纳粹只有一百八十三架日间飞行的飞机，其中一百六十架飞机是可用的。而这一百六十架飞机中，一个拥有

一百二十四架飞机的联队——第 26 战斗机联队，就在当天下午得到命令调离海岸。

在整个法国翘首期望和等待盟国登陆的千百万人当中，真正知道盟国登陆战即将发动的人不过十来个。他们显得十分镇静，不露声色地照旧干着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工作需要他们这样做，因为这些人都是法国地下抵抗运动的领袖。

他们大多数人都隐藏在巴黎，从那里指挥着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秘密组织。这些组织的领导人彼此并不认识而只知道别人的秘密代号。这个小组在干的事，别的抵抗小组也完全不知道。

在过去的时日里，这些抵抗组织的高级指挥人从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中收到了上百件暗号电文指令。其中有一个就是范尔拉尼诗集的开头一句。然而，对整个法国抵抗组织来说，真正的行动指示只有在盟军命令按事先安排好的破坏计划付诸实施时才出现。如果收到两个特定的信息将作为发动进攻的信号，一个是：“苏伊士天气酷热”，那就意味着要破坏铁路和铁路车辆；第二个是“骰子都在桌上”，那就是切断敌人的电话线和通讯电缆线。在这个星期一的晚上，也就是预定的盟军登陆战发动日的前夕，英国广播公司在下午 6 点半钟广播了一条电文说：“骰子都在桌上……拿破仑的帽子在拳击场……箭未能穿过”，而另一暗号也在几分钟后广播了。

行动命令广播之后，各个顶头领导人立即把消息悄悄地传达给每一个抵抗小组。事先，每个单位都已安排了各自的任务，所以谁都清楚地知道自己到时候该怎么去干。例如，在卡昂地方的车站站长艾伯特·奥吉和他那个小组人员是负责破坏场上的水泵设备，搞坏机车的蒸汽喷管。在伊希纳附近的喷泉广场的一家咖啡店老板，他的任务是要卡断诺曼第的通讯联络，他那小队四十个人

就是大量地切断诺曼第通往瑟堡的电话线。伊芙司·格雷史琳是瑟堡的一个杂货商，他的那个小组的任务是最艰巨的，他和他的小队要炸毁通往瑟堡、圣洛和巴黎的铁路网。在盟军将要登陆的海岸地区，从布列塔尼直到比利时边境，所有的地下组织人员都已做好了准备。

晚上快9点的时候，法国的海岸外域出现了十几艘小船。它们沿着地平线悄悄地向前移动，他们离岸边越来越近，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诺曼第的房屋了。这些船只来回划动丝毫未惊动敌人直到完成他们的任务后才返回。他们是英国的一支扫雷部队，正在为从未有过如此集结的最强大舰队充当开路先锋。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英吉利海峡，那里密密麻麻的舰只，迎着灰白色的海浪直指希特勒占领的欧洲——自由世界的威力和狂怒终于爆发了。这些舰只一排又一排地、威武地、以压倒之势向前疾驰而去。二千七百二十七艘各种类型的军舰分成十路大军，排成二十英里宽，浩浩荡荡地向对岸开去。这里有新的快速攻击运输艇、慢速船身有锈斑的货轮、远洋航轮、救护船、饱经风霜的油船、海岸航轮以及一群群忙忙碌碌的拖船。还有数不清的浅水登陆艇方队——一些较大的颠簸着的船只，有的几乎有三百五十英尺长。这类船只以及其他重型运输舰，都装载了小型的、可用于进攻海滩战斗的登陆艇，总共有二千五百只以上。

行进在特遣舰队之前的是扫雷部队，还有海岸保卫快艇、路标布放艇和摩托快艇。防御敌人空袭用的阻塞气球在船只上空飘荡。一架又一架战斗机在云层下穿梭飞行。在这个庞大无比的大舰队上面有着大量的登陆部队、大炮、坦克、摩托车和供应品。它们由七百多艘战斗舰在四周保护着，摆开了令人生畏的阵势。

舰只中有美国“奥古斯塔”重型巡洋舰，这是库克海军少将的旗舰，他率领着美国的一支特遣舰队——二十一艘护卫舰开往代

号为“奥马哈”和“犹他”的海岸。紧挨护航舰雄伟壮观航行着的是飘扬着各色战旗的战列舰。英国军舰“拉米利斯”号和“华尔斯派迪”号；美国军舰“塔克赛斯”号，“阿肯色”号以及那艘令人骄傲的“内华达”号——它在珍珠港曾被日本人炸沉并被认为是“呜呼哀哉”了的。

率领着三十八艘英国与加拿大护卫舰开往代号为“军刀”、“朱诺神”和“黄金”海岸地区的舰队的是英国巡洋舰“锡拉号”，它是曾经追袭过德国著名战列舰“俾斯麦”号的海军少将菲利普·维恩爵士的旗舰。“锡拉号”旁边是英国最有名的巡洋舰——英国的“阿约克斯”。它是追猎德国“格拉夫斯比号”，并把它击沉在蒙得维的亚港内的三艘军舰之一。此外，还有好多身经百战的包括美国、英、法国的著名巡洋舰，总共有二十二艘之多。

井井有条地航行在护航队的边缘的还有各种海岸炮舰、轻型巡洋舰，强有力的炮艇——象荷兰的“梭思巴”号，反潜巡逻艇，快速鱼雷快艇以及到处出现的神气的驱逐舰。除了英美的驱逐舰队外，还有加拿大的、挪威的，甚至“自由波兰”武装力量也有一份贡献。

这支庞大而长长的舰队缓慢而沉重地驶出英吉利海峡，它是以从未有过的以分钟计算而错开的方式运行的。无数的船只从英国港口出发，分成两路，然后在怀特岛南端集中。从那里再整队随着战斗部队向指定的五个代号海岸目标地区之一进发。船舰集中的地方人们取了个浑名叫“匹克迪里广场”（伦敦繁华区的一个广场，从那里向四面八方辐射出许多街道）。从这个“广场”，护航队沿着设有浮标标记的多航道直向法国开去。将到诺曼第时，舰只就象是公路网似，共沿着五路，每路两列，共排成十行直指对岸。每一路两列船队，一列快速前进，一列慢速前进。在这两列航队的前沿紧挨着扫雷艇、战舰和巡洋舰的后边，是指挥舰——五艘攻击型运输舰上矗立着密密满满的雷达和无线电天线。这些浮动的指挥

所是这次登陆战的神经中枢。

海上到处是船只。对于那些在船上的人们来说，这个历史上空前壮举的大舰队是他们从未见过的“印象最深而又最难忘的宏伟场面。”尽管前面有艰难和危险，但是对于士兵们来说，能终于走上征途还是不错的。人们心头还免不了有些紧张，不过某些不安的感觉已经消失。现在每个人就是想搞好自己的任务并把它一下完成。在登陆艇和运输船上的人正在写最后一分钟的信函或没完没了地玩纸牌游戏或者闲聊。二十九师的汤姆斯·达拉斯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随军牧师们负担起了象政府出售公地局一样的任务，尽其所知地说明登陆地点情况。”

许多战士在海峡上还没待多久，就花了不少个小时担心自己会送命。因此心急如焚，恨不得立时到达海滩。晕船病就象瘟疫那样传遍了五十九艘护卫舰，特别是在摇晃、颠簸得十分厉害的登陆艇上。每个人都备有防止晕船的药片。还备有一种以典型的军人办事彻底性列在登船携带物品清单上的用具：“袋子，呕吐用，第一号”。

有些人企图用读书来打发时间——都是一些有点古怪或引人好奇的书，极少有与他们当前所处环境有关的书籍。在英国皇家运输舰“帝国铁砧”号上第一师的随军牧师劳伦斯·依·迪雷发现一位英国海军军官正在诵读贺拉斯用拉丁文写的颂歌，这使他感到惊讶。迪雷自己是应该随16步兵团在“奥马哈”海滩第一批登陆的，他在晚上阅读着西蒙的《米开朗基罗传记》。就在邻近的一架登陆艇上加拿大的一位上尉——詹姆斯·道格拉斯·季兰，打开的是一本当夜对大家都有意义的书。为了安定他自己和另一位兄弟官员的情绪，他打开《圣经》诗篇第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我必不至缺乏……。”

现在是晚上10点15分刚过一点。德国第十五军反间谍活动

头子梅耶中校冲出了他的办公室。在他的手中捏着一张可能是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拦截到的最重要的一份电报。梅耶已经了解到盟军的登陆将在四十八小时内发动。他闯进了餐厅去，那里汉斯·冯·塞尔摩茨将军正在同他参谋长和其他两人玩桥牌。梅耶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将军！电文——第二部分……已经来了。”冯·塞尔摩茨将军思索了一会儿，然后发出了要十五军全军警戒的命令。

象其他伞兵一样，第八十二空降师的列兵阿瑟·勃，“荷兰”舒尔茨已经作好了战斗准备，正在机场上等待着命令。他穿上了伞兵服，携带着降落伞——还未系好，而是在右臂上挂着。他的脸用木炭涂得黑黑的，头发剃得剩下一小络，在头顶中间往后梳，这一切使他看去象个印第安易洛魁人。在他的周围全是他的各种装备。突然有个人叫道：“得啦！我们开动了！”卡车开始把伞兵们送到待命出发的飞机旁边。

在整个英国，所有的盟军空降部队都登上了飞机和滑翔机。领航机已经出动。在纽勃兰的第一〇一空降师总部，艾森豪威尔将军和一小组军官以及四名记者亲自观望着第一批飞机起飞。艾克已经花了一个小时向飞行员们讲话。他对空降部队的作战活动要比其他各阶段的战斗担心得多。他的某些司令员们相信，空降部队的进攻可能会带来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伤亡。

艾森豪威尔站立着目送一架架飞机滑行上跑道又飞向天际，一架接着一架钻进了夜空。在机场上空它们盘旋着直到编成队形。艾森豪威尔两手深深地插在他的裤袋里凝视着黑暗的天空。当结队的飞机再次在机场上空轰鸣，然后向法国飞去的时候，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红色”缪勒看了一眼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的眼眶里充满着泪水。

几分钟之后，英吉利海峡上空，连进攻的舰队也听到了飞机的

轰鸣声。当一批又一批的机群一排接一排地飞过头顶的时候，轰鸣声越来越大了。这些编队的机群从上空飞过几乎化了一个多小时。这以后引擎的响声才听不见了。船只上的人们都静静地仰视夜空，没有一个人说出话来。当最后一队飞机飞过的时候，一种琥珀色的灯光通过云层向下面舰队闪闪发亮。人们看到灯光缓慢地发出了摩尔斯电码三点一横的信号：V，表示旗开得胜。

在诺曼第德国第七军各级指挥部门里，开始窃窃私语地传播着各种稀里糊涂和相互矛盾的消息，军官们到处都在对这些消息作出估量。但是他们听到的片言只语根据不足——这儿发现有人影，那儿有人放枪。在某个地方树上发现有降落伞挂着。这些都是“事出有因”的线索，但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究竟有多少人登陆——两个人还是二百个人？他们是不是从轰炸机里跳下来的机组人员？这到底是不是法国地下抵抗组织在发动进攻？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而且尽管已经得到了各种情报，但是无论是第七军总部或者在加莱海峡地区的第十五军总部，谁也不愿去发出警报，因为这种警报说不定事后又证明是错误的。于是，时间就这样倏然消逝。

虽然德国人还没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是盟军伞兵部队在瑟堡半岛的降落却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它表明盟军欧洲登陆行动已经开始。最早降落的部队是一百二十名美国士兵，他们是一批探路的先头部队。他们曾经在一所由詹姆斯·艾姆准将建立的特种学校里经受过训练。这位准将被人们称为“跳跃的詹姆”·加文，是第八十二空降师的副师长。这一百二十名美国士兵的任务是要划出一个五十英里方圆的降落区。这个降落区正好在代号“犹他”海岸登陆区的后面，他们开出了这个降落区以便为一个小时后美国伞兵的大规模空降战斗作准备。加文曾经对他们说过：“当你们在诺曼第空降时，你们只有一个朋友，就是上帝。”

这些先头部队在一开始就碰到不少困难。德国人的高射炮火十分猛烈。飞机不得不被迫偏离原定航线。这一百二十名先头部队中只有三十八个人降落在预定的目标地点。其他的人跳下来时离原定目标好几英里。在所有降落的地区，这些先头部队都力图弄清自己的方位。他们悄悄地从矮树丛向另一矮树丛移动，身上鼓鼓囊囊地背着枪支、手雷、电筒和荧光信号板，走向预定的集合地点。他们只有一个小时的准备时间，要为大规模美国伞兵空降划出降落地区范围。

离这里五十英里之外，在诺曼第战场的东头，六架飞机载着英国的先头部队和六架轰炸机后面拖着的滑翔机也开始飞临海岸上空。当开始跳伞的时候，天空中高射炮火密集，照明弹象恶魔吊灯似地比比皆是。

两名英国伞兵先头部队在黑暗中跳落到德国少将约瑟夫·拉赫尔脱指挥的第七一一师总部前面的草地上。当飞机飞过上空时，拉赫尔脱正在玩纸牌，他和其他军官们立即从屋里冲出来。这时正好看见这两个英国伞兵降落下来。两方面打了照面后是德国人还是两个英国人更为吃惊，这很难说。大为震惊的拉赫尔脱只能脱口而出大声问道：“你们从那儿来？”这两个英国人中有一个好象作为不速之客参加了鸡尾酒会似地尽力做出镇静的样子回答说：“十分抱歉，老头，我们掉到这儿来完全是出乎意外。”拉赫尔脱急急跑进他的总部拿起电话说：“给我接第十五军总部。”但是正当他在等着接通电话的当儿，这时，在英国和美国伞兵空降地区的信号灯不断地闪亮起来。有一些先头部队找到了他们的目标地区。

对大部分的空降兵来说，这次跳伞是他们永远难忘的一次经历。第一加拿大营的中尉理查德·海尔本回忆说，有一个伞兵跌落到一个花棚暖房的顶上，并且摔了下去“把那个地方的玻璃全砸得粉碎，发出了巨大的响声。”但是在玻璃破碎声还没全部停止以

前他就一溜烟地窜了出去。还有一个伞兵不前不后正好掉在一口井里，后来他用手拽着他的吊伞索两手不断交替地爬了上来，然后直奔集合地区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隆美尔在英国空降地区的反空降的预防措施还是搞得很有成效：他把台维斯山谷灌满了水，这些水和沼泽地是死亡的陷阱。有多少伞兵死在里面是永远无法知道的。据一些生还者讲，那个地方的沼泽是由无数水沟交叉而成一座水沟迷宫。这些水沟有七英尺深，四英尺宽，底下是陷人的泥浆。一个人要是跌进这些水沟，由于他扛着枪支和重装备，陷进去就休想再出来。好多人眼睁睁看着离开干的陆地只有几码远，但无法自拔而活活淹死了。

在圣·玛莱·埃格列，炸弹爆炸的声音十分逼近。这个市的市长（镇上的药剂师）阿历克山大·雷诺特可以感到大地也在震动。他把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赶进了他们自己造的临时性防空所里——起居间外一条用木料盖好的通道。这时正是12点10分。他所以记得这个时间，因为正是在这个时候，有人不断地、急促地敲打着大门。当雷诺特还没走到大门的当儿，他已看到了一副可怕的情景：广场对面的海朗先生的别墅正燃烧着熊熊的大火。站在门口的是镇上的消防队长。他戴着闪闪发亮、垂及两肩的黄铜头盔。他说：“我想这是被一颗偏离目标的燃烧弹击中而起火的。你能否请防区司令官下令撤销宵禁？我们需要人们来传递水桶”。市长快步跑到附近德国司令部并且获得同意撤销宵禁。然后他和别人一起去敲各家的门，召集居民来共同协助救火。不一会儿就有一百多男男女女排成两行，用手传递着水桶。有三十名武装德国警卫队围着他们。

就在这混乱中间，雷诺特记得传来了嗡嗡的飞机声，飞机向圣·玛莱·埃格列直飞过来。随着越来越响的引擎轰鸣声，地上射向机群的阵阵高射炮火声也越来越厉害。当飞机声响飞临人们

头上的时候，市里德国人的炮也开火了。飞机从交叉的火网中飞掠而过，一队又一队的飞机穿流不息地进入上空，这里进行了一场空前未有的大规模空降行动：八百八十二架飞机满载着美国第一〇一和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一万三千名士兵，全部降落在离圣·玛莱·埃格列都只有几英里的六个降落区里。

伞兵从飞机上跳落下来。天气正好刮着大风。二等兵约翰·施蒂尔发现他下面不是闪着亮光的降落区，而是朝着一个似乎着了火的市镇中心降落。然后他看见德国兵和法国老百姓发疯似地没命奔跑。在施蒂尔看来，好象许多人都抬起头来瞅着他。后来他被什么东西击中就象被一把刀子划了一下，一粒子弹打中了他的脚。接着施蒂尔发现一件事使他更是害怕。他的降落伞背带使他在空中摆动着，怎么也摆脱不及，他正朝着广场旁边的教堂塔尖上降落下去。施蒂尔的降落伞被线在教堂塔顶的一角上而他自己就无可如何地悬在半空中。他听到叫嚷声和咒骂声。他看到德国人和美国兵在广场上和街道上相互射击。施蒂尔发现离他几码远的地方，德国人的机枪手们正向他们所看到的一切目标扫射。于是他打定主意，这时唯一的活路就是装死。他被他的降落伞背带吊在那里，就象真的“死了”一样，据第八十二师的上尉维拉特·扬记得，正当他同德国人激烈交火中经过教堂时，“这个死人还一直挂在那座教堂上”。施蒂尔到最后被德国人俘虏之前一直在那里悬挂了两个小时。

盟军欧战登陆发动日第一天的战斗是由总共一万八千名美国的、英国的和加拿大的士兵在诺曼第战场的两侧侧翼进行的。在两翼中间有着五个登陆海岸地点（盟军把法国诺曼第登陆区分为五路，向五个地点进攻，它们的代号分别为犹他、奥马哈、黄金、仁诺和利剑），而在海岸线之外十二英里，正在稳步靠拢的是一支巨大的进攻力量——其间有着包括登陆艇在内的五千艘船舰的先头

部队。

这时候德国人仍然蒙在鼓里。这当然有很多原因，如天气；他们缺乏侦察机（虽然在前几个星期曾在登陆地区派来几架飞机，但 these 飞机都给盟军击落了）；他们的固执信念，认为盟军要登陆一定是加莱海峡，因为那里是离英国最近的法国海岸等等都起了作用。即使他们的雷达站在盟军发动进攻的当晚，也失去作用。这是由于盟军飞机沿海岸洒下大量金属小片形成的屏幕干扰。只有一个雷达站提出了报告，但报告认为它所见到的仅仅是“正常的海峡飞行”。

在第一批伞兵空降之后，过了两个小时，在诺曼第的德国指挥官才意识到可能正在发生某些重大的事情。在这个时候，一些零星的有关报告也陆续送来了。

当第八十四集团军司令官麦克斯将军电话铃响的时候，他仍然在欢度他的生日宴会呢。向麦克斯打电话的是七一六师师长威廉姆·里赫特少将。这个师正驻防在卡昂上边的海岸。这个报告说：“伞兵部队已在奥恩东面降落，……降落区似乎在布莱维里和雷恩维里附近……”。这是送到德国重要总部的第一个有关盟军进攻的正式报告。时间是清晨2点11分。

麦克斯这时立即打电话给第七军参谋长帕姆塞尔少将，帕姆塞尔听到消息马上把第七军指挥官弗列德里赫·道尔迈将军叫醒，他报告说：“将军，我认为盟军已开始登陆，你能否立即到司令部来？”正当帕姆塞尔在等着道尔迈的时候，第八十四集团军又再次发来报告：“在蒙特堡和麦考夫地方有伞兵降落……部队已投入战斗。”帕姆塞尔随即迅速向斯派达尔少将报警，他是不在岗位的隆美尔将军的参谋长。

这时在隆美尔的总部有一段时间表现为奇怪和混乱。现在警报和报告几乎从四面八方飞来。这些报告大都是不精确的，好多

是莫明其妙和自相矛盾的。在巴黎的德国空军总部宣布：“五十到六十架双引擎飞机正在飞近”瑟堡半岛，而伞兵已在“靠近卡昂地方”降落。而海军上将西奥多·克朗克总部则证实英国伞兵部队已降落，并且补充说空降部队中有的是稻草人。而德国空军总部在发出上述报告后不到几分钟又发来报告说：伞兵在贝叶附近空降。但是实际上在那个地方根本就没有伞兵。后来又有报告说，那些空降部队实际上是“伪装成伞兵的木偶。”

德国人的观察有部分正确的地方。盟军的确在诺曼第登陆地区南面投下了成百上千个扮作伞兵样子的橡皮假人。每一个橡皮人身上都有一串爆竹，碰到陆地就噼噼拍拍发出声音，给人以小武器作战的印象。有些橡皮人在奥马哈海滩登陆地区还真的起了作用。它们使麦克斯将军上了当，以为他的部队遭到了来自背后的伞兵部队的袭击。他还要派遣部队去进行阻击，而这些部队原来是留在海滩作战的。

在隆美尔的总部，人们拼命地估计着在他们地图上涌现出来一片表明敌人进攻的红点的意义。如果这真是盟军发动登陆战的话，他们的目标是不是诺曼第？这次进攻会不会是一次转移视线的行动，以吸引开对真正登陆战的注意力？经过对形势的一番讨论，德国官员作出了结论，这些结论根据事情发展的真相来看，简直是难以置信的。当冯·朗斯代茨总部的代理情报官员道顿巴赫少校向隆美尔总部打电话要他们报告情况时，人家告诉他说：“参谋长认为局势平静”，并且还说：“有一种可能性：传闻中的伞兵部队不过是跳伞逃命的轰炸机组人员而已。”

但是，德国第七军并不同意这样看法。在早晨3点钟，帕姆塞尔向斯派达尔报告，在瑟堡的海军情报站用声纳探测到在海岸外有盟军船只。但斯派达尔回答说：“事情仍然是局限在地区性的行动。目前还看不出是一次大规模的行动。”

这一天晚上，在诺曼第最被搞得晕头转向的要算是德国精锐的第二十一装甲师的一万六千二百名饱经风霜的士兵了。他们曾经是隆美尔著名的非洲兵团的成员，驻扎在卡昂——英国部队的重要目标——东南方二十五英里方圆的地区里，他们几乎把所有的小镇、村庄、森林都挤得满满的。这些人正处于登陆战战场的边缘。自从空袭警报鸣响以后，这些士兵一直守在各种坦克和汽车的旁边，引擎保持发动状态。可是，警报之后就没有接到任何命令或指示。尽管他们愈来愈恼怒，很不耐烦，他们继续在那里伫立待命。

这时已快天亮，一万八千名盟军空降部队正在向目标挺进。在五个小时战斗里，盟军空降部队已经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并切断了他们的通讯联络。现在他们占领了诺曼第登陆地区的两翼，在很大程度上已封锁住德国人的增援行动。

在英国部队活动地区，空降兵迅速牢固地控制着重要的卡昂桥梁和奥恩桥梁的两边阵地。这两座桥是英国空降部队在午夜发动的大胆进攻中占领的。伞兵部队现在占据了制高点，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卡昂。到拂晓时，德国占领的达瓦斯上边的五个渡口也将全部被盟军摧毁。这样分派给英军的任务已全部完成，只要他们能控制住各条交通干线，德军的反攻将被推迟或者被迫停止。

在登陆地区的另一端，美国部队也干得很出色。盟军空降部队已经登上(欧洲)大陆，并取得了初步立足点。现在他们正等待着海上部队的到来，以便同他们一起向希特勒占领的欧洲大陆进军。对于美国地面部队来说，现在离开特定的H时刻——即早上6点半钟，还有一小时四十五分钟。

士兵们处处都在等待着这个拂晓时辰的到来。但是谁也比不上德国人那样焦躁不安。从这时起，一些新的、预示不祥消息的电报象潮水一般涌进隆美尔和冯·朗斯代茨的总部。沿着整个法国的海岸，德国克朗克海军上将的海军情报站已经探测到船队的声

响了,已经不是象过去探测到一艘或两艘,而是一大批船舰。一个多小时的工夫,这种飞来的电报简直堆积如山。最后在清晨5点差一刻,这位坚持己见的帕姆塞尔少将给斯派达尔少将打电话直率地说道:“在维尔和奥恩入口处集中着大量的盟军船舰,敌人对诺曼第的登陆和发动大规模进攻已经迫在眉睫。”

冯·朗斯代茨元帅正在他的巴黎郊外的总部里,他已经作出了相同的结论。不过,他把迫在眼前的盟军对诺曼第的进攻,仍然视作是“声东击西的攻击。”但尽管如此,他还是迅速地采取了行动。他下令两个庞大的装甲师(第十二SS师和教导装甲师,它们正在巴黎附近作为后备部队待命),立即集合向海岸挺进。从技术上来说,这两个师没有希特勒的特别批准,任何人是不能调动的。但冯·朗斯代茨还是想试一下,因为他认为希特勒是不可能撤销这一命令的,他送呈了一份正式申请,要求立即调动这些后备部队。

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希特勒总部里,南巴伐利亚的天气显得温和异常,电报送到了约道尔将军的办公室里。约道尔现在正在睡大觉。他的参谋人员认为形势还未危急得非叫醒将军不可。电报晚一点看,问题不大。

离约道尔将军处三英里远,在那名叫“鹰巢”的地方,那里是希特勒在奥贝尔萨尔兹堡的山间别墅。元首和他的情妇伊芙也正在睡觉。希特勒象往常一样,清早4点钟刚刚睡下,而他的私人医生毛累尔博士给他吃了安眠药(现在没有安眠药希特勒几乎不能睡觉)。清晨5点左右,希特勒的海军助理卡尔·约恩古·冯·朴特卡美上将将被约道尔总部来的电话给吵醒了。那个打电话的人说:“在法国发生了某种登陆行动。”但是一直没有任何精确的消息。朴特卡美将军被告知:事实上一开始收到的电报内容是含糊不清的。”使朴特卡美作难的是,现在是不是要去通知元首?这位将军

和大家反复研究后决定不去吵醒希特勒。朴特卡美后来回忆此事时说：“现在没有多少消息可以告诉他的，而且我们担心要是现在这个时候去吵醒他，那就可能引起他无休止的歇斯底里紧张状态，这种情况常常使他作出一些最荒谬的决定。”他认为到早晨有充分的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希特勒。

在法国，隆美尔和冯·朗斯代茨总部的将军们正安坐等待着。他们已经向部队发出了警报，而且也调动了后备的装甲部队。现在下一步就要看盟军方面的了。谁也无法估计，即将来到的盟军的进攻将会是多大的规模。虽然已经有许多事实证实，诺曼第是个目标，但谁也不能肯定，主要的进攻战将会在何处发生。德国的将军们已经做了他们可能做的一切，其余的只能让那些守卫着海岸防卫工事的人去干了。可是在海岸边，那些第三帝国的士兵们对着大海眺望，他们怀疑这究竟是一次预防性的演习还是真的进攻终于来临了。

魏纳·普勒斯卡特少校在面临奥马哈海滩的碉堡里，从清晨1点钟以后就没有再听到上级的任何指示。他的电话整个夜晚没有响就是一个好征兆，这意味着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但是那些伞兵是怎么回事？那大队的飞机又是怎么回事？这时，普勒斯卡特少校又拿起他的双筒望远镜再慢慢向海岸水平线上又扫了一眼。一切似乎都平静。在他的后面站着他的两个军官轻轻地互相交谈着。普勒斯卡特也参加他们的谈话。他向他们说：“那儿仍然看不出有什么动静，我真不想再去理会了。”不过，他还是决定再作一次例行公事式的瞭望。他没精打采地把望远镜再次转向左边，他向海面慢慢地端详。他看到海湾的最中心位置时，望远镜停止转动了。他变得紧张，死盯住看个不停。

通过那迷漫正在消逝的薄雾，他看见水面上奇迹般地出现了大量的船只，各种各样的船只潇洒自若地或前或后列队运行着，就

好象他们在那里已经有好几个小时了。看来海面上有上千艘船只。这个魔鬼似的巨型舰队不知一下子是从何而降。普勒斯卡特呆若木鸡，目不转睛地盯住它，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好象他一生中还没有那样激动过。在这一瞬间，曾经是优秀军人的普勒斯卡特的精神世界开始崩溃了。他自己后来承认，就在这最初极短暂的时刻里，他已经知道，而且十分冷静、肯定地认为，这“就是德国末日的来临”。

他转向他的两个同僚，用一种奇怪、旁观者的口气简单地说：“这就是登陆战。你们自己看吧！”然后他拿起电话筒，要三五二师师部，找布洛克少校。他对布洛克说：“布洛克，在那里肯定有一万艘船”即使他这样说，但他自己知道他说的这些话一定令人难以置信。布洛克厉声说：“请别信口开河，普勒斯卡特。美国人同英国人加在一起也没有那么多船只，谁也没有那么多船只！”布洛克的不予置信使普勒斯卡特从迷惘中清醒过来。他突然叫喊说：“如果你不相信，到我这儿来你自己看看吧。这的确是奇怪之至！难以想象！”稍停一会布洛克说：“船只往那个方向开？”普勒斯卡特握着话筒向碉堡的孔眼外望了一望，然后回答说：“正朝着我开过来。”

这真是从来没有过的一个黎明！在暗沉而灰蒙蒙的光亮下，盟军的庞大舰队在诺曼第五个登陆海滩边缘集结就绪。海上尽是各种船只。从瑟堡半岛的“犹他”海滩边缘地区到靠近奥恩河口处的“利剑”海滩的整个海面上，无数战旗在风中飘荡。以天幕为背景展列着各式战舰：大型战列舰、令人畏惧的巡洋舰、轻便坦克似的驱逐舰。在它们的后边是硕大的指挥舰，天线就象树林一样升起在舰船上。接踵而来的是显得矮小和慢吞吞的满载士兵的运兵船和登陆艇。成群的浮动着的登陆艇载满兵士，环绕着带头

的运输舰，正等待着一声令下冲向海滩，他们将第一批登陆。

一艘又一艘的登陆艇不断地围绕着母舰来回地开动。那些在艇上湿漉漉、害着晕船病、可怜的兵士们将带头向诺曼第进攻。在滚滚浪潮中登上这些登陆艇是件复杂而危险的事。士兵们身上披挂着如此繁多的各式装备，走路都觉得艰难。他们带着橡皮救生衣、武器、野战背包、挖壕工具、防毒面具、急救包、刀子、饭盒、行军干粮以及额外数量的手榴弹、炸药和二百五十发子弹。有些士兵还背着他们从事某种任务而需要的特殊设备。有的人估计，当士兵们在甲板上蹒跚而行，准备上岸时，他们身上所带各种装备重量至少在三百磅左右。

进行首批攻击的第一梯队士兵，他们甚至看不到为薄雾所缭绕的诺曼第海岸。他们停留在离岸九英里之外。有些战舰已经同德国海岸炮群接上了火。不过这些开火都是远距离的，对第一批进攻的战士是不涉及个人安危的——不会直接向他们开火。而晕船仍然是他们最大的敌人。

停泊在美国部队登陆目标海岸附近的“奥古斯塔”旗舰上，渥玛·勃劳特雷中将用棉花堵住了耳朵，拿着双筒望远镜注视着登陆部队快速向海岸驶去的情况。他所率领的美国第一军正在坚定地长驱直入。勃劳特雷心里着实是担心。就在几小时之前，他得悉德国久战沙场的王牌师三五二师的一支精锐部队已经开入奥马哈海岸地区布好阵势。由于情报来得太晚，而没有能通知到攻击部队。现在，海军将开始发动大规模炮击，因此，勃劳特雷祈求这次炮击将会减轻敌人对进攻部队的压力，使他们的任务稍易些。现在的时间是清晨5点50分。英国舰队已经向他们的海岸目标地区开火了。整个登陆地区爆发出一片熊熊的烈火。当这一艘艘大船沿着各自事先指定的目标进攻的时候，震耳欲聋的轰雷似的声响不断地在诺曼第海岸之间回荡。

在奥马哈海岸目标区外，“得克萨斯”号和“阿肯色”号大型战舰，它们总共十门十四英寸口径、十二门十二英寸口径和十二门五英寸口径的大炮对准海岸霍克角上的德国炮兵阵地发射了六百多颗炮弹，为的是全力支援别动营向一百英尺高的峭壁逼近。在“利剑”、“仁诺”和“黄金”三个登陆海岸区，英国战舰“渥斯派脱”号和“雷密尼斯”号用它们的十五吋大炮对准德国强大的勒阿弗尔炮兵阵地和奥恩入口处的炮兵群倾泻了成吨的钢铁。而那些机动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则对准德国的掩体、水泥碉堡和多面堡发射出一串串连梭炮弹。

这时候，一种新的响声震动着整个舰队。开始声音还是很缓和、细微，有如一大群蜜蜂发出的嗡嗡声，慢慢这种声音变成了巨大的响声，一群轰炸机和战斗机出现了。他们从舰队的上空一直飞去，差不多翼梢碰着翼梢地飞。一队飞去又来一队，总共有一万一千架飞机。“烈女式”、“雷公式”、“野马式”等各种型号飞机，呼啸着飞越过登陆艇的上空。它们显然不考虑舰队发出的炮弹而向着登陆的海滩和岬地猛烈地扫射，然后直上云际之后又转回来进行第二次攻击。

在这些飞机上面交叉飞行的是第九空军师的 B—26 中型轰炸机。在这些飞机上边的，被云层遮住在视线以外的是英国皇家空军“兰卡斯脱”飞机和第八空军师的“堡垒式”和“解放式”飞机。这么多飞机就象整个天空已容纳不下它们了。

现在，登陆攻击艇所排成的长长的行列，离“奥马哈”和“犹他”海滩不到一英里了。对于第一批进攻中的美国部队来说，现在离开指定的 H 时间仅仅只有十五分钟了。

在头顶上就象张开了一把大的钢伞。舰队的大炮仍然在不停地轰击着。海岸上不断地响起隆隆的爆炸声，那是盟国空军正在那里进行地毯式轰炸。奇怪的是，德国人的“大西洋铁壁”的大炮

却一片沉寂。登陆的部队眼看海岸线已在前边，他们怀疑那里是不是有敌人的火力。许多人心里都认为，看来这是一场很方便的登陆。

登陆艇正在一步步向海岸靠近，只有五百码了，四百五十码了，敌人仍然没有开火。海浪掀起四、五英尺高，登陆攻击的船艇正循着波浪颠簸着前进，这时停止了向海岸的炮击，而向纵深地区的目标发射。当第一批登陆艇到离岸四百码的时候，德国人的大炮响了（这些炮火很少有人相信在经过盟国空军、舰队猛烈轰击后还会残存下来）。透过这些轰鸣声，有一种声音离得特别近，比其他声响更使人感到可怕，那就是机枪的子弹正哒哒地打在登陆艇的船头上。然后，大炮、迫击炮的炮弹象雨点般打过来。整个沿奥马哈海岸地区四英里长的范围内，德国的大炮象捣蒜似地向登陆艇发动攻击了。

这时正好是指定的 H 时间。

登陆部队冲上了“奥马哈”海滩——这些步伐沉重，外形臃肿的战士们是不会有人羡慕他们的。他们要把这个海滩称之为“血的奥马哈”。有些登陆艇沿着海岸想找一个敌人火力少一点的地方。有些则顽固地试图在指定地区登陆，可是那里火力十分猛，战士们不得不跳进艇侧海水里，可是马上又成为德国机枪瞄准的目标。

在奥马哈海滩地区，不幸的情况一个接着一个袭来。许多士兵发现他们的登陆地点搞错了。有的登陆艇着陆地点离开原来规定的地区相差两英里。而“陆海军特别爆破工程队”，他们主要任务是炸毁海滩上的障碍物，为登陆部队开辟道路，可是现在被打散——他们在关键时刻被召集拢来，比原定计划的时间是落后了。于是这些受挫的人到达那里，就在那里干起来。由于拚命赶时间，这个特别爆破工程队工作起来每一步都受到阻碍——步兵也乱插

在他们中间涉水，当 they 要炸掉障碍物时，士兵们却在障碍物后面躲藏着，而那些登陆艇被潮水冲击着，涌向海岸时几乎在他们头上淌了过去。

现在已到了清晨7点钟。第二梯队的登陆部队也来到了奥马哈海滩这个大流血场所。他们的遭遇是相同的——他们在敌人呈饱和状态的弹雨冲散中登岸。登陆艇归集到越来越多的废船残骸燃烧着的坟场，每一批登陆的船只都给浪潮作出血的贡献。沿着整个海岸几乎到处是这次登陆战中的各式各样的残骸和遗弃的东西。装备和供应品丢的满地都是。登陆艇变了形的残骸象古怪的野兽露出在水面上。燃烧着的坦克仍在冒着一股股螺旋形的黑烟。推土机在海滩障碍物之间仰天侧卧着。

就在这混乱、残杀、死亡的海岸上，第三登陆梯队又接踵而至——但一切又倏然停止下来。人们肩并肩地一个个躺在海滩上，躺在石头和岩峭之间。他们蹲在海滩障碍物后面，他们躲在死尸中间作掩蔽。他们被敌人的火力（原以为早该被压制住的）压住了，由于在错误地区登陆而感到迷惑。他们原先期望轰炸造成的弹坑可以作为掩体，但是事实上却没有这样的弹坑，这使他们感到怅惘。他们被周围的无数的死亡和破坏所震惊，一句话，这些战士在海滩上不寒而栗，似乎冻僵了。士兵们好象处于一种麻木状态之中。这种受惊当然不会持久。即使在这种时刻也还有少数人意识到停留在海滩上即意味着必然死亡，他们站立起来，马上行动。

离奥马哈海滩十英里远的“犹他”海滩，却是另一番景象。雷蒙特·巴顿少将率领的第四军正在蜂拥登陆，并迅速向纵深推进。第三梯队的登陆艇已经开进而一直没有遭到很大的抵抗。两栖坦克车在登陆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犹他海滩地区所以没有遭到很大的抵抗，还有一个原因，可以说是因祸得福。士兵们登陆的地点完全不是原来指定的地点。因为战舰炮火的浓烟造成了混

乱，一只领航船遭到一股强烈的水流冲击，结果它把登陆艇引向了离原来指定登陆地点往南一英里的地方上了岸。这次登陆地点不是对着第3号、第4号安全口的海滩——这是五条重要堤道中的两条，一〇一空降师即进攻这个地区，而整个滩头堡是横跨第2号安全口。

第四军不打算拿下计划中的进攻目标，他们想的是沿着一条堤道向纵深楔入。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现了德国兵，就把他们干掉，占据他们的据点。现在整个事情取决于神速行动——必须抢在敌人从登陆引起的惊慌中恢复过来之前。

在被称为“利剑”、“仁诺”和“黄金”的海滩地区，英国和加拿大的部队正在进行登陆。在从奥恩河入口处的圭里斯梯海姆到西边的勒海默尔村，整个十五英里海岸线上塞满了登陆船艇，而这些船艇正在倾吐出登陆士兵。海岸外几乎成了攻击艇的集合场，一批批船只几乎一艘叠在另一艘上似的。然而，整个来说，英国和加拿大部队在它们进攻时所遭遇到的抵抗要比美国在“奥马哈”所遭遇到的抵抗小得多。它们的发动进攻时刻要晚一些，英国战舰仍有很多时间对德国海岸防御工事进行猛烈的轰击，他们的士兵不断涌向岸上，并向纵深移动。英国和加拿大士兵取得了盟军欧洲登陆战发动日这一天作战中的最大进展，但他们却不会达到预定的主要目标——占领卡昂。德国精锐的第二十一装甲师将阻止他们取得诺曼第的这一重镇，在这里抗击英加军队达五个星期之久。

贝希特斯加登的清晨显得格外的平静和安谧。云雾低低地缠绕着四周的山头。在希特勒的别墅里一切都十分安静。可是在离这里两英里的元首的总部里，约道尔将军正开始钻研关于诺曼第登陆的最初的报告。他仍然认为情况还不是十分严重。

此时，负责作战计划的副参谋长瓦尔特·瓦利蒙脱将军打来

了电话，他报告说：“冯·朗斯代茨请求准予调动后备装甲部队。他希望把它及早调到登陆地区。”

据瓦利蒙脱回忆，当他说完后，有一段沉默的时间，约道尔在考虑着这一请求。然后约道尔问道：“你对这一切都那么肯定吗？”又说：“我还不能肯定这就是登陆。我想现在还不到调动后备部队的时候。……我们必须等情况明朗化以后再说。”

瓦利蒙脱对于约道尔这样咬文嚼字解释希特勒控制装甲师调动问题的命令感到震惊。他后来回忆说：“约道尔所作决定，在他看来，也是希特勒会作出的一个决定。”那时要不要调动后备装甲师的决定完全凭一个人——希特勒的兴致所定。可是在登陆日那一天，要挫败盟军全凭力量和速度，等作出决定，时间已经太晚了——没有八个半小时是作不出决定的。

而那个曾预见到这一情况并曾希望能和希特勒讨论这种形势的人，坐汽车不到一小时才到达贝希特斯加登。埃尔温·隆美尔元帅正在乌尔姆的海尔林根地方自己家里，这时的时间还是早上7点钟。在仔细保存下来的第二集团军的战时日记里并没有这样的记录：隆美尔元帅已被告知诺曼第登陆情况。

尽管诺曼第的登陆战已经打响了七个半小时，在朗斯代茨和隆美尔的总部里，还不能确切地估计出这次盟军进攻的意图何在。同整个前线的巨大通讯网被破坏了。伞兵部队干这一手干得很好。德国第七军的帕姆塞尔将军在打电话给隆美尔总部时说过这样的话：“我现在正在打的仗是征服者威廉打过的仗那样——只能凭耳闻目睹办事。我的军官们打电话来说，‘我听见声音和看见船舰了’，但他们不能给我说清楚形势的真实情况。”

可是在洛芒士的第七军总部军官们情绪高涨。因为看来精锐的三五二师正在奥马哈地区进行反击并阻击住了盟军的登陆。当收到有一份电报说第十五军提出要增援他们时，第七军总部负责

作战的官员谢绝了。他说：“我们不需要他们帮助。”

在隆美尔总部（拉罗什居扬的罗希福考特公爵的古老城堡）里也有着一种相同的乐观情绪。根据里奥特盖特·弗里堡上校回忆：“一般的印象认为在天黑时，盟军将全部被赶入大海。”隆美尔的海军顾问弗里德里赫·卢格中将也分享着这种胜利感。但是卢格将军注意到一件事情：这个公爵家族的管理人员正在走遍城堡从墙上取下无价之宝的“哥白林”挂毯。

这时，在英国正是上午9点半钟。艾森豪威尔将军整夜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等待着每一件送来的报告。现在，盟军在欧洲大陆上已经无疑地取得了一个立足点。尽管这个立足点还不够巩固。但是他已经没有必要把他二十四小时之前手写的一份电报发出去了。要是盟军进军遭受了挫败，他的电文里写道：“我们在瑟堡和勒阿弗尔地区的登陆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立足点，我已下令撤出这些部队。我作出此时此地进攻的决定是根据我们收到的最佳情报作为基础的。陆军士兵们、空军和海军的勇敢和忠于职守是堪称典范的。如果这次进攻意图存在着任何过失和缺点的话，完全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到9点33分，一个完全不同的消息向全世界宣布了，它是这样说的：“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指挥下，盟国的海军部队在强大空军的支援下，已于今晨输送大批盟军在法国北部海岸登陆。”

10点15分在海尔林根隆美尔的家里，电话铃响了。打电话来的是他的参谋长斯派达尔少将。他向隆美尔报告盟军登陆的简要情况。这是关于登陆的第一次完整的汇报。隆美尔听着电话，心情不胜沮丧。

这不再是一种“第厄普式袭击”。这是他长久以来一直在等待的一天，也就是他曾经说过的这将是“最长的一天”。现在对隆美尔这个“现实主义者”来说，事情已很清楚了，尽管前面还会有好几

个月的战斗，但是整个战争已经输定了。虽然现在上午还刚过去一半，但是“最长的一天”几乎已经过去了。由于命运的嘲弄，这位伟大的德国将军在战争决战时刻，却成了场外的旁观者。当斯派达尔报告完了后，隆美尔所能说的只是这样一句话：“我多么蠢！我多么蠢！”

隆美尔之死的真相

康泰司·沃尔德克

1940年5月，当德军横扫法国，隆美尔将军作为德军第七装甲师司令而一举成名。其时他正是四十九岁。两年后，他的非洲兵团一直打到离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仅仅七十英里地方。这时候他更是名震全球。正是那一年，希特勒晋升他为元帅。英国人称他是战争中最有才能的将领。

当英国第八军在非洲同隆美尔作战的时候，士兵们如果说“做一个隆美尔”的话，他们的意思就是要干一件漂亮的事情。隆美尔那种随机应变的狡诈和才能使他赢得了“沙漠之狐”的绰号。有一次，他受到英国部队的很大压力。结果他虚张声势，使英国以为他掌握着优势的兵力，不得不给吓跑了。他知道英国皇家空军每天都要飞临德国的防线上来照相。于是他命令每一辆可以利用的车辆，在整整两天晚上连续不停地开来开去。在沙漠的地形里，一辆卡车接着一辆卡车。据此拍出来的照片，再加上德国的宣传，使英国过高估计了德国的兵力，不得不最后撤退了。

隆美尔有着一一种品质，这种品质可以称之为男性军人美。这可以从他的军帽戴得趾高气扬上表现出来，也可以从他那种农民式的狡诈上表现出来。对他的部下来说，当人们在前线战场上看到他从他坦克炮塔里露出来时，简直象个战争之神。有一次，

当他的军官们处在敌人火力下时，他就冲着他们喊道：“待在跟我靠近的地方。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但是，到了战争的最后，他的身上确是发生了一些事情。

很少为人们了解的关于他的神秘的死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根据德国官方的说法是，他的死亡是由于盟军在诺曼第登陆时，他乘坐的指挥车在法国勒阿弗尔南边、靠近利瓦勒脱地方遭到盟军机枪扫射受了重伤而致命的。但是事情真相却要戏剧化的多，——而且更能说明问题。

这得要从隆美尔在非洲战役处于失败的时候讲起。那时，他第一次认识到了希特勒对于个别的人的生命那种根深蒂固的蔑视。隆美尔已经看到，由于德国缺乏汽油和武器装备，加之英国不断得到增援而力量增强，他的非洲战役的失败已经无可挽回。他要求希特勒下令撤退德国军队，这是唯一可以挽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的办法。可希特勒却激动地回答：“不胜利，就死亡！”隆美尔后来对别人冷冷地说：“我是既没有死亡，也没有胜利。”

在1943年5月德军在突尼斯投降之前，希特勒已经下令要隆美尔回到德国，并调到了元首身边工作。因此，隆美尔避免了和那次失败联系在一起。接下来好几个月的时间是不好过的。隆美尔一直没有加入纳粹党，从来也没有佩带金色党徽奖章。而且由于他专心致志于扩展自己的力量，因此，那时候对于纳粹的灭绝种族的屠杀，奴役劳动，集中营以及盖世太保在占领区干下的各种暴行，他都一概未予注意。现在他为纳粹党以德国人民名义所干的事情感到极度厌恶。他说：“我指挥的是一场干净的战争，但是他们（纳粹）却玷污了我的军服。”后来，当希特勒发布臭名昭彰的以十二比一的比例（即对方杀一人，纳粹将杀掉对方十二人）枪杀人质的命令时，隆美尔是把这个指令丢进废纸篓的少数几个德国指挥官之一。最后，使得隆美尔最为痛苦的是，他已认识到，希特勒不把德

国和他自己一起拖进黑暗的深渊，决不会善罢甘休。

为了给德国人民鼓起信心，同时也为了炫示盟国，希特勒任命隆美尔为诺曼第地区反登陆战的地面司令。但是，隆美尔将军很快预见到他所率领下的这支部队既缺乏兵源又缺乏物资给养，显然是无法击退一次全面的登陆战的。1944年4月，他曾经同驻法国的军事总督和德国反希特勒运动的领袖卡尔·海因列希·冯·斯梯尔纳盖尔将军交换过意见，讨论用什么办法，通过什么渠道立即停止在西线的战争，并推翻纳粹政权。

为了要取得比盟国宣布的无条件投降的政策多少好一点的结果，隆美尔希望瞒着希特勒向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提出和谈。和谈的基础就是从“西方墙”撤出德国军队。作为交换条件，盟国将立即停止轰炸德国的城市。而在东方战线，德国将在缩短战线情况下继续作战，主要将在罗马尼亚、利沃夫以及维斯杜拉河、梅梅尔一线作战，“以保卫西方的文明”。隆美尔建议，将由可靠的装甲师部队把希特勒抓起来并交由一个德国法庭进行审判。他倒不希望把希特勒立刻弄死，使希特勒反而成为一个烈士。

当盟军在诺曼第登陆成功之后，隆美尔向希特勒发出了一份最后通牒。在这个通牒里，他要求立即开始停战谈判。

1944年7月17日傍晚，隆美尔从前线回来，刚到达利瓦勒脱城郊外，突然，两架涂有英国标志的飞机直接向着他俯冲下来。一架飞机飞得离地面才几码距离，对准隆美尔坐的汽车的左半边大肆扫射。隆美尔被打得失去了知觉，并从车上摔了下来。当他正躺在大路上时，第二架飞机又俯冲下来向他开火。隆美尔受了重伤——颅骨折裂，太阳穴两处受伤，颊骨一处破裂，左眼受伤，脑震荡——医生们都怀疑他是否还能活。

这是对反纳粹阴谋的两次严重打击中的头一次。第二次打击发生在7月20日。按“范尔克列行动”，是一群德国军事领袖和反

纳粹的老百姓企图暗杀希特勒的阴谋(为了策划这一阴谋,隆美尔早期曾被斯梯尔纳盖尔拉入其中),结果在元首的普鲁士总部未能击中希特勒。炸弹爆炸时离希特勒才两米,总部毁了,炸伤了二十个人和炸死四人。而希特勒却奇迹般地逃脱了这次暗杀。纳粹对所有被查获的阴谋分子进行了报复。那些被抓的都给处决了。

到了夏末,隆美尔居然能很快地恢复了健康,只是左眼有部分麻痹,他象获得新生一样。10月14日,在靠近马尔姆的赫林根的别墅里,他起得很早,因为他要见他的十六岁的儿子曼弗莱德。他儿子由于得到军队里的一次短期休假即将回到家里。同天中午,隆美尔还要会见一个不那么受欢迎的客人。在那天的前一天晚上,有人打来电话通知隆美尔说,元首将派威廉·波格道夫将军来同他讨论有关他被“重新任命新职”的事情。隆美尔在吃早饭的时候对儿子说:“波格道夫的来到可能是个圈套。”

12点钟,波格道夫将军来到了。他是由欧内斯特·麦塞尔将军陪同前来的。隆美尔同他的妻子和儿子一起迎接了客人。他们还亲了隆美尔夫人的手。他们先说了一通秋天可爱的天气和每个人的健康——包括元帅的了不起的复元之类的客套话。然后,隆美尔夫人和儿子都退了出去。

1点钟过后,隆美尔上楼走进了他妻子的房间。隆美尔夫人看见她丈夫的脸色后惊惶地问:“出了什么事?”

隆美尔心不在焉地回答说:“在一刻钟以内,我将要死去”,他好象在细细品味着这句话的意义。

然后,他很快地告诉她:斯梯尔纳盖尔的口供(斯梯尔纳盖尔在一次自杀企图中仅仅伤害了眼睛,后来被绞死了)已经肯定无疑地说出了隆美尔也参加了7月20日的阴谋。现在希特勒给他两条路选择:要末立刻吃毒药自尽;要末送上人民的法庭审判。而且两位将军说得很明白,如果隆美尔坚持到法庭受审,他们将要对隆

美尔的妻子和儿子采取报复措施。如果隆美尔吃毒药自尽的话，他的家庭将得到宽恕，并能获得与一个元帅地位相当的荣誉和养老金。元首决定不向人民公布这样的事实：这样一位受人爱戴的将军竟参与了搞掉希特勒的阴谋，而且要向敌人求和。波格道夫还以一种残酷的精确周密性，帮着隆美尔计划他最后毒死自己的详细方案。当汽车到乌尔姆时，将会把毒药交给隆美尔，吃下去三秒钟内就会死去。他的尸体将交给在乌尔姆的一家医院。届时将向全世界发表一个文告，宣布由于在7月17日受伤后的副作用医治无效而死亡。

在这间二楼隆美尔夫人的房里，隆美尔把这个恶毒的计谋的详细情况告诉了其他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助手阿尔汀格上尉，还有是他的儿子曼弗莱德。然后他们三人一起下了楼。隆美尔让别人帮他穿上了大衣，再戴上了军帽，象平时一样地潇洒。曼弗莱德和阿尔汀格递给他手套和指挥棍。一切准备停当，他走出大门上了汽车。汽车里他的刽子手正在等着他。上车后，汽车就开走了。

翻遍第三帝国的编年史，没有一个场面比这更罪恶昭著地揭露出希特勒赖以兴旺的社会心理状态。这里说的不是那些可怜的犹太人孤立无助地落到了盖世太保手里的故事。这里是一位德国元帅堂而皇之地手握指挥杖，象征着德国军队的光荣，以机智才能名闻全球的将领。可是这么一位人物竟如此听从摆布，置自己于死地。

1点25分，波格道夫和麦塞尔将军把隆美尔放到了乌尔姆的一家医院里，这时他已经死了。主治大夫建议作一次尸体解剖，但波格道夫立刻回答说：“不要碰那个尸体，柏林已经安排了一切善后事宜。”

隆美尔坐上汽车以后究竟发生了什么细节，可能是一个永远

不会解开的秘密了。波格道夫后来也同希特勒一起在帝国总理府的地窖里消亡了。而麦塞尔同他的党卫军的司机后来在盟国提审时都坚持说，他们当时都被支使离开过一会儿。而等他们回到车里时，发现隆美尔已经死了。

10月18日举行了国葬仪式。许多纳粹大头子和高级军官都来参加，会上礼仪庄重肃穆。冯·朗斯代茨元帅代表希特勒致了悼词。隆美尔夫人脸色苍白，表情冷漠，她拒绝了朗斯代茨的搀扶。在这个装扮得似乎富有教养礼仪的薄薄面纱下，一种无名的紧张气氛好象要穿透这层伪装而爆炸开来。只有在场的少数几个人是心里明白的，他们参与了这场谋杀公案的最后一幕。

神风攻击队成员的死亡

前日本帝国海军上尉猪口力卫和指挥官

中岛正著，千速正隆和罗吉·比诺译

1944年10月17日，当日本人还占领着菲律宾的时候，一支美国部队在莱特湾入口处登陆了。甚至在这一日期之前，美国的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已经飞临从吕宋岛到棉兰老之间的许多目标的上空了。当时，日本的舰队在菲律宾海面的战斗中，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它的海空军力量急剧地衰落。人人都已意识到，只有出现意想不到的奇迹，才能把日本从灾难中拯救出来。

10月19日，当苍茫的暮色降临到吕宋岛马哈洛卡特田野的时候，一辆黑色轿车驶来停在日本二〇一空军大队指挥所的前面。海军上将大西泷次郎跨出了汽车。作为第一海军航空兵司令，他被人们看作是日本最有名的空战的先驱者。现在他正召集他的二〇一大队参谋部人员开会，并且对他们说：

“形势已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保卫菲律宾的成功与否，关系

到整个帝国的命运。在栗田海军上将率领下的一支海军部队正在进入莱特湾，并且在那里歼灭敌人的水面船只。第一海军航空兵已奉命支援栗田的海军部队。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破坏敌人的航空母舰，至少使它们一个星期不能发挥作用。但是，根据我们现在的力量要是还用普通的常规战争的办法，已经不能赢得胜利。我的意见是：“只有这样的办法才能制住敌人，那就是：用零式战斗机装满每枚二百五十公斤重的炸弹，向着敌人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俯冲撞击。”

当海军上将尖利的眼睛扫向这坐满听众的房间的时候，人们听了他的话好象触了电一样。事情十分明显，他这次来访的目的是要鼓励人们发动自杀性攻击。

当大西上将讲完之后，值勤的指挥官玉井中校要求允许他同空军中队的领导进行协商，因为这件事情实在太不一般了。不过他深信，他的大多数飞行员在听到这个计划后，是會把自己奉献出来作为火箭的。后来，他向上级报告说：“他们没有说什么。但是他们眼神却雄辩地告诉人们，他们是愿意为祖国去牺牲的。”

后来，决定指名由关之雄上尉来领导这次攻击。他是一个才能出众的、有个性的人，毕业于江田岛的海军学院。当玉井中校宣布这项指令时，关把身体微微向桌子前倾，用手支着头，闭着眼睛。这个年青的军官在离家之前刚刚结婚。除了握紧拳头之外，他有好几分钟一动也不动。然后，慢慢抬起他的头，轻轻往后理一理他的头发，用那清晰而平静的声音说道：“请一定派我来领头发动这一攻击。”

10月20日日出后不久，大西海军上将召集了二十四名神风攻击队——日本的自杀飞行队的名称——的飞行员，并且向他们作了讲话。他的声音由于充满感情而有点颤抖。他说：“日本面临着可怕的危机。拯救我们的国家已经不是那些部长们的力量所能

做到的，也不是总参谋部以及它的下属单位指挥官象我这样的人所能做到的。现在这责任已经由有为的青年，象你们这样的人担当起来了。”在结束讲话时，他的眼眶里满含着泪水，他说：“我请求你们尽最大力量，并祝贺你们成功。”

同时，招募神风攻击队飞行员的工作也在其它日本军事基地上进行着。在宿务，10月20日傍晚6点钟，所有的飞行员集合开会。指挥官说：“每个志愿参加‘特别攻击队’的人都要在一张纸上写上他的名字和职衔。把它放进一个信封，然后封起来。如果你不愿意当志愿队，你就在信封里放一张白纸。你们现在有三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去进行严肃的考虑。”到9点整，一个年长的海军中士飞机驾驶员把信封收集拢来，并把它交到了指挥部。在二十多名飞行员中只有两个人交了白纸。

10月25日。第一次成功的神风攻击队的进攻完成了。在南棉兰老的达沃地方，六架飞机在拂晓时起飞，结果至少破坏了三艘敌人的护航航空母舰。同天早上，关上尉从马哈洛卡特也领导了一次成功的攻击。

四架护航机中的一个飞行员提供了有关这一行动的报告：“在发现了敌人的一支舰队，计有四艘航空母舰和六艘其他船只之后，关上尉对准一艘航空母舰一头猛扎下去，他撞击成功了。他的同事也对着这同一艘舰只俯冲下去。舰上立即冒起大股的浓烟。另外两个飞行员也撞击成功。一架撞着一艘航空母舰，另一架撞中了一艘轻型巡洋舰。”

神风攻击队成功撞击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海军。而那一天一共有九十三架战斗机和五十七架轰炸机进行了常规的进攻，可是没有给敌人造成破坏。自杀攻击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大西上将深信，进一步进行这种非人道的战术是不可避免的。他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第二海军航空兵司令、海军中将福留，对他施加压力。

说：“除了竭尽全力进行这种特殊攻势外别无他法可以挽救我们。现在已是你的航空兵也采取这种战术的时候了。”

至此，神风攻击队的战术得到了充分的使用。年轻人自愿地参加“神风攻击队”，增添了它的力量。国内的增援力量源源不断，年青人都急切希望有机会向着敌人的兵舰俯冲撞击。

然而，所余时间不多了。莱特岛四周的形势变得一天天越来越无希望。由于敌人进攻的步伐不断的加强，使用这种自杀性攻击的密度和次数也越来越大和多。可是飞机的供应却越来越少。到了1月5日发动了从菲律宾起飞、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自杀性攻击。十五架战斗轰炸机在林加延湾撞击了敌人的进攻部队，破坏了一艘巡洋舰和四艘运输舰（原编者注：据美国海军统计，在林加延湾的战斗中，日本神风攻击队的攻击比日本自己估计的更为有效。破坏的不是一艘巡洋舰，而是两艘，同时还破坏了一艘护航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神风攻击队的威胁如此之大，以致美国航空母舰原定计划要在1月7日进攻台湾，后来不得不留下继续进攻吕宋岛。）

在丢失菲律宾之后，日本的失败一个比一个惨重。1945年敌人以强大的兵力于2月对硫黄岛，4月对冲绳岛的进攻，更使日本陷于死地。这种形势鼓动起日本把神风攻击队的战术运用到空前未有的程度，甚至一些教练机也被动员来作这种攻击。

现在又发明了一种新的自杀性武器。在轰炸机“母机”上还带上一支一千八百公斤的火箭。当发现目标以后，在有效距离内，发出火箭，同时自杀飞机飞行员俯冲撞向一艘敌舰。参加训练使用这种武器的飞行员们被称之为“神风攻击队”。不过盟国人员给它起了个外号叫做“笨弹”。

“笨弹”在4月12日盟军对冲绳岛大规模进攻时曾使用过。第一个使用这种火箭的飞行员在进行攻击时表现得十分冷静。在

不进行飞行的时候，他是低级官员宿舍的管理人。他在爬进“母机”轰炸机机舱前的最后一句话是：“请你好好照看我给宿舍定的一批新的稻草席子。”当飞向冲绳岛的时候，他平静地在机舱里打瞌睡，得被人唤醒以进行他走向永恒的飞行。

仅仅在冲绳岛的战役中，就有一千八百多次自杀飞行。到日本投降的时候，日本帝国海军里总共有二千五百一十九名士兵和军官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宣布立即停战之后几个小时，日本第五海军航空兵司令宇垣海军上将选择了他过去曾经下令让他的许多飞行员走向死亡的方式。他从自己的制服上摘下了他的军衔标章，对着他召集起来的军官和士兵们说：“我就要起飞到冲绳，向敌人进行冲撞攻击了。有愿意跟随我一起去的请举手。”结果举手的志愿人员比当时可能使用的飞机数目还多。最后十一架飞机起飞了。在这十一架中有七架其中包括宇垣上将的一架，用无线电报告说：“‘它们’正向目标冲去。”

那天黄昏，大西海军上将，他现在已经是在东京的海军部总参谋长了，写了一个条子：“献给我已去世部属的英灵。我为他们英勇的行动表示最大的感激。我将一死以向这些勇敢的人们和他们的家属表示歉意。”之后，他拔出一把武士刀刺进了自己的肚子。他拒绝急救医治，或“慈悲一击”（指为免除痛苦而把他击毙）。大西海军上将慢慢地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一直到第二天傍晚6点钟才死去。他决定去经受持久的痛苦，显然是为了赎罪——为了他在那种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最凶残的战术中所起的作用而赎罪。

同希姆莱进行交易的美国人

埃德温·马勒

在战争初期，斯德哥尔摩的埃力克·爱立克桑先生就被列入了盟国的黑名单，罪名是同敌人进行贸易，支援德国人的战争活动。盟国情报机关报告说，爱立克桑卖给德国人汽油，并定期到德国旅行。他还同德国盖世太保的高级官员关系亲密。

这一事件的揭露对于爱立克桑的家庭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爱立克桑的一些老朋友，全是强烈亲盟国的，现在在街上看到他走来时，都穿过马路避开他。他的老婆遭到人们的冷遇和排斥。虽然爱立克桑是个瑞典公民，但是他是生在美国纽约的布洛克林区，小时候在那里长大，毕业于康纳尔大学。他不断收到他的美国家里人写来的严厉批评他的信，然而这一切阻止不了他同德国人来往。

“红色”的爱立克桑是一个标准美国推销商的类型。他之所以做起石油生意，是因为这门生意令人兴奋，并且可以获得地位。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那些“石油帮”都是国际财团。你可能今年在上海碰到这个人，而明年在伦敦或德黑兰又碰见了。今年你可能同他进行无情的竞争，而明年你同他却是“风雨同舟”。美国人、英国人、荷兰人、德国人他们全都生活在一种富有冒险的赌博和交易之中，买卖的操纵超越了国界。爱立克桑变成了德士古石油公司在瑞典的经理。后来他成了瑞典公民，并且开始经营自己的公司，从美国进口各种石油产品。

战争爆发之后不久，他看到同德国人做生意是个发财的好机会。那时，德国有石油出口。如果有人认为盟国靠轰炸就可以大大影响德国的石油供应，那是十分荒谬的。因此，爱立克桑就同德

国人周旋起来。他加入了在斯德哥尔摩的德国商会，同他的老朋友们一个个地分手了。但是他同瑞典国王的侄子卡尔·贝尔纳多王子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爱立克桑了解到德国盖世太保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在石油买卖中是有着最后决定权的。希姆莱在瑞典有一个主要代表，名叫芬格尔先生，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因此爱立克桑就寄希望于这个人，对他作了大量拉拢的工作。芬格尔有个弱点，就是对皇室特别讨好。卡尔王子给爱立克桑同芬格尔之间搭了线，爱立克桑则不断培养感情。很快芬格尔先生成了爱立克桑乡下别墅的座上客。可是，另外一些德国大主顾却没有赏光——特别是德国公使馆的商务参赞路德维奇先生。他根本不喜欢爱立克桑先生。可是尽管路德维奇冷淡疏远，爱立克桑还是获得同意去德国访问，并且带有芬格尔和其他人替他写的介绍信。

在斯德哥尔摩郊外的波洛马机场上，飞往柏林的飞机暂时停航。瑞典警察命令爱立克桑离开飞机，并且粗鲁而又彻底地搜查了他和他的行李。可是没有发现任何罪证，于是不得不准许他登机启程。到了柏林，一辆官方的汽车把他送到了盖世太保总部。在那里他碰见了两个同他一起坐飞机来柏林的人，他们是盖世太保的间谍。他们有一致的看法：在波洛马机场上发生的意外事件是盟国的代理人干的。

爱立克桑同德国搞石油的人进行了接触，特别是在汉堡。在那里，他参观了炼油厂，同经理们谈了话，讨论了他要签定的合同的条件，同时还探望了一些他所熟知的“石油帮”人物。首先他看到有一位容克家族^①的人物，他曾经在英国上过几年学，有一段时间还同壳牌石油公司有过交往。爱立克桑希望和他做的生意保持

^① 容克是普鲁士德国贵族大地主家族。——译者

秘密，因此他同容克家族成员的会谈是秘而不宣的。另外他还同冯·斯蒂克尔先生进行了接触。他是一位石油银行家，是汉堡的一个古老家族。爱立克桑费了好大的心机竭力不让这两个人中的一个看见他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

当爱立克桑回到瑞典之后不久，德国的第一批石油就开始启运。也正是这个时候，盟国把他列入黑名单。他的老朋友全部跟他彻底断绝来往。有些人在饭店里一看见他进来马上站起来就离去。他的瑞典妻子也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她仍然是反纳粹的，但为了讨好她丈夫，她不能不款待她丈夫的那些新朋友。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爱立克桑又去德国进行了几次旅行，同时继续拉拢、讨好那些盖世太保朋友。他应邀到这些朋友家里作客，并且从瑞典给他们的太太带来了黄油、皮外套和其他礼物。他仍然做着生意，不过由于盟国对德国轰炸的升级，要从德国买到石油已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有一次，在他巡视了一家大的炼油厂之后，总经理请他留下来共进午餐。他犹豫了一下，但是很难推托。他们在总经理办公室里进餐。当宴会散席时已经快是午夜了。而刚过午夜后不久，盟国轰炸机来了。当他们结束了他们的谈判后，这家工厂已经不复存在了。盟国就在彼时彼地使爱立克桑同敌人的贸易完全趋于停顿。

盟国对德国石油设施的攻击产生了愈来愈多的效果。不过到1944年下半年，一些重要的工业还在继续开工。德国人对炸坏的工厂的修复工作要比盟国想象的迅速得多，而且，德国人把许多炼油厂隐藏得好好的，它们一点也没损坏。

1944年秋天，盟国的战争势力已经推向高潮——莱茵河地区战役。这时，爱立克桑如果要做更多的贸易，他必得加快速度。他长期来一直渴望对德国整个石油工业进行一次范围甚广的游览，现在时机到了。他认为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推销商得想法

见一见大头头——这次要见的大头：就是海因里希·希姆莱。

爱立克桑计划了一笔宏伟的“大生意”。这种大生意是所有强行推销的商人都会喜爱的。他建议在瑞典建造一座规模巨大的综合炼油厂，耗资五百万美元，由瑞典和德国两国合资援建。这个建议估计会吸引德国人。理由有二：一、这样可以使德国在一个中立国家获得石油的来源，而且不会遭到盟国的轰炸；二、如果德国失败了，它可以为纳粹资金存放在中立国找一条路子。

爱立克桑准备了一份计划书并把它交给了芬格尔，芬格尔看了大为高兴。在德国的纳粹大亨们也对此发生极大的兴趣。但是有一个人不同意，就是德国商务参赞路德维奇。他坚持认为爱立克桑的计划是假造的。路德维奇是外交部的人，他是属于里宾特洛甫（纳粹德国的外交部长）那个派系的。当战争继续进行着的时候，里宾特洛甫同盖世太保，也就是说同希姆莱的矛盾越来越大了，而希姆莱常常能够得手。因此在这种事情上，路德维奇被否定了。盖世太保认为爱立克桑是信得过的，他同希姆莱会见的道路畅通了。

那是1944年10月，爱立克桑又一次从波洛马机场乘飞机横越波罗的海的灰濛濛的海水和干燥的德国北方平原，降落在坦波尔霍夫机场。他被安顿在柏林未被盟国炸掉的一座最好的旅馆的一套房间里。早上，一辆大的黑色轿车载着盖世太保的警卫来接他。

在希姆莱的总部，这个盖世太保头子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说：“我们从芬格尔先生那里听到关于你的很多伟大的事情。”他们详细地讨论了炼油计划，以及爱立克桑有必要亲自去看看德国工厂的运行情况。然后他们又讨论了其他的事情。

突然，希姆莱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德国国防军入侵瑞典将会发生什么样情况？”

爱立克桑回答说：“瑞典人会拼死战斗”。

他心中琢磨，要给希姆莱留下较深印象，就不能表现得卑躬屈膝。他是对的。这次拜访的结果使他得到了一份特别证件，准许他到任何地方去看任何石油工业。德国人还给了他一辆汽车并分配给他好多汽油。

爱立克桑从科伦到布拉格游历了中欧。他巡视了洛伊纳、阿南道夫和哈雷所有的大工厂，同经理们谈话，看看他们正在干什么，还将计划搞些什么。就象一个推销商要在新地区开展工作那样，他得有个全貌图景，并且带着这些图景回到了瑞典。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驻斯德哥尔摩的公使馆为这个“红色”爱立克桑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午餐会，邀请了所有他的老朋友。许多人向他祝贺，敬了无数次的酒，他和他过去的亲戚朋友又融洽无间。

爱立克桑讲了事情的经过：当战争爆发后不久，一位盟国情报机构的代表如何来找他，爱立克桑如何同意去进行间谍活动，但是拒绝接受任何报酬。后来又是如何根据他的建议把他弄上了盟国的黑名单。而同他一起工作的卡尔·贝尔纳多王子又是如何成为为盟国服务的一名情报人员的。他还说，这些石油，他从德国运来的石油又是如何转运到英国石油公司，实际上被盟国用来打击了德国人。他如何给冯·斯蒂克尔以及其他联系人写了好多由他签名的信件，以便在盟国胜利后可以证明这些人也是秘密为盟国效劳的。而当时他写的每封这样的信又如何成为一把悬在他头上的利剑，因此每当他去德国访问时，老是担心得成夜睡不着觉，时时感到有人会来敲他的房门，那就意味着盖世太保的来临和他的死亡。

他获得的情报，以及在他这条危险工作线路上其他人的情报都起了很好的作用。在莱茵河战役的前几个月里，盟国对德国石

油的攻击达到了顶点。我们的飞行员都能精确地知道德国炼油厂的所在位置，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炼油厂。他们还精确地了解德国战斗机的简易机场的方位，高射炮阵地的位置，以及保卫炼油厂的伪装设施等等。一旦把这些工厂炸掉之后，盟军也能知道修复这些工厂需要多长时间。等到这家工厂刚刚恢复生产，盟军飞机又来进行轰炸。结果供应德国国防军和空军的燃料十分匮乏。当盟军发动最后大规模进攻时，许多德国坦克由于没有燃料只能绝望地呆在田野里，许多飞机无法起飞。

盟国对爱立克桑给予冯·斯蒂克尔的允诺予以兑现。不过，路德维奇先生最后当了一名俘虏，享有很多暇时来思考他对爱立克桑的判断的正确性。芬格尔先生在丹麦用假名、乔装打扮，混了几个月之后，最后也被捕。至于作为推销商的爱立克桑后来也从冒险生涯退休，同他的妻子住在斯德哥尔摩。

一次私下的休战

约翰·赫里沃德·阿列克斯

在1944年盟军发动欧战登陆日所带来的兴奋以及紧接着的几个星期之后，当我的轰炸机中队奉命要从英国调到北爱尔兰的朗夫福雷海岸时，大家觉得就好像一下子从九天跌入深渊似的。我们被分配的任务是，进行长距离夜间巡逻，搜索浮上水面的潜艇，这实在是单调乏味的工作。发现潜水艇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在我们中队调到驻地之后不久，我的中队成员总是处在待命状态。这就是说，我们穿着飞行服睡觉，准备在得到通知之后三十分钟内起飞。有一天清晨3点钟，我被作战室的勤务员给叫醒了。敌人竟然闯到了我们的门口来了。五分钟内，我们的机组和我六个人连连打着哈欠走到情况交待室去集合。二十分钟后我们都已

坐在飞机里了。当我们把沉重的威灵顿型飞机飞向海上时，在西边升起了一股极为明亮的闪光，然后被鱼雷击中的船只起火，发出红色火焰。正当我注视着这条船的时候，很快，接着又有三艘船被打中了。

我那时所想的就是要搞掉那艘潜水艇。可是不巧的是：它从未浮上水面来。一艘英国皇家海军的船只早已探测到它的声音，并一直追踪直到它遁入了爱尔兰共和国附近的中立水域里避难为止。这个地方靠近朗夫斯维雷的入口处，海湾变得狭长起来，象一条长长的手臂伸进了多尼戈尔郡。在此之后，虽然我们经常在这个地方巡逻，这艘潜艇也一次又一次出击，但是每次出击后它就逃进中立水域里躲避起来。

几个星期之后，我的机组人员放假了，我暂时没有飞行任务。我得到了两天假期，就穿过爱尔兰边界到邦克拉纳去，那里是靠近朗夫斯维雷的一个小镇。当然对于一个英国军队的军官擅自进入爱尔兰领土是“不合常规”的，但是几乎所有我们驻在边境上的部队都是这么做的——不过得穿便衣，并且要得到边界两方面的警卫的默许。在爱尔兰，食物十分丰富而且是不搞配给的，酒也十分便宜。到那里换换环境真是再好不过的了。

在我到达邦克拉纳后就走进旅店的酒吧间，想在晚饭以前喝一点什么。酒吧间里除了一位金黄头发吸着烟斗的人以外，还没有顾客。这个人的面前放着一瓶烈性黑啤酒。我也要了一瓶烈性黑啤酒，同那个人开始攀谈起来。在邦克拉纳，人们说话必须小心，如果我们的身份被人查询起来，可能要被拘留。那个金黄头发的人也显得十分谨慎，我们都避免谈及我们服务的单位、战争以及任何会引起争论的问题。

这个金黄色头发的人是一个愉快、知识丰富和健谈的人。但是在他身上总有着一种说不出的与别人有所不同的某些东西。我凭

直觉就看出他不是英国皇家空军的人，而且看来也不象是属于皇家海军和英国陆军里的人。我们喝完酒以后玩掷飞镖的游戏。在整个游戏过程中，对于他究竟可能是个什么人的问题总是在我的心里嘀咕着。他讲的英语是一种非常正规的牛津或剑桥的英语。我仔细观察他的衣着，他那花呢的上衣和法兰绒的便裤剪裁得十分合身。我只有一个印象：在英国我所认识的人中间没有谁这样打扮。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是一个很好的伴侣。我请他同我一起进晚餐，他也同意了。

这时我说：“可是，我们还没有彼此介绍认识。我的名字叫约翰·斯图华特”，我想还是不说出自己的真姓为好。

他在伸出他的手时稍为犹豫了一下。他说他的名字叫查尔斯·汉密尔顿。

在用餐的时候，我向他提出了一连串带有诱导性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他回答得挺自然。很显然他很熟悉伦敦市中心的情况，对牛津了解得更多。然而他对英国的知识似乎并不是最近的情况，一涉及战争时期的一些变化他就显得有点紧张了。这时我敢肯定：他这个人总是有些地方不大对头。突然，我心头的疑问具体化了：他一定是个德国人。

我思想里一旦跨越过这条界线之后，提出的问题就多了：他可能是在都柏林德国大使馆里干事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到邦克拉纳来是干什么呢？于是，我很自然地想到了那艘潜艇。可不是吗？肯定就是为了这个！他是不是大使馆派出来的一个低级外交官以便同潜水艇接头？还是潜水艇上的一名水手？或许他就是潜艇上的一名指挥员！

突然，我察觉到查尔斯正在用古怪的神情盯着我。因为我只在想而不曾听见他在说什么。于是我说：“对不起，你说什么，卡尔？”

我并非有意要把事情搞得这样难堪，但是把“查尔斯”这个名字译成了德国的“卡尔”，这可是起了磁电一样的效果。他滔滔不绝的话头停住了，脸变得雪白。这时我自己简直惊诧不止，甚至有一瞬间我不敢相信我的胡乱猜想竟然会成为现实。当时我的惊慌的神情大概一定不亚于我那个伙伴。我意识到，我在冲着他傻笑。很明显，这是我可能干出的最好的事情，因为他的脸色恢复正常，并且作出微笑。

我尽可能用一种正常的语调说：“对不起，这完全是一种无聊的把戏。”

他说：“好啊！你算赢了，你现在打算把我怎么样？”

的确，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此只能保持沉默。我的伙伴似乎比我更快地恢复了他的镇静神态。在我思想还没理出头绪之前，他很和蔼地笑着对我说：“我开始理解了，你也是一样的。”

“是啊！我的处境不比你好多少，也可能我们两个人都要被拘留”，这种滑稽的尴尬处境使我笑了起来，我又说：“我看你是那艘在海湾口停着的潜艇上的指挥官吧？”

这句话使他震颤了一下，随即反击说：“你在说些什么呀！”

我说：“事情相当明显，难道不是吗？我是皇家海军反潜艇中队的一员。我们飞来此地想干掉你已经有好几个礼拜了。”

他再一次放松下来并说：“你猜得完全正确。我还想喝一杯，我的朋友，你怎么样？”

我需要时间来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因此正在等酒拿来时，我站起来慢慢踱到火炉边，假装着看挂在墙上的一张图画并拿出了烟斗来装烟。我是不是应该叫警察来将他逮捕起来？如果我这样做，他们一定要看我的身份证，那很可能我和他两个人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得住监狱。那末我是不是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就是把这块中立土地当作暂时享有外交豁免权的场所，就象在古时候人们

把教堂当作避难所一样呢？

假若我去告诉警察他是个什么人，那末结果我们两个人都得被置身战争之外，我报效祖国的机会也就完结了。至于卡尔，他的位置可以由第二个指挥员来接替，而这艘潜艇将会继续进行袭击。因此，我作出了决定——充分尊重这个中立国家给予我们的庇护所。

我转向卡尔对他说，不能仅仅因为在几英里外，在不同的环境里我们将彼此厮杀要来个你死我活，我们就得摆架子压倒对方。

于是我们拿起酒杯走出室外，两人坐在一棵板栗树下的一条长凳上。在那儿，我了解到卡尔的英文为什么说得这样好。他的父亲曾经是一家德国工厂设在伦敦办事处的负责人。卡尔曾在我们的一所中学里念书，后来还进了牛津大学。他在战争爆发的一年前回到了德国。我又问他，他怎么能上岸的。他告诉我前一天夜晚，潜水艇浮出水面，艇上两名船员用橡皮艇把他送到离此二、三英里的海岸。他们将在当天午夜再把他接回去。接着他说：“上午我在一些农场里用自己留下作纪念用的英镑买了鸡蛋，在潜艇里食物实在少得可怜，人们已经好几个月没见到新鲜的鸡蛋了。我把相当多的鸡蛋储存在这条路前边的树丛下。”

天色快暗下来时，卡尔说他必须走了。我陪着他一直走到村子的尽头。在走过最后一所房子的时候，我说：“我希望你安然无恙，卡尔！”

“我也这样想，”卡尔苦笑着说：“希望你也一样。”

“那么你最好离开我远远的，”我说：“我可不愿意非得去把你干掉不可。”

他回答说：“不必担心，你不会有那样的机会的。”说完他慢慢地走开了。

我站在那里，当我听着他走在爱尔兰砂砾小路上的脚步声逐

渐向海边移去时，我内心的感情是很复杂的。

身带绝密件的人

小弗雷德里克·桑顿

在战时就象在和平的日子里一样，美国国务院同世界各国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之间的紧急而简短的通讯，都是用无线电和打电报的密码来进行的。但是那些有详细内容的机密文件和绝密的报告以及各种命令和保密地图、海图等等，都是由美国外交服务处的信使们传递的。正象一个在敏感岗位上的大使所说：“我们的电子仪器能做出的事，别的国家的电子仪器同样有可能加以破坏。因此，当那小伙子们之一送来机密文件时，我就感到比较安全。”

这种情绪由于一件历史事实而更加加强了：美国的信使队除了失事或飞机坠毁以外，从来没有丢失过一份文件。

那些高度机密的文件，信使们总是密封在一个叫做“安全手邮袋”里。这个邮包在任何时候，信使们一定把它放在一举手就能拿到的地方。当这些信使睡觉的时候，他们把一个象石头一样硬的包垫在头下当枕头，同时把其他几个包用铁链锁住了套在他的手腕上。因此，有谁想要动这些包就会把他们弄醒。在国外的旅馆里，常常没有门栓而锁又比较原始。信使常常用家具来顶住房门。

根据规定，凡是信使感到他乘坐的飞机可能坠毁或者乘坐的船将要沉没，他们即将死亡时，必须把“安全手邮袋”里的东西全部毁掉。有一次一个信使乘坐的飞机正飞临拉丁美洲的丛林上空。驾驶员迷失了方向，油箱里的油已经用完，飞机坠毁看来不可避免。这个信使弄开了他手提箱上的神圣密封口，打开箱子，撕碎所有的文件，使那些机组人员感到恐怖万状，因为这意味着一切都真的完了。几分钟之后奇迹出现了。在他们下面伸展开了一片坚实

而平整的土地，他们安安全全地着了陆。这个信使嘀咕说：“真见鬼，现在我又活着了。我得向上司解释，我为什么要撕掉这些文件。”

信使队在第二次大战中经历过最糟糕的时刻。有个叫亨利·考尔门的信使，他曾经身上带着有高度机密的材料从华盛顿去伦敦。途中他坐的轮船在大西洋中部遭到德国潜艇水雷的袭击。美国国务院认为他已经完蛋了。四天之后，一个形容枯槁的人踉踉跄跄地闯进了在伦敦的美国大使馆。考尔门在海船失事后伏在救生艇里在大海风浪中飘浮了半天。后来一艘挪威货船把他救起来在船上过了好几天，才把他送到苏格兰上了岸。这个信使精疲力竭，可他的邮包却完好无损。

有一个典型事例发生在1940年秋天。一个叫霍顿·台尔福特的一次难以忘怀的旅行。当时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联军正向希腊和土耳其推进。美国正在试图通过外交压力挡住这次进攻浪潮。就在台尔福特信使的包裹里，正装着美国国务卿霍尔发给在雅典和安卡拉美国大使最机密的重要指示。对于这些文件，轴心国是不惜出高价来收买的。

台尔福特在瑞士的伯尔尼收拾停当他的邮包。当他乘坐的飞机还没有在罗马着陆的时候，罗马电台公布了墨索里尼对希腊宣战的消息。台尔福特的邮件更是“热门”之至。信使并不知道他们携带的是些什么内容的东西，不过多半能作出精明的猜测。所有飞往希腊的飞机都停飞了，台尔福特赶上了一列火车前往直意大利和威尼斯。那里，他经过贿赂乘上了一艘横渡亚得里亚海抵达南斯拉夫海岸的轮船，然后再坐火车赴希腊边界。希腊的边防哨兵尊重他所持有的外交护照，让他进入国境。他们告诉他可以经过崎岖山路到十二英里外的奎伐利车站上车去雅典。台尔福特雇了两名脚夫上了路。

正当他到达奎伐利的时候，意大利的战斗机呼啸着俯冲下来袭击火车终点站。结果，这个信使不得不抱着他那珍贵的邮包在满是雨水的肮脏的沟渠里蹲了半个多小时。最后，台尔福特又湿又冷又饿，好不容易挤上了一辆塞得满满的火车，带着完好无损的秘密文件到达了雅典。这时他希望能够得到片刻的休息。可是美国使馆命令他立即离开雅典去伊斯坦布尔。

一辆使馆的汽车打算把他带到四百英里外，穿越土耳其边境的一个车站。可是在离目的地二十英里的地方抛了锚，台尔福特只好换乘了一辆牛车走完一段路程。最后他迈着蹒跚的步子，满脸灰沙到达了伊斯坦布尔。当他把邮包交出去时感慨地说：“这次我可碰到了一些困难啊！”

现在在电影和电视上，人们时常看到把信使想当然地描述成为是从事一种富有吸引力的美差使，总是有漂亮的金发碧眼女间谍们与之打交道的、有声有色的冒险故事。信使队成员看了却不是滋味，有一个信使说：“人们应当看看我们的守则！”信使们的守则必须一丝不苟地严格贯彻执行。它包罗万象，从你应该如何向外国海关官员说话一直到出差前一夜该吃什么喝什么都有规定。

信使队手册上写着：“进行旅行的公众可能很希望同信使们谈谈他的旅行计划和他的责任。这类性质的谈话必须尽快立即结束。碰到一些突如其来的问题时，回答应当模棱两可或者不表示态度。”一位美国商业航线上的驾驶员，他曾多次载运过信使来往飞行，他说：“信使是世界上最讲礼貌，也是最不友好的家伙。”

信使队的守则上要求每个信使，不论他走到那里都要配备一只没有毛病的闹钟。他得到的经常指示是必须在离火车开行或者飞机起飞前四十五分钟赶到机场候机室或月台。除非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没赶上航班或车次的是不能原谅的。

还有一种严格的规定，要信使们不得滥用外交豁免权。信使

们除了携带官方通信和供应品外，是绝对禁止携带任何别的东西的，个人的用品也仅仅是极少量。命令规定他们发现任何人——包括大使要求他们带一件礼物、一封信或者除外交邮包之外的任何东西，都必须向上级报告。给他们自己私运任何东西，即使是一双袜子和一盒雪茄都要受到立即开除的不名誉的处罚。

信使是从来不带武器的。他们的安全主要是依靠各国政府之间长期订立下的不成文协定，即相互之间不得干预彼此之间的外交信使。各国海关当局不得打开外交邮包。甚至间谍特工人员也不能碰那些在运送过程中的邮包，只要它们是由信使护送的。迄今为止，美国的外交邮包还没有受到任何间谍的袭击。

有个高级政府官员曾经这样说：“信使们是在严格的学校里经受过训练的，他们在‘送货’时从来不会误事。”

第六部分 在战线后面的胜利

(1945 年)

当绞索越来越紧地套住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千年帝国”的时候，德国进行了绝望的挣扎。在法国受到挫败之后，德国人用乔装“美国兵”打头阵的办法发动了猛烈的反攻。它赶忙完成一项秘密计谋，妄图用大量制造的伪币来促使英帝国经济上破产。德国的科学家们相信他们在研究原子能的竞赛中大大领先。

秘密的间谍工作也是盟军的一种强有力的武器。从美国海军的精锐蛙人部队的水底活动到美国战略情报局小伙子们在阿尔卑斯山口的“大鼷藏匕首”间谍活动，敌人们被各种各样的突袭和进攻弄得狼狈不堪。

希特勒躲藏在他的柏林地下防空室里发布命令，要所有的德国人抵抗到“最后一人”。但是当炮弹把纳粹首都毁成一片瓦砾时，希特勒自杀了，从而结束了欧洲的战争。于是盟国转过身来全力贯注于太平洋战争。在那里，人们面临着的前景是：在可能征服日本列岛之前将有一场可怕的流血战争。

突然，从波茨坦向日本人广播了一篇最后通牒：投降，要不，立即遭到彻底的毁灭。当时很少有人知道盟国的科学已经能驾驭原子。这一最后通牒没有受到重视，于是战争中最强大的武器——六十万人的秘密劳动成果在世界上爆炸了。

尽管第一颗原子弹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破坏力，日本的军阀们仍然在秘密会议上围绕着投降与否问题争论不休。第二颗原子弹迫使他们作出了决定。

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将军说：“一场巨大的悲剧结束了。一个巨大的胜利已经赢得。天空将不再降下死亡之雨……全世界处于和平的宁静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所有的秘密以及一切秘而不宣的内情不可能都公之于众。战争中的全部间谍和地下活动的故事也不会全部被人们记录下来。然而，即使那些已经被人们知道的事情，已足以提供一幅充斥于战争年代的伟大间谍行动和英勇业绩的引人入胜的图景。

欧洲最危险的人

托马斯·姆·约翰逊

1945年5月17日，一个高大的、长着褐色头发、脸上有一条从左边耳朵到下巴的伤疤的气宇轩昂的男子，走进邻近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地方美军总部。他猛地举起贴着他那时髦的、饰有希特勒精锐党卫军骷髅标志的帽子敬了个礼。敬完礼，他说：“党卫军中校奥托·史考尔桑尼前来投案。”

对于值班的美国兵来说，投降过来的德国人就好象当时美国部队中战地配给干粮那样寻常。美国兵倒竖着他的瘦瘦的大拇指说：“O.K，奥托。上那儿的牢房去。”

这个德国军官瞪着眼，然后转过身来。灯光照着他身上一排排的奖章，照着他那冷酷的、阴沉的蓝眼睛。一个美国情报官员穿着一身不显眼的旧制服，目不转睛地盯着德国人的手腕看。静静地观察之后，他对旁边的一个美国士兵说：“戴的是墨索里尼的手表，他就是那个史考尔桑尼，这是我们通缉名单上一个最重要的敌人秘密间谍。”

对于美国陆军反间谍的猎手来说，没有人比这个六英尺四英

寸高、体重二百二十磅的狡猾而大胆的冒险家更具有威胁的敌人了。这个人曾经领导过最大规模的反对美军的破坏活动。在巴尔吉战役中，他曾设计下了一个狡猾的诡计，要许多纳粹分子穿了美军制服在美军防线后面制造混乱，甚至在使用暗杀这一恐吓手段的威胁下，逼得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军官们，把怒不可遏的盟军总司令象个囚徒似地关禁在总部达十天之久。

早在一年以前，史考尔桑尼曾率领了不到一百人，在一个山顶上把有四百名意大利卫兵看守的墨索里尼抢走，使墨索里尼惊喜交集。他们利用滑翔机和小型飞机进行的劫持活动，使这个“领袖”得以在意大利北部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并且帮助德国人延长了他们的抵抗。墨索里尼授与史考尔桑尼一只精雕图案的手表。希特勒奖给他骑士十字勋章，并委以更多微妙的任务。

1944年10月，德国间谍曾经报告说，匈牙利的当政者尼可拉斯·霍赛准备抛弃他同希特勒的合作关系而转向斯大林。史考尔桑尼，当时作为一支小股部队的头子，对霍赛居住的城堡发动了猛烈袭击。但是这位海军上将已在广播了匈牙利决定投降后逃跑。不过后来有人透露了霍赛躲藏的地方，其时正值俄国军队越过边界向西推进，史考尔桑尼立即发动突袭，一下子将霍赛绑架到慕尼黑关押起来。

霍赛事件之后，希特勒又召见了他所宠爱的这个强有力的助手，使他作出最出色的行动。元首正在计划一次最后的疯狂反击。在崎岖多山的法国阿登地区，那里美军防守力量最薄弱，希特勒企图孤注一掷，出动他那由精锐的装甲部队率领的战略后备队对这个地区进行猛攻。这支部队将奋力向北推进，包围住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在欧洲全部军队的一半。然后攫获庞大的后勤供应和占领安得卫普这个盟军的最好的港口。这一来将会使美国和英国军队长时间内处于瘫痪状态。希特勒希望借此赢得时间，以便能造出

大量的 V 型炸弹、喷气式飞机和新式的潜艇，从而最终能赢得战争。

可是希特勒在私下同几个领导人秘密策划时承认：“这里还有一个障碍，我们如何能够夺取默兹河上的那些桥梁，以便让我们的装甲部队通过呢？……有了，把史考尔桑尼给我叫来！”

10 月 22 日，在一间秘密的作战室里，希特勒带着他 7 月份以来由于暗杀他而未成的炸弹爆炸案所引起的苍白而沮丧的神色，向史考尔桑尼吐露了他的大胆透顶的计谋。史考尔桑尼被授权从所有部队中挑选一批亡命之徒，组成一支三千人的特别部队，这支部队的人都能讲英语，每个人都穿上了从美国俘虏身上剥下来的美军制服。他们被送过美国的防线去作间谍，作破坏者和散布悲观情绪，使士气低落。他们要去占领和控制默兹河上的桥梁以便让德国主要部队通过。这一切史考尔桑尼必须在两个月内完成。

在奥兰宁堡附近的弗里登泰尔，史考尔桑尼把他的部下集合在一起，让士兵们熟悉美国的装备和武器，美国式的操练和习俗。他下令说：“不要太过于军事化，立正时不需要象德国兵那样脚后跟碰敲。”他教士兵们怎样用美国人的方式打开一包香烟，给他们的是美国牌子的香烟。他还教他们学美国的骂人话和俚语。一时间，“O.K.粗坏！”成了部队里的口令。他们还备有美国身份证明卡、美钞甚至从美国弄到的信件和快照。这次行动被起名为“格里夫”，意思是“攫夺”。

但是这个行动不可能一点风声也不漏。美国第一军情报处截获了一份命令要讲英语的士兵向史考尔桑尼报告情况。史考尔桑尼的名声就此为美军所了解。12 月 10 日本杰明·艾·迪克逊上校报告说：“这份命令明显的是预兆要发生某种破坏活动，或用渗透过来的或空降的专门人员袭击总部和其它重要军事设施。”他接着又说：“有个搞情报十分内行的战俘，他在其他方面的观察与客

观事实总是相符，他说，各种可能使用的手段都在进行考虑，为了即将发动的一场全力以赴的反击战。”然而，盟军高级情报官员对这个看法却是半信半疑。结果我们没有向阿登前线派去更多兵力，而12月16日纳粹在那里发动了进攻。

德国人以十七个师前导，后面跟着十二个师向那一地区浩浩荡荡推进，触发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战斗。成千门德国大炮向崎岖而为白雪覆盖着的阿登山轰击出一条路来。而同时，史考尔桑尼的“美国兵”坐在截获了的美国吉普车里到处乱窜。他们同德国其他部队用事先约好的种种信号联系，如高高举起钢盔或使用各种颜色的手电。他们进入或穿过美军阵地，注意哪里是简易机场和后勤仓库，并探明我们的增援部队将从哪条路线赶来。这一切帮了德国炮兵极大的忙，使我军遭受了重大的伤亡。他们还把树砍下来阻塞各种道路，切断电话线，弄乱道路标志使盟军的交通发生混乱，而且还故意移动地雷的警告牌，毁坏盟军卡车。更有甚者，一个“攫夺”队员装作美国宪兵，站在十字路口打手势，把一个团的美军引向错误的道路。

起初，很少有美国士兵发现在自己部队中间混杂了一些假扮的美国兵，专门从事这种破坏的勾当。到12月18日，在比利时的阿维列，宪兵在查询时发现有三个坐在吉普车里的美国兵答不出口令，不过他们都有证明文件，证明他们是美军第五装甲师来的，并且还讲了令人信服的故事，但有一件事使人蹊跷，就是“礼貌多得令人见怪”。就凭这一点人们把他们送到弗列德里赫·华莱克中尉那里听他发落。这个中尉是从达豪纳粹集中营里逃出来的，他过去是一位德国的法官，现在我们第一军里盘询纳粹战俘的审判官。他对付这三个美国兵的战术就是羞辱他们穿着别人的制服，而偏偏不穿德国军队的制服，这种战术竟然奏了效。

华莱克对他的上级说：“他们招认的事情与那张截获的命令的

内容是相符的。”但对于我们许多官员来说，这种计谋看来似乎“过于出奇”。

很快，反间谍部队的一些军官在那辆重新夺回来的吉普车上发现了一部德国的电台和密码本。与此同时，一个美国的无线电收发报员监听到从一些吉普车上发出的电报，是关于有人穿着美军制服作掩护而给我们造成损失的一份报告。于是就开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猎获间谍的行动。这时口令已不起作用，因为德国人可以弄到口令。那些铁板着脸的美国宪兵和反谍报部队的特工人员，拿着手枪贴住坐在吉普车或其他车辆里的所有人的胸脯，只要发现他的美国味儿有点问题的话。他们发问：“棕色轰炸机是什么？温迪城在哪个地方？”“声之音”指的是谁？台姆·勃姆斯是个什么人？要他们说：“Wreath”（因为几乎每个德国人都把“th”这个音念作t）。这些新的检查方式在前线和后方许多设有障碍物的路口进行着，特别注意那些坐在后座的（现在才知道）、英语说得蹩脚的人。有些汽车司机对盘问感到十分惊慌，试图开车溜走，结果反暴露了自己。还有的人想闯过路障逃跑。

在12月19日，美国反谍报部队特工人员发现有一辆吉普车，车上坐着两名看上去是美国空军少尉的人，正在注视着我们的增援部队快速行军。情报人员向他们问话，他们拿出了养狗牌、预防接种记录，并且大谈在部队生活经历的种种细节。他们说，他们曾经在霍特营里受过训练。有个特工人员似乎已感到回答满意，问了一句：“在得克萨斯玩过吗？”其中一个德国人回答说：“没有，从来没有过。”这个特工人员猛地拔出手枪喝令：“举起手来！霍特营就在得克萨斯。”

之后，在列日（比利时），默兹河的一个交叉口——这里是史考尔桑尼特别注意的一个目标，一个吉普车队大胆公开地打听总部所在的通讯联络地区。不久，装备有重武器的美国宪兵立即把这

些人包围起来。后来，华莱克被传唤来对他们进行查询，他又一次用起他那“羞辱”的战术。那个脸上长着短髭、头发褐色的中尉立即供认了自己的名字，并且描绘了所有史考尔桑尼的官员形状和供出了更多的细节：史考尔桑尼率领下的第一五〇装甲旅在攫获了的美国坦克里，装着正在撤退的模样，然后伺机占领默兹河上的桥梁。

当被带到第一军的总部作进一步审问时，这个中尉开始说他已供认了他所知道的一切。总部的审问官说：“那好，我们把你交给政委。原来这个中尉象大多数德国人一样最害怕苏联人。这时，一个穿着红军制服的高大身躯的人立在他面前，用一种外国腔调说德文来问问题（这个人是来自密尔沃基的美国人）。这个德国人吓得脸色发白，嘶哑着承认说：“我们也还有艾森豪威尔这个目标。史考尔桑尼和另外一个小队，他们将扮成美国官员押送一批被抓住的德国将军前往凡尔赛你们的总部去审问。他们将驾驶着美国的汽车。一旦闯进你们总部，他们将把武器对准你们总部的官员，然后史考尔桑尼将亲自动手或者绑架艾森豪威尔或者把他杀掉。”

这个故事也可能是伪造的。但是最高盟军总部了解史考尔桑尼这个人，它感到必须严加防范。在特里埃农旅馆和凡是有盟军总部官员居住的建筑物，外围都用铁丝网圈起来，附近停放着坦克。一千名全副武装的美国宪兵和美国兵在外面的路口检查。所有接近这些房子的人都会得到汤姆枪和严格盘问那种样式的接待。有五个反谍报部队的特工人员负责做到：所有访问艾森豪威尔的人都要由助手来亲自检证认领才能放进去。艾森豪威尔将军也搬进了一幢有围墙的房子，这所房子的门、窗和屋顶都严布岗哨。将军几天几夜都不走出屋子，因为反谍报部队怕他会遇到远距离的狙击手。可艾森豪威尔生性好动，他总想试着走出去，他叫嚷说：“受够罪了，我得出去散散步。”但是他最后还是屈服于他部下的恳求。

这是因为他知道：除非他呆在屋子里，否则将有更多的士兵——他们在别的地方更有需要——派到这里来“围着我转”。

与此同时，在布尔吉地方，属于德国第一五〇装甲旅的五十辆美国坦克中的一些坦克出其不意的碰上了毫无准备的一个美国装甲营，歼灭了其中的一半。结果警报传来“我们自己的坦克向我们自己开火了”。美国宪兵得到命令要他们报告所有在命令规定以外的坦克行动。在默兹河上的一切航船交通完全断绝。两岸加强了武装巡逻，凡是企图越过交叉口的人都将受到逮捕和审问。用这样的办法，抓住了总共五十四名穿着盟国军队制服和穿着便服的德国人。

利用大量散布失败的消息，这个由纳粹第一五〇师装甲旅假扮起来的“攫夺”队成员几乎长驱直入我们在默兹河前面的这条最后的防线。在马尔梅迪（比利时），史考尔桑尼发现美国大炮阵地严阵以待。因此，在发动攻击以前，他派遣他的部下混到炮兵中去，向他们了解他们有多少大炮，炮有哪些品种。但是这些早有警觉的炮手们立即把这些骗子们抓住了。大炮开始向敌人作出回答，结果那些偷来的坦克被击毁，从这些坦克残骸里弄出来好多德国人，有死的也有活的，全都穿着美军的制服。

美军第一军在12月22日开始在军事法庭上对被俘的“攫夺”队员进行审判。所有的人都被判为：违反军事法律，在敌人后方利用穿着敌军的制服去进行欺骗和间谍活动，或进行破坏。所有被判处死刑的立即由行刑队枪决。

没有人知道“攫夺”队成员在战斗中死了多少，只知道在审判后有一百三十人被执行枪决。第一军的反谍报官员们从卢森堡广播电台广播了他们的名字和“攫夺行动”的细节，以及对尚未捕获的德军官员们的描述，尤其是对它的头子史考尔桑尼。这个魁梧的奥地利人由于太靠近前线，一颗弹片把他打伤了。他还在希

望能有机会带领第一五〇装甲旅的残余力量去进行欺骗和拼死。现在听了广播，证实这样的机会已经完全没有了。结果，这个史考尔桑尼不得不抱着极为遗憾的心情，命令他那些失望了的亡命之徒们扔掉他们的美军制服。“攫夺”队的行动组是彻底完蛋了。

此后，史考尔桑尼干的最后一件事是设计和分配毒药丸。那些纳粹大头子，如戈林和希姆莱就是吃了这些毒药药丸自杀的。

当史考尔桑尼向美国人投降的时候，他表示他从来没有真正企图杀害过艾森豪威尔。有关暗杀艾森豪威尔的故事是他编造出来以便激励他的部下的。他知道他手下有些人是会被美国人抓住，会招供，这段故事可以加剧盟军间的混乱。他颇有礼貌地而且自恃地说：“如果我计划过这样做，我一定要试着去干。如果我已经试着干过，我一定会干成功的”。

之后，在达豪（慕尼黑附近）由九名官员组成的法庭上，史考尔桑尼的一些起诉人撤销了他的一些罪名，包括同臭名昭著的在马尔梅迪屠杀美国战俘案有牵连的罪名。这个身材魁伟的大骗子发誓说，除了他的“攫夺”队成员，其他许多人，包括英国兵和俄国兵，他们也穿过敌人的制服。他说他曾告诉他的部下，利用美军军服偷偷地越过美军防线，但是他下令在开枪以前必须把美军军服扔掉。1947年9月8日，审判员在经过两个半小时的审议之后，决定释放史考尔桑尼和他的七名助手。史考尔桑尼说：“我得到了一场公正的裁判。虽然我被单独监禁了二十二个月，但从未受肉体上的虐待。我唯一的抱怨是有人‘解放’了墨索里尼送给我的手表。”

作为曾经担任过党卫军的官员，史考尔桑尼现在面临着一场清除纳粹分子的审讯。可是在他被监禁的德国监狱里，他收到了来自美国的一批崇拜者的信件，还有人向他提出要给他帮助。显然这一切都是由于报纸报道了有关宣判他无罪的故事造成的。他的遭遇在美国受到了一些人的同情。到1948年7月27日早晨，

德国的监狱官发现他已经逃跑。

他的起诉人阿尔弗雷德·约·罗申弗尔德上校愤怒地说：“这个人在监狱外面有很多追随者。他们显然已经组成一个地下集团，等着他去当领袖。这个人是欧洲最危险的一个人物”。

这个英俊的、脸上有疤痕、十分易于辨认的高个子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好多年来一直是个谜团。最近有消息说他现住西班牙的马德里，并且据说还参加了纪念意大利大独裁者墨索里尼去世十八周年的追思弥撒。

蛙 人

埃德温·马勒

在战时，不管哪一天，只要你沿着美国加利福尼亚南部、靠近科罗纳多海岸走的话，准可以看见一群群被太阳晒得黝黑而健壮、穿着游泳裤的年青人似乎在享受着无限乐趣。他们一会儿潜进波涛之中，一会儿又扎到水下进行长距离的潜泳，一会儿又浮上浪尖翻滚。要是浪大风急，他们就更高兴了。看上去这里好象是在玩乐欢闹，但是实际上这些人都是在参与种特别粗犷形式的军事训练。他们全是属于海军的“水底爆破队”，人们称之为“蛙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蛙人”还是一种高度保密的组织。他们的任务就是充当两栖登陆的先头部队，他们走在登陆大部队的前头，指引路线，清除海岸和近海水域中的水雷和其他障碍物。他们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而自己付出了高昂代价的牺牲。

人们认识有建立“水底爆破队”的必要，是因为在塔拉瓦岛曾有过恐怖与血的教训。在通往这个岛屿的入口处，日本人建起了一排排“刺猬”——那是一种用钢栅栏插在水泥底座象枝丫似地指向四面八方的障碍物，被安放在水面底下一点点。正当我们的

登陆艇向海岸疾驰而去，结果这些船一艘接着一艘地被钉住在那里。登陆艇上的海军陆战队全都拥挤在甲板上，无法抵挡岸上日本人射来的致命的重机枪子弹。最后，海军陆战队终于占领了塔拉瓦。不过那是穿越过成百上千他们的同伴填塞成堆的尸体而登上这个岛屿的。此后，海军决定不能让这样的灾难再度发生。

1945年6月24日，第七海陆两栖部队的一个两栖登陆小队，潜伏在婆罗洲(加里曼丹)的岸边，准备对海岸发动攻击。清早7点30分，美国的炮火开始咆哮了。8点钟，七艘小艇装满穿着游泳裤的人，从舰队行列中悄悄地溜出来，开足马力向海岸驶去。这些人带着潜水面具，脚上套着橡皮的划水板。其中三艘遭到日本炮火的袭击，但一艘也没有被打坏。在离岸五百码的地方小艇停了下来，与海岸成平行线地轻轻摇荡。每艘小艇旁拖拽着一只橡皮救生筏。信号一响，蛙人们两人一组迅速地翻滚到橡皮筏子上。然后每隔五十码两个蛙人钻进水中开始向海岸游去。他们采用了俯泳，这样不致溅起水波而且尽量不使身体(除了两臂以外)露出水面，以免受到敌人炮火袭击。

他们随着起伏的波浪滚滚向前。到离岸边不太远的地方，他们碰到了成行的障碍物：四排十英寸厚的桩子直扎到珊瑚滩底，刚刚隐没在水下的顶部，则杂乱交错地缠着铁丝网。

每两个蛙人分管五十码长的地区。每个人的颈项上挂着一块有机玻璃板和一支铅笔。他们深深地潜下水去，在水里停留不到一分钟。当他们浮上水面时，他们把在水下看到的障碍物的分布样式录写在有机玻璃板上，然后再潜入水里。正当他们工作中间，日本人的迫击炮手发现了他们，机枪子弹呼啸而来溅起了水花。这些蛙人们尽量长时间地把自己淹没在水里，并且尽量保持在两个浪头当中的低槽里。侦察任务完毕后，蛙人们向海里游去。这时小艇拉着橡皮筏全速开来。蛙人们一个挨着一个被从海里拖上

来。之后在离岸很远的舰队船舰上，参谋官员们详细研究画在有机玻璃上的材料。

下一步的任务是要爆破障碍物。一艘艘小艇又驶近海岸。现在当两个一组的蛙人们又潜下水里时，他们把重重的一捆捆东西扔进了海里，这都是炸药，每五包就是一百磅重的炸药，每一包炸药都装在充了气的橡皮囊中随水浮动。潜水员们抱着橡皮囊小心翼翼地向岸边游去。如果一颗近发的迫击炮弹在附近爆炸就会把他们炸得粉碎。到达了障碍地区，蛙人们两人一组开始干了起来，他们工作得又快又有条不紊。沿着这些桩子的顶部，他们穿上一行由“导火线”构成的干线，干线连接着炸药的引芯，只要一个炸响了，就能引起连锁的爆炸。于是他们把每个装炸药的气包依附在桩子底部，同时又用线把炸药包同上面的导火线连起来。在半个小时内，他们已把炸药安放到半英里长的障碍物上。然后他们浮出水面，向小艇靠近，只留下两个人准备点火。他们定下在十五分钟以后爆炸，于是点上火后急急忙忙赶上其余的人（在战争期间游泳游得最快的人可能要数这些离开岸边的蛙人了）。接着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半英里宽的沙子、水和木头掀到了半空中然后坠落到水里。爆炸刚过，蛙人们又回去工作，继续清理掉更多的死亡陷阱。

7月1日发起了总攻击。上空有重炮轰击作掩护，海上有“水下爆破队”的小艇引路，登陆艇蜂拥着占领了海滩。

婆罗洲（加里曼丹）港的战役是十来次这种战斗中一次典型的由“水下爆破队”作开路先锋的水陆两栖部队登陆。在关岛战斗中，主要的障碍是珊瑚礁，离岸三百码的地方都是这些礁石，礁石上面掩盖着一到三英尺的海水。差不多用了一万磅炸药，“水下爆破队”才开出一条广阔而安全的通道。当海军陆战队第一梯队冲向海岸时——有人流着血，汗水浸透，不断躲避着机枪子弹——他们发现这些礁石上有着后来名扬海军的标记口号：“欢迎海军陆战

队来到关岛。承蒙‘水下爆破队’的努力，海滩畅通。联合服务组织右首两街区即是。”

在诺曼第登陆战的“奥马哈”海滩上，蛙人们遭受到了战争时期最大的伤亡。由于那里有着宽广而逐渐倾斜的斜坡，潮水来时浪头一下往前冲进十八英尺，因此当涨潮时，你必须小跑步才能赶在浪头前面。在落潮和涨潮线之间的海滩，德国人搞了三排木桩，上面缠了团团铁丝网。德国人考虑，第一次攻击的船艇将会在落潮时登岸，接着迅猛的涨潮会很快把障碍物埋进水中，这样当后续船艇到达时，就会陷在里面不得动弹。而已经登岸的士兵将会被切断。

“水下爆破队”被禁止去侦查诺曼第海岸——因为那样会暴露目标。好在美军从法国地下组织的报告中已经得到了有关海岸防卫情况的精确情报，同样也从空中侦察和潜望镜摄取的照片中知道底细。蛙人们同第一梯队的登陆部队一起进入海岸。他们划着橡皮艇拍浪前进。德国第八十八师的火力很厉害。当一颗炮弹打中了一艘装着高爆炸药的小艇时，连船带人一下都化为乌有。在潮水开始上涨时，小艇队终于通过危险地带而进抵海滩。为了要抢在潮水的前面，蛙人们急急忙忙赶到第一排木桩和铁丝网的障碍物边。炮弹爆炸掀起的泥沙溅在他们的四周围。不时，一个携带着炸药包的人会突然消失。

在有一个地段，蛙人们在四十五分钟内一个一个地终于把三道障碍物全部搞掉了。在那次登陆战中，有百分之四十一的蛙人不是死亡就是受伤。

今天，“水下爆破队”仍然是一个高度保密的单位。在他们中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在为哪一种两栖登陆战而作着准备。他们所

① 美军“联合服务组织”(USO)系为军队福利、文娱服务的机构。——译者

知道的仅仅是：如果有哪支美国部队要担当起在敌人的任何海岸进行登陆任务的话，那么蛙人们就必须走在部队前头为他们扫清道路。

躲藏在秘室的日记

路易斯·德·约翰

一个喜欢争辩的小伙子有次问法官菲列克斯·法朗克费特：“你为什么认为人类是值得拯救的呢？”法官说：“因为我已经读过安娜·佛朗克的日记。”

一个十几岁的姑娘怎样写成这部日记并把它保存下来，这段经历几乎象日记本身一样富有戏剧性。当时没有人会预见到这一本小小的书将会产生这样巨大的影响，甚至他父亲也没想到，在安娜被关在集中营里去世之后会把它印刷出版。

当希特勒掌握政治权力的时候，奥托·佛朗克是一个银行家，居住在德国。他是1925年结婚的。1926年他生下了第一个女儿玛格特。三年之后又生了第二个女儿安娜尼斯·玛丽。她常常被人们叫做“安娜”，有时又称之为“温柔的女性”。1933年秋天，希特勒发表了一篇又一篇的反犹太人的宣言后，奥托·佛朗克决定移民到好客的荷兰去。他开始在阿姆斯特丹开了一家小小的公司。在战争爆发前不久，他找到了一个伙伴范·唐恩先生，也是一个流亡的难民。他们主要经营的是香料，生意并不怎么兴旺。有次，奥托·佛朗克甚至不得不要求他那小小规模的职工把他们不算丰裕的工资暂时再削减一点。但即使如此，也没有人离职他去。伙计们都非常喜爱奥托·佛朗克热情的个性，并且十分钦佩他的勇气和给予他的两个女儿无微不至的良好教育。

在学生时代，安娜并不是一个十分出色的学生。大多数人同

她们的父母一样，认为玛格特要比安娜更有出息得多。安娜最特别的一点，是她从小就对别人关注。她富有感情而且意志坚强。有一次她父亲对我说：“她真是一个‘问题儿童’。她十分健谈并爱衣着漂亮。”在那个小镇上，她常常被一群喜欢饶舌的女朋友们包围起来。这对她来说是“正中下怀”。这对弗兰克一家也是件好事。因为他家很少过得起假日，而且他们自己也没有汽车。

当1940年5月纳粹入侵荷兰后，弗兰克一家陷于困境。弗兰克比居住在阿姆斯特丹的其他犹太人更早地感觉到，他和他的家得找个地方躲藏起来的时间可能已不远。他决心躲在他的办事处的房子里。那幢房子面对阿姆斯特丹的一条两旁绿树成荫的运河。房子楼上有几间长期无人居住的房间，人们称之为“附属建筑”。可以给弗兰克和范·唐恩两家秘密居住。

1942年7月初，玛格特·弗兰克接到命令被驱逐出境，但是她没有遵命离开。于是弗兰克立即把玛格特和一家人全搬进了他那隐蔽的屋子里。后来，范·唐恩一家也很快搬到那里去了。四个月之后，他们又把另一个犹太人，一位牙医生也搬进了那个狭窄的住所。房子里总共住了八个被警察追捕的人。任何声响或灯光都可能泄露他们的秘密。他们同外界微弱的联系就是凭一台收音机和奥托·弗兰克办公室四名勇敢的职员——其中两名是打字员，他们偷偷地把食物、书报杂志带给他们。他们唯一的另一个伴侣是一只猫。

就这样隐居的日子里，安娜决定要把她的日记继续写下去。那本日记本是她在十三岁的时候父母送给她的。她描写了在“附属楼”里不可避免的紧张和争吵情景。但是她首先是创造了十分微妙的自己长大成人的忠实记录。几乎把一个少女的思想感情以及她的起居生活和孤独寂寞一古脑儿和盘托出了。当她同外界切断联系而度过大约十六个月之后，她在她的日记里写道：“我感到

自己象一只被残忍地剪断了翅膀的夜莺，在一片黑暗里向着笼子的栅条碰撞跳腾。”两个月后，日记本已经全部写满了，这是一本用格子本装订的小本子。后来一个名叫迈普·范·生丁的打字员又给了她一本普通的练习本。用完之后安娜又拿了玛格特的化学练习簿继续写她的日记。

安娜的日记里流露出她对睿智的父亲信任。因为她感到她的母亲并不了解她。她写到她同范·唐恩家十七岁的男孩子头一次亲吻时的那种欣喜若狂的内心感情，以及最后，一个媚人的女性性格的成长，热切地用成年人的勇气和成熟的自我透视来面对生活。

在一张纸条上，安娜写下好多假名。准备将来在日记公开出版时使用。当时，她的日记还是不愿被人知晓的一个秘密，特别是那个脾气暴躁的牙医生，因为她同安娜共同住一间小小的卧室。安娜的父亲让她的日记放在他的一只小办公包里。可是直到安娜去世之前，她父亲从来没有读过她的日记。

1944年8月4日，一个德国纳粹和四名荷兰纳粹警察突然袭击了他们居住的地方（“附属楼”的秘密怎么会泄露出去的始终不得而知）。他们吼叫着：“你们的钱和珠宝放在什么地方？”佛朗克太太和范·唐恩太太的确是藏有一点黄金和首饰的，结果很快就被搜查出来了。纳粹们想寻找个东西来放这些首饰和钱，一个警察注意到了佛朗克先生的这个小办公包。于是他把包里的东西全都倒在楼板上，对日记本只是看了一眼。最后把“附属楼”里住着的人全都逮捕。

9月初，艾森豪威尔统率下的盟军很快接近荷兰了。佛朗克和范·唐恩一家和牙医生被载在运牛车里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这是在波兰南部一个纳粹的死亡营。到了那里，纳粹分子立即把奥托·佛朗克和他的妻子、女儿隔离开，甚至连互相告别的时间都

没有。佛朗克太太、安娜和玛格特被押往集中营的妇女队。在那里，佛朗克太太由于劳累衰竭而死去。后来范·唐恩一家和牙医生也先后去世。

安娜不愧是奥斯威辛这个小小的妇女队里一名勇敢的领头人。当人们饥肠辘辘而得不到东西吃时，她敢于走进厨房去索取食物。她常常告诫玛格特永远不要屈服。有次她看到好几百个匈牙利犹太孩子全都一丝不挂地在冰冷的雨水里站着，等待着被送进煤气室，孩子们理解不了成年人世界里对他们所施加的恐怖，安娜喃喃地说：“哦，看他们的眼神……”

到了深秋，安娜和她的姐姐被转移到另一个叫波根—贝尔森的集中营去，它在柏林和汉堡之间。安娜的一个亲近的朋友曾经在那里见到她“挨冻、挨饿，头发全被剃光了，形容枯槁，穿着那种粗糙、不象样的集中营里的直条子俘虏服”。她衰弱得使人心酸，当时她正由于伤寒发烧而受尽折磨。安娜死于1945年3月上旬，玛格特则在安娜去世前几日死去。姐妹们被埋葬在集中营的集体坟坑里。

奥托·佛朗克先生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总算活下来了。他在1945年初被苏联人解放出来。当年夏天他回到解放了的阿姆斯特丹。有个朋友告诉他，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但是他始终期待着安娜和玛格特会回来。在空等了六个星期之后，有个朋友不得不告诉他，她们姐妹俩都已不在人世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过去的打字员迈普把安娜的日记交还了他。年前当佛朗克一家被逮捕后一个星期，迈普大胆地又回到了“附属楼”去，看见有一大堆纸丢弃在地板上。迈普认出这是安娜的笔迹，决定把这些日记收藏起来，但她并没有去读它。要是她当时读了这本日记，就会发现其中记叙了她和其他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救护佛朗克一家的详细细节，这样她可能为了安全的原因而把这本日记毁掉。

奥托·弗朗克花了好几个星期读完了他那死去的女儿所写的日记。他每翻阅过几页之后就要停顿下来。由于他的母亲还健在——她早已移居瑞士，那里有着近亲照顾——他复写一份日记稿给妈妈。日记中有些段落他感到描写得过于亲热或许会伤害别人的感情，就把它抽掉了。当时他还没想到要把这本日记正式拿去出版。他把一份打字的复印稿给他一个亲近的朋友看，这个朋友又把稿子借给了一个教现代历史的教授。使奥托·弗朗克大为吃惊的是，这位教授竟然为日记写了一篇文章在荷兰报纸上发表。弗朗克的朋友们都催促他把安娜的日记正式出版，因为这是安娜生前所希望的。她在其中一段里写道：“在战争结束以后，我要出一本书，书名就叫‘附属楼’……我的日记可以为这一目的服务。”当弗朗克最后决定同意出版这本日记时，两个著名的荷兰出版商却拒绝印这部书，后来第三个出版商决定接受出书。

自从那时以来，这部日记已在全世界翻译成至少二十二种语言，先后销售了近三百万部。根据日记改编的剧本也在二十多个国家演出。一部关于安娜的电影也在世界各地放映。从世界各个角落寄来了无数的信件，以致奥托·弗朗克不得不放弃了他自己的生意。精心看管他女儿的日记已经成了他的爱好，变成他生命中的一项重要的使命。他后来一直住在瑞士，过着比较俭朴的生活，至今还没有一辆汽车。他把所有的稿费奉献给了慈善事业，因为他感到这一切也一定是安娜所赞成的。所有的来信都由他亲自一一作复。每天都有一些新的来信，使他悲伤地勾起过去所经受的惨痛遭遇。但是，他觉得英国最大的一所中学女校长来信中所说的有着真理和慰藉。女校长写给他的信上说：“这一定会使你感到是一种深刻欢乐的源泉——在你整个悲哀之中：当你想到安娜她短暂的生命，从深远的意义上来说，其实是刚刚才开始。”

这本日记在德国引起的反应是最为明显的。当1950年这本书

第一次印了四千五百本运到德国出售时，许多书店经销人都怕把它陈列在橱窗里。从那时起，这本书的德文袖珍本卖出了近一万册。

根据这本日记改编的戏剧在德国七个城市同时开始上演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观众会有什么样反应。这出戏一共有短短八场。舞台上没有出现过一个纳粹分子，但是却使人每一分钟都感到他们不祥的存在。最后，人们只听见纳粹的皮靴蹬蹬地踩着楼梯走上这个安娜躲藏的小楼。在戏的结尾，只有安娜的父亲，一个孤独的老头站在舞台的中央。他宁静地诉说着他如何获悉妻子和女儿悲惨死亡的消息。他捡起了安娜的细长的日记本，一页一页地翻阅着。终于找到了那最后一段，而当他找到它时，安娜年轻、满怀信心的声音在舞台上响了起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仍然相信，人们的心灵是善良的。”

安娜的悲剧深深地感染着满座的观众，他们深陷在内心的愧疚的沉默之中。在杜塞尔多夫上演的时候，人们甚至在中间休息时都不愿离开座位，正象有的报道上写的：“他们坐在剧院里，好象害怕戏院外的阳光似地感到无脸彼此相见。”杜塞尔多夫的一名叫孔·埃贝尔的舞台监督解释说：“安娜·弗朗克这出戏获得了成功，因为它使观众和历史进行较量，通过个人的感受而并无谴责之词。我们看这出戏就象在看一份用最谦卑和可怜的文字写出来的起诉书，控诉人对人的野蛮暴行。没有人因为我们是德国人对我们进行控告，而是我们自己控诉自己。”

在西柏林，“安娜·弗朗克之家”已向人们开放，它致力于为了青年一代人利益的社会工作。柏林的人民选用了安娜的名字作为“种族和社会宽容精神的象征”。在德国各地以安娜名字命名的组织一个一个地出现，它们要同残存的反犹太主义进行斗争。

安娜短短的生命真是才刚刚开始。她带给世界人民的是勇气

和宽容精神。她虽死犹生。

大 伏 击

威廉·L. 惠脱(《他们是可以牺牲的》、

《皇后傲然而死》及其他书的作者)

一架从高空徐徐下降的大型飞机通夜嗡嗡轰鸣不停。这架飞机从意大利东南的巴里基地起飞已经飞了四个小时，现在已深入到敌人防线后面的地区，即波伦那南部三百英里的地方。这正是1944年圣诞节以后的一个夜晚。三个准备跳伞的人，俯瞰着下面的一片黑暗，想寻找敌后游击队员预定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山麓的特列希那村附近所点起的篝火信号。当飞机倾斜时，他们看到了雪地上那细小的篝火信号。

第一个跳伞的是他们的头头，战略情报局的霍华德·查波尔上尉。他二十六岁，是俄亥俄州和西部预备大学毕业生。他是在美国出生的普鲁士后裔，能说德语，可不能说意大利语。不过他的翻译员法勃力格中士能说意大利语和其他几种语言。另外一个中士雪尔斯卑，是个无线电收发报员，他是在南斯拉夫执行过两次战略情报局任务的老手，最后一个跳下飞机。在三个人跳伞后，飞机又扔下好些用降落伞抛下的大箱子，里面装着各种枪支、弹药和发给游击队的制服。

当查波尔上尉收拾停当降落伞后，他发现大约有三十名游击队员，穿着杂七夹八、难以名状的意大利和德国的制服，站在他附近。另外的人正在收集投下来的装有各种装备的箱子。因为如果不在天亮以前把这些东西找到，德国人就会发现一切。

波尔萨诺是德国党卫军在意大利的总部所在地，离这里仅仅六十公里远。而每个乡镇都驻有重兵把守。在整个这一地区有很

多德国兵，这是因为附近有两个大的山口：一个是勃伦纳；另一个向东可通维也纳。只有通过这两个山口，德国人才能向他们的部队运来各种供应品以支援德军在意大利作战，同时也只有这两个山口是德军将来撤退时的必经之道。查波尔的使命就是组织游击队切断德军的退路。

在附近的贝罗诺镇上，另一名战略情报局的拜鲁齐上尉早已在进行活动。查波尔等三人就在他那里度过了五天光阴。他们向游击队员们传授如何在德国兵经常出入的旅馆、小酒馆和兵营里埋置地雷。

查波尔详细地向我们叙述了他的故事：

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设法去卡铁那，在那里我们希望能迎接一支空投伞兵小分队——一共十二个美国人，来帮助组织游击队。现在雪下得这么厚，我们知道要到那里去一定会在公路上遇到麻烦，因为德国人在公路上设下那么多路障。所以我们考虑乘坐卡车去，而且大模大样让谁都看得见。为了使事情象个样子，游击队员们送来了德国第二十空军师的两个奥地利逃兵，他们仍然穿着德军制服。这两个逃兵站在头里可以作为押送我们的德国兵。游击队员们说，这些逃兵是忠于盟军方面的。游击队设在贝罗诺镇的秘密印刷所，为我们所印造的假证件，将证明我们是一群被运送到勃伦纳山口去修筑工事的劳工。

目前，德国第二十空军师正在换防到我们这个地区。我已注意到这两个奥地利逃兵开始有点傲慢和行迹鬼祟，所以告诉了法勃力格中士要好好看住他们。他们还不知道法勃力格懂得德语。据法勃力格说这两个奥地利人主要是怀念他们旧日所属部队单位。现在这个部队又返回邻近地方驻防，因此他们很想回去重新参加工作，并且把我们这几个人出卖上交得上一笔奖赏。所以我们非得干掉他们不可。

我决定把去卡铁那行动推迟些日子。同时我已经同在这一地区工作的英国的伯力艾泰克上尉议了一切事情。而且我们已商定把这一地区由他和我各负责一半。我将接管两个旅的游击队，称之为拿纳特师部。

这支部队原是共产党的游击队。我发现我统率的这支部队完全是由一支将军组成的军队。这里有好多司令员、副司令、师和旅的指挥员和政委。但是没有多少普通游击队员去从事劳累而危险的工作。而许多共产党人所以能够使自己在地下活动中爬上重要职位，百分之二十是通过同纳粹打仗，而百分之八十都是靠和俄国的关系。我们很快就发现他们把缴获的德国武器都埋藏起来。显然他们是想在战争结束之后，当美国人撤出意大利时，他们将利用这些武器来为自己谋求好处。意大利人在战争结束后究竟怎么干，这是意大利人自己的事情。但我们向游击队空投武器是为了拯救美国人的生命，我们要把我们的武器用于这个目的。

从大部分的普通游击队员来看，他们都是好样的，而且也是勇敢的。有个共产党女孩子，她在战斗中的名字叫玛利亚，她成了我的私人通信员，她经常通过德国人的防线把情报放在奶罩和短裤里为我们传递信息。玛利亚曾经被共产党安排了来监视我，但是后来她慢慢变得喜欢我起来，当以后他们阴谋杀害我时，她还偷偷把消息告诉了我。

每天晚上我用无线电把情报发往在巴里的战略情报局的基地，报告弹药库和汽油库的位置，以便让空军能够进行轰炸。同时也告诉他们德国部队在公路上和勃伦纳山口的行动情况以及其他收集到的有关德国军队士气和粮食供应的情报。

我也还向游击队员们传授有关进行破坏活动的训练。其中有一项最有成效的东西就是我们那种有四个尖头的钢制的路钉，无论你怎么放总有一个尖钉朝上。这种钉子甚至小孩也能撒在公路

上。由于我们飞行大队有俯冲轰炸机，德国人的所有行动都在晚上进行。而这种四脚钉曾把大量德国汽车的轮胎戳穿。我们还在路上横放黑色电线接通着地雷，并且搞了好多饵雷，上面铺上马粪，进行伪装。我们这一切把德国人激怒得发疯一般。他们甚至试用一些狗走在他们头里以便踩响地雷。但是你曾经尝试过在一条笔直的大路上赶狗的味道吗？

到了白天我们就藏起来，同游击队一起住在一些被人废弃的屋子里或干草堆里，或躺进我们的睡袋里，隐藏在灌木丛中。

在这个地区一共有四个英国和美国派遣组织在活动，所有的供应全靠空投。我们正救获许多被击落下来的美国飞行员（现在我们的救援数字已积累到二十一个人）。分派给我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地下组织的渠道，把他们全部送回去，越快越好。

每当美国空投人员从飞机上降落下来的时候，我的游击队员们就要赶在德国法西斯的前面把他们找到。因为德国纳粹常常在这些人员着陆时就把他们枪杀了。降落人员因此都在即将着地之前一刻就急急忙忙掏出他们的左轮手枪。这样就给一些游击队员们造成了困难，游击队员们大都不会说英语，他们有时很难让美国空投人员相信他们是朋友。游击队员曾经带回来一个飞行员，据这个飞行员说，当几个粗鲁的家伙穿过田野向他跑去的时候，他立即掏出他那0.45的手枪，准备把他们干掉。后来有人开始用英语发誓，说了一堆美国香烟招牌名字和美国俚语，他这才把枪收起来。有时候德国也在这个地区空投间谍，冒充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因此我们对谁都不轻易相信，除非我们把他的名字和号码发往我们的基地后，基地回话证实确有其人，原飞行单位宣布失踪。

我们知道：由于德国人已看到在这个地区有过一些空投降落，他们不久一定会来个大扫荡，这就使我们很难把许多空军人员隐藏起来。我曾经让一批飞行员和游击队员把一个足球场的雪扫干

净，这样可以让大型的 C—47 运输机降落，以便把美国空军人员们带走。我也向基地发电报，要求派些人来，特别是一个带有齐全医疗装备的医生。我们不可能把伤员送到当地的医院里去，因为枪伤一眼就可以被人发觉，德国人就会把他们处决。在法西斯向我们围剿的前两天，我们的援兵到了。他们一个叫艾·布格哈迪特，是个医院的看护兵；一个叫查·茜卡拿，是个武器专家；还有一个叫格·迪拉尼，爆破专家。后两个人能说一口流利的意大利文。布格哈迪特带来了磺胺药、吗啡、碘酒、纱布和器械。我们这个地区长六十英里，宽二十英里，布格哈迪特建立了一个医疗网，每个医疗站有个懂一点医药常识的游击队员负责。

关于修筑简易机场的事情，我们差不多刚完成了一半时，得到消息：德国人正在邻近地区发动大规模扫荡。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躲进山里去，而且得动作快。我把半数美国飞行员送给了英国特工人员伯力艾泰克上尉，他能够带领他们经由一条逃走的撤退路线送往南斯拉夫。但是后来一场暴风雪封住了道路。他们无法在公路上走路，也对付不了山上十五英尺厚的积雪，因此就一直跟着伯力艾泰克直到战争结束为止。

法西斯集中了一支部队，他们装备着重机枪、迫击炮和来复枪。我们就钻进了另一个山谷，固守在山的顶部。我们在镇上的秘密组织工作得相当好：只要德国法西斯一有动静，他们就在五个小时内报告我们。我们得到消息说：德国法西斯出动了一百二十名士兵来到了我们山脚下的一个小小的乡镇并且在一家经常供应我们面包、黄油、酒和奶酪的小店里设立了他们的总部。这样我们的供应就断绝了。因此我决定给他们一个打击。

在午夜时分，我召集了二十名游击队员包围了法西斯士兵的营房。游击队员们带着有史汀枪，两支自动步枪和一支火箭筒。我们先向窗口里发射了一枚火箭，接着就大声呼唤他们投降。一个

法西斯士兵走到门口问我们投降的条件，但是当我们中有个人走向前去同他交谈的时候，法西斯就打起了机枪。于是我们把全部火箭向那座房子倾泻过去，我可以肯定那里一个不剩地被全部歼灭。到天亮时我们估计干掉了他们八十个人。我们这一次的袭击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是这一地区的敌人第一次尝到了火箭筒的味道。法西斯匪徒们纷纷想要离开这个地区，可是游击队员们的士气却大大高涨。参加这次袭击的二十个人成了英雄，在“下阿尔卑斯山”地区人人都知道他们，人人都想加入我们的行列。

然而，我们也还是处于极度危险之中。离我们三公里远就有德国军营，他们配备着装甲兵车。我知道他们对于这次袭击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因此，我把所有美国人集合起来，其中包括留下来的六名空军部队的小伙子，给他们发了食物和弹药，和三十名游击队员一起转移到这个地区的一座高山上。这座山高三千英尺。我们全都隐藏在山顶上的三个牧羊人的茅屋里等待着。

不久，一百二十名法西斯匪徒沿着山间的羊肠小道爬上山来了。于是我们用机枪消灭了他们二十个人，其余的人急急忙忙退下山去。有个游击队通信员，他通过法西斯的防线爬上山来向我们报告，有三千名法西斯士兵团团包围住了这个地区，而且很快就要向山上发动进攻。我通知雪尔斯卑向我们的基地发报，报告我们已经被敌人包围。我们需要罐头牛肉、五支自动步枪，两挺美国机枪和一门47毫米口径的炮。两小时之后，雪尔斯卑再次同基地通话，得知我们巴里总部的麦脱拉士中尉已经把我们要的东西包装好，并装上了飞机。总部的密切配合使我们在后方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我们知道我们是会得到支持的。

到了黄昏时，法西斯的卡车开到了山顶公路上离我们只有五公里远。我们在山上屏息以待，只等第一辆卡车开进对面山上一个短隧道内，这个隧道的两头都在我们的火力范围之内。当一辆

卡车从隧道中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突然给它一个迎头痛击，卡车只好退回隧道。整整一个小时，我们同敌人开展了猫逮老鼠的游戏，不管它在隧道的哪一头出现，一出现就狠揍它一下。最后我们把它报废了，他们把它丢弃在那里，山间的小路也给封锁了。

其实，我们在山上被包围住的也仅仅只有少数几个人，而天色很快就暗下来了。我们在琢磨一个问题：如果他们有胆量在夜间来攻击我们，那我们该怎么办？我给村里的玛利亚送了一封信。因为她象山羊一样地熟悉阿尔卑斯山的每一条小路，可以使空军战士们安全转移。那天晚上她来了，率领着美国空军人员在重重叠叠的山峦中走了三十英里的路到达了英国伯力艾泰克上尉那里。

我们发现，在夜晚，法西斯匪徒比我们更是害怕，他们都撤退到安全的地方去了。于是我们立即把武器装上了雪橇，悄悄地运到了离这里十五英里的另一座山上去。到当时为止，我们已把法西斯们弄得够受的了。据我方情报人员告诉我们，他们正在呼吁德国人来支援他们，可是得到的答复是：见鬼去吧！

我们得到这个报告后，就向基地要求能给我们一种“黑色”宣传品^①以便向法西斯散发。总部给我们送来了一本伪造的、看上去象是德国人所写的小册子。这小册子里说，法西斯们全是一群胆小鬼，因此最好的办法是立刻将他们送往前线去。我们把这份小册子在法西斯士兵里散发，结果造成了大量士兵开小差。另外还有一份宣传品，——假装是法西斯分子出版的，指责德国人把意大利人弃之不顾。除了散发这些宣传品之外，我们蛰伏在新的据点里，停止了所有游击活动。我们有意要使这个地区平安无事，这样我们就能从基地来更多的人。

法勃力格、雪尔斯卑、布格哈迪特、茜卡拿、迪拉尼和我分住在

^① “黑色”宣传品，指伪造的宣传敌方形势恶化的材料，使敌方士兵看到后误认为系自己国家印发，从而大大影响士气。——译者

两座无人居住的石头房子里，另外与我们一起的还有三名游击队员。他们一个叫波托斯，是从波尔萨诺来的一个二十二岁的小伙子。他的双亲被美国炸弹炸死，而兄弟们则被德国人杀死了。另一个叫维克托，他不久就背叛了我们。还有个小伙子叫波洛尼艾，他的双亲被德国人杀害，他比所有的人都勇敢。有次他同几个游击队员到贝罗诺镇，当他看到那里军械库里存着两挺机枪时，他很快把军械库的哨兵缴了械，把两挺机枪扔进一辆德国人的卡车。然后又来回四次把军械库的其他武器偷出来装上卡车把卡车开到山上我们的驻地。

法勃力格这时正在尽力准备挖洞以便埋藏备用电台、煤油、汽油、食物、衣服和弹药，防备万一我们被迫撤离。

我们中有一名最好的战士是个意大利人，他在战斗中的名字叫塞丹。过去曾在贝罗诺镇德国党卫军总部当司机。通过游击队的交通网，他使我们及时准确地得知德国人将怎样处置他们所俘获的人质，什么时候他们计划来进攻我们等等重要情报。他给我们极大的帮助。有好几次他亲眼目睹我们的游击队员们在德国人总部的院子里被处决。他眼看着曾经同他并肩工作的人一个个走上刑场。有时他们目光相接，塞丹会给游击队员们以鼓舞的眼色，向他们示意：人们一定要为他们报仇。从来没有人出卖过他。

有一天，我们从塞丹那里获得一件大新闻：大名鼎鼎的德国凯塞琳将军将要到我们相邻的一个地区进行视察，第二天将到达特里企阿诺，那里离我们有六公里远。迪拉尼、波洛尼艾和我几乎在那个倒霉的日子里整天带着两支自动步枪围着山头转，企图碰上凯塞琳，把他干掉。即使当时我们未卜先知，知道后来他被希特勒任命为西线德军总司令，也想不出更多的法儿搞掉他。但是我们被厚厚的雪地阻挡住了，而且当时他总是有两辆吉普车在他车子前面开路。

那天晚上，我在靠近特里企阿诺的圣·安东尼奥一家小酒馆碰上了拜鲁齐上尉。我们谈论有关的计划一直讨论到清晨3点钟。然后我把他带到我们藏匿的住所。我告诉他游击队员们带来了一只火鸡。我们都期望明天上午能有一顿美餐。因为好几天来我们一直吃玉米面。

第二天我起得特别早，一面烧着茶，一面不时地看看火鸡做得怎么样了。雪尔斯卑正在装起他的无线电通话机以便发走电报。突然一阵急促的叩门声。进来了一个农村姑娘，她是曾答应过一发生情况就立刻前来报警的。姑娘一看见我们就慌忙说：“德国人已经包围了你们。”我立即命令雪尔斯卑收起无线电台把它埋藏好。拜鲁齐正在叫醒其他的人。我下令法勃力格把所有剩余物资统统装进事先挖好的洞里。拜鲁齐和我带了几支自动步枪跑到房子上面的高地作警戒。我估计敌人会召来德国党卫军。那时我还不知道敌人原来出动了一千多人并且由施罗德少校亲自率领。

拜鲁齐拿着一副双筒望远镜，向后面的一个山脊眺望。他叫唤起来：“那上面有好几个德国人”。我夺过望远镜来观看。敌人散在四处团团围住了我们，而且在步步进逼。我们一定要冲出重围。那个农村姑娘已经走了，当然她留在这儿是不安全的。我们急速转移，沿着一条山间的小河床往上跑，河水深到膝盖地方。这时我们全部清清楚楚地暴露在德国人的眼前。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他们没有注意到我们，直到我们已跑了一千码光景。接着，一支机枪向我们四人扫来。法勃力格猛然扑地。我向他呼唤，但是没有回音。于是，我绕过河湾。

正当我跑到河流拐弯的地方，检到了一个游击队员丢下的一支自动白朗宁。于是我向敌人打了好几梭子弹，以打退德国人对我们的逼近。然后我丢掉枪支，沿小溪跑了四百码远。发现布格哈迪特和雪尔斯卑也都在这儿。他们全都筋疲力尽了。这时我

看到了大量的德国兵。一个德国兵隔着河向我们开枪。而另一个德国兵站在一个小山墩上，离我们只有二十码。布格哈迪特对我说：“上尉，他们就要把我们抓住了”。我拉着布格哈迪特的胳膊，扶他过了瀑布。我对他说：“我们得冲出去”。然后再跑到雪尔斯卑那里。现在两个德国兵向我们一齐开火。雪尔斯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他爬不起来也跑不动。于是我喊道：“同志！”雪尔斯卑说：“上尉，你快走吧，不要再跟我呆在一块儿。”这时我手上有一支0.45口径的枪，但我不能开枪，我一开枪他们准会向雪尔斯卑开枪。一个德国兵向我们跑过来，另一个在我们后面监视我们。这当儿我立即把身边价值一千美金的瑞士法郎和金路易金币塞在一块岩山的下面。因为我知道，如果他们发现我身上有那么多钱，他们就不会相信我会是一个身无分文的被击落的空军人员了。这是我一旦被捕后将要冒充的身份。

德国人走了过来，缴掉了我的手枪，命令我把雪尔斯卑扶起来并押着我们走上一条通往特里企阿诺的公路。特里企阿诺离这里有三英里远，那儿有八百多名德国驻军。如果我们到了那里，任何逃跑的希望都将化为乌有。这时，雪尔斯卑已经喘过气来了。当我们走到公路上的一条河边时，我知道已离特里企阿诺不远了。因此我对雪尔斯卑轻轻耳语说：我们得马上想办法逃走。我看到靠着公路有一座马厩，有一扇门对着公路，还有一扇门在后边。后面是一个深谷。我告诉雪尔斯卑，当我们走到马厩门前时，他要突然飞快地冲进马厩的前面一扇门，并且立即从后门逃跑，而我则围着马厩跑，当卫兵追赶雪尔斯卑从后门出去时我就把卫兵抓住。

当我们走近马厩时，我叫了一声：“现在！”就围着马厩逃跑。但是我却没听到雪尔斯卑的声音。我飞快地跑着并奔下深谷。我很幸运，因为卫兵忙于监视雪尔斯卑无法对我开枪。我一口气跑了四百码远，又走了一英里的路。最后我一直隐藏在河床边的一块

大圆石后边直到天黑，心里惦记着其他人的命运。

现在再回过头来谈谈其他的人。在我把布格哈迪特扶出瀑布之后，他沿河一直往前跑，直到他发现了一个山洞。而茜卡拿、迪拉尼和拜鲁齐几个人也各人钻进了山洞，他们一直躲在山洞里直到天黑。法勃力格可不太走运。三个德国人发现他藏匿在灌木林里，把他拉出来押上了一辆卡车，一直送到贝罗诺镇上党卫军总部去进行审讯。在那里，他曾经见了雪尔斯卑一面。雪尔斯卑通过塞丹告诉法勃力格只能一口咬定他们只不过是被打落飞机上的空军人员。塞丹几乎一刻不停地在那个地方进进出出，他当然享有完全的自由，很受德国人的信任。德国人对法勃力格百般折磨，但无法从他口中得到真相。

接着他们带来了两名被抓住的游击队员，他们是波托斯和维克托。波托斯一言不发，可是维克托却把我们全出卖了，并且带着德国人到我们埋藏武器、器材的山洞。在维克托供出这一切后，德国人就把他和波托斯一起吊死了。

当德国人从维克托的嘴里了解到法勃力格不是一个被打落的空军人员，而是负责我们地下活动的一个中士，并且知道他所说的一切事情，因此，德国人就更加毒打他，要他供出我们的电台。但法勃力格始终没有告诉他们。最后，德国人不得不放弃逼他招供的念头，把他送进了波尔萨诺监狱。他们把他加上手铐，押上了一辆汽车的后座。塞丹已经设法弄到驾驶这辆车的任务。这时，他对法勃力格说：“现在我们有办法了。我将给你机会让你逃走。我打开车门，咱们一起逃到山里去找游击队。”可是，法勃力格连连摇头，塞丹问道：“为什么不呢？”法勃力格说：“对我们来说，你留在德国人总部这个地方，要比到山里参加游击队更有价值得多”。这的确是真实的情况。但此时其人说出这个道理确是大勇。

另外，那个波洛尼艾也是沿着小河跑，看到十五个德国人在搜

灌木林，波洛尼艾用他的自动步枪一共击毙十个德国兵。但是他自己的胳膊和腿上都受了伤，这使他既不能跑，也不能打枪，结果被另外一群德国兵俘虏。从那时以后，我们再也没有看见过他。这是从村民那里听到有关他的情况。

我自己一直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等到天黑我才走进一所房子。这些老百姓都是同情游击队的（住在城外的老百姓都是这样）。他们给我饭吃。然后我去到一个名叫席勃鲁的游击队员住的屋子里。当他给我包扎腿上的伤口时。我听到了关于雪尔斯卑和法勃力格被送到圣·安东尼奥一所学校改建成的监狱的消息。接着我找来了四名备有自行车的女游击队员，布置他们四出打听波格哈迪特、茜卡拿和迪拉尼的消息。深夜时分，我向席勃鲁借了一支手枪，然后偷偷地摸进镇上，窥探了三个小时，希望能接近那座学校，帮助雪尔斯卑、法勃力格两人越狱。但是由于敌人封锁了道路，我还必须向山麓小丘那边去。大约凌晨4点钟，我闯进一个马厩，那里好象约有十多个人躲藏在那里。我刚躺倒在干草上眼睛就睁不开了。

早晨6点钟，我被那群意大利人的笑声惊醒了。他们还在拿德国人的蠢笨当作笑料。似乎曾有三十人左右的巡逻队正好打屋子右边走过，居然没有进屋子里来搜寻一番。有个意大利人悄悄地把门打开了一条缝，刚把鼻子伸出一点，突然听到呼的一声，吓的赶快缩了回来。看来，愚蠢的德国人已猜到我们是在这座屋子里，因此，他们让一队巡逻兵故意大模大样地往前去，而另一队巡逻兵则偷偷匍匐着逼近他们的目标。当意大利人窜出屋子迅猛地奔逃时，藏在侧翼的德国人立即开枪打死了两个意大利人。等到这些意大利人逃了有二百码远的时候，我估计德国人的注意力已转到他们身上，就偷偷地溜出门去。我的背紧贴着墙壁，踮着脚尖转向墙角，正在我背贴着转动的时候，突然我感到有一样硬邦邦的

东西紧紧顶着我的肋骨。我往下一看，是那伙愚蠢的德国人中的一个，正拿着枪对准着我。他命令我转过身来，押着我一直走到一条小河的尽头。

我过去在贝宁堡担任教导员的时候，曾教过一些跳伞兵学员如何解除一个带枪人的武装。你突然抓住他握手枪的手腕，把他顶起来，迅速地向右边用劲一拉，让他从你肩上滚过去，晕头转向地扑向地上。过去我只是向学员们这样讲解过，而且肯定地认为在战斗里会起作用。但是不少时候，我总私下里嘀咕这种办法究竟会不会真起作用。这次我试了，果然管用。这个德国人连头搭胸甩在地上——死了。

当时有几个德国兵正站在那小土墩上，他们看见抓我的人和我沿着河边往上走去。如果他们看到有个人往那里走而忽然不见踪影的话，那是会起疑心的。我已感到没有办法再隐藏了，因此决定大模大样地走出来。我把那顶山里人戴的皮帽子塞到上衣里，穿着美国陆军的裤子和英国的战斗服。当然我没有什么领章。我把一头黄发搞乱，使它看来尽可能象个德国人的模样。我走到河岸的另一边，故意装作对土墩上的德国人（我知道他们正在注视着我）毫不注意的样子。我还不时地东张张西望望，就好象我是德国搜索部队的一员。我还特意走到离他们二十码彼此清晰可见的地方，坦然地一直走向三百码外的一所房子，打开了大门走了进去，就好象这是我的营房似的。房子里面在火炉旁坐着一位老妇人和两个年青姑娘。姑娘们正在用手缠毛线。一看见她们，我就说，我是一个美军上尉，想找个地方能躲藏一会。两个姑娘手上还缠着毛线就站起来领我往右走去。她们丝毫不表示惊疑，就好象每天有美国上尉们来这里吃早饭一样。她们煮了几个鸡蛋，还在我的口袋里塞满了面包。然后一个姑娘把我领到一个深沟里，她认为我躲在这里很安全。于是我蜷缩在冰雪里一直躲到晚上10点钟，

走出去想打听一下那四个姑娘骑着自行车带来什么消息。听说迪拉尼和茜卡拿两人都平平安安地同游击队员们在一起。我托人带口信给他们，要他们尽力躲藏起来直到这次逮捕高潮过去为止。我还听说布克哈迪特正隐藏在一位爱国者的家里，而拜鲁齐也平安无事。

我十分需要休息，但是现在是必须继续进行工作的重要时刻。我记起来，靠近杜梭伊村旁的几个岩洞可以成为我们碰头的地方。我给布克哈迪特写了个便条，约他在那里同我会面。同时我也请求一个名叫布鲁诺的共产党领导人帮助我们。他指挥着麦塞尼旅，这支旅虽然属于共产党的拿纳特师，但实际上同我合作得十分融洽，而且真是同德国人战斗的。

我在晚上动身到杜梭伊村去。当我到达接头的岩洞时，我向附近的游击队打过招呼，请他们送些食物给我们。到了第二天早上，一个游击队员和布克哈迪特一同来了。布克哈迪特告诉了我自从我们分手以后的一切遭遇。他告诉我当他躲在一所房子里的时候，他亲眼看到了纳粹施罗德少校的部下在圣·安东尼奥广场把维克托吊死了。

那个共产党人布鲁诺带了三百个全副武装并训练得很好的士兵来到我们岩洞的时候，他介绍给我一个意大利的密码报务员以代替雪尔斯卑。这个意大利报务员的战斗名字叫齐齐。现在可以准备重新开始工作了。我们搬到了费尔迭里附近的一个新的地方，那里游击队几乎从来没有到过。可是它是一个重要的地区，因为越过勃伦纳山口通往奥地利的一条主要公路正好打这里经过。我向基地发出了电报，告诉他们德国在费尔迭里附近储藏炸药的地点。德国人有三所地下储藏所和两个仓库都堆满了炸药。这些炸药是德国人准备在撤离这个地区时用来炸毁桥梁的。盟军空军部队获得了我的情报，就对这些地下储藏所一个个进行了轰炸。这时

我们又获得了新的空降武器，可以装备源源不断新招募来的游击队员。我把茜卡拿和迪拉尼调来对他们加以训练。我们获得的武器包括三角尖钉，喷火枪和金钢砂粉。我把砂粉发给游击队员们，他们将把它撒在布尔萨诺和英斯布鲁克装货的机车轴承里，因为在那两个地方从山口开过来的火车需要换火车头。

我们的工作一定干得很不坏。因为到4月1日我们得到消息说，德国人增调了整整一个师（那时一个师有五千人）的兵力到这个地区来追剿我们。我们对于那种成天在山里流窜的生活已感到厌倦了。因此我们决定，当德国人开进丛林里去追寻时，我们就隐匿在一个城镇里。就在德国的一师人马扫荡“下阿尔卑斯山”的那会儿，我们都在城里继续干我们的工作。

在我们藏匿的地区，原先有四座关键的桥梁联结着意大利和德国。后来我们的空军炸毁了两座，还剩下布什和维多两座桥。游击队又把维多桥炸毁了，这样只剩下布什桥成为德国人通往比阿维河的唯一通道。桥上交通拥挤不堪。盟国空军曾经一再进行轰炸，但没有炸掉。因此这个任务就只能由游击队来完成了。

但我们在炸维多桥时，几乎耗尽了所有的炸药。后来总算从二十公里外的另一支游击队那里分到了二百磅的炸药。两天之后，游击队终于把布什桥也炸上了天，飞到一百码的高度。这样迫使德国人在后来的战争中不得不迂回绕道，多走六十公里路程。在他们的防线被盟军突破时，溃退下来的辎车和人员都挤在那个地方，汽车一辆紧挨着一辆，动弹不得。

在费尔迭里的城外不远，我建立了一个指挥点。这是我们在靠近一条小河边挖的一个地洞。夜晚我们把山上的那些空投装物箱筐运到这里来，把它们拆了弄平作顶板，在顶板上铺上一层草皮和羊齿草。入口处伪装了一扇薄薄的装有皮铰链的木头门。上面用铁丝捆扎好一层草皮，不断浇上水，草皮仍保持鲜绿。我同布

克哈迪特、迪拉尼、茜卡拿和齐齐都住在这个洞里。到晚上，我们就出去同布鲁诺和他的麦赛尼旅的军官们碰头。现在布鲁诺已经拥有五百人马了。每当他们实在没有什么事情可干时，就把钢笔型定时炸弹和手榴弹扔进德国兵营闹着玩。这可使德国人经常处于狼狈的境地，因为他们不知道扔这些玩意儿是不是表明游击队要发动一场进攻战。而我们又故意不时地发起一次袭击。游击队员每天晚上在公路上用饵雷和火箭筒总可以击毁二、三辆德国车辆。在白天德国人怕盟军飞机袭击不敢在公路上走。而游击队的活动又使他们在晚上的出动也感到惴惴不安。游击队在每次袭击之后都要开到十五公里以外去住，停几天之后再发动下一次袭击。

到了4月20日，我们主力部队的反攻进行得十分顺利。我立即意识到，如果让德国人经过这里撤退到“上阿尔卑斯”山和勃伦纳山口的话，那就得花好几个月才能把他们撵出来。最好的办法是把撤退中的德国人堵截在我们的主力部队和游击队之间。在阿尔卑斯山南面进行活动，由布鲁诺统率的拜鲁齐和麦塞尼旅，它们正稳健地发展，不再需要我们的帮助。因而我决定同埃托里联系。他是游击队英勇的范·科多伏里旅的司令官，这支劲旅正在“上阿尔卑斯”山战斗，我们可以加强它的力量。

要进入上阿尔卑斯山地区，我们必须越过三处德国路障，并且没有陆上的通道，因为那里的山几乎都是悬崖峭壁，路全是从峭壁间炸开的。幸好，我们曾同一位有爵位封号、和我们站在一起的意大利妇女有过联系，她是个女侯爵，正好在边境地区拥有很多的土地。她是一个才三十岁出头的金发碧眼女人，并不美丽但有一个女学生似的体形。另外，她很有胆略。她还有一点对我们特别有用，因为据说她是这一地区德国民防司令施密特博士的情妇。不管怎么说，她可以在任何时候使用施密特的汽车。实际上这个女人同我们地下组织紧密合作，经常在经济上和供应上给予支持，并

且帮我们藏匿被击落的英国和美国的飞行人员，直到能把他们送过边境。

在我们同她接上头以后，女侯爵安排了一辆卡车来接我们并把我們一直送到科迭纳。4月24日凌晨3点30分，在蒙蒙细雨的早晨我们到达了这位夫人在边境上的别墅。这时，这辆烧木炭的大卡车开进有院墙围起的庭院里停了下来。这位夫人用很好的火腿蛋早餐招待我们，并且还有代用咖啡。吃完早饭，抽完最后一枝香烟，大家才走向卡车。卡车后面装得高高的是三英尺见方的大箱子，都用钉子钉在一起。在前面——也就是紧靠司机背后有一个小洞，我们可以从洞里爬进去。另一只箱子钉在它上面，并且还有一块大防水帆布用绳子绑好覆盖在所有箱物之上。这本来是为躲藏两个人而设计的，但是迪拉尼、茜卡拿、齐齐和我们都挤进去了，还带着全副装备。

当卡车开始上路的时候，我们心里总是反复为三件事担心：1. 德国人会搜查这辆卡车；2. 我们自家的游击队员可能出于误会用火箭来伏击我们；3. 美国的战斗机用二十毫米口径机关炮来打穿我们。还好，那天有毛毛细雨和迷雾，排除了第三种担心。

我们是在拂晓前一会儿开始离开的。当我们抵达德国人的第一道路障时，哨兵就从屋里走出来站到路上，我们的卡车司机把车停了下来。我们听到司机在对哨兵编造说，他是曾经去贝罗诺镇为德国的修路工人取这个月的配给香烟的，可是那里没有香烟，只好把些空箱子拉回来。听到这里，我们的心几乎要从嘴里跳出来。要是他说箱子里装满香烟，哨兵就可能要上车拿几包，并且立即会发现我们。

当我们通过第三道路障时，我们想这是最后一道关了，开始稍感轻松。但突然，卡车又放慢速度并且停住了。哨兵要司机掀掉盖在车上的帆布，以便他能看得更清楚些。我们蜷伏着象死人一

样。我们可以听到司机解开绳子时那种吱吱嘎嘎的声音以及拉开帆布时的沙沙作响。寒冷的细雨淅淅沥沥掉在我们箱子上。然后又听见哨兵告诉司机要把这些箱子搬下来看看。我们蜷缩在这些箱子里，无法开枪。再说由于我们还有两台无线电台，我们就无法把自己说成是四个无害的飞行人员。

一个德国兵爬上了箱子，并且拉开最上面的一只。当然他是拉不动的。正在这时，刮起了一阵狂风，濛濛细雨一下子变成了滂沱大雨。“行了，让他开车吧”。另一个德国哨兵不耐烦地说：“让我们进去避避雨吧！”我们可以听到这些哨兵跳下卡车，皮靴踩在砂砾上的吱吱声。他和其他三个德国哨兵一同走到几码远的掩蔽所里去了。

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到达了阿尔卑斯山谷里的马里松——一座小小的意大利村庄。大家同埃托里一起坐在当地一家咖啡馆里，饱餐着由他叫来的一顿午饭。

当我们吃饭的时候，埃托里告诉我们，他的游击队现在正控制着处于米塞克纳和我们过去占领的据点之间的整个地区。这个地区目前有德国驻军七百人。我决定明天早晨攻打米塞克纳。埃托里的游击队员们都是好样的，我可以看出来在他们之间没有象在共产党的游击队里常见的那种强调立场的事。当天晚上我派了他们中的二十个人，装备着自动步枪、机枪、手榴弹和火箭筒，爬上米塞克纳后面的一座山，占据一些可以俯瞰小镇的山头阵地。第二天拂晓，我同埃托里、茜卡拿和其他二十名游击队员乘了一辆校车开往米塞克纳。我的计划是这样：当德国人走出他们的掩蔽处沿公路攻击我们的时候，那些早已埋伏在陡峭绝壁上的游击队就突然向他们开火。

马里松的居民们早就厌恶德国人。德国人在令人厌烦的战争年月里骑在他们的脖子上作威作福太厉害了——他们占据老百姓

的房子，抢吃老百姓的粮食，并且把村子上最壮的人抓去当苦工。因此，当他们看到他们的游击队员集中的时候，而且装备那么好，又是由美国人率领，可高兴了。几乎有一百个老头和小孩紧紧跟随在我们的车子的后面。他们有的用镰刀，有的用棍子，有的用屠刀、毛瑟枪、大铁锤……武装了自己。我告诉埃托里，让跟在我们后面的那些老百姓别靠得我们太近，以免使他们受到伤害。当我们到了离米塞克纳有五百码的地方，就进行部署，并且立即开火。这时德国人企图从镇外撤离，埋伏在山上的游击队也开了火。德国驻兵很快就投降了。我们把他们的武器发给了游击队员。

接着，我忽萌一念。当时巴顿将军正在奥地利边境地区，而俄国人则抵达维也纳。我们已封锁了勃伦纳山口，并控制着整个山谷。于是我给那些俘虏的德国兵印发了通行证，允许受伤的人可以回到德国自己的家乡去。在那些通行证上盖上了我的名字的印章，名义是美国陆军和范尔·考迪瓦尔旅指挥官。发完后就让他们自由了。以后所发生的一切正合我们的希望。我听说，后来这些人向那些仍在打仗的德国人显示了这些通行证。之后，好多德国兵都扔掉武器逃回家去了。

我们在这个地区的扫荡，封锁了去勃伦纳山口的通路。到4月28日，我得到消息说正在撤退的德国人向北朝着山口在移动，已到达费尔特里。埃托里派人把镇北面的一座桥梁炸掉了，同时又派了个小组上山砍树，把木头放在附近，这样一旦美国人来了需要一座新的桥梁的话，很快可以重建起来。我们在路的两侧设下了埋伏。埃托里带了十个人守在被炸毁的桥的附近。当德国人退到这里，正要动手重建一座桥梁时，埃托里的人立即向敌人开火。德国人不得不拖了一百二十具尸体退到了克波列里。从一个伤兵口里，我了解到在我们活动的这个地区，共有德国第五〇四装甲营的五百人和三千国防军以及施罗德少校率领的三百名党卫军。

从六百码高的山上俯视下面克波列里，可以看到党卫军正在把老百姓从屋里拖出来，象赶羊似地把他们赶进教堂去。埃托里和我立即转到后面山谷里的小村。不一会儿，一辆德国汽车上挂着一面休战的白旗在大路上开来。车上有一个是克波列里的牧师和一个德国的中士。中士带来了施罗德少校的一份傲气十足的最后通牒，说：如果我们不让全体德国军事人员通过的话，克波列里的所有居民都将被处决。埃托里对这个通牒作了这样的回答：如果有任何居民受到伤害，那么德国人休想有投降的机会，我们决不饶恕。对此，这位克波列里的牧师开始哀号起来，他请求埃托里救救那些无辜的居民。但是埃托里不为所动（当然这得有足够的勇气）。我也支持他，德国中士跑回去了。过不久，施罗德少校送来一个口信，他要求同我们举行会谈。我知道他已认识到他们已陷入罗网，既无法突出重围，也无法后退。

后来，施罗德同海姆上尉来了。海姆长得很英俊，他是装甲营营长。我让施罗德先谈。他大大地发挥了一通，并且一再重复他准备对居民采取措施的威胁。但是我也告诉他，如果他敢对居民动手，我们将要怎样对付他们。

然后海姆发言。他讲得直截了当，而且绝口不谈有关居民的事。他说，他所最喜好的就是跟我们好好地打一仗。但是他几乎已没有弹药，既然已无回击之力，他不想让他的部下去送死。他说：“就我的部下而言，我已把我们自己置于你们掌握之中。”施罗德则说，在他考虑投降之前，他必须先知道，他是在向谁投降。我说我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上尉霍华德·查波尔。他说他情不自禁地要说，我完全象个普鲁士人，个儿高高的，一双蓝蓝的眼珠和金黄的头发。接着他又说，他经常听到有关我的勇敢的行为，因而能够向这样的人投降他是感到十分高兴的。因为我是个军官又是个普鲁士人，因此也一定是讲信义的君子人。对待他和七名党卫军军官

会完全象他对待我那样——如果我被他俘虏的话。我回答说对这一点他可以一百二十个放心。第二天，茜卡拿、埃托里、齐齐和我带领了一个营的游击队向北朝着奥地利边境挺进，并且很快俘了六百名德国驻军。在那里，我们又看到了好多在米塞克纳被我们释放的德国人正通过那个地方，他们向我们出示了我签名的那些“通行证”。而被我们俘获的六百名占领军，他们也决定要回家去。

从这里过去不远是一个叫考尔·法斯柯的阿尔卑斯山的村落，那里驻有德国后备队三千五百名士兵。这些人高兴之至地投降了。所有从柏林来的通往意大利各地的电话线和无线电联系全都要经过考尔·法斯柯。现在这个地方都已落到我们的手里。从阿尔卑斯山前面通往奥地利边境的公路已全部打通，只待美国军队过来了。

我借了一辆德国人的汽车日夜兼程驶往贝罗诺。5月3日，我终于同第三三九步兵团的指挥官接上了头。我告诉他，从此地到奥地利边境的道路已全部由游击队控制着。游击队正在等待着他的光临。同时还告诉他由于路上积雪非常厚，他的卡车轮子上应当挂起铁链子；并讲了其他有用的情报。之后我又驶向费尔特里去同第八十五师进行联系了。

我已经有五个多月没有理过发，看起来象个游击队员，不象个正规士兵。当我正在等候见到G-2(负责陆军情报)的上校时，随手拿起两本《星条》杂志翻阅，看看最近世界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突然我听见一个人对我大声叫着：“你在这儿到底是干什么！你是个什么人？”我一看发问的是一位少将，就站正了回答道：“长官，我是查普尔上尉，战略情报局的。”他又问：“你是个军人吗？立正！离开这个办公室。”

我走出了办公室，向着我所在的山头那边走去，这时管陆军情

报 G-2 处的上校来了。他说，非常高兴地得到我的报告。前哨部队的人见到我们，得到我们提供的新鲜情报总是十分高兴。可是那些最高司令官们，有时却并不愿意承认任何别的人曾给予他们有益的帮助。

我后来又回到了阿尔卑斯山麓，把我们俘获的七千五百名俘虏、卡车、武器和装备全交给了战略情报局。在向我们的军官们汇报了我所了解的全部情况之后，我同埃托里和塞丹开始出发去搜捕战俘。

我们不希望漏掉任何一个人。例如，我们清楚地记得史第夫·霍尔的情况，这个美国小伙子是在科迭纳附近从事着同我们相同的使命。史第夫·霍尔是单独滑雪到科迭纳去的，他是要去炸掉一座给铁路供应电力的水力发电站。他在一次暴风雪中被捕了。据目击者说，第二天人们发现他已毫无知觉地躺在教堂的附近。德国警察把他送进了监狱。后来有个叫特尔的是德国雇佣的间谍，证明史第夫是美国的特工人员，结果史第夫在布尔萨诺被处决了。我们把特尔抓了来，他写了一份坦白书，供认他如何骗取了史第夫的信任，然后又出卖了他。我和法勃力格中士后来又见到面，这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大好事。他曾经同雪尔斯卑一起被送进了党卫军在布尔萨诺的监狱。当战争即将结束的前夕，他溜出了监狱逃到了米拉诺。那里还潜伏着好几名党卫军的高级军官。他走到了党卫军的兵营里，并且说他是美国陆军“上尉”法勃力格。他命令这些党卫军军官不得擅离兵营。他真是一位有说服力的演说家，他的威吓战术居然奏了效。当美国第十师的部队打进来的时候，他把整个城镇——承蒙法勃力格中士的足智多谋——移交出来。

塞丹则处于左右为难的情况。战争将结束时，盖世太保一直在搜捕这个人，因为他们最后确凿有据地发现他是为我们工作的。

间谍。但是很多不了解真相的游击队员记得，塞丹曾经为德国人开过车，因此也要抓他。我最后给塞丹在我们的反情报部队里搞到了工作。他给我们弄到好多战俘。

至于女侯爵呢？我最后听到的消息是：一位驻在附近的美国陆军上校经常把吉普车停在她门口。她做的**意大利**点心有一层薄霜似的酥皮。

纳粹制造伪钞的阴谋

美国乔治·J. 麦克纳莱少校及小弗雷德里克·桑顿

在希特勒的军队投降以后不几天，一位驻奥地利的美国反间谍活动军官情绪激动地打电话给德国法兰克福盟军司令部我的办公室。他向我报告说，有一个德国上尉把装有无数英镑钞票——价值好几百万美元——的一辆卡车交出来了。他还说，大量的钞票正沿着恩施河上飘流。那些居民和盟军士兵正在忙碌不停地在那里捞钞票。

怀着惊讶和迷惑不解的心情，我即刻赶到拘获德国上尉和卡车的地方。那里，有二十三个象棺材大小的结实箱子里，成捆成捆地放着英格兰银行的钞票。根据附在每只箱子上书写整齐的钱数很快粗略一算，这笔珍藏的财富总共有二千一百万英镑！即使用最好的放大镜我也无法判断这些钞票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把情况告诉了我法兰克福的英国同事们。不久，英格兰银行直接打来了一个电话，当我向他们描绘我们的发现时，在电话线的那头传来了拉长了的惊讶声。过不了一会儿，英格兰银行的一位代表从伦敦来到了法兰克福。这个代表是个身材高高、瘦瘦而又沉默寡言名叫理弗士的绅士。

我们把他带进了一间有重兵把守的装着财富的小屋子里。他

一个一个箱子地逐个看遍，还用手指翻弄这些钞票。最后他站住了，一声不响地直盯盯地望着空间。过了几秒钟，他慢条斯理地用一种受过教养的人的英语咒骂起来。最后他说：“真抱歉，可是制造这些东西的人使我们付出了多么高昂的代价啊。”

就那个时候开始，理弗士和三个来自苏格兰场（英国警察情报机构）的侦探和我进行协作来弄清楚“彭哈特行动”这一惊人案件的来龙去脉。

首先有人告诉我，大概在1943年时曾经发现有一批惊人数目的伪造英镑钞票正从苏黎世、里斯本、斯德哥尔摩和其他一些中立国家的经济中心流向伦敦。它们开始成批出现，一批大约总在十万英镑左右或者更多些。英格兰银行的专家们清楚地看到：这批钞票是由技术极为高超的能工巧匠们精制出来的，并且由组织得十分严密的集团来加以分发的。不久，一个德国的间谍在爱丁堡被捕了。他是乘着水上飞机来到苏格兰海岸，并用橡皮筏子登上岸来的。在他带的手提箱里，装满了连英格兰银行都认为是印制得最为精致的伪造英镑钞票。

英格兰银行此时意识到这个问题与德国政府本身有关联，这将使英国的声誉岌岌可危。因为几十年来，全世界的银行把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钞票几乎当作黄金来对待。对时局惊慌不定的欧洲人和亚洲人都储藏它来应付乱世。现在成千上万的英镑假钞票在英国国外大量流通。如果人们对整个盟国和中立国家中流通的英镑都产生怀疑——特别是处在进行战争的中期，其结果不仅对英国而且对同盟国家都会带来极为严重的危险。

当英国宣布所有在外流通的各种票额的英镑钞票一律作废，必须换成新设计的五镑钞票时，整个金融世界为之震惊。因为在规定的日期以后，所有旧的英镑钞票都得作废。英国议会也乱作一团，英国财政大臣在向议会解释时十分谨慎，他说大规模地伪造

英镑钞票是采取这次行动的原因之一。他没有细节说明，而英国报纸想追根究源时，也遭到了政府劝阻。

事实是，在三年中纳粹已经印行了数不清的伪造英镑钞票，这些伪币破坏了大量资产，扰乱了银行和工厂，使英国国库损失了好几百万英镑。

在了解到这些背景情况之后，我们开始搜寻制造伪币的策划人和机器设备。

碰上机会，找到印制的机器设备并不困难。那个交出成箱成箱伪钞的德国上尉告诉我们，他是从一个党卫军军官那里接受这些东西的。这个军官的卡车在里特尔一席伯夫附近的村子里出了事，坏了。那个上尉知道的全部情况就这一点。根据这个线索我们赶到了里特尔一席伯夫，在那里，我们在德国人想作为他们最后据点的阿尔卑斯山地堡里发现了一个地下网道，有各种仓库和车间，象蜂窝似地密布其间。在第16号坑道——二百英尺长，从一座山的旁边钻眼而成的一个巨大的竖井延伸开去——的里边，我们发现了印钞票的印刷机和其他机器。但是没有搜寻到铜版、纸张和原始记录材料。理弗士对我们说：“老伙计们，现在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去寻找曾经在这里主持其事的那些家伙们。”

经过一番实地调查，事情的真相终于逐步暴露了出来：所有曾经在这个地下工厂工作过的人，后来在德国投降的几天之前被全部驱赶到离这里四十英里外的埃明齐集中营里去了。我们急忙再赶到埃明齐，然而所有参加过印刷伪币的人都已不在了。当集中营被解放的时候，这些人都自行离开集中营各奔东西了。幸好，所有集中营的档案资料都保存完好，显示了一种典型的德国人的精确性，即使在第三帝国已陷于最后疯狂挣扎的时期也是如此。档案上罗列着这个奇怪集体里各成员的姓名和出生地点。这样我们就开始了为时达数月之久的搜寻活动，踏遍前纳粹帝国的辽阔属

地。

我们一个一个地寻找，终于搜查到四十多名最重要的、伪币制造人犯。其中我们了解到有个捷克人名叫奥斯卡·斯加拉的，是纳粹的一个政治犯，他是这项活动的主要记账员。经过捷克警察的帮助，我们找到了他。他正在派尔逊附近的一个小镇上安静地经营啤酒生意。斯加拉是一名非常好的合作者，工作十分精细。他保留了下来的一本小册子，上面详详细细地把制造伪币的工作情况一天天地记载了下来。于是这个“彭哈特行动”的奇妙的故事的最后一章全部被揭开了。

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德国党卫军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曾经创建了一个秘密组织，这个组织的目的是用大规模伪造英镑来破坏英国的经济。这个计划直到彭哈特·克吕格少校1942年来主持时才算真正走上轨道。克吕格少校当时是一个年轻、足智多谋的纳粹分子，他了解到这项事业的一个困难是为庞大的伪造工厂招募一批具有高超技能的专门人才。而当时帝国银行和德国的马克印制所里的一些专家们，他们大多是举止严肃的旧普鲁士公职人员。这些人是绝不会同意去干伪造别国货币那样的事的，即使是战时也如此。克吕格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有一批德国很有本事的印刷技术人员被关在集中营里，是因为他们的人种系犹太人，这批人可以招来为他工作，而且同时又可以很好地保密。

彭哈特·克吕格把这些技术人才一个个搜罗过来，他答应给予他们优惠照顾，并把他们转送到柏林附近的奥伦伯格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里（有些技术人员早已关押在那里）。他把这些人单独关押在一个代号为19号街区的院子里，四周布满着铁丝网与外界隔绝，并从臭名昭著的“死硬旅”中调来了警卫人员。这些警卫人员是经过挑选，起过誓要绝对保守秘密的。于是彭哈特就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了。一所最新式的印制伪钞的工厂建立起来了。所有印

版都十分精细，一家德国的印刷机械制造商中断了战争用品生产来供应克吕格所需要的各种精密机器。一家著名的造纸厂也重新精心制作英格兰银行用来印制英镑的那种质地良好而又轻又薄的纸张，并带有精细的水印图案。彭哈特生产出来的第一批试验品被送往德国驻土耳其、西班牙、瑞士、瑞典的使领馆的盖世太保代表手中，要他们在当地银行中试用一下。大部分的伪造英镑被人们接受而没有引起怀疑。希姆莱对此大为高兴。

当伪造的英镑印出来之后，要经过严格地检查和评分等级。第一等钞票，也就是最好的产品，大都用于在一些中立国家里的采购任务，也用作希姆莱在国外比较重要的间谍和破坏者的活动经费。第二等钞票，这些伪钞有极小的缺点但仍然是上好的膺品，供应纳粹占领区里盖世太保机构，在购买情报或给合作者津贴时使用。因为这些人总希望万一事情不妙时，手头随时有英格兰银行的钞票可以办事。第三等也是一种能乱真的伪币，它是积聚起来用于小笔交易或是随时发生的各种需要。

作为克吕格第一等膺币的受害者中最著名的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一个名叫“西塞罗”的阿尔巴尼亚间谍。此人在第二次大战时是英国驻土耳其大使的男管家和贴身男仆。当他把从英国大使馆的保险箱里偷出来的机密文件卖给纳粹德国情报机构而取得了价值一百万美元的英镑报酬时，他还真以为自己是历史上酬金最高的间谍呢。另外一个倒霉蛋是一个瑞士的商人，他从一家卓有信誉的土耳其银行深信不疑接受了将近二十五万这种英镑钞票。这些钞票几经周折又转到一家瑞士银行，最后再通过好几个中立国家回到了位于索列得尼特大街的英格兰银行总行。在那里克吕格的伪制品被警惕性很高的出纳员揭穿了。

1943年意大利人民把墨索里尼抓住以后，关押在一个秘密地点。为了发现这个秘密地点，纳粹化费了大量的贿赂。党卫军头

子奥托·史考尔桑尼那时对这个秘密监禁点进行了突然袭击，然后把墨索里尼运到了希特勒的帝国暂时安下身。为了办成这件事，纳粹帝国用掉了五万伪造的英镑。

即使当这个“彭哈特行动”还在事业兴旺的时候，克吕格少校心里就在暗暗发愁。他的伪造英镑的工厂每月可以炮制四十万英镑的钞票。希姆莱定下的伪造英镑的数字很快就完成了。于是，少校就同他的工头们密谋商议要减少印刷量，并且把大量的第一等的假钞票报废。有一天对他的记账员和主要助手说：“如果我们不把这些减下来，我就要被送到前线去打仗，而你们就全要被枪毙。那就未免太遗憾了。”他这样想对于英格兰银行倒是件幸运的事。就在克吕格的命令下，几十万可能在市面上流通的第一等伪造英镑钞票被悄悄地装进了一只只大木箱，搁置起来。

为了保持“彭哈特行动”能充分发挥生产能力，克吕格又着手搞另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在他心目中已酝酿好久了，就是伪造美钞。但是他手下的技术人员发现这可是件更为棘手的工作。首先美元钞票要用的纸就没有仿造成功。德国最好的造纸厂经过周密的科研试验，也仅能制造出一种极粗造的摹仿品。甚至克吕格手下最有才能的工程师们也难以搞出美钞所需要的复杂的金属图案刻版和印刷颜料。

克吕格心中捉摸，在被德国占领的国家里，至少总可以找到一个对于制造美钞有经验的职业能手，可能会帮他突破这个难关。于是盖世太保和希姆莱的另外一些秘密特工人员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搜索活动。最后在德国的监狱里，他们找到了索莱·史墨列昂纳夫，一名伪造钞票的一流高手。不过，索莱从来没有去过美国，可他却精于伪造美钞，其技术之高明曾经不止一次地引起美国秘密机关的注意。他曾经由于伪造美钞在好几个欧洲国家里蹲过监狱。

现在，索莱觉得“第19号房子”是个乐园。他对他的同事说：“请你们想一想吧！造假钞票的工厂居然有警察守卫！”在1944年底，他已准备停当，开始伪造五十元和一百元票面的美钞——德国帝国印制公司的专家们已经加以检验，对质量十分满意。“彭哈特行动”接到命令：尽快作好准备以制造这种美钞。

可是，这时战争的浪潮已经逆转对帝国不利。柏林每天受到盟军更猛烈的轰炸，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正在盟军轰炸的目标地区之内。希姆莱企图停止“彭哈特行动”，但是克吕格说服了他的上司，让他把工厂和他的人员转移到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一个有碉堡守护的地下工厂去。从萨克森豪森搬家搬到那个新地点化了好几个月的时间。那是1945年4月份，当时“彭哈特行动”在里特尔—席伯夫后面的第16号坑道里还没有来得及安装好印刷机器，美国军队已经包围了这个碉堡地区。因此索莱从来没有使用过他所精心刻制的印刷底版。

这时，希姆莱亲自向克吕格下了命令：把“彭哈特行动”遗留的痕迹彻底消灭掉。所有有关档案马上加以销毁，把所有伪钞和空白钞票纸全部烧掉，把一切底版和印模沉到附近托波列兹湖的最深处。所有一百四十名“彭哈特行动”的人员全部转移到艾奔塞集中营。打那时以后，这家伪造钞票的主犯克吕格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尽管后来派了大量警察集中一切努力企图找到他，但是音讯杳然。当时党卫军官员和参加“彭哈特行动”的囚犯们化了整整三天时间来焚毁各种记录和质量较差的钞票。足足动了一个班的人力把那些印制的伪钞的底版和许多装满假英镑钞票的箱子沉到托波列兹湖湖底。可是这些人总舍不得销毁掉世界上印制得最好的假英镑钞票，因为这些第一等钞票是克吕格为了避免产生“超产”现象而把它们搁置在箱子里的。正象战后有一个参加印制伪钞的人后来告诉我们那样：“这些钞票印得漂亮极了。”于是，装着这些

伪币、棺材大小的箱子被装上了卡车，卡车司机被命令开到附近某个合适的地方去埋起来，等将来重新挖掘。

上面所说的这些卡车之中有一辆就是向我们交出车子和钞票的那个德国上尉所驾驶的。其他的卡车则不知去向。因为据说那些急于逃命的党卫军人员当时只知道想法换上老百姓的衣服溜号，匆忙间只好把箱子扔进恩施河里了事。在阿尔卑斯山由于春雪融化而泛滥起来的汹涌的河流中，那些装着头等伪钞的箱子泛涌上来撞着岩石而崩裂开来。人们高兴地围着箱子去打捞钞票（后来到1959年7月，在托波列兹湖底打捞到了许多伪钞的印制版和好多箱伪币）。

我们的调查既告结束后，我们算了一下整个“彭哈特行动”所制造的伪币总和，结果使我们大吃一惊。根据奥斯卡·斯加拉的笔记本和其他克吕格手下工人的确凿证据，这个纳粹少校总共伪造了九百万张英格兰银行的钞票，其票面价值一共值一亿四千万英镑，等于那时候五亿六千四百万美元之数！其中有价值六百万美元的伪币进入了土耳其和近东地区；一千二百万美元价值的伪钞流进了法国和荷兰等国；三千万美元价值的伪币作为支付德国的各项费用付给了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和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国家。另外有价值二亿五千万美元的伪币则逃脱了在里特尔—席伯夫被焚的命运，或者被奥地利人、俄国人、美国 and 英国人从恩施河里打捞出来，或是被党卫军挖地洞藏起来准备将来之用。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人们从水底里打捞上来而未交公的克吕格的那些杰作，不断出现在英国的赛马场、欧洲的黑市市场甚至纽约的外币交易所里。

英国发行的一种新的五镑的钞票——上面画有一种细金属线，系用一种秘密的工序印上，可以防止任何人伪造印刷——用来代替过去的老货币。但是对于英国人以及对我们美国人来说，“彭

哈特行动”可是确能乱真的事儿。它将来可能还会重演。

阿道夫·希特勒的末日

小弗雷德里克·桑顿

“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的《希特勒的末日》一书，系特雷弗-罗珀少校所著，他是英国情报部指定专门研究此案的英国历史学家。“双日”公司出版的《死亡前的十天》一书，系美国海军预备役军官摩斯默诺上校所编纂，他曾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名法官，参加过纽伦堡的审判〔摩斯默诺编纂该书时包括了盟军情报机构提供的各种各样材料和他自己详尽的研究〕。这篇文章就是根据上述两本书的有关内容写成的。作者弗雷德里克·桑顿在德国投降后不久就到达柏林，并同许多调查希特勒死亡事件的情报官员进行过讨论研究。

纳粹德国崩溃后的第三个星期，苏联保安警察副司令伊凡·尼基塔尼少校在柏林向莫斯科发了一个报告说：希特勒既没有在地下庇护所自杀，也没有象大家信以为真的在掩蔽所附近他的尸体被焚——当然，他如果真是亡故了的话。

也在1945年，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情报机构发出命令，要对此立即进行彻底调查。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情报专家所组成的特别小组，逐步地弄清楚希特勒生命最后时日的一切细节。盟军曾经俘虏了二十八名在柏林战役中同元首十分接近的人，对他们进行了不断的反复讯问，对他们交待的情节作了核对和反复核对。在盟军对德国独裁者结局的调查完成之前，查阅了不知其数的档案文件，堆起来象山一样。

大约在1945年4月30日下午3点30分，在地下的元首的掩蔽所里，阿道夫·希特勒坐在他妻子的旁边，把自动手枪枪口对准自己的嘴巴，扣响了扳机，而伊芙·希特勒嚼碎吞咽了一瓶氰化物。到晚上10点半，把被焚尸体的残骸浸透了汽油，在总理府花园里焚

毁了——由龙列斯·列登霍甫将军和一小分队精选卫兵掩埋了。在那个晚上，苏联战线上的火炮向这个地区整整轰击了一夜，把房子土地都掀翻了。希特勒的尸骨支离破碎就如同他的“千年帝国”已彻底崩溃一样。

然而，莫斯科并不希望事情如此发展。俄国领导人千方百计地运用一切办法来阻挠我们对希特勒的调查。被俄国人捕获的一些关键见证人——包括列登霍甫将军，都已销声匿迹。我们的情报人员已了解到，在焚毁希特勒尸体的地方，俄国的调查者已经发现了一块确证无疑是希特勒的下颚骨，这是经过两个曾经给希特勒装过假牙的牙科技术师鉴定的。这块颚骨和两名技师都被送到了莫斯科，以后就再也没听到这方面的消息。

斯大林亲自定下了俄国人对此事的官方态度。他在波茨坦会议上的发言曾使杜鲁门总统和贝尔纳斯国务卿大吃一惊。他说：他相信希特勒仍然活着，并且正躲藏在西班牙和阿根廷。斯大林看来决心要使希特勒“活着”。柏林的那些最后的可怕日子的记录——一个发了疯的暴君想把整个国家和他同归于尽——似乎不太合乎斯大林的心意。

1945年4月20日是元首的生日。在总理府花园地下五十英尺的元首掩蔽所里，德国陆军和纳粹党的头子们正集会向最高军事首脑致以敬意。他们的靴子和勋章都闪闪发亮，但是大多数人的脸上都形容枯槁。被大批杀伤的德军正在所有的战线上溃不成军。俄国人正向柏林进逼，而美国军队正越过易北河快速同苏军会师。

自从希特勒十个月前侥幸逃脱德国将军们企图用装了炸弹的办公包来暗杀他的阴谋以来，突然变成了一个老人，腰弯了，背驼了，一只脚拖着走路，左臂微微发颤。但是当他的朝臣聚会起来向

他喃喃地发出生日祝贺的时候，希特勒的声音又尖锐锋利，眼睛又炯炯发光，一如往昔了。

在生日祝贺之后，紧接着召开的会议上，希特勒的这群爪牙们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当威廉·凯道尔元帅吞吞吐吐想指出当前局势的严重危险性时，希特勒不耐烦地把他撇在一边。他粗声粗气地说：“别说废话，俄国人将在坚不可摧的柏林大门前遭到最悲惨的失败，然后我们将把盟军扫进大海里，”希特勒的具有魔力的目光扫视着每一个人，谁也不敢动一动。

帝国的空军元帅海尔曼·戈林的说话暂时打破了这室人的沉默。这个肥胖的、曾经是一度强大的德国空军的首脑说，德国是必然会胜利的，但是元首如果能在贝希特斯加登深山僻静处指挥军队，要安全得多。希特勒眼睛瞪了起来：“你建议的真实意图，”他大声说：“就是你想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去。你可以去那个地方，悉听尊便。”在冷酷的沉静中，戈林举起他那用宝石镶嵌起来的元帅棒向希特勒敬了一个礼，然后就离开了。几分钟之后，戈林的装甲“梅塞施密特”汽车飞快开往了巴伐利亚——他认为的安全地，后面紧跟着装满财宝的卡车护送队。

在掩蔽所里，希特勒到一张大地图面前，向他的部下们解释他的战略。希特勒的一个地位很高的将军后来说：“我们全都知道，他在地图前向我们指示作战的那些师早已不再是能进行战斗的单位了。但是，听着他讲话，我们大多数人感到或许也还有点希望。”希特勒确有一份精心策划、把俄国人打出柏林的计划。这个反攻将由他的最宠爱的精锐卫队司令、党卫军将军费里克斯·史坦纳来领导。希特勒宣布这个计划时，压尖了嗓子叫道：“不管哪个军官，如果要把他部下的一个人留下来不参加这个行动，五个小时内必须把他枪毙。”

4月22日下午，元首向他的参谋部人员宣布了这个新的反攻

的头一回合的胜利。海因里希·希姆莱，这个善于阿谀奉迎的党卫军头子曾用电话向希特勒报告说，史坦纳的反击正在全线进展，而苏联红军正在从柏林后退。接着，几封电报接连不断地安放在作战部主任阿尔弗雷德·约道尔将军面前。有好几分钟，约道尔简直惊呆得说不出话来。希特勒注意到他的脸色，说：“怎么啦？怎么啦？”但约道尔对希特勒说：“我的元首，史坦纳根本就没有发动进攻。据报告，朱可夫（苏军司令）元帅的部队已进入了柏林。”

这时，希特勒两眼直挺挺地望着前边，他的脸气得发紫，呐呐地说：“党卫军！”然后低语变为大声吼叫：“我被党卫军出卖了！起初是陆军，后来是空军，现在是党卫军。叛徒，你们全是叛徒，狼心狗肺的叛徒！”

整整三个钟头，希特勒陷于狂怒之中。他的性子一旦发作就不可收拾，势头之猛使那些即使从不激动的凯特尔和约道尔将军——象他们中间有一个后来回忆说，也极感狼狈。最后希特勒蹒跚地走回他的椅子，气喘吁吁地嘶哑着嗓子说：“第三帝国完了，我什么也没有了，只有死亡。我要待在这个地方直到最后时刻，然后我向我自己开枪。没有任何东西留下可以用来打仗的了。让戈林去和同盟国谈判吧。”

希特勒的这些话被报告给了戈林，因为根据希特勒在1941年颁布的一项继承权法律，戈林被指定为希特勒的继承人。可是这个胖乎乎的、乐天派的元帅，感到很有把握的是，他能够和同盟国谈判，争取到合理的投降条件，即使最坏的情况出现，他也可以让自己得到舒适的流放。因此，他给希特勒打了一个回电，电报说：

我的元首——鉴于您的决定，您是否同意由我来接管整个帝国的领导？如果在今晚10时未得到您的答复，我将认为势所当然。

戈林立即把他的部队增加到一千名士兵，而且向他的部下宣布，他将在明天飞往盟军司令部去会见艾森豪威尔将军。但是，正

当他准备向美军最高司令部发电报的时候，他接到了一封无线电报：

戈林——你所作所为须处以死刑。如果你自动辞职，我将不坚持追究责任。否则我将采取相应措施。

阿道夫·希特勒

当戈林半信半疑地盯着这份电报看的时候，一小队党卫军的皮靴声已在他房外石板上蹀躞可闻。这位帝国元帅被捕了。希特勒根本不愿意让戈林来继承他的宝座。

当希特勒戏剧性地在元首掩蔽所同人们告别以后不到一小时，他就开始筹划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葬礼了。他用冷酷而明确的语言，命令正在同美军作战的第十二军温克将军迅速返回柏林增援。同时下令柏林的每个男人和男孩都坚守街垒阻挡俄国人的前进。逃跑者就要被吊死。

听到这一命令后，一位主管北部德国民间事务的老纳粹中坚分子，叫戈莱脱·魏格纳尔的，设法给希特勒挂上了电报。他恳求：元首如能授权在西线向英美盟军投降，俄国人即可被制止，直到停战为止，这样可以避免遭受浩劫。可是当时希特勒却说：“魏格纳尔，我要的就是浩劫。这可以使我的结束更为光辉。”第二天，4月25日，俄国人包围了柏林。

在元首掩蔽所里的最后七天的日子，希特勒身边的人已经是越来越少了。戈培尔和他的夫人带着他们六个孩子跟着他，他们后来把孩子弄死以后自杀了。再就是希特勒政治上的左右手马丁·鲍曼也决定留下来。希特勒的情妇伊芙·布朗不愿意离开他。在紧挨着希特勒房间的两个钢骨水泥的窖里，是二十六名高级官员和另外三十名秘书和卫士。

当俄国人的炮弹打得越来越近，并震撼这个掩蔽所时，“每个人渐渐都象要疯了。”酒象水一样地在哗哗地流，喝得酩酊大醉的

普鲁士将军们脱掉外套，同他们的速记员发疯似地狂舞。希特勒老对着地图思索盘算，举行着会议。

最后，到4月28日，从斯德哥尔摩发来了一条新闻，人们把它交给了希特勒。这条新闻报道说：党卫军的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正在同贝尔纳多伯爵进行谈判，德国第三帝国向盟军投降。这是使人无法忍受的最后一击。希特勒吼叫：“现在居然连忠诚的海因里希也这么干了！”但是他的这种大发雷霆——他的最后一次，是短暂的。突然他变得冷静而又干脆。希姆莱的背叛粉碎了希特勒企图进行反击的任何希望。末日已经来到了。

元首掩蔽所里的最后两天是最富有传奇色彩的。4月29日清早，希特勒和伊芙·布朗举行了简短仪式的婚礼。婚礼进行的时候，俄国人的大炮正轰击着整个总理府，炮弹就在他们的头上爆炸，掩蔽所房顶上的泥灰象下雨一样地抖落下来。然后希特勒向他的秘书口述了他的“最后的政治意愿和遗嘱”。这些全是重复他过去说过好几遍的老话。他把戈林和希姆莱清除出纳粹党，而指定海军上将卡尔·邓尼兹作为他的继承人，任命为国家领袖。

人们继续象平常一样把各种新闻摘要送给希特勒。在这些要闻中，他详细地阅读了一则关于墨索里尼死亡的消息。他是被游击队的一个小队处死的，人们把墨索里尼和卡拉拉·佩塔茜的尸体倒挂在米兰广场上，使之暴尸示众。希特勒早就给他的部下发出指示：在他自杀之后，必须把他和伊芙的尸体销毁掉。现在他又再次发命令：“全部销毁，你们明白没有？全部！”

在当天中午举行的参谋部例会上，他平静地听着关于俄国军队向前挺进的报告：俄国人最迟将于5月1日直接进攻总理府。希特勒向与会人员说：“现在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不管情况如何，决不能让他们活捉我。”到了深夜，希特勒下令所有的人集合在主要掩蔽所里，元首希望同每个人告别。当大家集合起来以后，希特勒

默默无言地轮流同每个人握手。有个目击当时情景的人后来回忆说：“他的眼神呆滞，看起来好象已经远离人世。”

之后，人们回到掩蔽所的酒吧间，突然喧哗大作。有人抓起一瓶酒跳上桌子大声叫喊：“为死亡者干杯！”有人开起了留声机，人们发疯似地跳舞，大声嘶唱一直闹腾到第二天早晨。从元首掩蔽所发来了指令，命令大家保持安静，但谁也不理。

4月30日3点钟，希特勒象平时一样，吃了午餐。他看上去脸色苍白而沉静，但吃来好象颇有滋味。吃完饭，他同他的妻子伊芙走出饭厅到一个主要过道上，鲍曼·戈培尔和他的主要助手已等候在那里。他和伊芙默默地同他们握手，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去。房门砰地一声关上了。希特勒的一名卫兵守在门前。过了一会儿，房间里响起了一声枪声，这个“千年帝国”终于末日来临。

与原子弹有关的一个神秘人物

《欧洲内幕》和《亚洲内幕》等书作者约翰·根室

1942年的一天，一个美国上校代表当时我们属于最高机密的原子计划工程，走进纽约一家比利时矿主埃德加·桑吉埃办事处，问他能否帮忙为美国从比属刚果（即今扎伊尔）弄点铀矿来。上校还向他说，这一要求对于盟军的反法西斯战争是事关重大的。

桑吉埃先生彬彬有礼的听着这些话，并且要求上校把证件给他看。当他对上校深信不疑后就满口应诺，表示他能向美国提供适当数量的这种珍贵的矿产品。并问：什么时候要？上校回答说：“我们最好马上就拿到手。当然我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桑吉埃先生对上校说：“正相反，这种矿产品在纽约就有。有一千吨。我早就存放着等你来呢！”

埃德加·桑吉埃是整个战时中不露真姓名的重要人物之一。

尽管他到美国访问不下于四十或五十次，但是他来来去去从来没有受到报界注意。这样一个无名人士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如果没有桑吉埃，当时就不会生产出原子弹——至少是在1945年的夏天不会有原子弹，而美国正是那个时候在广岛和长崎扔下两颗原子弹，终于结束了对日本的战争的。桑吉埃不但为制造这第一、第二颗原子弹提供了可怕而亟需要的铀，而且在此之后几年里美国制造的每一颗原子弹，不论它是在美国内华达州还是在南太平洋上进行试验用的全部的铀，都是桑吉埃在刚果所经营的公司所属矿井里提供的。

关于埃德加·桑吉埃的故事，有好些年未作宣传。这样做有好多理由。首先，桑吉埃自己不愿抛头露面。1953年时，我曾经在巴黎同他一起进午餐。他对我说：“如果你准备写有关我的故事的话，最好不要把我个人写进去。”当然他的意思是不要我在书中强调他个人的重要性或者不要使他留给人爱好虚荣的印象，因为他不是那种人。其次一个原因是保密。因为有关刚果铀的开采的许多细节在当时还是最大的机密。

我开始听说桑吉埃的名字是我准备写一本有关非洲的书、正在对刚果进行研究的时候。位于刚果东南部的上加丹加是储藏铀的一个省，而且也是地球上铜矿储藏量最丰富的地方。拥有开采这些矿藏以及其他矿产品的支配权的是“上加丹加矿业联合公司”。而桑吉埃正是这家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之一。

桑吉埃1879年出生于比利时，之后受教育成了一名工程师。他是一个好冒险、意志顽强、敢于负责和极为聪明的人。当他快三十岁的时候，他移居到非洲。从此这块黑非洲在他今后一生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1939年他当上了“上加丹加矿业联合公司”的总裁。在加丹加的首府伊丽莎白堡的博物馆里，我曾经看见展览

着一堆沥青铀的东西——铀矿石。它象一头猪那么大，颜色是黑色和金色的，看去似乎上面盖上了一层绿色的渣土沫。它产于加丹加的辛考洛勃韦矿地，展品上的标签写着：“注意，有放射性！”凡是要照相的都不能靠得太近，否则照相机里的胶卷就没有用了。

桑吉埃自1921年开始，就在辛考洛勃韦开采沥青铀矿。在当时，谁也不觉得这种矿藏里所含铀有什么价值。人们当时的全部兴趣集中在镭。然而到了1939年事情开始起了变化。当时一位英国物理学家在极为秘密和紧急的情况下找到他，并告诉他德国科学家正在进行使原子分裂的工作，而且很可能用铀原子的分裂来制成一枚原子弹。桑吉埃听了这一情况后，他说，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是：决不能让铀落到敌人的手里。因此，桑吉埃十分担心纳粹德国会入侵刚果，他擅自决定安排了将一千多吨富沥青铀矿矿石用船运到美国。他后来对我说：“我干这件事，一点风声也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1940年矿石运到了美国，矿石全部装在钢筒里，储存在纽约的一座仓库。在矿石运抵美国以及正式用于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这段时间之内，还发生了一些离奇的插曲。

桑吉埃对矿石一事极端保守秘密，他仅仅向美国有关领导报告过铀就在纽约。美国国务院对此甚为关注，决定把这个危险物质运往诺克斯堡，以便安全保藏。但是这件事一直拖了好久未予办理，差不多耽搁了一年，这一耽搁几乎使美国政府贻误了桑吉埃这种有远见的安排。当时，那些原来知道这件事的人竟然忘记了铀究竟存放在什么地方。

直到1942年，即本文开头所说的那位美国上校，才对桑吉埃在纽约的办事处作了一次历史性的拜访。不到一个钟头，这个上校很快就拿到了由桑吉埃签署的一份黄色纸张的备忘录。现在这些对原子弹计划所必不可少的铀已经成为美国的财富。

后来，到1946年，当桑吉埃访问美国的时候，克洛夫斯将军在

杜鲁门总统出席的情况下，授予他一枚“功勋奖章”。他是极少数的几个非美国人获得这样珍贵荣誉中的一人，自然他对此是十分自豪的。但白宫授予他荣誉的理由完全保密，有关的记录存进了白宫。给予嘉奖的措词是故意说得不具体明确。我曾经见到过它的全文：上面仅仅提到埃德加·桑吉埃“在战争时期原料物资方面的贡献”。

桑吉埃对所有这些荣誉并不很在意。只是有一件事他是引为十分自豪的。一种新的矿石（即含有铀、钒和铜混合结合的矿石）被命名为桑吉埃矿石。桑吉埃后来于1963年7月27日死于法国，享年84岁。

六十万人守口如瓶

托马斯·姆·约翰逊

一个与众不同的秘密组织保护着原子弹的研究和发展工程。在将近四年时间里，这个组织保证了原子弹的秘密不致于被那些健谈的美国人泄漏出去，也防止了被到处探听秘密的外国人所窃取。除此之外，它还侦察出纳粹德国原子研究计划。

在1942年1月，詹姆斯·皮·康纳特博士绝对信任地告诉过一个军事情报人员有关正在进行的巨大实验和其重要性。他说：“可是主管科学研究发展的部门却很担心，有些工人可能太爱嚼舌头。请你去巴克莱一趟，检查检查这方面工作”。

约翰·雷斯道尔少校（后来升任中校）就脱下军服穿上便衣，开始了他的乔装打扮、改换身份的工作。他先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进行“研究工作”，认识和结交了几批从事原子研究的科学家，进入了实验室里，参观了新的原子反应堆的回旋加速器，并且也了解到在芝加哥与此有关联的工作。之后，他又穿上了军服召集了工

作人员，提问道：“假如我是一名间谍，该怎么办？”

9月份，负责“曼哈顿计划”的勒斯里·尔·格洛夫斯少将对他讲：“去各个地方都同样来这么一下，要把守口如瓶作为‘曼哈顿计划’的一条法定纪律。”

在美国的橡树岭城以及其他地方，成千上万个热情的爱唠叨的美国人，正在从事着那种具有高度机密性的工作。在“保护计划”的这个口号下，雷斯道尔少校在威廉·康沙特少校的协助下，开展了一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保密工作，他把一批年青的男女组织成一支秘密人员队伍，起名叫做“潜行人”。这支小队的官员大都是经过陆军部专门保安工作训练的律师，它的特工人员也是从陆军的反谍报部队和宪兵队调来的人。由于这样一批人的克尽责守，结果在我们整个的原子计划实施过程中，没有发生过任何由敌人策动的破坏行动。

他们中间谁也不准提起“原子”、“铀”和什么“秘密武器”的字眼。所有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员，包括“潜行人”小队在内，在讲到这些事时，必须用各种暗语来代替，而这些暗语是经常变换的。原子叫“光端”，炸弹被叫作“小艇”。这个“潜行人”小队还经常调查同这项秘密计划打交道的官员和一些公司的股票持有人——也包括成百的那些与之订立合同者的情况。为了防止间谍和可能的飞机轰炸，这项秘密计划的运行是分散的：在田纳西州的橡树岭、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玛斯，华盛顿州的亨福特和其他地方。

在这些地方，每份发错了的文件，如一周未见放回的，都要进行严格追查。每一张复写的东西都要登记在案。晚上下班，每个办公室都必须检查有没有散落的文件，写字桌上了锁没有。对职工人员则老是絮絮不休地强调“守口如瓶”的纪律。当时罗斯福总统经常从这些地方得到各种各样的书面报告，这些报告都是陆军部长史汀生亲自携往白宫的，并且在旁边看着总统读完这些报告，

然后把这些报告再带走。

参加“曼哈顿计划”的人员前前后后共有六十万人之多。所有这些进来工作都签署了保密协定。在整整四年之中，有二千名说话随便的人被检举。如果是军事人员因为某种理由解除职务另有任用时，则安置在不会遭敌人俘获的工作岗位上；文职人员的解雇则必需妥善处理，防止他们变得恼火而乱说。

科学家是令人最伤脑筋的问题。如果德国人知道了我们那些非常著名的原子科学家在什么地方的话，他们就能推断出其他的事情。因此，这些科学家都使用各种代名词。例如，阿瑟·H. 康普顿博士叫做A. H. 考玛司。埃里可·弗林博士叫做亨利·法梅尔。他们每人身边都有一个警卫人员。绝大多数的科学家们都是行动谨慎的。但是他们中间有极个别人很可能在讲学中脱口而出，不小心地泄漏了某些事情。有人就曾把装满重要资料的手提包遗忘在火车上了，结果有六名情报人员找了一夜，终于找到了——并且完整无缺。

就在战争开始之前不久，纳粹德国曾经把两名最好的科学家派到美国来，企图了解我们的原子能研究人员究竟在做些什么。在“曼哈顿计划”开始工作后，我们截获了由别的间谍用摄影微粒制作的书信，他们试图同我们的科学家们进行接触。

加拿大是一些间谍用来窃取原子弹生产秘密的基地。在那里，英国物理学家阿兰·依·梅曾送给苏联情报人员铀的标本和关于加拿大肖克河的工厂和我们在芝加哥一些实验室情况的部分报告，他曾三次参观过这些地方。之后，他曾想第四次访问实验室，还想再来美国。可是“潜行人”小队已经怀疑上他了，格洛夫斯将军断然拒绝。他被英国当局逮捕后，承认有罪，判处十年徒刑。

担心希特勒的“秘密武器”里可能包括原子弹这种阴影一直是悬在我们的头上。因此“曼哈顿计划”加速了步伐。好几个国家的科学

科学家们被带到了西半球来。由于英国情报机构的帮助，世界闻名的原子物理家纳尔·鲍尔从丹麦逃出来到了美国。他用“尼克拉斯·贝克”的代名为“曼哈顿计划”工作了两年。

接着有消息传来：德国在挪威的诺斯克氢化工厂——欧洲唯一生产大量重水的工厂——正在加紧生产重水。挪威的突击队员从空中降落到挪威，破坏了工厂的一部分，销毁了相当数量的重水。后来德国人企图用船只把剩下的重水运走，地下游击队又把它炸毁了。

到1944年2月，哈莱士·克·科尔伏特上校，富尔曼少校参与了在伦敦的工作，会同英国人一齐开始侦察关于德国原子计划的情报，纳粹对原子研究也看作是最高的机密严加保守。首先，他们检查了德国的铀的供应情况。纳粹德国曾经占领安特卫普附近的巨大的炼油厂。但是比利时的地下游击队却想办法使一船船铀矿石运到别的地方去了。一个捷克的情报人员报告了在约切姆斯托尔矿山的产量。战前做铀和钍买卖的商人都名列清册。其他的金属冶炼厂、发电工厂和任何可疑的设施也一个一个记录在案。

为了搜寻希特勒可能有的原子弹实验所，伦敦的情报人员想找到那些能做这种研究工作的德国物理学家所在的地方。从飞机上拍摄的照片显示出，原来在靠近柏林的达拉姆实验所已经搬迁了。而这一情报从爱说话的德国科学家那里得到了证实。这些科学家说，他们有些同事已经离开柏林去到一个未经透露的地点。

之后，英国情报机关又听到，有一个亲纳粹的瑞士科学家正在贝辛根的实验所里帮助德国人搞一种新的炸药（贝辛根在德国南部的霍亨佐伦地区）。另一个美国检查书报邮件的机构截获了一封发往南美的邮件，是由一个在“D字研究实验室”工作人员写的。这封信的邮戳上的地址是在离贝辛根以北三英里的海辛根。而据一位友好的瑞士科学家的报告，靠近那里住着一位魏纳·海辛堡格

博士，而这个人很可能是德国的一名最有权威的原子物理学家。所有的盟国的和中立国家的原子科学家都被问遍了，他们认为到底哪个纳粹科学家最有可能在上面所说的实验室里工作。他们提出了五十个人的名字。不久，“潜行人”小队给他们许多人都作了描述，有他们的地址和照片，甚至把其中一个人的讲话都录了音。我们对每一个可能作为实验所的建筑物都查证清楚。

1945年的春天，盟军部队正席卷德国，这时升任了中校的雷斯道尔立即发布命令：“尽快首先进入霍亨佐伦地区，在德国科学家们没能逃走之前就抓住他们和他们的秘密。”

于是，将近一百名经过挑选的士兵组成了一个小组，起名为“阿尔萨斯”，由勇猛闯将波里斯·特·帕歇率领。他们为一批由西北大学教授斯麦约·艾·高司密脱为首的科学家扫除障碍。这个小组的一个首要的秘密目的是要去寻找法国第一流原子科学家弗特列克·约里奥·居里。他是居里夫人的女婿，后来被任命为法国原子能的高级专员。由于纳粹德国曾经使用过约里奥的实验室，因此，高司密脱教授相信他是知道许多纳粹在原子方面工作的情况。为了避免在我们军队到达的时候，纳粹绑架约里奥进行讹诈，帕歇和卡尔福特上校带了两名反谍报部队人员，随同法国的先头坦克部队，很快打进巴黎。据约里奥后来说：两个德国科学家先占了他的实验室，从事他们的核能物理研究。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如何制造一枚原子弹。在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阿尔萨斯”小组立即直插德国，随同占领史蒂斯伯克的部队前进。在那里的大学里头，美国科学家和兵士获取了大量珍贵的资料。这些材料使人深信，霍亨佐伦是德国的原子中心。

这时，突然传来了自诺曼第登陆日以来使人最吃惊的消息：有张从高空摄得的照片显示出贝辛根附近的村庄有奴隶劳动营和高压电线。而且正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高速建造着一座巨大的工厂。

过不久，柏林广播电台宣布德国已拥有原子弹！

为了揭开其中的内幕，科学家，侦察人员和士兵们扑向了贝辛根，然而那里的情景使他们大失所望，不过这对人们倒是个很大的宽慰，原来那个巨大的工厂并不是计划用于制造原子弹的，只是用来从页岩里提炼石油。他们转向别的工业设施去寻找。在苔尔芬根，他们找到世界上第一个使铀原子裂变的奥托·海恩，他正坐在他那个巨大实验室的写字桌旁。同他在一起的还有大约二十名科学家。纳粹们否认他们曾经有制造原子弹的意图。他们说他们的图纸资料全毁了。不过，有一个著名的科学家欢迎美国人，说：“我们一直在等待着你们呢！”并且交出了他的工作概要说明。同时，我们还在一个污水池中找到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它们是被隐藏在一个大油筒里。最后，有几个德国科学家说服了其他科学家们全部彻底交待。他们这才把实验室里的东西交了出来——藏在旧的磨房里的一小部分重水和埋在田野里的氧化铀。最后他们又交出了装在山旁边一条很深的地道的他们的“原子反应堆”。

事实是一个绝大的讥讽，原来他们的“铀分离器”和“原子反应堆”全是不中用的废物，他们根本不能进行或保持任何连锁反应。德国人还不能生产钚，他们不相信从铀 238 中可以分离出铀 235 来（而我们已发明了三种方法来分离铀 235）。他们只有一座回旋加速器，而我们已有三十多座。德国的最好的原子科学家还没超越实验阶段。

即使在他们被俘之后，他们还深信我们是如此落后于他们，因此不得不模仿他们无价之宝的成就。从这点看，“潜行人”的保密行动是大大地成功了。

赢得战争的秘密

根据弗莱雪·纳皮尔和查尔士·维·巴雷

所著《无高地》一书缩写

美国战舰“奥古斯塔”号正急速向西横渡着大西洋。其时正是午夜，而且是处于战争时期——1945年8月5日。不过当时德国已经战败了，半个世界的战争已告结束。因此，这艘重巡洋舰亮着明晃晃的灯在大洋中航行。

在餐厅里，军官们围着一壶咖啡坐着。他们刚刚听了关于未来的描绘，这使他们感到十分激动和惊讶。

那天晚上军官们曾经招待了杜鲁门总统。杜鲁门同英国和俄国盟国开完波茨坦会议后和这些军官们一起，正在回国的途中。军官们一边吃着甜点和咖啡，一边把话题转向波茨坦的这次会议。这时，战舰上的医生华尔脱·帕帕列奇中将提出了一个每个人心中都在思索的问题：在波茨坦会议上有没有任何承诺和协定，要俄国人参加太平洋战争，从而加速日本的垮台？

对这个问题，杜鲁门总统回答的一番话使人永远难以忘怀。他说：没有，没有达成这种协议。要是说俄国人在波茨坦会议上有点难对付的话，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美国已经拥有了一种新式武器，这种武器的力量和性能已经使我们不再需要俄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帮助了。他说：“这种武器威力极大，它每一个相当于二万吨梯恩梯炸药。”杜鲁门总统还告诉“奥古斯塔”号上的军官们，这种新式武器的发展是完全保密的，它已经经过试验，现在能用来结束战争了。然后他接着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场赌博，在这上面已花了二十亿美元。不久之后，我们将很快能知道这种武器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杜鲁门总统在“奥古斯塔”号的餐厅里吃着星期日正餐时，在西太平洋的马里亚纳群岛已是第二天清晨了。那里美国海军海蜂型飞机象往常一样，每天从凌晨3点就开始工作，一个星期七天，天天如此，已连续进行一个多月了。他们是热火朝天地向美国第二十空军大队不断供应高效炸药和燃烧弹工作链条中的最后一环。克迪斯·依·李梅少将的B—29型轰炸机队，在7月份一个半月内已经向日本的各城市倾泻了四万吨的炸弹。在前一个星期四，即8月2日，他的轰炸机队的驾驶员们曾经用一天创记录地丢了六千六百三十吨炸弹的行动来庆祝(陆军)空军节。

就在杜鲁门总统在“奥古斯塔”号上受招待的那个星期天。《纽约时报》的记者威廉·劳伦斯正在关岛。他在前一周曾向他的报纸发出电讯说：

在这里同在美国国内一样，有为数惊人的人们认为，我们甚至用不着进攻日本本土的象征性行动就能迫使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此地存在的这种乐观情绪之所以显得特别重要，是因为许多谈论这件事的人都是佩有星星的将军辈人物，因此，就被人看作是身居要职，言必有据的。

劳伦斯在他的报道中承认，他并不同意这些观点。他还说，他用十元美金同一位“一颗星的军官”打赌，因为那位军官硬是说战争在三个月内可以结束。

可是在美国第十三海军陆战队——正在夏威夷集训的第五海军陆战师的一个团——没有人搞这样的打赌。他们从一场血腥的战斗后于3月份撤离硫黄岛以来，已经又在准备接受一个新的任务：在日本本土西南的九州发动登陆进攻。这个前景正是使得第十三队的士兵不能尽情享受夏威夷媚人风光的一个因素。威廉姆·密勒少校是第三营的指挥官，他曾同日本军队在瓜达卡纳尔岛和格洛斯特角以及硫黄岛进行过战斗。现在他又在筹划准备着一场新的进攻，而这场战斗如果打起来，初步估算要有十万人死

伤，这恐怕还是一个保守的估计。一总算起来，将有七十五万部队参加这场战斗。

在东京郊外的一块萝卜地里，从日本海军中来的一队无线电专家团团拥挤着坐在一间屋子里，注视着一百八十一台强有力的无线电接收器。大和通讯部队的士兵们，他们是被专门指定来监视和记录从美国发报机发出的任何信号。现在，正是8月6日的清晨，一个值夜班的人收听到了三个星期前他们第一次收听到一种呼喊信号。这些监听者判断出它来自提尼安岛。由于在7月下旬天天听到这个呼号，他们就把它称之为“新任务公司”，以便提到它时迅速而不产生误解。在东京的密码员一直无法破译，但是日本监听人员象受过专门训练的无线电报务人员那样，能立即辨认这个暗语。这是根据美国发报员在用手发报、按键钮的个性特点来作出判断的。

现在这个信号又出现在无线电电波之中。对于日本人来说，这仅仅是必须报告和记录在案的一项任务。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新任务公司”是最最机密的第五〇九轰炸机大队，它的最终使命，是要投下第一颗原子弹以结束这一场战争。

从日本这里往东三百英里地方，集中了过去从未有过的最巨大的打击力量在晨曦中航行。二十四小时以前，美国海军的第三舰队正向南部日本的预定目标突进。可是现在它接到命令要它转变航向开往大海上，这使这支舰队的将军们迷惑不解和愤怒。海军航空兵、航空母舰第二师指挥官斯贝拉克海军少将，在“铁康迪拉哥”号战舰的舰长室里，召集了他的负责作战计划的情报官员们。他手里摇晃着一纸命令大声说：“这样打仗简直是瞎胡搞。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请问，我要你们这批情报人员干什么用的？”

这纸命令是从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发来的，它写着：

兹命令：切切注意不得干扰五〇九轰炸机大队的行动。为此，除非

另有特别指示，你们不得派出任何飞机飞临九州和本州西部。

斯贝拉克少将的情报官员们对他们领导人的发问无言以对。这次讨论的结果就是每人拿出一张一美元的钞票，聚集起来作为集体赌注，然后每人用纸写着自己对这件事的猜想，密封好待以后打开，决定谁该赢得赌注。来自纽约的埃德温·皮·斯汀文思海军少校这时回忆起1941年一次鸡尾酒会上，同一位物理学家朋友的谈话。这个朋友曾告诉他，有一些科学家正在寻找一种击破原子核而使它释放出巨大能量的办法。因此他在猜测原因的纸上草草地写上了“核子能”一类字样。还有一个军官，小詹姆斯·荷·洛维少校战前曾在白宫担任过罗斯福总统的助手。他写的猜测是一种联想：结束战争的谈判正在进行中，为此计划中的进攻不得不推迟。洛维和斯汀文思两个人的猜测，从某个方面来说，都是对的。但是后来洛维却没有赢得这笔赌注。因为时机不巧。应该说曾经有过谈判的企图，但是到了1945年8月6日，时机已失。

还在6月18日，日本最高战时委员会曾经同意作这样的试探，通过一个中立国家，看看能否作一次努力来进行谈判达成和平。这不能说是决心投降，而只能说是有那么一点开始的苗头。

同一天在华盛顿，杜鲁门总统的核心战争顾问班子也举行一次会议，不过他们的目的可不是谈判。在会议结束时，总统最后批准同意一项名为“奥林匹克”的行动。这个计划决定进攻日本本土。这项计划预定在11月份实行。

但是，6月18日会议上，战争问题还不是亨利·杜鲁门总统会议议程上的唯一议题。在美国也象在日本一样，寻求和平的行动也在秘密进行中，尽管当时双方也都在为最后的决战作准备。就在那一天，副国务卿约瑟夫·格雷私下里会见了总统，他敦促总统给予日本一个机会，即在日本战败后可以继续保持天皇制，他认为

这样一种办法将会大大促进日本向盟国投降。他建议杜鲁门总统公开发表一份声明，要求日本投降，但不妨提出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日本天皇可能被允许继续存在（这一建议还得到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的支持）。杜鲁门对格雷表示，他喜欢这个想法，但是他希望目前暂等一下，等到他到波茨坦同盟国举行会议时再提出来。他要求格雷把这个问题作为波茨坦三国首脑会议上的一项议题。

7月24日在波茨坦会议时，史汀生同杜鲁门总统商谈了十五分钟。史汀生也从贝尔纳斯国务卿那里已经听到，经由杜鲁门和丘吉尔两人同意的、对日本的最后通牒中并没有特别提到天皇的问题。波茨坦宣言只是声明这样一点：未来的日本政权的形式将留交日本人民来决定；除此之外，不用多说。

一天之后，7月25日，杜鲁门必须作出自他担任总统以来最重大的决定：如果日本拒绝波茨坦会议的最后通牒，他将要发布命令使用原子弹。这份命令在华盛顿写好，然后飞越太平洋把它送到提尼安岛。

7月26日，美国、英国，还有中国作为一个联署国，以及俄国这位旁观的赞助者，一起发表了《波茨坦宣言》。

在日本，正象史汀生和格雷曾经警告过的那样，弥漫着一片关切的气氛。由于波茨坦最后通牒没有提及天皇未来的地位问题，日本最高战争委员会和战时内阁不可能接受目前那种最后通牒。内阁经过了长时期的讨论，决定对最后通牒不予答复，采取置之不理或“用沉默来扼杀”的态度。

过后不久，杜鲁门总统接到了斯大林的信息：苏联对日本提出斡旋的建议进行过研究，认为“过于含糊”，无法认真考虑。看到斯大林持的是这种态度，加之日本决定拒绝波茨坦最后通牒，使杜鲁门总统深信不疑：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实行他在7月25日送

去提尼安岛的命令。而在这个小小的岛上，一切准备行动早已在进行中。这个行动只需用雷霆万钧的一击就把一切外交和政治纵横捭阖的微妙处扫除一光。

导致这些事情步骤早在六年前人们就开始了。

1939年1月，美国报纸曾经刊载一条新闻，报道德国科学家已成功地使原子分裂。这对懂行的来说，含义十分明显：希特勒可能在某一天会拥有一种极为可怕的武器。里奥·席拉德是一位杰出的匈牙利科学家，他在希特勒上台的时候，就同另一个匈牙利物理学家一起逃出了德国的实验室，到纽约长岛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消夏的家园里同爱因斯坦见了面。他们两人代表了一批科学家们希望说服爱因斯坦能向罗斯福总统提出警告，即德国已在原子方面取得很大进展。当时爱因斯坦还不大了解德国在原子研究方面的最新的进展，但是他的帮助是十分重要的。他同意在给罗斯福总统写的一封信上签署他的名字。然后这两个匈牙利人提出请纽约的金融家亚历山大·萨克斯（此人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顾问，一种低档贝尔纳德·巴罗奇式人物^①），向总统私人面交这封信。

萨克斯交这封信时，罗斯福总统正在白宫的二楼书房里单独进早餐。罗斯福总统愉快地问萨克斯：“你今天早上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萨克斯回答说：“有一个故事。”然后他向总统讲了有关拿破仑怎样失掉一次好机会的故事。拿破仑渴望着征服英国，但是险恶的英法海峡浪潮使他的计划受挫，阻止了法国战船的进犯。有一个美国发明家叫劳勃脱·富尔登的，向拿破仑建议，要法国制造一支用蒸汽发动的舰队，它可以轻而易举地克服海峡风浪的障碍。但

^① 贝尔纳德·巴罗奇（1870—1965）系美国一位靠做股票生意而发迹的金融家兼政府高级顾问。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为美政府国防顾问。第二次大战时为国务卿贝尔纳斯的特别顾问。——译者

是拿破仑把它看作是空想，未予置理。萨克斯问罗斯福，如果拿破仑当时重视富尔登的建议，今天欧洲的历史将会起多大的变化？当今1939年的世界，当原子科学家们正在探索一种具有无比力量的武器时，谁将首先赞助他们呢？

罗斯福总统听着这一切，脸上绽开了笑容。他马上召来了埃德温·“老爹”沃森准将，他是总统的秘书。罗斯福一手把有关的材料交给了他，并且说：“‘老爹’，这需要采取行动。”从这时起，美国政府开始对原子弹有了兴趣。

但两年过去，这一行动进展缓慢（虽然两年内希特勒已经征服了欧洲，日本军队也长驱直入开进了印度支那）。毫无计划和互相配合的原子研究工作只是在美国少数几个大学里进行着。而热心的核子科学家们则埋怨缺少经费，埋怨华盛顿的官员们反应迟钝。华盛顿的全国科研委员会里直到1941年夏才设立专门研究“铀”的机构，1941年底才真正投入政府力量。科学研究和发展部主任范尼弗·布什曾经向罗斯福总统报告了当时美国原子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并得到总统保证要拨给更多的费用和人员。12月6日，布什向他的同事们宣布了一个全力以赴的发展计划。可是时间已失之偏晚了。第二天，日本航空母舰飞机轰炸了珍珠港，美国正式向轴心国宣战。

在原子研究阵线上紧接着发生的情况是一件“只有在美国如此”的奇迹。一个曾经取得许多卓越工业成果的国家，现在在严格保密情况下从事着人类空前的最巨大的科学—工业—军事事业。在许多年以后，那些当时身负重任的人仍然不能相信事情竟然获得成功。

1942年夏末，“曼哈顿地区工程师”——即这些原子弹建造者们的称号，被批准给予工作上的“三A”，即最优先权。一名四十六岁的西点军校出身的工程技术人员莱斯里·格洛夫斯准将主持

整个行动。那年9月，他在没有现成工具、图纸和材料的情况下着手准备把方程式、理论和科学信仰所形成的无形化合物转变为实际的军用武器。

这个“曼哈顿计划”业务的规模可以说是吓坏了人的。那个时候，人们根本还不知道分裂铀 235 的三种办法究竟哪一个为好。因此三种方法都被引进使用，这一来花费极大，所有三种方法在进展中的每一种，为了取得任何一个解决办法都提出两个新的问题。为了在 1945 夏天能准备好三颗原子弹，虽然已经制造出了不到一百磅重的可裂变物质，可是在最高峰时，“曼哈顿计划”本身及密切部门总共雇佣了五十好几万人，足够组成三十个陆军师。

曼哈顿地区已变成了美国科学的熔炉。一些国内成长起来的科学天才，如新物理学家劳勃脱·奥本海默，会同从英国原子发展部门来的物理学家以及从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流亡出来的科学家们都在这个地方。在某些部门里，博士比办事员要多，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可以排列成队，象军队里的二等兵那样。

“曼哈顿计划”建立以后几个月内取得了一项历史性的胜利。那是 1942 年 12 月 2 日中午，在芝加哥大学足球场看坛下的小橡皮球戏场地上，科学家们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创造了人工控制的连锁反应。他们的装备用现在的标准来看是十分原始而粗糙的。但是在那一天夜幕降临之前的成功实验，使物理学家们已能看到他们所创造的这种裂变的进展，有一天将成为一种巨大威力的武器。

但是仍然有难以解决的实际问题横阻在前面。科学家们计算出，一个象高尔夫球大小、重量为一磅的铀 235，将能释放出相当于九千吨梯恩梯炸药的能量。然而单单这一磅重的原材料凭自身的量来说是太小了，无法经受连锁反应。在搞一次爆炸之前，它必须要有相当大的数量，也就是所谓“临界质量”（其量为多少人们当

时还不知道)。然而科学家又要使这样大质量的各种物质分隔开，使它在正确爆炸时间不致变成“临界”。

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曼哈顿计划”成员在靠近洛斯·阿拉玛斯的一个孤立的方山设立了一座原子弹实验室。奥本海默被任命为负责科研的主任。这个室以及其他有关设施中保密规定是严格的。很少有美国人会想到，就在他们中间正在从事一种革命性武器的发展工作。

同时，格洛夫斯将军已经在另一块沙漠地带精心策划另外一个计划。为了保证使尚未现形的原子弹能真正击中敌人的目标，有一千五百名军官和其他人员集中组成了一支独特的第五〇九混成团。它是空军中唯一的“小而全”事事自己干的单位。凡第五〇九团所需要的一切战斗和生活用品都绝对保证供应：交通运输工具、军械、食品、维修设施以及飞机等等。五〇九团的所有成员都是精心挑选的。

至于那个头等重要的任务，由陆战空军司令亨利·阿诺德将军挑中了保尔·迪贝茨来担任。他是一名29岁、英俊的飞行员。在欧洲战场上，迪贝茨曾是一位出色的轰炸机驾驶员。当我们进攻北非时，他先是运送马克·克拉克将军，然后送艾森豪威尔将军从英国飞往直布罗陀。

在听到被任命担当这一重要使命的半小时里，迪贝茨好象置身于另一星球。人们向他讲授了有关原子分裂的神秘的故事，告诉他美国希望在这里面从军事意义上来说取得什么，另外他也知道了：只要美国生产出第一颗原子弹，他可能就是头一个驾驶着飞机去进行投弹的人。他也将担任组织第五〇九团飞行核心的工作，并且要找到一个他所喜欢的训练场地。迪贝茨驾着B-29型轰炸机开始寻找，终于找到了他停下来的第一个地方，是犹他州的温多佛，他不再另找地方了。温多佛位于离盐城湖市一百二十五英

里处，是一大片荒芜而广阔的沙漠。

五〇九团一开始与众不同。迪贝茨作为最高指挥官，要求他的高级部属严守秘密，他们不该知道的事他从不透露。飞行的训练方式是团里驾驶员们所未见到过的。投弹的练习经常在三万英尺上空进行，而且每架飞机总是只投掷一枚一万磅重的炸弹。没完没了地强调凭视力观察投弹。这使得一些老驾驶员们感到迷惑不解。因为直接观察轰炸需要的晴空在过去欧洲空战中十分罕见，而对日空战中恐怕更是少见。

其实，对于知道“曼哈顿计划”秘密的人来说，这样做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在练习中只带一枚炸弹完全是为了模拟最终的原子弹轰炸飞行，那时装在飞机弹舱里单单一枚珍贵炸弹价值就好几亿美元。在那个时候，我们决不能让炸弹没投中目标，而当时凭雷达指引还是很不可靠的。

在扔下了他们的假炸弹之后，驾驶员们要演习一种完全与常规飞行不同的飞行。为了要能够不受爆炸影响并避免受到冲击波的袭击，科学家们计算出，任何飞机在投下原子弹后，至少要离开炸弹爆炸点八英里之外——也就是投弹后的四十三秒钟。因此，飞行员必须来个158度的急转弯，同时将飞机头部冲下以获得快速。这就要使飞机尽可能地轻装，抛弃掉所有的武器装备，只在机尾留下一挺五十毫米口径的机枪。这使得那些至今还被蒙在鼓里的飞行员们感到莫明其妙。

在曼哈顿地区，想要制造出一颗原子弹的狂热劲头从来没有低落过。到了1944年12月30日，格洛夫斯感到现在可以宣布他的进程表了。在写给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乔治·马歇尔将军的一份备忘录里，他写道：“第一颗原子弹大约将于1945年8月1日准备就绪。”由于要使用这颗原子弹来对付德国显然太晚——纳粹政权已经陷于彻底崩溃，格洛夫斯建议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应当待命

行动。为此，第五〇九团需要一个能够直接飞抵日本的基地。对这个建议，马歇尔将军、史汀生和罗斯福总统都表示赞同。

在美国控制的马里亚纳群岛的提尼安岛被选中作为第五〇九团的基地。这个小岛有一个平面的石灰石平台，中间宽约六英里，长十三英里，成了一艘理想的不会沉没的航空母舰。另外这个岛子很小，易于保密。

4月5日陆军部同意把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行动取名为“中心板”的代号。4月下旬，迪贝茨的飞行员们现在已准备好十五架轻量武装的B—29型轰炸机。他们开始移向海外。

第五〇九团几乎立刻成了海岛奇物。这时东京玫瑰^①准时地——如果并非全然清醒地，在日本的广播中广播了五〇九团的到来，可是这是其他B—29型飞机机组人员最后一次听到有关这个奇怪的飞行队的“官方”消息了。第五〇九团自己的宪兵迅速地在某些地方围起了铁丝网，并竖起机枪来加以保卫。这些地区甚至连将军出入都必须出示出入证。

然而，最使其他B—29型轰炸机队成员目瞪口呆的是第五〇九团的飞行方式。迪贝茨和他手下的人从来不参加集体的大规模轰炸——对轰炸任务完成后营房里空床累累的景象也毫无感触。他们总是单独执行任务，时而去轰炸日本占领的一个岛屿，时而来回飞行三千英里飞临日本的一些城市仅仅为了去投掷一枚炸弹——这一类的谣传在空军总部里不胫而走。

格洛夫斯将军预计全部完成原子弹的日期为8月1日，事实证明是了不起的精确。选中用来进行试验的地点是新墨西哥州离阿拉木郭多五十英里的一块荒凉广阔地区。试验时间是7月16日上午5点30分。就在这一天，开始了人类的原子时代：天空

^① “东京玫瑰”是日本在第二次大战中所雇佣的一个英国女广播员的绰号，她专门宣传美国如何失败以涣散美军军心。——译者

一团闪光照亮了方圆二百五十英里的地方，而爆炸中心象无数太阳散射出令人目眩的强光。一股四周镶嵌着深紫色和桔红色的巨大火焰足足有一英里方圆。大地在抖动。冲击波的热浪迅猛扑向四周。被原子弹击中的一百英尺高的高塔整个地被气化了。在十英里外的观察站里，原子弹爆炸引起的连锁反应的巨大轰鸣声，隔了好几秒钟后才听到。一股白色圆柱般浓烟直冲云霄，然后形成一朵蘑菇状烟云，最后一直升腾到四万英尺高空。所有在西南方向的地方，居民们都听见了一声霹雳似的雷声，尔后天空中好象太阳以十分奇异的方式又升起来，然后在右边掉了下去。一个在好多英里外的盲妇人高声喊叫她看见了一种亮光。

一份事先准备好发播的新闻报道交给了在阿尔伯克基的新闻记者们。这是一篇对这一不可思议的爆炸所作的假说明：

阿拉木郭多空军基地专用地的偏僻地区，一军火库今晨爆炸，所发出耀眼闪光和巨响据说即使远在西北二百三十五英里的盖洛普地方也能觉察。

科学家们为他们的胜利所惊服。格洛夫斯将军在写给正在参加波茨坦会议的陆军部长史汀生的一份极为机密的备忘录中说道：“试验的成功已超过了我们最最乐观的期望。”原子弹正象预计的那样，它发出的能量相当于二万吨梯恩梯炸药。

在试验之后不几天，卡尔·舒巴茨将军从欧洲被召回华盛顿。这次想任命他为太平洋地区战略空军司令，但只给他口头任命，对此他坚决拒绝接受。他对代理参谋总长托玛司·亨迪将军（当时马歇尔将军正在波茨坦开会）说：“听着，托姆，如果要我去屠杀成千上万的居民，我不能根据口头命令去执行。我需要书面命令。”虽然这种要求违反正常的“曼哈顿计划”手续程式（书面东西越少，走漏机密的可能性也就越小）。但是最后舒巴茨还是得到了书面命令。

对日本正式投掷原子弹的决定是经过好几个月人们思想感情上的斗争才勉强作出的。开初时,有些科学家曾经希望“曼哈顿计划”的科研工作将被证明是无效的。而后来原子弹终于制造出来的时候,不少科学家写了充满激情的备忘录,组织起来写请愿书,提出了不要使用原子弹的要求。

在领导战争的军人中间,威廉·李海海军上将毫不掩饰他对原子弹的反感。路易斯·斯特劳斯海军少将和亨利·阿诺德将军对于使用原子弹也持强烈的保留态度。至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波茨坦被征询到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时,他希望对日本最好不是非用原子弹不可。不过,大部分的军界领导人深信,这种新的炸弹就象梯恩梯炸药做的炸弹和燃烧弹一样,并不会引起什么道德上的问题。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居民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3月9日夜晩,在东京的一块仅仅十六英里见方的地区,由于燃烧弹引起的大火烧死了七万八千人)。

可是,由杜鲁门总统任命组成的一个临时委员会却建议,尽快地向日本投掷原子弹,而且事前不需要发出特别警告。为了留下最大限度的痕迹,委员会决定这颗原子弹要投在日本国土上至今没有被大量轰炸过的城市里。而当时没有被轰炸过的日本城市是屈指可数的。因此在开列考虑作为轰炸对象的城市名单只有那么四个:京都、小仓、新潟和广岛,后来又加上了长崎。最后作为主要目标的城市又缩小为一个。8月2日一份最机密的作战命令发到了关岛,决定投掷原子弹的日期是8月6日;主要目标是广岛城市的工业地区。

广岛是日本全国闻名的柳树之乡,有着千姿百态的美丽杨柳。这个被圈定面临死亡的最大的海港和制造业城市在三年半的战争中一共遭受过敌人十二颗炸弹的震荡。尽管如此,城市的居民们知道得很清楚,日本在战争中正在走下坡路。在那些曾经送走过

⑤

成千上万日本士兵开赴西南太平洋作战的码头上空，笼罩着死一样的沉寂。它的“凯旋馆帝国大厦”，即，“凯旋厅堂”曾经是多少士兵聆听胜利祝词和最后接受勉励的地方，如今是一片静谧和空虚。广岛在战争爆发的头几年里曾经住满了士兵，有为数达十万之众开赴前线。现在这个城市只剩下一个师的兵力了，而且主要是为了防御不是为了进攻。包括各种支援部队在内，在广岛总共也不过二万四千名士兵。由于美国飞机曾在广岛内海四周投下了大量水雷，现在已没有什么船只到这个城市来了。

1945年8月6日，是星期一。这一天，在广岛不断感到物资匮乏，失败、疏散和强迫劳动的这一年里同其他个星期一样，并没有什么不同。每家的妇女们用小块木炭在煮他们的早饭。这种炭炉子是日本家庭用来取暖和煮饭的两用火炉。早上各种各样的日常工作正在繁忙地进行。这个城市里的大多数居民对于7点09分响起的空袭警报并没有在意。那些抬起头来向着嗡嗡引擎响声方向瞧去的如果眼睛很尖的话，就会看见有一架孤零零的美国B—29型轰炸机在很高的空中飞行。但这很可能是每天清晨飞来的一种试测气候的飞机。这架飞机两次穿越了这个城市。到7点25分飞机向海上飞去。警报器在7点31分发出解除警报的信号。

这架单独的B—29飞机的确是一架测候机。它的名字是“同花顺子”。派它飞往广岛上空的指令被称之为第13号特别轰炸使命。迪贝茨手下十五架B—29型轰炸机中，有七架被指定担承这一使命。

8月4日，这七架飞机的机组人员被召集到一个小茅屋里。海军上校威廉·帕逊司(他是被任命去装原子弹弹头的)向机组人员放映了在阿拉木郭多进行原子试验的影片。在看完这些令人不寒而栗的可怕的壮丽场面后，每个人懂得了为什么飞行员们要在训练中练习在极高的高度必须立即进行陡峭而急剧转弯的道理了。

帕逊司上校还警告飞行员们不得飞行穿越蘑菇云，因为有受到辐射的危险。他坦率地说，谁也无法保证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第二天，8月5日是个星期天。炽热的太阳使天气炎热。在第五〇九团的装置炸弹的茅屋里，当原子弹正在从差动滑车上挂下来时，物理学家、军械官、宪兵、保安人员和飞行大队的高级军官聚集在一起敬畏地凝视着。

这颗炸弹约莫有十四英尺长，直径五英尺，重量正好不超过一万磅。其裂变的核芯远远不到它重量的百分之零点五，藏在最里层，就象奥本海默说的：“象裹在巨大棉花衬里中的一颗小小金刚石。”炸弹里有一个近发引信，事先按在一千八百五十英尺的高度上。当轰击原子下降到这个高度时，引信线就引炸一个传爆装置。这一装置将撞击一小块 U—235，使它以每秒五千英尺速度向前冲击放在炸弹头里的较大的一块、如茶杯形状的 U—235。在这一时刻，原子爆炸即将发生。

两个特别信使把这些至关重要的茶杯形状的物资装在象油煎土豆片罐头那样的铅筒里送到了提尼安岛。他们得到的命令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们必须保好 U—235 优先于保命，万一巡洋舰沉没——他们乘坐的是一艘重巡洋舰“印第安那波利斯”号——第一只摩托快艇或救生筏子应装运 U—235。这艘巡洋舰从旧金山急速驶往提尼安岛，只是在珍珠港稍事停留补充燃料后，7月26日把 U—235 送到了岛上（四天以后，“印第安那波利斯”号不幸中水雷沉没）。其他三小块 U—235 也已用飞机运到了岛上。每架飞机分开各带一块，都由“曼哈顿计划”的保安人员护送。

在5日午夜，第五〇九团的随军牧师为出发执行投掷任务的机组人员做了一次简短的祷告。之后，这七架飞机的机组人员吃了早饭，在6日清晨1点37分，三架测候飞机分别飞向广岛、小仓

市和长崎。因为如果广岛有雾的话，其他两个城市将作为替代的目标。过了一小时后不久，也就是8月6日清晨2点45分。迪贝茨的一架装载很重的飞机（它以他母亲的名字叫它伊诺拉·盖）在珊瑚石灰石跑道上起跑，直到跑道尽头只剩下几码的地方才飞离地面。以后每间隔两分钟，另外两架B—29型飞机起飞——一架测量爆炸和辐射，另一架拍摄照片。第四架B—29飞机则起飞得更早一些，它将伫立待命，在硫黄岛把原子弹转移并完成投弹任务，万一“伊诺拉·盖”号飞机出了故障的话。现在第13号特殊轰炸使命正在进行之中。

“伊诺拉·盖”号在太平洋上空急速拔高的时候，由于猛烈升高，飞机颤抖起来。当迪贝茨飞到足够的高度向左转动并校准飞行罗盘方向，朝北六百二十二英里外的硫黄岛飞去时，机上人员呼吸感到畅快了一些。飞机在四千英尺高度时，迪贝茨把飞行减到巡航速度。帕逊司把烟斗里的烟磕掉，低着头走到前面炸弹舱里开始作最后的装配。整个工作只花了二十五分钟左右。这个装配停当即将发放的武器，除了它的革命性的核性能以外，也还是一个充满电子神妙设计的迷宫。当炸弹落下时，在开头十五秒里，一系列错综复杂的记时装置将自动关闭，这样连接炸弹的各种装置将不会在这段时间内引爆炸弹，同时还有另外一组仪器确保原子弹不会在一万英尺以上的高空爆炸。在炸弹下落了十五秒钟之后，气压计就会触发无线电操纵的近发信线，使它在规定的一千八百五十英尺高度时发生爆炸。这样的近发信线一共有四根。其中至少有两根将确保炸弹在落到预定的准确高度时才能引爆。所有这一切设计操作从炸弹掉落到爆炸时刻总共必须在四十三秒钟内完成。

为了保证不发生机械故障，飞机上装有一个“黑盒子”，它将监视控制炸弹里的电线线路。自起飞之后，“黑盒子”就开始工作，每

隔半小时就自动检查一次，仪表盘上的各种仪器的数据必须正确无误。否则就得把炸弹重新带回提尼安岛，不能投掷。

6日清晨4点55分，天已经大亮了。“伊诺拉·盖”号飞机在硫黄岛上空同跟在它后面，将要伴它续飞的两架B—29型飞机会师了。它们编成一个V字队形，关掉了无线电通信，严格地保持着沉默，然后往西北方向的日本的四国飞去。

这时，迪贝茨通过通话器向所有机组人员讲话。他说，从这里开始，每个人必须严守自己的岗位。当他们到达日本海岸时，所有通过通话器的对话都要录下音来。迪贝茨说：“这是为了历史留档的需要。请说话时注意你们的语言。因为我们这里装的是世界上头一枚原子弹。”对于大多数机组人员来说，还是第一回听到这个说法呢！

7点09分，远远飞在他们前面的测候飞机已经抵达了广岛的郊区。在肉眼能望见的范围内一片浓密云层笼罩着日本。可是，几分钟之后，整个广岛市展现在眼下。在“伊诺拉·盖”号计划中要投下它所装货物的地点，城市景象如此清晰，机上人员甚至可以看到一块块草地。从飞机上看，在一片浓厚的云层中，露出了一个方圆十英里的大洞，就好象命运之神已经把一只钉子钉进这个城市的心脏了。

7点25分，测候机发来了它的天气预报，报告最后说：“建议：炸原定目标”。迪贝茨译出了电文，转向站在他肘旁的领航员施罗德·范戈克上尉说：“目标广岛”。

7点50分，“伊诺拉·盖”号飞过了四国岛的边缘，机组人员穿上了他们的防空服装。控制仪表台显示操纵原子弹的线路情况一切正常，没有任何日本干扰的迹象。

8点09分，在云隙中广岛的轮廓已清晰可见。迪贝茨对通话器发出指令：“我们就要投弹了。你们在听到音响信号之后，要带

上护目镜，直到发生闪光以后才可摘下”。所有投弹手们都带上了特制的护目镜，这种护目镜黑的奎宁晶体只许一种颜色，即紫色，通过它的镜片。

“伊诺拉·盖”号往西飞行到三万一千英尺高度。广岛全盘、清晰地显露在飞机的下面。从投弹瞄准器里看，广岛展现的姿态正是投弹手汤姆·费埃比从投弹目标照片上所深为熟悉的。瞄准的目标——大田河最阔的支流上一座主要桥梁的中心——向着瞄准器的十字标线移动着。费埃比喊道：“我找到目标了！”同时他启动了自动同步控制器，进行最后一分钟投掷炸弹的部署。四十五秒钟之后，他开启了无线电音响信号，这意味着还有15秒钟炸弹就要投下去了。

8点15分17秒，炸弹舱舱门弹开了，飞机微微向上翘起，突然它减轻了一万磅。迪贝茨把飞机偏向右侧六十度，然后来了一个158度急转弯。由于这个行动来得如此猛烈，机身发出了尖厉的刺耳声。

迪贝茨急急地指令机尾的机枪手鲍勃·卡龙把他看到的一切告诉大家，他自己则在心里默默地数着四十三秒钟。现在每一会儿工夫似乎都是无限漫长。

过了大约三十五秒钟之后，迪贝茨问卡龙：“看到了什么没有？”卡龙回答：“还没有，长官。”

摩里斯·杰泼逊中尉是负责仪器盘的，这个仪器盘控制整个炸弹的无线电路，他正在数着：40、41、42……杰泼逊停止了数数，脑子里闪过这样一个念头：“这是个哑弹”。

就在这一霎那间，鲍勃·卡龙眼前的整个世界突然闪起了紫色的光亮。他的眼睑在护目镜后不由自主地紧闭起来。他心里想，我的眼睛一定是发花了。当他早些时候，透过护目镜直接对着太阳看的时候，太阳光也只是微微闪亮而已。他现在一下子感到

晕头转向，以致不能立即向通话器报告他的所见所闻。

卡龙一直在注视着一次大爆炸，但是这次爆炸的时间之迅速，用计秒表也难以测量，它一下变成一团直径有一千八百英尺左右的火球。火球中心的温度高达一亿度。广岛已经成为一个失踪了的城市。

回顾8月6日早上7点31分在城里响起的解除警报信号并没有使广岛的生活步伐有任何变化。绝大多数的人他们太忙，或者太懒，以致对空袭警报根本没有在意。当单独一架高空飞行的B—29 侦察机离开广岛的时候，就象它二十二分钟以前飞来时一样，并未激起那怕是一丁点的骚动。到8点15分，广岛有几个眼尖的人看到一小队飞机，其中一架掉下来三个降落伞。这些降落伞是从一架测量爆炸和辐射的飞机上投下来的。他们用仪器来记录测量结果。广岛一些人看到飞机上落下降落伞就高兴呼叫，以为这些飞机一定出了毛病，因此机上人员不得不跳伞逃命。

在整个四十五秒钟里，广岛晴朗的天空别无他物只有这几个降落伞在飘荡。可是，突然间，连个声响也没有，广岛上空已看不到蔚蓝的天空了。

据后来一些幸存者回忆：一开始，原子弹在广岛上空爆炸的一瞬间，几乎是一片令人目眩的强烈的光亮，美丽多彩得使人感到畏惧。一个目击者描绘说，他先看见了闪光，这个闪光从升起到光芒四射的过程中是强烈的白光，逐渐转变为粉红色，以后又转成蓝色。其他的人则说他们似乎看见了“五种或六种鲜明光亮的色彩”，有人则说只见一道白光里闪烁着“金色闪光”，使人联想起就好像一盏巨大无比的摄影镁光灯在城市上空爆炸开了——这也许是最普遍的一种印象描述。人们留下的唯一印象都是眼睛看到的。至于是否发出过什么响声，谁也记不得听说过。

成千上万的人甚至连什么也没看见。他们站在直接受到辐射

热的地方立时被焚化了。这种辐射热使广岛中心成了一座巨大的焚炉。另外成千上万的人只活了一、两秒钟，然后不是被冲击波打碎得四处横飞的玻璃碎片切割而亡；就是被压在倒塌了的墙底下；再就是让倒下的横梁、砖石或其他遭受爆炸直接冲击的固体物给压死了。

有好几个因素，使这次原子弹所造成的破坏比核子专家们预先估计的还要严重。第一是投弹投得准。费埃比少校的瞄准工作十分完美。尽管炸弹是在飞机快速飞行时丢下的，比原定方位偏东三英里、在空中则接近六英里，但炸弹的起炸离原定目标略超出二百码远而已。

第二是爆炸的时间。因为爆炸时正好碰上整个广岛居民做早饭时间，成千上万的煤炉炉火旺炽。而每只煤炉为冲击波掀倒之后，都成了一个火炬使木头和纸做的房子变成了一片火海。奥本海默曾经预计，大部分居民将会躲进防空洞里，伤亡人数可能是二万人。但是由于没有事先的警告（只有小批飞机来回穿梭于城市上空而并未扔下炸弹），大多数居民仍在准备上班。因此使伤亡人数高达七万人。

炸弹炸开时即刻爆发出的闪光产生了一场灾难。首先冲来的是辐射热，它持续的时间不过是那么一瞬，可是十分强烈，把屋顶的瓦都烧融了，石英晶体被融进花岗石块。两英里长露在地面上的电话线杆子烧成了灰烬，附近的人全部烧化。什么也没有留下，除了在沥青马路和石墙上可以看出他们被烧毁的影子轮廓。

离城市十英里之外，神户市市长站在他住宅的花园里，明显地感到有一股热气扑向他的面孔。在落弹点两英里半之外，辐射热还使皮肤发烫。一英里半以外有一本翻开的书页正好受到辐射线冲击，所有黑字都被烧得无影无踪。成百妇女衣服上深色部分被烧掉，而浅色部分则未受损害。她们的皮肤也留下了花纹图案，就

同她们和服上的花样图案一样。

随着辐射热而来的是巨大的爆炸，一团火球夹带着向外一小时五百英里速度的热风扫掠而过。只有那些表面抗力最小的东西得以幸免，例如桥上的一些栅栏、小管子和公用事业的小柱子等。还有少数几幢特别建造的抗地震的办公大楼还矗立着，不过也只剩下了一座空架子，为瓦砾所包围罢了。爆炸使所有的自来水总管道全毁坏了，以致残存下来的消防队员（三分之二的消防队员都伤亡了），对于几秒钟里烧起来的几千处大火束手无策。在方圆五英里的地区内，爆炸和大火使一切单幢建筑物荡然无存。

除了辐射热、爆炸和大火之外，广岛居民还经受其他一系列的折磨。在爆炸的几分钟后，天空中开始落下一阵奇怪的雨。雨点有如弹子大小，而且全是黑的。这个吓人事件是由于原子弹爆发的火球蒸发了水汽而形成的云层又迅速冷却而造成的。这种“黑雨”对扑灭火焰无济于事，相反只能增加广岛人民的惊恐。

接着“黑雨”而来的是风，一股巨大的“火风”刮向了灾难的中心。广岛多处起火，空气变得更加烫人，“火风”之势也愈来愈强。风力迅猛居然把挤满避难人群的公园里的大树连根拔起。这股风还在大河里掀起巨大的波浪淹死了无数的人。本来这些人为了逃避辐射热和大火而跳进河里的。

现在回过头来再说美国飞机的情况。迪拜茨事先向他的部下提出过警告：在炸弹爆炸之后一分钟，飞机可能遭受到冲击波的影响。为了防止这一点，他把机头向上赢得高度而减低速度——这一飞行技巧据许多空气动力学专家们估计将会减少冲击波影响。

在飞机尾部的炮手座位上，鲍勃·卡龙这时只见后面一条带子似的淡光向飞机奔袭而来。它无疑是一股热气浪，就好象在一条柏油公路远处所见到的那样，但是它带着长长的弧形波纹，好似把一块石头投进池塘引起的波浪一样。它所以能被人看得见，因

为是重重压缩的空气后面出现了一条真空地带。这地带不久就由蒸汽凝聚形成一条带子似的飞速移动的薄雾。这股冲击波以每分钟十二英里的速度同飞机赛跑。虽然过去在情况介绍会上曾经强调过这种冲击波可能具有的威力，但它实际威力之猛不能不使机上人员感到惊恐。

当它袭来时，迪贝茨不由自主地惊叫了一声：“高射炮火！”

帕逊司也作出了同样的反应。因为它确是使人感到好象高射炮弹在飞机二十英尺外炸开一个样。

这时，卡龙在他的飞机尾部有利地点，向通话器发出了警告：“现在又第二次来袭了”。

第二个冲击波袭来了，这是炸弹在飞机下面爆炸的一种反应。

这以后危险过去了。在和两架陪伴的飞机结成队形后，“伊诺拉·盖”号沿广岛郊外向南飞去。现在机上人员才首次观察到他们所干过的事情。

整个广岛升腾起一股尘土，这股尘土久久不散。而一道道长长、袅袅的灰色烟尘冲向中心。一条白烟所形成的烟柱，形状整齐得难以置信，笔直地矗立着。它的底层杂有红色和桔黄色的斑点，而在它的顶端则舒展开犹如一株完美的蘑菇。这朵奇怪云形花朵的茎，使人想起好象是一个巨大的墓碑似的。几分钟里头，蘑菇云向上猛窜几乎达四英里高度。

在这个被摧毁的城市上空，机组人员们的心情是极为复杂而矛盾的。有些人洋洋得意认为原子弹成了，希望这一来将能结束战争。有些人感到骄傲和惊愕参半。有的人根本还不能把他们见到的一切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迪贝茨的副手劳勃·路易斯上尉是第一个打破沉默说话的人，他说：“我的上帝！我们干了些什么啊？”

迪贝茨命令向提尼安岛上发了一个明码电报,说明“伊诺拉·盖”号已经凭视力轰炸了原定目标,效果良好,未碰上敌机,未遭高射炮袭击。接着,当飞机正长途飞行返回提尼安岛时,他又发回密码电报:“干净利落,各方面都很成功。根据肉眼观察比‘达立尼达’(在新墨西哥州试验的代号)威力更大”。

当“伊诺拉·盖”号回到基地刚刚滑行到停机坪时,二百多名军官和士兵就簇拥到它的机翼下。前来祝贺的代表团中包括新战略空军首脑舒巴茨将军,马里亚诺群岛空军的新司令诺顿·特威宁将军,第三一三空军联队指挥官约翰·戴维斯准将,的确还有好多机组人员平时很少见到过的将军和海军将领。

戴维斯将军大声喊道:“注意命令!”舒巴茨将军走向前来把一枚殊勋勋章别在穿着肮脏飞行服的迪贝茨的胸前。迪贝茨由于缺乏睡眠,眼睛红红的,脸上已好久没有刮胡子,思想上毫无准备。他这时赶紧把烟斗握在左手心,将烟斗管拢进袖子里。舒巴茨同迪贝茨握了手,顿时四周围围起了一大堆人。“伊诺拉·盖”号上的每一个人都成为一群热切探听投弹情况者们的中心人物。

整个第五〇九团要举行一次烤食“热狗”(香肠夹肉的面包)和啤酒的聚会。

但是,“伊诺拉·盖”号的机组人员却需要参加一次官员们的详细情况调查会。这个会长达两个小时。当他们前来参加聚餐会时,最后一份“热狗”和最后一罐啤酒都已经吃光了。可是稍后,每个参加了广岛轰炸任务的空军人员都被授予了勋章。

再说日本方面。8月6日上午8点16分之后,日本广播公司东京控制台的电话员已经发现它的通向广岛的电话线已完全切断。他几次试图接通这条线路,但仍然无法叫通广岛。在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的二十分钟之后,东京的铁路信号中心的工作人员也发

现他们通往广岛的主要电报的线路已经失灵。被破坏的地方是在广岛的正北方向。这时广岛附近的车站开始向东京发出报告说，广岛发生过某种爆炸。铁道通信兵向陆军总部送去了信息。大约上午10点，东京《朝日新闻》值班编辑细川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办公室打来的，它报告广岛在被敌机轰炸后已“几乎完全陷于崩溃”。

差不多在此同时，日本第二集团军参谋部官员平野都作陆军少校正好在东京的陆军总司令部里。他是一个星期前从广岛到东京来报告有关这个港口城市的军事供应情况的，本来计划星期一乘飞机返回广岛，但后来有事耽误了，因此还留在东京。现在，他面前的电话响了。这是从大阪的中区司令部打来的电话，中区司令部是驻在广岛的第三集团军下面的一个机构。电话报告说他们同广岛和广岛以西的通信联络已全部中断。

东京的总司令部好几次试图接通对广岛的通讯中心，但都失败了，原因不明。然后，总司令部不断接到广播电台、铁路信号中心以及《朝日新闻》编辑和大阪打来的报告，说明已经发生了某种极为严重的事件，但谁也无法知道这件事是怎么回事。下午1点后不久，总司令部最后获悉第二集团军发来的报告。这个报告很简短，但使人目瞪口呆，它写道：“广岛已被一个炸弹所毁灭，全城大火正在蔓延。”这个报告是广岛滨水区陆军海运仓库发来的，它幸而在爆炸圈之外。

有关广岛的各种报告源源发到东京。到这天下午已过去一半时，陆军总司令部了解到，在炸弹爆炸的时候，只有三架敌机飞临广岛上空。而且还听说有两架并没有扔下炸弹。东京五家大报的值班编辑被召到政府的新闻情报局的办公室。一位军队新闻官向记者们发布讲话，他说：

“我们相信，投在广岛的炸弹不同于平常的炸弹。我们准备在获得

有关情报后再发表声明。在此之前，你们可把有关消息放在版面的不显著地位，作为一条与报道一般空袭没有什么两样的消息。

换言之，军方还要捂住盖子。因为陆军方面早已强烈怀疑美国扔在广岛的炸弹可能是一颗原子弹（日本海军情报机关早在1944年就得悉美国已在制造原子弹，并且注意到美国政府对大量购买所有可资利用的铀矿石的兴趣）。但是陆军方面一直想把这场战争打下去，并且准备最后一招，要在日本领土上同美国军队决一死战，因此尽可能地一直扣压有关原子弹的新闻。

但是广岛的真相很快就披露出来了。在东京郊外的埼玉府的有关西准政府新闻社，设有一个很大的监听站，站上有五十名工作人员。其中有不少女孩子是美籍日本人，出生在美国，她们每天收听美国广播。大约在8月7日清晨1点（即华盛顿6日中午），监听室的头儿木下秀夫被当天值班监听的青年叫醒，告诉他所有的美国电台都在广播杜鲁门总统关于新武器的声明，据说扔在广岛的是“一枚原子弹”。木下秀夫听完青年的汇报，立即向他的上司长谷川才治打电话。长谷川根本不知道原子弹是个什么东西，但他急匆匆地赶到办公室，读着监听站刚刚送来的文本。然后他连忙打电话告诉了内阁长官迫水久经。

内阁长官又急忙把消息报告了铃木贯太郎首相。铃木首相一个时期以来正同内阁长官努力企图安排一次同盟国的和平谈判。他后来说，他们马上知道：如果杜鲁门的声明是确实的话，没有哪个国家再能继续进行战争了。没有原子弹，就不可能对拥有这种武器的国家作战，保卫自己。现在结束战争的机会来了，不再需要说服和责怪军方、制造业或任何别的人了。原子弹就是一个很好的借口。

然而，日本军方仍然不愿意接受停战。8月7日，将军们参加了内阁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并且竭力争辩说扔在广岛的不是一

颗原子弹，不过是一颗大型的常规炸弹。他们断然拒绝外务相东乡茂德的建议：立即考虑接受波茨坦最后通牒上投降条件的可能性，并且坚持要把杜鲁门的原子弹声明向日本人民封锁，直到日本陆军能对广岛现场进行调查之后再说。

实际上，日本军方早已在进行核查了。来自广岛陆军总部的平野陆军少校（就是那个有事在东京耽搁几夜因而幸免于难的那个人），已经拜访了日本第一流的核科学家仁科芳雄。他告诉仁科有关杜鲁门的声明。仁科同意作这次调查。

平野的小飞机到达广岛时已是晚上7点钟，那时天还亮着，因而还能使他看到一副令人大吃一惊的图景。他说：自从我加入军队以来，我的眼睛已经看惯了遭受轰炸以后的惨象了。但是这次全然是一种不同的景象。出现在我们眼下的第一个印象是一片无止境的废墟上看不见任何东西。在平常的空袭过去之后，路总还是可以看到的，可是这次在广岛却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一片瓦砾。

当平野从飞机上走下来时，看到的第一个人是一名空军军官，他从跑道那边走过来迎接从东京飞来的小组。这个军官的脸明显地从中间起分成为两种样子。一半是完好无损，而另一半由于曾朝向原子爆炸，已经烧伤，满脸水泡而且发黑。调查小组穿过市区来到第二集团军总部的断垣残壁面前，那里一个人影也不见了。最后总算在小山头的洞穴里找到了残存的几名军官。还未等到第二天早晨着手正式调查之前，从东京来的这两个人就已了解了事实的真相。事实上，平野早从他的飞机环绕广岛飞行时看到的地面上的情状就已明白一切了，就象在前一天，鲍勃·卡龙在8点16分时，当他从“恩洛莱·盖”号飞机上回头望时所第一眼看到的情景一个样。

在华盛顿，美国政府同意将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消息立即向

公众宣布。记者们立即从事他们认为这是历史上最重大事件之一的报道工作。当官方发布了有关原子弹的公报后，消息震动了整个世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条消息还不可能使人充分理解，但是几乎每个人都意识到这事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最早的官方公报是由白宫发布的，它在叙述了这种武器的性质和威力之后说：

“为了不使日本人民遭受彻底的毁灭，7月26日盟国在波茨坦发出了最后通牒。日本政府领导人立即拒绝了那个最后通牒。如果他们仍然不接受我们的条件，那他们可以期待着一场他们从未见识过的、带来毁灭的暴风雨。”

为了加速迫使日本帝国投降，华盛顿决定开展一场巨大的宣传运动，在日本四十七个城市投下了一千六百万份传单。同时还把原定8月11日投掷第二枚原子弹的计划提前到8月9日。美国所以要这样快地连续进行两次原子打击，为的是要日本领导人相信，广岛并不是一次什么造化的恶作剧。

可是投掷第二颗原子弹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别扭。直到最后，几乎没一件事情是顺顺当当的。这颗炸弹是钚制的，它的大小形式同在新墨西哥试验过的差不多（炸广岛的原子弹是铀制的，是迄至当时为止从未试验过的）。第二颗原子弹是由查尔斯·史维耐少校驾驶别人的飞机去投掷的。原先定的主要目标是小仓，由于上空云层遮蔽，飞机三次飞过小仓都未能发现云层空隙。因而史维耐不得不飞向替代的目标：长崎。在长崎同样有云层把它盖住了，飞机上的核武器专家阿什华兹中校下令，如果需要的话，用雷达指示目标投弹。由于飞机的燃料不足，由他负责改变华盛顿的指令。尽管投弹手在最后一分钟于云层中发现了空洞，但结果整个投弹是由雷达指示目标的，炸弹落点离主要目标三英里。即使如此，轰炸造成的破坏仍然是巨大的。

在投下第二颗原子弹的第二天，日本内阁同意通过瑞士政府

送交盟国一份文件，准备接受波茨坦最后通牒所提条件，并希望盟国能“谅解”日本天皇将继续在位。至此，除了还有一套手续和仪式之外，战争宣告结束了。

裕仁天皇同军方的一场斗争

美国退休上校邦纳·菲勒斯

邦纳·菲勒斯准将是麦克阿瑟将军总部对日本进行心理战的负责人。他主持这项工作一直到战胜日本为止。后来，他又担任了七个月的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秘书长。为了了解他的心理战成果，他先后审问了日本战时内阁成员和日本其他高级官员。

1945年秋天，我站在东京庄严的美国大使馆门口，注视着—辆黑色轿车在人行道旁停了下来。车上走下一位神情有点紧张的戴眼镜的日本人，他穿着一—种战前时代的那种后面开长叉的燕尾服和—双高腰的鞋子。当我规规矩矩地对他敬了一个礼，当我把手放下时，他接近来抓住了我的手并紧紧地握着。我们相互致意，肩并肩地走进了使馆。就这样，我作为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的军事秘书，正式会见了日本天皇裕仁。后来，我经常从他和他的内阁成员那里，开始了解到有关日本投降的几乎难以置信的内幕故事。

这些故事无可置疑地告诉人们，在日本正式投降以前六个月，苏联曾—再扼杀了日本方面要同盟国进行和平谈判的表示。苏联决心要在东方取得—个支配地位——在领土和政治两个方面。因此，它打算在对苏联最有利的时候才参战。

天皇个人决定要投降以及他第一次试图通过苏俄的斡旋来实现停战的念头，早在1945年2月14日就有了。这是发生在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进入马尼拉之后、早于美国向日本投掷第一颗原子弹之前六个月。天皇和近卫文磨（他三次当日本首相，是比较倾

向于和平主义)有一次在皇宫里见面商谈。天皇踱着方步来回走着,显然心事重重。他坦白地声称:他相信日本不可避免地要战败,但是军国主义分子却还要把仗打下去。他们的论点是:盟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只能意味着要取消天皇制。

近卫告诉天皇说,他不相信美国继续进行战争仅仅是为了要消灭天皇的皇朝。天皇同意这个看法,但是他表示由于军方控制了一切通讯工具,不可能直接同美国打交道。天皇特别想知道,近卫是否愿意帮助他进行有关投降的谈判。近卫欣然同意。很快,天皇以非凡的魄力来对军方施加压力。天皇首先指责军方一贯谎报军情,甚至向军队瞎吹,说什么日本陆军已在美国西海岸登陆,军事公报公布的击沉敌舰的数字超过美国实际拥有的军舰数量。

1945年4月,倔强的、灰白头发的七十七岁的铃木贯太郎被任命为首相。他是一个温和派人物。1936年在所谓“年青军官”的暴动中曾经遭到狙击而幸免于死。许多人认为铃木上台是向盟国表示日本希望和平的一个信号。铃木同天皇是长年的好友,因此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天皇第一天感到有了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领导人了。在几次秘密会谈中,天皇告诉铃木他并不信任帝国司令部的那些人,而且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些人对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还要蛮干下去。天皇说:再要使人民生灵涂炭就是一种罪恶。

可是使天皇和铃木感到奇怪的是,盟国方面一直没有关于谈判的消息。随着一天天过去,天皇结束战争的决心也越来越坚定了。美国B—29轰炸机一次空袭东京,就造成十八万五千人伤亡。天皇在皇宫花园闷闷不乐,散步时,亲自捡到的一张美国传单上,宣布要不断进行类似的轰炸。可是军方人士还继续争吵说,当美国军队入侵日本时,日本军人一定能够在海滩上消灭敌军。

尽管如此,人们要求前内阁首相广田弘毅通过俄国驻东京的

使馆同盟国开始非正式的和平对话。军方勉强同意进行这次试探，因为他们希望请俄国人出面斡旋可以防止苏联进攻满洲。但是苏联驻东京大使雅各布·马立克对广田的和平谈判建议出奇地表示冷淡。广田试图同苏联进行有关领土和资源的交易。

正当天皇和铃木秘密草拟一个可以接受的投降方案之时，盟国空军不断加强对日本主要城市的轰炸。这时天皇对他家里人表示，不管对他个人会产生什么后果，他决心要结束战争。最后在6月18日经过一场恶斗之后，最高国务委员会^①暂时同意作出努力，以图同莫斯科直接接触以寻求和平。可是即使如此，最高国务委员会的成员们还是无心真正来打开谈判之门。对于精疲力竭、满怀忧虑的裕仁天皇来说，这种拖延是令人受不了的最后一击。

6月22日，天皇要日本广播电台发表了一篇声明，尽管这篇声明充满了东方式的隐晦曲折的词句，但不容置疑，它的意思是明白的，裕仁企图要超越和摆脱日本国会或陆军和海军的控制，亲自来领导日本。

同时，天皇得悉苏联对和平建议十分冷淡。虽然苏联并没有对日本宣战，可是看来苏联除了要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外，对别的建议都不感兴趣。

由于军方对一切通讯设施进行严格的控制，天皇想要直接同美国接触的可能性是不存在了。7月7日裕仁指令铃木请求苏联允许派遣天皇的秘密使节去莫斯科。天皇早就选中了近卫来担负这一使命，并授予他全权代表，可以不惜代价获取和平，甚至无条件向盟国投降也行——若事情能如此发展，天皇准备在军方还不知情之前，就公开批准这个决定。

但是这个计划也失败了。7月10日向莫斯科发出了一份要求

^① 在本文中作者对日本的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最高军事会议等各类最高会议未加区分而笼统地都称作最高国务会议了。——译者

苏联政府接见近卫的无线电报后，苏联方面一直没有给予答复。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接到这份电报之后四天，在莫测高深的沉默中去波茨坦开会。直到7月22日，莫斯科才最后来了回音，要求“把近卫的使命说得更清楚一点”。天皇回答说：日本方面寻求苏联出面斡旋以达成和平。但这第二份电报始终没有再得到答复。

7月26日，《波茨坦宣言》正式发表了。对于天皇和自由派的日本人士来说，它可以作为投降的基础。但是最高国务委员会对此感到不满意。此后，8月6日和9日美国对日本两次投掷了原子弹，苏联也对日本正式宣战。8月9日，最高国务委员会投票接受波茨坦的投降条件，但同时作了四点保留：1. 日本天皇王朝继续存在；2. 保持日本本土不被占领；3. 由日本方面自己进行裁军和撤离军队；4. 由日本自己处理对战争负有罪责的人。

裕仁天皇明确地感到，提出这些条件，即使想要停止盟国的轰炸也不可能。因此，他命令最高国务委员会在午夜前到他的临时皇宫，也就是在日本挖得最深的一个防空洞地面上的小屋里开御前会议。

在那里（在被毁坏了的东京城里，敌人空袭引起的日夜不停的熊熊大火成为城市唯一的照明），展开了一场日本历史上最罕见的争论。仲夏夜的东京，闷热而又潮湿。蚊子从皇宫护城河沟死水里不怀好意地飞到会议桌旁不停地嗡鸣，而汗流浹背的领导人正坐着开会，心绪不宁，忧心忡忡，感情激动得发颤。这些人就是日本天皇和最高国务委员会的六名成员，还有那个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

最高国务委员会的三名军事长官：陆军大臣阿南，陆军参谋总长梅津将军和海军军令部总长丰田将军一个接着一个起来发言，反对向盟国投降。他们一反自己平时缄默不言和淡泊冷漠的态度，一个个声泪俱下，声称投降是不可想象的，必须战斗下去！他

们简直狂怒之极，用尖厉的嗓音哀求陛下推迟作出投降的决定。但是年老的首相铃木果断地要求表决，他的头部由于感情激动和疲劳而不住地颤动。十年前，军国主义极端分子企图暗杀未遂留在他身体里的两颗子弹，使他知道军国主义分子杀气腾腾的疯狂劲头很容易用来制造一场政变，然后把所有反对他们的人杀掉。然而铃木并没因此而动摇。终于，会议参加者一个个进行了投票表决。

三名军事长官坚持他们不可变更的反对投降的态度，除非能够满足他们的条件，即由日本自己来解除他们自己军队的武装和保持日本不得被盟国占领。而七个人中间另外四个人：铃木、东乡茂德外务大臣、米内光政海军大臣和平沼骐一郎投票赞成投降，唯一的条件是天皇制必须原封不动地保持下去。

根据严格的规定，而且这种规定过去从来没有被打破过，就是最高国务委员会的决议必须是全体一致通过的。现在一直沉默的天皇讲话了，他安详而冷静地指出，从战争一开始，军方的计划就是不符合实际的。他说：“考虑到事实的真相，现在继续这场丧失生命和财产的战争是毫无意义的。我仔细地聆听了那些反对结束战争的人的讲话，但是我仍然没有改变我的主意。我相信盟国和它们提出的条件，我准备接受现在这样的条件。”他停顿了一会儿，然后用一种在最高国务委员会中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命令口气说：“我希望你们全体在这一点上同我意见一致。”

会议至此已经开了好几个钟头了，时间已经到了清晨3点钟。当裕仁天皇讲完话后，所有成员泪流满面都低下了他们的头。这时，陆相阿南打破了沉默，他跪了下来匍匐移向天皇面前。天皇蔑视地把背对着他。阿南用哭嗓尖音哀求说：“请您作主，我们有个计划，您不能投降！”他用膝盖再移近一步，触摸到了天皇的外套，天皇不屑一顾地转过了身子。过了一会，天皇又一次说：“我希望

你们全体同我意见一致。”然后他离开了会议室。

‘东方已经破晓，会议成员最后同意了天皇的要求后离去了。这个要求就是向瑞典和瑞士拍发了一份电报，请两国政府转交给美国、英国、中国和俄国。如果能证实日本天皇皇室和主权将继续保全，日本政府将无条件地接受《波茨坦宣言》。但是与军方的斗争——军方由于对天皇的敬畏而暂时有所收敛——并没有结束。三天之后，盟国方面给予了答复，强调“日本的政府最终必须根据日本人民自由选择的意志建立起来”。对此，最高国务委员会又愤怒地争论起来，陆相和陆军、海军总参谋长又再一次要求把战争继续打下去。他们的理由是，盟国的答复意味着要消灭天皇制度。与此同时，美国飞机向日本全国撒下了大量关于《波茨坦宣言》和日本答复的传单。

当时枢密院的掌玺人木户幸一侯爵，他是天皇的心腹之一，拾到了一张传单，立即拿去给裕仁看。他们两人非常担心军队方面当得知日本同意投降后会进行反叛（当时日本军队都沿海岸线部署，因此他们对城市已被轰炸破坏得一塌糊涂的情况是不了解的）。狂热的军官们甚至可能劝说他们的部下，外面所传天皇接受投降条件是假的，鼓励士兵们继续战斗。但是天皇也知道，人们已经对空袭轰炸感到厌倦了，他们从飞机投下的传单上已了解到战争的真实的情况，因此他们是会欢迎投降的。为了防止凶残的秩序混乱，必须立即向全国广播皇室关于停止战争的诏书。

8月14日早上，天皇召集了最高国务委员会成员。当陆相和两位总参谋长再次不服从地反对投降时，天皇用威严逼人的眼光盯着他们说：“我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决定不是轻率作出的。既已决定再不改变。除非战争在这样一个严重关头结束，否则，不仅日本的国体将会彻底破裂，而且日本人民将要遭到毁灭。将来，日本要和进行战争的各种手段分道扬镳，这样，人们才会享受到真正

的永恒的和平。由于我希望人们能理解我，准备一份皇室诏书草稿吧！我需要……。”他停下来再一次用严峻的目光扫了一下军方的几个人，然后接着说：“我需要你们所有出席的表示同意。”

傍晚时分，诏书已经准备停当。夜晚 11 点，天皇已经全部录完了他的诏书讲话，送信使者伫立待命准备把这份诏书送往东京电台向全国广播。但就在这一刻，将近一千名持不同意见的士兵渗透进入皇家园地。在他们还没来得及冲进小屋时，裕仁已把这份录音锁进了他的保险柜里。

这些反叛的士兵曾经有六次闯入这所小屋搜寻这份诏书的录音和木户侯爵。他们认定木户侯爵是天皇要求投降活动中起关键作用的人，因此决定要杀掉他。木户急忙躲进秘密的地下过道里，而天皇则由于害怕被暗杀也躲进了茅屋的另一个地方。同时，另一批军队把首相铃木的住宅烧成了一堆废墟。到凌晨 4 点钟，陆相阿南由于反对天皇和策动政变未遂，自杀了。早晨 8 点后不久，东部防务区司令田中将军抵达东京，说服了闯进皇宫里的士兵们撤离解散。士兵队伍里有两名军官开枪自杀。接着田中将军回到自己的房间也开枪打死自己。傍晚时分，皇室诏书向全国广播，整个日本都听到了天皇的声音，告诉他们日本最后已接受投降。

当然，作为日本名义上的领袖，天皇在理论上也分担他的政府领导人的战争罪责。然而这并没有使这个徒有虚名的天皇的高度戏剧性故事有所逊色。他敢于当面压倒狂暴的军国主义分子，夺取了他们的权力，并且完全以意志的力量迫使他们接受了投降。

现在可以公开了

托马斯·姆·约翰逊

象潮水一样涌现出来的有关二次大战期间间谍活动的“现在

可以公开了”的故事，给人一种印象，好似我们的秘密战争是一系列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记录。然而，事实的真相是：当我们取得了一系列光辉的胜利时，我们也有许多失败和挫折——经常是不必要的——它使我们付出了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生命代价。

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给我们很多的教训。优秀情报工作所取得的赫赫战果告诉我们，情报工作有多么高的价值。而我们的失败（这些失败大部分发生在战争初期）则告诉我们缺乏准备和灵机一动式办事会使我们付出多大的代价。

当珍珠港事件突然猛烈地打击到我们头上，我们却事先毫无觉察，这该是何等令人震惊。战争期间担任副国务卿的迪·艾奇逊不得不承认，国务院收集情报的技术在主要方面并不比独立战争时期高明多少。而海军情报机关自以为是地选择了对日本航空母舰行迹的错误估计，他们还认为它们在日本领海里。至于我们收集情报的几个部门——国务院，陆军部，海军或者别的部门——没有一个是工作出色的。它们彼此之间互不通气，而且很少在一起工作。

珍珠港事件之后，发现华盛顿发给海军情报官员的关于如何改进他们工作的指示，一直被锁在保险箱里，根本没有发给大家。有的外交官对于改换密码还提出抗议说：“要改换我的密码！为什么，这个密码很好！我已经用了二十年了。”国务院翻译国外发回的电报文件，并把它分发给一百二十七个不同的办公室，需要好几天时间。从来没有设立一个收发文件的中心。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三个月，批准成立了一个联合情报局，可是这个组织一直到那个致命的早晨之后三天才开始真正工作。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我们破译了一些日本的密码文件，文件是六天之前截获的，要是当时破译那就会把日本人的计划透露出来了。

虽然太平洋上已经战云密布，而对于被日本占领的一些岛屿，

我们所了解的只是它的经度和纬度。国务院认为收集有关这方面的情报可能会激怒一个“友好的国家”，在珍珠港事件前国务院多次阻挠海军去进行调查。后来，海军情报机关又发疯似地去向每一个看到过日本岛屿的人进行调查，甚至询问流浪在南太平洋的白人、潜水采珍珠的人、捕鲸手和传教士，不管他们了解的情报是多久以前的事情。

美国曾经调集大量船只和军队进攻基斯卡岛，可是岛上日本人早就偷偷地溜走了。在瓜达卡纳尔岛，我们的海军陆战队不得不靠缴获来的日本地图行动。尽管日本人好几年来一直在进行丛林战的训练，并且学会了不少这方面的门道，但是长期来我们既不知这一事实也不知门道。

在非洲，我们第一次在陆上作战遭到了失败。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突击队员曾经截获敌人的一道命令，是关于隆美尔将通过费德山口进行反攻的一个电报，可是在一个重要的司令部里居然没有一个人能把这份电报翻译出来，因为我们把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情报专家小心翼翼地放在远离前线的后方。这是代价惨重的一个教训。之后，立即把马里兰州列德希营的特工人员调进非洲，并且将所有美国战地情报放在靠近最前线的地方工作，这样一来马上成绩大为显著。

不管在欧洲还是在亚洲，我们对于轰炸哪些是敌人易受伤害的目标这一点了解得极少。百分之七十的日本飞机的引擎是由两家工厂生产的，但是美国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两家工厂。空军情报机构说，德国电力系统单凭轰炸电厂是不能使它陷于瘫痪的。因此我们就试都未试一次。后来我们才知道可以使其瘫痪，是应该炸电厂的。

我们在搜集情报方面化钱之吝嗇是恐怕令人难以置信。有一个“远东情报部”涉及日本、中国、东南亚和西伯利亚方面的情

报，它只有一名官员和一名女职员。有一个情报官员化了五百美金收买了一个敌对强国的机场图表，就被上级斥责为浪费。有个美国驻柏林的武官发了密码电报，报告希特勒将进军布拉格，结果华盛顿方面却要这个武官自己掏腰包付电报费。

国务院、国防部和海军部大量用价格低廉的办法收集情报——即由有公开身份的外交人员或领事代表来做，有时也请一自愿的爱国者来收集。而一般来说，我们的外交人员们收集的东西都是驻在国允许他们看到和听到的东西。有些大使还禁止使馆人员出外旅行或者去图书馆收集情报，怕他们看上去象是在搞活动。

那些自愿者做的工作是值得人们深深感激的。但它终究是偶一为之，而且也不能要他负什么责任。有一个业余的间谍曾经报告说，他看到日本的一种配备有16英寸口径大炮的潜水艇，后来证明这不过是一种水上起重机。还有人报告说他们看到大量的日本军舰，其数目之多超过日本实际拥有的舰只数目。

珍珠港事件后，英国和法国曾经把他们情报机构的情报提供我们使用，然后我们就立即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科学情报工作以代替过去的临时凑合。我们安排一批学者、科学家和专门从事分析的行家进行工作，同时也让一般人员凭常识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注意观察。关于阿留申群岛的地形和气象资料是从国会图书馆里弄来的。一本德国杂志上的图片第一次告诉我们纳粹已有了一种新的四十毫米口径的高射炮。德国报纸上的一组照片，拍摄了一家工厂前面有一架飞机，于是我们了解到这种型号的飞机就是那里制造出来的。一本纳粹的导游手册上摄下有关一条高速公路隧道的相片，那里很象设有地下工厂。而后空中侦察的照片证实了这种猜想。

谍报工作要通晓各方面的事情，不管这有多么辛苦，包括从查核货运里程价格表和以铁路货车数计算的货物运输量以及提货

单。研究人员们能标出德国炼油厂位置以准备轰炸。东京城市姓名住址录上刊载的冶金学家和化学家的工作单位地址，再配上空中拍摄的照片，就发现了伪装的军事工厂。通过对德国地方报纸上登载的阵亡军官的数字的研究，可以了解到整个德国军队的实力。

有个德国战俘曾经帮助我们解开了德国潜艇上一种机巧的防卫武器的秘密。这种武器叫做射弹器，就是它能在潜艇尾部把一些化学小弹射向水中，这些小弹子勃勃地起泡时发出一种噪音干扰我们舰上的监听系统。当我们用深水炸弹去排除这种干扰时，敌人的潜水艇已逃走了。

这种武器一个时期使我们束手无策。1942年4月，在发射了深水炸弹后，水面上浮起又亮又红的水泡。情报人员收集了这些标本并进行了分析。不久，他们又抓到了一艘潜水艇的指挥官。一位情报官员漫不经心地问他：“这一次水泡泡可没有起作用。”

这个德国人吃了一惊。

美国人接着说：“噢，我们对这个全知道了。”于是他谈了有关细节——夹杂了得到启发的猜测——可是这席话使德国人如此信服，结果他交待了一切。经过实验，证明水泡的声音同潜水艇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训练我们的猎潜手们如何辨认这两种不同的声音。

早在1943年，我们曾于突尼斯俘虏了一名德国将军，经过老手做工作逗他讲话，他自吹曾经看到过德国第一次V—2火箭的试验。之后不久，有张航空工程的照片立即引起了观察极为敏锐的飞行军官康斯坦司·巴萍顿·史密斯的注意。她是英美空军情报组的照片分析专家。她从照片上辨认出在靠近佩内明德巨大土方工程的小梯形物上有一个白色呈T形的东西，还有其他一些神秘的装置。于是佩内明德遭到了轰炸，炸死了包括在那里工作的

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等一共七百三十五人。德国研究其他新武器的工作为此推迟了半年之久。有人认为，这半年时间拖延挽救了英国，赢得了战争。

在太平洋战场上，有四千名美籍日本人冒着被俘和毒刑拷打的危险在前线从事情报工作，这一工作从死去的或俘获的日本人那里，以及日本军事设施里，先后攫取到为数达二百万份的各种报告、命令、地图和日记。有一张复写纸，经过人们仔细的检查发现上面记载着一条船的调动，一个团的兵力的详细表和防止虐疾病的医疗法等等。还有一张草图关于表明军队的运输工具是怎样伪装的。

在所有的盟军对欧洲的登陆战中，第一梯队总是有情报官员伴随在一起。当部队占领敌人司令部后，情报官员们立即打开保险柜，迅速弄回有价值的文件。就是从这些文件里盟军找到了西西里岛外围的布雷详图。在攻打法国瑟堡时所以能那么快，那么轻易地拿下来，就是因为美国特工人员缴获了一份瑟堡的防御工事图。单就这个成就，就足以说明部队训练情报人员的必要了。

我们的研究人员不辞劳苦地从事对情报工作有用的科技发明，在无线电和雷达方面，在截获敌人电报和破译密码成套方法上以及天气预报方面都取得了极为显著的进步。我们发展了垂直倾斜混合空中摄影的广角照相机，用了它就能使拍摄的照片的每个细节象浮雕一样毕露眼前。飞行员眼睛所能看到的起伏不平的土地，全部都能摄下来。这样对于轰炸和侦察增加了准确性。许多广阔的地区就是第一次用这种方式制出全部地图。

用空降办法把情报人员投到敌后，然后用短波无线电很快地报告情况，这种方法的巨大价值已经为人们所公认。美国战略情报局组成之后，不仅训练间谍人才而且也从事其他种类的情报工作以及如何在敌人后方进行战斗和破坏活动。战略情报局取得的

战果有时十分辉煌和引人注目，有的内容丰富有重大价值。而且常常是二者兼而有之。战略情报局向十六个国家的地下游击队投下了二万七千吨武器和供应品以及成千名特工人员。其他的人员曾搭救了五千名美国空军人员。而战略情报局伤亡人员的总数大约一百人。这是美国历史上在进行最大范围的秘密活动取得的成就中付出的微小代价。

“沙壳”，即中美合作组织（指国民党中国和美国两国地下特务武装力量和无线电发报员的合作组织^①，遍及中国沿海大部分和内陆）。它的负责人戴笠将军，是蒋介石特务工作的头子。他在美国帮助下，也建立了一所间谍学校。这所学校训练一批中国妇女专门从事勾引日本军官和将军，以便从他们那里猎取情报。

我们最终建立了过去从来未有过的最大、最好的情报机构，它帮助美国和它的盟国免于失败。我们再也不允许我们的外交官去同比他们有着更多情报根据的外国外交官打交道，我们也不允许由于我们对一些国家的意图和实力的误解而使我们的将军和海军将领遭遇到突然袭击。美国人民一向是颇有警惕的人民，他们比过去更有理由要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切。

一个很有力的情报组织机构意味着一个更安全的国家。

^① 此系指在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同国民党特务组织共同建立的机构。他们虽然进行过一些抗日地下活动，但也敌视和破坏中国人民的群众性抗日活动。后来这种合作完全沦为臭名昭著的囚禁和屠杀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反革命组织。——译者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秘密与间谍

SS号=10339176